

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I

李 遜



OXFORD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李遜
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1 3 5 7 9 10 8 6 4 2

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I

李遜

978-0-19-944168-6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謹以此書紀念與祭奠——

我和我同代人的夢想與夢魘

目錄

前言

革命名份的誘惑

- 1 思路與方法
- 3 體制身份——被隔離的階層群體
- 7 政治身份——被隔離的意識形態
- 11 政治身份是現代的「政治名份」
- 13 體制身份與政治名份的關係
- 15 文革中的政治名份與體制身份之爭

第一章

批判《海瑞罷官》

——從上海拉開的文革序幕

- 25 江青來上海
- 29 柯慶施與批判《海瑞罷官》
- 31 被毛澤東欣賞的張春橋
- 34 「金棍子」姚文元
- 41 上海市委與批判《海瑞罷官》
- 47 北京市委的反應
- 50 張春橋收集學術界反應
- 55 「要害是罷官」
- 57 錦江飯店南樓會議
- 58 《二月提綱》與上海
- 63 姚文元再批《三家村》
- 65 小結

第二章

鬥鬼風

——被轉移了的文革方向

- 69 上海批判八個專家學者
- 72 批判「牛鬼蛇神」高潮
- 76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76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79	市委向全市派工作組
81	鬥鬼風蔓延上海高校
87	小結

第三章

紅八月

——十七年階級鬥爭的延續

91	第一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
98	上海的破四舊
103	紅色恐怖
107	有組織的大抄家
114	抄家風蔓延
117	小結

第四章

北京紅衛兵衝上海市委

——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

121	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串聯
127	「炮轟上海市委」
130	《我們老工人要講話》
137	上海市委門前的工人造反派
139	周恩來的三點指示
146	北京紅衛兵第二次南下
155	北京紅衛兵第三次南下
158	小結

第五章

造反派紅衛兵

——從反校黨委到反市委

163	「復旦傷風，上海咳嗽」
165	復旦紅衛兵領袖：勞元一
169	復旦紅衛兵領袖：安文江
172	復旦紅衛兵領袖：馬立新

173	最初的造反派紅衛兵
177	復旦：上海三大紅衛兵造反組織的發源地
184	紅衛兵造反組織在全市興起
187	全市性中學紅衛兵組織
188	從反校黨委到反市委
193	結語

第六章

工廠裏的造反派

——響應毛主席號召的積極分子們

197	工廠文革從上海開始
199	工廠基層幹部王洪文
204	王洪文最初的造反
216	勞動模範王秀珍
220	團支部書記金祖敏
222	黨齡最長的耿金章
224	小青工潘國平
228	五好職工黃金海
233	文革委員會副主任葉昌明
237	退伍軍人陳阿大
240	臨時工戴立清
244	培養對象謝鵬飛
249	最初的造反原因
256	小結

第七章

工總司成立

——艱難的公民結社

261	毛澤東要求工礦企業開展文革
266	工總司籌備會議
274	工總司的誕生
280	搶紅布行動
283	宣言、海報、袖章和大旗
289	市委的「三不」方針

291	工總司成立大會
295	上北京告狀
298	小結

第八章

安亭事件

——工人造反派崛起(上)

303	安亭攔截火車事件
312	中央討論安亭事件
316	陳伯達電報
319	張春橋赴安亭
328	文化廣場談判
335	毛澤東支持張春橋
339	張春橋為什麼簽字
345	蘇州談判
349	北上告狀的工人全部回滬

第九章

安亭事件

——工人造反派崛起(下)

353	市委會議上的分歧
356	安亭事件突破中央規定
359	市委調查王洪文等人
361	創建《工人造反報》
371	工總司總部最初的分工
372	工人造反派的構成
378	小結

第十章

工人赤衛隊

——文革遭到強大阻力

381	二·七戰鬥隊
385	市委與上海工人保守派
392	三個組織合併為赤衛隊

397	工人中的老保：王玉璽、陳阿春
399	工人中的老保：馬驥
404	工人中的老保：李劍鈺
406	赤衛隊迅速發展
411	洪雙壽事件和色織二十四廠事件
415	小結

第十一章

解放日報事件

——工人造反派取代紅衛兵

417	聶元梓以常溪萍為突破口
421	紅革會佔領解放日報社
427	工總司支援紅革會
430	赤衛隊與工總司的較量
433	市委再次妥協
437	馬天水轉變立場
440	佔領者撤出報社
442	小結

第十二章

寫作班造反

——市委心臟爆炸

447	寫作班的由來
452	市委機關幹部徐景賢
462	大學講師朱永嘉
472	黨支部書記郭仁傑
474	大學教師王知常
477	朱永嘉宣佈「我要造反」
482	寫作班召開全體會議討論
487	徐景賢終於下決心
490	市委機關聯絡站串聯成立
494	寫作班宣佈造反
499	小結

第十三章

康平路事件

——造反派統領上海文革(上)

- 503 市委轉向支持造反派
- 508 赤衛隊被拋棄
- 518 張春橋告誡造反派
- 522 耿金章赴現場指揮圍攻
- 526 上海第一場大規模兩派衝突事件
- 528 抄張春橋家事件
- 533 康平路事件中的工總司

第十四章

康平路事件

——造反派統領上海文革(下)

- 539 昆山事件
- 543 「三停事件」
- 551 造反派強行解散赤衛隊
- 556 赤衛隊員轉變觀點
- 560 小結

第十五章

接管《文匯報》

——一月奪權的開端

- 565 毛澤東生日祝酒辭
- 567 陳丕顯簽字《急告上海人民書》
- 577 上海造反派籌備打倒上海市委
- 580 毛澤東派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
- 585 《文匯報》被接管
- 593 《解放日報》和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被接管
- 595 張春橋、姚文元與工人造反派見面
- 600 造反派宣佈罷免陳丕顯、曹荻秋
- 607 毛澤東高度評價《告全市人民書》
- 609 陳丕顯希望與造反派合署辦公
- 614 小結

第十六章

經濟主義風潮

——革命口號下的身份和利益要求

- 617 最初的經濟主義要求
- 619 全國臨時工組織的成立
- 621 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轉正
- 625 回鄉職工要求遷回戶口
- 630 支內職工和支疆下鄉青年要求回城
- 632 小商小販也造反
- 634 市委節節退讓
- 640 香山路會議
- 643 港務局首先補發鈔票
- 645 體制內職工的經濟要求
- 649 上海經濟生產危急
- 657 經濟風中的工總司
- 660 小結

第十七章

中央賀電

——上海為毛澤東的文革找到出路

- 665 《緊急通告》的產生
- 671 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 675 鐵路造反派接管調度所
- 678 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
- 685 毛澤東要中央向上海發賀電
- 691 保守派全面崩潰
- 697 造反派取得決定性勝利
- 699 小結

第十八章

一月革命

——從「接管」到「奪權」

- 703 紅三司接管公安局
- 709 上三司接管上海市委

716	毛澤東支持群眾奪權
725	張春橋傳達毛澤東講話
728	造反派醞釀成立「新上海公社」
730	上三司再奪市委權
735	紅革會奪市委和華東局權
738	張春橋回顧上海奪權
741	小結

第十九章

1.28炮打張春橋 ——上海的紅衛兵運動式微

743	復旦三派紅衛兵打派仗
745	炮司貼出大標語
748	市紅革會猶豫，復旦紅革會積極
755	復旦紅革會綁架徐景賢
759	張春橋被圍攻
764	工總司保張春橋
766	毛澤東口授中央文革急電
771	上海紅衛兵運動式微
777	小結

第二十章

「公社」的成立與改名 ——回歸秩序和權威

781	毛澤東要上海成立公社
787	毛澤東指示上海「三結合」
792	耿金章成立第二公社
798	張春橋化解危機
800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802	毛澤東建議公社改名
805	從公社到市革會
809	小結

〔續下卷〕

前言

革命名份的誘惑

思路與方法

這本書的內容是關於上海十年文革歷史。由於官方不開放史料，無法了解上層政治，所以我的選擇，更多地側重於底層的群眾運動。上海文革是中國十年文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革除了上層的政治鬥爭，群眾運動是其最大特點。文革群眾運動由兩大部分組成：紅衛兵運動，以北京為典型；工人造反派運動，以上海為典型。紅衛兵運動，到1968年上山下鄉基本結束。工人造反派運動，到1968年「大聯合」也基本結束。只有上海以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派，通過組織的體制化，基本保留了骨幹隊伍，在文革政壇整整活躍十年。除了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上海還有一支其他省份城市都不擁有的文革力量：以張春橋和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委寫作組。這股勢力左右着上海的輿論，對全國的輿論也起着重大影響。上海的文革就這樣與中央文革派緊密相連，從1965年的批判《海瑞罷官》，到1966年的安亭事件，到1967年的一月奪權，到1976年的未遂武裝反抗，始終為毛澤東的文革尋找突破口，忠實地實現毛澤東的心願。

隱藏在本書整個敘事背後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為什麼」，我追溯的是歷史的初始動機和邏輯。每個章節的敘述背後，都有這樣一條主線。許多事情或事件，最初究竟因何而起，我希望通過細節，尋找歷史的來龍去脈。我認為歷史由細

節組成，沒有細節的歷史有時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黑洞。我試圖拼接我所能得到的碎片，重新梳理這段歷史。許多細節是我有意識的選擇，有些是為了再現場景，有些是希望能為學者和後人的研究提供關注點。我而且希望能盡量再現文革參與者的軌跡和形象，他們也是歷史的組成。所以，我理解的歷史以及我對歷史的敘述方式，可能和主流的敘述和體例不一樣，但這是我對歷史的感覺。

忠於史實的根本，在於一切從史料出發。而目前對於文革的研究，最大的困難就是史料不足。這不僅包括檔案的不開放，也包括對一些重要當事人的監控。這使得目前階段任何人的研究，包括我，都不可能全面深入。在撰寫過程中，非常多的時候我苦於沒有資料，尤其苦於看不到當時的文書檔案。有些事其實只要查一查有關會議記錄或簡報，馬上可以真相大白，但是不可能。而等到檔案開放，又將等到何年何月？我只能尋找當事人，請他們回憶那段歷史，解釋自己當時的動機；我並且查閱文革時期的報刊文件、傳單小報，以及文革後的清查、交代；我也關注每一本或每一篇新出的關於文革的回憶和研究文章。書成稿之後，我請當事人核對史實，盡量在史實方面求得當事人的認可。由於年代久遠，資料稀缺，有些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的說法與主流敘述不一，我盡量找到當時的文字記載對照，努力爬梳出真相。收集史料，盡可能地還原史實，這是歷史研究的最基礎工作。用著名當代中國史學者沈志華的話來說，就是挖掘歷史，發現歷史。

所以對上海的文革研究，我的關注點不只是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奪權等重大政治事件，我而且關注文革的其他方面，諸如老保組織、大聯合、科層精簡、轉型後的群眾組織、後期造反派、寫作組、第二武裝，等等。這些都應該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由於資料的限制，我的研究無法深入，但我希望以這樣的擴展，拋磚引玉，引起其他

研究者對這些領域的關注，為今後學者的研究提供歷史線索。我也希望能為過來人重演歷史記憶，為不知文革為何物的青年再現歷史場景。

在研究整個上海十年文革歷史的同時，我對等級身份制在文革中所起的潛在作用特別感興趣。雖然，這個問題已經被許多學者研究。我的不同在於，將1949年後各種等級身份，歸為體制和政治兩大類，並且分析兩者的相互作用。共產黨執政後，消滅了以財富為基準的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兩個不平等的等級身份體系：以戶口、編制和工作單位所有制為歸屬的等級身份，即體制身份；以階級鬥爭理論劃分出的本人成份、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現為標準的等級身份，即政治身份。前者更多體現着經濟利益的分配，後者更多體現着政治權利的分配。比起財富的不平等，這是兩個更宿命和無奈的不平等。這兩個身份體系，是我對中國1949年後的等級身份的分類；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則是我對中國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文革的能量來源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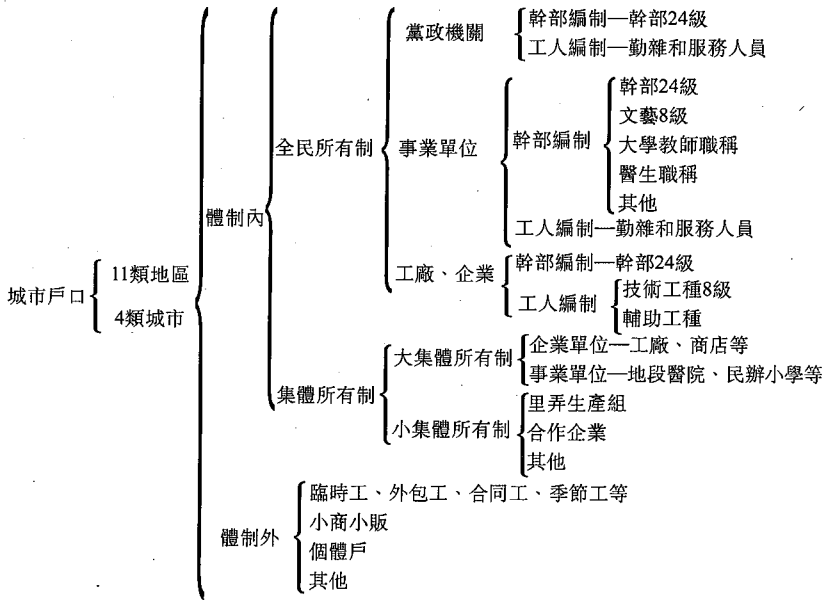
這兩個等級身份體系，完全重構了中國1949年後的社會結構。不僅破壞了傳統中國農村和城市之間的交換和勾連，也破壞了每個個體對身份自我轉換的權利和能力。這樣的制度，將各種不同的階層群體和政治形態，隔離在各個層次等級，不許橫向聯繫，以方便執政者分而治之。兩類身份之間的相互轉換，形成了獨特的激勵和懲罰機制，成為十分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到文革前，兩個體系日益強化，成為統治中國老百姓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礎。

體制身份——被隔離的階層群體

等級身份的第一大類是體制身份，與戶口和工作單位的所有制及編制有關；還有地區差別、城市等級差別，等等。基本

屬於經濟層面，體現的是經濟分配關係，是中國當時經濟體制下的特有身份，可以統稱為「體制身份」。

以下是體制身份等級示意圖：



農副戶口——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集體所有制

體制身份中的第一種與戶口有關，即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城市戶口優越而世襲，農村戶口幾乎是貧困的同義詞。而城市也有等級，依據城市的政治或經濟地位劃分行政級別：中央直轄市、省轄市，地(專區)級市，專區所轄縣級市，以及縣城、鎮，等等。直轄市等級最高，縣以及鎮的城市等級最低。此外，全國分為十一個工資區，以一類地區為基準，每高一類，工資標準增加3%。文革前，上海市區職工工資屬於八類地區，基數在全國較高，相比之下，作為首都的北京市區只屬五類地區。上海郊區十個縣，九個縣屬於五類地區，還有一個崇

明縣屬於四類地區。所以在上海郊縣，縣屬企事業單位的工資要比市區同類低約9%左右。

第二種體制身份與編制有關：即幹部編制和工人編制。在幹部編制中，又分各種等級。機關幹部有行政級別，其他屬於幹部編制的大學教師、文藝文化工作者等，都各有相應的等級。在工廠，技術人員和科層管理人員也屬於幹部編制。在幹部編制中，實際身份最高的是黨政和軍隊的領導幹部，他們是權力的所有者。幹部的等級是最森嚴的，被定為二十四個行政級別。¹ 各種級別的待遇十分分明。十二級以上屬高級幹部，單是看病，就可以進只對高幹開放的醫院。家屬看病，只要每月繳納一定數目的月費，便可以全報銷。

工人編制，實際就是第一線幹活的工人。工人編制中有各種技術等級：最高八級，視各類不同工種而定。有些技術工種最高八級，有的只有六級、七級，等等；或者根本沒有技術級別，只被算作輔助工種或簡單工種。和幹部的級別相比，工人的技術級別只是技術水平的體現，只有責任和工資的差別。不像幹部級別，不但是責任和工資的差別，更是權力、權利、待遇的差別。

第三種體制身份與所有制有關。即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以及體制外的差別。身份最高的是全民所有制職工：終身職業保障，帶薪事假、病假、產假，連同家屬半醫療保險在內的「大勞保」，低租金的住房分配，退休後的退休金以及繼續享受的醫療保險，死後還有喪葬補助費，等等。甚至在勞動保護用品的發放等方面，全民所有制也遠比其他所有制要優越許多。總之，真正是生老病死有依靠。集體所有制中，上海還有大集體、小集體之分，作為區縣政府的工業部門或文教商業等

1 也有說工資等級有 32 個級別。但筆者認為這是工資的全部等級，不是幹部的工資等級。當時大學生畢業後分配工作，算幹部編制，幹部 24 級是他們的起點。

部門管理的大集體所有制企事業，職工的起點工資，較全民所有制職工低10%左右，退休工資也低許多；醫療保險是只保個人不保家屬的「小勞保」。不過儘管工資福利較全民企業稍差些，但就業一般較穩定，近乎終身制。而歸街道管理的小集體所有制企事業，職工收入更少，且沒有醫療保險及退休、病假工資，更不是終身制。

城市職工中身份地位最低的是處於體制外的臨時工、合同工與外包工。他們就業無保障，無法享受絕大部分社會保障，是事實上的廉價勞動力，

以上所有這些身份，都與體制的結構性框架有關。本來，在哪個行業工作就是那個職業的身份，職業身份的社會地位由收入、知識和技術含量等因素決定。但所有制身份將職業身份再分等級，成為職業身份的附加值。

身份最低的是農民。所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與他們有關的少得可憐，勞動付出和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大多數人生活最苦、收入最低。這樣的體制身份，使農民成為社會地位最低的職業身份。

體制身份後面除了經濟權利，還有政治權利。全民所有制工廠的職工被劃作馬克思主義學說中代表最先進生產力的產業工人，國家骨幹企業的基本階級隊伍。他們可以加入工會，集體所有制職工則大部分無此權利。至於臨時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則不能參加工會，也不能參加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完全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所有這些體制身份，有些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鄉、地區戶口，隨父母而定。改農村戶口為城市戶口是最難的。有些體制身份是後天被分配的，如所有制單位，在每個人第一次被分配職業時決定。這第一次分配幾乎定終身，以後若要改變也非常困難。還有編制身份，工人編制只能當生產工人，即使有希望升遷，當上管理人員，要改工人編制為幹部編

制也十分困難。因為幹部編制屬於非生產人員，尤其在工廠，名額很少，是稀缺資源。工人要上升到管理層，第一個關口，就是變工人編制為幹部編制，只有改變了編制，以後才有進一步上升的可能。許多人便只能長期「以工代幹」，待有了幹部編制的名額，方能改變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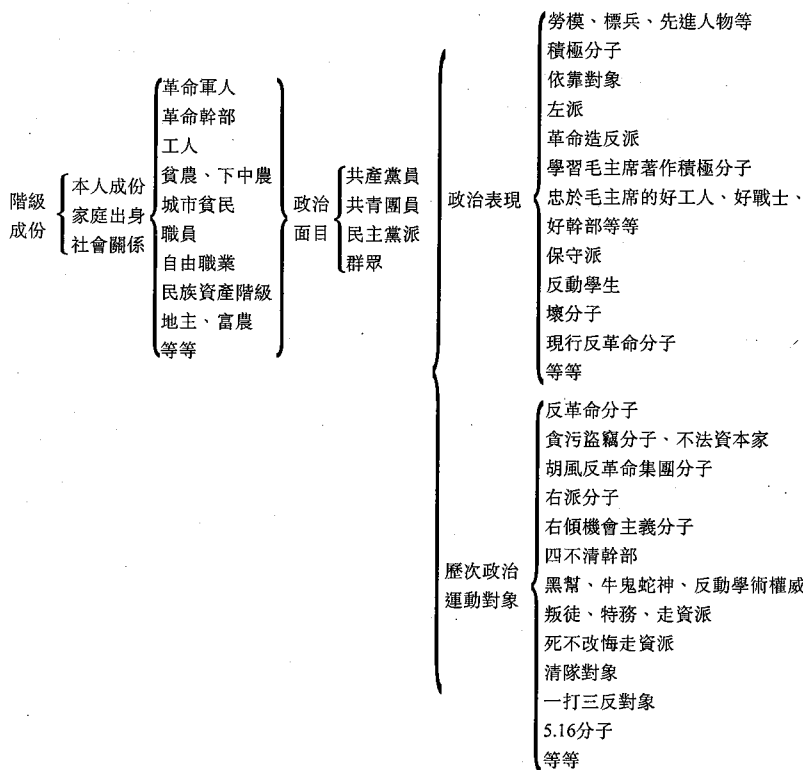
地區、企業或各類職業之間的工資收入、福利待遇及社會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在任何社會都是正常現象。但在中國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一切不是個人努力或個人選擇的結果，而是由政府一次性分配，而且基本是單向和封閉的，幾乎沒有流動的可能。靠個人努力改變被分配定了的體制身份非常困難。於是在當時這個大力宣傳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國家，卻有着最多的宿命、無奈甚至絕望。

政治身份——被隔離的意識形態

等級身份中的第二大類是政治身份，由階級鬥爭理論派生。是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給每個人派定的政治等級身份，屬於政治層面或意識形態領域，體現的是政治權利。

在各類政治身份中，最基本的是階級成份，也稱本人成份，是由階級鬥爭學說劃分出的第一種政治身份。共產黨執政後，以階級鬥爭學說重新定位中國的社會階層，在整個社會劃分出敵、我、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加上被劃為「同盟軍」的農村貧農、下中農，都是「革命的主力軍」，並由憲法確定。屬於革命階級的還有革命幹部、革命軍人，也即1949年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和軍人。地主和富農，則是敵對勢力，革命對象。而「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按階級鬥爭學說，也應是革命對象，但由於共產黨對其採取「團結、贖買」政策，所以被作為「團結和改造」的對象。

以下是政治身份等級示意圖(見下頁)：



在各類政治身份中，最基本的是階級成份，也稱本人成份，是由階級鬥爭學說劃分出的一種政治身份。共產黨執政後，以階級鬥爭學說重新定位中國的社會階層，在整個社會劃分出敵、我、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加上被劃為「同盟軍」的農村貧農、下中農，都是「革命的主力軍」，並由憲法確定。屬於革命階級的還有革命幹部、革命軍人，也即1949年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和軍人。地主和富農，則是敵對勢力，革命物件。而「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按階級鬥爭學說，也應是革命物件，但由於共產黨對其採取「團結、贖買」政策，所以被作為「團結和改造」的對象。

這樣的身份，從1949年共產黨執政前的個人職業而來，由

職業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以及從業者對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而劃分，本來應該算作職業身份。但是階級鬥爭學說，將各種不同職業，劃入各種階級，職業身份成為政治身份。

在階級成份中，等級最高的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下中農，再加上「革命烈士」，文革中被稱為「紅五類」。等級最低的是地主、富農，是實際上的賤民。兩個對立的等級之間，是「職員」——其中包括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以及「民族資本家」，上中農等。這些中間等級的地位很曖昧，有時是革命對象，有時是「團結對象」，全由政治運動的指向決定。至於許多1949年前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要職者，雖然成份算作職員，但被劃為「歷史反革命」，也是等級最低的賤民。

被階級分析的還有「家庭出身」，這是個與生俱來的宿命身份。階級成份主要與本人過去的職業身份有關，加上對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在許多情況下還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而家庭出身的劃分，則完全被父母輩的階級成份決定，是個由階級成份派生出來的先天政治等級。同一個性質的，還有「社會關係」，也即家庭成員或親屬的階級成份。

第二種政治身份，是各類「政治面目」。分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群眾、民主黨派。黨員自然是革命的領頭者；團員也是被信任的。群眾，則是需要教育和引導的對象。民主黨派是「團結」對象。

第三種政治身份是被1949年後的各種政治運動劃分出來的，名目繁多。例如「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等等。此外還有「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現行反革命」從字面理解，就是「現在正在行動」的反革命，其實，大多是反共產黨者，甚至只不過是有點意見牢騷者。「壞分子」，主要指那些觸犯刑律被關押勞改後的刑滿釋放者；還指雖沒觸犯刑律但觸犯當時的道德和社會規範者，例如「流氓阿飛」、「投機

倒把」者、「亂搞男女關係」者，等等。此外，1957年反右時因工人中不劃右派，有些單位就將提意見者劃成「壞分子」。地主、富農，再加上反革命、壞分子，統稱「四類分子」；再加上右派，統稱「地富反壞右」，又稱「黑五類」，與「紅五類」對應。不久，又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等等，稱為「黑六類」，或者「黑七類」、「黑八類」。革命對象隨着革命的勝利越來越多。

以上三項內容，都是共產黨執政後，各種個人登記表格中的必填項目。而第四種政治身份，則是登記表格上沒有的，卻由各級黨組織掌握，有可能記錄在個人檔案中。這就是「政治表現」，根據各個政治運動中的不同標準或稱謂而定。總體來說，不外乎「積極分子」、「依靠對象」、「落後分子」，在學校中還有「反動學生」，等等，只是大多數人不知道自己的這個真實政治身份。在這方面，幹部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有權分配「政治表現」。尤其在各次政治運動中，他們根據各人表現進行政治排隊，給每個人貼上每場運動新制定的政治標籤。這類政治排隊，一般都會在運動後期塞進個人檔案。以後，事主的提拔、培養等等，都會受到檔案的影響。

政治表現與歷次政治運動對象一樣，是最具彈性的政治身份，尺度全由各級幹部掌握。不同處在於，後者是公開的，是政治運動的結果；前者是不公開的，是下一次政治運動可能的靶子，當事人可能毫不知曉。

所有被視為敵對和可疑的對象，都由各級黨組織掌握，隨着每次政治運動的需要，被有選擇地拋出。文革初期，橫掃牛鬼蛇神階段和紅八月抄家批鬥階段，許多人都是被單位黨組織拋出個人檔案內容，成為批鬥或抄家對象的。這樣的制定運動對象模式，到1966年底，因為批判走資派和奪權而暫時有所改變；但到1968年開展的「清隊」，又重新恢復並繼續。

在政治身份中，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以及社會關係，都是

被先天派定的；而後三種政治身份：政治面目、運動對象和政治表現，則是按政治態度也即對共產黨和共產黨政策的擁護程度劃分的。這為個人選擇留下空間。尤其政治表現，可以通過個人努力爭取，諸如「積極分子」、「依靠對象」，等等；還有各種先進人物稱號：「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五好職工」、「三八紅旗手」、「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等等。

政治身份是現代的「政治名份」

所有這些政治等級身份，實質就是由共產黨對社會進行甄別，考察對革命的忠誠度，制訂出每個個人在階級鬥爭社會中的政治位置，以此建立嚴格的政治秩序。文革前的中國，本質上是個身份社會而不是契約社會。為了達到高度統治的需要，共產黨以階級鬥爭為綱製造政治等級，對社會一次又一次地分層再分層。將其中最可能有獨立思想的知識精英，隔離在最不確定的等級；將最有活動能力的前政府時期的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隔離在最低的等級。當政者用隔離各種生存空間和政治傾向的方式，不使各類階層群體和各種思想意識產生縱向聯繫，以便於分而治之。

從表面上看，政治等級身份不像體制等級身份那樣直接與經濟利益掛鉤。政治身份體現的是與主流政治的親疏關係，而不是經濟分配關係。更像是一種被指派的外在身份，一種名義上的政治身份，也可以說是一種名份，一種由共產黨分配的政治符號。

在中國文化中，名份是個很特別的現象。簡言之，名份中的「名」，是個體的人在人際和政治社會關係中的身份和位置，例如君臣、父子、夫妻等關係，是傳統中國的社會秩序在個人身上的體現和規範。而名份中的「份」，則是與「名」對

應的權利、義務和社會地位。因此，名份實際就是身份政治，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等級和人際等級關係，核心是「禮」；也即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和倫理秩序，由此構建了整個傳統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秩序。

傳統社會的名份，以及1949年後建立的政治名份，實質都是為了治民。與政治名份相似的是：傳統社會的名份，大多也是一種名義上的身份。而有了名義上的身份，則可以相應得到或轉化為其他利益。但是，政治名份與傳統社會的名份也有不同。主要在於，1949年後越來越強化的政治等級身份制度，是國家強力推行的；各種政治名份，都是共產黨通過各項政策和運動，由各級黨組織強行分配給每個個人。而傳統社會的名份理念，是通過教化施行影響而強化的，並不伴隨着完整嚴密的國家制度。國家雖然也給忠於朝廷者賜予各種名份，但國家並不直接分配社會秩序和社會生活中的名份；各種名份主要不是由各級官員派定，而是禮所規範。

看起來，所有政治名份中，工人階級的等級是最高的，農民的等級也不低。但真正處於第一等級的，是革命幹部和革命軍人，也即幹部階層，以1949年前參加共產黨劃線。由於基本都擔任各級領導職務，掌握着所有的政治和物質資源，所以是實際上的最高等級。光是從工資收入，就能比較出幹部和工人的實際等級：工人中工資最高的是八級技術工人，文革時在上海是105元至118元(各個行業不同，輕工業和紡織等系統稍低些，重工業系統最高)，只相當於十六至十七級幹部的工資。此外，各種文件的傳達包括信息的傳遞，幹部總是最先按級別逐級知曉的，工人、農民卻總是最後才被告知。

工人和農民的實際地位，還可以從對人的處罰看出。文革前和文革中，對人的最重處罰，除了關監獄或送去勞動教養，便是革去城市戶口，發配農村當農民。即使不下放農村，下去勞動也是嚴重處罰。所謂「下去勞動」，實際就是下去當工人，幹工人

的活。由此可見工人的崇高地位嚴重名不副實；農民實際地位最低，完全是個空名份。這反映出體制身份與政治身份之間的內在衝突，也反映出意識形態與體制結構的巨大矛盾。

體制身份與政治名份的關係

所有的政治名份後面，實際仍然是利益和權利的分配。因為革命名份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與各種體制身份有着不同的經濟權利和待遇相對應的是，各種政治名份也有着不同的政治權利和政治待遇，包括話語權、信息權，政治參與權。具體來說，就是說話的權利、聽文件的權利，參加運動的權利，入黨入團加入工會的權利。此外還有居住權、工作權、受教育權，等等。

本來，政治身份和體制身份，是兩個層面或範疇的身份。前者屬於政治範疇，後者原則上屬於分配領域的經濟範疇。但由於1949年後，所有的資源——有形和無形的，越來越集中到執政黨手裏，各種資源的分配，越來越向政治層面的政治名份傾斜。使得原本只是政治態度或政治地位的政治名份，越來越成為被分配各種資源時的考量。到1960年以後，隨着階級鬥爭之弦越繃越緊，出身、成份和政治表現越來越成為考察和選用人的主要標準，包括大學和重點中學的錄取標準。作為權利的「分」，越來越和政治的「名」緊密相聯。換言之，現代社會公民所應有的權利不是天然的，而是根據「名」的等級而酌情給予的。

政治名份可以提高體制身份。光有能力、職業和名聲還不夠，還要被認為「可靠」。那些政治積極分子，會被看中培養或提拔，工人編制可以轉為幹部編制，進入科層甚至權力機構；農村戶口有可能「吃上公糧」，被安排公職轉換為城市戶口；學生的畢業工作分配，有可能被留在等級高的大城市，獲得好工作。文革中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被取消城市戶口。

他們要重新獲得城市戶口，只有通過被推薦招工或上大學。這樣的機會，對於沒有背景和普通家庭子女來說，必需用政治和勞動表現換取。而勞動表現，在文革中被政治化，是政治表現的具體體現。在工廠，對科層管理人員的提拔也是這樣。尤其從工人中提拔政治工作幹部，一定要「政治表現好」。王洪文文革前從一個普通工人，被提拔為廠保衛科幹事，編制身份從工人編制轉為幹部編制，就是因為政治表現符合主流要求。王秀珍文革前，作為一個普通工人，被保送進上海的專科學校學習，也是因為她出身好，加上政治表現好。

一般來說，人的社會地位是由能力、職業、財富、權力、名聲、出身等因素組成的，不同形態的社會各有側重。其中最能體現個人選擇和個人特點的，應該是職業身份。但是，1949年前的職業身份被視為政治身份中的階級成份，1949年後的職業身份又與難以變更的體制身份捆綁；加上個體對從事何種職業越來越沒有選擇權力，於是到文革前夕，職業身份如果沒有體制和政治的優勢，已經無法對社會地位起決定作用。例如同樣是教師，集體所有制民辦小學老師的社會地位，無法與全民所有制學校的老師相比。還有政治名份，也越來越成為職業身份的重要附加值。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只有被認為是革命的，也即有了革命的名份，才會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名份降低，那麼體制身份也有可能降低。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運動對象最後都會被處理。那些胡風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許多是專家、學者、文化人或幹部，成為打擊對象後，社會地位驟然降低，不但失去原來的工作，而且失去在大城市的居住權，「下放」去中小城市或邊遠地區，甚至驅逐去農村勞改，被取消城市戶口。更多人則被調離原來的工作，工資降級。文革初期，北京就發生過大規模驅趕「四類分子」出北京、遣送去農村的情況。同樣的情況上海也有發生。

所以，政治名份可以提高體制身份，也可以降低體制身

份。而在上文所述的兩大類身份中，雖然體制身份中的戶口最為宿命，編制也幾乎是一次分配定終身，但在政治身份中，還是有着個人選擇的正負空間。而政治名份資源積累到一定程度，不但有可能轉換體制身份，甚至有可能轉換體制身份中最難轉換的戶口。在這方面，個人的政治表現是至關重要的，尤其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更是關鍵。不但日常的政治表現，每場政治運動，更都是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名份變更機遇。因為這是向共產黨表現忠誠的最重要機會。與此同時，被認為表現不好或者政治歷史被認為有問題者，則有可能被拋出作為運動的批判對象，從而被貼上各種負面政治名份。背着這樣的政治名份，動輒得咎，沒有希望，沒有出路，還有可能被打入底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或放逐農村，甚至判刑、勞教。每一次政治運動，尤其在文革中，這些人都首當其衝地成為批判和衝擊對象，而且累及子女甚至第三代，永世不得翻身。巨大的人生代價，使得很少有人敢於以自己乃至後代的人生作抵押，去對抗共產黨。人們不得不積極投入各項政治運動，掙得被信任的政治名份。

這是革命名份的誘惑，也是反革命名份的威懾。政治身份和體制身份之間的轉換關係，就這樣成為最有效的激勵和懲罰機制。這種來源於內心深處恐懼的忠誠，是共產黨執政後歷次政治運動的動員能量，也是歷次政治運動的動員結果。

文革中的政治名份與體制身份之爭

1949年以後，每一場政治運動都是對政治名份的不斷劃分。由國家權力體系層層佈置，自上而下地鑑別和劃分「依靠、團結、打擊」對象，重新鑑定政治名份。於是，每一場政治運動，也為每個個人提供了提高政治名份的機會。文革就是1949年以來最大的一次重新劃分政治名份的運動。

文革前，評定政治名份的坐標系，縱向軸是時間——參加共產黨革命的年份，參加得越早，等級越高；橫向軸的是對共產黨的態度，即是否「聽黨的話」。文革中，造反派試圖實行新的名份規則：時間改為1966年的文革，造反越早，名份等級越高；橫向軸由聽話順從，改為「敢於造反」，這成為文革中上海對幹部的考察和提拔標準。這是文革政治名份與十七年的不同之處。不過，這個不同只是「聽話」對象的不同。文革雖然暫時可以不聽各級幹部的話，但必須聽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話。這是文革始終沒能發展成真正自主的群眾運動的重要原因。

文革初期，許多造反者都自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緊跟黨的積極分子。但實際上，這個自我認知的革命名份，很可能與他們檔案中真正被各級黨組織認定的「政治表現」相去甚遠。當他們給幹部們貼大字報時，幹部們會拋出他們個人檔案中的一些內容作為反擊。這些內容包括偷偷記下的他們過去的言論，或者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成員或社會關係情況。例如張伯生平時的玩笑與閒談，謝鵬飛父親的「政治歷史問題」。運動初期各個學校和工廠頻發的「搶黑材料」行動，是最初的對幹部暗箱操作劃分政治名份的衝擊，也是對幹部劃分群眾政治等級身份權力的反抗。「不得秋後算賬」，實際就是幹部不得在運動後期再來一次政治分層，強加名份，反攻倒算。搶黑材料，又是造反派逾越規範的開始。在此之前，雖然對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和抄家等行為，也都是逾越規範的；但是這樣的行動，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的土地革命時期，是共產黨與生俱來的革命手段，而且針對的是革命對象。而搶黑材料行為，則針對各級黨委自身，質疑他們的權力。這個挑戰共產黨嚴密控制民眾制度的造反行動，是之前從未發生過的。可以說，這是文革中造反派對十七年規則的第一次真正逾越。

在文革中，「革命造反派」成為新的革命名份。以往的

那些革命名份：黨團員、勞模先進人物、歷次運動積極分子，等等，在文革初期全部成為「運動阻力」的代名詞，暫時失去了以往的榮耀。由以上幾類人物為骨幹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赤衛隊，被當時上海市委的一個負責幹部斥為「隊伍嚴重不純」。但是，儘管這幾類人員文革初期的政治名份似乎降低了，一時不如造反派；但黨員、勞模先進人物等政治名份的含金量還是實際存在。畢竟文革前的入黨標準非常嚴格。能入黨者不但政治表現要好，其他方面也必須突出；吃苦在前自不必說，還必須是道德楷模。群眾基本認可這樣的標準。勞動模範的評比也是這樣，工作必須十分出色。所以，儘管文革中一方面批判黨員及勞模先進人物的「奴隸主義」，也即缺乏造反精神；另一方面造反派中的黨員，卻比其他造反派更受到信任。畢竟入黨就是對政治和道德的雙重篩選。於是，工總司籌備成立時，身為黨員的王洪文會當選為負責人；而繼續北上告狀的二兵團前身「北上大隊」，在北上途中推舉負責人時，會呼籲「共產黨員站出來！」

王洪文雖然是造反派，但他對黨員也是更多信任和推崇。安亭事件結束後，王洪文馬上要人去基層廠挑選黨員造反派。黨員——文革前的帶頭者，造反派——文革中的革命者，在王洪文身上得到交匯。這也是王洪文以後被毛澤東看中的最重要原因。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另外兩個骨幹人物王秀珍和金祖敏，也都是這兩個革命名份的兼有者。他們兩人也都被提拔重用，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地位僅次於王洪文。

此外，由於文革雖然是又一場大規模的政治分層，但分層標準卻仍然延續十七年的階級鬥爭思維。所以，政治名份中的出身、成份效應繼續存在。文革初期紅衛兵大規模抄家批鬥，都是針對十七年的革命對象。出身不好者甚至連參加文革的資格都沒有，否則馬上會遭到大字報反擊。工總司的潘國平、黃金海、謝鵬飛等最初造反時，都被貼大字報，說他們出

身不好，意即他們沒有資格參加運動。登峰造極的血統論，乾脆將出身簡化為「紅五類」和「黑五類」：前者被封為「自來紅」，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後者被稱為「狗崽子」，只有老老實實挨批判鬥爭的份。此種政治等級觀念，即使造反派也不能免俗：加入造反隊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出身不好者自己也會覺得名不正而矮人三分。謝鵬飛被大字報揭發說他父親有「政歷問題」後，在工總司籌備成立時，認為自己不適於擔任主席團成員，推薦了別人。

文革中新的革命名份「革命造反派」，甚至超過了十七年歷次政治運動的革命名份。過去的積極分子，只有在宣佈造反後，他們之前的名份資源優勢才能夠延續到文革之中。因為過去的積極分子都是原來的幹部培養提拔，他們和那些幹部有着割不斷的感情聯繫。當這些幹部被作為文革對象，他們培養的積極分子自然被視作文革阻力。所以許多過去的勞模先進人物，還有黨團員、積極分子，在一月革命造反派大局已定之時，都一遍又一遍地檢討自己，表示要反戈一擊起來造反。以這樣的表態，表達對文革的認同，從而延續自己的革命名份。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名份，而且還提高了體制身份。例如楊富珍，宣佈造反後，一次又一次地檢討自己「被舊市委利用」，從而成為勞模先進人物「正確對待文革」的典型。她因此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紡織廠的擋車工人；文革中她當上普陀區委書記，職業身份得到了轉換。

政治名份的實際價值，靠體制身份的轉換體現。如果一輩子只有積極分子的名份，體制身份沒有轉變，那麼除了有可能在評工資時被評得高些，這個名份幾乎是空的。文革前，只有像王洪文那樣，被從工人轉為科室幹部；像王秀珍那樣，被送去專科學校培養，畢業後成為技術人員，政治名份所攜帶的附加值才得到兌換，才是名至實歸。文革中，1968年毛澤東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後，憑着「領導階級」的名份，大批過去的

普通工人進入各級黨政機構，成為黨政幹部。王洪文是其中升得最高的，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其他如黃金海、葉昌明、戴立清、陳阿大等等，也都從普通工人成為市級領導幹部。革命的政治名份就這樣為體制身份的轉換，提供了最堅實的條件。而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造反派們最焦慮的就是幹部們對他們身份轉換的抵制。他們希望以革命造反派的名份進入各級領導位置，從工人變成幹部。一些人直截了當地提出：「造反派就是要當官」。

但是，和文革前相比，文革中政治名份對體制身份的轉換是不完全的。所有當了幹部的原工人們，人事關係仍在原來的工作單位，工資也由單位按文革前夕的原工資標準發放。他們只是被「借調」去擔任新的領導工作。即使當了幹部甚至市革委會上層幹部，職業變了，但編制仍然是工人。甚至王洪文，當他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的人事關係還在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工資仍是他當廠保衛科幹事時的64元，而且仍由上棉十七廠發放，每月派人給他送去。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當時的工資是404元(毛澤東工資以行政幹部24級第一級算，應是610元。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自己要求降低到404元)。王洪文去北京後，工資不夠開銷，只好由上海市革委會每月給他補貼。而那些被打倒的幹部，以及被驅趕去幹校勞動、去工廠「戰高溫」的幹部，他們的政治名份雖然一時降低，職業一度被改變，但他們的編制始終沒有被變更，始終保留着幹部編制。許多幹部在被批判期間工資「凍結」，但一旦恢復工作，被扣工資立即補發。還有那些被「解放」但降級使用的幹部，工資一般也不會隨之降級。這樣的處理與文革前不同：文革前，幹部如果被降職，一般會被相應降級降工資。

文革前，工人被提拔為幹部，編制也會隨之轉換為幹部編制。文革中，被提拔為幹部者都不轉換編制，工資也不相應增加。所以，他們雖然成為幹部，但只要編制不變，他們的身

份轉換就沒有最後完成。這是與文革前幹部提拔制度的顯著不同。這種狀況，使得那些被提拔的工人一旦犯了錯誤，立即被打回原形，說聲下去勞動，就被一擡到底，回原工廠重新當工人。而對於幹部編制的各級領導幹部和科層人員，即使去幹校或「四個面向」，保留的幹部編制，使他們保留着重回領導崗位和科層的可能。事實上，到文革後期大批幹部也確實回到了機關。兩邊的身份轉換，都停止在「編制」，都沒有名至實歸地最後完成。如此只改變職業，不改變編制，初衷可能是為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但這樣做的結果，卻使底層即使向上層流動，也因沒有完成體制身份的最後轉化，面臨隨時重回底層的威脅。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文革前就有着幹部編制身份的幹部及科層人員的讓步和照顧，也是對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幹部的限制和制約。

政治名份在許多時候，需要編制身份的確認。「工人階級」的政治名份，只有在工廠工作的工人才具有。而「產業工人」的政治名份，更只有全民所有制工廠的工人才擁有。到1968年毛澤東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人階級的名義地位上升到頂點。對文革新幹部的提拔，有沒有「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名份是個標準；但若要再提拔到上層，有沒有產業工人所必需的全民所有制編制身份，也是重要標準。在一次討論市委革會的女委員人選時，王洪文提名同是老造反的徐美英和王秀珍。但徐美英是集體所有制工廠的工人，算不上產業工人；王秀珍工作的工廠是全民所有制大廠，屬於最正宗的產業工人基地。儘管王秀珍是幹部編制，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但張春橋最後挑選了王秀珍。而許多工人對自己「工人階級」的名份也十分珍惜。當被調去科室或各級領導職位時，他們擔心自己會不會從此變成「當權派」，不再被算作工人階級，從而成為下一次政治運動的對象。

文革又是1949年後，唯一由底層群眾給各級幹部進行政

治分層的運動。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自上而下地由各級幹部給群眾劃定政治名份。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由底層群眾給各級幹部劃分政治名份的運動。「造反有理」，就是群眾有權評判幹部。文革始終有兩個目標。一個是各級幹部們的目標，一個是毛澤東的目標。這兩個目標此起彼伏在整個文革：最初的批判對象「牛鬼蛇神」之類，是幹部們的目標；不久毛澤東的目標「走資派」成為運動重點；到清隊，幹部們的目標重又回歸。而政治名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判定權，隨着這兩個目標的轉換而轉換。1966年下半年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爭，實際就是底層群眾與幹部爭奪對政治名份的劃分權。從1966年8月《十六條》公佈，到1967年的一月奪權，這個爭奪完成。對政治名份的劃分權轉移到群眾手裏，哪些幹部是走資派，哪些幹部是叛徒、特務，還有什麼裏通外國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死不悔改走資派，決定權在群眾。而且群眾還可以決定哪些幹部是可以「解放」後被三結合的，哪些幹部靠邊暫不使用，哪些幹部掛起來繼續審查。不過，這個時間段不長。從1966年下半年批判資反路線開始，到1967年底結束。隨着黨政一體化的各級革委會建立，政治名份劃分權由各級革委會掌握。1967年年底開始的清隊，對名份鑑定的權力又重新回收，清隊對象重新由革委會也即各級權力系統決定。但由於各級黨組織尚未恢復活動，革委會尚未建立權威，所以這一鑑定在許多單位，是由工宣隊和軍宣隊執行的，在執行的過程中幫助革委會重構權威。

文革也是共產黨執政後，底層民眾自己給自己確定政治名份的唯一時段。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十六條》，就是新的革命名份標準。對照《十六條》，群眾對自己政治名份的認知與幹部對他們的評定不對稱，衝突由此而起。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組織和造反派組織都要求各級黨組織承認他們是「革命群眾組織」。而到了1967年初，幹部的權威下降到底點，造反派組

組織無須幹部們的承認，他們自己宣佈自己是革命群眾組織。在「走資派」兵敗如山倒的形勢下，頻繁的批鬥大會更多成為自我身份鑑定的表演儀式。由於沒有了鑑定權威，群眾只需自我鑑定，或者得到其他組織的認同。於是許多組織都想爭奪革命名份鑑定標準的話語權，生怕別人給自己作鑑定。派性，就是對政治名份鑑定權和鑑定規則的爭奪戰。赤衛隊，一、二、三兵團等，就這樣被取消革命名份，沒有了存在權利，大小武鬥紛紛而起。

文革中幾乎所有的運動都是爭取政治名份，但也發生過大規模的爭取體制身份的要求，這就是1967年初的經濟主義風潮。人們既然無法自己選擇或改變體制身份，便只能寄希望於操分配大權的幹部們，要求他們放鬆或改變分配體制身份的政策。於是1958年後因「大躍進」造成持續三年嚴重經濟衰退而被辭退或動員回鄉的職工，要求恢復城市戶口並恢復工作；支內職工和支疆下鄉青年要求回城恢復上海戶口；集體所有制職工要求轉全民所有制，小集體所有制職工要求改為大集體所有制。體制外的臨時工、外包工、合同工連工人階級的名份都沒有，於是他們先要求工人階級的名份，希望正名後再要求享受體制內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等等。實質都是要求體制身份後的那個經濟利益分配的「份」。

文革中的造反派們，雖然反對由掌握實權的幹部劃分政治名份和體制身份，但這些反對行為，始終沒有跳出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思維模式。體制內的工人質疑自己被貼上的政治標籤，但對於整個政治等級身份制度卻毫不懷疑，地富反壞右始終在他們的批判和打擊範圍內。對於經濟體制等級身份，他們更是毫不質疑。有着穩定工作和收入的體制內職工造反派，在爭取自己政治權益的同時，對處於社會邊緣的臨時工等漠不關心，認為他們為私造反。在「反擊經濟主義妖風」時，毫不手軟地將他們的組織紅工司取締。沒有人想到，他們應該享有與

自己相同的一切權利。而那些體制外工人，在爭取體制身份的經濟主義風潮中，雖然反對體制等級身份，但卻不反對政治等級身份。紅工司在與市委簽訂要求參加文革的條約時，特地注上「黑六類除外」，對政治賤民們沒有絲毫同情，更不說考慮到他們的權益。而且他們反對的只是自己被派定的體制身份，不是體制身份制度。他們反對體制身份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能擠進體制，享受體制內的經濟權益。

所以，文革雖然是一場重新評定政治身份的造反運動，但是衝擊的只是政治身份中的很小一個部分，也即幹部對政治身份的評判權。造反派們要求的是評判別人包括評判幹部政治身份的權利，不是改變整個體系。對整個政治身份制度，文革不但沒有衝擊，而且強化，所有文革前十七年曾經被打擊的對象，到文革中幾乎全部被再整上一圈。雖然一部分造反派試圖打破家庭出身的隔離，但是打不破階級成份的隔離。家庭出身不好者，只是爭得了一個「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名份。有了這個名份，至少可以得到多一點的權利，例如被推薦上大學、入黨入團。但「本人成份」這個政治身份原封不動，對本人成份「不好」者的衝擊批判，甚至比文革前有過之無不及。而對於經濟層面的體制身份等級隔離，文革也基本沒有觸動。

通過自己的努力提高身份，改變境遇，是任何一個形態國家國民都有的心態和行為。只是，在當時的中國，因為所有的資源都被壟斷，要享有這些資源，必須表現出對共產黨的高度忠誠。所以才會有中國民眾對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通過政治運動，提高政治身份以提高其他身份，從而獲得被共產黨嚴控的各種資源。以革命名份改變自己的人生，是文革能夠發動起如此眾多民眾的重要原因。造反口號之下，是與造反截然相反的效忠。「效忠」這個最俯首帖耳的卑微行為，卻在文革中以慷慨激昂的「造反」形象表現。這是文革的特色，更是文革的真諦。

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越來越多元化，兩個體系的等級身份越來越淡化。尤其政治身份，幾乎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職業身份越來越成為名符其實的社會身份。人們不必再通過爭取革命名份去換取利益，這是社會的極大進步。

第一章

批判《海瑞罷官》 從上海拉開的文革序幕

江青來上海

1963年2月下旬，農曆春節過後的一個月，正是春寒料峭。江青裹着一身寒氣，從北京來到上海。¹

1949年中共執政後，江青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她雖然掛着兩個普通職務：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國務院文化部電影局顧問，但因為是毛澤東夫人，人們對她都十分尊重。上海市委出面接待江青的，通常都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上海市委負責人，也都會去看望。過去江青來上海，大多治病或休養，很少接觸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偶爾外出，也很保密。這次江青來上海不再深居簡出，而是經常找人談話或外出看戲。²

江青是來組織「京劇革命」的。她要上海市文化局組織人員，修改京劇《智取威虎山》，並將淮劇《海港的早晨》改編為現代京劇，參加即將在1964年北京舉辦的京劇現代戲匯演。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對江青的京戲改革非常支持，要什麼給什麼。江青提出要找幾個人幫助她改戲。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先後推薦華東局宣傳部部長夏征農和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

1 《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陳丕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2 同上。

民，但江青和他們談話後，都不滿意。³ 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再推薦另一個宣傳部長具體協助江青，即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張春橋，他不久後接替石西民擔任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為江青記錄和整理講話，向劇團傳達和貫徹她的意見，一心一意撲在戲改上，得到江青的欣賞和信任。1964年4月柯慶施患肺癌，手術後身體虛弱，去廣州療養。1965年4月9日，柯慶施逝世。以後江青來上海，由接任市委書記的陳丕顯接待。1965年初，江青又來上海：一是繼續修改京劇《智取威虎山》；二是物色人選批判《海瑞罷官》。前一個行動在黨內高層公開，後一個行動則十分秘密。

《海瑞罷官》是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寫的劇本。劇中的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間的大臣，為政清廉，敢為老百姓講話，因上書批評皇帝被罷官。還是在1959年初，毛澤東看了湘劇《生死牌》後，因戲中有海瑞，毛將《明史·海瑞傳》找來看。1959年4月間，毛澤東曾經幾次講話提倡幹部要學海瑞，要敢講真話。毛澤東在4月5日的一次講話中，提到明朝的海瑞批評嘉靖皇帝的故事：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⁴

毛澤東對海瑞的評價，由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向文藝界作

3 這是張春橋妻子文靜說的，轉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這本史話的資料基本來源於文革中上海市委、市革委會、市總工會等機關的簡報或內刊，以及文革結束後對上海「四人幫餘黨」的清查檔案。

4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轉引自《毛澤東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

了傳達。海瑞戲迅速在全國遍地開花，各個劇種爭演海瑞。其中以上海和北京的海瑞最有影響。上海的海瑞戲名為《海瑞上疏》，毛關於海瑞講話的幾天後，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上海約見上海京劇院院長、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以及上海文化局戲劇處處長劉厚生，建議他們寫海瑞戲。上海京劇院經過討論，成立了創作組。劇本完成後，上海京劇院調集強大演出陣容，主要角色都由一流京劇演員擔當，周信芳任導演並飾演主角海瑞。經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同意，1959年9月30日，大型新編歷史劇《海瑞上疏》作為國慶十周年重點劇目，在上海天蟾舞台首場演出。周信芳還帶隊去北京上演。

北京的海瑞戲由吳晗撰寫。毛澤東提倡學習海瑞精神後，中共中央另一個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回北京就去找吳晗，希望吳晗根據毛的講話寫文章介紹海瑞，吳晗寫了《海瑞罵皇帝》和《論海瑞》兩篇文章。1960年3月又寫了新編歷史劇《海瑞》，後改名《海瑞罷官》。1960年底公演後，毛澤東在家中接見海瑞的飾演者、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同他一起吃飯，請他當場清唱海瑞，還說：「戲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罷官》的文字寫得也不錯。吳晗頭一回寫戲，就成功了！」馬連良當晚就打電話給吳晗，轉告毛澤東的話，吳晗聽了很高興。⁵

實際上，就在提倡海瑞精神後沒過幾個月，毛澤東自己對海瑞的態度又有了改變。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毛澤東在8月16日的閉幕會上說：

現在聽說海瑞出在你們那個裏頭，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個左派，他代表富裕中農、富農、城市貧民，向着

5 虞雲國著《那樁關於海瑞的公案——讀〈懷念吳晗〉》；以及上海《東方早報》2009年11月16日《南北「海瑞」引發的大冤案》，沈鴻鑫著，載於《世紀》2007年第1期，中央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編輯出版。

大地主大官僚作鬥爭。現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着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嗎？有人講，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出現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變了右派我就不高興呀，我就要跟這種海瑞作鬥爭。⁶

毛澤東的這番左派海瑞、右派海瑞的話，胡喬木很快告訴正在撰寫海瑞文章的吳晗，吳晗趕緊在自己剛寫好的《論海瑞》一文中，加上一段話，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假冒、歪曲海瑞」。但吳晗的補丁沒起作用。1962年3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海瑞罷官》，把戲調到北京民族文化宮演了兩場。看後，戲被停演。過了好長時間，傳出消息，說江青認為此劇借古諷今，影射現實。

1962年9月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結束不久，江青去找陸定一、林默涵、周揚、齊燕銘，都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務院文化部的部長或副部長，要他們對《海瑞罷官》開展批判，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表示不同意，別的部長也都不贊成。10月，江青又去找北京青年文藝評論家李希凡。李希凡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因批判《紅樓夢》研究權威俞平伯寫的《紅樓夢簡論》，引起毛澤東注意，成為文壇新星。江青派專車將李希凡接到中南海，親自和他談了幾個小時，說應該注意《海瑞罷官》，這齣戲有問題，但李希凡沒表態。他後來對人說，他當時覺得，要把《海瑞罷官》與1962年的單幹風聯繫起來很難，因為兩者扯不到一起。⁷江青轉而將目光投向上海。

6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

7 這是李希凡對復旦中文系的教師胡錫濤說的，轉引自《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炎黃春秋》2011年第7期。

柯慶施與批判《海瑞罷官》

當時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是柯慶施。柯慶施資格很老，才五十多歲時就被稱為「柯老」，連比他大九歲的毛澤東，也如此稱呼；而且據說，還是毛澤東首先稱呼。1954年10月，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毅被調往中央，柯被從江蘇省委調來上海接任，後又兼任上海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1960年中共中央華東局重建後，又任華東局第一書記。在上海幹部中，對柯慶施始終有兩種不同評價。有人對柯反感，認為他「左」，霸道，喜歡揣摩和迎合毛澤東心事；有人對柯尊崇，認為他有能力，對幹部要求嚴格對自己要求也嚴格，尤其對上海經濟建設功不可沒。

柯慶施工作嚴謹，對幹部要求十分嚴格，批評部下毫不留情，甚至讓人下不來台。他不但工作上對幹部嚴格要求，生活上也反對幹部特殊化。他自己生活簡樸，也要求部下能與民同甘共苦。1958年，上海落成一批工人新村，柯要求市委所有領導幹部，除年歲大者或正在患病者，全部搬出花園洋房或公寓，去工人新村與工人為鄰。他自己首先帶頭，於1959年春節前帶頭搬入東廟二村(後改名為東安二村)。那是上海西南地區的一個工人住宅群，居住條件比花園洋房自然差許多。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上海高級幹部大多入住條件較好的花園洋房或公寓，柯慶施要求幹部搬出高級住宅，顯然是希望幹部們縮短與老百姓的距離。⁸ 當時，康平路市委機關大院對面，有幾幢上海本地的中國式磚瓦房，沒有煤衛設備，甚至用水都是在屋外接個自來水龍頭。這樣的房子和整個康平路的花園洋房顯得很不協調，市委辦公廳幾次要拆除，都被柯慶施攔下，一定要保留這些房子。柯慶施說，放在那裏，每天看到，就會提醒我，

8 不過1960年初，柯慶施又搬往康平路上的愛棠公寓，據說是因為在東廟二村辦公不便。

還有老百姓住在這樣的房子裏。⁹

毛澤東十分倚重柯慶施，因為毛澤東對上海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成果都滿意，這兩項成果的取得都與柯分不開。上海本來就是全國最大最重要的輕重工業以及科研基地，柯在上海十年，上海經濟發展持續領先全國，工業總產值十年翻番。在文化方面，柯1963年提出戲劇舞台要「大寫十三年」，即着重寫共產黨執政後的十三年，得到毛的讚賞。江青也曾對張春橋稱讚柯慶施說：「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掛帥，可以作為基地。」¹⁰ 柯在黨內地位上升很快，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65年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柯慶施逝世後，又被給予很高榮譽，稱為「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於是成為又一個偶像，文革中上海以柯慶施劃線，被柯慶施批評過或與柯慶施曾有過節的幹部，都作為有問題而遭批判。

姚文元文革初期曾經說過，批判《海瑞罷官》，「這是柯老逝世前交下來的，因逝世中斷了一下。」¹¹ 也就是說，姚文元是從柯慶施手裏接受這個任務的。¹² 1963年5月6日，上海《文匯報》發表《「有鬼無害」》，這篇文章是針對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1961年為京劇《李慧娘》寫的一篇文藝評論。《「有鬼無害」》的發表對文化界震動不小。這篇文章作者署名

9 這件關於房子的事，是朱永嘉告訴筆者的。

10 轉引自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徐景賢家人編輯，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11 姚文元的這段話轉引自徐景賢1967年1月4日工作筆記。

12 有回憶錄說，批判《海瑞罷官》，實際上是毛澤東1963年決定要「批判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由江青到上海向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佈置，柯慶施讓華東局宣傳部執行的。華東局宣傳部當時擬了十個題目，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撰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其中之一。還有一個題目是批判「有鬼無害論」。引自《文革從華東局開始的三件史事》，唐榮智口述，金大陸採訪，孫路遙、王芳整理，載於《炎黃春秋》雜誌2013年第10期，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主辦。

梁壁輝，實際撰寫者是華東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俞銘璜，張春橋也參加了修改。筆名是柯慶施取的，取「兩支筆揮舞」的諧音。¹³ 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也是由俞銘璜具體與姚文元聯繫的。一場針對北京市委的批判，就這樣首先從上海發起。

但是，俞銘璜不久即因病於1963年去世，接着，柯慶施也於1964年3月底住進上海華東醫院，4月20日做手術，6月初出院，7月14日離開上海，乘坐火車去北戴河休養，9月18日離開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離開北京去廣州療養，自此以後直至1965年4月去世，再也沒有回過上海。¹⁴ 俞銘璜和柯慶施相繼去世，原來由華東局組織、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俞銘璜具體負責的批判《海瑞罷官》之事，就由上海市委接手，市委書記處書記、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具體負責。

被毛澤東欣賞的張春橋

張春橋的提升，與柯慶施不無關係。張春橋是山東巨野人，生於1917年，1935年到上海從事文化寫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一直從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在晉察冀解放區時期，他曾先後擔任《晉察冀日報》和《石門日報》主編，那時，柯慶施是石家莊市長。共產黨執政後，張任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後又任社長兼總編輯。柯慶施1954年調任上海時，張春橋已經被免去上海所有職務，即將被調離上海。起因是張未經請示，就在報上點名批判一些華東局領導幹部，還打算點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違反了共產黨組織原則之一：新聞媒體不得擅自批評黨的領導

13 「梁壁輝」名字為柯慶施所取，引自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14 這個日程表全部引自鄧偉志著《如何評價柯慶施》，載於《黨史縱覽》2003年第9期，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以及慶施的女兒柯六六著：《爸爸的身影》，載於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紅星照耀的家庭》。

幹部。當時主持上海工作的陳毅和譚震林，擬將他調離上海，作為接替的原南京《新華日報》總編楊永直，也已經被調來上海。但柯慶施到任後，立即留下了張春橋。而讓張春橋協助江青在上海搞現代京劇修改，也是柯慶施建議的。¹⁵

許多和張春橋長期共事者都不喜歡張春橋。當年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對張春橋的印象是：平時不苟言笑，遇到重大問題從不先表態，總要察顏觀色、掌握火候和時機。一旦事情出現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態度調整好，把責任推卸得乾乾淨淨。城府很深，陽一套陰一套，不好合作。¹⁶ 張春橋不苟言笑，是幾乎所有和他有過交往的人的印象，除了佈置工作，他平時與人交流很少，哪怕辦公室門對門。當時的市委辦公廳秘書長李家齊，辦公室就在他辦公室的對門，但他從來沒和李聊過天；李對他的印象是「高深莫測」，「陰」。¹⁷ 就連後來和張春橋一個陣營的毛遠新，文革中毛澤東向他詢問對張春橋的看法，他也說對張「往往不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麼，有點陰」。¹⁸

對於張春橋的「陰」，後來給姚文元當助手的朱永嘉有個說法：「張這個人，講話不多，不是很容易親信別人，原則性很強，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有太大的可以討價還價的餘地。我們閒聊的機會都沒有，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一開會就討論工作，也不談生活，也不談家庭，沒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所以人家講他比較陰，就是這個道理」。¹⁹ 但張春橋的不愛說話，並不意味不善言辭。他有興致時，和人聊天談笑風生；他作報告，從來不要秘書起草，思路清楚，生動流暢；每次講

15 陳丕顯 2005 年《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16 同上。

17 文革前擔任上海市委辦公廳秘書的長李家齊 2009 年對筆者的回憶。

18 轉引自江青文革初期的秘書閻長貴著《貢獻與缺憾——讀〈國史〉第八卷》，載於《問史求信集》第 418 頁，王廣宇著，紅旗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19 章劍鋒著《文革上海寫作班的那些人和事兒》，載於《南風窗》2010 年第 8 期，廣州《南風窗》雜誌社。

話，總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不會是空話套話。

張春橋給市委幹部的另一個印象，是比較左。例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上海市委為了增加副食品供應，打算開放自由貿易市場，決策前先向區、縣負責幹部徵求意見。開會時，下面幹部還未發表觀點，作為市委領導的張春橋，首先發言表示反對，嚇得有些區委幹部不敢再談自己的看法。²⁰

張春橋生活簡樸。長期在市委宣傳部工作的徐景賢，文革後回憶：張春橋總穿着一條藏青色舊呢褲，屁股上打着兩塊補釘也不以為意。文革以前過春節，徐景賢幾次和上海一些黨員老作家們一起，到幾位市委書記家拜年，別的書記家多少有些擺設，有的牆上還掛着字畫之類，招待客人時總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獨張春橋家陳設簡單，且只有兩盤花生招待客人。

張春橋出名，是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在一系列會議上，讚揚「大躍進」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對1949年後實行八級工資制的等級差別表示不滿，懷念戰爭年代的供給制。張根據毛的這些話，寫出《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發表在半月刊《解放》雜誌6月號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躍進中創辦的理論刊物。張春橋這篇文章與毛的思想合拍，受到毛讚賞，指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親自撰寫了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讀」。²¹ 毛開始注意張。那年被毛澤東賞識的，還有吉林省委文教書記鄭季翹，他寫的是批判形象思維的文章。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轉載張春橋的文章，引出黨內和學界大討論。張的文

20 文革前擔任上海市委辦公廳秘書長的李家齊 2009 年對筆者的回憶。

21 《人民日報》1958 年 10 月 13 日。

章被《人民日報》轉載後的第六天，毛澤東下令調一架專機，送張春橋和陳伯達去河南遂平碓岬山衛星人民公社考察，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鄭州會議作準備。²² 這年年底，張春橋被提拔為上海市委常委。在討論此事時，市委中有人提出，張春橋妻子文靜有叛徒問題，被柯慶施當場打斷，說此事不要再提。

張春橋的主要工作，是幫柯慶施抓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為柯慶施起草各種報告、文件和講話，以及直接抓一些重點創作，被戲稱為「柯慶施的不管部部長」。1963年12月，張春橋升任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1964年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調北京，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張春橋接任分管宣傳的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兼任市委宣傳部長。

「金棍子」姚文元

姚文元和李希凡，都是共產黨執政後自己培養的著名青年文藝評論家，當時有「北李南姚」之說。姚文元生於1931年12月，資格比李希凡老，1948年他還是中學生時，便已加入中共地下黨。共產黨執政初期，他在上海盧灣區共青團區委擔任宣傳幹事。1958年，柯慶施點名，將姚文元調往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半月刊雜誌，擔任編輯部的文教組組長。1961年底，《解放》停刊，經張春橋提名、柯慶施同意，姚文元被調往中共上海市委黨報《解放日報》社，任編委兼文藝部主任。

文革前的姚文元，已經是有名氣的青年文藝評論家，發表過許多文章。到1965年12月底，他在各種報刊上發表近四百四十篇文章，出版文藝理論、文學評論和雜文集共十三本。他的兩篇文章：《百家爭鳴，健康地開展自由討論》及《錄以備考——讀報偶感》，曾經引起毛澤東注意。前者刊登在1956年6月30日的《解放日報》上；後者刊登在1957年6月10

22 徐景賢著《張春橋短片》，載於2005年6月號香港《明報周刊》。

日的《文匯報》上。後者將幾張報紙對毛澤東一篇講話的不同版面安排進行比較：「解放日報用特別巨大的鉛字和醒目的標題放在第一條新聞，人民日報排在當中，標題比解放日報要小些……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覺得這是一條無足輕重的新聞。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兩個鉛字那麼大」，意即《文匯報》的辦報方向有問題。毛澤東讓《人民日報》在6月14日轉載了姚文元的這篇文章，並且借姚文元這篇文章為由頭，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撰寫了震驚文化界的《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在文化圈內，姚文元的文品口碑不好，被文化人稱作「棍子」，認為他文藝思想的核心，就是反對文學固有的人文關懷。艾青、巴金、丁玲，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過姚文元的批判。姚文元以捍衛共產黨的文化政策為己任，只要上面說哪篇文章哪齣戲好或不好，姚文元就撰文讚揚或批判。他的很多文章就是這樣寫就，例如讚揚南京軍區的話劇《第二個春天》的文章，批判安徽省表現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話劇《毒手》。據說江青因此稱讚姚文元，說他是「無產階級的金棍子」。

不過，生活中的姚文元，不似他的文風那樣咄咄逼人。據和他共事過的朱永嘉以及陳冀德等人回憶：姚文元個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歲便已謝頂；他不喜歡說話，少言寡語，不苟言笑，說起話來結結巴巴，不抽煙不喝酒，給人印象老實甚至木訥；他獨往獨來，與周圍人除了工作，幾乎沒有私人交往，與人談話只談正題，正題之外從不談一句私事；他為人隨和，很少與人起爭執，寫作班的青年喜歡開他玩笑，他囁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氣；他生活隨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鋥亮，仍不換洗；書包裹吃剩的油條大餅可以放到發出異味，被人掏出，方才發覺；他理財馬虎，辦公室抽屜裏稿費

和廢稿紙混在一起，幸虧同事發現，幫他清點出來；²³ 他會鄭重其事請人吃飯，但請吃的卻只是碗陽春麵。²⁴ 姚文元的這種特性，一直保持到後來，直到他去中央後，對過去寫作班的那些人，仍是十分隨和，但仍是不苟言笑，不談任何私事。²⁵ 給人印象，姚文元完全是個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內容，就是工作寫作，不諳人情世故。後來給他當助手的朱永嘉，對他的印象是：「不苟言笑，講話很謹慎，沒有一句題外的閒話。這是我對姚文元的最初印象，這一印象以後一直也沒有改變」。²⁶ 而與姚文元熟悉的市委寫作班成員陳冀德，在幾十年後撰寫的回憶錄中，乾脆說姚文元是個書呆子。²⁷ 朱永嘉則評論說姚文元「與張春橋還是有差異的。張比姚更有心機，姚畢竟比較單純些，書生氣重些」。²⁸

在閱讀愛好上，姚文元特別喜歡科普和科幻讀物。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蘇聯作家亞歷山大·別利亞耶夫，²⁹ 等等，他們的作品都是姚文元的最愛和收藏，甚至曾經為了有人借去他收藏的科普書不還而表示不高興，這在性格平和的姚文元是很少的。十幾年後，當文革結束，姚文元被判刑關押，監獄中寫交代之餘，他又寫出三本著作，都關乎人類科學認識史。一本是人類對天體形成的認識發展史，一本是人類對地球的認識發展史，還有一本是人類對生命的認識發展史，都是獻給妻子

23 《生逢其時》，陳冀德著，香港時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年出版。

24 陽春麵是當時上海底層市民的廉價點心：一碗光麵，除加了點豬油的醬油湯，沒有任何澆頭。

25 朱永嘉和徐景賢都曾多次對筆者這樣評價和回憶姚文元。

26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 201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朱永嘉本人也曾對筆者多次這樣評價姚文元。

27 這是陳冀德在其 2008 年的回憶錄《生逢其時》中一再說的。

28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2001 年整理 200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29 前者是《海底二萬里》等小說的作者，後者是《陶維爾教授的頭顱》等小說的作者。

金英的，他們夫妻倆感情篤深。³⁰ 姚文元一生以文藝批評和政治批判為己任，最後的著作卻是對「天、地、人」形成的認識，而非回憶自己生平，顯示了他的某種無奈，也顯示出他對自然科學領域的濃厚興趣。

1958年9月11日姚文元曾經寫信給出版社，要求出版社不要再給自己寄稿費：「上次你們收入論『約翰·克里斯多夫』一文，匯來了稿費。這次務請不必再寄錢來了。一篇文章出版社成集又拿一次錢，無論如何是不合理的，這是資產階級稿費制度的殘餘。如果自己將來成書，豈不又多拿一次錢。有什麼工人生產一樣產品『拿兩次』錢的嗎？不發稿費，書的定價也可以低些。如果寄來，我也可以退回的。如果說這是『制度』，那我就例外一下吧，這個制度反正可改的。」³¹ 當時，正值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刊登在6月的《解放》雜誌上不久，對「資產階級法權」的全國性討論剛展開。姚文元以不要「兩次」稿費的行為，表明自己的道德和價值取向。後來，到1964年上海市委寫作班成立後，寫作班的一幫青年，也提出不要稿費，和姚文元的做法一樣。

江青找李希凡不成，又來上海找到姚文元。據朱永嘉回憶，「江青到上海找柯慶施，然後通過市委文教書記張春橋將任務交給了姚文元」。³² 李希凡畢竟大學科班出身，多少還從學術層面考慮問題。姚文元曾對人比較自己與李希凡的差別：

李希凡是搞學問的，我是搞政治的。論舊學底子，我不如他，他畢竟是科班出身；論政治敏銳性，他不如我。我最

30 這三本手稿的打印件，筆者曾經在朱永嘉處看到過。

31 文中的着重號為原文所有。引自姚文元1958年9月11日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載於《古籍善本》中國嘉德2009秋季拍賣會照相彩印本，Lot3051 方氏珍藏，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32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大的興趣是寫雜文。李希凡是屬於學者類型，我只想做一個革命戰士。³³

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剛到《解放日報》社上班，張春橋來電話要他馬上去，不必向報社打招呼，要保密。姚文元去後才知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撰寫文章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臨走，交給他一本1961年第1期《北京文藝》，上面刊登着吳晗的劇本。

江青除了那本《北京文藝》，其他什麼資料也沒給姚文元。可姚文元對明史不熟，他希望再有個熟悉此段歷史者，幫忙查閱和核對資料。幾天後，張春橋告訴姚文元，人已選好：復旦大學歷史系青年講師朱永嘉，³⁴對明史很熟，正借調在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任組長。歷史組當時設在丁香花園的「老虎尾巴」，姚文元去那裏，找到朱永嘉，只說要寫明史方面的文章，需要了解海瑞的歷史，要他給自己當幫手，但沒有告訴他寫作背景。朱永嘉以為，既然寫海瑞，吳晗是明史和海瑞權威。吳晗寫《海瑞罷官》劇本後，曾編寫過一本資料集，都是有關海瑞的。朱將這本資料集找來，又找了些明史方面文章，一並交給姚文元，告訴姚文元，有關海瑞的主要資料，都在吳晗這本集子中。後來，朱永嘉又給姚文元講過幾次明朝歷史，補明史知識。他不知道也沒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對象正是吳晗。³⁵

姚文元當時兼華東局「內刊」《未定文稿》編委。4月底，

33 轉引自胡錫濤著《「南姚北李」與〈海瑞罷官〉批判》，載於2000年第9期《今日名流》，湖北省作家協會編輯出版。

34 朱永嘉，男，193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中共黨員。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主要負責人，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市委革常委、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文革結束後判刑14年。

35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2011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市委寫作班與華東局《未定文稿》「分家」，屬市委領導的寫作班，從丁香花園搬出，遷入武康路18號(後來又搬入武康路2號)。姚文元當時人事關係還在《解放日報》社文藝部，《解放日報》社給了他長假，報社五一節以後的稿子，都不用他看了。

姚文元最初沒有將文稿給朱永嘉看，只是經常向朱永嘉詢問具體史實。直到1965年5月左右，朱永嘉才第一次看到稿子，這已經是第四稿。朱永嘉不知文章來頭，只覺文章在政治上提得太高，便表示：學術文章不要太多搞到政治上去，各種觀點可以長期共存。朱永嘉還要歷史組的其他人不提意見，不表態。³⁶ 姚文元給朱看稿子時很謹慎，讓朱當場將所要核對的內容摘錄下來，從不將稿子留在朱處。毛澤東後來對人說，寫《海瑞罷官》批判文章時有一個班子，其實開始時只有兩個人：寫文章的姚文元和幫他查資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寫作班辦公樓寫作，寫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當其助手。為防止行動洩露，張春橋通過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告誡同幢樓的寫作班文藝組，不要上二樓歷史組的辦公室串門，不要過問關於他們的任何事情。

在着手準備批判吳晗之前，張春橋有些顧慮。海瑞戲是在毛澤東提倡下寫的，批判海瑞戲，毛是否同意？張請江青詢問毛澤東。

據我知，主席對吳晗的《海瑞罷官》早有意見，但我們也知道北京對此戲評價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說此戲是根據主席指示寫的。我曾問過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說很大，也未詳細說明。我們還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發現海瑞的宣傳出乎意料的多，劇種很多，什麼京劇、滬劇，各種劇都在演海瑞。上海廣播電台六四年還在廣播此

36 朱永嘉的這個態度轉引自吳瑞武 1977 年 3 月 18 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幫」辦公室編。

戲，《生死牌》搞了電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學課本有海瑞，大學就不要講，一大堆連環畫、小人書，各種宣傳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請江青問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說，他沒有提倡過寫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懷叫他看《生死牌》，戲裏談到海瑞。主席回來就查明史，說海瑞未在湖南作過官。請同志們看看，如此而已。³⁷

對於自己曾經提倡過海瑞精神，毛澤東矢口否認。毛澤東的否認，讓江青和張春橋沒有了顧慮。但究竟批判哪個海瑞，上海的，還是北京的？

我們考慮過，究竟批評哪一個？是《海瑞罷官》，還是《海瑞上疏》？我們認為《海瑞罷官》寫得太露骨，應該批判影響大的。³⁸

張春橋請江青向毛澤東詢問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罷官》，說明張春橋和姚文元動筆之前，是通過江青向毛澤東請示過的，更說明毛澤東事先便知道此事。而且在此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個部長，要他們批判《海瑞罷官》遭拒絕後，毛澤東曾指示，將《海瑞罷官》列為可供批判的39個《文學藝術資料》之一，批轉至縣團級，但因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等沒有具體的後續佈置，批判未曾實際實行。³⁹ 但是，毛澤

37 這是張春橋 1966 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上海「紅革會」及「工總司」代表時說的，載於《反到底》1967 年 1 月 8 日，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編輯部編。

38 張春橋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周良霄、顧菊英編，香港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年出版。

39 這 39 個包括《海瑞罷官》在內的可供批判的《文學藝術資料》，很多文章

東1967年2月3日卻在與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卡博·巴盧庫談話中說，批判《海瑞罷官》他起初不知道：「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⁴⁰ 而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主席在那裏親自領導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寫的嘛，有些人卻貪天之功，說是他們搞的」。江青這個講話題目為《為人民立新功》，毛澤東在審閱時，刪去了「是主席親自在那裏領導的嘛」句。⁴¹ 批判《海瑞罷官》實際是毛澤東批判北京市委的前奏，但毛澤東似乎不願對外承認，自己才是這場批判的真正推手與始作俑者。

上海市委與批判《海瑞罷官》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第一稿出來是1965年6月間。江青以觀看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為名，特地來上海，親自審稿。她對這個初稿不滿意，認為沒深度。她要姚文元再修改，不能就事論事批判。以後，江青又幾次來上海，審閱姚文元的稿子，與張春橋一起提出修改意見。張春橋也多次將稿子夾在《智取威虎山》錄音帶內，用飛機送去北京江青處。江青後來說，張春橋每次去見她，都裝着是為樣板戲的事。陳丕顯回憶說，開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慶施逝世，江青才對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他，說起批判《海瑞罷官》的一些情況，要求繼續借用張春橋和姚文元。江青還一再交代陳丕顯要保密，陳覺得蹊蹺，但也沒有太當回事，「心想

都提及，雖然筆者始終沒有查到原始資料的出處，但是在「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1967年12月編輯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9——1967.10)》中的1964年7至9月中有記載。

40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第1397頁。

4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卷，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風頭，先保密，發表時一鳴驚人」。⁴²

柯慶施是上海市委領導，江青從一開始沒瞞着柯慶施。柯慶施去世後，江青又馬上告訴了繼任的陳丕顯，顯示江青沒有想瞞着上海市委。雖然文章的一至六稿，都沒有給上海市委其他領導看，但書記們各司其職，一時不知道也非不正常。而且，從姚文元開始動筆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起，上海市委都知道。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認為，批判《海瑞罷官》，「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建立班子在上海寫，沒有背着上海市委和華東局，張春橋是作為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代表來組織文章的。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他們能不執行嗎？當時是執行的，還是光榮的。毛主席對上海市委是信任的，寄予希望的。並沒有把張春橋、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開」。⁴³張春橋是分管宣傳的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兼任市委宣傳部長，由他具體抓姚文元的寫稿順理成章，何況姚文元本身就是張春橋分管系統的人員。

江青要隱瞞的對象不是上海市委，而是北京市委。不過，整個寫作過程確實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廠排版印刷時，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車間，沒有任何手續。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須送市委秘書長批後才能送印。⁴⁴

9月，陳丕顯要去北京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行前，張春橋將姚文元文稿交他，讓帶給在北京的江青。陳丕顯後來回憶，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應該是第七稿。⁴⁵陳丕顯

42 陳丕顯 2005 年《在一月風暴的中心》第 28–29 頁。

43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756 頁，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出版。王力這話是針對文革後有一些文章說張春橋組織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是瞞着上海市委的。

44 文革前擔任上海市委辦公廳秘書長的李家齊 2009 年對筆者的回憶。

45 張春橋在 1966 年 12 月 23 日對「紅革會」代表和工人造反派曾經說：「從一至六稿是我和姚文元搞的，都沒有給市委看過，直到七稿才給市委看」。

說，自己帶稿子去北京時，一路心中不安。覺得江青在上海秘密組織寫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長，卻又不准上海對北京方面打招呼，這會影響上海和北京兩個城市關係，也不符合共產黨組織原則。到北京，他將稿子交給江青；又將自己的顧慮，告訴同去開會的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兩人商量半天，覺得最好找個機會，向周恩來或陳毅匯報。但沒等他們匯報，毛澤東已向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吳晗的打算。那是在會上，毛澤東忽然提出，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正當與會者對毛這句話費解，毛又轉向彭真，問：「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澤東突如其來的問話問住，楞了一會兒，才回過神，答：「吳晗有些問題當然可以批判」。陳丕顯於是認為：毛澤東向彭真發問，一是徵求意見，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這樣認為，會後，他對陳丕顯說：「阿丕，這下不用擔心了，毛主席都問過彭真了，我看我們也不用再找總理和陳老總匯報了。」⁴⁶

文章發表前，張春橋提出，要聽聽學術界意見。11月5日和7日，由文匯報社出面，開了兩次座談會。第一次座談會對象是黨內專家。上海社科院院長李培南提了些意見，內容尖銳。這個發言後來幾次被張春橋點名，李以後被打倒，與此不無關係。第二次是黨外專家會議，以文匯報社名義，在泰興路的市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開，參加者有史學界權威周谷城、周予同、譚其驤等，《文匯報》總編輯陳虞孫主持會議。陳守實、譚其驤、周予同以及周谷城，都是復旦大學教授，與姚文元的助手朱永嘉，都是同事關係。陳守實教授曾是朱的導師，譚其驤教授和吳晗關係比較好。兩人的家都在復旦校園內，朱永嘉也住在復旦校園。朱此時已知道姚文元文章背景是江青和毛澤東，擔心兩位教授言多有失，會前找機會向他們打招呼，說文章有

46 陳丕顯 2005 年《在一月風暴的中心》第 28-29 頁。

來頭，會上發言小心。所以，譚和陳在會上講話很謹慎。周予同和周谷城兩位教授家在市區，直接從家去參加會議，朱永嘉沒有機會向他們打招呼。⁴⁷ 不知就裏的周予同，在會上為吳晗打抱不平，說吳晗是個好人，不能這樣給他戴帽；周谷城也發言，不同意姚文元觀點，儘管說得比較婉轉。會上大多數人都非常同情吳晗，尤其反對硬把吳晗劇本與單幹風聯繫起來，認為太牽強武斷。⁴⁸ 張春橋將這些發言寫進會議簡報，直接報毛澤東。不久文革全面發動，周予同和周谷城兩位教授，成為上海報紙點名的八個「反動學術權威」中的兩個。

曹荻秋後來在一次講話中說，姚文元的文章，「市委改了四稿」。⁴⁹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書記處開會，討論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經討論過幾次。這次參加會議的，有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書記張春橋、分管教育衛生的候補書記楊西光、市委候補書記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協助姚文元查資料的朱永嘉，以及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曹荻秋站着，很仔細地將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資料引用上提了幾個問題。陳丕顯似乎沒好好看文章，在會議室裏來回踱着步，對張春橋說：「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勞的！」⁵⁰ 不過，陳丕顯還是為吳晗辯護，說「不一定他主觀上同退田聯繫起來」。⁵¹

47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2001 年整理 200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48 以上材料引自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印；以及筆者、顧訓中 2005 年 7 月 23 日對朱永嘉的訪談。

49 這是曹荻秋說的，同上。

50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2001 年整理 200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以及顧訓中、筆者 2005 年 7 月 23 日對朱永嘉的訪談記錄。

51 陳丕顯的話轉引自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問姚文元：「你準備給吳晗戴什麼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還是其他什麼？」因為姚文章中沒給吳晗定性。姚答：「看事實吧！何必我們給他戴帽子呢」。楊西光又問姚，吳晗是秘密黨員，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這就不管了。張春橋也站着，沒坐。參加會議的朱永嘉後來回憶說，整個會議給他印象是開得鬆鬆垮垮。陳丕顯、曹荻秋他們似乎沒太把文章當回事。⁵²

姚文元的文章，就這樣被上海市委通過了。看樣子，市委領導幹部們都以為，姚文元的文章至多只是批判北京市委，最高到批判彭真。1949年後這種批判太多，尤其六十年代以後，今天批判著名哲學家馮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楊獻珍，一會兒批判經濟學泰鬥孫冶方，一會兒又批判史學權威周谷城。他們尤其不知道，這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思想是主席的，具體是江青同志搞指導的」。⁵³

文章發表前，陳丕顯和曹荻秋都主張，向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打個招呼，張春橋不同意。⁵⁴ 曹荻秋後來承認說，上海市委那時非常為難：考慮過同北京的關係，事實上是同彭真的關係問題。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動；打了招呼，上面不同意，又怎麼辦？書記處反反覆復討論過好幾次。⁵⁵ 張春橋也說過，同北京市委的關係是他當時的顧慮之一：

還有一顧慮，即和北京的關係。我們當時不敢打招呼。文

52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2001 年整理 200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53 張春橋 1966 年 12 月 23 日對「紅革會」代表和工人造反派的講話。

54 《陳丕顯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材料摘編》，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宣傳組，1967 年 5 月。

55 曹荻秋的這段話引自 1967 年 1 月 8 日「紅衛兵上海大專院校革委會」與「紅衛兵上海司令部」主辦的《紅衛戰報》第 16 期，《砸爛反對毛主席的上海市委》，作者是「市委文革小組辦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

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來，我們考慮不必要送審了，主席九月會議已經講了話，可以批評吳晗嘛，這時如再問彭真好不好？我們反的是資本主義，如彭真說主席已批准，為什麼還問我。所以就未打招呼，還有批評周谷城也沒給上海打招呼嘛。雖不是副市長，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協副主席。我們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後，因為準備不夠，也很緊張，周谷城要自殺，我們毫無準備，但無怨言，因為周谷城應該批評。⁵⁶

不過張春橋還是在姚文發表前，向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打招呼。他和鄧拓是老同事，張春橋1949年前在《晉察冀日報》工作時是理論部主任，鄧拓是社長兼總編，張的上級。張春橋說：「我和鄧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鄧拓打招呼，鄧拓就會說我不夠朋友了」。這話張春橋對陳丕顯和朱永嘉都說過。⁵⁷ 不過據說，張春橋電話打過去，鄧拓不在辦公室，沒有直接聯繫上。⁵⁸

定稿後的文章，毛澤東「看了三遍，認為基本還可以」。⁵⁹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頭版發表。第二天，中共上海市委的黨報《解放日報》全文轉載。文章首先登在《文匯報》上，是張春橋的意思，他認為文章刊登在這張非黨報上，首先不會引起人們猜測，因為這份報紙過去也發表過一些學術爭論文章；其次，這張上海報紙在全國特別在知識界擁有廣泛讀者，

56 張春橋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

57 陳丕顯 2005 年《在一月風暴的中心》第 36 頁。

58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2001 年整理 200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59 毛澤東 1967 年 5 月 1 日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談話，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

可以通過對姚文元文章的爭論，了解知識界態度，便於以後的批判。江青同意了。⁶⁰ 文章發表那天，姚文元自己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還在睡覺，一個電話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電話，是陳丕顯親自打來的，告訴說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匯報》發表，還向姚文元表示祝賀。⁶¹

北京市委的反應

《文匯報》發表姚文後，全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但北京沒有轉載。姚文刊登當天，《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向鄭天翔電話請示是否轉載。鄭是北京市委分管《北京日報》工作的市委書記，他匆忙看過姚文後，同意轉載。但第二天《北京日報》上不見姚文，原來是被市委書記鄧拓攔下了。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北京領導層對吳晗印象都很好，如果轉載，北京市委等於認同對自己市長的批判。最後北京市委決定，先向上海方面詢問背景，如果文章是毛澤東讓姚文元寫的就轉載。但是，北京市委沒有得到答案，上海方面託詞不答。

北京市委不轉載姚文，並不違反共產黨的操作規則。1949年以後，批判有一定職級的黨或行政幹部，必須經過相關部門批准，這是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姚文元文章只是個人署名，而且只是刊登在上海的地方報紙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彭真，不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且還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這個小組成立於1964年7月，是毛澤東對文藝界做了「兩個否定」批示後成立的，負責領導

60 《以共和國名義判決》，王文正口述，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8-06-04 出版。作者王文正當時擔任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長。

61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2001 年整理 200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又據朱永嘉對筆者說，這是姚文元女兒告訴他的。

文藝界整風等文化革命事宜。1965年五人小組曾經發過指示，這個指示毛也同意：學術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點名要經過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現在上海發表姚文元文章，給吳晗戴上一系列大帽子，彭真當然會抵制，尤其他根本不知道，這一切實際都出自毛澤東安排。彭真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哪裏去了」。彭真的不愉快，還有一個原因，南北兩個海瑞戲，上海批判北京的，卻不批判自己的。為此，彭真幾次說上海市委只批評《海瑞罷官》，而對《海瑞上疏》卻不作檢討。

沒有立即轉載姚文的，還有陶鑄掌控的廣東和中南地區，陳丕顯很着急。11月20日，陳丕顯與正在上海看病的陶鑄妻子曾志會面，告訴她姚文背景。曾志第二天就打電話給陶鑄，陶鑄馬上佈置發表姚文。⁶²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兩天，毛澤東便離開北京，一路巡視，11月17日到上海。以後便一直住在上海和杭州等南方城市。整個文革發動階段，毛澤東始終不回北京，似乎是為了與北京市委以及在北京的中央決策機構拉開距離，遙觀北京動態，又似乎是對整個北京領導層不信任。毛澤東到上海後，得知北京各報不轉載姚文，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將文章印成單行本，向全國發行。不知就裏的北京方面，只按一般圖書報了訂數。

陳丕顯等上海的市委書記們很着急。11月25日，陳丕顯見到陪同毛澤東到上海的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將姚文背景以及毛對北京不轉載姚文的不滿都告訴了羅，羅馬上告訴周恩來。周恩來從上海回到北京後，要求盡快轉載；羅瑞卿也要《解放軍報》轉載。⁶³ 11月29日，在上海發表姚文十九天後，《北京日

62 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63 陳丕顯2005年《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報》和《解放軍報》同日轉載姚文。僵持終於結束。所有人都鬆了口氣，包括張春橋。張春橋後來回憶，北京沒登姚文時：

上海新華書店打電話問各地是否定訂？各地回電話都要，只北京不回電，完全封鎖，一直到後來，我打電話問石西民，他說他不管發行，我說請你管一下嘛。這樣局面恐怕和彭真有關。我們不為自己擔心倒為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擔心，這樣恐怕要犯大錯誤。

後來羅瑞卿和總理去上海，羅投了一次機。羅向主席問姚文元文章的事，主席說，是呀，可以看看。羅未摸到底。我們和羅談，羅給彭打電話，說彭不反對文章，是想考驗范瑾、周揚等的態度。羅說，我告訴總理，這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經過羅，彭真已經知道，北京才登。這時我們才稍鬆了一口氣。⁶⁴

可能是湊巧，更可能是有意，就在姚文元批判吳晗文章發表的同時，上海市委大造聲勢，宣傳紀錄片《北京農業大躍進》，規定作為重點片，在市區各大電影院同時放映，郊區所有生產大隊輪流放映。於此同時，《解放日報》接連兩個版面，刊登整版照片。一時間，「學北京、趕北京、超北京」，成為上海郊區農業口號。文革開始後，上海市委遭批判，此事也是被批內容之一：上海市委放映此片，是為了「吹捧彭真為首的舊北京市委」，「竭力抵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影響」。⁶⁵

64 張春橋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

65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1965 年 11 月—1967 年 2 月 24 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班 1969 年 1 月編寫。「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班」是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寫作班」的前身。

張春橋收集學術界反應

姚文刊登後，張春橋指示，開座談會或單獨訪問，收集北京和上海學術界知識分子反應，這顯然是毛澤東的要求，因為這些反應匯集後，都報毛澤東。北京學術界情況，由文匯報社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艾玲負責收集後報上海。艾玲是抗戰時期就參加共產黨的老幹部，當時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她丈夫是軍隊高級幹部，在文革的準備時期，她以自己和丈夫的社會關係，收集了大量北京文化界及幹部圈內對樣板戲以及《海瑞罷官》的反映。這些收集來的反映都是手寫的，每天一個郵包，通過民航班機送往上海。⁶⁶ 艾玲後來被認為在批判《海瑞罷官》中立了功。文匯報社本來編有紅色刊頭的內刊《文匯情況》。收集來的情況，立即刊登在《文匯情況》上，直接送毛澤東、江青。

張春橋要求縮小《文匯情況》發行範圍，控制發行數量，連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都不在分發之列。根據張春橋要求，文匯報社另闢保密排字印刷車間，人員都經嚴格政治審查。1965年12月中旬，周恩來和楊永直先後偶然看到這個《文匯情況》。江青得知後，立即要張春橋從12月23日起，不再將此類信息登載於《文匯情況》；另出不編號的《記者簡報》，刊頭印着「絕密，只供負責同志參考」字樣，每期只印十二份。張春橋親自分發。十份交江青，專送在杭州的毛澤東，江青吩咐不送周恩來。上海只發張春橋、寫作班兩份；給陳丕顯發過兩期，後來停發了。⁶⁷ 毛澤東當時在上海，非常愛看這份刊物，每天都索要。

66 艾玲《我在文匯報「北辦」的經歷》，載於2001年第9期《炎黃春秋》。

67 轉引自鄭謙1984年著《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載於《黨史通訊》1984年第6期，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學術界對姚文反應冷淡。二十天內，《文匯報》僅收到三篇來稿，而且這三篇來稿都不是專業人士文章。張春橋事先已經準備一批文章。11月29日，《文匯報》第二版，以《讀者來信要求討論〈海瑞罷官〉》為通欄標題，刊登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以及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讀者來信。所有文章在對姚文籠統肯定後，接着都以商榷口氣，從史實或研究歷史方法出發，反駁姚文元觀點。這些文章都是事先就組織好的，而且都是聯名，沒有個人署名文章。⁶⁸《文匯報》為這些文章刊發張春橋撰寫的《編者按》：

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我們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為了開展百家爭鳴，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問題弄清楚，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昌盛。我們熱烈地歡迎廣大讀者繼續來稿來信，各抒己見，參加討論。⁶⁹

這篇《編者按》連續刊登了六天，但是署名來信還是不多。《文匯報》編輯部在讀者來信中，發現一篇署名馬捷的反駁文章。馬捷是上海敬業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真名馬以鑫。⁷⁰他讀了姚文元文章，認為牽強附會，寫信給《文匯報》，表達不同看法。張春橋看到後，決定刊登。報社將馬捷找去，要他修改一下。馬捷覺得，既然公開刊登，那就將文章改得平和一些，不要太尖銳。但是修改後的文章，張春橋不滿意，覺得沒

68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2001 年整理 200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69 《文匯報》1965 年 11 月 29 日《編者按》。

70 馬捷，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敬業中學高二學生。1968 年「上山下鄉」去農村，以後上大學，文革結束後任上海師範大學教師。

了鋒芒，不像對立面樣子。於是將馬捷修改前的文章《也談〈海瑞罷官〉》，加上通欄標題：《關於〈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1)》，旁邊仍配上張春橋寫的那篇《編者按》。但沒有說明這是中學生來信，給人感覺馬捷是個圈內人士化名。

文章刊登後，應者還是寥寥，之後五天的討論版上，刊登的仍都不是名家來信。為了讓業內人士出來說話，張春橋要求召開座談會，還指示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帶頭表態，說：我們現在要「放」，如果別人不敢提相反意見，你可以先表個態，就說姚文元文章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可能是小部分正確，大部分不正確，完全可以討論，不會抓辮子的。「你是宣傳部長，你這樣一說，人家就敢講話了」。楊永直有些猶豫。張春橋說：「人家將來有意見，我會替你說明的」。⁷¹文革開展後，楊永直為此事多次遭揪鬥，張春橋卻沒為他辯護，更不提他當時的那番話。⁷² 12月10日，業內人士討論會召開。張春橋自己也在會上發言：

《海瑞罷官》提出來的不只是一齣戲的問題，而是一系列的原則問題，涉及到海瑞、清官、道德繼承、歷史主義、讓步政策、歷史劇、歷史人物，等等。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有根本分歧。這些分歧，是我們同……歷史界、戲劇界、哲學界許多資產階級學者之間的分歧，是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中階級鬥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要有步驟地搞，首先是要給這齣戲是不是毒草定案，然後一個題目一個題目地搞。⁷³

71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20 頁。

72 鄭謙 1984 年著《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

73 張春橋在 1965 年 12 月 10 日座談會上的講話，轉引自鄭謙 1984 年著《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

張春橋發言中那一系列題目，是朱永嘉幫助制定的。北京轉載姚文後，張春橋曾將朱叫去辦公室，要朱列出《海瑞罷官》學術上可以討論的題目。朱於是列出了上面那幾個題目，涉及黎澍的「歷史主義」，翦伯贊的「讓步政策」，馮友蘭的「抽象道德繼承」，等等，都是1962年以來學術界爭論熱點。那天張春橋沒有提怎樣從政治上批判《海瑞罷官》，朱永嘉當時以為，張春橋目的是引起爭論，開展學術討論：

文章發表後，《文匯報》的編者按是張春橋修改的，先後登了六次。當時的目標是放在黨內支持學術權威的走資派上。討論的問題是張春橋佈置的，由我寫出討論提綱。討論什麼？當然不可能討論政治問題，只能討論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海瑞的清官和貪官的關係問題，目的是引起爭論。討論的方法是明辨是非，允許不同意見。我自己也寫了兩篇關於告狀問題、投獻問題的文章，也是在學術範圍。⁷⁴

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中央軍委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羅瑞卿。會間，彭真找張春橋，了解上海批判《海瑞罷官》的打算。彭真找張春橋，據朱永嘉回憶，張春橋是高興的，他後來告訴朱永嘉說，彭真問上海準備怎樣做，張對他說批《海瑞罷官》是學術討論，並將上海組織討論的計劃和報紙上的按語都給彭真看了。朱永嘉對此還回憶說：

張春橋給彭真看的確實是上海制訂的計劃，這個計劃是我在張的辦公室一起參與討論和策劃的，是在北京轉載姚文元文章後制訂的。而這時候的張春橋並不完全清楚這場批

74 朱永嘉列的這幾個題目以及回憶，均引自顧訓中、筆者2005年7月23日對朱永嘉的訪談。

判的最終目標是什麼，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整個部署和指揮的都是毛澤東，張春橋也不過是毛澤東的大棋局中的一個棋子，只是毛澤東這時並未走到台前。前台是彭真與張春橋之間的較量。⁷⁵

彭真看了很滿意，對張春橋說：等這些事結束了，你到北京來時，我請你吃烤鴨。⁷⁶ 彭真和朱永嘉等都以為，這只是一場學術討論而非政治批判。但是，1966年1月，張春橋為上海市委起草的《關於討論〈海瑞罷官〉問題的通知》，卻強調這是一場政治批判：這個討論不僅是對一齣戲的評價問題，而是多年來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的新發展。張春橋強調指出，全市各級黨組織都應重視思想戰線上的大辯論，以「推動意識形態領域裏的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但最後這句話，被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改掉了。⁷⁷

不過，即使是學術批判，還是沒幾人響應。學術界經過1957年反右，以及1964年後越來越升級的批判，早成驚弓之鳥，噤若寒蟬，無人敢完全真正地說心裏話。於是，張春橋又要求：《文匯報》出面召開上海史學界、文學界學者座談會。會前宣佈是內部討論，不登報，不發表，暢所欲言。

12月31日座談會召開，與會者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周谷城、上海市文化局劇目工作室負責人蔣星煜、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譚其驤、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傑、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副主任兼總編

75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2001 年整理 200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76 這件事陳丕顯和朱永嘉在回憶錄中都有提及。見《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以及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2001 年整理 2001 年《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77 楊永直刪張春橋講話之事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班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輯李俊民、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束世澂、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楊寬、上海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魏建猷、上海師範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張家駒、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德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副主任陳向平等，都是上海一流知名學者。他們紛紛發言，不同意姚文元對吳晗的指責，會議結束時，主持人宣佈要把討論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學者們大呼「上當」。⁷⁸ 李俊民那天被張春橋點名參加會議，會後回到家大呼「老天亡我」！原來他事先準備了一份措詞謹慎的稿子，不料正欲發言之際，忽然一陣風將稿子吹走。他只好硬着頭皮脫稿發言，其中說了一句：「清官是封建時代的精華」。⁷⁹ 李俊民的發言，日後被提煉成「清官精華論」，1966年6月，他作為上海文革最初八個「黑幫」之一，在報紙上遭到公開批判。

「要害是罷官」

12月，毛澤東看了《光明日報情況簡編》第362期，上面《吳晗看了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後的反映》一文，引起毛注意：

姚文元說我的《海瑞罷官》作品產生於1961年「颶風」的時候，這是錯的。我的《論海瑞》發表於1959年9月21的《人民日報》上，《海瑞罷官》是1960年寫的，我沒有那麼大的本領，預見到1961年要「颶風」。

吳晗的自我辯護，指出姚文非常明顯的一個漏洞：吳晗劇本在前，單幹風在後；明白地顯示，給他的罪名是強加的。毛

78 鄭謙 1984年著《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

79 李俊民的女兒冬冬 2010年11月《記憶裏的浪花》(未刊稿)。

澤東看了這篇材料後批道：「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⁸⁰ 毛澤東於是採納了康生的「罷官」說。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與秘書陳伯達、田家英、胡繩、關鋒、艾思奇五人談話。毛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打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個加上去的「要害」，就連姚文元之前也不知道。與姚文元很熟悉的上海市委寫作班的徐景賢，曾經問過姚：你的文章怎麼就沒有打中要害呢？姚文元回答說，他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害是罷官。⁸¹ 即使是張春橋，似乎也不知道這個「要害」，不知毛的意圖：

當時也沒有想到觸動社會如此之深，當然也沒想到彭真會那樣發怒。老實說，那時我們理解也很淺，也未準備大搞，只想發表姚文以後，吳晗會反駁，那我們寫幾篇文章就完。⁸²

所有人都不知道毛澤東批判吳晗的真實意圖。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在整理毛12月21日那天談話時，將「要害是罷官」那段話刪去。田家英可能認為，毛只是即興說說。殊不知整個講話，只有這段才是要害，是毛真正要表達的。

80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第 1398 頁。

81 這是朱永嘉告訴筆者的，朱永嘉回憶說是徐景賢告訴他的。

82 張春橋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在陳丕顯的回憶錄中，說張春橋是知道要害的。他回憶說張春橋在一個小會上講：「這個『要害』不要由我們來說，要讓主席說。如果我們寫上去了，主席不同意這麼說，會使我們變得非常被動；不如我們不要這個『要害』，爭取主席的支持，讓他說出這個『要害』，那就不同了。主席威望高，他說《海瑞罷官》是替彭德懷翻案，人家不敢說半個不字，我們就立於不敗之地」。但陳丕顯沒有注明張春橋是在哪個小會上說此話。筆者估計這可能是張春橋後來在文革中的講話。

錦江飯店南樓會議

1965年12月26日，彭真到上海。這天正值毛澤東生日，彭真做東請幾位上海市委領導人吃螃蟹，地點在錦江飯店南樓的14樓。參加者有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書記處書記張春橋和書記處候補書記楊西光，還有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

彭真說，他早就要批判吳晗，叫周揚、范瑾、鄧拓寫文章，寫得不好，你們上海寫了好嘛，北京未轉載是想看看動態。彭真還說，對姚文元文章要一分为二。張春橋便說，向陽生也有問題。張春橋所說的「向陽生」，即指鄧拓。彭真讓鄧拓署名「向陽生」，在1966年12月12日的《北京日報》及北京市委刊物《前線》雜誌上，發表《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就幾個理論問題與吳晗同志商榷》，文章從學術角度，對吳晗的道德繼承論提出討論。彭真說，那是我叫他寫的。彭真說，主席說了要放，政治問題以後再談，劉仁、鄧拓是左派。

一位到會者幾十年後回憶當時的對話：彭真又說，中央的方針就是放，不要急於批判。陳丕顯說：中央的方針，我們同意，上海的討論也展不開，很多人不肯說意見，我贊成放。

張春橋說：中央方針是「放」，我們贊成放。這是我們黨歷來的方針，反右鬥爭的時候，毛主席就是說過我們不收，永遠不收，要放。我看如今也是這樣。彭真說：那好，你們的意見和中央一致，那就很好。

張春橋又問：我們原來打算發表一篇批判向陽生同志的文章，看來，也為時過早，是嗎？彭真說，我看暫時不必發表吧，若是批判得急了，誰發表文章呢？

張春橋說：已經放了好多了嘛。彭真說，再釣幾條大魚。

張春橋對彭真表示，自己和鄧拓是老朋友了，你說不批判就不批判吧，不過以後有可能還要發表的。什麼時候發表由中

央決定，我們服從中央。彭真說，好，就這樣定了。你們到北京，我請你們吃烤鴨。

後面的談話很輕鬆，話題轉入文科教育革命和備戰。整個談話，彭真顯得很高興，張春橋也沒表示不同意見，他還建議彭真「抓一下」，「有什麼情況可以聯繫」。大家在如何進一步開展批判《海瑞罷官》問題上，達成一致共識，就是要繼續「放」，釣出更多的「大魚」。⁸³

《二月提綱》與上海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彭真在會上說，經過調查，吳晗與彭德懷沒有關係。會後，根據彭真指示，中宣部兩位副部長許立群和姚溱，起草給中央的《匯報提綱》，因為在2月起草，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中心是學術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地以勢壓人。2月5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和鄧小平參加會議，會上討論通過《二月提綱》，同意在學術討論的文章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不提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並且決定，由彭真向毛澤東匯報。⁸⁴2月7日，《匯報提綱》以電報形式，發給正在武漢的毛澤東；2月8日，彭真帶領包括康生在內的五人小組全體成員，乘專機到武漢，直接向毛匯報。匯報中，毛澤東兩次問《海瑞罷官》同彭德懷翻案是否有聯繫，彭真再一次為吳晗辯護，說根據調查，沒有發現他們有聯繫。於是，毛澤東說：「我說過吳晗文章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是康生的發明權。」在

83 以上資料引自張春橋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以及中共中央1966年《516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還有參加會議當事者的未刊回憶錄。

84 吳冷西《回憶毛主席》，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

一邊的康生聽了連忙否定：「不，不是我的發明權，是毛主席的發明權。」毛澤東則再一次重覆地肯定：「是你康生的發明權！」⁸⁵ 甚至還表示，吳晗經過批判後，仍然可以當北京的副市長。

許立群平時比較謹慎和敏感，那次匯報談話後許卻顯得特別輕鬆；彭真等更是如釋重負，以為幾個月的問題都解決了，鬆了一口氣。大家都認為，他們向毛匯報，毛沒有反對，就是認可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他們那時還不知道，大凡毛不表示反對，但又不明確贊成，大都其實是不贊成，甚至反對。

2月10日，彭真從武漢飛到上海，將《匯報提綱》給陳丕顯看，讓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責人看後轉交江青。陳丕顯與曹荻秋、魏文伯傳閱後，當天下午，就轉給正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江青，並轉告說，彭真打算晚上同她面商。⁸⁶ 彭真見大家都沒意見，便代中共中央擬了個批語，電傳北京，經政治局在京常委同意後，於2月12日將《匯報提綱》發往全國。彭真認為毛澤東已經同意了自己的意見。2月12日，他對上海市委說：「『匯報提綱』是常委討論過，毛主席同意了，問題都解決了，也不需要跟你們談了。」這話實際對着張春橋。彭真說，你們看文件就行了。張春橋後來說，自己當晚馬上同時看兩個文件：一個是毛澤東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另一個就是彭真的《匯報提綱》。晚上，張春橋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及《人民日報》總編吳冷西同桌吃飯。田家英與彭真看法一致，認為問題已經解決了。張春橋則認為問題還沒有解決，對提綱中提出的「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等，還需要研究。第二天，彭真讓胡繩找張春橋談話，要胡繩告訴張春橋，不能講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聯繫廬山會議，還特地說明，這是毛澤東的意見。但張春橋說，問題根本沒解決：

85 陳丕顯 2005 年《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86 同上

我說主席曾兩次問，吳晗是否可說反黨反社會主義。《提綱》提到演壞戲的演員不要檢討，是有所指的。因為《文匯報》曾登過譚元壽的文章，批判吳晗說寫海瑞不對。這是好事。報上還登過馬連良的文章，這是捧吳晗的文章，說吳晗文章有現實意義。我們轉載了這些，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可是《提綱》卻不讓登他們的文章，如按《提綱》辦，還有多少人可以參加戰鬥？⁸⁷

江青也馬上覺察出《二月提綱》真實目的。張春橋後來在一次講話中說，《提綱》「不動聲色地束縛了我們的手腳，硬把運動拉向右轉，弄得許多文章不能發表。姚文元、關鋒寫好了的講要害的文章都壓下了。」為縮小影響，張春橋指示，只在小範圍傳達《二月提綱》；而尚未進入權力核心，不知中央高層紛爭的姚文元，甚至已經着手根據《二月提綱》精神，為《文匯報》起草「四個月來運動總結」，作結束準備。⁸⁸

面對底氣十足的彭真，張春橋有點吃不準毛澤東的態度了。為了摸清《二月提綱》底細，3月初，張春橋以上海市委書記處名義，派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去北京了解情況。讓楊永直去，是因為楊與許立群延安時期是同事，說得上話。楊永直到北京後，根據張春橋要求，反復詢問許立群「學閥」是否有所指。許立群請示彭真後，在楊永直即將返滬的3月11日，打電話對楊說：「學閥沒有具體指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哪裏去了？」楊永直回上海後，即向陳丕顯和張春橋匯報。張春橋問楊永直是否聽錯了，楊說沒有聽錯。張春橋於是斷定：

87 《516 通知附件》，以及張春橋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

88 鄭謙 1984 年著《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

所謂「學閥」恐怕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市委，感到這是針對毛主席的，因為他知道主席說過叫批判吳晗。《提綱》草案裏沒有「武斷」二字，正式文件強加上「武斷」和「以勢壓人」。這是指吳晗的政治問題，說主席武斷，上海市委以主席之勢壓人。⁸⁹

毛澤東果然對《二月提綱》非常不滿。3月28、29、30日連續三天，毛澤東在杭州與江青、康生等談話，當他們匯報許立群對楊永直的回話後，毛更是大怒，說：

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許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⁹⁰

彭真的意思是說姚文元撰文批評北京市長，卻不向北京方面打招呼；毛澤東硬將其詮釋為「姚文元發文章必須向北京打招呼」。毛澤東還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就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毛澤東又說：「我歷來主張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各地造反，向中央進攻」，「中央出修正主義，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我們面臨着文化革命，中央機關還有保皇黨」，「必須進行這場文化革命，反對修正主義」。⁹¹ 毛澤東還點了吳晗、鄧拓、廖沫沙的名，這三人都是北京市委的領導。毛澤東說：

89 引自張春橋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

90 轉引自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91 轉引自鄭謙 1984 年著《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

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前線》也是吳晗、廖沫沙、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⁹²

這些講話，已經不只是針對「罷官要害」，而是針對整個北京市委和整個中央，是隨後不久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綱領。毛澤東這三次講話後，批判升級，從原來針對吳晗，上升到針對北京市委。毛澤東還要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彭真只得於3月30日與4月1日，兩次打電話給曹荻秋，說：「學閥無所指，打招呼問題是陸定一有意見」。

毛澤東離開上海時，讓張春橋把對《二月提綱》的意見寫出來。張春橋寫了。4月4日，他在上海市委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澤東3月28日至30日的那些講話，並提出，自己對《二月提綱》的意見已經同康生說過，但應當以市委名義正式提意見。曹荻秋不贊成，說：「要就是口頭談談，不正式寫。」⁹³

張春橋將這份意見交給毛，毛表示：「很好，需要徹底的攻」。毛還讓康生告訴張春橋：不要有無窮的憂慮。張春橋對此一語成讖地說：

我們還有顧慮。主席健在時，主席的戰友健在時，還有此情況，將來主席不在，又將如何？⁹⁴

92 轉引自王文正著《以共和國名義判決》。

93 曹荻秋這個態度引自傳單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94 張春橋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

姚文元再批《三家村》

5月8日，《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登出高炬《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和何明《擦亮眼睛，辨別真假》，點名批判三家村。

所謂「三家村」就是三個作者：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加上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都是北京市的領導。三人雖都身為高官，但都曾是文人，捨不了對文字的愛好，六十年代在《北京晚報》上開闢《三家村札記》專欄，發表了許多雜文。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登出姚文元又一篇文章：《評「三家村」》。這篇文章是江青讓姚文元寫的。⁹⁵ 曾經被陳丕顯否決過，認為發表此文會使北京市委被動。但不久，張春橋又將此文送去上海市委，要求在《文匯報》上發表。陳丕顯等覺得不妥，曹荻秋也認為文中「挖根子」之類提法太激烈，刪去了文中一些段落。張春橋堅持要發表，並通過江青將文章直接送正在上海的毛澤東。毛看後，親自將文章標題改為《評三家村》，說「文章看了，很好，題目改短一些，問一下作者有無意見。」並要上海報紙立即排版發表。上海市委只得照辦。張春橋將被上海市委刪去的段落，又加回文章。⁹⁶

張春橋後來說，《評「三家村」》是他經手的，「最後的稿子市委要去討論過的，修改的地方、增加的恰好是吳晗的觀點，我正好到北京開關於彭真的會議，沒有參加討論。」⁹⁷ 對這個過程，徐景賢文革中有個講話曾提及：

9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班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96 徐景賢 1967 年 10 月 26 日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 2006 年版。

97 張春橋 1966 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上海「紅革會」及「工總司」代表時的談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9]65年11月毛主席在上海，親自領導了文化大革命的輿論準備階段，《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主席直接關懷、江青同志親自領導、張春橋同志直接幫助的，但當時不少地方就是不發。陳丕顯槍斃了姚文元同志的《評吳晗的政治立場》一文，認為發表會使北京市委被動。

他們還把《評三家村》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正在玩弄丟卒保車、丟車保帥的把戲」，陳、曹(即陳丕顯、曹荻秋)怕得要死，堅決砍掉了。

主席在上海看了《評三家村》，將原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三家村》改為《評三家村》，並說題目要大一些，並要徵得作者同意，要作一些修改，要立即發表。這樣文章才發得出來。

但陳丕顯在醫院打電話，要把姚的名字拿掉，企圖歸功於上海市委，並對姚一直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後來張春橋同志來，戚本禹同志也來了，將姚文元同志文中的被砍掉的一段加進原文，變成五段。這篇文章在上海被陳扣了兩個月，後來才在上海修改發表。⁹⁸

《評「三家村」》發表那天，正值中國氫彈爆炸成功。那天的《文匯報》，頭版上半版刊登氫彈爆炸消息，下半版刊登姚文元的《評「三家村」》。見報的當天上午，姚文元來到辦公室，對幫他查找資料的朱永嘉等人說：「今天是個好日子，爆炸了兩顆原子彈，一顆是物質原子彈，一顆是精神原子彈。精神原子彈比物質原子彈重要。大家辛苦了」。邊說邊拿出從家裏帶來的沱茶和糖果招待大家。⁹⁹

98 徐景賢1967年10月26日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徐景賢其中提到的《評吳晗的政治立場》一文，估計應該就是《評「三家村」》一文最初的題目。

99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面對如潮水而來的批判，彭真不得不匆忙應對。4月16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面，刊登《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材料，以及《前線》、《北京日報》編者按。但彭真的努力為時已晚。《北京日報》批判三家村的當天晚上，中央通知：對北京市委批三家村的文章一律不予轉載。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問題。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被撤銷。4月19日，彭真被停職。一個月後，鄧拓自殺。一場針對以鄧拓為首的三家村的大批判旋即鋪天蓋地展開。全國各地緊緊跟上，紛紛揪自己省市的「三家村」、「四家店」。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杭州，未出席會議。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都出席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對彭真進行全面系統批判，並通過由毛澤東親自定稿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5月28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王任重、劉志堅為副組長，姚文元等為組員。會後，張春橋和姚文元離開上海，去了北京。

以批判《海瑞罷官》為開端的政治批判，就這樣上升為一場政治大革命。從上海開始的批判《海瑞罷官》的姚文元文章，就這樣拉開了文革序幕。這句話是毛澤東說的，毛澤東說，批判《海瑞罷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¹⁰⁰

小結

批判《海瑞罷官》，是毛澤東發動的又一場政治運動的前奏。和過去任何一次運動不同，這次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但是，運動的開始，卻與過去許多次運動一樣，

100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756 頁。

以批判知名知識分子為開端。雖然在最初，《海瑞罷官》批判背景沒有多少人知道，但知識分子們能從姚文元文章的武斷和殺氣，感覺來者不善。誰都害怕成為又一場批判運動的對象，害怕被劃入政治的另類名份，他們大多數只能選擇沉默，或小心謹慎地提些委婉的不同看法；一旦局勢明朗，更是無人再敢發不同之聲。

在文革的準備階段批判《海瑞罷官》中，毛澤東始終沒有對中央決策層闡明自己的意圖。因為毛的批判對象，正是除他自己而外的整個中央決策層，毛只能讓身置決策層外的妻子，成為這場批判的組織者。整個中央決策層對毛的意圖全然不知，蒙在鼓裏。毛澤東一方面瞞着北京市委和整個中央，用上海市委打北京市委，一方面又對不知就裏的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所做出的反應憤怒。毛澤東在上海發文章批判北京的副市長，卻不告訴北京市委文章是自己組織的，坐看北京市委表現。他為什麼不對彭真明說？是為了考察彭真的忠誠度？是為了等待彭真入彀？還是這樣批判北京一個市長，有違「組織原則」，他不便明說，要彭真自己體會？

使毛態度升級的因素，是彭真的一再抵制，北京的抵制讓毛憤怒，北京的表現又正入毛之彀。彭真每一個措施，都激起毛下一個更強烈行動。彭真完全不知道這場運動的第一個目標其實就是北京市委和他彭真，所以才會如此抵制。於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彭真成全了毛澤東的心願，將對吳晗的批判，演進成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引子和開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已有多時。不過，究竟如何對待劉少奇，是部分削除還是全部解除其權力，毛在發動批判《海瑞罷官》時，可能還沒有確定，一切跟着感覺走，相機而定。可以說，敲打對「大躍進」等以往運動心存腹誹的黨內外海瑞們，是毛的近期目標，清算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們，是毛的終極目標。總之，毛澤東要批判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復辟勢力代表人物。即使彭真不抵制，結果

可能以撤換幾個北京市委幹部暫告結束，但毛肯定還會尋找其他機會，再次出擊。

從張春橋和姚文元所作所為看，他倆最初也不明白毛澤東的終極目標，最多只感到目標是彭真。他們最初也只是將這次政治批判，看作是一場更大的反右運動。張春橋一再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引蛇出洞」，說明他眼光還是盯着黨內外知識分子，想釣出更多大魚。而且文章發表前，張春橋曾去北京，打電話給康生說想見面。不過後來因康生說沒時間而未能見面。據說張春橋想見康生，實際上是想摸底，看樣子他當時對毛的真實意圖，也不十分清楚。¹⁰¹

彭真的態度很矛盾。他最初似乎極力想將運動限制在學術批判範圍，但在南樓會議上，又說要釣大魚。既然是釣「大魚」，那就一定不會只在學術範圍。讓人感覺他的「學術範圍」，只是保護吳晗等一部分人的被動策略，無法面向全體知識分子。

兩個星期後，陳伯達所主持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更顯示了黨內幹部階層的共識：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來自被打倒的「階級敵人」，即革命前的經濟和政治精英；以及「自由化」的知識分子，即整個知識精英。沒有人會想到這場運動是衝着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更沒人想到運動最後是衝着自己，衝着整個幹部階層而來。張春橋後來曾經承認，「我也是這樣，那時候赫魯曉夫，我認為是指彭真，很高興，覺得主席這幾句話解決了問題。我就沒有想到是指劉少奇」。¹⁰²

整個文革準備階段，是一場信息不對稱的對決。毛自己一

101 林默涵著《「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載於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102 張春橋 1968 年 12 月 12 日在市機關小組的講話。原件由上海市檔案館收藏。

人決策，瞞着整個中央決策層，剝奪他們對文革決策信息的先知權。而不久以後，在文革的發動階段，毛澤東將進一步顛倒信息的先知權，置整個中共決策層和整個幹部階層於極端被動境地。

批判《海瑞罷官》從上海發起，這使上海市委多少有些居功思想。上海的領導幹部們以為，自己在這一次政治運動中沒有站錯隊，躲過了彭真那樣的厄運。但誰都沒有料到，這一切只是開始，這場以批判知識分子為開端的運動，將是一次更大的政治分層，尤其以各級領導幹部為對象。而且，不久進入文革決策層的張春橋、姚文元，不但沒有使上海市委避免厄運，為上海市委解圍，相反卻起了負面的推動作用。

第二章

鬥鬼風

被轉移了的文革方向

上海批判八個專家學者

上海市委收到中央發來《五·一六通知》正式文本，是在1966年5月21日。5月27日至30日，上海市委召開三屆六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傳達《五·一六通知》。

從6月起，形勢發展變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高調激越的批判宣佈了文革的開端。「牛鬼蛇神」一名典出佛經，原指下界陰魂鬼卒、牛頭馬面。文革前，毛澤東曾多次在講話和批示中以牛鬼蛇神一詞，指代他所認為的反動勢力；這篇社論更是使之成為文革中被打倒對象——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地富反壞右)，以及叛徒、特務、走資派的專用詞和總稱。當晚，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緊接着，自6月1日起，近十天內，《人民日報》每天都發表驚心動魄的社論和消息。這些文章和消息，篇篇都是重磅炸彈，震撼全國。全國和上海的各學校、機關、工廠、農村生產隊紛紛舉行集會，歡呼和聲援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們。一場席捲全國的群眾運動就此開始。

6月2日，市委書記處開會，會上成立了上海的「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張春橋，市委分管宣傳的書記；副組長楊西光，市委分管教育和衛生的候補書記；組員為：市委宣傳部長楊永

直、市委教育衛生部長常溪萍、市文化局長孟波、市委辦公廳秘書長李家奇、《解放日報》總編馬達、《解放日報》編委姚文元、為市委起草文件的市委辦公廳一室主任吳雲溥、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會上，張春橋傳達江青的話：「外地對大字報的底細不明，你們上海知道了大字報的底細，你們怎麼搞？」張春橋又說，「要放手發動群眾，要讓孫悟空大鬧天宮，不准設置障礙。我們相信群眾是要革命的，絕大多數群眾是革命的」。¹但曹荻秋和主管教育的書記楊西光，還是強調要「加強領導」，「掌握政策」，「內部材料要控制」，「大字報不提倡，不反對」，「學生不搞遊行」，「內部材料要控制」；並決定全市各部門建立文化革命小組。²6月10日，在地處陝西南路的文化廣場，市委召開萬人大會，對象是全市十七級以上幹部，包括基層黨支部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被檢查出鼻咽癌，正在病休，上海工作暫由上海市長、上海市委書記曹荻秋主持。曹荻秋代表市委講話，他在講話中，列出了上海地區的批判對象：

著名音樂家、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著名京劇演員、京劇《海瑞上疏》的海瑞飾演者、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著名文化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總編輯李俊民，著名電影劇作家、理論家、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著名歷史學家、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著名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李平心，著名經學史家、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周予同，著名作家、評論家王西彥。八個批判對象，除了周谷城，其餘七個人，4月中旬市委就已經決定在報刊上批判；³其中

1 張春橋的話轉引自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印的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2 同上。

3 據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印的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中說：「1966年4月15日」，陳丕顯在醫院中召集曹荻秋、楊西光等人，研究決定在全市報刊上批判李平

瞿白音、周谷城、周予同等，之前已被報紙公開點名或不點名批判；李平心、李俊民，是在討論《海瑞罷官》時被「釣魚」釣出來的。這八人都是有聲望的黨內外學術權威和文化人，其中賀綠汀、瞿白音和李俊民，雖然是領導幹部，但更是共產黨內的知識分子。被點名的還有陳其五，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宣傳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因「利用竊據的領導職位，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動方針」，⁴ 之前的1965年已被開除中共黨籍，調到江蘇農學院任教務處副處長。這八個批判對象，上海市委在4、5月間便已確定。顯示了上海市委領導幹部們的共識：文革是又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批判名單中加上陳其五，也算是有一個曾經的市級幹部。此時，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結束，《五·一六通知》草案剛通過，上海市委顯然是以這個行動，表明對毛澤東決策的緊跟。

曹荻秋在講話中要求各級幹部放手發動群眾，用大字報形式參加文革；曹荻秋還提出，要警惕階級敵人搞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現在已經發現有這種情況」：

對於階級敵人在這次運動中，搞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必須提高警惕。現在已發現有這種情況。對於那些隱藏着的牛鬼蛇神從地下冒出來，張貼反動的大字報，我們的態度是，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也就是說，當着他們貼出反動的大字報的時候，正好暴露了他們的反動面目，便於我們發動群眾展開反擊，打退他們的猖狂進攻。廣大群眾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擁護社會主義的，一小撮牛鬼蛇

心、賀綠汀、瞿白音、王西彥、周予同、周信芳、李俊民等七個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4 引自曹荻秋1966年6月10日在全市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編的內部刊物《黨的工作》1966年第26期。

神想乘機搗亂，是不可怕的；相反，可以使我們撕下這些牛鬼蛇神平時偽裝的假面具，把壞事變成好事。⁵

第二天，6月11日，曹荻秋講話的精神被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社論原來的題目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上海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市委常委討論時，張春橋嫌太長，改為《徹底揭露，徹底批判，徹底打倒》。⁶

從上海市委拋出的九個批判對象，以及曹荻秋代表市委所作的講話，可看出上海市委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市委所認為的「牛鬼蛇神」，顯然與1957年的右派一致，而且市委還佈置對在運動中「想乘機搗亂者」展開反擊。據後來的一份傳單說，6月4日，曹荻秋曾讓市委副秘書長查閱1957年全國劃右派的數字和比例。曹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出一大批右派，比五七年更多。」「接着，在一系列會議上一再佈置排左、中、右隊伍，以抓右派為名殘酷鎮壓無產階級革命派。」⁷

批判「牛鬼蛇神」高潮

《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聶元梓大字報發表後，上海各單位大字報迅即鋪天蓋地，形成第一次大字報高潮。各單位黨委拋出本單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按市委對上海文革設想：先發動群眾貼大字報，從揭發出的問題中，確定重點批判對象，然後根據群眾提出的問題，進行黨內整改，幾個月結束運動。這實際就是「四清」模式。

5 曹荻秋 1966 年 6 月 10 日在全市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6 馬達著《辦報生涯 60 年》第 44 頁，文匯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7 傳單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印的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大字報被貼對象都是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的革命對象或邊緣分子。也有針對黨委的：6月3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11名學生貼黨委副書記姚力的大字報，這是文革中華師大第一張針對黨委的大字報，也是上海高校第一張針對校黨委的大字報。接着，上海科技大學無線電系和數學系的學生以及部分教師，也貼出質疑校黨委和市科委的大字報。⁸而在工廠和基層單位，6月11日，國營第三十棉紡織廠技術員王秀珍帶頭貼廠黨委大字報，6月12日，國營第十七棉紡織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帶頭貼副廠長大字報。貼黨委大字報較早的還有上海玻璃機械廠的青年工人潘國平。王洪文、王秀珍、潘國平，後來都成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

6月10日市委動員大會後，形成第二次高潮大字報。在此之前的大字報，大多是學校師生或單位職工自發寫的。市委動員大會後，各級黨委立即討論，圈定出本單位的運動對象，組織群眾寫大字報，以加強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這是文革初期第一次大規模政治分層，由各級黨委研究後，拋出他們所認為的運動對象，發動群眾批判。一些單位動員：「上下左右都可揭」，「黨內黨外一起揭」；還有的單位提出「橫掃」、「縱掃」、「直掃」一起上。⁹那些稍有名望的專家、學者，紛紛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拋出，文化人和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宣傳系統：媒體、出版、演藝等，以及大專院校，更是首當其衝。許多人或因為「出身不好」，或因為「政治歷史複雜」，或因為「社會關係複雜」，甚至因為是業務拔尖的學科帶頭人，被黨委作為「黑幫」、「學術權威」拋出。而在工廠，一

8 引自王蔚蓮著《文革期間的上海紅衛兵運動》，載於《當代上海黨史文庫 崢嶸歲月》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2年出版。

9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37頁，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這本史話的資料基本來源於文革中上海市委、市革委會、市總工會等機關的簡報或內刊，以及文革結束後對上海「四人幫餘黨」的清查檔案。

些技術人員和資方人員，也被黨委拋出，成為大字報對象。

復旦大學的周予同教授，是市委在4月中旬便已決定要批判的對象之一。市委6月3日常委會議決定公開點名之前，校黨委發動全校師生貼大字報。全校6月3日至6月4日，兩天共貼出大字報八千多張。6月3日市委常委會上，決定公開點名者中還有周谷城，於是復旦黨委又推出周谷城教授，於6月5日至6月10日動員師生集中聲討周谷城。此外，復旦黨委還學着上海市委批判「黑幫」，也湊了「反動學術權威」，加上市委點名的歷史系二周，共10人，作為重點黑幫。與此同時，每個系起碼有一個以上「反動學術權威」，都是復旦校黨委拋出的。揭發的所謂問題，除了被批判者平時在學生中的言論外，許多是系黨總支透露給學生的「歷史問題」。¹⁰ 復旦校黨委在5月底6月初，內部排名單，上名單的有207人，這些人被分成四檔：第一檔是黨內外「黑幫分子」，必須徹底打倒；第二檔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者」，需要在「適當場合」批判；第三檔是「有錯誤的」，需要在「小範圍內」批評檢討；第四檔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需要「掃一掃」。這個已經形成書面文字的內定名單，後來被造反派在搶「黑材料」時查抄出並公佈於眾。¹¹ 據說，光是物理系，就「審查了307名黨政幹部、教職員工材料。事後學校黨政幹部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¹² 這是歷次政治運動的程序：排左、中、右名單，或排積極分子、運動批判對象名單，等等。都是給對象劃分政治等級。

被橫掃的不只是知識分子們。市委多次提出：「每個單位可以有二三人重點批判外，有些資產階級思想的人也要批

10 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復旦大學《過河卒》戰鬥小組 1966年9月8日。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11 這個名單的情況，是文革前復旦大學歷史系黨總支書記余子道 2010年9月14日告訴筆者的，他也在這個名單之中，被分入第四檔。

12 復旦大學「史紅」戰鬥組 1968年7月編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判」，「大是大非可以貼，小事小非也可以貼」。¹³ 於是，普通群眾、黨員和科室人員，也被貼大字報，據市委辦公廳後來統計：「許多單位被貼大字報人數佔總人數的30%至80%」。¹⁴ 沒有「學術權威」的中小學、醫院、工廠等單位，矮子裏拔長子，業務和技術骨幹也成為批判對象。

不過，從另一些材料看，主持工作的曹荻秋比較謹慎，要求嚴格掌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尺度。6月10日，曹荻秋在對全市十七級以上幹部講話時說：「在黨內外，有些人基本上擁護社會主義，但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寫過一些不好的作品，對於這些人，要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嚴格區別開來。」市委還規定，各單位重點批判對象，必須事先報有關領導機關審批，凡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必須經市委批准，等等。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高潮的6月15日，曹荻秋在市委統戰部一份請示報告上批示：「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般在歷史上都有不同程度問題，因此，他們的材料應嚴加控制，不能隨便給要材料的單位。如果算歷史賬，許多人都可能成為重點鬥爭對象，這樣，打擊面可能太寬。」而在批判八個著名人士時，曹荻秋始終不肯撤去賀綠汀的上海音樂學院院長之職。¹⁵ 曹荻秋後來承認，他對大字報有顧慮：

我們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導積極鼓勵革命群眾貼大字報，而是害怕大字報，對貼大字報加上種種限制。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前，我們曾說過，群眾貼大字報，既不反對，又不提倡。六月一日北大聶元梓等七名同志的大字報發表以後，上海革命的大字報，有如熊熊烈火，燃燒在每個角落，發

13 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印的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14 同上。

15 同上。

揮着強大的威力，有的大字報已經貼到了街上。這時，我們憂心忡忡，怕打亂了所謂「正常秩序」，因此，在說可以貼大字報的同時，對大字報又加了許多限制。如說可以貼小字報；大字報不要貼到街上去；大字報要內外有別。並要各單位建立審查大字報的委員會等等。這些都是不相信群眾，束縛群眾手腳，限制和害怕群眾起來革命的錯誤說法和錯誤行為，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¹⁶

7月上旬，劉少奇去杭州，路過上海，曹荻秋陪同去車站，劉少奇問上海亂不亂，群眾聽不聽市委話，貼不貼市委大字報，曹荻秋一一匯報，告之還沒有發現群眾貼市委大字報。劉少奇說：「說明上海很穩定，你們市委的威信高，群眾聽市委的話，這很好」。¹⁷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6月3日以後，北京向大中學校派工作隊。6月10日，在文化廣場召開的上海17級以上幹部萬人大會上，曹荻秋宣佈，「市委已經決定組織文化大革命工作隊，派到必要的單位去開展工作。對於凡是領導權已經不在無產階級手裏的單位，要首先派工作隊去領導開展文化大革命，把領導權奪回來……市委各部委、各區委、縣委都要抽調一批幹部，作為機動力量，必要時組成工作隊，到需要奪權的單位去領導文化大革命，開展奪權鬥爭」。

16 曹荻秋《我的檢查》，1967年3月12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7 《曹荻秋的假檢討》，載於《上海黨內頭號走資派陳丕顯、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檢討》，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大會印，1967年7月。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上海市委對上海29所大學派出6個工作組；對全市489所中學派出168個工作隊；在文化和科研機構，也派出工作隊；¹⁸ 未派工作組的單位派出聯絡員。最先被派工作隊的是同濟大學，6月10日市委工作隊進駐。但是，工作隊派出不久，就與派駐單位的群眾關係越來越緊張。在北京，工作隊將持異見學生視作反工作隊反黨，圍攻批判，遊鬥關押。北京甚至發生被鬥學生自殺事件。上海也發生圍攻事件。復旦、同濟、交大等大學的一些學生，貼出針對學校黨委大字報後，遭到擁護黨委的學生圍攻。¹⁹ 雖然上海情況要溫和許多，但貼黨委或工作隊大字報者，同樣感到巨大壓力。

例如6月3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11個學生貼出批評校黨委書記姚力的大字報後，立即受到校黨委組織的大字報反擊圍攻，黨委不但「整理他們的黑材料」，還說這些學生想「一鳴驚人，當第二個聶元梓」。同日在同濟大學，貼黨委大字報的學生也受到圍攻，「他們操縱一些人狂叫保衛校黨委，擁護校黨委，甚至向革命學生遊行示威，非法綁架革命同學。」華師大的大字報貼出不到兩小時，便被眾多的反擊大字報批得沒了聲音。6月中旬，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魏文伯親自去華師大，要校黨委總結「6.3」經驗，打算向華東各省推廣。²⁰ 在復旦大學，6月20日，化學系三年級一個學生貼出質疑校黨委運動方向的大字報，不到半天，整個校園貼滿反駁大字報，說那張大字報是「反革命的戰略號召」，說校黨委「是絕對正確的，對校黨委的任何懷疑都是反動的、反革命的」。²¹ 6月19日，

18 這幾個數字引自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

19 《大動蕩的年代》P36，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出版。

20 傳單《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紀念毛主席親自批准發表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一周年》，上海文化革命資料聯合編輯部 1967 年 6 月，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21 復旦大學「過河卒」戰鬥小組 1966 年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二)》。

哲學系一年級「孫悟空」小組胡守鈞，將北京傳來的「北京林學院與北京新市委許克敏講話紀要」抄出貼在校園。校黨委立即發出通知，說這個講話紀要是「反革命綱領」，「否定黨的領導」，示意胡守鈞貼這張大字報是「反黨行動」。²² 8月1日，復旦大學外文系三年級學生孫月珠、勞元一等，貼出大字報《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校黨委書記王零看後對人說：「過去左派不發言，現在你們可以發言了，你們太不敏感了，現在這個情況下，至少可以寫它二十個題目。」勞、孫等被說成是「否定黨的領導」，遭到大字報圍攻。²³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許多工廠和單位，以後成為工人造反派骨幹的潘國平、黃金海、徐美英等，都因為給黨支部或工作隊貼大字報，被說成是反黨，或被批判或被圍攻；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青年工人謝鵬飛等人，更遭到工廠黨支部組織的毒打和關押；南市區文建中學教師陳進坤因為貼大字報，甚至被南市區公安分局關押23天，關押期間被毒打。²⁴

許多單位還按照「反右」思維，暗中將給黨組織提意見者分類。復旦大學校團委、學生會和保衛科，7月中旬按校黨委的佈置，各自都曾經對所屬學生幹部進行分類，第五類是「活躍分子，也即需要密切關注嚴控者」。²⁵ 按歷次政治運動的慣例，被列入名單者運動後期大都會遭到清算，被安上各種政治名份，影響終身。這是學生們最怕最擔心的。這就是後來被批判的五十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簡稱「資反路線」）。各單位領

22 復旦大學「史紅」戰鬥組 1968 年 7 月編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23 復旦大學「過河卒」戰鬥小組 1966 年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二)》。

24 《控訴劉鄧路線對教工進行慘無人道的政治大迫害》，載於《工人造反報》1967 年 1 月 25 日。

25 復旦大學「史紅」戰鬥組 1968 年 7 月編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導，以反右鬥爭思維模式對待向自己提意見的群眾，造成文革初期大量衝突。這五十天中，因對本單位黨組織或工作組評價不同，產生了最初的多數派、少數派，發展到後來的保守派、造反派。長期以來，因各種原因積累的人際矛盾和對黨委或工作隊的不同評價，以響應毛主席號召投入運動為話語外殼，構成文革初期運動發展的主要線索。

與此同時，學生中的暴力現象也開始出現。從6月下旬起，上海一部分中等學校，出現起哄、圍鬥、打人、罰跪、戴高帽子等情況。據當月統計，全市中學出現這類現象學校的比例達40%；許多中學教師受到凌辱，甚至小學也有發生。²⁶ 給被革命對象戴高帽子的行為，可以追溯到1924年至1927年共產黨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毛澤東曾經撰文高度評價。但作為革命行為的推廣，是1966年在全國上映的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電影，其中有給「土豪劣紳」戴高帽子的場面；文革前夕群眾性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毛澤東當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被學習最多的文章之一，毛澤東對於給土豪劣紳戴高帽和遊街，有着詳盡的描寫和高度的讚揚：「好得很！」這些，都為文革初期的批鬥提供了最具象的榜樣和導向。

市委向全市派工作組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學生在工作組不在場時，將四十多名教授和校領導揪上「鬥鬼台」，掛牌子，抹黑臉，戴高帽，坐噴氣式，還對女性有侮辱行為。工作組聞訊立即前往制止，並寫成匯報材料。材料由劉少奇批轉，以9號簡報發向全國：「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

26 以上數字引自中共上海黨史研究室2004年編纂《中共上海歷史實錄》。

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²⁷ 上海在6月下旬，收到中共中央轉批的9號簡報；6月28日，市委佈置全市各大專院校，宣讀劉少奇的這個批示，以圖制止上海各學校已經出現和正在蔓延的人身侮辱現象。

劉少奇批發的9號簡報，將學生離開工作組自行其是的行為，定為「壞人有意搗亂，還很有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儘管沒有說是反革命事件。正在武漢的毛澤東得知後，說為什麼群眾離開工作組就是反革命？毛澤東讓江青往北京打電話，要中央文革到有工作組的單位去支持群眾反對工作組。說北大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²⁸ 6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撤除工作組決定。毛澤東說：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的。²⁹ 7月18日，毛澤東自上海回北京，張春橋將劉少奇轉發的9號簡報交毛。毛看後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³⁰ 毛幾次對江青等人說，不要讓原來的黨政機構控制運動，就是不願讓幹部掌握運動話語權，但話語權實際還是牢牢掌握在各級黨委領導手裏。從7月22日起，毛澤東四次派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前往北京大學與學生和教師見面，轉達毛澤東對反工作組行動的支持，一再表示北大「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澤東將過去一貫由黨委和工作組掌握的評判革命的標尺，直接交給群眾，這使一直處在秋後算賬達摩克利特劍威懾之下的學生，有種獲得解放之感。

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北京各群眾集會上的發言，迅速傳到上海。北京師生將這些「中央首長講

27 王年一 1988 年著《大動盪的年代》。

28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608 頁，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29 王年一 1988 年著《大動盪的年代》第 47 頁。

30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608、714 頁。

話」抄寫後，寄給他們在上海的同學朋友親戚，在上海造成巨大影響，越來越多的學生和工廠工人，與黨委或工作組發生衝突。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根據毛澤東意見，宣佈撤銷派往大中學校工作組。上海市委遵照中央通知，於8月5日召開全市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萬人代表大會，各系統十七級以上幹部和大中學校師生代表參加。會上，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教育的書記處候補書記楊西光，代表市委宣佈撤走上海大中學校的工作隊。大會的另一個內容是播放7月29日北京大會中央負責人講話錄音。大會後，又在全上海大中學校和機關，組織收聽北京大會錄音，包括江青講話錄音。就這樣，中央撤銷工作組意見一竿子到底，讓幹部與師生迅速直接地知曉。

派駐工廠的工作隊，撤出時間稍滯後些。因為上海的工廠文革，同文革之前的「四清」一起進行，此時四清運動尚未結束，所以工作隊還留在工廠。

鬥鬼風蔓延上海高校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第八屆十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陳丕顯因病未能出席會議，曹荻秋參加預備會，列席全會。會議焦點之一就是北京大學6.18鬥鬼事件。8月2日，曹荻秋打電話回上海，向陳丕顯匯報全會情況。8月3日，陳丕顯與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一起召集上海各大學黨委領導，傳達毛澤東對北大6.18鬥鬼事件的支持態度。本來，從6月下旬起，上海有些中等學校，已經開始出現凌辱批鬥對象情況。市委已經正在按照劉少奇對《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的批示制止蔓延。但此時市委只能表示，群眾如果再要起來批鬥牛鬼蛇神，不要積極支持，但也不要再阻攔。

在此之前，為了表示對運動積極投入，各大學黨委已經研究討論出一批本校的批判名單，這批「牛鬼蛇神」按歷次政治運動慣例，一般都有「政治歷史問題」。毛澤東對北大「鬥鬼」行為肯定，一些大學黨委便將這些本來就打算拋出的名單，透露給了給學生。「鬥鬼風」旋即在上海各大專院校蔓延。

最先開展鬥鬼的，是華東師範大學。從6月開始，華師大新成立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根據歷次政治運動習慣，陸續向市委教衛部、組織部等有關單位，上報十八名黨政幹部和教師「反黨反社會主義綜合材料」和「反動觀點」，以及初步批判打算。各個系或部門也相應進行政治排隊。7月4日，華師大黨委文革領導小組向市委教衛部上報一批擬重點批判和一般批判的對象名單，由黨委引導的大批判在校園展開。

8月2日，歷史系重點批鬥黨員主任吳澤教授。吳教授在四清中就被批鬥，文革一來，又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繼續挨鬥。吳教授不服，校「中心戰鬥組」便貼出大字報，呼籲用各種形式聲討吳教授的反革命囂張氣焰。隨即，其他系的一些學生，貼出大字報響應，說應該給吳教授戴上高帽子。8月4日上午大字報貼出，下午歷史系便在系飯廳召開批鬥大會。批判會很快失控，四五百個學生湧進會場，強迫吳教授戴上紙糊高帽，吳教授被強迫敲着畚箕，身上貼着「我是牛鬼蛇神」紙條，由幾百個學生簇擁着，遊鬥到學校共青場。見歷史系行動，其他各系學生也馬上動員，紛紛給本系「牛鬼蛇神」戴高帽，往臉上和身上塗黑墨水，以示他們是黑幫，也強迫他們敲着畚箕，拉到學校大操場領操台上跪下挨鬥。領操台和領操台兩側，跪滿批鬥對象。校黨委副書記到現場表示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並要求各系將這些「牛鬼蛇神」拉回去有重點地逐個批判。於是有些系或部門，認為白天批鬥得不夠，當晚和第二天繼續「補課」。據統計：這一天，華師大全校被揪鬥者共194人，佔全校教職員工的11%；其中，正副教授63人，黨政

幹部39人。這次行動結果是一人不堪凌辱折磨而死，一對夫妻縊死，二人自殺獲救。³¹

華師大的「鬥鬼」行動，對全市各高校起了示範作用，消息傳出，上海各大學紛紛仿效。第二天，8月5日，復旦大學也颳起鬥鬼風，不同的是華師大集中鬥，復旦分散鬥，而且連鬥四天，從8月5日直鬥到8日。學校所有乒乓桌都被抬到室外，搭成鬥鬼台。第一個被鬥者，是經濟系蕭純錦教授，他擔任過國民政府江西省教育廳長，學校黨委原來就打算批判他。同時還有49名學者與幹部，也被戴高帽抹黑臉；經濟系教師吳若丹，當天就被鬥死。下一天，8月6日，各系普遍批鬥，歷史系周谷城教授首當其衝，和譚其驤教授一起挨鬥，被戴高帽，整瓶黑墨水倒在身上，還被迫脫鞋在校園遊街。著名數學教授蘇步青，被強壓着跪在乒乓桌上，高舉打倒自己的牌子。除了「反動學術權威」，一些青年教師也被鬥。8月7日晚，江青等講話錄音在全校播放後，數學系馬上批鬥本系講師葉某等人。化學系七十多歲的趙丹若教授，被學生扣住不讓回家，第二天早晨又被罰跪、挨揍、戴高帽、抹黑臉，鬥完後遊街。學生們用草繩捆住趙丹若教授，從台上往下拉，趙教授被鬥得疲憊不堪，當場跌暈厥，送往醫院已經氣絕。生物系學生批鬥談家楨教授，談的夫人傅曼雲在學校托兒所工作，托兒所沒有學術權威，就批鬥傅。8月天熱衣單，傅的短袖襯衫被扯脫撕掉，胸罩也被故意扯開，以致傅上身半裸。傅不堪凌辱，回家就自殺。

8月8日上午，復旦鬥鬼風剛剛稍有平息，上海財經學院學生也開始批鬥教授和幹部。幾個學生上主席台點名，給一批學校幹部和教授戴高帽子。各系學生紛紛仿效，臨時做起高帽子。來不及做，就以廢紙簍、鉛桶、痰盂代替。還將這些被批

31 這些數字引自《華東師範大學校史》，袁運開、王鐵仙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及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3頁。

鬥者「牽」往操場，逼他們跪下，捆綁、毆打、頂磚頭、揪耳朵，逼他們在地上爬。據統計，當時被戴高帽者95人，佔全校教職工總數的19%。

8月9日上午，同濟大學建築系學生，遊鬥黨委書記、副校長和學術權威李國豪等十五人，黨委書記身上被貼「反黨反社會主義」紙條，強迫戴上西瓜皮、土簸箕、廢紙簍；一百多個「牛鬼蛇神」被戴上高帽子遊街。³²

8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學批鬥15人，其中13人被戴高帽子。8月11日傍晚，上海體育學院揪鬥22名教師和2名職工，其中正副教授10人，是該校教授的60%。學生們對他們拳打腳踢，並在食堂前面的大草坪上疊起桌子，強迫他們跪在上面示眾，還強迫他們在地上爬着，從板凳下鑽過，一直折磨到深夜。同日，上海外語學院八十多人被揪鬥，除了澆墨汁，糊紙條，還被逼迫在煤屑跑道上爬行。8月12日和13日，上海第一醫學院揪鬥123人，之後又對他們進行抄家。8月15日，上海科技大學遊鬥26人，並將其中部分人關入「牛棚」。所謂「牛棚」，即單位自行關押或監禁「牛鬼蛇神」之處。8月25日上午，上海鐵道學院運輸62(1)班學生，在第一教學樓前空地，焚燒圖書館書籍，並在火堆前下風口，擺上桌椅，將12名學校幹部拉到火場，強迫他們站在桌椅上，遭受煙熏火烤。³³

鬥鬼風在上海高校一個學校挨一個學校地轉了一圈，就像接力賽。但鬥鬼風也遭到一些學生質疑，認為這是轉移鬥爭大方向。復旦校園內的「南京路」上，當天出現大字報《鬥鬼風從何而來？》，斷定「這場鬥鬼風完全是預謀的，目的是為了轉移鬥爭大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從中央精神移開」。復旦校

32 傳單《同濟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同濟大學路橋系「部分革命教師」潘洪萱、王午生、沈慶均……易建國 1966 年 9 月 16 日。

33 以上關於上海高校的鬥鬼風資料與數據部，除注明出處的，全部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三章。

黨委連忙讓人出面說明：「鬥鬼是群眾自發的要求」，校黨委書記王零在全校大會上，提出對牛鬼蛇神應該如何鬥爭更為有利，又被一些學生指為推卸責任，轉移目標。³⁴

而在市委，陳丕顯和曹荻秋反對鬥鬼風中侮辱、折磨和毆打批判對象，雖不敢堅決制止，但還是試圖緩和。據市委書記馬天水後來造反時的揭發：

去年8月初，各大專院校革命群眾剛起來，有的單位戴了些高帽子，他(指陳丕顯—筆者注)就怕得要死，直接佈置書記、常委、副市長每人聯繫一個大學。他講：「學生看到你們去了，就不敢亂搞了」。而且他對誰聯繫哪個學校的名單都要去親自進行審查。³⁵

鬥鬼風高潮時，造反派群體尚未形成，那將是1966年9月中旬以後的事。所以，鬥鬼風中的積極分子，並非人們通常認為和指責的造反派們；事實上，他們大多不久後成為保守派。在復旦大學，「鬥鬼」積極分子，後來很多都是保守派群眾組織「紅衛兵大隊部」成員。他們大多出身幹部或工農家庭，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以及出身的優越感，使他們對那些「牛鬼蛇神」們毫無憐憫之心；為了最大程度地表現自己的革命性，他們出手特別狠。而保守派後來不同於造反派的批判指向，也在鬥鬼風這場文革最初的批判中充分展現。還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為了表現自己對黨的忠誠和革命的堅定性，也對「牛鬼蛇神」下狠手。復旦大學第一個往「黑幫」身上倒墨水的，就是一位父親是工程師的女學生，當時這算出身職員家

34 《復旦往事》，吳中傑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文中的×××是原文。

35 馬天水1967年3月23日在《我的揭發》，載於《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專刊，《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聯合版。

庭。³⁶而在許多學校，職員出身的學生打老師也不在少數。

市委每一次開會議題，總是離不了下面越來越亂的局面，市委希望遏止這股風，但有毛澤東對北大事件的表態，根本不敢放手佈置各校黨委出面制止。這股風的目標，很快隨着越來越升級的文革，颳向各級黨委；各校黨委和行政領導，不久都成為學生的目標，自身難保，更加無法制止混亂局面。

鬥鬼風迅速從高校向中學和基層單位蔓延，而且伴隨着數十天後紅衛兵運動的興起，更演化為一場大規模的紅色恐怖。據當時另一份統計，上海1966年6月1日至9月30日，各區中學、財貿、工交、地區系統，「被打和較嚴重體罰的人數為6665人」，其中6月至8月(3個月)，為1037人，9月(1個月)，為5616人。³⁷

鬥鬼風是上海文革中第一次暴力高潮，這個暴力高潮，與接踵而至的紅衛兵運動相連接，開創了上海1949年後非正常死亡高峰。據市委辦公廳《文化大革命動態》第841期記載，9月份不完全統計：704起自殺事件中死亡354人。其中：被抄家後自殺446人；因掛牌、遊街、剃陰陽頭等不堪凌辱自殺169人；被貼大字報後思想緊張自殺18人。³⁸

1966年8月22日，正是「紅色恐怖」走向高潮之時，曹荻秋呼籲不要擴大打擊面：

前一階段，許多學校都鬥爭了牛鬼蛇神，我在北京開會時就聽到許多學校鬥爭牛鬼蛇神了。現在看來，絕大多數是

36 這是她1987年自己對筆者談起的。

37 上海市委辦公廳載於《各區中學、財貿、工交、地區系統從六月一日以來打人和較嚴重的體罰情況》，載於1966年10月1日第818號《文化大革命動態》；轉引自金大陸《北京紅衛兵在上海》(上)載於上海歷史研究所2008年第3期《史林》。

38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8頁。

鬥得對鬥得準的。長了革命群眾的志氣，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只是在方法上有些缺點，有的在方法上不符合文鬥。少數人屬於一般性質的問題，但還不是屬於牛鬼蛇神的也被鬥了，這是在運動中難免的，但大家要注意，如果不應鬥的被鬥了就會擴大打擊面。把打擊面搞寬了就不利於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³⁹

曹荻秋的這番話，顯示上海市委對鬥鬼風的無奈，既非常不贊成，又不敢反對。

小結

聶元梓大字報批判北京市委，一個月後撤消工作隊，十七年形成的上級和黨委領導一貫正確的權威接連解構。兩次解構的間隔時間如此之短，給久被黨委話語權威壓抑的底層群眾以巨大的興奮和解放感，甚至還有對新變化的期待感。而各級幹部則感到迷茫困惑和不知所措。

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共產黨執政十七年以來，媒體第一次公開刊登文章，自下而上批判中共高級幹部，而且是批判首都北京高級幹部。在此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自上而下的批判，不經允許，不能公開批評黨的領導，尤其是高層領導；底層的群眾，只能跟着黨的決策，聲討和批判既定的對象。大字報造成的影響是震撼性的。聶元梓的大字報與毛澤東的目標一致，不只因為對着北京市委，更因為是下級對上級的公開的反抗。這應該就是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稱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原由。聶元梓大

39 傳單《曹荻秋 1966 年 8 月 22 日晚在江灣虹口體育場上海市高等院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物理系黃永仁整理，新師大東方紅戰鬥兵團 1966 年 12 月 6 日翻印。

字報的核心，就是反對黨委對運動的「加強領導」及「堅守崗位」。⁴⁰

但毛澤東的這個意圖，沒有被各級黨委領會。文革以批判《海瑞罷官》為鏢入點，最初目標對着吳晗、鄧拓、廖沫沙，雖然都是北京市的領導，但也都是黨內外著名文化人士。而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也起着導向作用，令各級幹部階層感覺，這場運動如「反右」一樣，是對知識分子的又一次政治分層。這是黨內共識，運動初期，幾乎所有黨組織，都拋出本地區、本系統、本單位的黨內或黨外的「反動學術權威」，他們大多數是知識精英；也有黨內的幹部被拋出，但大多是共產黨內的弱勢群體：知識分子或原來的中共地下黨成員，即那些曾經在國民政府時期單獨作戰的地下黨員。各級幹部毫不手軟地拋出他們，以顯示自己對中央決策層的緊跟。這也是出於對自己既有身份的本能保護：與以往一樣，每一次政治運動，不但是對運動對象們的又一次政治分層，也是對運動領導者們的又一次政治分層。執行不力者，有可能與運動對象一樣，成為批判對象，輕則被調離或降職，重則失去幹部身份。

文革的批判對象，經歷過幾次轉換。對「牛鬼蛇神」、「黑幫」、「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是文革對政治名份的第一次劃分，劃分權仍在各級黨委手裏，自上而下。各級黨委選擇和拋出他們所認為的運動對象，發動群眾批判。

同樣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北京資反路線主要對着學生，圍攻與黨委或工作組持不同意見的學生；而上海，雖然圍攻不同意見學生的事件也有發生，但大多不是非常嚴重。這應該源於上海運動相對於北京的時間差：在毛澤東已經對9號文件表示憤怒之後，上海市委不敢再對學生過多管束。不過在工廠，對於已經是成年人的工廠工人，還是沿用了過去政治運

40 這是《人民日報》1966年6月2日社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中提出的。

動的模式。所以上海的資反路線更多發生在工廠。不過，無論學校還是工廠，政治排隊都依然存在，這是最為群眾痛恨和詬病的。許多學生和工人，給黨委貼的最初的大字報內容，就是批判黨委拋檔案，背地給群眾進行政治排隊，以圖「秋後算賬」。這是催生上海造反派隊伍形成的重要因素。

北京揪鬥「牛鬼蛇神」，許多是黨委或工作隊控制外行為；由於毛澤東對「9號文件」的震怒，在上海，則成為黨委或工作隊有意或暗示引導的結果。不久以後，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這場對於知識分子的摧殘，卻沒有被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革中被平反者，大都是造黨委或工作隊反而遭壓制圍攻的學生或工人；即使有些知識分子後來被解除批判，但他們沒有像被批判過的學生和工人那樣，得到公開道歉或平反。對知識分子的批判，持續貫穿了十年文革的始終。

第三章

紅八月 十七年階級鬥爭的延續

第一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

上海市委始料不及的是，鬥鬼風只是動亂的開端，更大的動亂還在後面。

1966年的6月初，一個不受黨團和學生會控制的青少年組織在北京橫空出世。他們接連貼出《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系列大字報，喊出後來風行了整整十年的文革口號——「造反」。他們與壓制自己組織的學校黨支部或工作隊辯論，7月28日，江青將他們的大字報送毛澤東。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給他們的回信，信中說：「我們支持你們」。這個組織就是不久將震驚中國和全世界的紅衛兵。這個組織只接受紅五類子女，因為他們具有先天的話語權和政治正確性。不過，即使在紅五類的子女中也存在着先天的等級：幹部子女比普通工農子女有着更大的話語權和優越性；而高級幹部子女比普通幹部子女又有着先天的優勢。說是紅五類子女，實際核心和靈魂是幹部子女尤其是高幹子女。所以北京最初的紅衛兵組織，價值取向和鬥爭方向，基本取決於核心層的高幹子女，工農子女只是點綴。

北京的消息很快傳到上海，上海許多大、中學校的學生也摩拳擦掌，準備成立紅衛兵組織。幾天後，8月18日，毛澤東又

以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的方式，公開表達自己對這個體制外青少年組織的支持。紅衛兵運動迅即在北京興起。

上海各校學生也要求馬上成立紅衛兵組織。此時上海的學生，還是希望在各級黨委的許可下成立組織。但上海市委很謹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當天上午，市委書記處開會，討論上海是否開會慶祝。曹荻秋「竭力反對，後被迫同意開，又說，不講話，隊伍走過就算了。」最後還是陳丕顯決定，曹荻秋和華東局書記魏文伯都要到會講話。¹ 第二天，上海組織了慶祝遊行。會上，復旦大學「紅衛兵戰鬥小組」的代表報告8月18日在北京見到毛主席的情景，上海師範學院附中學生向大會提出在全市建立紅衛兵縱隊的倡議。但對於這種體制外組織形式，曹荻秋小心地表示：「組織紅衛兵的問題還要考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沒有講」。學生要在報上刊登建立上海紅衛兵組織的倡議，曹荻秋沒答應。8月22日晚，市委在江灣體育場及虹口體育場召開上海市高等院校師生員工大會，會上又有學生要求建立紅衛兵，曹荻秋明確表示「我不主張建立紅衛兵」。² 但是，曹荻秋的反對根本不起作用，有毛主席支持，紅衛兵組織迅速在上海各大、中學校，甚至工廠、機關中蓬勃興起。³

上海最早以「紅衛兵」命名的組織，是成立於1966年8月11日的復旦大學外語系「紅衛兵戰鬥小組」，負責人勞元一，他不久將成為全市最大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紅革會」負責人之一。8月22日，復旦大學紅衛兵大隊部成立；8月27日，南洋模範中學紅衛兵組織成立。幾天之內，所有的大、中學校全都

1 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2 傳單《曹荻秋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材料摘編》，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宣傳組1967年6月。

3 工廠機關的紅衛兵組織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時間，後來都改稱為「戰鬥隊」或「造反隊」。

成立了紅衛兵。最初的上海紅衛兵組織完全是北京紅衛兵的翻版：講成份，唯出身，非紅五類子女包括教師、醫生以及普通職員的子女，都沒有參加資格。而且與北京一樣，上海各校紅衛兵成立初期，核心人物大多是幹部子女。

為將紅衛兵運動納入慣常軌道，上海市委成立了紅衛兵聯絡站，站長是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不久，不但學校紅衛兵組織，而且城市職工和郊縣農民的紅衛兵組織也紛紛成立，也由張文豹負責聯繫。8月底至9月，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並衝擊上海市委，社會秩序越來越亂。陳丕顯和曹荻秋提出，對紅衛兵組織要加以引導。上海市委對紅衛兵的態度，從不支持到希望組織引導，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及中央決策機構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是共產黨一貫思路：對所有的群眾組織必須加強領導和控制。上海市委希望「切實掌握」幾個紅衛兵組織「在自己手裏」，「有事情可以用來起糾察作用」，⁴ 據後來批鬥曹荻秋大會的批判材料說，1966年9月，曹荻秋在部分區委書記會議上說：「根據運動的發展，每個區要切實能掌握二、三個大型學校的紅衛兵在自己手裏，這樣事情就好辦了。」⁵ 顯然，曹荻秋是希望以此對越來越失序的現狀有所控制。

上海第一個全市性中學紅衛兵組織和大學紅衛兵組織，就是在這樣的設想下由市委聯絡籌備成立的。9月上旬，曹荻秋和市委書記梁國斌、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等，各自召見了一些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警備區等領導幹部的子女，希望他們盡快成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維持社會秩序。⁶ 幾十年後當事者回憶，8月底9月初，北京紅衛兵來上海造

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寫。「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是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前身。

5 《曹荻秋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材料摘編》。

6 《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操縱上紅總部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大事記》，載於《紅衛兵戰地》紅1號，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大批判小組主辦，

市委反，所以這個組織「是在市委和警備區領導要穩定上海市的情況下開始籌建的。而一些幹部子弟(主要是南模的)就發起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⁷而另一個當事者也回憶說，上海第一個中學生紅衛兵組織和大學生紅衛兵組織的成立，確實是上海市委組織的：

1966年8月……我接到魏曉台(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的兒子)打來的電話，讓我去警備區政委李彬山家開會。……

到了李彬山家的院子裏，記得那時大概有三、四十個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都有)。有一位市委幹部蘇超(時任市委辦公廳副主任)說：北京已經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現在上海也要成立，你們這些人是市委經過選拔的。大家一起開了個會，會後又分開在兩個房間組織討論(中學生一個房間，大學生一個房間)。後來分別成立了兩個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總部、上海市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⁸

在籌備過程中，上海警備區給予了大力支持，提供四輛摩托車，還派出不穿軍服的軍人，為紅衛兵們開車，使籌備者得以在十來天時間內，聯絡了全市十個區的五百多所中學，此外還加上中等技術學校、中等專科學校以及郊縣的中學。

參加第一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是有條件的。當時，正值第一批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他們對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質疑；

1967年8月6日。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 7 原上紅總部作戰處處長、上海第61中學高中學生張延平回憶錄《「文革」我當上了「作戰處處長」》。
- 8 原上海第61中學高中學生、上紅總部工作人員張小坊的回憶錄《難忘的歲月》，張小坊在2009年12月26日對金光耀、金大陸、筆者的訪談時還回憶說：這次會上決定了兩件事：一是成立全市中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總部」，二是成立全市大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上海市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

由對上海市委的評價，分化出上海最初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後來被改稱為「保守派」，又叫「老保」），許多學校都同時存在不同觀點的紅衛兵組織。對上海市委的評價成為參加這個組織的條件。據當事人回憶：

當時各個學校都有紅衛兵組織，而且不止一個，我們必須一個個談過來。談的條件很簡單，第一，保不保上海市委？如果是保上海市委的紅衛兵，就可作為吸納成為組織成員；不保就剔除。而且每個學校原則上只選一個勢力最大的；如果勢力相當，且都是「保皇」的，就兩個都選。那時候沒有什麼太大的路線上的分歧，只是「保皇派」和「造反派」之分。⁹

而據不久後對市委的揭發材料，更是說參加者必須具備幾個條件：

- 一、承認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 二、必須是紅五類出身；
- 三、要文鬥不要武鬥。¹⁰

9月12日下午3時，「上海紅衛兵總部」（簡稱「上紅總部」），在人民廣場召開正式成立大會。這是上海第一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上海的黨政領導和駐滬三軍領導曹荻秋、梁國斌、王少庸、李干成、宋日昌、楊愷、陶勇、廖政國等，都出

9 上海復旦附中高中學生、原上紅總部工作人員魏曉台的回憶錄《從紅到黑，從黑到白》，魏的回憶還提到市委組織了上紅總部的籌備會議，時間在1966年的8月間，地址在湖南路8弄的李彬山家。

10 《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操縱上紅總部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大事記》。而據後來成立的另一個中學紅衛兵組織「紅西南」負責人屠伯森對筆者的回憶說，據他的記憶，第一條是「在上海市委領導下開展運動」。

席大會；曹荻秋、陶勇、廖政國並講話。參加大會的還有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貧下中農協會的領導，以及上海的學毛主席著作標兵楊富珍、楊懷遠和蔡祖泉。大會宣佈，上紅總部決定聘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為總輔導員，聘警備區副司令員張宜愛和副政委李彬山為輔導員。¹¹

上紅總部的總指揮、南洋模範中學高三學生李愛民，是文革前中學生中少有的共產黨員。據說當時中央有個精神：高幹子弟不要擔任紅衛兵組織負責人。李的父親是部隊中層幹部。不過，李的性格不屬能幹張揚類型，幾乎是名義上的司令，實際決策人是韓烽火和廖年，也都是南模高三學生。前者是中共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的兒子，共產黨員，李愛民的同班同學，任上紅總部的政委；後者是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兒子，任上紅總部的參謀長。此外，上紅總部各部門負責人也都是幹部子女：聯絡部長是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的兒子魏曉台，後勤部長是市民政局副局長楊洪才的兒子楊海光，作戰部長是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的兒子張小勇，辦公室主任是上海工學院黨委書記張敬人的兒子張小坊，等等。他們大都是高中學生。¹²

上紅總部號稱統領全市紅衛兵40萬。但其實這個數字是根據當時上海全市中學生的數字估算的。總部在各區設「區總部」，每區一個總指揮，兼上紅總部副政委。總部機關報為《紅衛兵》報，鉛印四開，創刊於1966年9月16日，重要文章最初都送市委審查。張春橋女兒張維維曾經是編輯之一。

上紅總部辦公處，在籌備階段時，設在原永安公司老闆郭琳爽淮海中路1375號近復興路口的家中。那時抄家之風已經興起，郭的家被上海中學的紅衛兵佔據，上紅總部便暫時在那裏辦了幾天公；正式成立前夕，搬往人民廣場剛完建的一幢大樓

11 《上紅總部正式成立》，載於上紅總部與上紅大專總部合辦的小報《紅衛兵》第一期，1966年9月16日。

12 這個名單是曾經參加過上紅總部的石鼎、張小坊等人回憶的。

內。這幢1964年開始建造的五層大樓，原準備作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大樓，文革驟起，沒來得及使用，市委將其分配給上紅總部，一、二、三樓辦公；四、五樓作宿舍，紅衛兵們在那裏打地鋪過夜睡覺。9月29日，上海第一個全市性造反派組織「紅衛兵西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西南」）成立，要求市委也提供辦公處。為了不被指責對老保和造反派厚此薄彼，也為了避免以後更多的群眾組織來申請辦公用房，市委只能要求上紅總部搬出人民廣場大樓。據說當時市委希望上紅總部能遷往南洋模範中學，因為那裏離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比較近。但上紅總部有些人不願意搬去南模；10月4日，上紅總部搬往徐家匯天主教堂，那裏的神職人員已在前不久的「破四舊」中被趕出。¹³

「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簡稱「上紅大專總部」），繼中學生的上紅總部成立後，於9月26日成立，是最早的全市性大學生紅衛兵組織，也主張在黨委領導下開展文革。骨幹成員主要在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戲劇學院。復旦大學的「紅衛兵大隊部」（簡稱「復旦大隊部」）是主要發起者，總部設在陝西北路500號共青團上海市委的團校內；主要負責人是華東師範大學學生李本榮，當時是上海市學生聯合會的副主席。上紅大專總部機關報也是《紅衛兵》，與中學上紅總部聯合編輯。但是，上紅總部與上紅大專總部，除了報紙是聯合辦的，實際沒有什麼橫向聯繫，甚至沒有在一起開過會，¹⁴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學紅衛兵初期活動，都在校園內而不在市裏。

市委希望這兩個全市性的紅衛兵組織，能夠對越來越亂的社會秩序起到救火作用。韓烽火後來回憶說：「他們主要的指示，就是讓我們維持好秩序。」¹⁵ 但是，以幹部子女為領導核

13 《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操縱上紅總部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大事記》。

14 金光耀、金大陸、筆者 2009 年 12 月 26 日對張小坊的訪談。

15 韓烽火著《對文革初期的一些回憶》。

心的上紅總部，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政治優越感嚴重，和北京紅衛兵一樣，只有純紅五類子女有資格加入，將許多其他家庭出身學生排斥在外，不但凸現共產黨十七年以來的階級等級身份制，而且更加強化。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沒有資格加入紅衛兵，另為他們設立了「紅外圍」、「紅戰友」之類的組織，以顯示政治身份的區別。而且幹部子女與幹部階層的先天聯繫，使他們無法將鬥爭目標集中到毛澤東所要打擊的當權派身上，他們是天然老保。上紅總部曾發過一篇傳單《革命的保爹保媽派萬歲！》，光是這個標題就很能說明他們的傾向。文章曾送《解放日報》社總編馬達審稿。¹⁶

不過，市委沒有提出過讓上紅總部出面保自己的要求；而且不久因為局勢的變化，上紅總部更是沒有也無法組織什麼有影響的活動，隨着造反派紅衛兵興起，這些被稱為老保的紅衛兵很快失去文革主流位置。1966年的12月20日深夜，上紅大專總部被復旦大學和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造反派紅衛兵查封，從此不復存在。¹⁷中學生的上紅總部，由於骨幹成員高幹子女多，在1966年11月以後，為避嫌避砸抄，成員或離開總部，或外出串聯，總部實際癱瘓，到1967年1月初上海的保守派全面瓦解後，也不復存在。

上海的破四舊

8月20日起，北京紅衛兵作出更驚世駭俗的行動——上街

16 這是筆者聽文章起草者、筆者的同學俞膠東回憶的，他是當時已經去世的原華東局宣傳部長俞銘璜的兒子，松江二中高三學生。文革初期筆者也曾聽他講起過這篇文章。不過筆者始終沒有親眼見到過。

17 這個日期引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海工人造反派鬥爭大事記》（討論稿），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辦公室資料組編，載於「一月風暴編輯部」編輯的《一月風暴》叢書1966年第一期。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破四舊」。所謂「四舊」是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來的，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個行動通過新華社報道傳向全國全世界，《人民日報》還特地為此配發社論《好得很》，為紅衛兵的狂熱推波助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8月23日剛發布北京紅衛兵的這則新聞，當天，全上海大、中學校紅衛兵便湧往街頭，尤其湧往商業鬧市區，首要目標就是店名、街名。

上海文革中第一個被改名的，不是商店，也不是馬路，而是有着37年歷史的《新民晚報》。就在破四舊消息見報當天，8月23日，《新民晚報》宣佈改名為《上海晚報》。這家創刊於1929年的報紙，以貼近生活的報風深受上海市民喜愛，發行量始終居上海地區市民自費訂報之首。此次更名，倒不是紅衛兵強迫，而是報社文化革命小組和臨時黨支部決定。改成這個毫無個性的名字，顯然是想減淡該報的民間色彩。這個決定8月12日作出，8月23日公佈，恰好為上海改名狂潮做出了第一個榜樣。

聚集人潮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商業最集中的南京路和淮海路，紅衛兵加上成千上萬看熱鬧的路人，將馬路圍得水洩不通。各商店櫥窗貼滿大字報，都是五花八門的改名意見：國際飯店被倡議改為亞非拉飯店、工農兵招待所；和平飯店被倡議改為人民戰爭飯店、革命飯店；永安公司被建議改名永紅、永門百貨商店，淮海路舊貨商店被改名為人民委託商店。老字號的王開照相館、冠龍照相器材店、邵萬生南貨店，招牌都被取下扔進火裏。各大服裝、皮鞋、理髮店前，貼滿大標語和最後通牒：「不准縫製奇裝異服」、「不准出售尖頭皮鞋」，「不准剪流氓阿飛頭」；著名的藍棠皮鞋店被上海交通大學紅衛兵斥為「尖頭皮鞋司令部」，店裏一雙雙待售皮鞋，被紅衛兵們用剪刀剪碎。

南京路附近的西藏路上，著名商業娛樂場所「大世界」的巨大牌子，被用繩子拉下砸爛；新的待命名字一大堆：東方紅

文化宮、工農兵友誼劇場、革命俱樂部、人民遊樂場、東風世界，不一而足。淮海路上，永隆食品商店改名永紅食品店，哈爾濱食品廠改名工農兵食品廠，襄陽公園改名向陽公園。靜安區改為延安區、紅衛區；徐匯區改為群英區、前衛區；長寧區改為戰鬥區、長征區、遵義區；普陀區改為普紅區、工人區；盧灣區改為紅衛區，等等。南京路改為反帝大街、五卅大街；淮海路改為反修大街；肇嘉浜路改為憶苦思甜路；復旦大學被建議改名為東方紅大學。¹⁸

上海的宗教場所和宗教建築大都遭到毀滅性破壞。百年名刹玉佛寺首當其衝。玉佛寺所在的普陀區委領導得悉後，搶先派幹部前往玉佛寺進行保護性「查封」。在紅衛兵到來時，進行說服工作。整座古寺和寺內佛像以及珍藏的經書大部分得以保存下來。這是破四舊浪潮中上海僥倖保存得最完整的寺宇之一。有一千多年歷史的龍華古塔也險遭劫難，8月25日，一夥紅衛兵想用繩索拉倒龍華塔，幸虧廟中人員及周圍百姓通宵守護，並懸掛巨幅政治標語於塔身，古塔方倖免於難。上海其他教堂廟宇和人文遺址則基本被砸：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文化遺產靜安寺、龍華寺、上海城隍廟，近代優秀建築徐家匯天主教堂、佘山天主教堂等等，幾乎無一倖免。靜安古寺前的千年沸井被填沒，廟裏十八羅漢塑像統統被戴上高帽子；曹家渡三官堂的菩薩被扔進蘇州河；佘山天主教大教堂的精美雕刻全被砸爛；徐家匯天主教堂哥特式尖頂和頂上的十字架被拉倒；教堂廟宇內的神像、經書、法衣全被焚燒。宗教人員遭受侮辱批鬥甚至毆打。上海教區主教張家樹、上海天主教愛國會副主任陸薇讀等七十三位神職人員和上層教徒，被強迫跪在徐家匯大教堂中，張家樹等八人被戴上高帽子批鬥；佘山大教堂的馬

18 以上資料引自1966年8月25日新華社報報道，以及金大陸主編的《上海青年志》，《上海青年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神父被打死；楊浦傅家宅天主堂內修女被趕走。紅衛兵還聲稱要「接管」廟堂或教堂。南市區的大同中學紅衛兵接管清心堂基督教堂；盧灣區五愛中學紅衛兵接管惠中堂基督教堂。

其他稍有文化內涵的建築也遭到掃蕩。黃浦江畔上海海關大樓頂端報時鐘，報時音樂被改為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旋律。城隍廟豫園內上百年雕花門窗全被搗毀，豫園圍牆上瓦片砌成的九條龍被限令一周內拆除；岳陽路上俄國詩人普希金紀念碑，建於1937年，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拆除，1947年又重建，此次破四舊浪潮中第二次被砸毀；外灘的上海市人民委員會門前原匯豐銀行留下的兩座大銅獅子被移走；上海展覽館¹⁹門前一對顯示中蘇友好的人像，其中的蘇聯人像，腦袋被布包裹，身體貼上白紙，上書「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名人薈萃的萬國公墓，所有名人墓碑全被砸毀，連國家副主席宋慶齡父母墓園也不能倖免，骸骨被從墓中挖出暴屍。其他公墓包括地處郊縣的公墓也無一倖免，農民們用鋤頭鐵搭刨墳墓，撬棺材，將屍首拋棄於田野；掘墳掘到的金銀陪葬物，換成人民幣，算作生產隊收入。²⁰

安閒舒適的西化生活方式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咖啡館、西點館門口貼着「中國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國貨」等口號；著名西餐館老大昌的高檔麵包、泰山飲食店的攪奶油等停售，店家收起威士忌、白蘭地，買來筷子代替刀叉。中餐館也逃不了被批判：滄浪亭的蝦仁麵被指「為資產階級遺老遺少服務」而停售；一些餐館取消營業員端菜上桌的服務，要顧客自己排隊領取所點菜餚。百貨行業經售的指甲油、口紅、玻璃絲襪等，與「資產階級臭美」有關，也都不被允許出售。一個顧客破四舊前在一家舊貨店預付款，定製了張雕有龍鳳奪珠

19 上海展覽館原名「中蘇友好大廈」，文革前夕改此名。

20 張治凡著《我所參加的一次搶劫》，載於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4tid=504>

圖案大床，屆時商店不讓提貨，說必須先將龍鳳敲掉。一些收入較高的文化人或工商業者聚居的高檔住宅區，公寓或弄堂口貼着大字報，限令僱主二十四小時辭退保姆。

銀行門口被貼上「取消利息」、「沒收千元以上存款」大字報，前往銀行提款的客戶統統被要求報成份，若是資本家或小業主，當場便被批鬥。紅衛兵認為「資本家拿定息和高薪是剝削」。²¹ 一些膽小的企業主見紅衛兵來勢洶洶，很長時間不敢再去銀行領取，變相放棄。南京路上老介福、協大祥、麗華百貨的資方人員被同濟大學、復旦附中紅衛兵揪出批鬥，前胸後背貼上「剝削無恥」、「取消定息」的大字報，還被逼着當場簽名同意自願放棄定息。私營企業被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紅衛兵說「公私豈能合營？」全市所有公私合營商店、企業，一夜之間全被摘下招牌。私人業主被強迫歇業。北京西路上有家私營婦科診所，玻璃窗、紅木桌椅、處方本，被砸得一片狼藉。畫家哈定開設在餘慶路上教授繪畫的私營畫室，玻璃窗、石膏像、畫架，全被毀滅性砸爛。

這股風很快颳到郊區，從8月24日到29日，不到幾天，郊區的教堂、廟宇、道觀、庵堂、公墓，稍有文化沉積的古物、古建築，幾乎全部被砸，社員家中的神仙祖宗牌位一掃而光。大部分農村人民公社改了名，換上時髦的東方紅、紅衛、紅星之類新名字。²² 許多學校的學生還焚燒書籍，將自己學校的圖書館藏書毀之一炬。

這場破四舊之狂潮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比歷史上任何一場天災人禍或戰亂都要徹底和無微不至。光是數不清的各類幾百

21 定息是固定息率的股息，是1956年「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完成後，國家根據贖買政策給私營資本家和業主核定的私股股額，按期支付給原企業主的。

22 以上材料大部來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五章，以及1966年8月25日、8月29日、9月29日的新華社報道。

年牌樓、牌坊、石碑、木匾，就被砸得連一個都不剩，而文革前它們遍佈上海周邊城鎮和鄉村。上海郊縣的松江、嘉定等古縣城都有千年以上歷史，多少文物古跡，躲得了千年戰亂，卻躲不過破四舊，永遠消失。

面對海嘯般的改名風潮，市人委辦公廳於10月5日，召開各區區長及有關單位負責人會議，討論群眾提出的對區名、縣名和路名的更改建議，多數人反對，說再看看，議而不決。上海的路名就這樣沒有遭受大的反復。²³

紅色恐怖

北京破四舊中，對人身的最初侵犯是革「奇裝異服」的命。上海也完全照搬：鞋子頭不能尖，否則立即責令脫下，用剪刀剪去尖頭，讓鞋主光腳回家；褲腿不能小於七市寸，否則剪破整條褲腿；頭髮女不能披肩，男不能包頭，否則剪去一絡頭髮或乾脆剃成光頭。

北京的破四舊很快轉入對牛鬼蛇神的人身迫害。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傳達毛澤東「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7月28日江青對北京市海淀區中學生講話中，又一次轉達毛澤東6月下旬左右說的這段話。²⁴8月初，北大附中批判北大工作隊長張承先，「紅旗」戰鬥小組發起人之一彭小蒙上台發言後，下台走過張承先前，突然解開武裝腰帶，在眾目睽睽之下抽打了張承先一下。這個動作，卻沒有受到在場的江青等人阻止。北

23 《上海地名志》，《上海地名志》編纂委員會編，張紹梁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24 《江青19660728對北京市海淀區中學生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但據說，毛澤東在這段話後面還有一句話：「今後不許打人」，說毛澤東對刪去最關鍵的這句話很生氣。

京幹部子女第一次打人行爲，就這樣在公開場合下，被中央文革小組默許和縱容。

但是各級黨委還是有所顧忌，不敢放任學生隨意打死人，各地政府都有干預學生的動作。於是，在紅色暴力高潮開始的8月下旬，經毛澤東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緊接着，又是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²⁵ 這種凍結社會治安系統的做法，使1966年的紅色暴行有恃無恐，愈演愈烈。而此時，各級黨委和政府還沒有失去權力和權威，完全可以制止日益蔓延的紅色恐怖。但幹部們不敢違背毛澤東意志，聽任形勢惡化。這是幾乎所有共產黨幹部多年形成的行事方式：寧可對不起老百姓，也不能違背上級意圖，更不用說違背毛澤東。文革前，不要說打死人，就是鬥毆傷人，公安部門也會出面干涉，嚴重者會被拘留。但在1966年的破四舊中，本應維持社會治安的公安局或派出所卻不見行動，默許了紅色暴力的蔓延。

8月2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發布北京紅衛兵上街破四舊新聞的當天，著名京劇藝術家周信芳的家被十幾個紅衛兵敲開。「是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學和市二女中的十幾個紅衛兵，都是初中生，幹部子女，而且大多是女孩子，但她們打人毫不手軟。」²⁶ 幾個女紅衛兵強行將周信芳九歲的孫女剪「陰陽頭」，還當着孩子們的面，掄起帶着銅扣的軍用腰帶，將周信芳的妻子和兒媳婦打得昏過去，將周信芳家的狗打死。九歲的女孩子被嚇得精神分裂，從此再也沒能痊癒。²⁷

8月初的上海，鬥鬼風主要還是侮辱人格，雖有打人現象，

25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第 1438 頁。

26 金大陸、金光耀、筆者 2009 年 12 月 26 日對張小坊的訪談。

27 樹莽著《生死戀歌——周信芳與裘麗琳》，文匯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但大多還不是往死裏打。而在上海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幾乎同時，一些北京紅衛兵南下上海串聯，將北京打人風帶到上海。這些北京紅衛兵甚至還沒到上海，就在火車上尋找毆打的對象：勒令「地富反壞站出來」。若真有膽小者站出來，他們就對這些1949年後的賤民一頓暴打。8月下旬後從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到上海站時，經常能看到從車上抬下的被打得奄奄一息者。²⁸ 一些到上海的北京紅衛兵們一再指責「上海太手軟，讓我們打幾個牛鬼蛇神給你們上海人看看！」言傳身教地向上海紅衛兵示範如何將人往死裏打。而上海學生中，打人最厲害者是中學紅衛兵。他們到街道和派出所索要名單，按圖索驥將人抓到私設的公堂毆打。從現在所能看到的資料，上海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者，是上海縣梅隴公社朱行大隊的一個「地主婆」。8月27日，3個北京紅衛兵到那裏，「把六個地主，一個投機倒把分子，三個地主子女捆綁起來，雙膝跪在磚頭上，頭低下用長板凳壓住」，「由北京兩個學生帶頭用鞭子打」。結果打死一個婦女，打傷二人。²⁹ 這是北京紅衛兵第一次向上海的紅衛兵展示他們的殘暴。以後成為著名社會學家的楊東平，那時是上海中學學生，親眼目睹了這場慘無人道的拷打，而且打人者都是女學生，是北京第二十八中學的三個女紅衛兵：

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北京女紅衛兵是在附近農村的一戶「地主」家，她們讓「地主婆」跪在一塊磚上，用北京話罵，用皮帶抽。人要是翻倒了，讓她再跪上去，繼續打，就聽慘叫聲，還看見血淋淋，我們誰也沒有見識過這種場面。³⁰

28 這是筆者的高中同學俞膠東告訴筆者的。他曾經在上紅總部政治部工作過近一個月，上紅總部小報《紅衛兵》的編輯之一。

29 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始末(1966.9.10-9.30)》，發表於《史林》2008年第3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出版。

30 李宗陶著《思慮中國——當代36位知識人訪談錄》中對楊東平的訪談：《楊東平——積極的悲觀主義者》，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9月6日，地處徐匯區的上海第五十一中學紅衛兵，在中山醫院一個副院長家批鬥他的八旬老母，說她是地主婆，將其毆打成重傷，後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9月10日，東南中學紅衛兵往黃埔(浦)區沈家弄的一戶居民家貼大字報，說她過去有「投機倒把」行為，她不服氣，發生爭執，紅衛兵就將她吊起毆打，次日又拖到沈家弄小學綁在旗杆上繼續毆打，當日晚上10時，這個婦女被活活打死。9月17日，上紅總部幾名紅衛兵通過黃浦區龍門路派出所，找到三個「壞分子」，押到上紅總部毆打，其中一人被打了一整個晚上，直至打死。9月17日，地處徐匯區的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學，六個紅衛兵用帶釘木棍、鞭子和扁擔，毒打一名父親是「歷史反革命」的婦女，說她不老實交待在單位裏偷看內部報紙《參考消息》之事，將她硬灌大量涼水後踩肚子，當場折磨死，又將其母親也打至重傷。³¹ 第五十一中學和五十四中學，都是上海幹部子女較多的學校，這些打人者中帶頭的，許多是自恃出身優越的幹部子女，也有工人子女。

據統計，從1966年9月1日起至9月25日，上海市區被打者達一萬餘人，其中打死11人。³² 而同時期的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被紅衛兵驅趕出北京市的「五類分子」及其家屬達八萬五千多人，北京全市被打死1772人，高於上海一百六十多倍。³³ 據一些當事人回憶，上海的許多打死人事件，都有北京紅衛兵參加，而以北京紅衛兵為主的打人事件還要多。余山大教堂的馬神父、原國民政府駐法國肖姓參事等，都是被北京紅衛兵活活打死的。

破四舊是上海繼鬥鬼風之後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於這兩

31 以上材料主要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五章。

32 《中共上海黨志：中共上海黨志—特記「文化大革命」紀略》，《中共上海黨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33 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個高潮幾乎相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個高潮。鬥鬼風中的被鬥者主要是學術權威，破四舊中的被鬥者則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對象。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得到來自中央決策層的默許。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1966年8月下旬一系列講話，更是為紅色恐怖推波助瀾。他說：「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8月下旬他在甘肅、陝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甚至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³⁴ 謝富治這些講話，撤去了本應保護老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後屏障。

有組織的大抄家

上紅總部還在籌備階段，北京的抄家風已經興起。但上海市委對整個破四舊，始終持保留態度。8月23日，北京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消息剛經《人民日報》刊登，8月24日市委書記處便連夜開會，作出規範意見，第一個內容便是「不要抄家」，此外還有不要破壞公物，不要破壞文物，不要去搞外僑，不要在馬路上強迫脫鞋子、脫褲子，不要攔轎車，允許市民乘坐三輪車，不要破壞建築物，不要燒圖書，不要燒檔案，保護圖書，等等，共有十條，口頭通知至各區、縣、局黨委。³⁵ 但沒幾天，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高度讚揚抄家，抄家成為時代最強音。市委只得再加上「隨便」

34 轉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刊於《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3期(總第78-34k期)。

35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60頁。筆者當年也曾聽說過這個「10條」。

兩字：「不要隨便抄家」。上海市委這個「十條」以後被來上海串聯的北京紅衛兵一再指責，說是阻礙運動的「臭十條」。張春橋在北京聽說曹荻秋制定十條，也打電話來批評市委，說「不要作束縛群眾手腳的規定」。³⁶

市委對破四舊的態度，還可以從兩篇社論在上海的被廣播次數看出。8月2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軍學習》，上海播送了33次；而對8月29日的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上海卻只廣播了7次。³⁷ 曹荻秋要求幹部們盡可能地維持秩序，「在一天內制止下來」。

8月29日至9月3日，上海第一次大規模抄家，其中有組織連續抄家達三天。當時上紅總部還沒有成立，一個市一級類似領導小組的機構，領導了這三天的全市性抄家，領導者都是些中學紅衛兵，其中不少人不久成為上紅總部成員。抄家行動時，他們分管各區；下面如抄出重要物資，或與被抄家者發生衝突，隨時與他們聯繫，警備區向他們提供了汽車，他們可以迅速前往處理。³⁸ 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默許下進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後實際組織者。市委從原先的不贊成抄家，到組織和引導抄家行動，顯然是想將紅衛兵的抄家行動盡力規範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

抄家名單大多由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黨組織提供。在此之前不久，公安部長謝富治，在8月下旬的一次北京公安局幹部擴大會議上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

36 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編 1967 年 11 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37 《市委和市委宣傳部頑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幾個突出事例》，市委宣傳部「一心為公」革命造反戰鬥小組在 1966 年 12 月 18 日市委寫作班造反大會上的發言，載於寫作班造反大會的大會特刊。

38 這是俞膠東告訴筆者的。

們」。³⁹直到9月2日，由於打死人太多，中共北京市委才發布《關於制止一切打死人現象的緊急通知》：「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從現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謂流氓分子名單，違者要受紀律處分。除現行犯外，五類分子的名單，也不要向群眾提供」。⁴⁰

上海這次大抄家，市區十個區的抄家名單全部匯總到那個市一級的抄家領導機構。當時的一個參與者回憶，這些抄家名單都是各派出所提供的：

這些抄家名單，每個人都有一份材料，全是群眾的檢舉揭發，主要是被懷疑為國民黨特務的，還有什麼被認為是反革命的人、被釋放的舊軍警和國民黨將校以上的高層人員，還有解放後群眾舉報的私藏武器和電台的特務，等等。「地富反壞右」倒很少，沒有著名人士。有資本家，但大都是被認為和敵特勢力有聯繫的資本家。所有這些材料，全是解放後到文革前夕這許多年的舉報，由派出所整理的。……

為什麼我當時會覺得是派出所整理的，因為這些資料全部都是打字機打出來再油印的，沒有一張是手寫的，而且紙張很白很新，看上去都像剛打印出來的。那個年代，老百姓家根本不會有打字機。所以，給我當時的感覺，這是上海市公安局為配合紅衛兵的抄家行動，統一部署各派出所，加急整理出來的。每份名單下面都敲有派出所的圖章。……

我印象中，那三天絕對沒有大量抄資本家的家。至於有沒有抄知名人士的家，我不太清楚，因為當時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敵特嫌疑上。而且給我的印象，市委也是將重點放在敵特嫌疑上。當然，之後的抄家，就開始抄資本家的

39 轉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

40 同上。

家。不過，那些抄家就不是我們統一指揮的了。⁴¹

另一個當年的紅衛兵幾十年後也回憶說，抄家名單是政府給的：

我們抄家的名單，大都是街道里委和公安局提供的。徐匯區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長來找，讓我們幫助破案。他們佈置我們去抄嫌疑人的家，公安穿便衣夾在裏面，關鍵時出面審問嫌疑人。我記得用這個辦法查了兩起案子。一起大概屬於「特務嫌案」。⁴²

抄家的對象「主要是解放後由群眾揭發、舉報的敵特嫌疑對象，還有被捕判刑後釋放出來的國民黨中高層軍人、將領。」⁴³這一類人的名單都由公安局提供：

抄家名單都是公安局給我們的。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是紅五類，公安局就是給我們一個名單，懷疑哪個地方有敵特的嫌疑，或者有海外關係的資本家，我們就去抄他們的家。公安人員穿着便衣等在下面，我們抄到的東西也都交給公安局，而且是要登記的。⁴⁴

各區名單集中後，再按所屬區分配下去；同時分下去的還有地圖，由警備區提供，是五萬分之一的軍用上海地圖，很詳細，哪個弄堂是死路還是活路，都標得很清楚。⁴⁵

41 金大陸、金光耀、筆者 2009 年 12 月 26 日對張小坊的訪談。

42 孫恆志著《從紅衛兵到「反革命」》。

43 張小坊著《難忘的歲月》。

44 張延平著《「文革」我當上了「作戰處處長」》。

45 同上。

這些抄家名單是上海市委要求公安局系統提供，還是公安局系統根據謝富治講話執行？目前還不得而知。而負責上海公安工作的市委書記梁國斌，在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串聯時，曾經說過「可以向紅衛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名單，讓他們去抄家」，⁴⁶ 或可間接證明，上海抄家名單至少是在市委默許下提供的。一個當事者還回憶，「上面」對此次抄家作了規定，如必須留出與周邊群眾同等生活水平的熱水瓶、被子、鍋碗瓢盆等家用物品；對於現鈔、存款、糧票等，也都有很詳細的數目規定；如果遇到反抗馬上匯報，不許武鬥，等等。⁴⁷ 大抄家的第一天晚上，市公安局的一個副局長，和紅衛兵一起坐着吉普車巡邏，時刻準備哪裏出事便馬上趕去處理。⁴⁸

趁紅衛兵抄家的機會，有關部門還讓紅衛兵出面幹他們不便出面幹的事。據說監測部門過去在上海一些地段，長期發現可疑電波點，有的可疑點在多戶居民混雜的房子裏，礙於法制不能挨家上門查抄。這次抄家，有關部門便要求紅衛兵對可疑點的一幢或幾幢房子抄家，甚至安排人親自查抄。據一個當事者回憶，他當年聽參加過這類抄家的上紅總部糾察隊負責人說，曾看到一些成年人直接參與抄家。他們穿着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戴着袖章，看上去像紅衛兵，但有的人年齡明顯大了些，便戴着口罩。他們抄家挖地三尺，破牆鑿洞，內行得很。⁴⁹ 上海虹口區北虹中學的一個學生文革後也回憶說，他們學校當時曾幾次被要求「抽調一批可靠紅衛兵」，以抄家為名：

對公安局內部掌握的敵特嫌疑對象進行搜查……規定了紀律，如不准透露是公安局帶領抄家的，只能叫公安局帶隊

46 轉引自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47 這是俞膠東告訴筆者的。

48 張小坊著《難忘的歲月》。

49 這是筆者的同學，作家薛海翔當年聽親歷者說的。

的人老師，還不准對外人提起被抄的對象，查抄中不准打人、砸東西、所有查抄物品都要登記造冊，由被抄人本人簽字和居委幹部簽字才能帶回來等等。而且，所有的抄家都是在夜間進行，公安局還為我們的行動配備了卡車。其中一家被抄對象在和平公園附近，公安局懷疑那家有秘密電台，結果什麼也沒有抄出；另一家是49年前開首飾店的老闆，懷疑他家隱藏黃金等大量貴重物品，結果果然抄出大量金條金磚甚至夜明珠。⁵⁰

此類有關部門讓紅衛兵出面幹他們不便出面幹的事還有許多。例如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學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那些日子接待過幾個成年人，自稱是公安局的，給了他們一份十幾人的名單，都是住在徐匯區的；說這些人在中國人民銀行租有保險箱，存放的可能是敵產或是其他什麼東西，甚至可能是武器，希望紅衛兵小將們去破四舊。但這些保險箱必須同時使用兩把鑰匙才能開鎖，一把在銀行手裏，另一把在箱主手裏，「我們不好出面開鎖，你們紅衛兵小將出面」。紅衛兵根據提供的名單去到這些人家，要求交出鑰匙，所有人都以種種理由推說鑰匙不在或找不到。於是紅衛兵將他們帶往銀行，要求銀行強行開鎖，並由箱主支付十元開鎖錢。結果，開出來的全部都是外幣或黃金，沒有武器電台之類。這些資產都當場在銀行「就地上交」，物主不敢表示任何異議。⁵¹

全市性大抄家還真抄出了十幾部發報機，有個發報機是從棚戶區裏抄出的。那些原先測出可疑電波的點，有些挖地三尺也沒有抄出發報機，但有些可疑點確實抄出發報機。而且自從

50 這個回憶是筆者在網上看到的 2008 年《申城往事》，登在「心之橋網站」，網址<http://www.zqlhcn/Index.asp>，作者是原北虹中學 66 屆初三(10)班學生，筆名海訊。

51 筆者 2006 年年 8 月 21 日對原「上海紅衛兵西南地區紅衛兵」負責人、上海市第 51 中學中五學生屠伯森的訪談記錄。

這次抄家之後，全市可疑電波全部消失，整個上海的上空安靜了好多年。⁵²

高安路19號是不公開掛牌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的宣傳部。小院隔壁是情報研究所，也沒掛牌。19號對面的一幢小院，房主出國，房子長期空關着，可屋子的閣樓上居然架着一門炮，對着19號，下面箱子裏還有兩枚炮彈。⁵³ 其他地方也有抄出不少武器的：長短槍、機關槍甚至六零炮。全市共抄出三萬多支輕重武器，從迫擊炮到手槍，到好幾箱黃油都沒擦乾淨的步槍。⁵⁴ 現在看來，那些抄出的武器，有些可能只是共產黨執政後，收繳民間武器時沒有上交的私人武器；那些發報機，有些可能只是早就廢棄的商業電台。但是，抄家後可疑電波消失，說明還真是曾經有過正在使用的政府控制外電台。上紅總部成立後，曾打算將抄家花絮登在《紅衛兵》報上，市裏沒同意，說許多事是保密的。上紅總部就在自己辦公樓下辦了個「紅衛兵抄家成果展覽會」，展出抄出的槍支彈藥和電台，以及黃金等物。⁵⁵

曹荻秋9月4日一個講話說，「上海的紅衛兵抄了五千家」，⁵⁶ 這顯示，9月4日之前，上海至少被抄家五千戶。1966年9月18日曹荻秋在全市區縣局以上幹部大會上，作關於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勢的報告，在匯報「文革戰果」時，曹荻秋說上海搜出黃金48萬兩，「是北京的10倍」，「北京好像動得比上海

52 這是筆者的同學、作家薛海翔 2005 年 10 月 2 日告訴筆者的，他在高安路上的家，文革前就是監測部門監測可疑電波的點，少年時經常有兩個軍人帶着儀器來他家，在一間屋子裏對着外面通宵監測。抄家後可疑電波消失多年之事，就是這兩人文革中告訴他的。

53 筆者對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54 金大陸、金光耀、筆者對張小坊的訪談。

55 以上資料均為俞膠東告訴筆者。

56 引自《曹荻秋同志在市委會見北京南下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摘要》，1966 年 9 月 4 日，載於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資料匯編第 1 集，新師大文革籌委會、物理系《五敢》聯絡部、化學系《挺進》兵團聯合翻印，新北大《叢中笑》戰鬥組印，1967 年 2 月，上海。

厲害，但上海成績比北京大。」⁵⁷ 10月，曹荻秋去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將紅衛兵抄家作為上海文革戰果匯報。後來造反派說，上海市委這是將文革的破四舊成果「據為己有」。⁵⁸

抄家風蔓延

三天大抄家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都回憶說，最初公安局、派出所提供的抄家名單中，沒有社會知名人士或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基本都是資本家、小業主，還有長期被有關部門懷疑是特務者。市委通過公安系統影響紅衛兵的抄家行動，固然有趁機將他們一直懷疑的對象抄家，但顯然更多是希望盡量將紅衛兵的抄家行動控制在各級黨委手裏。

而事實上，全市性大抄家起了示範效應，以後的抄家根本不可能被控制約束，緊接着全市抄家不斷，而且即使在那三天大抄家中，絕大多數知名人士也還是被本單位職工或本地區紅衛兵、居民抄家，市委根本無法阻止。參加這場全市性大抄家的，不但有各中學、大學的學生紅衛兵，而且更有成年人紅衛兵。⁵⁹ 這些成年人的紅衛兵組織，在單位黨組織的策劃或默許下，對本單位牛鬼蛇神抄家。文革結束後，許多工廠、工業局編印的「文革大事記」或「黨史大事記」中對此都有記載。⁸

57 傳單《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黑報告是一株大毒草》，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程綺華等，1966年11月16日。

58 傳單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59 紅衛兵運動興起的最初期，在職職工也學着學校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196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的批示（中發〔66〕509號），要求職工單位不要成立紅衛兵。196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的批示（中發〔66〕509號），要求職工單位不要成立紅衛兵。以後紅衛兵成為純學生組織。

月30日晚上，光是冶金系統各單位，就出動五六千名職工紅衛兵，冶金局直屬單位共有九百多人被抄家，其中局機關53人。⁶⁰許多工廠的職工紅衛兵組織也對自己廠的「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組織抄家行動。例如國棉十七廠，8月31日至9月1日二天，全廠出動四百多名由幹部和工人組成的紅衛兵，對34名「重點對象」抄家。⁶¹沒有工作單位的自由職業者，也難逃抄家之劫，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就是被自己所住地區的房管所職工紅衛兵抄家，接着又被上海音樂學院學生紅衛兵抄家，不甘凌辱，於9月3日凌晨雙雙自盡。

上海第一批被抄家的對象中，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長黃赤波也在其列。當時上海對各級幹部的批判還在市委控制之下，批判幹部尤其局以上幹部，要得到上級黨委批准，黃赤波是文革初期最早被市委拋出的市級領導。8月23日晚，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幹部王維章帶人去抄了黃赤波的家；王以後成為公安局系統的造反派組織「公革會」的負責人。⁶²

以維持社會秩序為責任的市公安局的局長，尚且自身難保，普通市民更難逃劫數。不久市委進一步失去對全局的控制能力，抄家之風更加蔓延。抄家物件開始是「牛鬼蛇神」中的一部分即「黑六類」，以後很快波及黨政領導、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作家演員等著名文化人士、學校教師，等等；幾乎波及所有的「牛鬼蛇神」；有的單位凡帶「長」的全部都被抄家。

上海是共產黨執政前中國企業家最集中的地方，所以被作為「資本家」抄家的對象也最多。知名人士如劉念智、郭琳琪、榮漱仁（榮毅仁之姐）家被抄。全市六萬多工商業者統統被

60 上海市冶金工業局黨委、有色金屬總公司黨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 1987 年 10 月編《上海市冶金工業局黨史大事記》。

61 《上棉十七廠十年動亂紀實 1966 年 6 月—1976 年 10 月》，上棉十七廠 1984 年編寫。

62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57 頁。

抄家，無一倖免。一些社會知名人士，更是紅衛兵抄家集中目標，作家巴金、書法家和詩人沈尹默，以及演員趙丹、白楊、京劇演員童芷苓等家裏，上門抄家者絡繹不絕，這幫去了那幫來，甚至時常發生兩群抄家者在同一時間上門的情況。抄家株連名人子孫後代。黎元洪兒子、段祺瑞姪子、袁世凱孫媳婦等悉數被抄。上門抄家的不僅紅衛兵，還有單位造反隊。抄家者挖牆洞、砸櫥櫃，上到房頂，下至地板，角角落落都抄徹底。更有「毀滅性抄家」，不僅拿走東西，還將未拿走的東西肆意破壞。有的家庭，被抄家後接着又被強佔房子，「掃地出門」，失去棲身之地。⁶³ 在抄家風掃盪下，許多人被迫自行破壞珍藏的文物書畫。如名畫家吳昌碩後人，將許多字畫撕毀，當廢紙就賣掉一百多斤。著名畫家林風眠，將自己留存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著名書法家沈尹默，將畢生積累的一大批明清大書法家真跡，以及自己的作品，撕成碎片，在夜深人靜時倒進蘇州河。⁶⁴

抄家物資中，金銀、存單、現金、外幣及貴重物品，當時都交由銀行收兌和保管；1970年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批准，各單位寄存在銀行的金銀，由銀行按當時收兌牌價折價處理。那時金銀兌換價非常低，而且只有政府一家壟斷價格，但原物主不敢有任何怨言。還有許多文物古董、名家字畫、外幣等，被無知狂熱的抄家者作為四舊，當場燒毀砸爛，損失難以估量。抄家物資集中堆放，沒有任何交接手續和賬冊，情況混亂，被一些人趁機順手牽羊、中飽私囊，日後也無法查清。還據一份材料顯示，上海文革初期抄家收繳597架鋼琴，後來都沒歸還原主，由市革委會有關部門批准，轉送給了中小學。⁶⁵

63 以上材料均來自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五章。

64 丁抒著《幾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 年破四舊簡記》。

65 市教育局工宣隊軍宣隊 1969 年 1 月 26 日《關於抄家鋼琴的分配報告》，

伴隨着抄家風的，還有驅趕黑六類風。這股風由北京颳來，上海紅衛兵向北京紅衛兵學習，去街道、里弄驅趕黑六類，勒令他們必須在限定的日子遷離上海回原籍；甚至有些機關企事業單位也配合紅衛兵的「勒令」，驅趕本單位的職工。市商業二局系統從1966年9月上旬至10月19日，開出黑六類名單1630餘人，其中511人被掃地出門，趕回原籍或農村、小城鎮。市財政局系統的一些單位，以反革命、漏劃地主、漏劃富農、壞分子等為名，將局機關以及所屬分局、建行等機關的21人趕出機關，其中18人被遣送回原籍「改造」，致使一人因此跳樓自殺身亡。市水產供銷公司第二批發部共有職工638人，被大字報點名要驅逐出上海的有133人，佔職工總數20.8%。而據當時的統計，到1966年10月10日為止，上海全市有9260餘人被遣送回鄉。⁶⁶

1966年整個紅八月包括與之相連的9月期間，上海非正常死亡人數大幅度上升：據市委辦公廳《文化大革命動態》第841期記載，9月份不完全統計，發生自殺事件704起，死亡354人。⁶⁷

小結

如果說，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建立的一個處於中央權力體系之外的力量，一個他自己能夠直接領導和支配的中央決策班子，用以對付和對抗他所要打擊的中央決策層幹部對文革的控制；那麼，紅衛兵則是毛澤東支持的不受各級黨團或學生會等官方組織控制的體制外青少年群眾組織，用以衝決地方執行層幹部對文革的抵制。而在此之前，甚至朋友之間如果交往稍

原件藏上海市檔案館，檔號B105-4-325-4。筆者後來在所工作的上海電機廠的托兒所，也曾看到從工廠總工程師孟慶元家抄出的鋼琴，給了廠辦托兒所作教學用。

66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103 頁。

67 同上第 58 頁。

微密切，也有可能被指責為「小集團」、「反革命小集團」，輕則遭受批判，重則被判刑。共產黨不允許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間團體存在。所以，紅衛兵組織興起的最大意義在於其體制外的組織形態，為不久全社會的自由結社開了大門。於是底層群眾的意願，得以用群眾組織的形式表達並介入黨內鬥爭，毛澤東的意願得以上下呼應。這種結果雖不是毛澤東在給紅衛兵寫支持信時所完全能預料到，但卻是毛所需要的。

以高幹子女為核心的第一批紅衛兵，在文革最初的發動上起了巨大的榜樣作用。他們藐視權威與秩序的反叛精神，帶動了全國的青少年以及對現狀不滿者。但是，他們的政治要求，也只止步於成立不受黨團組織控制的結社自由。他們的最終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獨享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名份，以將來獨享政治資源。他們企圖以血統論，清除那些學習成績出色的非紅五類子女對教育資源的競爭威脅。1964年以後，共產黨越來越強調階級路線，強調幹部子女「要接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班」，召開專門的幹部子女會議，向他們灌輸「接班」意識，上海當時也曾召開過兩次這樣的會議，參加者都是局以上幹部子女。這一切，都強化和擴張了幹部子女原本就有的政治優越感，並使這樣的優越感落實到捨我其誰的當然接班人意識。這是文革初期血統論興起的重要背景。紅衛兵運動，以血統論為開端，將共產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分層推到極致。原有的各種政治名份，被歸結為兩大類：紅五類和黑五類(或黑六類)。原來可以通過個人努力改善的政治名份也被固化：「出身不好」者一定天生反動，有「歷史問題」者一定永遠反革命；而紅五類出身，一定是天生的革命者。

在鬥爭方向和鬥爭對象上，這批紅衛兵和共產黨的一貫目標完全一致，區別只在「文鬥」還是「武鬥」。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暴戾是階級鬥爭學說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導的必然結果。這樣的暴戾不但沒有受到阻止和懲

罰，反而得到默許甚至鼓勵，這使1966年的紅八月充滿了血腥，而且為不久興起的造反派樹立了榜樣。整個文革十年中的武鬥和打人行為，都可以溯源到紅八月，溯源到最初的幹部子女紅衛兵。當然，更遠可以溯源到《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破四舊是上海繼鬥鬼風後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於這兩個高潮幾乎相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個高潮。這兩個高潮一脈相承，對象全部都是被階級鬥爭理念政治分層出來的階級敵人或牛鬼蛇神。只不過鬥鬼風是在中央號召下的按照「黑幫」、「反動學術權威」標準的又一次政治分層，破四舊則是紅衛兵們對共產黨執政以來所有的革命對象和不信任對象的一網打盡。

與鬥鬼風一樣，上海最初的紅衛兵運動幾乎就是北京的翻版：抄家、破四舊。但是，總體來說，上海打人事件以及打死人的數目要比北京低許多。這與上海市民一向不崇武而崇說理的地域文化有密切關係；更與上海市委極力控制有關。北京紅衛兵自籌備成立始，就完全是體制外產物，不受各級黨委控制。而因為運動初期上海與北京的時間差，使得上海市委能夠盡量設法影響運動。從紅衛兵籌備成立開始，到最初的抄家行動，上海市委都盡力「加強黨的領導」，將運動處於自己影響之下，盡量減少其破壞作用。許多時候，當聽說哪裏發生嚴重打人事件，幹部們都會立即去現場勸阻和處理。這是上海紅衛兵最初的破壞力不及北京的原因之一。

紅八月催生了上海最初的紅衛兵，他們的批判指向與北京最初的紅衛兵完全一致；與北京最初的紅衛兵區別的是，他們有着明確的保衛對象——中共上海市委，加入他們必須承認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或必須接受上海市委的領導，這使他們被視為保守派組織。紅八月的諸多暴行，應該算在此時的紅衛兵頭上。而隨着中央決策層對文革對象態度的明朗和對造反派的堅決支持，上海的紅衛兵運動將很快分化，造反派紅衛兵迅速

崛起。到最後，上海紅衛兵中最頑固的保守派，基本只剩幹部子女，加上一些對文革打倒一切思維方式有看法的學生。他們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始終與文革格格不入。在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除了與造反派的摩擦外，更是很少參與運動。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被文革邊緣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對文革熱情的消退。

1966年11月之前的上海文革運動，只是對北京運動的追隨和模仿，沒有自己的原創，也沒有上海這樣一個全國最大工業和消費城市所應表現出的特點。上海的特點，一直要到工人造反派興起之後，才會顯現。

第四章

北京紅衛兵衝上海市委 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

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串聯

上海的紅八月破四舊，很快轉向對上海市委的批判。這是由北京來上海串聯的紅衛兵引發的。

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全國各地大中學生大批湧向北京，北京紅衛兵則去向全國各地，形成全國性大串聯。毛澤東支持大串聯，認為有利於將文革推向全國，說：「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¹ 上海是全國第一大城市，又地處北上南下交通樞紐。大串聯的學生，第一目的地北京，第二便是上海，此外，還有「革命聖地」延安、井岡山和韶山。上海和全國一樣，經受着大串聯的超負荷接待壓力。僅9月17日一天，就接待1.35萬餘人。² 而10月29日，上海站晝夜上下車的串聯師生達1.62萬餘人。³ 1966年12月12日統計，上海接待外地師

1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第 1439 頁。

2 以上材料均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83 頁，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這本史話的資料基本來源於文革中上海市委、市革委會、市總工會等機關的簡報或內刊，以及文革結束後對上海「四人幫餘黨」的清查檔案。原件藏上海市檔案館。

3 《上海鐵路志》，《上海鐵路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9 年 6 月出版。

生總量已達403.5825萬人次。⁴ 來上海最多的除北京外，更多來自上海附近華東六省，尤其是與上海接壤的江浙兩省。不少學校的中學生幾乎傾巢而出，整班級地來上海：上海周邊城市江蘇南通第三中學，學生們幾乎全部來過上海；浙江平湖中學一次就來上海二百多人，⁵ 這相當於四至六個班級。市委接待人員平均每天接待上百人，這批剛走那批又來，一天只能休息二三小時，實在疲憊不堪。市委一再增加接待人員，仍是人手緊張。

一般學生來上海主要是好奇，看看就走。但有些學生說上海運動冷冷清清，要發動對上海市委的批判。這些學生中以北京的學生對上海局勢影響最大。例如北京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從1966年9月來上海，參與了文革初期上海一系列大事件，直到1967年初才回北京。⁶ 還有北京航空學院(北航)、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科大)、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西軍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北京體育學院等外地大學的學生，都參與了上海1967年一月奪權的全過程。1966年8月15日起，少量的北京紅衛兵陸續來上海，到8月20日以後，來上海的學生迅速增加。北京紅衛兵自稱來上海串聯為「南下」，共有三次較大規模，後來被研究者稱為「北京紅衛兵三下江南」。

8月24日，二十多個北京紅衛兵乘火車來到上海，主要來自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北京郵電學院，還有一些北京的中學生。他們在火車上認識，起了個共同名字：「北京紅衛兵南下造反隊」。一個上海船舶專科學校的老師正好也在這列車上。他建議說，你們去上海後，可以住在復興中路的上海機器製造學校，那是一個中等專科學校，學校裏有學生因為反對校

4 《上海青年志》，上海青年志編纂委員會編，金大陸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5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83、84頁。

6 同上。

黨支部被壓制，你們去了可以支持他們。這批北京紅衛兵到了上海後就住進上海機器製造學校。其中，中國科大的幾個學生，仍沿用他們在科大時就使用的「齊衛東」戰鬥小組名稱。齊衛東後來參加了上海文革初期的大多數事件，在當時上海的文革運動中有相當影響，核心人物是中科大的學生許小昆和忻鼎亮。

8月26日，又一批北京紅衛兵一百七十多人乘火車向上海進發，這是自8月中旬以來人數比較多的一次。上海市委得知後，派出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張浩波、上海市學生聯合會主席郭醒民，前往車站歡迎。第二天上海《解放日報》報道歡迎會情景：北京紅衛兵一下火車，前往迎接的數百名上海紅衛兵便敲起鑼打起鼓，上前同他們熱烈握手，高呼「熱烈歡迎首都紅衛兵」，「向首都革命師生致敬」等口號。在車站候車室，李干成副市長代表上海市委向他們表示熱烈歡迎，希望他們「將文革的好經驗傳給上海師生」；北京紅衛兵代表也講了話，表示要「同上海革命師生一起奪取文革勝利」。北京紅衛兵向上海贈送毛主席石膏像，最後共同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但是，北京紅衛兵方面，對於市委組織的這個歡迎會一點也不領情。據北京紅衛兵以後散發的傳單說，當時是鎮江車站打電話給上海市委，說一批北京市委派出的紅衛兵正在去往上海，市委於是「匆匆組織」了歡迎會，「根本不是真心」。⁷而上海市委對這些來自北京的天兵天將也心懷防衛。就在歡迎會第二天，8月28日一早，市委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全市負責幹部會議，參加者一百多人，都是市委各部委、局負責人以及四清工作團團長和文化革命工作隊隊長。曹荻秋在會上說：北京紅衛兵「絕大部分是革命的，好的，少數人有偏激情緒，

7 傳單《鐵證如山罪責難逃！——三評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首都齊衛東 1966 年 10 月 13 日，新北大紅色造反聯軍新北大紅衛兵革命委員會印，1966 年於上海。

也有個別別有用心的人。說上海從市委到基層組織都爛掉了，要罷我曹荻秋の官。市委有缺點錯誤應該揭發，但就這樣下結論不正確」，「還有人片面強調造反有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要武鬥，不要文鬥」。曹荻秋要求各級領導「對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展開辯論」，要「大膽領導，敢於辯論」。⁸ 曹荻秋の這些話是他對大串聯の真實想法。他在以後講話中承認，自己始終想早點結束大串聯，認為革命靠自己，這樣下去文革搞不好，交通運輸搞不好，要影響生產。⁹ 曹荻秋對中央放縱北京紅衛兵の暴戾也有看法，曾私下對人埋怨說：「北京紅衛兵打死那麼多人，中央也不管管！」¹⁰

8月30日，又一批北京紅衛兵抵滬。他們一到上海，就要求上海市委領導接見。市委負責人當即分幾次接見他們。因要求接見の人多，曹荻秋經與陳丕顯商量，8月30日下午3時，在當時上海最大室內會場「文化廣場」開大會，歡迎來滬串聯の北京紅衛兵。8月24日來上海的那批學生也參加了這個見面會。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除不在上海的張春橋外，所有書記：曹荻秋、馬天水、王一平、梁國斌、楊西光、王少庸，全部出席歡迎會。110名上海交通大學紅衛兵擔任大會糾察。參加大會の北京紅衛兵約三千多人。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熱烈歡迎北京紅衛兵到上海革命串聯；曹荻秋向他們介紹上海文革情況，並回答他們的問題。因為提問多，曹荻秋建議將意見集中，推派代表與市委座談，一次不行，可以多次。

從曹荻秋の講話以及六個市委書記全部出席大會の規格，

8 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資料匯編第1集：《曹荻秋同志8月28日在全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新師大文革籌委會、物理系《五敢》聯絡部、化學系《挺進》兵團聯合翻印，新北大《叢中笑》戰鬥組印，1967年2月，上海。

9 傳單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10 同上。

可以看出上海市委對這批小將的重視。但這些在北京受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頻繁接見的紅衛兵，要求的不是接見而是對話，甚至是批評、批判上海市委。許多紅衛兵要求上台發言，馬天水將他們的條子遞給曹荻秋，曹即宣佈同學發言。紅衛兵上台發言訴說在上海申聯遭到阻力：一些大中學校的門房間傳達室說他們拿不出介紹信不讓他們進門，乘公共汽車售票員要他們買票，到處被上海人圍住要和他們辯論，他們想見市委領導十分困難，等等。他們質問：「中央撤銷工作隊的決定，上海為什麼不像北京那樣貼到街上去？」他們指責上海市委「為什麼把上海運動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在此之前的文化革命不算數，重新開始」，說《十六條》在上海「只剩下要文鬥不要武鬥」；說曹荻秋8月22日江灣體育場講話是大毒草，他們要將其送交黨中央和毛主席，等等。

北京紅衛兵對上海文革運動的指責是以北京的運動為參照的。此時在北京的各個學校，各級黨委權威不再，文革運動基本由學生掌控。而在上海，各大中學校的文革運動仍為黨委或黨支部控制，由黨委拋出運動對象，發動群眾寫大字報批判，這使他們覺得上海運動「冷冷清清」，覺得是偏離了《十六條》提出的「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從第二個發言起，紅衛兵們蜂擁而上，擠滿主席台，上百人手挽手；上海的工作人員一個個被趕下台，上台台下一片混亂。一些人圍住曹荻秋等市委負責人，有人要曹荻秋對常溪萍問題表態；有人要上海市委立即收回「臭十條」，即市委8月24日連夜制定的「不要隨便抄家」等十個「不要」；有人要六個市委書記依次報名字和家庭出身；還有人拿着紙，要曹荻秋寫出兩個「上海最大的資本家」的名字，說「讓我們北京紅衛兵鬥幾個資本家給你們上海人看看！」最後，紅衛兵們宣佈五項決議：

- 一、上海市委要在明天的《解放日報》上宣佈取消修正主義的「臭十條」；
- 二、命令北京來的非「紅五類」子弟滾蛋；
- 三、命令上海市委要允許上海「紅五類」同學去外地串聯；
- 四、組成大會臨時籌委會和北京紅衛兵上海聯絡總部；
- 五、在《解放日報》上刊登「毛澤東主義萬歲」等文章。

晚上8點半大會結束。「他們高唱着『造反歌』、『鬼見愁』等歌曲，亂哄哄地將六位書記擁出了會場」。¹¹ 北京紅衛兵初試鋒芒，將上海市委對他們的歡迎會，開成了他們對上海市委的批判會。曹荻秋說：「這是沒有預料到的，也無這種思想準備」。曹荻秋馬上於當晚召開市委常委會，研究市委遭到衝擊時如何開展工作，會議開到次日凌晨。最後決定，為了防止因紅衛兵衝擊而無法工作的局面，將辦公地點轉移到別處，共三項措施：1. 今後接待紅衛兵只接待少數代表；2. 將市委書記處搬到江南造船廠去辦公；3. 市委的書記們都搬到市委的一個招待所去住。¹² 曹荻秋還佈置調查一些北京紅衛兵們的背景，「查出是壞人，要告訴北京市委，以便整他們」。¹³ 但是，市委這次轉移工作地點的措施沒有持續多久，就被打電話來聯繫工作的周恩來發覺。經周批評，市委書記處只好又在一

11 以上資料全部引自傳單《八月三十日中共上海市委負責同志會見北京來滬革命同學大會紀實》，紅衛兵上海交通大學支隊《代代紅》第六大隊 110 個戰士 1966 年 8 月 31 日。

12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梁國斌 1967 年 3 月 31 日《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滔天罪行》。這份鉛字排印的發言稿沒有顯示編印單位，但從其編排上看，應是 1967 年 3 月的一次批判上海市委大會或批判陳丕顯、曹荻秋大會的發言稿，由大會籌備處編印。

13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個半夜搬回康平路。這些措施以後也遭批判，說市委為逃避紅衛兵轉入地下，是抗拒文革。¹⁴

「炮轟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沒有料到事態的發展完全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第二天，8月31日上午10時，北京101中學、北京師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學校、北京師大女附中三十多個學生來到延安西路200號大聲呼喊，要見上海市委領導。北京紅衛兵說，昨天紅衛兵在文化廣場宣佈的五條決議市委沒有執行：「十分鐘之內把曹荻秋找出來，否則要動武了！」在一旁圍觀的上海市民上千。延安西路200號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大樓，但門口沒有牌子。北京紅衛兵在這裏引發事件後，上海市民們才知道原來這裏就是上海的中心樞紐中共上海市委。中午12時左右，北京紅衛兵衝進機關大院。由於受到市委機關工作人員的阻攔，雙方發生衝突。這後來被稱為「8.31事件」。從市委51個工作人員撰寫的一份傳單中可以生動地感受當時的情景：

曹荻秋正在接見另一批北京來的學生，於是就讓兩名自報「我們是代表」的學生進去，市委常委、副市長宋季文和市委常委、監委副書記秦昆立即接見他們，問有什麼要求，兩人不回答，只是要求門外的同學一起進來，還用拳頭打宋季文。一會兒，他們退了出去，向門外喊叫：「市委不肯接見你們！」於是一部分學生向大門裏面衝。在旁圍觀的一些上海人攔住他們不讓進去，讓他們有話到一邊的接待室去說。爭執了半個多小時，中午11時左右，天上

14 梁國斌《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滔天罪行》，原文無印發單位，但從其編排上看，應是1967年3月的一次批判上海市委大會或批判陳丕顯、曹荻秋大會的發言稿。

下起了雨，市委同志十分關心他們的健康，要他們進大樓避雨。沒等玻璃大門全部打開，幾十個紅衛兵一擁而上，一個佩戴「北京機械學院」校徽的女同學衝在最前面，用拳頭擊碎大門玻璃。他們衝進大樓，遇到阻攔他們的工作人員，便拳打腳踢，或者用皮帶抽打。那個打碎大門玻璃的女紅衛兵還舉着被玻璃划破的手高喊：「上海市委幹部打人！」¹⁵

北京紅衛兵也撰寫了傳單，現場描繪稍有不同：

我們先派了一人進市委大樓聯繫，一去不返。我們見中央領導同志，見毛主席都沒這麼難。8.18的大會上，我們紅衛兵齊喊「我們想見毛主席」，毛主席就出來見我們了。上海架子為什麼這麼大，門檻這麼高？我們要求派兩個代表，不行！最後還是上海的革命群眾使了好大勁，硬給推了進去。見到宋季文，要求接見全體代表，他只說了一句話：「沒有那麼大房子，不能接見」。難道這麼大一個市委大樓裝不下我們30多人？兩個代表哭着出來把這一情況告訴我們。正下着大雨，我們下決心不見市委不回去，淋着雨齊喊：「我們要見市委！我們要見市委！」許多市委的人從窗口探出頭來往下看，但沒人出來。門口守衛的上海紅衛兵挽着胳膊，使勁推我們，想把我們擠走。¹⁶

衝擊市委辦公大樓的北京學生中，絕大多數只是剛上初一、初二的14至15歲少年。他們與上海市民辯論的話題是：

15 傳單《關於8月31日一群學生衝進市委機關的事實真相》，市委51個工作人員，1966年9月1日。

16 傳單《致上海全市革命同志》，首都北京師大女附中、北京101中學、北京政法學院附中、新北大，北京航空學院、新北大附中、中國科技大學、北京121中、北京示範大學、上海和平中學，上海復旦大學部分紅衛兵，1966年9月9日。

「真理是否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以及「懷疑一切」口號是否革命，紅色恐怖和血統論是否正確。他們對上海運動最大的不滿就是「上海運動冷冷清清」。就在幾天前，8月23日，毛澤東還在中央會議上主張再亂他幾個月。毛對各省市無能招架紅衛兵的情況不以為然，說「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8月以後的北京，一片抄家打人之風，一派「炮打」、「火燒」之勢，各大中學校領導層基本癱瘓，新改組的北京市委也運行艱難，而毛在這個講話中說：「我看北京還亂得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¹⁷

儘管都對上海的文革運動有看法，但相比中學生，北京一些南下大學生的觀點和批判方向有所不同。來上海的中學生，其實沒有什麼明確目標。他們不滿的是上海對牛鬼蛇神太客氣，文鬥變成「溫鬥」，他們的目標還在共產黨十七年的革命對象上。但是，一些北京的大學紅衛兵的觀點有所不同。他們對血統論並不熱衷，他們不滿的是上海運動「沒有真正開展」。前面提到的中國科技大學的「齊衛東」，他們住進上海機器製造學校後，曾去附近學校和工廠串聯。上海機器製造學校、上海海關學校、上海第二女子中學，都曾有他們活躍的身影。他們去這些學校支持和鼓勵因造黨委反受到壓制的學生或派別。他們還去一些文藝單位串聯，例如上海青年話劇團、黃浦京劇團、上海舞蹈學校等。這些單位都有因提意見而受領導壓制的情況。他們支持受壓制者，向社會呼籲。他們人數少，能量大，活動能力強，早期上海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就是他們放大至社會，引起廣泛關注。例如青年話劇團的「劉貴琴事件」，黃浦京劇團的「孟慶釗事件」，上海舞蹈學校對芭蕾舞劇《白毛女》評價的「毒草、香花之爭」，上海海關學校、上

17 毛澤東 1966 年 8 月 23 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海機器製造學校的兩派之爭，還有被單位壓制的青年報社記者游雪濤的平反，都與他們的奔走有關。他們認為，上海的文革運動還是在各級黨委掌控之下，文革就是要打亂這種秩序。因為《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上海的各級黨委包括市委，卻沒有把自己當作革命對象。基層黨委不敢引火燒身，是因為市委對運動的導向有問題，這使上海運動冷冷清清。他們認為，各級當權派都應接受文革考驗，所有幹部都應接受群眾的火燒和炮轟，是真金不怕火燒。一個當初參加衝擊上海市委的齊衛東成員二十多年後回憶說，他們那時就是想「炮轟」一下上海市委，看看上海市委的反應，有問題沒問題先「炮轟、火燒」一下，「是革命的炮轟不倒，不革命的會炮轟出問題」。¹⁸ 他們的目標，和毛澤東的文革目標完全一致。

《我們老工人要講話》

上海市民對北京紅衛兵在上海行為的最初了解，大概就是通過上海市委工作人員的那張大字報。9月1日，這張題為《關於8月31日一群學生衝進市委機關的事實真相》的大字報，被連夜印刷成傳單貼遍上海。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機關大樓消息傳開，越來越多的人湧往延安西路。許多人是來支持北京紅衛兵的，其中既包括陸續來到上海的北京紅衛兵，也包括與北京紅衛兵持同一觀點的上海學生和工廠工人，如以後成為工人造反派領袖的王洪文、潘國平等人。更多人則是來與北京紅衛兵辯論的。辯論的核心是：上海市委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上海市委對上海文革運動的領導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時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已經由北京紅衛兵傳到上海，抄出貼在市委門前。北京紅衛兵提出，對上海市委也要炮打，只有經過炮打，才能辨出市委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司令部。

18 筆者 1992 年對原中國科技大學學生欣鼎亮的訪談。

許多上海市民不同意北京紅衛兵的觀點，認為上海市委過去在柯慶施領導下，取得很大成績；這次姚文元文章又在上海撰寫和首發，證明上海市委緊跟毛主席。毛主席提出的是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上海市委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不應該炮打。北京紅衛兵指責上海運動冷冷清清，指責上海市委對他們不熱情。上海市民反駁說：「我們的副市長親自去火車站接你們，難道不算熱情嗎？」延安西路市委大樓門前擁擠着上萬人，這條寬敞的馬路如今水洩不通，成了上海的政治中心。有單位還在市委門前搭起辯論台，大樓不遠處的靜安公園，也被闢為辯論場所，貼滿了大字報，從早到晚人頭攢動。上海市民拉住每一個說普通話穿軍裝的學生模樣的年青人，把他們認作北京紅衛兵，要和他們辯論。以後成為工人造反派的潘國平去看熱鬧時，曾因為說普通話，被認為是北京學生而遭圍攻。

這場辯論實際是上海市委默許甚至引導的。曹荻秋以後承認：

當上海工人、學生同北京學生開展辯論時，我們很贊成這種辯論，還佈置過一部分幹部參加辯論。這種所謂辯論，實際上是一種圍攻，有些地方圍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紅衛兵不放，有的要他們檢查了他們的所謂錯誤觀點以後才放走。¹⁹

市委辦公大樓附近馬路兩旁大字報欄上，貼滿支持上海市委的巨幅標語：「上海市委挺起腰杆堅強地戰鬥吧，我們信得過您」；「上海市委是馬列主義的」，「上海市委是堅定正確的」；「誓死保衛上海市委」，等等。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與紅衛兵「炮轟上海市委」、「上海必須大亂特亂」的大標語大字報針鋒相對。這些保衛上海市委的大字報中，最有影響的是國棉二廠署名「退休工人和老工人」的《我們老工人要

19 曹荻秋《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講話》，以及國棉一廠工人、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楊富珍²⁰等《給毛主席的急電》。

《我們老工人要講話》反對北京紅衛兵「炮轟」上海市委：

過去帝國主義炮轟過我們，蔣介石反動派炮轟過我們，美帝國主義現在正在炮轟越南兄弟，現在竟然有人要炮轟起上海市委來，他們算是什麼人？只有階級敵人才這樣幹！我們對黨有深厚感情，我們堅決不答應。炮轟市委是十足的反動口號。²¹

楊富珍等《給毛主席的急電》則為上海市委評功擺好：

我們上海工人對上海市委最了解、最清楚，上海市委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市委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首先發動了對反黨反社會主義、修正主義黑幫黑線的批判，吹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角。²²

20 楊富珍，女，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小學，文革前是上海國棉一廠擋車工人，全國先進生產者，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在1966年樹立的4個「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之一，中共黨員。文革中歷任工總司常委，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普陀區委書記兼普陀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全國婦聯第四次代表大會籌備組副組長、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共十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後任中共徐匯區區委書記、中共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楊富珍當時是上海國棉一廠紡織工人，上海市委1966年4月樹立的四個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之一，另外三個標兵是復旦大學電光源實驗室的工人工程師蔡祖泉、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的紅雷青年小組，以及上海海運局客輪服務員楊懷遠。當時正值林彪提倡「大學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上海市委也跟着樹立上海地區的典型。

21 傳單《我們老工人要講話》，上海國營第二棉紡織廠退休工人和老工人等36人1966年9月2日。

22 傳單《國棉一廠工人楊富珍等給毛主席的急電》，上海國棉一廠工人楊富

兩張大字報都用工整的大字抄寫，貼在市委大樓門前。為防止被雨水打濕，特地蒙上透明塑料布。大字報還被印成傳單，不但在上海廣為散發，全國其他城市也都有傳抄翻印。此類「急電」當時很多，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幾個老工人也給中央發過電報，抗議學生衝市委。

1966年9月上海市委門前的大辯論，表面上是上海市民與北京紅衛兵辯論，實際上是上海市委與北京紅衛兵的辯論。上海市委不同意北京紅衛兵對自己的指責，但又不便正面辯駁，便希望上海市民尤其是工人出面。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曹荻秋8月底至9月初在各種會上曾多次表示：

各級領導，如工作隊要大膽領導，敢於領導辯論，要組織力量；

上海市委的問題，上海的工人階級、革命師生、上海的群眾最了解；

共產黨員要挺身而出，敢於講話；

要加強領導，把左派力量組織起來。先把好的黨員、支部書記、教師組織起來，要形成一股強大的抵抗力量；

不能崩潰下來，要頂住這個浪頭，如果市委跨了，你們也不好受。²³

基層工廠的黨委或工作隊，組織了許多黨員和老工人去市委門前保衛市委，與北京紅衛兵辯論。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駐廠文化革命工作隊先後組織四批共七百多人，由工作隊幹部帶隊去延安西路；被組織前往的工人一律算公假；去前還關照這些工人，若有人問起，就說是自發去的，不是被組織去

珍等 12 人，1966 年 9 月 4 日晚 12 點。

23 以上曹荻秋講話均轉引自傳單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的。為防止被問及所在工作單位和職務，有的人連工作證都不帶。²⁴ 當時的市委副秘書長杜淑貞，文革結束後在回憶錄中承認，說自己當時曾經「通知滬西幾個大廠的工人前往保衛市委」。²⁵ 曹荻秋也曾經承認，那些去市委門前保衛市委的工人確實有不少是市委讓下面組織去的：

大約有三、四千人及紅衛兵，主觀上恰恰想防止衝突防止意外，這樣做實際上把工人與紅衛兵處於對立地位。²⁶

他們要進入舊市委機關，我們應該敞開大門歡迎他們，我們不但沒有這樣做，相反，以保持機關工作的正常進行為理由，採取了「堵」的辦法，組織了一批工人、紅衛兵、文藝工作者和幹部來「保衛」舊市委機關，在書記處辦公地點還組織了公安局的警衛人員「保衛」。因而使在舊市委門外的革命群眾幾天幾夜不能進入市委機關，淋了雨，有的同學生了病，有的在衝舊市委機關時受了傷。我們在「堵」的時間內，乘機搬走了檔案，怕群眾將它損害。我們這些行為，十足說明我們害怕群眾，不是站在革命群眾一邊，而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對他們實行防禦抵制。²⁷

9月1日，負責教育口的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向市委報告，說復旦大學支持北京紅衛兵觀點的學生，要組織一萬人，包圍

24 傳單《揭露以施惠珍為首的市委工作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國棉17廠《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1966年1月8日，哈爾濱軍工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紅色造反》戰鬥隊1966年12月8日印。工總司成員王腓利在與他2009年3月21日的回憶中也說「我聽我們廠的政治處副主任對這些老工人佈置說：『到了那裏，如果有紅衛兵來問那麼怎麼會來的，你們一定要說是自願來的』」。

25 杜淑貞《春陽秋雨話平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

26 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資料匯編第1集：《曹荻秋同志1966年11月15日作中央工作會議傳達報告（記錄稿）》。

27 曹荻秋《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市委在延安西路33號辦公大樓和康平路的辦公處。市委聞訊立即從各工廠調來上萬工人，守住附近道路，防止學生再次衝入市委辦公大樓；甚至還調動了部隊和公安人員。不過，後來證實所謂萬人包圍市委消息純屬誤傳。²⁸ 為此，曹荻秋不久後在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查，回上海後也多次在幹部會議上或群眾中承認錯誤，曹荻秋說市委當時的這些做法是因為害怕群眾。

市委門前反擊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大都是基層工廠或主管局、公司的幹部組織撰寫或暗示撰寫。而那兩張廣為人知的大字報：《我們老工人要說話》和楊富珍《給毛主席的急電》，更是由市委的一些幹部直接出面組織。《我們老工人要講話》是國棉二廠的黨委組織的，由黨委秘書起草；²⁹ 楊富珍《給毛主席的急電》是駐廠工作隊向在廠蹲點的上海市副市長張承宗請示，張承宗又請示市委書記陳丕顯，得到陳同意後組織撰寫，經陳丕顯同意後發出的。³⁰ 對此，楊富珍後來揭發說：

我以無比憤怒的心情揭發陳丕顯、曹荻秋兩個大壞蛋利用我們工人的名義欺騙毛主席的罪行。去年九月底，北京紅衛兵小將來上海造舊上海市委的反。陳丕顯、曹荻秋等怕得要死，就通過當時在各個工廠裏的原市委工作組要我們

28 梁國斌《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滔天罪行》。

29 《我們老工人真正要講話》，刊於1966年12月28日上海《工人造反報》。

30 傳單《揭開「楊富珍急電」的內幕……戳穿上海市委一手策劃的大陰謀》，中國人民大學紅色野戰軍，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縱隊，上海第一醫學院「環球赤」紅衛兵，上海中學「鋒芒」戰鬥隊，上海閘北十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敢闖」戰鬥隊，上海回民中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上海粹文中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鋼鐵縱隊」，國棉一廠半工半讀學校紅衛兵「九一八」戰鬥隊聯合戰鬥兵團，1966年12月16日。此外，市委另一個書記馬天水在1967年3月2日一次批判陳、曹大會上中也揭發說是張承宗得到陳丕顯的同意後組織撰寫的。

勞動模範、五好工人打電報給毛主席。電報稿子是工作組起草的，要我們工人簽字。³¹

黑市委抓住了我奴隸主義的這個弱點，一手炮製了欺騙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給北京紅衛兵小將們施加政治壓力的《急電》。這封《急電》起了保市委，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作用；這封《急電》是黑市委推行劉、鄧路線的產物，它流毒全國害人極深！對毛主席、黨中央及北京紅衛兵小將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³²

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的電報，是駐廠工作隊的秘書，組織幾個老工人撰寫。³³筆者前文所引的一張市委51個工作人員寫的《關於8月31日一群學生衝進市委機關的事實真相》，是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提議，市委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勵敏之和黨委宣傳部的幹部執筆，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楊西光親筆修改的。³⁴成稿後，立即抄寫成大字報貼出，並連夜印成傳單，第二天由市委辦公廳機要交通科送往各部委、各區縣局黨委以及各大學。³⁵這張傳單在當時影響極大，許多大學生和工

31 楊富珍在1967年4月7日批判陳丕顯、曹荻秋大會上的發言，載於《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1967年4月13日聯合編輯的《大會特刊》聯合版第5期。據這份《大會專刊》報道，楊富珍在發言時，「對一小撮階級敵人的極端仇恨，使她在發言中氣憤得講不出話來」。

32 轉引自「紅衛兵上海司令部」主辦的《紅衛戰報》1967年3月18日《毛主席的好工人、勞動模範的好榜樣楊富珍同志造反了》。

33 《上棉十七廠文化大革命事記》，上棉十七廠1975年編寫。

34 徐景賢在1966年12月18日市委機關聯絡站造反大會上的發言：《造反才知主席親》。載於1966年12月18日《大會特刊》，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合編。

35 傳單《上海市委破壞文化大革命罪責難逃——徹底批判市委51個工作人員大字報〈關於八月三十一日一群學生衝進市委機關的事實真相〉》，紅衛兵華東紡織工學院革命委員會「紅色爆破手」，1967年1月11日。這張傳單中，說51個工作人員大字報是市委辦公廳秘書長兼市委直屬機關黨委書記劉夫暢，讓吳玖儀起草的，成稿後，副市長宋季文以及市委辦公廳領導看過。

人們就是看了這份傳單後，趕往延安西路保衛市委。這張傳單後來被作為市委反對北京紅衛兵的鐵證。

上海市委雖沒有直接佈置下面撰寫大字報，但市委領導幹部的一些講話，卻有意無意暗示或鼓動下面的幹部去組織這類文章。下面幹部以為是在支持市委，但不久以後，這些大字報大標語讓曹荻秋們檢討了無數遍。

那些最初在市委門口保衛市委的工人，是以後上海工人保守派的雛形。

上海市委門前的工人造反派

在上海市委門前的人山人海，除了去保衛市委的工人們，還有不少同情北京紅衛兵的上海工人，這些人中，許多成為以後的工人造反派，最著名的有王洪文、潘國平。不過，他們那時還是旁觀旁聽者。另一些同情紅衛兵的工人們也在市委門前結識。9月4日上午9時，復旦大學、華東紡織工學院、上海外國語學院、愛國女中等十幾個上海學校的紅衛兵，以及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良工閥門廠和上海一家麻紡廠的工人，21個單位共四十多人，在地處上海西區的華東紡織工學院，召開「革命造反派大串聯會議」，那裏是市委最早安排的來上海串聯的北京紅衛兵住宿地。會議由復旦大學紅衛兵周谷聲主持，他向工人們介紹了市委大樓門口的衝突情況。周谷聲不久後成為上海最有影響的三大紅衛兵組織之一「炮司」的負責人。這是周谷聲第一次組織紅衛兵與工人的聯席會議，以後他還將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初期的一系列重要活動中起重要作用，包括推動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第一個自己的全市性組織「工總司」。

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的工人鄭三騰，在會上提出要建立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要求聯合起來的最初呼聲。會議開到中午，突然，一個復旦大學紅衛兵

帶來緊急消息，說北京紅衛兵在上海市委大樓門前被打。會議被中斷，一部分人回原單位搬援兵，大部分人急忙趕往市委大樓。到了市委大樓門口，只見人山人海，怎麼也擠不進去。他們便退到市委附近一幢小洋房裏，草擬一份給曹荻秋的最後通牒，提出六條要求。³⁶ 儘管這份《最後通牒》內容全都圍繞着紅衛兵，沒有一句提到工人造反派，但它是有文字記載的上海工人造反派與學生紅衛兵的第一次聯合行動。

那幾個上海鐵路裝卸機修廠工人，都是剛從技校畢業分配進工廠的青年，當時也只20歲左右，除了鄺三騰，還有兩個青年工人周國庭和陸雲龍。他們是在市委門前看熱鬧時與北京紅衛兵熟悉的。北京紅衛兵要往市委大樓門裏衝，鄺三騰說，市委在門口設了六道防線，進不去，自告奮勇要帶他們「到一個比市委還要大的機關去」。鄺說的是高安路19號的中共中央華東局辦公處，也不對外掛牌，所以一般人不知道。鄺帶領一百五十餘名北京紅衛兵來到那裏，衝破門衛阻攔，進入大院，要求用電話與北京中央文革小組聯繫。電話接通後，紅衛

36 傳單《最後通牒——給曹荻秋》，上海交大、復旦、師院、同濟、同濟附中、華紡、科大、一醫、上海教育學院分院、鐵醫、愛國女中、良工閥門廠、上海鐵路局機械修理工廠革命造反派聯合小組啟，1966年9月4日下午4時，新師大物理系「五敢」聯絡部翻印，1966年12月13日。內容如下：

- (一)要曹荻秋公開接見全體革命學生和群眾，對拒不接見北京紅衛兵一事公開向他們道歉。
- (二)公開承認北京紅衛兵昨天到今天的靜坐行動是革命行動，公開向北京紅衛兵，特別是被打的紅衛兵道歉，並給與治療和保護。
- (三)開動上海所有宣傳機器，公開為一系列有關北京紅衛兵「鬧事」之事辟謠，並大力宣傳當前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四)公開承認「火燒市委」、「炮打市委」的口號是革命的口號，「保衛市委」是極端錯誤的，「曹荻秋萬歲」的口號是反動的口號。
- (五)迅速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歡迎北京紅衛兵，會場由我們革命造反派組織掌握，票子由我們分發。
- (六)要求曹荻秋在今晚九點以前給與答覆。
不達目的，我們誓不甘休！否則產生一切嚴重後果由上海市委負責！

兵與北京足足通了兩小時話。晚上9點，有人來告訴北京紅衛兵，曹荻秋馬上在市委大樓接見，要他們立即趕去，華東局專門準備了三輛汽車送他們。鄭又站出來大聲說：「同學們，不要去！這是欺騙，華東局不可信，進去就出不來了！」³⁷ 華東局辦公廳一個幹部對北京紅衛兵說：「你們中可能混有不是學生的上海人，有政治扒手。」他可能是從鄭等人普通話中露出的上海口音產生懷疑的。一百五十多個北京紅衛兵來自不同學校，相互之間不太熟悉，便馬上按各自的學校站隊，鄭等人於是被剔出來。紅衛兵問鄭出身成份，鄭說自己是受壓制工人，在工廠是反對工作組的。一個華東局幹部擠進圍觀人群大聲宣佈，他剛才已經打電話去他們工作的工廠黨支部了解過了，這三人平時表現就不好，有的還偷過東西。³⁸ 紅衛兵當即從鄭身上搜出一份鄭自己寫的檢討，是關於在中央商場偷尼龍襪子和在41路公共汽車上偷女乘客皮夾子的第四次檢討。這下「扒手」無疑。³⁹ 鄭當場遭毆打，一邊圍觀的機關幹部也都一片叫打，為打人的紅衛兵助陣。⁴⁰ 北京紅衛兵將這三人交給了在南洋模範中學的紅衛兵，然後乘車趕去市委大樓見曹荻秋。三人被南模的紅衛兵直打到深夜；第二天，又把他們押回廠，繼續毆打，接着關押了一個多月。

周恩來的三點指示

曹荻秋第一次接見北京紅衛兵遭到圍攻後，便決定只接見代表。據說，這是陳丕顯的主張，他要曹不再出去接見北京

37 以上資料都引自傳單《揭開「上海工總司」的一張王牌》，首都南下「衛東」兵團戰士尚葆、穆夏、華明等13人，1966年12月4日。

38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他當時在場，是目睹者。

39 傳單《揭開「上海工總司」的一張王牌》。

40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他當時在場。

紅衛兵；讓工人來保衛市委也是陳丕顯的意思。⁴¹ 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市委書記陳丕顯正在病假中，市長曹荻秋主持工作。曹每天都向陳匯報，多時一天匯報幾次。而就在9月2日，有消息從北京傳來，說毛澤東針對全國各省市都出現的圍攻去串聯的北京紅衛兵現象發話：「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陳丕顯和曹荻秋看樣沒有理解，毛澤東的講話其實就是針對他們這些省市幹部的。

9月3日深夜至9月4日凌晨，曹荻秋在延安西路200號市委辦公大樓附近的靜安區文化館，與六名北京紅衛兵代表見面。代表們提出三項要求：曹荻秋接見在市委門前的所有北京紅衛兵；上海市委借給廣播器材，提供印刷傳單的條件；幫助接通給中央文革的電話。⁴² 曹荻秋沒答應前兩條，解釋說不開大會但開小會接見；廣播印刷器材各單位都想要，給了北京紅衛兵不給其他人擺不平；對最後一條，市委馬上提供方便，讓紅衛兵用紅色保密直線電話和中央文革通話。

曹荻秋不願接見所有的北京紅衛兵，引起北京紅衛兵憤怒，他們一定要曹荻秋接見全體人員。上午，聚集在市委門前的紅衛兵增至近千人，其中還有不少上海學生。他們成立臨時指揮部，設立廣播台，幾次發出最後通牒，要曹荻秋「滾出來！」紅衛兵們一次又一次向市委辦公大樓衝擊，和門口保衛市委的工人們發生衝突。中午，他們踏着人梯，打碎市委大樓臨街玻璃，爬進二樓，終於衝上樓頂，插上大旗，歡呼「我們勝利了！」

就在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之際，傳來消息：中央接到

41 馬天水 1967 年 3 月 23 日《我的揭發》，載於《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專刊，《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聯合版。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42 傳單《黃浦江畔並不平靜——目睹上海「9.3」事件》，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戰鬥隊，1966 年 9 月 12 日。

北京紅衛兵從上海打去的電話，立即給曹荻秋接連打了兩個電話，要他馬上接見北京紅衛兵。⁴³ 9月4日晚上9點半，曹荻秋會見在市委內的全體北京紅衛兵，發表講話，雖然表示歡迎揭發上海市委的問題，但實際還是不同意對自己的指責：

市委如果是修正主義，完全可以造它的反。但是上海市委的問題，上海的工人階級、革命師生、上海的群眾最了解。（長時間起哄）因此，上海工人、農民、革命師生你們大膽地揭發上海市委的問題，北京的同學你們對上海市委有意見，我們也表示歡迎。北京來的同學來上海後曾經對文化革命產生若干問題，產生了不同意見，並產生了辯論，這個不同意見的辯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⁴⁴

9月5日凌晨3時20分，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從北京來電話傳達周恩來三點指示：

- 一、同意給廣播器材；
- 二、已告訴曹要他接見北京紅衛兵；
- 三、周總理已給曹打電話，要求他將包圍北京紅衛兵的工人、學生全部撤走。⁴⁵

曹荻秋遵照周恩來要求辦了。9月5日上午，市委勸說簇擁在市委大樓門口的上海市民退開，讓紅衛兵們進入大樓。下午近6時，進入市委大樓的紅衛兵開會，要曹荻秋到場。曹荻秋到

43 傳單《黃浦江畔並不平靜——目睹上海「9.3」事件》，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戰鬥小隊，1966年9月12日。

44 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資料匯編第1集：《曹荻秋同志1966年11月5日作中央工作會議傳達報告（記錄稿）》。

45 傳單《黃浦江畔並不平靜——目睹上海「9.3」事件》。

會並講話，歡迎大家揭發市委問題，並呼籲團結。聚集在大樓外的上海市民要求收聽會議實況，否則也要強行進入大樓，和北京紅衛兵辯論。經學生同意，市委在門外臨時架起了幾個大喇叭，向外廣播會議實況。天上下起了秋雨，越下越大。一個在場者後來回憶：上海市民對市委由衷關切，場面令人震撼：幾萬市民，大多數都沒有帶雨具，黑壓壓一大片人群，就那麼一動不動地在雨中站立着，靜靜地、關注地聽着頭頂上喇叭中傳出的每句話。⁴⁶ 晚上8點，會議結束，市委用二十輛大客車將北京學生送回住地。

9月6日，市委在辦公大樓門口張貼出「市委熱烈歡迎革命群眾炮打司令部」大字報，要求全市幹部和群眾不要再貼「保衛市委」、「市委是正確的」一類大字報；並要求各基層組織代抄成大字報，在工廠、學校、機關中張貼。市委還檢討自己組織工人保衛市委機關大樓的做法，「實際上是使工人介入了學生運動，是錯誤的」。⁴⁷

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一開始，上海市委還十分有底氣，因為周恩來支持上海市委。據陳丕顯以後回憶：「此時，周恩來來電指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對上海市委表示了明確支持。心直口快的宋季文副市長很快把這一指示傳達給了北京學生。」曹荻秋也將這話對上海許多幹部說過。⁴⁸ 曹荻秋還多次對紅衛兵們說「總理是打電話給我說過上海市委是正確的」。但是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委的衝突升級後，紅衛兵傳單中說：「總理曾明確回答來問此事的北京紅衛兵：『我怎麼會講這種話？宋季文歪曲我的意思，你們可以駁他』。」周恩來說他當時說的是：「上海過去是革命的，現在也要革命的。」顯然，

46 這個情景是當時在場的蕭木，文革後對筆者回憶描述的。

47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75 頁。

48 陳丕顯著《陳丕顯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周恩來改了口。⁴⁹而據張春橋文革中的一次講話，周恩來甚至對上海市委的做法十分生氣：

那天5號早上，我到這裏，總理一見到我就對我說，你看上海怎麼搞的！總理很不滿意。很多北京紅衛兵一見總理就問，總理不知解釋了多少遍。對一個問題也有一個認識過程，因為運動以前，上海是做了一些成績，在柯慶施同志的領導下，中央是有一定評價的。總理是因為北京學生不了解情況，給他們講一講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要他們調查一下。但是怎麼能夠吹呢？是革命的也不一定是正確的。既然是革命的，人家紅衛兵來了為什麼連見一見都怕得要死呢，特別是宋季文講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問題，我和姚文元聽了都氣死了！其實《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有成績、有錯誤與宋季文一點都沒有關係，他有什麼可吹的？只要沾一點邊，好像就和他們關係密切得不得了，就吹起來了。⁵⁰

上海市委以周恩來的話保自己，結果適得其反，周恩來發火。曹荻秋只能檢討：「總理來了電話，講了一些話，我作為上海市委的負責人是不能講的，宋季文講了，是錯誤的，不對」。⁵¹上海市委貼出「市委熱烈歡迎革命群眾炮打司令部」

49 傳單《評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首都「齊衛東」1966年12月2日。

50 張春橋1966年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上海紅革會及工總司代表時的談話，載於《反到底》1967年1月8日，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編輯部編。又據徐景賢逝世後，他家人編輯的《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中提及：他1969年3月到北京參加中共「九大」時，曾經當面詢問周恩來此事，周答：「我是說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因為當時它畢竟領導過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嘛，但我決沒有說過上海市委是正確的，因為誰都犯過錯誤，連我都犯過錯誤。怎麼能說自己是正確的就不能接受群眾的批評呢？」

51 傳單《評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大字報，但這個引火燒身的舉動並沒有取得主動。更對上海市委乃至全國各地省市委不利的是，9月7日，毛澤東批轉文件，明確規定「不准調動工農干預學生運動」，⁵²還要報社寫社論：

林彪、恩來、陶鑄、伯達、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請一看。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北京就沒有調動工農整學生，除人民大學曾調六百農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沒有，以北京的經驗告地方照辦。

譚啟龍和這個副市長的意見，我看是正確的。請你們商議一下，酌定政策。⁵³

9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轉述了這一意思。不過，上海市委顯然仍然沒有真正領會毛澤東的意思。就在這篇社論出來的前兩天，9月9日，市委召開全市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五好工人和老工人、青年工人五千人代表大會。曹荻秋在會上還說，北京紅衛兵「裏面混進了一些壞人，上海一些壞人也混進去了」，「如果承認他們衝進市委是革命的，那他們反過來就講我們是反革命」。對於上海市民與北京紅衛兵在市委門前的辯論，曹荻秋表示：「工人貼保衛市委的大字報，心情我們是理解的，因為你們對市委是了解的，你們是最清楚的」，「有的說市委有問題，有的說沒有問題，可以擺事實講道理嘛！只

52 這個文件是《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毛主席關於不准挑動工農兵干預學生運動的決定》，中發〔66〕468號，1966年9月11日。

53 毛澤東 19660907 關於不准調動工農干預學生運動的批語，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許他們這樣講，不許我這樣講，那也不行。」不過，曹荻秋也知道自己這種情緒，會被說成是對文革的抵制，所以他在大會一開始，就要求到會者會上不要做記錄，會後不要以市委名義向下傳達，但可以「用自己的口氣往下講」。⁵⁴

市委並希望中央能夠出面，將這些攪得上海不寧的紅衛兵召回北京。就在貼出歡迎炮轟大字報的同時，曹荻秋以及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一再與國務院副總理陶鑄通電話：「現在形勢很緊張，再搞下去實在頂不住了」。市委被打倒後，有幹部揭發說，陶鑄當時回答：「你們再頂五天行不行？至多再頂七天到十天，以後就要轉了」。曹荻秋表示：「再頂七天，已經非常吃力了！」曹荻秋後來對一些幹部說：

北京傳來消息，國慶後運動要轉了，要抓整改，抓生產了。國慶以後中央各部的司、局以上幹部，一律停止鬥爭，不然工作和生產就沒有人抓了。⁵⁵

曹荻秋可能是從陶鑄那裏聽來消息，因為那一時期他與陶鑄聯繫最多，從上下級關係說，他也應該同陶鑄聯繫。而陶鑄為什麼會這樣預測形勢，估計是因為中央決定在10月初召開工作會議。但是，形勢發展並不如陶鑄所料。曹荻秋被打倒後，被迫為他對待大串聯和北京紅衛兵的態度作檢討：

去年8月下旬首都紅衛兵陸續到上海進行革命大串聯，當他們進行革命的宣傳活動和各種串聯活動的時候，我就對他

54 以上關於9月9日大會的情況，均引自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在1967年4月6、7日召開的批判陳丕顯、曹荻秋大會上的發言《陳丕顯、曹荻秋是「赤衛隊」的後台大老闆》；載於《大會專刊》1967年4月13日聯合版第5期，《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聯合編輯。

55 曹荻秋《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們抱着極大的反感，認為他們言論偏激，行動粗暴，懷疑他們當中有別有用心的人作怪，我並因此佈置過查他們的歷史，查出是壞人，要告訴北京市委整他們……

我對大串聯一開始就抱着懷疑態度，懷疑大串聯究竟有多大好處……錯誤地認為大串聯影響了本市各單位的鬥、批、改，影響了交通運輸，影響了生產，把上海搞亂了，發展下去會天下大亂。因而總想早點結束大串聯，不斷向中央施加壓力，要求停止省市之間的大串聯。⁵⁶

這些話應該是曹荻秋的心裏話。

北京紅衛兵第二次南下

北京紅衛兵第一次南下，遭到上海市民抵制。他們宣揚的血統論和紅色恐怖論，尤其引起一向溫良的上海市民反感，甚至同樣擁護階級路線的上海的幹部子女們，也大多數不贊成他們的極端觀點。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民最初的辯論，就是從那副著名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而起。他們給上海市民留下的印象是滿口「他媽的」，無視規則權威。而對於上海市民的對立情緒，這批紅衛兵也很想不通：「在上海人民中遭到這樣的孤立原來沒想到。」⁵⁷ 清華、北大等校學生幹部討論「今後怎麼辦？」多數人主張立即回北京，少數人主張繼續幹下去。北京紅衛兵中，有一部份家在上海考去北京

56 轉引自《曹荻秋的假檢討》，載於《上海黨內頭號走資派陳丕顯、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檢討》，「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大會」印，1967年7月。

57 轉引自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載於《史林》2008年第3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出版。原引文為「1966年9月10日，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文化革命辦公室編《教衛系統文化大革命情況反映》第208號《北京和其他外地同學的幾個重要動態》」。

的學生，家長怕他們衝擊上海市委惹禍，也勸說他們回北京。⁵⁸

到9月中旬，第一批來滬紅衛兵中，大多數已往其他城市串聯，留在上海的不多。雖然他們在9月4日後曾經在華東紡織工學院成立過一個北京紅衛兵上海聯絡站，也選出過負責人，但沒多久因人員都去其他城市串聯而實際解散。留下者大都態度堅決地反對上海市委，表示要堅持到底，⁵⁹ 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齊衛東」，⁶⁰ 這個組織參加過9.4對上海市委衝擊，以後一直沒離開上海，參加了1967年初上海「一月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和那些將地富反壞右作為鬥爭對象的中學紅衛兵不同，他們主張「牢牢掌握文革的鬥爭大方向」，將批判和鬥爭的矛頭始終對着各級黨內走資派。他們寫的系列文章《九評上海市委》，在當時起了很大影響。

就在第一次南下北京紅衛兵大多離開上海之際，又有一大批紅衛兵出發前往上海。還是在第一批來滬的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陳丕顯多次電話請示周恩來總理怎麼辦？周說可以派二千名紅衛兵來幫助你們。這批紅衛兵臨行前，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的妻子郭惠明打電話給陳丕顯的妻子謝志誠說，他們這次去上海，經周總理同意，是有組織的，是保上海市委的。還說她兒子是南下兵團的帶隊。⁶¹ 這次南下紅衛兵的主體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簡稱「首都一司」），到上海統一名稱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南下兵團」，共二千名大學生；另有一百名中學生，也一起參加南下。

58 轉引自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原引文為「1966年9月9日，市委辦公廳編《文化大革命動態》第622號《住在師大的外地學生的一些動態》。

59 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60 齊衛東的核心成員許小昆和欣鼎亮等，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都受到審查。

61 梁國斌1967年3月31日《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滔天罪行》。

9月10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一司」南下兵團，周總理明確指出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是革命的。南下兵團正式成立，總指揮章盾之(空軍衛生部長、第二軍醫大學校長之子)，副總指揮譚懷遠(譚震林之子)、吳蒙爾。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南下兵團還帶了100名中學生南下，組成16縱，隊長是19中的姚小康，政委是師大女附中的鄭中偉。⁶²

文革後，當年參加者回憶，說是周恩來讓他們去上海，還說是交大和復旦紅衛兵圍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無法開展工作，周恩來通過周榮鑫和「一司」商量，能不能派一部分紅衛兵南下，宣傳黨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學生還是要在校園裏鬧革命：

「一司」立即組織了由北大、人大、礦院等院校組成的，精幹的先遣隊南下，為南下兵團大部隊打前站，重點安排好大隊人馬的接待、吃、住等問題，並為大部隊南下做好思想準備工作，了解上海地區的運動形勢。先遣隊得到葉帥(葉劍英)的支持，葉帥的小女兒葉小英參加了先遣隊。

周總理還特別指示，先遣隊到上海後可先找東海艦隊接待，弄清情況後再找上海市委。⁶³

1966年8月下旬，上海大學生的關注點還在校園而不在市委，上海發生的比較大的事件，是復旦大學學生去上海戲劇學院串聯的8.25事件。說周恩來因為上海大學生衝擊上海市委而派人去上海，可能就是前文所提及的9月1日誤傳復旦大學一萬學生要包圍市委的空穴來風；也可能是第一批南下紅衛兵將8.30文

62 方迪《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一司」興衰始末》，載於2008年網絡<http://huisazirubokecom/viewdiary14247480.html>

63 同上。

化廣場歡迎會開成對市委的批判會，第二天8.31又衝擊上海市委後，市委向北京告急。大批人員出發之前，9月9日下午，周恩來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司令部負責人，全面了解他們的準備情況。⁶⁴ 第二天，9月10日，周恩來又出席首都紅衛兵外出串聯戰鬥軍團誓師大會，周恩來說：

到上海去的這個南下兵團，人數最多，將近兩千人(可能已經超過了)。你們組成了十六個縱隊(加上中學)，是很大一個隊伍了，超過兩千人了，那麼你們就要帶着剛才說過的戰鬥精神、學習精神、宣傳精神，又要很謙虛、很謹慎。要看出，這個任務不是一件很容易實現的任務。因為上海比北京大，那個地方有先進的無產階級隊伍，那個地方的領導在過去幾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教育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進行得比較好。⁶⁵

周恩來對上海市委明確肯定，與此同時也為出發者指明革命對象：

當然上海有另外一種複雜的現象，並不是說北京不複雜，而上海是另外一種複雜的情形，我說那裏資產階級的影響要比北京大。如果說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資產階級的話，那麼上海就是買辦資產階級影響要大，也不是說沒有封建的影響。⁶⁶

這是北京紅衛兵第二次大規模南下。這次南下受到周恩來關照，或者可以說是周恩來派遣。9月11日，南下兵團總部人員，乘着鐵道部專門為他們調來的列車到達上海，上海有關方

64 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65 周恩來 1966 年 9 月 10 日在《首都紅衛兵外出串聯戰鬥軍團誓師大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6 同上。

面派出由摩托車開道的車隊迎接，一路進入市中心。上海市委將他們安排在黃陂南路上緊靠人民廣場的市體育宮，住在看台下的屋子裏。後來他們自己又在一些區以及靜安區第一師範、楊浦區市東中學、徐匯區上海第五十一中學等，設立了聯絡點。市委要求各級黨委為北京紅衛兵活動提供方便，上海負責接待這批紅衛兵的部門，特地為他們安排許多活動，例如與著名全國或上海勞動模範和先進人物座談，參觀象徵上海工業成就的上海重型機器廠的萬噸水壓機，等等。總之，盡量向這批小將展示上海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指望這第二批紅衛兵多少能對前幾批北京紅衛兵的偏激行為有所制約。9月19日，曹荻秋在剛被改名為「文化革命廣場」的原文化廣場，向這批紅衛兵介紹上海情況。

但事與願違。第一和第二批到上海的紅衛兵大都是最早的紅衛兵，以幹部子女為多。第一批紅衛兵大多是中學生。第二批紅衛兵雖然以大學生為主，但仍有上百個中學生，組成第十六縱隊。這些中學生在北京時就將毆打運動對象或四類分子當樂趣，赴上海又將血腥暴力一起帶來，沒有絲毫收斂。他們感興趣的是上海如何破四舊，如何批鬥黑六類，如何貫徹階級路線。他們還沉醉在北京紅八月的功勳中，打算在上海再重演一場紅色恐怖。這從他們在座談會上所提問題可以看出。在國棉二廠，南下先遣隊與楊富珍、王林鶴、程德旺等著名勞動模範先進人物等共四十多個工人座談。他們的問題是：

- 一、「8.30」及「9.4」事件的經過；
- 二、上海如何抄家，被抄對象是否報復，如何處理，抄家物資如何保管？
- 三、上海如何貫徹階級路線，如何對待「黑六類」？
- 四、上海如何「破四舊」？
- 五、上海的紅衛兵如何組織，是否執行階級路線？

他們特別關心和了解上海街道里弄的黑六類情況，抄了多少家，鬥了多少人，鬥服了沒有，有沒有遺漏。他們得出的調查結論是：上海市委手太軟，對黑六類太講政策，文鬥成了「溫鬥」，實際文而不鬥，「目前上海的主要問題不是什麼文鬥武鬥的問題，而是鬥不鬥的問題，是溫鬥還是狠鬥的問題。」他們主張加溫，狠鬥，「鬥出一個紅彤彤的江山」。他們熱衷宣傳血統論，到處張貼「鬼見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散發《紅色恐怖萬歲》的傳單，還有此類大標語：「紅色恐怖萬歲」，「自來紅們站起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絕對如此」，「老前輩降群魔大砍大殺，後繼人伏妖崽猛鎮猛斬——誰敢翻天」，「階級路線萬歲」，等等。他們認為上海對抄家對象「搜查不徹底」，被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過着剝削生活」。宣稱「若在北京則基本掃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門進去，而是把門打壞了進去，不老實就揍」；還向街道幹部提議：「黑六類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們掃地出門好不好？」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南下紅衛兵，更是在上海大街上散發《最最緊急的革命倡議》，倡議：凡牛鬼蛇神一律減薪；銀行存款、電視機、照相機、沙發等一律沒收上繳；保姆一律解僱；一律從高級公寓、別墅搬出；白天一律進勞改隊，晚上一律寫交待；一律掛「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等，要將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使它們永世不得翻身」。

對這批南下紅衛兵的嗜好，上海市委只能遷就。市委安排「要他們砸徐家匯大教堂和抄一些人的家」。⁶⁷負責上海政法和公安工作的市委書記梁國斌說：「可以向紅衛兵提供一批

67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上海市人委革命造反聯絡站 1967 年 3 月 25 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揭發材料匯編》(一)。

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名單，讓他們去抄家」。⁶⁸ 而事實上，這批南下的北京紅衛兵，也確實從上海市委處，拿到過三大本花名冊。但這批北京紅衛兵的作為卻完全不是上海市委所能控制。他們在上海製造了一系列武鬥事件。據9月15-17日的不完全統計，三天內共發生30起北京紅衛兵打人事件，被打者達一百人以上。他們抄家，對抄家對象接連幾天地肆意毆打侮辱，打成重傷，打至昏迷，打得大小便失禁，還不許送醫院。這樣情景當時在徐匯、盧灣、南市、靜安等區都有發生。在上海音樂學院，9月19日，南下兵團第七縱隊的北京紅衛兵，與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8.18」紅衛兵，用皮帶毒打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及妻子，打得賀綠汀在地上翻滾；拳打腳踢之後又剪去其頭髮；音樂學院錢琦副教授等另外5位教師也遭毒打。在上海外語學院附中，9月15日至17日，南下兵團第十六縱隊北京外語學校學生11人，強令教師集中，按成份列隊，將五名女教師剪成陰陽頭或花頭，男教師全剃成光頭，揪至校門口罰跪、臉上塗墨，衣服上畫上烏龜，寫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資產階級分子」、「大右派」等字樣，胸前掛「牛鬼蛇神」牌子，強令他們相互罵，相互打，稍有不從，就用腳踢，用木棍鐵器毆打，連懷孕女教師也不放過。9月17日，在長寧區群聯中學，北京第七和第五十七中學紅衛兵，開大會批鬥學校半數教師共31人，將其中一名教師剃陰陽頭，用鉛絲繫着脖子遊街。在徐匯區斜土路第一小學，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第十五中學二十多名紅衛兵將學校黨支部書記毆打至重傷，副校長和另7名教師被打得頭破血流。在西藏中路基督教堂沐恩堂，9月14日至18日，南下兵團九縱隊二支隊北京體育學院紅衛兵，毆打教堂6名神職人員，揚言「打死人國務院不管」，還將9個過路人也抓進來；兩天後，南下兵團十六縱隊一百多名紅衛兵接着以特地用鋼絲製成的鞭子，繼續毒打這6個神職人員，打得他們

68 轉引自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無法行走，還將他們剃光頭，用白漆和墨水塗臉部和衣服，臨走又席捲了教堂的資料和物資。在上海最大天主教堂佘山大教堂，9月22日，一百多個北京紅衛兵將神父馬風祥從市區押去，邊鬥爭邊挖地三尺，說是追查藏匿槍支。槍支沒找到，馬神父被毆打至死。這樣的暴行還有許多，數不勝數。

其他地區來上海串聯的紅衛兵，也學着北京紅衛兵草菅人命。11月，在漕溪北路，幾個山東軍隊幹部子女在3個上海軍隊幹部子女帶領下，到漕北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報，見大字報上點名批判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張斌生是「反動資本家」（實際上只是小業主），便去派出所和里委會要求提供材料，然後上門抄家。⁶⁹ 他們砸光所有家俱、門窗，打死這家的老太太。為了證明老太是否真死，還拎了壺滾燙開水往躺在地上的老太身上澆。如此殘忍的行為引起眾怒，死者兒子是天馬電影製片廠的照明工，叫來上萬居民包圍打人者。市委只得趕緊派人疏解。⁷⁰ 這個事件，加上紅八月抄家時，許多里委和派出所都曾為紅衛兵提供抄家名單，引發對里委幹部的不滿，日後許多居委會或里弄幹部被揪鬥。

北京紅衛兵仍覺得意猶未盡，還想策劃更大規模的血腥批鬥：「讓我們批鬥給你們上海人看看，該怎樣對待那些資本家和黑幫！」他們打電報給周恩來，說要在上海揪一萬個資本家遊街，被周發電報制止。⁷¹ 如果說，第一批北京紅衛兵給上海

69 《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徐景賢這本回憶錄裏說打死的是母子兩人，但筆者在金大陸的文章，以及《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中所見，都說打死的是母親。

70 以上關於北京紅衛兵打人的資料全部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4 章，以及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71 周恩來 1966 年 9 月 25 日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去的同學打電報來要拉一萬人（資本家）遊行，這樣範圍太大了，我發了一個電報去制止」。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市民留下的是自以為是的張狂形象，那麼，這第二批北京紅衛兵留下的則是慘無人道和滅絕人性的嗜血殘忍，引起上海市民的強烈不滿。

上海市委疲於處理頻頻發生的事端，陳丕顯讓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往中央打電話向陶鑄求救，並建議國慶節後停止大串聯；曹荻秋也給周恩來打電話，一面讓人收集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行為向中央報告。⁷² 市委辦公廳原來編有《文化革命簡報》，專門反映上海文革情況，並報中央。9月份的前20天，只編印了4期。陳丕顯聽說煙台市委每天一份電報，向中央反映情況，便要求，上海的簡報，最好也能每天一份報中央。⁷³ 於是，之後的十天中，一連編印了17期，內容都是反映上海的混亂：《最近武鬥又有發展》、《少數人煽動學生搗亂》、《學生衝進××機關的經過》，等等，希望能夠引起中央決策層重視。9月，曹荻秋和魏文伯向中央發電報，呼籲為了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正常運行，希望中央能在國慶後停止大串聯。9月底，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又打電話給國務院，要求國慶後停止大串聯。

北京紅衛兵不但加劇上海混亂，也在全國各地造成混亂。9月下旬，周恩來親自起草和批發電文，以中共中央名義，指示華東局、上海市委，並告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以及北京大中學校在滬的其他紅衛兵組織，迅速結束在上海活動，⁷⁴ 9月25日，

72 梁國斌《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滔天罪行》。又據馬天水在1967年3月19日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上的發言《我的揭發》，也說陳丕顯讓人兩次向中央發電報，反映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的打人情況，載於1967年3月2日《大會專刊》、《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聯合編輯。

73 陳丕顯的話轉引自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74 陳丕顯著《滾滾浦江水，難訴思念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陳丕顯回憶錄中說第二批北京紅衛兵回北京的日期是國慶前。

上海市委向北京紅衛兵傳達了中央指示：一、必須嚴格執行《十六條》中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決定；二、迅速結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參加國慶節組織和維持秩序的工作。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遂於28日返回北京。回京後，他們受到周恩來接見。⁷⁵

周恩來打電話召回全部北京紅衛兵，令上海市委以為這是中央打算停止大串聯的信號：

國慶節前，中央打電報要北京紅衛兵回京參加國慶工作，我們錯誤地認為，這樣就可以結束大串聯，內心非常高興。並且打電報請華東各省動員上海同學在國慶節前回到上海。在九月下旬，我還佈置收集北京有哪些學生從八月下旬來上海還沒回去，並由馬天水打電話給吳德同志，希望能催促他們回去。⁷⁶

北京紅衛兵第三次南下

市委沒想到，前面這兩批南下的北京紅衛兵給上海帶來的麻煩只不過是前奏，更大動亂還在後面。就在第一第二批以幹部子女為主體的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之際，北京紅衛兵運動正經歷一場大分化。9月6日，以平民子女為主體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成立。「三司」與之前以幹部子女為骨幹的「一司」和「二司」不同，鬥爭鋒芒直指「黨內走資派」，他們被稱為造反派紅衛兵。

第二批南下紅衛兵回北京沒多久，10月，首都三司造反派紅衛兵大批來到上海。這次人數更多，時間更長。這是北京紅衛兵第三次南下。他們到上海後，組成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一些參加過9.4衝擊上海的第一批南下紅衛兵也加入他們。而此

75 方迪著《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一司」興衰史末》。

76 曹荻秋《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時，上海紅衛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崛起，將鬥爭矛頭從校園和工廠轉向市委。第一批和第二批來上海的北京紅衛兵，給上海市民和上海紅衛兵的印象不佳，甚至非常惡劣，他們始終沒有和上海市民或學生甚至造反派融合。直到第三批北京紅衛兵南下，發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高潮，上海的學生和工人造反派，才真正與北京紅衛兵聯合起來。也只有到這時候，上海的文革發展才真正切入毛澤東想達到的正題。

上海局勢越來越亂，區、縣、局以上領導機關已經沒法正常辦公，只能轉入地下或游擊辦公。面對這場真正是史無前例的運動，所有幹部都心中無底，不知如何應對。過去領導運動只要緊跟中央文件；而此時中央下達的文件根本無法執行，例如中共中央9月2日《關於保護檔案及機密資料的通知》，10月15日《關於各地革命師生暫緩來京串聯的通知》，10月30日《關於工人不要離廠外出串聯的指示》，等等，沒有一個能貫徹下去。曹荻秋在1966年9月18日黨員幹部大會上作關於文化革命問題報告時，道出心中的困惑：

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非常被動……這種被動，現在還沒有完全擺脫。被動來自何處？這個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主動權全在中央，我們還沒有擺脫被動局面，全國各地都是這樣的，有的地方還要嚴重……看來今後我們還是要被動的。⁷⁷

張春橋就在北京，而且就在文革運動決策的核心，上海市委認為他完全可以提供些信息和建議，更可以向毛澤東反映上海市委面臨的困境。陳丕顯認為張春橋是從上海市委調去中央文革小組的，理應給上海市委通點消息。還是在8月25日，復旦大學的紅衛兵去上海戲劇學院串聯，之後，市委便幾次打電話

77 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資料匯編第1集：《曹荻秋同志1966年11月5日作中央工作會議傳達報告（記錄稿）》。

給張春橋，希望他能回上海。張春橋後來對人說：他們催我同姚文元回去，企圖拿我當擋箭牌，我才不幹。到後來，陳丕顯等打電話給他，他乾脆不予答覆。⁷⁸

9月初，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的那幾天，陳丕顯讓秘書打電話給張春橋，說「上海最近情況很緊張，希望張春橋經常給曹荻秋打電話」，「同上海通通氣，多了解一點上海的情況，向中央反映」。但陳丕顯幾次和張春橋通電話，都很不愉快。陳丕顯對人說，「我都懶得和張春橋通電話」，「春橋同志是我們推薦給江青同志的，現在他取得了江青同志的信任，就不把我們放在眼裏啦」，「春橋同志不願回上海，他在北京舒服，只是參加大會，也不解決具體問題，住的地方又什麼人都不敢去衝擊」。⁷⁹ 陳丕顯對張春橋的抱怨，顯示出上海市委與中央文革的尷尬關係。據說，陳丕顯與張春橋的關係原來還可以，而且江青最初對張春橋並不了解，是陳丕顯在江青面前說了張春橋很多好話。⁸⁰ 但文革開始後，陳丕顯和張春橋兩人關係逐漸疏遠。

就在大串聯的紅衛兵將整個中國攪得天翻地覆，當各地黨委最迫切需要了解中央決策層意向的時候，地方與中央的信息交流卻越來越梗阻。在開口閉口中央首長如何講話指示的北京紅衛兵面前，上海市委的信息似乎顯得那樣滯後。市委於是決定派人去北京摸動態，及時了解決策層的真實意圖。9月下旬，市委派出三人去北京。一個是市委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一個是解放日報社的實習記者，還有一個是市委寫作班的朱永嘉。派朱永嘉，是因為他曾經為姚文元當過助手，關係比較熟悉，如

78 張春橋 1966 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工總司和紅革會代表時的講話。載於「交大反到底」編《反到底》，1967 年 1 月 8 日。

79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揭發材料匯編（一）》，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上海市人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1967 年 3 月 25 日。

80 這是朱永嘉對筆者說的。

今姚文元進中央文革小組，如果要問什麼事，朱應該比別人容易說得上話。市委辦公廳主任方揚找朱永嘉談話，要他去北京後，注意收集北京主要院校的紅衛兵大字報，中央首長接見紅衛兵和群眾的講話，北京文化革命開展情況，等等，及時反映給上海市委。

三人到北京後，住在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北京辦事處。他們的公開身份都是上海《文匯報》記者，給他們配了記者證，可以去北京各大學採訪。朱永嘉的記者證標號276，名字是朱衛東，一個頗有文革色彩的名字。

小結

全國性紅衛兵運動和大串聯是毛澤東文革初期的又一重大舉措。用文革專家王年一教授的話說，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後第一個關係全局的重大錯誤；⁸¹ 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是讓各地造反派聯合起來。毛澤東通過全國性的大串聯，打破封閉人事制度所形成的批評本地區本單位領導的高風險，讓一批地方黨組織奈何不得的外來力量，去衝擊本地區本單位老百姓不敢對抗的頂頭上司。所以，曹荻秋在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的8月底，雖然曾佈置人打長途電話往北京，查問鬧得厲害的北京紅衛兵的情況；但充其量也只能查問而已，無法像對待上海地區的學生那樣，通過學校對他們施加影響。上海市委對這幫外來的造反者，除了向周恩來、陶鑄告急，束手無策。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批判，作為共產黨工作機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名存實亡。5月底建立中央文革小組，8月以後成為事實上的中央決策機構，而江青不久也取代組長陳伯達，成為中央文革小組事實上的第一領導；只有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務院系統還在艱難地運轉。於是，中央實際

81 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出版。

存在兩套系統：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以及以周恩來和陶鑄為首的國務院系統。各省市黨委與中央文革小組沒有上下級關係，依照以往的正常工作渠道，他們應該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或國務院匯報下面的工作和情況。書記處名存實亡，他們只能向國務院匯報；但即使是周恩來和陶鑄，也無法將下面反映的艱難和混亂狀況，再向文革的實際決策中心傳遞，因為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根本不想聽取下面對文革的種種抱怨。這是下情上陳的梗阻。而且，即使信息能夠到達毛澤東處，也影響不了他的決心和決策。

毛另立中央文革小組作為自己開展文革的工作班子，拋開常規的嚴密系統：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員會-各省市黨委-各級黨委，不再像過去那樣由書記處制定文件然後層層下達，而是直接通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這三個權威報刊發社論。尤其像《十六條》這樣對運動具有指導意義的文件，過去都是層層傳達至基層幹部後，最後才讓老百姓知曉；這次卻是直接見報，「戰略部署直接與群眾見面」。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幾乎天天向學生講話發號召，通過學生傳播到全國，於是紅衛兵經常得風氣之先。這樣的信息傳遞方式，無形解構了各級黨委對中央決策的先知權和解釋權。這是上情下達的梗阻。

在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和威望超越於政府、法律、執政黨之上時，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評判、每一個決定，就有了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中央文革小組的優勢，就在於他們是毛的思想的最先知曉者。誰能夠揣摩到毛澤東思路，誰就掌握話語主動權。本來，幹部階層長期擁有對真理的解釋權，就是因為他們對信息的壟斷，壟斷信息就能壟斷真理。而這一次，毛澤東的整肅對象卻正是整個中央決策層和幹部階層。幹部對形勢和中央精神的解釋權就這樣被剝奪。文革中幹部權威的下降，正是從這個剝奪開始，而不是從稍後的挨批判開始。

信息傳遞過程的顛倒，使以往處於信息被動狀況的底層群眾，在許多時候能夠比以往直接了解文革決策層的意圖，這使群眾參與文革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幹部階層以往靠着壟斷信息所形成的強勢被改變，他們有時得到的運動信息還沒有紅衛兵們及時。這是政治資源的重新分配，從而造成話語權的轉換。而這場話語權的轉換，正在為即將於1967年1月開始的權力轉換進行鋪墊。

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促成了文革對象的又一次轉換。在聶元梓大字報之前，批判對象是與《海瑞罷官》有關的人和事，即吳晗和北京市委，由各級黨委組織批判文章，在報刊上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掀起批判本單位牛鬼蛇神高潮，由各級黨委拋出本省市地區或單位的反動學術權威、黑幫，發動群眾貼大字報。這是文革對象的第一次轉換，不過，轉換的權力掌控在各級黨委手中。北京紅衛兵運動興起，學校領導和駐校工作隊成為運動對象，這是文革對象的第二次轉換。這次轉換，是對共產黨政治運動形態的顛覆，標誌着文革不但掙脫了各級黨委的掌控，而且使各單位黨委成為了批判對象。而北京紅衛兵到上海和全國串聯，又使運動對象發生第三次轉換，從各單位領導，上升到各省市領導。兩次轉換都是顛覆性的，確實具有真正的造反意味。

北京紅衛兵對上海市委的指責非常雞毛蒜皮，第一第二批來滬的紅衛兵大都是幹部子女，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批鬥共產黨執政十七年來一貫打擊壓制的階級敵人，所炮轟的內容也是市委「對階級敵人批鬥不力」等。他們來上海時，正是北京造反派紅衛兵崛起之時。他們如果還在北京，只能劃入與毛澤東文革運動方向格格不入的老保陣營；但到上海，他們炮轟的對象是「包庇階級敵人」的上海市委，換句話說，他們的話語雖然還是血統論、紅色恐怖，但因為上海市委不同意這些觀點，所以他們又將批判矛頭指向上海市委，於是他們的鬥爭方向正與

毛澤東所要批判的對象合拍。而真正成為上海造反派的啟蒙和先驅的，是其中那些一開始就認為上海各級黨委必須將自己作為文革運動對象的北京紅衛兵們。文革後再看這些當年的大學生，透過文革式炮轟、火燒的話語外殼，是對當政者的質疑，這是被毛澤東「大民主」催生的朦朧的權利意識。這種對當政者不斷質疑的思考，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又成為反對文革的主力，這是後話。

這是十分有趣的現象。1966年的9月至10月，真正具有實質意義的，不是紅衛兵對各省市提出的罪名，而是各省市對「炮轟」的反應。在《十六條》已經明確規定，不許當政者利用專政工具迫害貼他們大字報的群眾後，他們駕輕就熟的政治資源和政治路徑，便只有發動和組織他們所認為的左派隊伍保衛自己。這個本能的反應使他們無一例外，全部入毛澤東「挑動群眾鬥群眾」之彀，向紅衛兵提供自己堅實的罪名，在毛澤東緊接着10月發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被打倒。有罪推定式的「炮轟」百戰百勝，不但上海，全國所有省市委都被這樣的炮轟打敗。

事實正如曹荻秋所感覺，運動主動權在中央，各級黨組織正在一步一步喪失主動權。這是兩套話語體系的衝突，即原來各級黨領導幹部所熟悉的那套整階級敵人、整政治邊緣分子的話語體系，與毛澤東的整走資派的文革話語體系的衝突。雖然核心都是階級鬥爭，雖然最終評判權仍歸於毛澤東一人，但是鬥爭指向不同。北京紅衛兵的到來，促成了這兩套話語體系的轉換，發生在上海市委門前的辯論，正是毛澤東所支持的北京紅衛兵們，向上海市委爭奪文革話語權的具體體現。上海紅衛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在北京紅衛兵榜樣的鼓舞下，正集聚力量，蓄而待發。這一時期——1966年的6月至8月，雖然在所有校園及工廠內，佔主導地位的仍是原來的那套話語；但是這套話語正在轉型，到了9月，在社會上，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

市委時，運用的已經是毛澤東所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炮轟省市」話語，而且很快就將發展成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打倒走資派」的話語。

這也是政治身份評定權的爭奪。北京紅衛兵在「炮轟」上海市委時，他們或許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顛覆共產黨執政以來各級幹部將人劃分政治等級的權力。過去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各級領導幹部劃分群眾的等級身份，按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等標準給群眾排隊，貼上名份標籤。而對上海市委的炮轟，是共產黨1949年執政以後，第一次自下而上由群眾判定共產黨的各級領導是否革命。政治分層的評判權，正在開始向群眾轉移。當然，評判的標尺不能超出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制定的準則。

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他們對上海市民的榜樣意義，就在於他們將市委作為造反對象。而在此之前，上海的學生或工人造反派，都還只是在反學校或工廠的黨組織。上海市委門前的大辯論，以對上海市委的評價為分水嶺，在上海市民和學生中劃分出「保」派和「反」派，也即是不久陣線分明的保守派與造反派。在北京紅衛兵榜樣激勵下，更在北京紅衛兵積極推動和組織下，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迅速崛起，不久更將組織起來，釀成震驚全國的大事件。

8.31是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失敗。中央決策層對北京紅衛兵的支持，解構了上海市委一貫正確的權威形象，而且為以後造反派的進一步「打倒」，鋪墊了話語準備。從北京紅衛兵的衝擊開始，上海市委處境每況愈下，越來越被動，直至最後被打倒。

第五章

造反派紅衛兵 從反校黨委到反市委

「復旦傷風，上海咳嗽」

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而文革中上海三大造反派紅衛兵——「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簡稱「炮司」）、「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簡稱「紅三司」），發源地都在復旦，而且這三大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也都在復旦。如果說有哪一所大學在上海文革中起着先鋒帶頭作用，那一定首推復旦大學。文革初期復旦因此被稱為「紅色革命根據地」，有「復旦傷風，上海咳嗽」之說。

文革一開始，復旦大學黨委便組織師生貼大字報批判歷史系教授周予同，此時周已是上海市委內定批判對象。6月4日，歷史系貼出經校黨委審查的批判周予同大字報，其他各系立即聲援，校廣播台也馬上廣播這些大字報，一時形成批判周予同大字報的高潮。復旦黨委還學着上海市委批判八個「黑幫」，也湊了八個「反動學術權威」，都是知名教授；加上市委點名的歷史系二周共十人，作為重點黑幫。一般教師被「火燒」的不計其數，學術上稍有建樹者更是首當其衝。校黨委組織寫作班子，由黨委書記王零的秘書掛帥，不定期出版壁報《紅纓槍》導向全校輿論。《紅纓槍》連出十篇評論，副標題都是「論追窮寇」，要將這些已被打敗的權威學者作為窮寇窮追不捨。與此同時，6月17日到6月底，復旦黨委斷斷續續開了十多

天黨委擴大會議，最多時有五六十人參加，會內會外結合，揭發批判三個黨內幹部。

三個幹部中，一人是原校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陳傳綱。¹ 陳是復旦大學三十年代的學生，很早參加中共，復旦黨委書記原來是兼任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的楊西光，1965年楊西光升任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離開復旦。由職務原來比陳傳綱低的王零擔任校黨委書記。用十七年階級鬥爭話語評價，陳思想比較「自由化」。受教育程度高的他與工農出身的王零不那麼融洽。1965年10月陳也被調出復旦，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長。文革發動階段的1966年6月，不但批判反動學術權威，還要批判黨內走資派。陳擔任過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又是現任市高等教育局長；更加上陳在延安時期曾因王實味事件受牽連挨過整，共產黨執政後又當過彭真秘書，讓他來當復旦走資派綽綽有餘。在黨委佈置下，批判陳傳綱的大字報形成高潮。² 6月18日，陳傳綱被通知回校看大字報，在看大字報時被學生認出，遭到幾百人圍攻。7月，陳傳綱服安眠藥自殺。文革初期許多被拋出的黨內幹部有一個共同特點：大多是知識分子幹部或1949年前的地下黨幹部，這也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規律。這兩類幹部都是共產黨幹部內的弱勢群體。

另兩個被批判的黨內「黑幫」，一個是復旦黨委宣傳部長、中文系總支書記徐震，也是知識分子幹部，著名雜文作家，筆名「公今度」，1957年反右時是左派，甚至前不久還是《紅櫻槍》的真正主編，為黨委將文革目標引導到周谷城等知識分子出過大力。另一個是原校黨委辦公室秘書、哲學系總支

- 1 復旦大學心向党戰鬥小組 1966 年 11 月《復旦大學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復旦大學生物系「赤衛隊」翻印。
- 2 復旦大學保守派組織心向党戰鬥小組 1966 年 11 月編寫了《復旦大學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復旦大學造反派組織過河卒戰鬥小組 1966 年 9 月編寫了《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兩個觀點不同的學生組織都在 6 月 17 日這天記事中提到：校黨委書記王零派人聯繫哲學系的學生，發動他們貼陳傳綱大字報。

書記劉振豐。這兩人是造反派學生首先提出批判的。黨委認可了學生的批判，將二人拋出，也作為運動對象。

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的熱潮，是復旦大學的第一次大字報高潮，這個高潮，基本在校黨委掌控之下。這是按照反右模式製造的高潮。這個模式就是由黨委對學校所有成員按運動要求進行政治分層，決定運動對象。

8月5日至8日，復旦大學的大字報高潮又起。這次高潮，雖然仍在黨委掌控之下，但已經開始失控。鬥鬼風席捲復旦連續四天。鬥鬼風的第三天，8月9日《十六條》公佈，對照《十六條》，一些學生認為黨中央說「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哪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復旦黨委卻引導批鬥學術權威，是轉移群眾視線，逃脫對自己的批判。他們貼出針對黨委和系黨總支的大字報。最有影響的是：《踢開絆腳石——中文系黨總支》、《歷史系黨總支必須靠邊站》、《火燒物理系》、《火燒生物系》、《化學系為什麼冷冷清清》，等等。³ 這是復旦大學第二個大字報高潮。如果說6月初期的大字報高潮，目標主要是校黨委引導批判「牛鬼蛇神」的結果，那麼這次高潮則是學生對校黨委運動導向的質疑。

在對校黨委的批判中，一批造反派學生脫穎而出。許多人文革前就是學校的活躍人物，關心政治，不甘平庸。他們在校園叱咤風雲，舌戰保衛黨委的學生。以後隨着對上海市委批判的升級，他們又將鬥爭目標轉向市裏，許多人後來成為市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

復旦紅衛兵領袖：勞元一

勞元一⁴ 是上海最大紅衛兵組織「紅革會」的負責人之一，

3 吳中傑 2005 年著《復旦往事》，頁 161。

4 勞元一，男，1946 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 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

文革前夕是復旦大學外文系三年級學生。勞元一出身幹部家庭，原在上海讀書，後來父親調任北京，他高中也轉學北京，大學考回上海，文革前夕是復旦大學外文系三年級學生。文革開始，勞元一正在農村參加四清，任榮華大隊工作隊長。在四清中他入了黨。⁵

勞元一是復旦大學較早造反的學生。文革後，他回憶自己貼大字報的原因是對黨委的運動導向有看法，尤其不滿黨委批判陳傳綱：

我造反說有什麼原因，也說不上，就是那個大潮，人人都造反了，我也就造反了。要真說有什麼個人原因，可能是因為校長陳傳綱之死。因為我覺得陳傳綱是好人。我回來後，又遇上鬥鬼風。那麼多教授被鬥，讓我覺得困惑。第二天就是陳傳綱自殺。陳傳綱的死，讓我覺得黨委這樣鬥，是不是過了頭。我對楊西光的印象就一直不好。……

陳傳綱形象高大，口才也好；楊西光卻矮矮的，一口安徽話，讓人聽不懂。我覺得陳傳綱是好人，對佈置鬥陳傳綱的黨委書記楊西光有了看法。我的那張大字報，就是對着黨委的，不滿黨委對運動的佈置。⁶

勞元一回憶說，自己對陳傳綱印象好還有個人原因。因為陳傳綱對他一直很器重。還是他剛上復旦到學校報到時，他們

大學外文系三年級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紅革會」及市「紅革會」負責人之一，1967年初參與「1.28炮打張春橋事件」。1968年畢業分配至安徽農場。文革後赴美國留學，曾為一所投資公司負責人。

5 不過這時已是《五·一六通知》發下之後，市委不久通知，5月16日後入黨的預備黨員都取消預備期。勞元一的黨籍於是沒有算。

6 筆者2008年對勞元一的電話訪談，不過這個回憶，在時間上稍有偏差。因為鬥鬼風實際是在勞元一第一張大字報之後。不過，不管怎樣，勞元一是因為對黨委不滿而貼大字報。

外地學生比上海學生早到幾天，學校讓他們先去勞動，給校園除草。勞元一在除草時抓到好多蟋蟀。那天，他貼了張布告，讓大家晚上來鬥蟋蟀。晚上正準備開鬥，系裏管學生的指導員看到，說這是封建遺老遺少玩花鬥蟲閒情逸致，要批判領頭的勞元一，嚇得別的學生不敢參加了。正在這時，陳傳綱經過，看到指導員在狠狠訓斥學生，就說你們不要大聲叫嚷啊，蟋蟀都要被你們嚇跑了。他加入學生，一起鬥蟋蟀。一邊的指導員只好閉嘴。勞元一就這樣認識了陳傳綱。陳傳綱賞識勞元一，兩次把勞元一叫去以學生身份參加接待外賓。陳傳綱認為學生要多看書，多接觸世界。「他喜歡我，我當然也就對他很好感。」勞元一聽說陳傳綱被批鬥，當天晚上曾想去看他，沒想到第二天就傳出他自殺的消息。⁷

7月，勞元一回北京探望父母，此時正值紅衛兵運動在北京興起。回校後的8月1日，他和班上六個同學貼出大字報：《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大字報主張學生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開展文革。這是勞元一從他在北京的同學處得知的，當時北京一些學校正在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不過，勞元一在大字報中沒有說明消息來源；而此時，允許群眾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十六條》還未發布，眾人都不知道中央對此將有新決策。於是引起辯論，反對者說這是「否定黨的領導」。⁸ 勞元一他們遭到圍攻。8月11日，勞元一和同學孫月珠等貼出對聯：「心中想念毛主席，我們上告到中央」，署名「紅衛兵戰鬥小組」。這是上海最早以「紅衛兵」命名的組織之一。⁹ 勞元一、孫月珠被大家推舉上北京。孫的路費是相同觀點學生湊的。毛澤東8月18日

7 筆者 2008 年對勞元一的電話訪談。

8 復旦大學過河卒戰鬥小組 1966 年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二)。

9 據當年是交大附中學生的魏威回憶，他們中學的紅衛兵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得還要早，在 7 月下旬。

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勞元一上了觀禮台，孫月珠上了天安門城樓並與毛澤東握手。這在文革中是莫大榮耀、特大喜訊。¹⁰

勞元一對學校運動的觀點是「揭」字當頭。他後來回憶：

我覺得「保」肯定不合時宜。但是，按「砸」派所說，打倒一切，我也不贊成。我說還是應該揭，通過揭，看是什麼問題，就批什麼問題。不是「保」字當頭，也不是「砸」字當頭，而是「揭」當頭。這個觀點是我提出的。……

我提出這個觀點也與陳傳綱的死有關。對於文革，我當時是響應的，覺得不批判不符合文革方向。但批判得把人搞得自殺，也太過分。所以我覺得應該先實事求是地揭發，揭發出來問題，再批判。¹¹

10月，勞元一和馬立新¹²等成立了復旦大學「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復旦紅革會籌備的同時。幾天後，復旦紅革會擴展成為全市性紅衛兵組織。

勞元一能說會道，即興演說非常煽動聽眾情緒，各種點子又多，在學生中很有影響。在紅革會，他被認為「雖然不是最主要負責人，實際上是最有權威的決策人物和實權者」，¹³「紅革會的靈魂」。¹⁴甚至北京的紅衛兵領袖，也是對他見面第一眼就印

10 復旦大學過河卒戰鬥小組 1966 年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二)。

11 筆者 2008 年對勞元一的電話訪談。

12 馬立新，男，1941 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 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生，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紅革會」和「市紅革會」負責人之一。1968 年畢業分配至南京 734 廠工作。

13 這個評價引自《勞元一何許人也？》，作者是「上海機械學院革命造反委員會劉啟鳳」，文章載於文革期間小報《聯合報》，上海機械學院革命造反委員會《挺進快報》編輯部，上海機械學院革命造反委員會《火線報》編輯部 1967 年 2 月 24 日。

14 這個評價引自當時上海師範學院紅革命的負責人李功佐，金大陸、金光

象深刻。北京航空學院造反組織北航紅旗負責人韓愛晶，幾十年後的回憶還這樣形容：那個勞元一非常有領導氣質，是個幹部子弟，一看就和農村出來的不一樣。整個的面目和眼神都不一樣，我們和他一比的話就自慚形穢，總覺得這傢伙，我們怎麼就沒出生在這種家庭啊，特羨慕他。他的那個氣魄非常大，指揮若定；千軍萬馬不在話下，好像天生就是指揮官似的。¹⁵

復旦紅衛兵領袖：安文江

安文江¹⁶ 是文革中上海全市第二大紅衛兵組織「紅三司」負責人，文革前夕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安文江從小生活在浙江舟山島，父親是海員。中學時他來到上海和父母團聚。中學，他作文總被老師作為範文。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後，他的偏科更成為強項，成績拔尖。還在二年級時，就已經成為復旦校文藝刊物的第一個學生編委，還在市裏的《青年報》上發表過數篇文章，這在當時文科大學生中不多。安文江被大家看作才子。但是，儘管他學習成績好，參加社會工作積極，但幾次申請入團，始終沒被接受。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不但如此，一年級時，班上同學一致選他擔任文藝委員，可是臨了黨支部書記找他談，說他不適合擔任這個社會職務。他意識到其中一定有什麼自己不知道的因素。後來他才知道，原來自己父親被查出「政歷問題」。被排斥被邊緣化的壓抑感和失落感，在大學一直跟着安文江，但他心底不服氣。

耀、筆者 2009 年 8 月 4 日對李功佐的訪談。

15 韓愛晶《清華刪大富》，香港春秋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16 安文江，男，1944-2013 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文革中是復旦大學過河卒小組核心人物，市「紅三司」負責人。1967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1968 年赴江西武山銅礦當礦工 10 年。1978 年平反後歷任子弟學校教導主任，以後曾任廣東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副教授，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佛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1965年，他參加了上海郊縣四清，在奉賢，負責一個生產隊的四清。他努力工作，吃苦耐勞，處處爭先，心底始終一個念頭：「我不比你們差」。¹⁷

文革剛開始時，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沒引起他多少重視，只覺得來頭不小，倒是聶元梓大字報給他震驚，但更使他震驚的是復旦黨委書記陳傳綱的死，覺得校黨委拋出陳傳綱是丟卒保車：「我是被陳傳綱鮮血激『醒』的一個。很快，我衝到了革命造反的第一線。」6月25日，安文江和中文系四年級的11個同學貼出《徐震是什麼人？》大字報。這是復旦大學第一張矛頭針對校領導的大字報。在此之前，所有貼校領導的大字報都是校黨委引導的。徐震此時剛被提為復旦大學黨委宣傳部長不久，安回憶說他「豁達平易，學識淵博，平時對我們很器重」，但被階級鬥爭長期教育的他們早已六親不認，學着中央對三家村的批判，也抓住徐雜文中片言隻語批判，緊接着貼出《二談徐震是什麼人？》、《三談徐震是什麼人？》，安文江準備像中共當年與蘇聯共產黨論戰發表「九評」那樣，也來個「九談」，但後來還沒寫到「五談」，校黨委將徐震拋出作為批判對象。徐震被打倒，安文江和同系十二人的「過河卒戰鬥小組」在學校出名。

6月至9月的復旦校園內一片對造反派的圍剿。校黨委組織學生觀看反映匈牙利事件的電影《昨天》、《黎明》，以及反映1957年反右的話劇《大學風雲》，前者警告學生不要蹈匈牙利事件「鬧事反黨」覆轍，後者以1957年反右結局威懾學生。都是市委佈置的。大字報區貼滿了針對貼黨委大字報學生的聲討揭發和批判，給這些學生造成非常大壓力。他們中有的貼出「退出」、「請罪」聲明，有的被逼得吞服安眠藥。安文江也被牆上點名的「安文江等一小撮」大字報搞得心理壓力巨大，連做夢都夢見紅色和黑色大叉。

17 以上內容均來自筆者2008年5月16日在佛山對安文江的訪談。

安文江的造反啟蒙者是來復旦串聯的北京紅衛兵。一個北京南下高幹子弟小D，只半小時談話就有醍醐灌頂之效：「你們上海大學生窩囊透了，都到啥時候了，還這麼溫文爾雅的，還在黨委領導下搞革命，你到北京去看看，那才叫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8月24日，新聞系的幾個學生貼出尚未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毛對各級黨委壓制不同意見的指斥，更使安覺得自己造反行為沒錯。以後，安文江參加過對上海戲劇學院的「8.25」串聯，被保守派萬人圍攻。在一系列衝突中，安文江擅長演說及文字寫作的才能得到極大發揮，成為復旦乃至全市造反派紅衛兵中的著名人物。

1966年9月初，安去北京串聯，正值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安以後回憶，「北京的朝聖使我成了難以自控的向左劇轉的陀螺」。¹⁸ 對於自己的造反目標，安文江認為，他那時鬥爭矛頭始終對着復旦校黨委，以後又對着上海市委，但從來沒有對着學校的教授們：

我們從來沒有鬥過教授，更沒有抄過教授們的家，我想紅革會也沒有。而且我們造反時，對教授的批判高潮已經過去。……

紅三司和紅革會在這點上都是一致的——把矛頭對準走資派。因為教授、黑幫、權威，在1966年的10月以後對我們已經不是興奮點了。¹⁹

但事實上，紅三司的一些成員後來參與了游雪濤的情報收集小組。而原市委寫作班成員郭仁傑後來被逼死，紅三司更有不可推脫的責任。

18 以上內容引自安文江著《我不懺悔》，載於《東方紀事》1988年創刊號，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19 筆者2008年對安文江的訪談。

復旦紅衛兵領袖：馬立新

馬立新也是市紅革會負責人之一，文革前夕是復旦大學哲學系四年級學生。馬立新1941年出生於山東的一個貧農家庭，父親曾參加共產黨的抗日游擊隊，後來是農會幹部。1951年馬立新上了小學，以後考上初中、高中。在學校，他擔任班幹部和團幹部，1960年還在讀高中時，他便已加入共產黨。1962年，他考入復旦大學哲學系。在大學裏，他擔任了班級團支部書記、哲學系共青團團委委員。1964年後，哲學系學生三次下鄉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三次時間加起來近兩年，其間只上了一年半的課。給馬立新印象深刻的是1965年中共中央《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個由毛澤東主持指定的文件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尤其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文章出來之後，批判氣氛升級，令他們覺得「黨要變質了，我們怎麼辦？」馬立新以後回憶這段歷史說，在這樣不斷的階級鬥爭教育下，「我們就像皮球，不斷地被打氣，打到一定程度就跳起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及6月2日聶元梓大字報發表時，馬立新他們還在農村參加四清。他和同學們要求回學校參加運動，6月中旬，所有下鄉的學生都被召回學校。6月下旬，馬立新和另外三個同學被學校調去參加復旦二附中的文革工作隊，作為工作隊員。「這表明學校對我不是一般的信任」。此時，陳傳綱已經被拋出，校園裏一片貼陳傳綱的大字報。和勞元一同感，馬立新也對陳傳綱印象頗佳：「他是我接觸到的復旦校一級領導中，最有水平的，而且很平易近人。」陳傳綱的自殺，給馬立新很大震撼。8月5日，馬立新被從工作隊召回，回了復旦。

這一天，正是復旦鬥鬼風開始，學校的郵亭後面，還特

地搭了個鬥鬼台。這使馬立新覺得，這場鬥鬼風是校黨委佈置的。7月底，哲學系成立了「八一鐵軍」，揭發和批判系黨總支，各年級都有學生和教師參加，馬立新也參加了。總支書記、指導員和校黨委找馬立新談過話，要他不要當右派，對他造成很大心理壓力。不久8月9日，《十六條》公佈，給馬立新以極大鼓舞，尤其「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裏」，他感到，「這是給我們指明了方向」。

馬立新在7月就認識了勞元一。勞元一組織成立學校紅衛兵組織的同時，8月25日左右，馬立新在原來組織的基礎上，又串聯了其他系的同學，大都是學生幹部和黨員，成立了「8.18紅衛兵籌委會」。10月，又和勞元一一起，成立了學校的紅革會。²⁰

最初的造反派紅衛兵

7月31日，就外文系勞元一等貼出《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同一天，哲學系「孫悟空」戰鬥組的胡守鈞等貼出大字報：《我校文化大革命處在十字路口》。²¹幾天後，8月11日，新聞系二年級學生譚啟泰²²、國際政治系二年級學生歐陽靖等貼出更具爆炸性的長篇大字報：《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譚與歐陽是校黨委指導文革運動的壁報《紅纓槍》的筆杆子，現在反戈一擊，還揭出許多內幕：說黨委是以鬥牛鬼蛇

20 以上所有引用的馬立新回憶均引自金大陸、金光耀、筆者 2010 年 5 月 21 日對馬立新的訪談。這一章中，缺「炮司」負責人的資料，因為筆者沒有能夠採訪到他們。

21 復旦大學「史紅」戰鬥組 1968 年 7 月編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22 譚啟泰，男，1946—1996 年，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 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新聞系二年級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紅三司」負責人之一。文革後曾任廣州《南風窗》雜誌主編。

神，保護未揭出的牛鬼蛇神，說復旦鬥鬼風是黨委統一組織、統一領導的，等等。大字報引起轟動，成為全校關注的中心，圍繞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²³ 復旦大學著名先進人物、電光源實驗室蔡祖泉²⁴ 第二天貼出由他牽頭的29人大字報：《堅決不同意罷掉復旦黨委的官》。許多人前往聲援。譚啟泰等又貼出《二論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²⁵ 復旦造反派和保守派陣營就這樣在一系列衝突中分壘。

就在復旦校園內圍繞勞、譚等的大字報辯論不休之際，勞元一和孫月珠等去了北京。8月20日，勞元一等從北京回校，立即以「紅衛兵籌備組」名義，貼出《復旦紅衛兵籌備組通知》，發起成立復旦紅衛兵組織，為此召開籌備會議。外文系勞元一等的「紅衛兵」、新聞系譚啟泰等的「殺閻王」、中文系安文江等的「過河卒」、物理二系周谷聲等的「大造反」、哲學系胡守均等的「孫悟空」，以及其他一些戰鬥組，都參加籌備會議並申請加入。勞元一提出成立「八·一八紅衛兵」，大家都同意。但在討論成立宣言時發生爭執。「殺閻王」潘嘯龍等認為復旦黨委是保皇派，必須罷官，潘等因此被稱為「罷官派」；勞元一等不同意潘的觀點，主張「徹底揭露復旦黨委，至於黨委是什麼派，揭出來是什麼，就是什麼」，勞等人因此被稱為「揭派」；胡守鈞等觀點則比潘更激進，主張「對一切黨委都要轟」，被稱為「轟派」，也被稱為「砸派」。²⁶

與此同時，另一批受到黨委支持的學生捷足先登，於8月21日晚發佈「紅衛兵復旦大隊」成立公告，第二天舉行成立大

23 復旦大學心向党戰鬥小組 1966年編《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24 蔡祖泉，男，原是復旦大學電光源研究所的工人，60年代後開始從事電光源研究，研製出十幾種新型電光源，被評為上海第一代工人工程師，文革前是上海著名的先進人物、事跡被許多報紙多次報道。

25 復旦大學心向党戰鬥小組 1966年編《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26 復旦大學 1986年5月編《大事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此資料在復旦大學也有存檔。

會，率先成立了復旦大學第一個全校性紅衛兵組織。發起人是復旦大學學生會主席、歷史系研究生、共產黨員王鶴鳴。不過他雖然起着很大作用，但沒有擔任具體職務；²⁷ 大隊長是復旦大學學生會幹部、物理系學生會主席許雲才。骨幹成員許多都是當時的學生幹部或積極分子：例如外語系學生會主席、新聞系學生團總支副書記、中文系學生黨支部書記，等等。²⁸ 辦公室設在紅旗樓，指揮部設在圖書館。這個組織不久加入全市性的保守派紅衛兵組織「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簡稱「上紅大專總部」）。紅衛兵復旦大隊部成員都是紅五類，骨幹成員大都是學生幹部和黨團員。他們不但排斥「成份不好」和他們所認為「表現不好」的同學，更排斥給校黨委貼大字報的同學。大隊部成員中許多人都是不久前鬥鬼風中的積極分子，成立後仍不改鬥鬼風思路，繼續將教授學者和老師作為主要批鬥對象，在復旦大學教工中留下了很不愉快的記憶。

造反派學生的紅衛兵組織晚了半拍，為了與前者區別，他們在「紅衛兵」後加上「造反派」三個字。8月22日下午，「復旦大學紅衛兵(造反派)」召開「造反有理大會」。但是，復旦統一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最終沒有成立。勞元一等提出，新聞系造反派學生若要加入「復旦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必須去除「殺閻王」等罷官派。新聞系譚啟泰等得悉後，便自己成立了「新聞系八·一八戰鬥隊」，與勞元一等的「復旦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分道揚鑣。胡守均他們的「孫悟空」也因被認為觀點過於激進，被「復旦大學八·一八紅衛兵」拒之門外。²⁹ 日後復旦三大造反派組織紅革會、紅三司和「東方紅公社」（即炮司在復旦校園內的組織）的雛形已初見端倪，不久將在上海興起大的波瀾。

27 樊建政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研究：以復旦為中心》（未刊稿）。

28 筆者 2008 年對安文江的訪談。

29 復旦大學 1986 年 5 月編《大事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

8月24日下午，經再三交涉，校黨委被迫同意在復旦大禮堂歡迎北京歸來的勞元一和孫月珠等四人。市委曹荻秋、馬天水、梁國斌、王一平等也出席了大會。³⁰ 這是持造反觀點的復旦師生首次聚會，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孫月珠激動哽咽的講話感染着所有與會者：「同學們，戰友們……我真不想洗手……真的，我多想讓這雙被偉大領袖握過的手被你們都握一握，把我們無限崇拜的紅司令的溫暖傳給你們啊！」勞元一則在講話前首先引進北京紅衛兵的儀式：「請同學們翻開《毛主席語錄》××頁，讓我們齊聲誦讀三遍……」新聞系的造反派學生宣讀了傳抄來的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³¹ 毛澤東的這篇討伐劉少奇的檄文，當時雖然沒有正式逐級傳達，但已經在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並很快流傳全國。

集會快結束時，來復旦串聯的上海戲劇學院紅衛兵上台，控訴他們大學黨委壓制造反派不准串聯的情形。主持大會的安文江當眾念了一張條子：「強烈要求主席團作出革命決定，立即到上海戲劇學院進行革命大串聯，把毛主席的大字報送到上戲去！」此時已是深夜11點20分。一千四百多人浩浩盪盪從復旦湧向戲劇學院，聲援那裏的造反派學生。第一輛車的車頭前綁着精心裱製的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全文，安文江領隊。復旦學生在戲校與那裏的保守派辯論，直到早上5點方回校。³² 這已經是復旦造反派紅衛兵第三次去戲劇學院串聯，前面兩次分別在8月16日及8月18日，但那兩次去的人數不多，影響不大。這次8.25串聯，轟動全市，不但催生上海戲劇學院造反派，而且使處於少數派的上海高校造反派聯合起來。這個8.25串聯，後來被造反派自稱為「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第一次大聯合」。

30 復旦大學「史紅」戰鬥組 1968 年 7 月編傳單《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31 安文江 1988 年著《我不懺悔》。

32 同上。

復旦大學的紅衛兵領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口才都極好，頗具演講天才。勞元一、安文江、胡守鈞、趙基會、謝葆晨，個個能說會道，演說的煽動力很強，能夠迅速鼓動聽眾情緒。復旦造反派聲名在一系列事件中壯大，而此時，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文革派，態度也越來越明顯傾向造反派，從10月底開始，局勢開始轉向，保守派成批倒戈，原本處於少數派的造反派學生，開始成為多數派。與此同時，造反派內部分裂也愈演愈烈。

復旦：上海三大紅衛兵造反組織的發源地

1966年10月3日，哲學系和政治系十幾個戰鬥組貼出大字報：《對我校當前運動的幾點看法》，既不同意罷官派說「校黨委是保皇黨」的觀點，也不同意保守派說「黨委是堅定馬列主義黨委」的觀點，主張迅速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員會，「邊批邊鬥，揭深揭透」。這個「揭」字當頭的觀點，與復旦大學八·一八紅衛兵「揭」派觀點正吻合。於是，經過多次協商，這些觀點相同的造反派學生，決定聯合成立校級紅衛兵組織。組織起什麼名字？有人提出中共在井岡山時期曾經有「革命委員會」的形式，於是決定叫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前面要不要加「造反」兩個字？有人主張加，但也有人提出這兩個字不利於爭取多數，最後決定不加。此外，「復旦」兩字放在前面還是後面？是「復旦大學紅衛兵革命委員會」還是「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最後決定後者，突出紅衛兵組織的特性。³³ 10月5日上午，「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簡稱復旦「紅革會」）在學校大禮堂誓師，宣佈成立。組成被稱為「勤務組」的校級領導機構；除外文和哲學系每系二人外，其他每系一人。成立初期，有影響的主要負責人是勞元一、馬立新、

33 復旦大學1986年5月編《大事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

謝葆晨、孫月珠、施伯鑫、章慶榮等，後來又增添趙基會。³⁴辦公處設在數學樓後面的「紅旗樓」。第一任召集人是馬立新，後來在1967年「1.28炮打」期間的召集人是趙基會。

在籌備校紅革會同時，勞元一、章慶榮、袁偉生等還到外校串聯，成立全市性紅革會。10月12日，在位於陝西南路的上海體育館，召開「紅衛兵上海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市「紅革會」）成立大會。上海外語學院的學生蕭松主持大會，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梁國斌、市委候補書記王少庸、中共中央華東局文革小組代表楊愷，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市紅衛兵聯絡站主任張文豹、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周炳坤等，應邀出席了大會；楊愷還在大會上講了話。上紅總部和上紅大專總部也應邀派代表出席大會。應邀出席大會的還有著名先進人物、復旦大學電光源實驗室工人工程師蔡祖泉。³⁵

紅革會衝破上海只有一個上紅大專總部的大學紅衛兵組織格局，更打破上紅大專總部對市委的依附格局。雖然成立那天，上海市委派負責人前往祝賀，但市委心裏肯定明白，這個紅衛兵組織與自己是對立的。紅革會是上海最早的全市性造反組織之一，一度成為參加人數最多的紅衛兵組織。紅革會成員除了復旦大學之外，還有上海師範學院、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水產學院、上海機械學院，這四個大學被稱為紅革會的「四大解放區」。此外還有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上海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等院校，後來也吸收一些中學生參加。人員號稱五萬，也有說十幾萬。

紅革會常委會由各成員大學推派代表選舉產生。共九個常委：復旦大學外語系學生勞元一和哲學系學生馬立新，上海師

34 復旦大學 1986 年 5 月編《大事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

35 《紅衛戰報》創刊號，1966 年 10 月 17 日，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編。

範學院中文系學生李功佐³⁶ 和政史系學生繆財生，上海交通大學學生鄭駿，華東師範大學學生關應超，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戴定憲，上海科技大學學生陶正範，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顧正儒。³⁷ 負責人最初是外語學院的學生蕭松。蕭是高幹子弟，不久因中央提出高幹子弟一般不要擔任紅衛兵組織負責人，蕭辭去「勤務員」之職，馬立新擔任了市紅革會負責人。³⁸ 總部辦公處設在復興中路1367號。總部下設宣傳部、作戰參謀部(也稱「二處」)、對外聯絡部、駐京聯絡站、工農學聯絡站、中學部，等等。³⁹ 「二處」負責人勞元一，成員以復旦大學紅衛兵為主，還有師院、交大、科大、一醫、政法等大學的紅衛兵，例如李功佐、賀學軍等；主要工作：對外聯絡、收集動態，編寫簡報。

紅革會機關刊物是《紅衛戰報》，創辦於10月17日，最高發行量80萬份。⁴⁰ 這是上海造反派紅衛兵小報中影響最大的報紙，在外地都很有影響。在上海造反派小報中，《紅衛戰報》創刊最早：1966年10月17日創刊。引發事端最多：從1966年11月底的解放日報事件，到1968年的影印版《紅衛戰報》刊登《一切為了九大》遭批判。辦報時間最長：從1966年10月一直辦到1969年4月。不過其間幾易其主：報紙第一期由紅革會單獨辦，第二期以後，由紅革會與「紅衛兵上海司令部」(簡稱

36 李功佐，女，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師範學院紅衛兵組織「紅革會」主要負責人、市「紅革會」負責人之一，1967年初參與「1.28炮打張春橋事件」；1968年畢業分配至廣西柳州鐵路中學工作。

37 這個名單引自紅革會上海外國語學院野戰軍「應新春」、「從頭越」1967年2月24日傳單《「紅革會」頭頭炮打張春橋同志大事記》中的「紅革會常委名單」。

38 金大陸、金光耀、筆者2010年5月21日對馬立新的訪談。

39 炮司的《工學運動》更早些，1966年9月創刊，不過是16開本的雜誌型。

40 80萬這個數字引自復旦大學1986年5月編《大事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

「紅上司」)聯合辦報；1967年1月28日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後，自1967年2月以後改由紅上司單獨辦。1967年5月被市革會作為中學紅代會(籌)機關報；1969年4月25日與大學紅代會的機關報《上海紅衛兵》合刊為《上海紅衛戰報》，成為大學紅代會和中學紅代會共同的機關報。

紅革會成立後，復旦另兩個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也相繼成立。據其中一個組織負責人安文江後來的回憶：

我們原想成立統一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且甘心讓出校級組織的領導權。但是，以黨團員為核心的紅革會籌備組負責人很講究「階級路線」和「隊伍的純潔性」。我們和周谷聲等對校黨委持全面否定態度，被他們稱之為「罷官派」，他們害怕激進會喪失群眾，會背水一戰。於是，以「譚××(即譚啟泰，筆者注，下同)出身黑幫」、「安××(即安文江，筆者注)父親有歷史問題」、「邱××(即邱勵歐—筆者注))出身反動權威」為由把我們拒之門外。⁴¹

紅革會核心人物，大多是造反的學生幹部或黨團員，出身也「硬」，另兩派紅衛兵對校黨委評價的激進觀點，是他們猶豫而不肯吸收對方的重要原因。

1966年10月18日，哲學系學生胡守庸等貼出《造反公告》，宣佈成立「東方紅公社」，負責人最初是「孫悟空」的胡守鈞⁴²等，後來又增添物理二系三年級學生周谷聲、物理系五年級學生邱勵歐⁴³等。東方紅公社是復旦校園內的紅衛兵組

41 筆者 2008 年對安文江的訪談；馬立新也對筆者談到過。

42 胡守鈞，男，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 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孫悟空」負責人，1967 年初參與「1.28 炮打張春橋事件」；1970 年因「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被判刑 10 年。文革結束後獲平反，後任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

43 邱麗歐，女，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 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物理系

織，成立後不久，即串聯籌備成立全市性組織。1966年11月3日，在華東紡織工學院第二食堂召開「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簡稱「炮司」）成立大會，這個名字取自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負責人是復旦紅衛兵周谷聲。比起紅革會，炮司人數要少得多。

炮司的主要組織成員在復旦大學、上海第二醫學院、華東紡織工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師範學院、以及上海的一些中學如市東、復興、上海、繼光、復旦附中等。而炮司的骨幹，則主要是復旦大學東方紅公社紅衛兵。不過，東方紅公社在復旦校園內不稱炮司；而且復旦東方紅公社的中堅組織「孫悟空」，主要成員胡守鈞更是沒有參加過市裏炮司的活動。儘管如此，外界還是將復旦的東方紅公社及「孫悟空」，看作是炮司成員組織。日後在上海執掌大權的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評論炮司：「人數不多，能量卻大」。

炮司的刊物，有1967年初創辦的《工學運動》，由常委歐陽靖主編；以及小報《炮聯快報》，由邱勵歐負責。炮司對上海文革最有影響的成果，就是與北京紅衛兵一起推動「工總司」的成立，這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組織，以後成為「工人階級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典範，受到毛澤東的關注和支持。炮司的周谷聲⁴⁴，不但參加工總司籌備會議，而且協助工總司參在緊接着發生的安亭事件中，參與了與張春橋的全部談判，包括安亭談判和文化廣場談判。

10月21日，復旦又一個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紅衛兵復旦

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紅衛兵組織「炮司」在復旦大學的組織「東方紅公社」的核心人物；1970年因「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被關押。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 44 周谷聲，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物理二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紅衛兵組織「炮司」負責人，1967年初參與「1.28炮打張春橋事件」。1970年因「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被關押。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大學革命造反司令部」，貼出《宣言》，正式宣告成立，負責人是安文江。據安文江後來回憶說，他們曾經想和紅革會聯合成立紅衛兵組織，可紅革會嫌他們觀點太激進，有人還嫌他們出身不好。安文江要求加入紅革會，校紅革會也曾有將他列進「勤務組」的打算，因為安文江在同學中有號召力。但是安文江所在的中文系有一部分人堅決反對，說他父親有政歷問題，這個所謂的政治歷史問題，後來被認為是校黨委拋出的。有人甚至提出，你們校紅革會如果吸收安文江並且將他列進勤務組，我們就退出紅革會。復旦紅革會成立那天，安文江也去大禮堂參加大會，但是被一幫人強行趕出會場。⁴⁵於是，安文江等自己另外成立造反組織。骨幹成員是以新聞系二年級學生潘嘯龍、譚啟泰為主的「殺閻王」；以中文系四年級學生安文江為負責人的「過河卒」；此外還有物理系「新愚公」以及「反復辟」、「換新天」、「烈焰」、「紅旗」等小組。「孫悟空」，最初也是「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後來獨立出去了。

「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造反司令部」不久加入了1966年11月22日在文化廣場成立的全市性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三司」）。當時北京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紅三司興起，這個名字顯然是學他們的。市紅三司總部負責人是復旦大學的安文江、譚啟泰，以及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學生趙全國等。復旦大學校內的紅三司負責人是復旦新聞系二年級學生潘嘯龍。紅三司的機關報是《革命造反報》，由譚啟泰等負責編輯。不過，紅三司成立不到一個月即分裂。同年12月20日，紅三司內部在籌備「華東六省一市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等事情上發生矛盾。當時來滬串聯的聶元

45 金大陸、金光耀、筆者2010年5月21日對原「紅革會」負責人、復旦大學學生馬立新的訪談。

梓召集上海的造反派開會，建議召開幾十萬人大會，要中央撤上海市長、市委書記曹荻秋職。譚啟泰等認為聶元梓把自己當救世主，於是寫大字報號召「走自己的路」，在造反派內引起辯論，一些人認為譚啟泰干擾鬥爭大方向。12月底，紅三司分裂成兩個組織。復旦大學安文江、譚啟泰等仍屬於紅三司。另一派趙全國等則成立了「紅上司」。

紅三司的成員組織主要在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上海科技大學、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華東政法學院、上海財經學院、上海海運學院、上海體育學院、上海職業外語學校等，號稱人數十萬。其中大學紅衛兵20%左右，其他都是中學、中等專科學校和技術學校的紅衛兵。紅三司沒有如炮司那樣參加工總司籌備。1966年11月6日，正在籌備中的工總司潘國平去復旦找到安文江，希望他們利用影響聲援工總司，但安文江對工總司重要性認識不足，同時也不喜歡潘國平「言談舉止透出股油頭粉臉的流氣」，成立大會那天沒去。⁴⁶ 紅三司也沒有參加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換句話說，上海文革初期的「三大事件」，紅三司都沒有參與。紅三司和炮司關係較好，和紅革會不相往來。

紅革會、炮司和紅三司，將要在上海掀起大風波，在1966年11月至12月底的上海文革中，它們都將是最重要角色。這三個組織，紅革會成員最多；紅三司的負責人能說會道，他們大都來自中文系和新聞系；炮司人少能量卻大。因此被稱為「紅革會的人，紅三司的嘴，炮司的腿」的形容。⁴⁷ 三大紅衛兵組織的崛起，帶動上海其他造反勢力崛起。日後成為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班子的「上海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機關聯絡站」），最初的造反，紅革會起了相當大作用；日後成

46 安文江 1988 年著《我不懺悔》。

47 樊建政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研究：以復旦為中心》（未刊稿）。

為工人階級參加文化大革命典型工總司的成立，炮司起了非常大作用。而在上海1967年的一月奪權中，紅三司奪市公安局的權，在當時影響很大。但是，到1967年，這三個組織卻都因為炮打張春橋而聲勢大減。不過紅三司仍成為不久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之一。而紅革會和炮司，則被取消參加公社發起單位資格。

紅衛兵造反組織在全市興起

從紅三司分出去的趙全國⁴⁸，是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一年級的學生。生於1940年，家庭出生革命幹部，不過從小和在農村的母親生活。上大學前在部隊當兵，在團裏做文藝表演方面的工作，曾經得過獎。1965年，所在部隊將他作為調幹生送去報考上海戲劇學院。當時趙全國正忙於團裏的表演，團政委就讓通訊員代趙全國去戲劇學院報名。到那兒才知道，年齡限在24歲，而趙全國那時已經26歲。通訊員就將趙的歲數報小了兩歲。所以趙全國比一般19歲左右進大學的學生，年齡要長上好幾歲。趙全國通過了考試，成為戲劇學院表演系的學生。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和其他大學一樣，戲劇學院的「學術權威」以及有「政歷問題」的教師員工，首當其衝地被拋出作為批判對象。趙全國卻在6月22日貼出學校裏第一張針對學院黨委的大字報，立即遭到圍攻。趙全國與校內觀點相同的學生互相串聯，一幢名為「灰樓」的灰色辦公樓是他們的聚集處。「灰樓」在崇尚紅色的革命年代不太好聽，造反派學生們給這幢樓起名為「革命樓」，後來，又以「革命樓」為名，成立戲

48 趙全國，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紅衛兵組織「紅上司」負責人；1967年1月因一月奪權被關押，後雖放出，但畢業後沒有被分配工作。

劇學院的造反組織，負責人是舞台美術系的學生侯邦琪⁴⁹。趙全國最初也是革命樓成員之一，後來因為觀點不一，⁵⁰ 趙全國就又成立了「井岡山」，後來又和其他大學的造反派學生，成立了紅三司。不久，因與安文江的矛盾，趙全國從紅三司分了出去，於1966年12月20日另外成立「上三司」，全稱還是「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不過在後面加括弧：（上三司）。不久，為與紅三司區別，在名稱前加上「大專院校」：「上海市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還是趙全國。這個從紅三司分出去的上三司，雖然名為「上海市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但成員除上海戲劇學院外，以中學生為多，佔80%。所作最有影響的行動，是在1967年「一月革命」中兩次奪權。上三司因此被砸，負責人趙全國被抓。

交大反到底和同濟東方紅也是上海比較有名氣的紅衛兵造反組織。1966年8月24日，以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嚴步東為核心，成立「反到底戰鬥隊」，1966年10月18日，嚴步東⁵¹、余小兵⁵² 等人成立上海交通大學交大「反到底兵團」（簡稱「交大反到底」）。同濟大學「東方紅公社」成立於1966年10月15日，最初只是各系「公社」的鬆散組織，有事各系公社派代表開會決定，總部只設一個總負責人和幾個核心成員。第一任負責人

49 侯邦琪，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學生，共青團員，班級團支部委員。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戲劇學院紅衛兵組織「革命樓」負責人；文革中歷任上海戲劇學院校革委會主任、上海市文化局革委會委員。文革後被解除所有職務。

50 據趙全國 2009 年 1 月 24 日對筆者回憶，是因為他們不肯吸收原來的保守派。

51 嚴步東，真名嚴惠林，男，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交通大學七系冶金 68 屆學生，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是交大紅衛兵組織「交大反到底」負責人；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1968年畢業分配至上海江南造船廠工作。文革結束後被判刑 7 年。2004 年病逝。

52 余小兵，真名余身偉，男，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交通大學一系 67 屆學生，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交通大學紅衛兵組織「交大反到底」負責人之一；1968年畢業分配至上海 5703 廠工作，曾在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工作。文革結束後被判刑 8 年。

卞某，第二任負責人王德龍。1966年11月，王因與總部意見不和，離開總部。以後陳敢峰⁵³成為第三任負責人。同濟東方紅參加了上海文革前期的所有活動。在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中，交大反到底和同濟東方紅都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

其他比較有影響的大學紅衛兵組織還有：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負責人舞台美術系學生侯邦琪。革命樓後來又分裂，以陸振球為首另成立了「狂妄大隊」。上海師範學院紅革會和「井岡山總部」在全市也比較有影響。前者負責人中文系李功佐，後者負責人赫明堅。此外，還有上海音樂學院「新上音紅衛兵戰鬥團」；上海外國語學院紅革會和紅三司；華東化工學院「紅旗」和「新化工」；上海水產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的「紅旗戰鬥兵團」（簡稱二軍大「紅旗」）和「紅色造反縱隊」（簡稱二軍大「紅縱」），等等。

上海的大學紅衛兵組織，主要以紅革會、紅三司為主；炮司人數雖少，能量卻大。紅革會、炮司和紅三司，在1967年初發起炮打張春橋，許多負責人後來大都挨整，或不被信任，只有同濟東方紅負責人陳敢峰青雲直上，擔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還當上九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是上海紅衛兵中僅存的少數碩果之一，也是九屆中央委員中唯一的紅衛兵代表。從福建農村出來的陳敢峰比較「聽話」，同濟東方紅因此被稱作「投機東方紅」，陳敢峰被叫為「陳看風」。不過，到文革後期，陳敢峰因為與上海駐滬空軍政委王維國過從甚密，王維國又被認為是林彪集團的，陳敢峰因此受到牽連，被關押審查。

53 陳敢峰，男，1943年生，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同濟大學紅衛兵組織「同濟東方紅」負責人；歷任上海市大學紅衛兵代表大會（市大學紅代會）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關押4年。文革結束後被判刑8年。

全市性中學紅衛兵組織

上面提到的這幾個大學紅衛兵組織，影響雖然大，但不是最早成立的造反組織。上海第一個不受上海市委控制的紅衛兵造反組織是中學生的。上海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上紅總部成立後，加入它有三個條件：1. 承認上海市委基本正確，2. 在上海市委領導下開展運動，3. 要文鬥不要武鬥。⁵⁴ 一些學校紅衛兵對第一條尤其不滿，認為市委是否正確還要在運動中看。有些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最初也想加入上紅總部，但希望取消這一條。他們派代表與上紅總部談判，但上紅總部堅持認為上海市委正確，談判沒有成功。⁵⁵ 於是，格致中學、上海第五十一中學、上海第二女子中學、南洋模範中學、上海中學、黎明中學等中學的紅衛兵組織，便串聯另外成立組織。1966年9月29日在盧灣體育館召開「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西南」）成立大會。紅西南是上海中學紅衛兵，也是上海紅衛兵中第一個造反組織，成員組織主要在上海西南地區的徐匯區、長寧區、靜安區以及上海縣。主要領導成員是上海中學高中學生李曉明、上海第五十一中學高中學生童志芳、上海第六十四中學高中學生葉定海等。自紅西南成立以後，各類紅衛兵造反組織紛紛成立。

紅西南成立後不久，1966年10月13日，又一個中學紅衛兵造反派組織成立。因為有紅西南成立在前，這個紅衛兵便取名「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東北」）。顧名思義，成員以上海東北地區中學紅衛兵組織為主。負責人是復旦附中高中學生夏寧等。此外，「紅衛兵上海司令部」（簡

54 筆者2006年9月3日採訪原「上紅總部」作戰部部長、上海市上海中學1966屆高中生李小明的筆錄。他對筆者說他在「上紅總部」成立大會上發言也提到這三條。

55 原「紅西南」負責人、上海市第51中學1966屆中五學生屠伯森2006年9月3日對筆者的回憶。

稱「紅上司」)，成立於1966年10月11日，主要成員為中學紅衛兵，機關刊物是與紅革會聯合辦的《紅衛戰報》，負責人是交大附中邵企敏。另一個中學生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紅衛兵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紅反會」），成立於1966年10月6日，負責人前期主要是上海輕工業學校學生高健武，後來是市一女中高二學生宋愛武(女)、吳淞中學高中學生蔣彪等。宋愛武後來是上海市革委會委員，是市革委會中唯一的原中學生紅衛兵。還有一個全市性中等學校的造反組織「紅衛兵上海中專技校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紅中技」），負責人是一所技校的學生顧瑞康。這幾個中學紅衛兵造反組織，後來都成為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

據文革後上海地方志記載，文革期間上海全市各類紅衛兵組織最多時達5430個。⁵⁶

從反校黨委到反市委

上海的造反派紅衛兵們真正在上海掀起風浪，是在1966年10月下旬以後。而在此之前，從8月下旬開始，市委根據國務院指示精神，安排學生分期分批赴北京串聯。不過這種官方安排和選派串聯人員的方式，很快就被打破。大批學生自行結伴，不買車票強行乘車外出串聯。上海所有高校和中學的學生幾乎傾巢而出。留在學校的都是「出身不好」沒資格串聯者。第一批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時，正是上海紅衛兵大批外出串聯之際。所以，在北京紅衛兵對上海市委的衝擊行動中，很少看到上海學生對他們的聲援或他們與上海學生的聯合行動。當然，另一方面原因，也是由於當時上海保守派勢力的強大。從10月開始，外出串聯的學生陸續回校。正如毛澤東所希望的，這些經歷了大

56 引自《中共上海黨志》：中共上海黨志——特記「文化大革命」紀略，《中共上海黨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串聯的學生，尤其是去過北京的學生，無一不被北京的文革氣氛感染。不要說原來持造反觀點的學生，就連那些原來反對北京紅衛兵炮轟上海市委的學生，去北京後也大都轉變了觀點。

10月5日，中央軍委的一個文件在全國激起波瀾。這份《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說：「凡是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所謂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並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這個緊急指示還宣佈，取消黨委對軍隊院校的運動領導。中央軍委的這個緊急指示頒發沒有多久，復旦大學校團委有人揭發出一份《學生團幹部思想動態》。這份由黨委指使整理的材料，將團幹部按左、中、右，分為五類：

一、左派

在運動中聽黨的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按最高指示辦事，堅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立場堅定，態度分明，大是大非問題分得清，能大膽揭發問題，工作積極主動，能夠帶動周圍同學一起投入運動。這一類幹部佔大多數，在一百五十七名正副書記和支部書記中有一百零三名是屬於這一類，佔百分之六十五點五。……

二、中間

這一類幹部能聽黨的話，對於大是大非問題看得尚清楚，對黨的政策一般能領會，但態度不夠堅決，工作有點畏難情緒，縮手縮腳，不敢大膽發表意見，也不善於團結群眾，作群眾的思想工作，因而在支部中所起的作用不大的。……

三、糊塗

對文化大革命認識較差，覺悟較低，有許多糊塗觀點，屬於這一類幹部的有十二人，佔百分之七。……

四、動搖

不大聽黨組織的話，在重大問題上搖擺不定，情緒變化較大，對黨組織有一些懷疑，屬於這一類幹部有八人，佔百分之五。……

五、活躍分子

這類人是站在與黨相對立的立場上看問題，有的還在群眾中煽動，影響很壞，這類幹部五人，佔百分之三。⁵⁷……

這份名單引起學生們的憤怒，認為這是明顯準備秋後算賬。造反派學生一再要求黨委交出「黑名單」。但是他們下通令、談判，都沒有達到要求，黨委始終不肯交出排隊名單。黨委認為自己沒有整學生材料，進行排隊是任何運動都要做的常規工作。但學生們認為排隊就是「整黑材料」。學生對於黨委派人抄寫他們所貼的大字報也心有「預」悸，認為黨委抄這些大字報是為了日後打擊報復時有據可查。黨委解釋說這只是為了保留運動的資料，學生們不相信這樣的解釋，說這些大字報抄件也是「黑材料」。

10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發出陳丕顯在北京制定的《市委關於大、中學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領導問題的通知》。這個通知的內容是比照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的那個緊急指示的。上海市委19日的通知，也宣佈停止上海各

57 徐振寶 1968 年編《復旦大學大字報選》。收於「上海文革史研究資料匯編」，金光耀、金大陸主編，2014 年出版。這些被認為的「活躍分子」，日後主要都集中在炮司和紅三司，紅革會中也有，如勞元一等。

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黨委(總支、支部)對文革的領導。⁵⁸ 這個通知，被造反派學生認為是黨中央對他們造反行動的支持及市委的潰退。10月20日，復旦造反派學生即查封了校團委辦公室；10月29日，兩名學生貼出絕食聲明，並於第二天開始絕食。復旦的紅三司、紅革會和東方紅公社，都積極參與，或靜坐，或聲援，或在現場與前來勸說的保守派們辯論。11月2日，由於周恩來辦公室的干預，市委同意派出市委副秘書長杜淑貞與復旦造反派達成協議。⁵⁹ 但是隨後，復旦黨委還是沒有交出造反派所認為的黑材料。一般來說，被認為是「黑材料」的，不但包括排隊分類，而且還包括「積極分子」打的小報告。如若披露，將引起群眾之間的猜忌和矛盾，有可能引出更大衝突。這是運動初期，許多學校以及工廠的黨委或工作隊，不肯交出黑材料的重要原因。

11月4日，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的趙全國等強行衝進學校黨委檔案室搶黑材料，⁶⁰ 這是有記載的文革中上海第一起「搶黑材料」事件。接着，11月8日清晨6點，復旦紅衛兵也採取行動。紅三司和東方紅公社率先衝擊復旦大學的校檔案室；紅革會聞訊後，立即召集人員封鎖檔案室外圍的現場，以示聲援。前來支援的還有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輕工業專科學校等紅革會的紅衛兵。紅三司的安文江和潘嘯龍帶領，從屋頂鑿洞進入校檔案室，搶出學生排隊名單，交由黨員學生查看。即使是造反派學生，對黨員優於其他人的權利也是接受的，認為只有黨

58 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59 《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力平、馬芷蓀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1997年6月出版。

60 上海戲劇學院工人赤衛隊、紅衛兵縱隊、硬骨頭戰鬥隊、雪山怒火戰鬥隊，1966年11月18日傳單《包圍黨和國家機密是我們的光榮職責——上海戲劇學院11.4事件簡介》。

員才有資格接觸檔案。搶黑材料行動轟動全校。⁶¹ 緊接着的11月9日和10日，復旦紅革會又兩次集合人員去上海機械學院和上海外國語學院，幫助搶黑材料；⁶² 與此同時，上海的其他大學，也接連發生搶黑材料事件。10月26日，交大學生要求校黨委交出黑材料而絕食；11月5日，在交大反到底申志明等的帶領下，交大學生衝擊他們認為藏有黑材料的校黨委政治部和組織部。⁶³ 11月5日和7日，上海師範學院接連發生學校紅革會衝擊體育系、政史系和中文系黨總支的搶黑材料事件；11月7日，師院紅革會去市委檔案室搶了師院運動的資料。⁶⁴ 這一時期上海發生搶檔案的大學還有華東師範大學，上海科技大學，等等。對搶黑材料行動，市紅革會的機關報《紅衛戰報》，11月11日特地在第5期第一版配發社論：《搶得對！搶得好！》之後，不但學校，許多工廠也都發生搶黑材料事件。

這一時期各大學造反派紅衛兵所搶的黑材料，主要都是對學生的政治排隊材料。這樣的排隊究竟是市委佈置的，還是學校黨委對政治運動的習慣性行動？據文革後有一所大學所編校史記載：1966年8月中旬「曹荻秋佈置，各校在學生中排左、中右、名單」。⁶⁵ 這是當時最令人痛恨也最令人生畏的個人檔案制度。黨委或工作隊列出他們所認為可以依靠的「運動積極分子」，或是運動打擊對象，或是必須密切注意甚至監視的「活躍分子」。這樣的資料或排隊，以後大都被塞進對象的個人檔

61 以上復旦搶「黑材料」的資料，引自復旦大學1986年5月編《大事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以及「紅三司」的材料引自安文江1988年著《我不懺悔》。

62 復旦大學1986年5月編《大事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

63 《上海交通大學紀事：1996-2005》，上海交通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64 《新師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6年6月1日至1967年7月10日》，新師院人民公社1967年7月編。

65 上海交通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2006年編《上海交通大學紀事：1996-2005》。不過這份校史沒有注明資料來源。

案，在當事人毫不知曉的情況下，甚至可能左右其一生的命運。文革初期各學校、各工廠屢屢發生的搶黑材料，都與幹部們背地對群眾進行這樣的政治名份分類有關。

校園內的反校黨委行動，很快發展為校園外的對上海市委的批判。在復旦大學針對着楊西光。楊西光從1954年起便擔任復旦大學的黨委書記，1959年後兼市委教育衛生部長，1965年被任命為市委候補書記。由於長期任復旦領導，加上身兼市委教衛部長，以後又任市委候補書記，所以復旦的紅衛兵將他看作市委在復旦的代理人，從1966年10月開始，紅三司和紅革會連續發起「打楊戰役」批判楊西光。而在華東師範大學，學生們將批判矛頭對着市委教衛部部長，華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在同濟大學，批判矛頭對着工作組長、市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主任陳琳瑚。紅衛兵們以批判這些在大學任職的市委幹部，作為批判市委的突破口。

10月22日，由市紅革會主辦，紅三司、紅上司、紅西南等參加，近萬紅衛兵在文化廣場首次隆重舉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誓師大會」。這個大會只是個表態性的大會，還沒有明確公開地將市委作為批判對象，所有發言都只是針對「資反路線」，沒有具體針對市委。但是很快，紅衛兵們的批判矛頭將明確指向市委。尤其安亭事件之後，「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成為上海造反派紅衛兵的共識。11月下旬，市紅三司和市紅革會先後召開批判上海市委的全市性大會。這兩個大會，將要在上海掀起繼安亭事件之後的又一起大的事件——《解放日報》事件。

結語

相比北京，上海各高校學生的造反成本不是很高。北京的工作隊壓制學生，將學生打成反革命；而在上海，由於與北京的時間差，各高校黨委根本不敢對學生進行壓制。雖然貼大字

報的學生也遭到圍攻，而且這些圍攻大多是黨委默許、引導甚至暗地組織的；但像清華大學王光美領導的工作組對蒯大富那樣的批判和關押，在上海的學校基本沒有發生。⁶⁶ 學生與各級黨委的衝突，主要在於「黑材料」。黨委以政治排隊的方式，為秋後算賬背書。這樣的政治分類，日後有可能會對畢業分配起着重大影響。背上政治異己名份的學生，有可能會被懲罰性地分配去邊遠地區，或是比較差的工作，而且因不受信任一輩子升遷無望。政治名份，就將這樣影響着今後的職業身份和戶口身份。

如果說，文革最初對「牛鬼蛇神」的批判，還只是學生們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號召的表態性行動；那麼「搶黑材料」則是學生們對關乎自己一輩子前程和自身利益的務實行動。這是以文革話語，反抗十七年越來越嚴密的對人的無所不在的監控和威懾，反對少數握有大權的幹部決定大多數人的政治身份乃至終身命運。不得秋後算賬，實際就是不得在運動後期再來一次政治分層，強加名份。

搶黑材料，又是造反派逾越規範的開始。在此之前，雖然對「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和毆打等行為也都是逾越規範的；但是這樣的行動，文革前的四清已有端倪，文革初期又被用來對付各級黨委劃定的對立面；而且甚至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的土地革命時期，是共產黨的與生俱來的革命手段。而搶黑材料行為，則針對各級黨委自身，而且質疑共產黨劃分政治名份的操作規程和權力。這個挑戰共產黨對民眾的嚴密控制制度的行動，是之前所從未發生過的。可以說，這是文革中造反派對十七年規則的第一次真正逾越。

自六十年代後越來越嚴格的階級路線，以及對學生越來越政治化的要求，對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造成了壓抑感，許多人因為家庭出身不被信任。他們文革初期被排斥在運動外，

66 筆者所知關押過人的單位，似乎只有一個衛生學校，還有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

沒有對政治的參與權。換句話說，他們被隔離在主流政治之外。批判資反路線，使他們獲得革命和造反的權利。他們以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各種講話為資源，積極投入文革運動，為自己積累和提高政治名份。

從8月至10月，上海造反派紅衛兵的活動，主要還是進行串聯，壯大組織力量，通過各種大會或行動，顯示自己的革命性。這一時期上海的運動，已經漸漸脫離市委導向，和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的導向逐漸一致。校園內的反校黨委鬥爭，正在與校園外的反市委鬥爭合流。

第六章

工廠裏的造反派 響應毛主席號召的積極分子們

工廠文革從上海開始

上海校園中紅衛兵造反派興起的同時，上海工廠中的工人造反派也正在興起。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上海工廠裏的工人造反派連「派」也稱不上，他們只是工廠裏反對工作組或黨委的活躍分子。他們大多數連「戰鬥小組」之類的組織都未成立，活動還只限於自己所在的工廠。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一定去過市委門前，但那時他們還只是看熱鬧的圍觀者；若幫着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民辯論，也只是單槍匹馬。在那一時期的傳單中，可以看到一些上海學生造反派組織署名的傳單，很少看到以工人造反組織署名的傳單或大字報。

上海工廠的文革運動是從1966年7月以後開始的，這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向毛澤東請示的。他們在6月30日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在上海已經開展四清的工廠試點，以文革為中心開展運動：

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在展開，中央和省市領導必須用很大力量領導這個方面的運動。如果工礦企業、基本建設等基層單位一齊動起來，領導上顧不過來，容易出差錯。最近工業交通和基本建設的計劃完成得不算好，特別是鋼、鋼材、煤的產量開始下降，質量下降的

情況尤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務原計劃上半年完成40—45%，現在只能完成35—36%。因此，在京同志討論之後，認為文化革命運動的部署方面，重點放在文化教育部門、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建、商業、醫院等基層單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條結合文化大革命進行（上海正在進行四清的40萬職工的企業，決定以文化革命運動為中心的方法進行，我們已答覆同意，看看他們的經驗如何，再行推廣）。這是一個重要決定，請主席考慮決定。擬了一個通知稿，請審核。

7月2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¹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於是立即頒發336號文件，要求全國的工廠企業結合原來正在開展的四清運動，將「文化大革命插進去進行」。但是，上海與全國不同，上海是將四清運動轉為文革運動，劉少奇想以上海為試點，再酌情推廣。

7月中旬，原來被派往上海郊縣農村人民公社的四清工作隊員全部被調回市區，與另外調集的幹部組成文化革命工作隊。7月15日，上海市委在上海展覽館和文化廣場，召開全市進駐工廠的一千五百名文化革命工作隊員會議，曹荻秋講話。從曹荻秋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他對正在全面展開的文革有着某種預感和擔憂。他在慣常的形勢分析和工作佈置之後，特別提出堅決不整群眾，說：「這方面要特別小心，否則要犯原則性的錯誤，因為不是反革命，你反擊變成壓制革命；若是反革命，你不管也不好，所以要慎重。」²

1 《劉少奇、鄧小平1966年6月30日給毛澤東的信》，以及毛澤東7月2日的批覆。中發(66)336號。

2 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資料匯編第1集：《曹荻秋1966年7月15日下午對文化革命工作隊員的講話》，新師大文革籌委會、物理系「五敢」聯絡部、化學系《挺進》兵團聯合翻印，新北大《叢中笑》戰鬥組印，1967年2月，上海。

但是，大多數工作隊負責人沒有注意到曹荻秋的話。與文革中派往大中學校的工作隊一樣，工作隊實行的仍是老套路，不能心平氣和地聽聽下面的意見，哪怕是與事實不符的意見。工作隊仍然堅持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他們沒有想到，這次毛澤東要破除的，恰恰是這種自上而下的十七年運動模式。儘管半個月之後，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的《十六條》一再強調，不要對貼領導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但工作隊和各級黨組織很難擺脫十七年的慣性思維。因為十七年經驗告訴他們，不積極組織反擊，他們自己或許將會陷入「右傾」或「包庇」的危境。所以他們整人，也是對自己的保護。上海市委社教辦公室後來在8月和10月專門整理了調查材料。這些材料表明，8月調查了「壓制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的事件93起，其中被處分者190人；10月共搜集了310起「壓制民主、打擊革命群眾」的事例，其中工作隊製造的有49起，基層幹部製造的262起；發生在《十六條》公佈前的272起，《十六條》公佈後39起。³ 這種壓制，激化了早已潛伏的幹群矛盾，也觸發了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被壓抑的個性的爆發。

工廠基層幹部王洪文

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無疑首推王洪文。⁴ 王洪文是全國第

3 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派城市社教辦公室戰鬥隊在1967年5月8日批判陳丕顯、曹荻秋大會上的發言《陳、曹「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惡毒手法》，載於1967年5月13日第7期《大會專刊》，「大會專刊」編輯部主辦。

4 王洪文，男，1934—1992年，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工總司」）發起人之一，並擔任主要負責人。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警備區政治委員，中共第九

一個被中央文革小組明確支持的跨行業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工總司的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1966年王洪文正值而立之年，是國棉十七廠的保衛科幹事。國棉十七廠是上海最大的三家紡織廠之一，當時有八千多名職工。工廠前身是日本人經營的裕豐紗廠；1945年抗戰勝利後收歸國有，改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第十七棉紡織廠。1949年後改名國營第十七棉紡織廠（簡稱「國棉十七廠」），七十年代又改名為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簡稱「上棉十七廠」）。工廠地處上海東北角楊樹浦，也稱楊浦工業區，是這個工業區引人矚目的大型全民所有制企業。

王洪文1934年出生於東北吉林長春的一個貧農家庭。他曾經對人回憶過自己小時候家裏的窮日子：「可苦啦！兩三歲那年生過一場大病——其實不是病，那是餓的呀！父親以為我死啦，就把我丟到了荒郊野外，後來摸摸好像還有點熱氣，又抱了回來。」⁵ 他1950年入伍，1951年隨所在的27軍80師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朝鮮戰爭。在部隊先是當警衛員，後來在師部通信科當通信員，班長級。履歷表上顯示他在志願軍軍樂隊吹過小號。徐景賢曾問過王洪文，王洪文說是吹黑管。⁶ 而王洪文妻子崔根娣的回憶，說王洪文還會拉手風琴，吹口琴。手風琴雖然拉得不專業，但能拉出個調調。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王洪文隨部隊調往江蘇省無錫市。1956年王洪文進入南京預備軍官訓練團。同年9月，他以副排級預備役少尉從部隊復員，分配進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作。王洪文從一個東北農村的青年，參軍，復員，成為中國最大城市上海的大廠工人，完成他身份轉換的重要幾步。

小時候王洪文家裏條件差，只念過三個月私塾，不識幾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文革結束後被判無期徒刑，1992年病逝於獄中。

5 這是王洪文去中央後，對中央住處的服務員說的，蕭木在一旁聽到。一次和筆者閒聊時蕭木又告訴了筆者。

6 徐景賢著《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出版。

個字。他後來對人回憶說：參軍後部隊組織學文化，起初他不願學，有空喜歡上山去打獵。在朝鮮時，有一次家裏來了一封信，他請人給他念。旁邊的人說：他不肯學文化，不要幫他讀。「這句話很刺激我，這樣我就開始發奮學習，我託人從國內帶來一本詞典，就是這樣學習了文化。」⁷進國棉十七廠之後，他又堅持讀夜校，讀到初中。在夜校，他認識了同班的女工崔根娣，她後來成為他的妻子。據崔根娣以後回憶說，王洪文的語文特別好，以後又比她多讀了幾年夜校。⁸進廠後，王洪文最初在四紡車間當揩車工，不久調到二紡車間，成為技術含量較高的保全工，後來又擔任二紡車間的治保主任。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調到廠保衛科做民兵工作；7月，他被正式調往廠保衛科任保衛員，人事關係從工人編制轉為幹部編制，成為工廠的科室人員。⁹編制從工人轉為幹部，身份從工人轉為管理人員。轉為幹部編制，是對他的提拔，也顯示他受到信任。王洪文實現了又一次身份轉換。到文革前夕，王洪文的月工資是64元。¹⁰

六十年代初期，因大躍進造成國民經濟衰退，上海組織十萬人圍墾長江口的崇明島，國棉十七廠也抽調幹部赴崇明。王洪文1960年9月被動員去崇明參加圍墾兩年，期間因為患闌尾炎，曾回上海動手術十多天。1962年12月回到廠保衛科。

文革後，對王洪文文革前的經歷，有兩種評價。一種評價是正面的，都是朋友、同事的回憶：說王洪文很喜歡看書讀

7 這是文革中王洪文對王腓利回憶的，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原工總司總部王腓利的訪談。

8 這是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告訴筆者的。

9 《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徐景賢家人編輯，徐景賢著，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出版。

10 這個數字是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回憶的。而據王腓利對筆者的回憶，他記得王洪文當初告訴他說自己的月工資是 64 元；不過若再加 4.50 元月獎金，則是 68.50 元。

報，而且口袋裏老裝着本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有空就讀。這是當時毛澤東推薦給幹部們看的書，工人中絕少有人閱讀這類理論書籍，可見王洪文文革前就對政治比較感興趣，也肯學習。王洪文的人緣也比較好，1958年二紡車間長日班黨支部改選，他得票較多。王洪文的同事唐文蘭更回憶說：「王洪文這個人過去表現不錯的，不能因為他是四人幫就把他的過去說得一無是處，這不符合事實。他以後的表現是以後的事。王洪文與其他人的關係也都不錯。」¹¹

另一種評價則比較負面：說他在朝鮮當通信員時「貪生怕死，不願在前線，一直鬧情緒，吵着要求調後方軍樂隊。」在南京預備軍官訓練團時，「鬧着要復員」。說他1956年剛進廠時，「吵着要補助，還煽動四五個復員軍人一起鬧補助」。說他進工廠當措車工時「吵着要當技術工，當上技術工後，又對師傅說自己不想吃技術飯而想吃政治飯。」說他那次「因改選得票最多，便想當脫產的黨支部書記。後來到廠保衛科，又想當科長。」說他在1960年國民經濟衰退時期說：「我東北老家沒有吃的，安徽餓死幾萬人。我們工人應該在廠裏做工，怎麼到崇明去圍墾。」說他因闌尾炎從崇明回上海動手術是「裝病」，說他講過：「天災？我看是人禍！」而且當「黨組織號召黨員分挑困難，節約糧食定量，他卻說：他媽的，叫老子餓着肚子幹活，這是什麼社會主義？什麼政策？要把人都餓死了！」說他收聽「敵台」的短波，被人發現，自辯說「我聽聽台灣在講什麼」。¹² 說1958年那次黨支部改選，他滿以為自己

11 筆者1992年5月17日對唐文蘭的訪談。唐文蘭，女，文革前是國棉十七廠黨委組織科幹事，檔案員，中共黨員。文革初期與王洪文一起造反，後來一直是王洪文的得力助手；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中共上海紡織工業局黨委副書記、紡織局工會主任。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回原工廠當工人。

12 此節資料引自《文匯報》1977年3月20日、6月4日文章，《解放日報》1977年11月20日文章，以及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幫」專案小組辦公室1977年3月編《反黨分子王洪文罪行年表》。

得票多可以當上脫產的專職黨支部書記，但上級決定由原來的支書連任，他只當上不脫產的宣傳委員。「王洪文很惱火，經常拒不參加支委會，並事事與支書對立。」¹³ 等等。

後一種評價都是文革結束後對王洪文的揭發和批判，有着明顯的時代話語特徵。但剝去話語的政治外殼，還是可以大致看出王洪文的性格脈絡：雖然是黨員、政工幹部，但又不像當時一般黨員和政工幹部那樣「聽話」，那樣「黨叫幹啥就幹啥」；他知道爭取自己的利益，有着自己的人生設計或目標；他關心政治，注意掌握各種信息，不但閱讀公開發行的報刊，而且收聽不被允許的海外信息；他敢說話，也比別人敢出頭。但是，王洪文畢竟是共產黨員，長期在共產黨嚴密的組織紀律下工作生活。上面所列舉的所有負面評價，即使在當時政治環境中，也不算太出格，那些話充其量只能算是牢騷話。

不過，許多當年同事對王洪文有個共同感覺：想當官。當時和王洪文一個保衛科的同事馬驥，文革初期是與王洪文造反組織對立的保守派組織負責人。他認為王洪文平時為人不錯，隨和，講義氣，喜歡出頭為別人說公道話，在工人中有威信，¹⁴ 而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文革後對王洪文的評價，則說他「愛管閒事」。崔根娣的意思是說王洪文好打抱不平，好幫人調解糾紛、有公共意識。她說：

王洪文為人熱心，愛管閒事。里弄裏有位80多歲的老人，與子女吵架想不開喝鹽鹵自殺，王洪文將老人的子女叫去狠狠批評了一頓。為這類事情他也得罪了一些人。文革起來，他越發起勁了，真是沒日沒夜了，好像廠裏的事，

13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133 頁，

14 筆者 1989 年 7 月 6 日對原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原國棉十七廠工人赤衛隊負責人馬驥的訪談筆錄，載於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史林》，發表時題目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市裏的事，全都要他去操心似的。後來就鬧起了「安亭事件」，嚇得我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整夜整夜睡不着。我也勸過，可他那個牛脾氣，哪裏肯聽啊，還罵我死落後。¹⁵

王洪文最初的造反

1966年6月12日這天，聶元梓大字報廣播後不久，廠醫務室旁的大字報欄貼出一張大字報，標題為《剝開畫皮看真相》，轟動全廠。這張大字報由王洪文起草並領頭簽名，後面還有六人簽名，其中五人都是保衛科幹部。王洪文說：「聶元梓大字報是七個人，我們也來個七人」，這七人全部都是共產黨員。¹⁶

國棉十七廠黨委當時沒有正書記，由黨委副書記張鶴鳴主管工作，王洪文大字報就是針對他的。當時廠黨委規定「貼大字報要經過組織審閱」，這是廠裏第一張未經審閱並針對廠部主要領導的大字報。¹⁷ 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王洪文在受審時，交待他寫這張大字報的原因：

我們認為廠黨委執行修正主義的幹部路線。我當時在保衛科工作，有兩個人，應定為反革命，廠黨委未表態。我在

- 15 這是崔根娣對蕭木說的，蕭木告訴筆者的。此外，文革剛結束時，在許多批判王洪文的文章中，都說王洪文偷廠裏的花布，拿回家去做衣服。筆者2012年曾經就此事問過崔根娣，她回答說，國棉十七廠是生產白胚布的，沒有印染車間印染花布；所以說王洪文偷花布是沒有的事情。不過王洪文確實往家裏拿過布，不是花布，是被機油等弄髒的胚布，斑斑點點，看上去像花布，廠裏工人都把這些工廠的下腳料拿回去廢物利用。她說，當時家裏孩子多，所發布票不夠用，王洪文也確實拿過。筆者曾經在工廠當過十年工人，據筆者的了解，廢物下腳料，未經允許不可以自行拿回家。
- 16 引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紅色堡壘」——記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人革命造反派的鬥爭》，載於1968年8月20日《文匯報》。又：文革結束後，這七人中，王洪文、唐文蘭等四人被開除中共黨籍。
- 17 引自《上棉十七廠十年動亂紀實1966年6月—1976年10月》，上棉十七廠1984年編寫。《大事記》中說：「黨委為使運動正常發展，盡力避免群眾在運動中相互開橫炮，規定大字報要經組織審閱」。

第一張大字報《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上，點了兩個人。黨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寫了第二張大字報，點了三個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張大字報貼出後，群眾不滿，說我罵廠黨委，是野心家，陰謀家，全廠寫了六千多張大字報。……

寫第一張大字報後，廠黨委和我有對立情緒。有一天，我在屋裏寫大字報，別人把門倒鎖上，黨委副書記來敲門，問有沒有人，我心裏想，你們還派人監視我，我不吭聲。書記覺得屋裏有人，叫了武裝部長帶十多人到保衛科搜查，我就火了，罵了黨委書記……¹⁸

王洪文說的書記就是張鶴鳴。張鶴鳴是地下黨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幹部，對上海社會環境和工廠的人事關係以及生產環節都非常熟悉。他處理事情也比較實際，不像有些幹部那樣生硬和革命。在對管理人員的使用上，他啟用和信任有「歷史問題」的「留用人員」，即共產黨執政前的工廠科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以及其他業務人員。總之，張鶴鳴的階級鬥爭之弦不那麼緊繃。這是王洪文大字報上所說黨委不抓階級鬥爭的由來。當年與王洪文一起造反，在他第一張大字報上簽名的七人之一唐文蘭，三十多年後分析王洪文寫大字報的原因：

王洪文為什麼要反張鶴鳴？這是因為當時廠黨委規定批判八個人，這八個人有的有政歷問題，有的在當時看是反動學術權威。但是廠黨委不許超出這個範圍批判別人。王洪文認為這是劃圈圈、定調子，所以就貼了張鶴鳴的大字報。另一個副廠長張元啟提出，對別的有問題的廠領導也可以貼大字報。我們當時也認為廠黨委領導自己也有很多

18 轉引自紀希晨著《史無前例的年代》第11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問題，卻不允許揭發，揭發了就說你反黨，這樣做其實就是保護他們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觀點。¹⁹

由此看來，王洪文造反，是因為與廠黨委在文革運動的批判對象上有不同意見，文革中這些不同意見被上升到階級鬥爭高度的政治分歧。但實際上，如果再深入分析，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種「政治分歧」背後的人際關係因素。對於王洪文的行為，還有另一種解釋：

我們廠在文革中引起爭論的那兩個廠長張元啟和張鶴鳴，張元啟是部隊轉業幹部，文化不高，但資格老，山東人。做起報告，一口山東話，上海工人聽不懂。他作報告，即使有時下面聽報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繼續作報告。而張鶴鳴是地下黨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幹部，浙江寧波人，一口上海話。我覺得，比起張元啟，張鶴鳴與工人的關係更密切。二張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張元啟。當時他倆都是副廠長。張元啟想當正廠長，大概因為他資格更老些。張元啟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衛，和王洪文關係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²⁰

兩個廠長有矛盾，張元啟分管保衛科，分管生產的張鶴鳴就從不去保衛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所以說張鶴鳴從1963年起從沒到保衛科坐過哪怕半小時，這是不抓階級鬥爭。可見，王洪文貼大字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兩位廠長矛盾影響。分管保衛工作的張元啟，因為工作關係與保衛幹部王洪文比較熟悉，張元啟與另一個廠長張鶴鳴有矛盾，於是影響了王洪文。

19 筆者1992年5月17日對原上棉十七廠職工唐文蘭的訪談筆錄。

20 筆者1989年7月6日對馬驥的訪談筆錄。

王洪文6月12日就貼黨委大字報，這在上海工廠職工中是相當早的。王洪文大字報貼出不到一小時，國棉十七廠的上級管理公司——上海棉紡公司的黨委書記立即趕到，召開廠黨委緊急會議，作三點指示：保衛科大字報是大毒草；1957年反右鬥爭的形勢又來了；反到黨委頭上來了，不能稀裏糊塗，這就是階級鬥爭。廠黨委找其他幾個大字報簽名者談話，追查誰是起草者。²¹ 立即，上百張反擊王洪文的大字報貼出。這種階級鬥爭過敏症，是文革初期點燃群眾造反情緒的重要原因。國棉十七廠群眾中最初的兩大派也在這樣的批判和對立中形成。

6月20日，上海紡織工業局黨委派工作隊進駐國棉十七廠。工作隊在全廠職工代表大會上批評張鶴鳴，肯定王洪文貼廠黨委大字報的行為。隨後，又連續召開各種會議，揭發批判張鶴鳴。²² 但是，這個工作隊在國棉十七廠沒待多長時間便被撤走，市委又派出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隊，於7月20日進駐國棉十七廠。

市委為什麼要撤走第一個工作隊？應該是和劉少奇6月30日對毛澤東的那個建議有關，當時上海其他工廠也有召回之前派駐的四清工作隊，再改派文化革命工作隊的情況。市委統一組織了一批文化革命工作隊，但組織得十分匆忙。以往派工作隊，總要先集訓幾天，學習有關文件和政策，再下工廠農村。這批工作隊卻連集訓和學習都沒有來得及，人員一配齊，馬上就下工廠，國棉十七廠的工作隊是其中之一。

工作隊的陣容十分強大：隊長是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施惠珍，²³ 另外幾個副隊長的職務也不低，分別是黃浦區副區長張

21 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 1975 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22 同上。

23 關於工會負責人的稱呼，1949 年以來一直稱為「主席」或「副主席」，1966 年 10 月，為了避毛澤東「主席」之諱，中華全國總工會發文，改正、副主席之稱為正、副主任。也即施惠珍進駐國棉十七廠時，職務是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後來撤出時，職務是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總工會改職務

六吉、楊浦公安分局副局長趙戈，上海絲織一廠黨委書記焦鳳嶺，以及上海市總工會教育部部長余文光。7月20日，新的工作隊進廠。第一天就召開全廠八千職工大會，隊長施惠珍作報告，據廠裏後來整理的文革大事記說：

這個報告不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強調「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廠職工「到深山密林中尋老虎」。這個報告對前一階段王洪文等同志與舊黨委鬥爭的革命行動隻字不提，對張鶴鳴鎮壓革命群眾的反革命罪行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一句。²⁴

市委對工廠如何開展文革心中無數，一切靠隊長們自己去摸索，能夠借鑑的只有四清模式：先發動群眾，待群眾揭發後，再決定運動對象。在工作隊進廠報告後的十天之內：

全廠共貼出2800多張大字報，屬中層以上幹部的佔14%，而貼群眾的卻佔70%以上。把矛頭指向群眾。……

到1966年9月底，全廠共排出四類對象114個，其中廠級幹部只有1個，而一般幹部和工人群眾卻有98個，其中已整理書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眾。在4個月中，全廠150多個車間級以上幹部進行批鬥的只有4人。²⁵

對於王洪文所反對的副廠長張鶴鳴，施惠珍在報告中說是

稱呼的資料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上海市政權系統、地方軍事系統、統一戰線、群眾團體系統組織史資料1949.5-1987.10》，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輯。

24 同上。

25 《控訴以施惠珍為首的市委工作隊殘酷鎮壓國棉十七廠的滔天罪行》，上海市國棉十七廠工作隊「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戰鬥組1967年1月，上海市國棉十七廠「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1967年2月翻印。

「壓制大字報的嚴重事件」，但沒有提及前一階段王洪文他們對張鶴鳴的揭發。工作隊為什麼沒有對王洪文他們前一階段的行為表態？據說他們不知道前面發生過的事情。因為工作隊派得非常匆忙，兩個工作隊之間沒有交接，他們進廠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經貼過張鶴鳴的大字報，甚至不知道「王洪文」這個名字。²⁶進廠後，才逐漸了解國棉十七廠的情況。工作隊認為兩個廠長的糾葛是「領導核心爭權奪利破壞團結的問題」。²⁷對於這第二个工作隊，王洪文1980年的交待中說：

工作隊由市總工會副主任任隊長，一進廠就支持我，正式宣佈要我列席黨委會。起初，我和他們合作，後來，由於他們和黨委觀點一致，我又和工作隊對立起來。²⁸

工作隊進廠後，從一些工人和幹部的反映中，逐步了解到王洪文的一些動向。但王洪文此時沒有公開反對工作隊，所以工作隊採取的策略是：「不受王洪文影響，不受干擾，你打你的，我幹我的，不激化矛盾，用事實最後說話。」²⁹工作隊進駐後，另一派繼續貼張元啟大字報，王洪文認為這是受工作隊指使。他反對批判張元啟，認為他「雖有缺點，但抓階級鬥爭是狠的。」³⁰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作為民兵連長的王洪文馬上與其他負責民兵工作的人商量，想將廠裏的民兵也組織成紅衛兵。工作隊不希望王洪文掌握紅衛兵，便想出了個辦法：既然紅衛兵是學校青少年的組織，那麼工廠的紅衛兵也應是青年工人的

26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12 月 20 日對 1966 年 7 月市委派駐國棉十七廠工作隊隊長施惠珍及工作隊秘書王曾元的訪談。

27 上海第 17 棉紡織廠 1975 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28 轉引自紀希晨著《史無前例的年代》，第 110 頁。

29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12 月 20 日對施惠珍及王曾元的訪談。

30 上海第 17 棉紡織廠 1975 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組織。他們將紅衛兵年齡規定在30歲以下，這是基幹民兵的年齡，上限是30歲。王洪文當時32歲，被出線。³¹

8月19日，國棉十七廠按《十六條》要求，籌備成立廠文化革命委員會。造反派們提名王洪文為候選人，但王洪文所在的廠部科室兩種觀點爭執激烈。廠部科室不但包括廠保衛科，也包括其他生產、技術、工資、人事和黨政等部門；廠部科室一派支持王洪文，一派堅決反對王洪文，結果廠部科室的文革委員會始終沒有成立。而要當選為廠文化革命委員會代表，必須是自己所在部門的文革委員會代表，王洪文於是沒有當上廠文革委員會主任。王洪文和造反派們認為這是工作隊干擾的結果，工作隊則認為這是群眾選舉的結果。

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國棉十七廠工作隊也接到電話，讓緊急抽調幾百名工人趕往市委大樓，與其他工廠的工人們一起組成糾察隊，保衛市委大樓。工作隊的秘書組副組長找擔任民兵連長的王洪文談話，讓他帶領民兵去市委門前。工作隊此舉顯示，當時他們並沒有將王洪文看作異己。³² 王洪文帶着工人到舊市委門口後，「發現卻是圍攻紅衛兵，馬上叫大家撤走」。³³

10月7日，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指示剛由《紅旗》雜誌的社論提出，王洪文與唐文蘭等六個廠部科室人員便貼出大字報《就目前形勢談看法》，公開打出了反對工作隊的旗幟，對全廠震動很大。³⁴ 不過，工作隊沒有正面組織對王洪文的反擊：

31 上海第17棉紡織廠1975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以及筆者、金光耀、金大陸2009年12月20日對施惠珍及王曾元的訪談，王曾元也回憶說30歲的年齡槓子是工作隊出的主意。據他們的回憶，公開的理由就是基幹民兵的年齡限定。

32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2009年12月20日對施惠珍及王曾元的訪談。

33 上海第17棉紡織廠1975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34 同上。

我們工作隊與王洪文的矛盾，不是因壓制王洪文而起，而是因為對二張的態度而起。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壓制過王洪文，我們只是對王洪文一定要打倒張鶴鳴的做法既不支持，也沒有表態。工作隊那時對於張鶴鳴，認為還要再看大家的揭發，不能馬上表態。不過工作隊也沒有批評過王洪文，我們沒點過保衛科的名，也沒點過王洪文的名，我們沒說過任何一句針對王洪文的話，沒有做過任何回應。³⁵

但是，王洪文他們還是感到了來自工作隊的壓力。工作隊通過廠文革委員會組織了四次全廠大辯論，辯論的中心是國棉十七廠的文革對象和方向，實際是對着王洪文他們的。10月10日的辯論中，王洪文被圍住，正在此時，國棉十七廠職校學生廖祖康³⁶帶來一幫學生紅衛兵為王洪文解了圍。³⁷晚上，反工作隊的工人們在王洪文家聚會，王洪文提出：「我們現在只有一條路：到北京去向黨中央告狀。」當即決定派人赴京。第二天，又在廠檔案室工作人員唐文蘭家裏開會，成立了「誓死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戰鬥隊」（簡稱「誓死」），成員共三十多人，王洪文被推為負責人。³⁸10月12日下午，王洪文等15人赴京告狀，他們離開上海的第二天早上，國棉十七廠大道旁貼出了他們15人署名的《給全廠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一小撮資產階級當權派和頑固保皇派如此欺侮我們，難道

35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12 月 20 日對施惠珍及王曾元的訪談。

36 廖祖康，男，1948 年生，受教育程度職業學校（相當於高中），文革前是國棉十七廠職業學校學生。文革中入黨。自王洪文擔任工總司負責人，直到擔任中共中央任副主席，廖祖康始終是王洪文的秘書。文革後被判刑 10 年。

37 廖祖康後來成為王洪文的助理和秘書，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去北京，也帶上秘書廖祖康。

38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紅色堡壘」——記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人革命造反派的鬥爭》，載於 1968 年 8 月 20 日《文匯報》。

我們就沒有說理的地方嗎？有！黨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們有力的靠山。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定會支持我們的，為此，我們暫時分別幾天，到他老人家那裏去吸取更大的智慧和力量。³⁹

去北京的火車票錢是大家共同湊的。1966年的10月，還很少有工人敢於離開生產崗位去北京，赴京告狀顯示王洪文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造反勇氣。王洪文回來後，被國棉三十廠的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請去介紹北京形勢；國棉三十一廠的工人造反派黃金海也專程去十七廠請王洪文介紹北京情況。王秀珍和黃金海都很佩服王洪文。王洪文後來受審判時，對他此次北京之行這樣回憶：

上訪期間，我們參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到北京大學、國棉3廠等很多地方，把當時中央領導人講話抄了不少，有陳伯達、江青、關鋒、王力、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講話。……

這些對我影響很大。……

回上海，廠黨委已經靠邊站，全廠工作由工作組領導，我對工作組的情緒更厲害了。……

我對人說，在北京，工作組已經被扔進歷史垃圾箱，可是，在我們廠，還是工作組的天下。⁴⁰

在王洪文們赴京期間，廠裏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是造反派又拉起一支新的戰鬥隊「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簡稱「永忠」），許多「誓死」隊員也加入了「永忠」；二是廠裏保守派工人也以保衛科幹事馬驥為首，成立了「捍衛毛澤東思

39 上海第17棉紡織廠1975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40 紀希晨著《史無前例的年代》第110頁。

想工人赤衛隊」，有五千多人參加，得到工作隊支持。⁴¹ 國棉十七廠工人已明顯分裂成兩大派。

10月25日，王洪文一行回上海。回廠第二天正是廠休日，在王洪文提議下，永忠和誓死合併，仍名永忠，王洪文仍被推為負責人，他提出永忠的首要任務，就是趕走工作隊。當天深夜，永忠全體出動。第二天清晨，上班的工人們發現廠裏到處貼着大標語，尤其工廠大門口和工作隊辦公室門前，貼着針對工作組的對聯，每個字都有乒乓球桌的桌面那樣大：「焦鳳嶺哼哼哈哈捧上壓下，施惠珍嘻嘻笑笑奸刁儲腹。什麼東西」；「熱淚盼來絆腳石，紙船明燭送瘟神。滾滾滾」；「落水狗禍國殃民，施惠珍罪該萬死。一對寶貨」。這天夜裏，王洪文又指揮永忠查封工作隊辦公室工作隊員的抽屜。11月1日，永忠貼出《工作隊十大罪狀》大字報，刷出大標語「工作隊靠邊站！」。11月4日，永忠佔領廠廣播台……永忠向工作隊發起了全面進攻。⁴²

王洪文與工作隊的分歧，在於究竟誰是文革對象，究竟如何開展文革。王洪文依據的是當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一系列社論，尤其是《十六條》。《十六條》公佈時，王洪文在廠部食堂高興地說：「好像中央在直接指我們廠的形勢。」⁴³ 在整個造反過程中，王洪文始終努力學習和領會報紙刊登的社論，據徐景賢後來的回憶：

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過程中，多次聽他說過：他在造反的過程中，反反覆復認真閱讀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指示和《紅旗》

41 這個數字數引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紅色堡壘」——記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人革命造反派的鬥爭》；以及馬驥 1989 年 7 月 6 日對對筆者的回憶。

42 上海第 17 棉紡織廠 1975 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43 同上。

雜誌的社論，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⁴⁴

而工作隊依據的還是十七年的政治運動模式：運動的主動權要掌握在工作隊手裏。兩套話語體系不斷發生衝突，工作隊那套話語體系運轉得越來越艱辛而且滯後。往往市委的佈置或精神，沒有幾天就和報刊的社論對不上了。到1966年的10月底，全國驅趕工作隊更是已成大趨勢，主管全市工作隊的市委社會主義教育辦公室，只得讓駐國棉十七廠的工作隊檢查錯誤。⁴⁵

國棉十七廠雖可說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發源地，但文革十年中，廠裏局勢一直沒有大亂，應該說與王洪文不無關係，也與這個廠造反派中共黨員較多不無關係。王洪文所在的廠保衛科，共有六名共產黨員與王洪文一起造反。這麼多黨員這麼早造反，在上海其他工廠絕無僅有。國棉十七廠保衛科文革中因此被稱為「紅色堡壘」。⁴⁶ 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一個黨員文革後回憶說：

我們廠黨員造反的很多，而且我們也不像其他廠，派性鬧得那樣厲害，我們廠從沒有武鬥過。開批判大會，也從來不給批判對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對張鶴鳴，也只是叫他站着聽批判，沒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後來，幹部們絕大多數都解放，擔任各級革委會負責人，除了少數有政歷問題的幹部掛着。張鶴鳴後來要求去一紡機廠，王洪文也答應他，讓他擔任一紡機廠的廠革會副主任。⁴⁷

44 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出版《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45 上海第 17 棉紡織廠 1975 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大革命事記》。

46 例如筆者在本章引用的 1968 年 8 月 20 日《文匯報》報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紅色堡壘」——記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人革命造反派的鬥爭》。

47 筆者 1992 年 5 月 17 日對唐文蘭的訪談筆錄。不過，筆者 2006 年 3 月 8 日訪談施惠珍時，她說：「我在國棉十七廠挨批鬥時，讓我坐『噴氣式』，挨鬥時經常被這人踢一下，那人打一拳。批鬥我時，王洪文都不出面。」

後來造反當上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對王洪文的評價，認為他雖然造反，但是共產黨員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他身上還是體現：

王洪文長期以來受着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教育，思想上「聽毛主席和黨的話」的觀念較深，組織性、紀律性較強，即使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組的壓制、給領導貼大字報的時候，他仍想方設法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匯報，尋求黨的高層領導的支持。上海奪權前夕，他都趕往北京，面見張春橋、姚文元等，目的也是爭取中央能夠承認自己的行動。⁴⁸

王洪文響應黨的號召起來造反，在那樣的形勢下，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積極投入運動是必然的，也是黨一貫的要求和教導。與王洪文對立的保守派，四十年以後說起王洪文，說他「到底是共產黨員，比其他的造反派講策略。」⁴⁹「講策略」一詞，在中國的政治語境裏還有「講道理」之意。王洪文響應毛澤東號召造反，但他骨子裏並不是個完全藐視權威和規則的人，所以他的造反行為不像有些造反派那樣肆無忌憚，總體上都在當時許可的規則內。這是許多共產黨員造反派的共同特點，也是以後文革在社會秩序恢復階段時，許多造反派紛紛被整肅，而王洪文仍被接納甚至上升的原因。

工作隊沒有公開組織圍攻王洪文，只是不表態，你幹你的，我佈置我的。但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上級的不表態支持，實際就是反對；正如下級的沉默，也被上級看作是反對態

剛開始批鬥我時，好像是讓我坐着接受批判，但後來的幾次，根本就是像鬥敵人」。

48 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出版《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49 筆者 2005 年 11 月 20 日對文革中的原上海「赤衛隊」總部顧問陳阿春的訪談筆錄。

度。所以王洪文感覺到壓力。實際上，對於王洪文的行動，工作隊始終密切注視並上報市委社教辦公室，前後共寫了一萬五千多字材料，還寫過一份題為《假左派王洪文大暴露》簡報，報市委社教辦公室以及工作隊的上級領導紡織局工作團。⁵⁰

勞動模範王秀珍

王秀珍，工總司總部主要成員。⁵¹ 王秀珍是東北人，出生於遼寧省一個多子女的城市貧民家庭，六個姐妹中大姐餓死，二妹也早死，她是老三，很小就背着妹妹揀煤渣，11歲後斷續續念了三年書。1950年3月，16歲的她進了遼陽紡織廠。因為工作積極肯幹，進廠兩年加入青年團，1953年加入共產黨。不久她被評為車間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接着，又被評為廠裏、市裏、省裏，乃至東北地區的先進生產者和勞動模範，這時她才20歲。以後，她又被提為沈陽市人民代表、遼陽省(當時的建制，今遼寧省的一部分)人民代表，還是省級最高立法會議成員。1956年，王秀珍作為調幹生被保送進上海紡織工業學校學習，學制四年。而進校前，她在業餘學校裏只補習到高小水平。

1960年王秀珍畢業，被分配進上海紡織設計院，幹部編制，月工資79元2角。⁵² 1961年，她懷孕了。王秀珍和丈夫老曹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以他們當時的住宅條件，老人們臨時到上

50 上海市國棉十七廠工作隊「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戰鬥組 1967 年 1 月《控訴以施惠珍為首的市委工作隊殘酷鎮壓國棉十七廠的滔天罪行》。這些上報材料，在工作隊撤出國棉十七廠之前，都被要回銷毀。

51 王秀珍，女，1934 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專科學校。文革前是上海國棉三十廠技術員，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中共第九和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 17 年。

52 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出版《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海入住連睡覺地方都沒有；而設計院沒有托兒所，所以王秀珍生了孩子後，孩子的照看將成問題。此時正遇設計院精簡，王秀珍便要求下廠，因為大廠一般都有托兒所。⁵³ 就這樣，她進了全民所有制的國棉三十廠，一家幾千人的大廠。王秀珍在廠裏擔任技術員兼織布車間工長以及廠長室技術秘書，仍是幹部編制。1965年七八月間，上海市紡織工業局需要「政治上可靠且又懂技術」的人員整理技術檔案，為紡織系統工廠遷往「小三線」做準備工作，王秀珍被借調去。1966年5月左右，整理工作結束，王秀珍回廠。此時正值批判三家村。

與王洪文所工作的國棉十七廠一樣，王秀珍所工作的國棉三十廠也是老廠大廠，前身是仁德紗廠，1958年公私合營後，原資產所有者仍參與生產管理。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讓王秀珍對此看不慣：

為什麼這些老吸血鬼還在社會主義企業中作威作福？為什麼黨委對這些傢伙開口稱「先生」，閉口喊「廠長」，捧得老老高？為什麼廠裏幾個主要部門的負責人都是資本家，而部隊來的轉業幹部受到打擊甚至被排擠出廠？為什麼工人對這些問題提出批評會遭到打擊報復？這個廠到底是誰家的天下？這是什麼企業？是資本主義企業還是社會主義企業？為什麼？為什麼？⁵⁴

王秀珍向廠黨委：

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舊黨委對王秀

53 有寫王秀珍的文章說，王秀珍從設計院去工廠，是因為「表現不好」。筆者曾經就此問題問過王秀珍本人，這是她的回答。

54 《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堅強戰士——記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王秀珍同志》，1968年4月8日《文匯報》。

珍的革命舉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沒有多久，就把她從檔案室調到車間去當工長。他們以為這樣一來，她了解的情況少了，不會再來「找麻煩」了。但是，王秀珍仍然頑強地堅持戰鬥。⁵⁵

文革初期的國棉三十廠也與其他單位一樣，最初上千張大字報除了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外，差不多全都針對廠裏原資方人員，將他們作為「牛鬼蛇神」批判。這顯然是工廠黨委的部署，把這些本已是政治邊緣人物的黨外「死老虎」拋出作為文革運動對象。

1966年6月11日，廠裏出現了一張與眾不同的大字報，標題是《廠黨委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冷冷清清！》，質問黨委為什麼將廠裏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雖然大字報只是質問，沒有什麼實質性內容，但這是國棉三十廠第一張針對廠黨委的大字報。大字報上十一人簽名，領頭的第一個名字是王秀珍。王秀珍文革結束後曾說起寫大字報的動機：

文革開始，我學了十六條，講重點是黨內走資派，我對黨委有看法，認為他們不關心群眾生活，與資本家勾勾搭搭，就與廠長辦公室的黨員同志一起寫了大字報揭黨委問題，「四清」工作隊進廠後也支持我的大字報。⁵⁶

形勢的發展證明了王秀珍的前瞻。8月，廠裏按照《十六條》要求，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王秀珍當選為廠文化革命委員會(籌)主任。不久，工作隊進廠。開始時，她與工作隊合作得

55 引自《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堅強戰士——記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王秀珍同志》，載於1968年4月8日《文匯報》。

56 王秀珍1977年的交待。王秀珍在這裏的記憶有誤，因為《十六條》是1966年8月8日通過的。

不錯。但很快形勢變化，王秀珍不贊成工作組的許多做法。她認為工作隊長批資本家不批黨委，是包庇黨委，是路線問題。⁵⁷在大多數人還在把資本家等作為文革對象時，王秀珍已經將批判鋒芒指向黨內，於是與工作隊產生矛盾。工作隊打算改選廠文化革命委員會，撤換王秀珍。他們對王秀珍說：「你不要因為改選不上文革而鬧。你是一個黨員，你還聽不聽黨的話，還要不要黨籍？」⁵⁸王秀珍感到了壓力。10月28日下午，王秀珍帶了一包材料，從楊樹浦趕往地處延安西路200號的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上訪，反映駐廠工作隊情況。在接待站，她遇到在紡織中專讀書時的老同學王春曉。王春曉在國棉十七廠勞動工資科工作，是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七個黨員之一。王春曉向王秀珍介紹在場的同事王洪文。王洪文和王秀珍年齡相同，又都是東北大同鄉。他倆一見如故，談話非常投機。王洪文三天前剛從北京上訪回來，

王洪文講他們到北京告了十七廠工作隊的狀，中央文革很支持，要他們回來與工作隊、市委資反路線鬥爭。王洪文還要我利用文革主任的合法身份和工作隊鬥。……

我膽子大了，回來就寫了工作隊一張大字報。⁵⁹

王秀珍邀請王洪文到自己廠裏去介紹形勢。王洪文第二天下午便去了國棉三十廠，參加王秀珍組織的大型座談會，作關於去北京上訪的演講。接着王秀珍又組織廠裏的工人去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串聯學習。不久，11月4日，王秀珍又在廠門口貼出大字報《一對寶貨——工作隊和廠黨委》，再一次轟動

57 王秀珍 1977 年交待。

58 《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堅強戰士——記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王秀珍同志》。

59 王秀珍 1977 年交待。

全廠。當天，王秀珍他們還將工作組長和廠黨委負責人遊街，從工廠內的廠區一直遊到工廠外的馬路上。

王秀珍以後一直說自己是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造反的，但她也認為真正促使她堅持造反的因素是與王洪文的結識。以後王洪文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後，他對國棉三十廠造反派的支持被寫進《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大事記》，說王洪文在國棉三十廠鬥爭最困難時去支持造反派，「使得三十棉紡織廠的文化大革命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⁶⁰

王秀珍的經歷在上海最初的工人造反派中絕無僅有：共產黨員、省級勞動模範、專科學校的調幹生、科室幹部、廠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有這樣經歷者文革初期幾乎全部都是老保，王秀珍卻是例外：不但是造反派，而且在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前就造反了。論受教育程度，在以後整個上海工人造反派核心成員中，王秀珍的學歷也是最高的。但因為王秀珍是黨員、積極分子，所以她造反後也像王洪文一樣，有着黨員「聽話」的政治性格的另一面。在工總司體系中，她對王洪文最聽從，不像其他造反派，有時會惹出點麻煩。她以後對於上海工人造反派以及工總司的穩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團支部書記金祖敏

金祖敏，工總司總部主要成員。⁶¹ 金祖敏文革前也是共產

60 上海第 17 棉紡織廠 1975 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61 金祖敏，男，1934-1997 年，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電機廠車床工人、第十車間團支部書記、副工段長，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和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負責人，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備組負責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分配至上海探礦機械廠當工人，1997 年病逝於上海。

黨員。他是浙江紹興人，共產黨執政初期，他就參加了土地改革，1950年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1年才16歲便在中共紹興縣委工作，擔任紹興文教幹部學校的政治輔導員；1953年至1954年到上海，在一個會計補習學校學習；以後進上海勞動局第一機械訓練班學習，1956年進全民所有制的上海電機廠工作，當車床工人。1958年大躍進時，上海電機廠在閔行工業區的廠區擴建，發展成為萬人大廠，文革前是上海為數不多的市直屬大廠之一。1960年金祖敏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擔任大電機車間(第十車間)團支部書記，1965年四清時，被提拔為第十車間第二金工工段的工段長，不過仍是工人編制。當時上海電機廠的四清工作隊長是市委分管工業政治部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王少庸，他對金祖敏的印象非常好，對金祖敏以後的提拔起了很大作用。

金祖敏並不是廠裏最早貼廠黨委大字報者。他後來說自己當初貼大字報，是因為「我們車間有個搞宣傳的，對廠裏提意見，廠裏就叫他留廠檢查，我就貼了張大字報，說廠裏和車間這樣做不對。」⁶² 8月23日，上海電機廠的上級主管局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的局長，帶工作隊進駐電機廠，工作隊長作報告。金祖敏馬上又寫大字報，說報告中有的觀點是錯誤的，轟動全廠。副廠長張惠民找金祖敏談話說，「你這樣下去要出問題，黨培養你那麼多年，你要好好考慮。」另一個局長也找金談話。金乾脆將這兩次談話內容都貼了出去。「我就這樣造反了。」⁶³

但金祖敏畢竟是黨員。他文革後回憶說，他看不慣廠裏有些非黨員造反派，認為這些人文革前不少是落後分子，文革中又搞打砸搶。因此他後來擔任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組的組長時，當這樣的人被上報為廠革會常委候選人，他不批准，將一些人降為委員，為此與廠裏一些造反派鬧得很不愉快。金祖敏認為

62 筆者1989年8月對金祖敏的訪談筆錄。

63 同上。

自己即使在文革中，行事準則絕沒有跳出共產黨的規範，「因為我畢竟是共產黨員」。⁶⁴

金祖敏工作過的上海電機廠，職工們對廠裏當上廠級或車間級領導的部分造反派評價不佳；但是，對同是造反派的金祖敏，無論是造反派、保守派、還是幹部，對他口碑大都不錯；甚至文革結束時，廠裏一片大字報，都是貼其他造反派們的，但很少貼位置更高、已經擔任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籌)負責人的金祖敏。這或許能反映金祖敏的一個側面。⁶⁵

黨齡最長的耿金章

耿金章，上海工人造反派早期重要人物。⁶⁶ 和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相比，同是共產黨員的耿金章是另一種類型。耿金章是山東寧陽人，生於1926年6月，出身很苦，6歲喪父，7歲喪母，和舅舅生活，但舅舅三次將他賣了換錢。他10歲便給地主當長工，後來還要過飯。1946年他參加國民政府軍隊，1948年他所在的吳化文部隊投向共產黨，他也被編入共產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復員到中泥造紙廠當工人。⁶⁷ 這個工廠專門生產包裝水泥用的紙袋，1966年10月改名為國營上海紙漿廠。

比起大多數只有二三十歲的工人造反派，耿金章算年長者。在後來的工總司總部委員中，論黨齡，耿金章最長；論年

64 筆者1989年8月對金祖敏的訪談筆錄。

65 筆者文革中自1968年至1978年，曾經在金祖敏原來工作過的工廠和車間當過10年工人，這是筆者10年中的感覺。

66 耿金章，男，1926–1997(?)年，半文盲。文革前是上海中華紙漿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二兵團」負責人、「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7年，1997年(?)病逝於上海。

67 《關於二兵團負責人耿金章拘留審查的情況報告》，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1967年4月11日。

齡也最長，1966年已41歲。他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不識字，半文盲。按一般情況，這樣的老黨員，即使編制不是幹部而是工人，在工廠最起碼也是工段長或生產組長。但他長期只是普通工人，不像王洪文、王秀珍他們是工廠基層幹部。除了業餘的民兵連長外，耿金章一直沒擔任過任何領導職務；直到1964年，總算被提拔為副工段長。他1952年在部隊時就因「生活作風」問題受過黨紀處分，1963年3月又因與鄰居發生糾紛，毆打鄰居，第二次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1967年和他一個廠的另一派造反派工人散發關於他的傳單，說他「粗暴成性，蠻橫無理，稍不順心，開口就是『他媽的』，閉口就是『去他媽的』，罵人不算，在廠裏還經常與人打架。」⁶⁸ 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廠工人說他不識字，頭腦簡單，作風野蠻，動不動就打人罵人，「文革前在廠裏打人是經常的」。⁶⁹ 據說他曾經因同事在黑板報上批評他而打對方耳光。在家裏，經常與鄰居吵架，甚至打人。有兩次打壞了人家的家具，鬧到長寧區法院。⁷⁰

文革開始後，耿金章和十幾個工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向廠領導提意見。他們一起寫了十條意見，內容主要關於領導的工作作風，6月15日寫成大字報貼在食堂。

當天下午，廠黨支部書記召開支部大會對我和另一個寫大字報的人進行了批評。我當即感到不滿，我們又貼了大字報。支部於是組織一些人也貼了我們的大字報。我被打成「四類黨員」，我就更火了。我利用自己是民兵連長的職務，發動民兵貼支部的大字報。⁷¹

68 傳單《警惕赫忒式的人物耿金章》，上海紙漿廠造反隊 1967 年 3 月 4 日。

69 「關於耿金章的群眾座談會」記錄，上海紙漿廠 1979 年 12 月 1 日。

70 《關於二兵團負責人耿金章拘留審查的情況報告》。

71 耿金章 1979 年 3 月 6 日交待。

7月，耿金章在廠裏組織了戰鬥隊，共三十多人，「主要針對廠黨支部」。耿金章就這樣造反了。

小青工潘國平

潘國平，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早期重要人物。⁷² 潘國平生長在上海一個工人家庭，1962年初中畢業參軍，後因膝蓋受傷，1964年10月提前退伍，被分配進全民所有制的上海玻璃機械廠，當模具木工，因為年紀輕，大家叫他「小木匠」。潘國平興趣廣泛，喜歡畫畫、唱歌，還愛好評彈、話劇。在部隊時他就得過美術創作二等獎，退伍回上海後曾經參加過滬東工人文化宮的評彈演出。進廠不久，他就被借調到廠工會工作，雖然仍是工人編制，但發發戲票，出出黑板報，很合他的性格和愛好。他感到這是廠黨委對自己的信任和培養，很感謝黨委。他也以努力工作回報，每天提早上班打掃辦公室。⁷³

文革開始時潘國平20歲，和大學的紅衛兵差不多年齡，當工人才一年多。他後來回憶自己最初的造反經歷時說，當初他其實應該算是保守派。因為他最初的造反行為是保自己所在工廠的黨委幹部。文革前夕工廠開展「四清」，他所在工廠的幹部被一網打盡：廠黨委書記被說成「貪大求洋」，一個廠長是「叛徒」，另一個廠長是「變節分子」；下面的車間或科室幹部，不是「招降納叛」，就是「階級異己分子」，實在找不出什麼，就被說是「與階級敵人勾勾搭搭」。潘國平覺得工作

72 潘國平，男，1946–2013年，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玻璃機械廠木工。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常委；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委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8年；1987年又因「投機倒把」被判刑6年，2013年病逝於上海。

73 筆者2006年在美國時對潘國平的電話訪談。

隊對幹部打擊面太大，於是，聶元梓的大字報出來後，六月上旬，他也給駐廠四清工作隊貼了張大字報：《工作隊包庇牛鬼蛇神過關》⁷⁴，說工作隊批判幹部是為了包庇真正的牛鬼蛇神。潘的大字報遭到工作組反擊。第二天，針對潘國平的大字報便在工作隊的組織下，一下子貼滿廠區。工作隊說他的大字報是大毒草，說「潘國平把矛頭指向工作隊，就是指向黨的領導。」還將潘母親的個人生活隱私也拋出。8月下旬，廠裏工人在黨委支持下成立紅衛兵，潘國平沒資格參加，組織者說他父親儘管當前職業是工人，但因為「解放前開過戲院」，所以不是純粹的工人。潘原來打算報考上海戲劇學院，廠黨委支持他報考；工作隊來後，卻說他不安心工作，想當演員是看不起工人階級，不給他出具報考必須的所在單位介紹信。⁷⁵ 潘國平後來回憶這段經歷：

1965年，就在我進廠不久，我們工廠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四清運動」，當時廠裏的幹部，從黨委書記、廠長到科長、車間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幹部」，被工作隊批判審查，還有幾個人被迫自殺。1966年初，我對「四清」工作隊的一位領導提了一點意見，說現在的這種作法不大符合中央下發的《二十三條》文件中說的「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精神，變成「打擊一大片」了。我當時覺得自己並沒有惡意，只是提提意見，沒想到工作隊卻給我扣上了「反對四清工作隊」、「反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帽子，發動廠裏的職工開會批鬥我，把我作為四清運動的重點對象。……

工作隊這樣對待我，我當然不服，那時我才二十歲出

74 筆者 2006 年在美國時對潘國平的電話訪談。

75 上海文化大革命資料聯合編輯部 1967 年 6 月編《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頭，血氣方剛，就與工作隊頂牛。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我覺得這是對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寫了揭發工作隊整群眾的大字報在工廠裏張貼。這樣，工作隊就對我組織圍攻，扣發工資，還整理了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送到我們廠所在的楊浦區公安分局，要求關押我這個「反革命」，還好公安局沒有收下我。⁷⁶

潘國平幾次去市委告狀，都沒有什麼結果。而此時，

從北京陸續傳來各種消息，一直到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都說明我與工作隊的鬥爭是正確的。我也就從本來是一個保工廠裏的領導幹部的「保皇派」變成了造工作隊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⁷⁷

潘國平去市委告狀時，正是北京紅衛兵剛來上海串聯之際。在市委門口，潘國平認識了北京101中學的紅衛兵們，從他們那裏聽到許多文革信息。8月28日，潘國平將從北京紅衛兵那裏聽來的揭發市委不要抄家等十條內情的信息，寫成大字報《揭市委「十條」內幕》，在廠裏貼出，當即遭到工作隊佈置的反擊。潘國平向北京紅衛兵講起自己受工作隊壓制之事，北京紅衛兵說：「這種工作隊，在我們北京早就趕出去了。」8月29日，應潘國平之邀，北京紅衛兵到潘國平廠裏參加大辯論，被擁護工作隊的工人圍攻。北京紅衛兵差點與他們打起來，但終於不敵人多勢眾的工廠工人，最後只得撤退。潘國平怕被工作隊扣留，也打算跟着他們走，但卻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車。北

76 亞衣著：《工人造反派與中國人權運動——訪上海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載於美國《北京之春》雜誌 1996 年 9 月第 40 期。

77 同上。

京紅衛兵將他拉上他們來時乘坐的一輛卡車，回到他們借住的華東紡織工學院。幾天後，正是9.4事件，即北京紅衛兵衝擊延安路200號上海市委機關大樓。潘國平也參加了。他年輕，加上普通話講得好，有幾次還被上海市民當作北京紅衛兵，一定要和他辯論。

幾天後這些紅衛兵要回北京，潘國平表示也想去北京看看，北京紅衛兵們答應了。潘國平就這樣去了北京。在科技界的一個辯論大會上，他見到出席大會的周恩來總理。他向周總理控告廠裏的工作隊，周恩來要他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回上海後，廠裏一些和他觀點相同的工人，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潘國平擔任了戰鬥隊的隊委。⁷⁸

文革結束後，潘國平對採訪者分析他當年的造反，其實是以文革話語要求自己的權益：

文革中「造反」組織和「保守」組織的形成，並不是後來人們所說的那麼理想化的。許許多多像我這樣的普通人變成了造反派，都有我們的個人的原因。目標開始都很簡單，想提級，想加工資，想有一個公平的對待，這種要求是合理的，從現在的眼光來看，不過是一些基本的人權。當這些要求受到不合理對待時，又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在這種情況下就認同了毛澤東當時提出的造「走資派」的反的方向，所謂的「路線鬥爭覺悟」，「保衛毛主席」，「維護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等等，是後來為了要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唱的一些高調；甚至還有人因此反過來去迫害不應當受到迫害的人，以此表明自己的路線鬥爭覺悟。⁷⁹

78 以上關於潘國平的資料主要來自筆者 2006 年在美國時對潘國平的多次電話訪談。

79 亞衣著：《工人造反派與中國人權運動——訪上海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

從北京回來後，潘國平乾脆以膝蓋老傷為由，請長病假不去上班，到處看大字報，聽辯論，了解各種文革信息，串聯認識了不少人。他能言善辯，在提籃橋一帶很出名。有一次被國棉十七廠的造反隊請去幫忙辯論，就這樣認識了王洪文。

五好職工黃金海

黃金海，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總部主要成員。⁸⁰ 黃金海是苦出身，出世沒幾天，母親因病去世，父親長期吸毒，養不活兒子，將黃送給鎮江胡姓人家。黃七八歲時，養父病故，養母靠替人洗衣度日。13歲那年，日子實在過不下去，養母帶他到上海見生父，希望得到一些經濟資助。不料生父見兒子已經長大成人，便強行要回兒子，逼養母回鄉。生父送黃金海念了幾年小學。15歲時，黃金海當了服裝店學徒，被老闆當傭人使喚，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做飯，晚上幹到十一二點才能睡覺。小孩子拉屎拉尿、大孩子上學下學，都包在黃金海身上。稍不如意，老闆順手就是一尺子一巴掌，有一次還把一碗漿糊扣在他頭上，將他的頭都打破，那個傷疤就此跟隨了黃金海一生。1955年三反五反時，黃金海揭發老闆偷稅漏稅，老闆的生意不久停了，黃金海自己也因此失業。但他仍積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五反運動結束，政府在仁德紗廠開會，給各廠老闆發定案書，讓黃金海在台上頒發手工業行業的定案書。幾十年後黃金海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我心裏很激動，有種強烈的翻身感，覺得揚眉吐氣。」

80 黃金海，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中專。文革前是上海國棉三十一廠車床工人、工會小組長。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委員；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財貿組負責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5年。

黃金海在楊浦區失業工人學習班學習了八個月，速成到初中畢業。1953年1月，他進申新五廠，這個工廠後來與另外幾個廠合併為國棉三十一廠，也是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業。黃金海被分配學車床，培訓一年後，就被評到車工技術四級，廠裏留下了他。進廠後，黃金海便寫入團申請。他積極工作，每個廠休日義務加班，儘管那時正式工人加班拿雙薪，學徒加班沒有加班工資，可參加可不參加，但身為學徒工的他基本上每次都積極參加。他技術上進步也很快，三年就被評上五級車工，1957年他車出加工難度很大的特種螺絲，不久評定技術等級，按「應知應會」的技術工標準，他被評為七級車床技工；車床工最高技術八級，他覺得自己升級太快，主動要求減為六級半。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又主動要求減去半級工資，「我應該為國家分挑困難」，所以他的月工資是85.5元。⁸¹ 他在廠裏是個活躍分子，擔任了廠俱樂部委員；業餘時間抄寫黑板報，領做廣播體操，參加歌詠隊、舞蹈隊、籃球隊。他還堅持每周三天讀夜校，一下班就匆匆啃着饅頭去上學；讀完了夜校，又上夜中專，學習機械專業，直讀到畢業。還打算再讀夜大學，他的理想是當機械專業的工人工程師。

但父親給他帶來的陰影揮之不去。父親吸毒積習不改，入不敷出直至貪污公款，事發後被判刑五年。此後，黃金海的入團申請遲遲不被批准，他覺得是受父親牽連，而他與這個根本不負責任的父親相處僅僅三年不到。他因此有些消沉：「我的政治包袱越背越重，業餘沉溺在釣魚打牌之中，一度留起了小鬍子，還買了領帶和方頭皮鞋，去寄賣商店買了格子呢的西裝。」「我比較注意外形，頭髮每星期一定理一次，不喜歡顯得邋邋遢遢。」黃金海還喜歡跳舞、溜冰，「不過我有底線，跳舞溜冰，我都在廠裏，從來不去跳舞廳和溜冰場。那時那種地方都是些當時被看作不太好的人去的」，黃金海後來這樣回

81 這是黃金海告訴筆者的。

憶。⁸² 文革結束後，有的批判文章說他文革前流里流氣，這顯然是一種政治醜化。其實，就連他文革中的對立面，同廠的保守派組織負責人李劍鈺，文革結束後說起黃金海，也說他「文革前表現不錯，沒什麼大缺點，就是穿着打扮在當時比較醒目而已。」⁸³

1964年提倡「學毛主席著作」，黃金海當選為所在生產小組的工會小組長。他重又回歸主流價值取向。他對小組同事進行家訪、組織政治學習，組織技術交流，「我們小組的工人那時很融洽，大家學《毛澤東選集》，休息天互相交流學習筆記，到今天我都覺得是美好記憶」，黃金海五十年後這樣回憶。⁸⁴ 他還進行技術革新，發明車床「雙頭刀架」，大大提高了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此外還有多項小改小革。他帶的甲班車床組，月月超額生產量都在20%以上，1965年被評為廠裏的「五好小組」，他也被評為「上海市五好工人」，他擔任組長的二十多人的生產小組，還有兩個工人也被評為市五好工人。小組成員的合影大照片貼在廠部光榮榜上。⁸⁵ 文革前夕，1966年4月，黃金海的照片再一次上了廠門口的光榮榜。照片被放到12寸大，照片上，他站在自己工作的車床邊，自豪地笑着。與榮譽一起來的還有加入共產黨。1966年3月，他被吸收入黨，支部大會通過；不過，黨委還沒批下，文革開始，這次入黨也就不作數了。

文革開始後，在黨委的號召下，黃金海最初也積極寫批判北京三家村的大字報：

82 黃金海 1977 年 1 月 2 日，4 月 5 日交待。

83 筆者 1992 年 7 月 3 日對文革中國棉 31 廠工人李劍鈺的訪談。這篇訪談 2009 年發表於上海社會科學院《史林》雜誌 2009 年增刊上，發表時的文章題目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84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黃金海的訪談。這一節黃金海文革後的回憶，都引自這個訪談。

85 評「五好」是一場全市性的評比先進活動，在當時聲勢很大。

平心而論，我最初應該是保黨委的，因為黨委器重我，提拔我。5月黨委要大家批判「三家村」，我們根本不認識鄧拓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還以為鄧拓是作家，《燕山夜話》我也沒有讀過。但黨委佈置要我們批判，聽黨的話總沒錯，我們「五好小組」應該帶頭。⁸⁶

6月，聶元梓大字報出來，對「三家村」的批判轉向聯繫本單位實際：

黨委要求聯繫本單位實際，聯繫什麼？廠部情況我又不知道，但我是「五好職工」，應該帶頭，我就挖空心思寫了張給黨總支提意見的大字報。⁸⁷

這張大字報是6月25日貼出的，內容是批評車間黨總支一些幹部們在政治學習時間聊天講大道(滬方言，即「侃大山」)，要這些幹部下來與工人一起學習，大字報中用「下來」兩字，是因為幹部們的辦公室在車間的二樓。大字報貼出的當天晚上，黃金海正上中班，只見組裏工人們的車床一個一個關了。他是組長，但卻沒人因此向他請假或打招呼，他心裏奇怪，也不好問。後來方知是車間黨總支叫他們去開會，但卻沒有通知他黃金海。晚上10點，中班下班，黃金海去食堂吃半夜飯，赫然見一路都是針對自己的大字報：「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黃金海揪出來示眾！」，到食堂門口，又是一張大字報：「『下來』就是要黨下台！」他這才明白，原來是那張「下來」大字報惹的禍。吃飯時，「本來我們小組像一家人，總是圍在一起吃飯，這天大家不敢和我坐在一桌了。」⁸⁸

86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黃金海的訪談。

87 同上。

88 同上。

黃金海大字報的內容很平常，甚至可以說批評的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黨總支卻抓住「下來」兩字，說「下來」兩字是1957年「右派向黨進攻的黑話」。黨總支立即佈置工人寫反擊大字報，第二天上百張大字報貼出，說黃金海是「反黨分子」、「個人野心家」。黃金海父親的吸毒歷史也被挖出，作為黃金海本人出身不好因而「一貫反動」的有力證據；甚至還有大字報揭發說，黃金海從小就跟隨父親出入鴉片館。黃金海的妻子見到這樣聲勢浩大的圍攻，嚇得在家裏掉淚。黃金海很生氣，認為這是黨委拋出本應保密的職工個人檔案。因為他在寫自己簡歷時，曾經老老實實地提到，小時候父親曾經帶他去過一次鴉片館。他的本意是為了說明，這次經歷使他看到吸毒的醜陋而更加痛恨吸毒。這個「向黨交心」的自白，現在被作為罪狀拋出。這樣的圍攻惹火了黃金海：

我是「五好工人」，3月發給我獎狀，6月就因為一張大字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白天堅持生產，晚上帶了麵包去市委告狀，毫無下文，我有理有怨到何處去申！⁸⁹

有意思的是，當黃金海遭到大字報圍攻時，他的那張12寸大照片仍然貼在廠門口的光榮榜上。

8月初，黃金海與他所在的機械車間的持相同觀點工人，組織了「毛澤東思想紅旗戰鬥隊」。因為是黨總支的批判對象，領不到寫大字報的免費筆墨紙張，他們就自己掏錢買。廠裏有人指點他們：不要老是糾纏在「下來」的問題上，應該把目標對着廠黨委和工作隊。此時社會上紅衛兵運動已經興起，黃金海覺得有道理。8月30日，戰鬥隊貼出了針對駐廠工作隊的大字報。「就這樣造反了」，「完全是被逼上梁山」。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傳出，黃金海看到後激動得掉淚，和

89 黃金海 1977 年 1 月 2 日，4 月 5 日。

王洪文一樣，他也覺得「毛主席好像就是針對我們廠的情況說的」。10月底，黃金海聽說國棉十七廠的王洪文去北京告狀回來了，他也想赴京告狀，便去國棉十七廠串聯。王洪文接待了他們，對他們說北京現在很亂，不要去；他們去北京時，中央接待站的人對他們說，廠裏壓制工人的問題，中央會逐步解決的。黃金海聽從了王洪文的勸告，王洪文的熱情和穩重舉止給黃金海留下很深印象。⁹⁰

文革結束後，黃金海為自己的造反行為辯護，說自己當初就是為了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入運動。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麼搞法子？對大字報定名為「修正主義分子」的人，老實說，工廠工人是根本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問題的。就連北京有劉少奇的大字報大家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⁹¹

確實，作為普通工人，根本不知上層鬥爭為何事。他們最初只是相應號召參加運動，以這樣的行動表達對共產黨的忠誠。

文革委員會副主任葉昌明

葉昌明，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總部主要成員。⁹² 葉昌明2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將他和另外兩個孩子艱難地帶大。1960年初中畢業時，葉昌明因為對無線電感興趣，就報考了江西省新建的郵電學校。剛去一年，正遇上經濟大衰退，學校緊

90 這是黃金海對筆者回憶的。

91 引自黃金海 1978 年 12 月 26 日。

92 葉昌明，男，1944 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專科學校，文革前是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的化驗工人。文革初期參加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任工總司最初的常委。文革中入黨，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副主任、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2 年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 15 年。

縮，他退學回上海。但此時上海戶口也緊縮，報不進。他只好將戶口放在口袋裏，成了「袋待戶口」，在里委協助圖書館工作，一年後才將戶口報回家裏。1963年底，他和另外350名青年一起，被分配進全民所有制的紡織局所屬合成纖維研究所，在化驗室當學徒工。業餘時間，他和同事一起，在研究所自辦的夜中專讀書，「我們所裏絕大部分青年都讀夜校的，這是那時的風氣」，葉昌明後來回憶說。

葉昌明也認為自己最初並不是造反派，而是緊跟黨委的積極分子。他所工作的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是上海第一批四清單位，葉昌明緊跟黨委投入四清運動。因為表現積極，1965年四清結束後，他加入了共青團。文革開始時，研究所黨委號召寫大字報，他就根據研究所黨委的佈置，貼那「反動權威」和「有問題」職工的大字報，還在研究所黨委的組織下，戴上團支部發的紅紙做的紅衛兵袖章，坐上卡車去高橋對一個地主出身的職工進行抄家。1966年8月下旬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市委附近的靜安寺一帶，到處都是三三兩兩辯論的人群。化驗室翻三班，他下了中夜班，有時就和車間裏另一個工人高根才一起，去離合成纖維所不遠的靜安寺那裏看大字報。巧得很，這兩個當初一起去看大字報的青年工人，後來各自成為上海兩大派組織的領導層骨幹：葉昌明成為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的常委，高根才成為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的常委。

最初，葉昌明很看不慣那些來上海造反的北京紅衛兵：

北京紅衛兵將上海搞得亂哄哄的，我認為市委怎麼可以隨便衝擊？我也看不慣北京紅衛兵趾高氣揚的態度，覺得他們隨便打人，破壞社會秩序。楊富珍給毛主席寫急電，還有其他老工人的大字報，我看了覺得很有道理，很贊成。我那時的觀點幾乎傾向於保守派。⁹³

93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7 月 19 日對葉昌明的訪談。

但是，隨着文革進一步發展，葉昌明覺得研究所黨委領導的運動方向和中央的指向不一致。中央文件和報紙上的社論說，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所黨委卻將運動指向那些工程師即所謂反動學術權威以及普通群眾。

研究所黨委和團委隔段時間就拋出一個人要大家批判。有工程師，也有小青工。還公佈成績，說全所批判了多少人，貼出多少張大字報。其實全是雞毛蒜皮的事情，我也寫過許多，可對照十六條，覺得寫資本家的大字報還可以，怎麼老是揪群眾。⁹⁴

使葉昌明真正轉變觀念的是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他在靜安寺附近第一次看到傳抄的這張毛的大字報。這期間，研究所裏有職工失竊，所黨委對全所進行了一次抄更衣箱和辦公桌抽屜的行動。儘管事出有因，但引起很多職工反感。葉昌明便就此事以及文革的運動方向等，寫了張批判研究所黨委的大字報：《炮打合纖所的司令部——黨委》。此時是1966年的10月，造反之火已經在上海蔓延。葉昌明貼黨委大字報，雖然在全所引起轟動，但沒有受到圍攻打擊，所裏不久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公佈名單中，他是委員。大字報貼出後，其他車間的工人來找他串聯，於是，他們成立了所裏第一個造反組織「紅旗戰鬥組」。大家決定集中揭發批判研究所黨委，有人提出從黨委對待紅雷青年小組的態度着手。「紅雷青年小組」，是文革前夕上海市委樹立的四大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之一。另外三個都是個人：楊富珍，楊懷遠和蔡祖泉。當時上海報紙連篇宣傳紅雷青年小組，但見報之前，小組所在的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職工卻不知道自己所裏有這樣一個小組，因為這個小組在所

94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7 月 19 日對葉昌明的訪談。

裏的名稱是「6401小組」，是個保密課題的研究組。小組共八名成員，平均年齡25歲。紅雷青年小組這個名稱，是市委決定將其作為學習毛主席著作典型宣傳後，見報時所起的名字。葉昌明文革後回憶：

我當時覺得，這麼好的一個先進典型，合纖所黨委卻不宣傳，致使所裏職工不知道身邊有這樣一個先進榜樣。於是我們寫大字報批判黨委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反毛澤東思想。但是，不久，我們發現，紅雷青年小組與所宣傳的形象有差距。報紙上文章說，紅雷小組成員經常自覺學習毛主席著作，在研究遇到困難時從毛主席著作中找方法和答案。報紙上還刊登了他們當時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筆記。但是，小組成員親自告訴我們說，沒這些事，而且筆記是在樹他們為典型後補寫的。⁹⁵

葉昌明和戰鬥組的青年認為，紅雷青年小組的真實事跡並不如報紙上宣傳的那樣先進，而是有許多虛假水份，市委樹立這樣的假典型，其實是為了樹自己。戰鬥組還因此懷疑其他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的真實性，為此他們特地去楊富珍所在的國棉一廠了解楊富珍的表現。他和戰鬥組的工人寫了大字報貼到靜安公園。葉昌明後來回憶說：「這樣就矛頭對着市委了。」後來，在工總司的成立大會上，葉昌明的發言內容正是「批判假標兵紅雷青年小組」。

文革中幾乎所有的勞動模範和先進人物都遭到批判，這些人是共產黨為全社會尤其是工人樹立的楷模，這些楷模隱含着共產黨所要求的政治和價值取向。他們的優點被放大，缺點被縮小隱蔽，幾近完人，甚至有些先進事跡離實際差距很大。楷模與楷模原型的差距，以及被樹立為楷模後所受到各種優惠待

95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7 月 19 日對葉昌明的訪談。

遇與普通職工的差距，很容易在對榜樣最熟悉的周圍人中，產生對楷模的逆反心理。而且，這種以強勢推行的教化核心，都是要求人們取消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要求超時間和不計報酬的工作精神，而且要求放棄個人思想。這就有可能使被教化者產生壓力和反感。

葉昌明最初一直沒有受到壓制。但是，後來研究所的團委副書記和別人聯名貼了他一張大字報，說他出身有問題。這是文革開展以來所裏唯一一點到葉昌明名字的大字報。葉很惱火，既然說我有問題，我就退出所裏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他將退出聲明貼在這張大字報旁邊；⁹⁶ 還和戰鬥組的人一起去市委接待站，反映研究所裏的情況，但接待站也沒給他明確的回答，他們就又去靜安公園看大字報。在那裏，他們認識了來上海串聯的北京紅衛兵。

退伍軍人陳阿大

陳阿大，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總部主要成員。⁹⁷ 與王洪文、潘國平、王秀珍、金祖敏、黃金海、葉昌明等人不同，他們都認為自己文革前是積極分子、共產黨的依靠和培養對象；而且王洪文、王秀珍和金祖敏，文革前都已經是黨員。陳阿大卻認為自己文革前「表現不好」。

陳阿大造反時24歲。他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貧農家庭，和雙胞胎兄弟陳阿二，從小在紹興鄉下長大。1952年，他不慎腿

96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7 月 19 日對葉昌明的訪談。

97 陳阿大，男，1942–2004 年，受教育程度小學。文革前是上海良工閥門廠鍛工，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常委；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78 年被判刑 16 年，2004 年病逝於上海。

骨折，被接到上海與父親同住。起初，父子倆在滬西復興西路太平弄，以每月2元的搭鋪費租一個床位。一年後搬出另租小屋，房子是竹片和泥巴搭就的簡陋棚子，上海人稱這樣的地區為「棚戶區」。搬家後，新的居住地區有文化補習夜校，家人替陳阿大報了名，但他讀不進去。他認識了一群比他年齡大的朋友，喜歡上跳舞廳、溜冰場，喜歡評論女人。這樣的人當時被主流話語列為「落後分子」甚至「流氓阿飛」。1958年這幫朋友中許多被送去勞動教養，⁹⁸ 從現在來看，對這些人的處理可能過嚴，但可以看出陳阿大所交往圈子的層次。陳阿大文革中曾說自己「當兵前也有些流氓無產者作風」。⁹⁹

陳阿大15歲就開始工作養家，在南碼頭做臨時工。1958年8月進中華造船廠，起初當搬運工，後來當鉗工。1961年從工廠參軍，在福建炮兵部隊當過飼養員和炊事員，後來又當上高炮指揮儀測手。他後來回憶說：部隊生活緊張，軍訓頻繁，紀律嚴格，與他原來散漫的生活不同；而且原來在廠裏每月工資有五十多元，當兵津貼只有六元，他就想提前退伍。他還回憶說，為了實現目的，他對部隊領導講自己小時候腿骨折過，至今仍有後遺症。一面寫信催母親將他小時候骨折時拍的X光片子寄來，一面乾脆連走路都一拐一拐，經常不出操。部隊讓他住進師部衛生院，檢查下來，骨折早就痊癒。為此領導批評他，說他患的是思想病，沒准許他提前退伍。服滿三年的兵役後，陳阿大1965年退伍，被分配進全民所有制的大型工廠上海良工閥門廠當鍛工，也當過鉗工和檢修工。¹⁰⁰

以上這段經歷是陳阿大文革結束後被審查時的交待，不乏為迎合時政對自己的矮化。而陳阿大所在部隊在陳阿大退伍

98 陳阿大 1977 年 8 月 10 日交待。

99 陳阿大在上海市工代會 1971 年整風學習會上的發言，《上海市工代會 1971 年整風學習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100 陳阿大 1977 年 8 月 10 日交待。

時，對陳阿大的評價尚不錯。現在能夠看到的部隊給他寫的鑑定材料中，有這樣的評語：「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積極想辦法完成任務」，「組織紀律性強」，「『三八』作風扎實，尊重領導，服從命令聽指揮，叫幹啥就幹啥」。¹⁰¹ 陳阿大的軍銜也能反映他在部隊的表現：入伍一年成為上等兵，退役時已經升為上士軍銜？而且陳阿大退伍進廠不久，在四清運動中加入了共青團。他所擔任的社會工作有：兼職的民兵排長和車間保衛幹事。¹⁰² 這一切都說明陳阿大是受信任的。

比起其他人，陳阿大的造反原因如今看來有點令人發笑。據文革中一篇材料記載：

陳阿大當初在廠裏「殺」出來，不為別的，就因為車間裏看不到一張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他懷着對毛主席的熱愛，貼了原黨總支大字報，以至受到圍攻迫害。¹⁰³

顯然，陳阿大是想做點什麼，表達自己對這場運動的積極參與。據說，陳阿大想造反，可不會寫大字報，便悄悄找個同事，要這人將已經寫好的一張大字報送給自己，說：「我請你到國際飯店吃一頓，這張大字報算賣給我好嗎？」後來，1967年，工總司要辦《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展覽會，陳阿大特地請人補寫了「良工閥門廠第一張大字報」，簽上名，送去展出。¹⁰⁴

文革結束後批判造反派，陳阿大是最遭非議的，被作為文革前個人品質差的造反派典型在報紙刊物上批判。在對他的批判文章中，他被形容成道德較差和缺乏自我約束力的人。陳

101 轉引自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102 香港星克爾出版社 2013 年出版《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徐景賢著。

103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1968 年 3 月 22 日《簡報》第 46 期。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104 《解放日報》1977 年 10 月 13 日及 11 月 20 日所刊文章。

阿大工作的良工閥門廠工人揭發說，陳文革前「是廠裏有名的穿包褲腿、尖頭鞋」的，那時穿這類服飾者被看成流氓阿飛。和他一起造反出來的工人造反派們也看不起他，說他是「草包」，既無文化素養又無工作水平。¹⁰⁵ 不過，如今看來，雖然自我約束能力較差，舉止較粗魯，缺少規範意識，但如果作為普通工人，文革前的陳阿大至多也只能算有些性格缺陷。

臨時工戴立清

戴立清，上海工人造反派領導層骨幹。¹⁰⁶ 戴立清祖籍山東，父母遷至鎮江定居，後來又到上海討生活，將戴立清留在鎮江。戴立清先是讀私塾，後來又讀小學。讀四年級時，正逢1949年共產黨執政，父母將他接來上海身邊。父親原來是鐵路管樂隊吹小號的樂手，算是鐵路警察，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便辭職了，父母都失業在家。1953年，戴立清以14歲冒充16歲，進廠當了一名學徒工，白天工作，晚上念夜校，讀完高小。1955年，戴立清所在街道的里弄委員會改選，他被選為兼職的福利委員。第二年，區裏動員社會閒散勞動力去外地工作，當時正值大西北建設，要求上海派人支援。里委會討論動員二十多人去外地，讓戴立清負責。但動員結果只有十多人肯去。戴立清覺得他作為里委幹部動員別人報名去大西北，自己首先應該帶頭：「我動員別人去，把西北說得樣樣好，我自己當然應該帶頭去」，他於是也報了名。父母堅決不同意他離開上海，

105 文革後有許多文章想當然地把陳阿大寫成「滿口污言穢語」，不合事實。認識陳阿大的人都說，陳阿大儘管說起話來語無倫次，毫無邏輯，但髒話基本沒有，最多就是相當於國罵「他媽的」的滬罵「赤哪」。

106 戴立清，男，1937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大專。文革前是江南金屬製品廠(後改名為上海標準件材料一廠)電工臨時工。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中共上海後方基地委員會副書記。1982年被判刑15年。

因為之前他的兩個姐姐已經隨工作的工廠遷去了河南。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了，半夜裏偷偷走的。

當時說是去支援西北一個建設項目，去半年，建設好了就可以回來。但他們這些上海工人到了那裏，不少人沒被分去當工人，而是提拔或送去培養。戴立清被送去幹部學校培訓二個月後，留在甘肅省建設局教科工作，負責職工教育。以後，他還在省建設局做過工會工作，當過文化教員、電影放映員，擔任過省建設局機電技工學校的工會主席。共產黨執政後的工會都是官辦工會，主席是黨組織選定的，戴立清能當上工會主席，顯示他受到信任。其間戴立清在蘭州一面工作，一面堅持業餘學習，自學了清華大學自動化系函授教育的二進制計算機語言，還在蘭州中俄友好協會俄語專科學校學習了兩年俄文，取得當技校老師的資格。甘肅的項目都是蘇聯援建的，掌握俄語，在技術上和蘇聯專家溝通可以容易些。

1959年以後，中蘇關係開始緊張，蘭州幾個大的蘇聯援建項目全部陸續下馬。戴立清當時正帶着學生在其中一個工程工地實習。工程下馬，他只好回省裏。但省裏他原來工作的甘肅省機電安裝公司也被撤銷，沒有工作可安排。1962年父親病重，他回上海照顧。父親去世後，他向蘭州方面辭職留滬，甘肅原工作單位將他的人事和戶口關係轉回上海。不過最開始是「袋待戶口」，沒有被落實到街道。等待落實戶口分配工作期間，他以上門修理家電維生，也幫助里委會和派出所做些事情。一年以後，總算被街道接收戶口，而且分配了工作。先暫時在上海第十鋼鐵廠當工人；一年後的1964年，上海市勞動局將他安排進上海江南金屬製品廠(後來改名為上海標準件材料一廠)，一個只有百來工人的小廠。戴立清擔任電工，負責維修全廠設備的電器部分。不過，不是正式編制，而是臨時工。他當教師的妻子沒能同時進上海，還在蘭州工作。¹⁰⁷ 戴立清

107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7 年對戴立清的訪談。

的這個經歷和他的臨時工身份，使他造反以後一直被人抓「小辮子」，說他去了蘭州後又回上海，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怕艱苦從內地「倒流」回來。甚至一起造反出來的工人造反派，也認為王洪文不該重用一個臨時工。這種因所有製造成的身份歧視，令戴立清很感困惑和委屈，覺得自己當年響應黨的號召參加大西北建設，後來因為有困難回來，為何卻處處低人一等。

戴立清剛進廠時，受到廠領導的重視。他有技術，晚上還堅持去技術夜校讀書以提高自己；他對政治感興趣，又喜歡看書，在自己的電工房的牆上，貼上「知識就是力量」等標語激勵自己。文革前夕，上海工廠普遍開展四清運動，文革開始後四清轉為文革。他被作為積極分子，經常參加工作隊召開的會議。工作隊在這些會上，向積極分子們拋出他們決定的運動對象的檔案：這個人是日本人佔領時期的「二鬼子」，那個人是一貫道的「三才」，還有誰誰是「資本家」，佈置積極分子們寫大字報。戴立清回憶，那時廠裏這類大字報大部分是他寫的，被工作隊作為積極分子他覺得很光榮，反正妻子不在上海，他就成天泡在廠裏。

但是，8月以後，他的觀點變了。使他改變觀點的是《十六條》。他仔細讀了《十六條》後，覺得廠裏做法和中央號召不一樣。《十六條》說文革運動的重點是黨內走資派，可廠工作隊卻把普通管理人員當運動對象。戴立清工作的工廠就在華東紡織工學院旁邊，華紡是最早安排來滬串聯的北京紅衛兵的住宿地。戴立清他們經常在工廠附近見到北京紅衛兵們，不久相互熟悉。其中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紅衛兵向他們介紹了北京形勢，支持他們，更堅定了他們的看法。戴立清成立了戰鬥隊，取名「紅旗」，8月25日給廠黨支部貼出大字報，揭發廠工作隊和黨支部如何拋檔案，整群眾，如何佈置他們寫大字報。¹⁰⁸ 戴立清文革後說起自己的造反原因：

108 以上資料引自《戴立清罪行揭發材料》，原件為打字油印，無印發單位，

我總這樣認為：「民隨王法，草隨風動」，老百姓總是上面有什麼號召，下面跟着幹。一般都這樣。我踏上社會已有幾十年，從不懂事開始，當過學徒，總的還是在解放後成長起來的。幾十年的生活實踐，自己有這麼個心願：跟共產黨走，聽毛主席話，從小受了這樣的教育，自己也經歷了各次政治運動……聽黨、聽政府的話不會錯，叫我犯法我沒這個膽子。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總認為思想表現好點，任何單位領導都會對自己有好的看法。平時自己也想積極點。文革中我態度是聽黨的。¹⁰⁹

戴立清顯然是希望以自己積極投入運動的行動，表現自己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忠誠。這應該是許多人當時共同的真實思想。戴立清又動員廠裏一個女工貼出大字報《我的控訴》，說廠黨支部書記利用職權一定要和她談戀愛，一下轟動全廠。戴立清他們就對廠裏提出，這種人怎麼能擔任黨支部領導，應該下去勞動。工廠領導也就於8月23日作出決定，讓這個書記下去勞動了。事情匯報到工廠的上級主管單位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局裏認為這是政變，幾個非黨員工人竟然把廠黨支部書記趕下台。於是佈置反擊，甚至還打算抄戴立清的家，人都集合準備上車了，因為有人不同意作罷。面對上級黨委組織的反擊，戴立清後來回憶說：

我當時壓力很大，也想到會不會失業，但又想到反正憑技術吃飯。我最擔心的，還是怕政治上會被劃為另類。¹¹⁰

但上有「滬委專調(77)183號」字樣。估計是文革結束後審查戴立清時整理的材料。還有一部分材料來自筆者、金光耀、金大陸2007年對戴立清的訪談。

109 戴立清1982年4月28日交待。

110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2007年9月對戴立清的訪談。

戴立清於是去市第一機電管理局和市委接待站告狀，沒有什麼結果。9月底，戴立清和另一名造反派工人、紅旗戰鬥隊隊長房有柱，自己掏錢買了車票，背上被子，去北京告狀。在北京，他們看到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更認定自己沒錯。戴立清將廠裏情況寫成文字，自己刻鋼板自己油印，請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紅衛兵呂英豪等轉給他們學校的造反組織北航紅旗負責人韓愛晶，希望能通過他轉交中央文革。11月3日，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戴立清他們也參加了，「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

培養對象謝鵬飛

謝鵬飛，工總司發起人之一。¹¹¹ 上海工人造反派重要人物。共產黨執政前，謝鵬飛的父親在銀行工作。1949年，那家銀行的主任去了香港，父親沒跟去，就這樣失業了。母親於是進了大中華橡膠廠，挑起全家生活重擔。1955年，父親被培訓一年後，分配去浦東東昌區的幹部學校，當了一名政治教師。所以，謝鵬飛一直認為自己雖然出身在職員家庭，但父親是黨校教師，自己的出身應該算比較好的。謝鵬飛母親生了六個孩子，父親沒有工作的那幾年，全家生活很拮据。但母親工作的工廠包下了所有的學費，他們兄弟姐妹上學全部免費。母親很感謝共產黨，工作一直非常積極，是廠裏的先進工作者。¹¹² 謝鵬飛初中畢業後，進了上海市勞動局第二技校。1964年畢業後，被分配在地處江灣的上

111 謝鵬飛，男，1944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技術學校)。文革前是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鍛工、熱處理車間生產組長。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負責人；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上海鐵路局和上海鐵路分局革命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鐵路局和上海鐵路分局工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刑8年。

112 筆者2005年11月22日對謝鵬飛的訪談。整個這節的內容，除了注明出處的，都引自這次訪談。

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當鍛工，這是家全民所有制的工廠。母親叮囑他一定要好好工作，爭取進步。他自認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他努力工作，政治上積極靠攏共產黨組織，進廠就打入團申請報告。他所在的小組被評為鐵路局和市裏的五好小組。文革前，廠裏要建立熱處理車間，「廠裏讓我負責組建，所有的設備都是我經手置辦的。廠裏還派我去上海機床廠、上海柴油機廠和上海建築機械廠學習。」文革結束後謝鵬飛這樣回憶，他覺得，這是工廠黨組織對自己的信任和培養。

1966年6月1日，聶元梓大字報發表，謝鵬飛也在幾天之後的6月6日貼工廠黨支部的大字報。謝鵬飛後來回憶說：

我那時對中央的事一無所知，我只知道上海市長是誰，鐵路局長是誰，我們廠的廠長是誰；中央的人，除了毛主席、劉少奇、周總理等，我都不知道，彭真是誰我也不知道。但聶元梓大字報出來後，我看社論和報紙，覺得自己應該跟上報紙。報上的號召在我心裏引起共鳴，聯想到廠裏的事情，於是在6月6日貼了廠支部書記的大字報，質問支部幾個問題：(1)為什麼中央已經這樣號召了，廠黨支部卻不動，這是對運動的態度問題；(2)廠裏的組織路線有問題，重用出身不好的人。我當時覺得自己出身職員，算出身好的。這張大字報用詞是比較溫和的。我是響應黨的號召貼大字報的，覺得應該投入運動。

貼大字報的不止謝鵬飛，還有鄭三騰、周國庭、陸雲龍、萬金榮、蔣周法、傅世而等，都是和謝鵬飛差不多年齡的青年工人，觀點相同。這家工廠的四清工作隊此時已經轉為文革工作隊。工作隊也不示弱，組織人貼反擊大字報，說周國庭一貫工作吊兒郎當，鄭三騰有偷竊行為，萬金榮生活作風有問題；至於謝鵬飛，大字報揭發說他出身有問題。原來，謝鵬飛的父親在抗日

戰爭時期，曾經自己出錢，捐給安徽省國民政府主席李明祥一百擔白糖，送給李組織的長江中下游抗日挺進軍。謝鵬飛父親以這樣的行動支持抗戰，李明陽給他封了個專員，是個無工資又無工作任務的空頭銜，純粹為了表彰他父親的愛國行為。但這個前政府的「專員」頭銜，到共產黨執政後，就成了他父親的政歷問題，四清時被審查，此時又被拋出來作為謝鵬飛的問題。謝鵬飛他們7月初乾脆在廠裏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還經常去附近的復旦大學看大字報。大字報上傳抄的形形色色的中央首長講話，更堅定了他們的信心，覺得自己「大方向沒有錯」。每次廠裏召開有關文革的大會，發言權幾乎都控制在他們幾個人手裏，工作隊的威信受到很大打擊。不過，工作隊那時除了發動人貼他們的大字報，也沒有其他更進一步的行動。

事態的變化在9月4日。本書第四章中曾提及：周國庭、鄺三騰、陸雲龍那天與北京紅衛兵在高安路時，被華東局的幹部認出不是學生；從鄺三騰身上還搜出他偷東西被抓後寫的檢查。三個人被交給南洋模範中學的紅衛兵，毒打整整一夜，還給他們剃了陰陽頭，身上寫上牛鬼蛇神字樣。第二天，他們被押回廠。據說，為這幾個人，華東局書記魏文伯：

親自給上海市公安局寫了批示，要盡速「處理」上海鐵路局裝卸機械廠周國庭、鄺三騰等人的「公事」，上海市公安局接令後，轉告鐵路公安處協調處理。分局黨委也專門為此事討論了數次，定案「現行反革命分子」。¹¹³

113 傳單《上海鐵路分局黨委是上海市委鎮壓革命破壞生產的頭號幫兇(從「安亭事件」到建立「二七戰鬥隊」、「工人赤衛隊」的經過事實真相)》，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隊鐵路總部上海鐵路分局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隊，1967年1月16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廠黨支部和駐廠工作隊，事先已經接到華東局幹部調查這三人的電話。9月5日早晨：

上海鐵路裝卸機械廠全廠停工，緊急集合，工作組和黨支部召開全廠大會，會上人保主任×××宣佈：「周、鄺、陸在華東局製造匈牙利事件，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工作隊秘書×××說：「現在我們廠的牛鬼蛇神揪得還不夠多，再等幾天，再揪出一批給你們看看」。

下午四點多鐘，周、鄺、陸被押回廠，推進食堂，跪在凳子上。¹¹⁴

同來的紅衛兵再一次用皮帶毆打他們。這時有人高叫：「我們廠裏還有他們的人」，這是指謝鵬飛以及和他一個戰鬥隊的蔣周法¹¹⁵和傅世而¹¹⁶等人。立即，十幾個青年工人被推上台。都跪在凳子上，一字排開。他們被逼着承認是「反革命集團」，開過「黑會」，到外校串聯是「反革命串聯」，還被逼着交出「同黨」。他們臉上被塗上墨水，在衣服上寫上「牛鬼蛇神某某某」。木棍、皮帶沒頭沒腦打來，還有人用車床車下的彈簧狀鋼絲抽打他們。¹¹⁷鬥爭會開了三個多小時，他們的膝蓋都跪出了血，其中一人還被一腳踢出去，腦袋撞在地上。黨

114 《上海鐵路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大事記 1966.6-12》，原文為打字油印件，沒有注明編者即成文日期。筆者估計是「上海鐵路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在1967年初編寫的。

115 蔣周發，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常委；文革中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1968年後回廠勞動。

116 傅世而，原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鉗工，和謝鵬飛一個廠一起造反。文革中任工總司鐵路聯合指揮部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上海鐵路局及上海鐵路分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17 《上海鐵路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大事記 1966.6-12》。

支部和工作隊當場宣佈鄭三騰、周國庭是「反革命分子」，其餘人是「反黨小集團成員」。鬥爭會開完後，共16人全部被關押在廠，當晚，又強迫他們跪了八小時。廠裏組織了幾十人日夜三班看管。廠裏為什麼這樣對待這些青年工人？估計是與華東局打來調查周國定等三人的那個電話有關，甚至很可能是華東局佈置審查他們。

謝鵬飛也被關押在廠裏。他文革後回憶說：

我媽媽見我晚上沒回家，第二天聞訊找到廠裏來了。見到我就哭。第一句話就是共產黨救了我們，你怎麼可以反黨？你讀書的錢都是共產黨付的。廠黨支部書記也找我談，說你和他們那些人不一樣，你是我們的培養對象，我們對你那麼好，你為什麼還要反對黨支部？這時我思想有過動搖，我怎麼成了反革命？我沒有反黨啊，我對黨一貫忠心耿耿，難道是我錯了？

廠黨總支書記也找被關着的謝鵬飛談話，說你們技校當時分配進廠二十幾個人，廠裏讓你去籌備熱處理車間，這是對你的信任和培養，你為什麼還要反黨？謝鵬飛辯解說自己根本沒有想過要反共產黨。不過，他不敢說出自己其實也去過市委門口，反正沒人知道。被打得最厲害的是鄭三騰他們三人，因為他們去過華東局。其間，鄭曾經逃出去過，被抓回吊起來再打。這16人從9月5日一直被關到11月初。終於，11月3日這天早晨，謝鵬飛謊稱上廁所，趁看守人員不備從廁所翻窗逃了出去，一路狂奔到97路公共汽車的終點站，上車乘到山陰路終點再換車，直逃到炮司所在的巨鹿路691號，被那裏的紅衛兵收留，不回廠了。

這樣毒打和關押貼大字報者，在上海工廠很少見。十多天後，在工總司成立大會上，這些被毒打的工人將舉着血衣上台控訴。

最初的造反原因¹¹⁸

從以上一些造反派最初的造反經歷來看，王洪文和王秀珍的造反經歷是一種類型。工作隊沒有打擊或圍攻他們，只是不重用或將他們晾在一邊。他們與工作隊的矛盾不是受到打擊後的反彈，也不僅僅是出於個人恩怨。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響應毛主席號召」。他們比照《十六條》和報刊一系列社論，覺得工作隊所作所為不符合中央精神，於是和工作隊有了分歧。這樣的類型還有金祖敏、葉昌明。另一種類型，則是受壓制後的強烈反彈。他們因為貼黨委或廠領導的大字報，遭到圍攻，被指為反黨、向黨進攻。這反而使他們的反抗意識更強烈，一定要訴求公正的評判。許多老造反都將當初自己的這種反抗看作是最初的造反。潘國平、黃金海、戴立清、耿金章，都可以納入這種類型。

我們還可以從其他工人造反派的自述，看到同樣的被壓制和圍攻後的反彈。例如馬振龍，¹¹⁹ 當時是上海搪瓷機修廠車床工人。1966年6月，他因與同廠工人曹德宏，向上級寫信反映對工廠廠領導的意見，駐廠四清工作隊和工廠領導將他們打成反革命，還發動工人貼他們的大字報。後來這個工作隊撤走，文化大革命工作隊進駐。新的工作隊長認為馬振龍他們的行為夠不上反革命，充其量只是群眾運動中的缺點錯誤。¹²⁰ 馬振龍以後成為工總司骨幹成員。文革結束後被關押審訊，當被問及

118 這節中所提到的工人，除了徐美英是集體所有制工廠的，全部都是全民所有制工廠的產業工人。

119 馬振龍，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上海搪瓷機修廠車床工人。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中共上海市輕工業局委員會副書記、輕工業局工會主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6年。

120 馬振龍1982年4月28日審訊筆錄。

怎樣造反時，他詳細談了自己的造反經歷。審訊人員要他對自己受壓制的過程談得簡單些，他為自己辯護說：

這個要講，不講我怎麼回答你我怎麼造反呢？去掉這個，造反就談不上了。為什麼毛主席後來講「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呢？揪走資派的。對否？這個事情就來了。要說老實話，要尊重歷史，我看就得談。¹²¹

工總司發起人之一、以後成為工總司總部委員的徐美英，¹²² 最初也是因為給廠黨支部貼大字報而受到壓制。徐美英是147服裝社工人，這個廠是家大集體所有制工廠。徐美英是生產組長和廠工會女工委員，有着這樣社會職務的工人，一般都是積極分子和黨的依靠對象，所以徐美英始終認為自己文革前是「靠攏黨組織」的。徐美英這年33歲，已有四個孩子。據徐美英回憶：文革開始時，廠領導示意她寫一個臨時工的大字報，徐美英不願意，說廠領導自己有很多問題：工人做錯事例如損壞馬達，領導說是破壞生產，而領導自己的親戚下班用廠裏的縫紉機做私活，臨走時忘了關掉帶動縫紉機馬達的電開關，導致馬達因空轉燒毀，卻不了了之，等等，她要貼廠領導大字報。大字報貼出後，她立即遭到圍攻。她很不服氣，

我想，我一沒貪污盜竊，二沒生活腐化，三沒歷史問題，四沒和人吵過架，我沒有什麼老底或把柄可被揭的。廠裏拿我沒辦法，因為我當時不是黨員，他們無法用黨紀壓

121 馬振龍 1982 年 4 月 28 日審訊筆錄。

122 徐美英，女，1938—2012 年，受教育程度小學，文革前是 147 服裝廠工人，生產班長，廠工會女工委員。文革初期參加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任工總司委員，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革委會委員、手工業管理局工會副主任。1973 年回廠。

我，只好不讓我參加廠裏組織的工人紅衛兵。¹²³

工總司發起人之一，以後成為一兵團負責人的戴祖祥，¹²⁴當時是上海第三鋼鐵廠第二薄板車間的專職工會工作人員，負責宣傳工作。這個車間是軍工車間，對工作人員政治上的要求很高，這讓戴祖祥認為自己是被信任的，自己是忠於共產黨的。戴祖祥文革前夕是四清代表，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組長，打了申請加入共產黨的入黨報告。¹²⁵他在1967年一次演說中宣佈自己的造反原因：

我們廠我是第一個貼出黨委大字報的。因為他們老是反三家村，不許揭發黨委問題。我貼了大字報，黨委書記罵我混蛋，說我亂了人民，把我軟禁在防空洞兩個禮拜。為了找真理我出來的。¹²⁶

工總司發起人之一、以後擔任過工總司總部常委的范佐棟，¹²⁷當時是上海保溫瓶二廠的噴花工。這是個技術性很強的工種，范佐棟是六級工，油漆工的最高技術級別。文革初期，批判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工廠裏沒有學術權威，技

123 筆者 1989 年 5 月 2 日對徐美英的訪談。

124 戴祖祥，男，1936 年生。文革前是上海第三鋼鐵廠第二薄板車間工人編制的專職工會宣傳幹部，受教育程度相當於大專。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北上返滬第一兵團」負責人，1967 年被以「另立山頭」名義清洗出工總司，並被楊浦區公安分局拘審一年。1968 年 3 月釋放回廠。

125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10 年 5 月 15 日對戴祖祥訪談。

126 戴祖祥 1967 年 2 月 22 日《在懷恩堂答辯會上的發言》，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收藏。（筆者認為日期似乎應該是 21 日，因為懷恩堂答辯會是在 21 日）。

127 范佐棟，文革中又名范左東，男，1932 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高中。文革前是上海保溫瓶二廠油漆噴花工人。文革初參加「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文革初參加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曾任工總司常委。1967 年被以「分裂工總司」罪名關押，以後回廠當工人。文革結束時未被處理。

術好的范佐棟被說成是「反動技術權威」，也挨到大字報。范佐棟覺得這是黨支部為了躲避群眾對他們的意見，有意將鬥爭矛頭轉移向他這個普通工人，而他當時既沒有給廠領導貼過大字報，也沒有參加過任何「戰鬥隊」之類的造反組織。他很氣憤，就去離工廠不遠的市委門前，看紅衛兵的大字報有什麼說法，就這樣認識了北京紅衛兵。¹²⁸

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張伯生，¹²⁹ 同樣是因為被大字報圍攻而造反。他平時喜歡寫文章投在工廠黑板報上，也算是個活躍分子。當時四清剛結束，文革開始，廠裏的黑板報好長時間沒有出，他就投了篇批評稿給分管此事的廠工會，說黑板報怎麼那麼長時間開天窗。投稿後的那天是他的輪休日，輪休日後他去廠裏上班時，只看見從廠門口到樓頂，上上下下都是針對他一個人的大字報，說他「槍口對準工人」，說他「地主出身」。而實際情況是，身為基幹民兵的他，在一次民兵活動的休息時間，開玩笑地拿槍對着同事模仿電影說「不許動」；地主出身的緣由，則是在閒聊時說的話，說起自己小時候無錫家鄉的風俗，過年總要做些米酒和年糕。這些話被大字報質問：「解放前窮人連飯都吃不起，你怎麼能吃上年糕？只有地主才吃得上年糕。」平時無心的舉止和閒談，被拿出來指責自己是異己分子，張伯生很氣，也寫大字報還擊。他感到壓力很大，直到《十六條》出來，說不許壓制群眾，他的日子才好過些。他工作的人民電機廠離靜安寺不遠，他是機修鉗工，工作時間比較彈性，他就經常去延安西路市委大樓看大字報，認識了北京紅衛兵。¹³⁰

128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4 月 25 日對范佐棟的訪談。

129 張伯生，男，1936 年生。原人民電機廠工人，文革初期參加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成立宣言起草者，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機電一局革委會委員，靜安區革委會委員，人民電機廠革委會副主任，廠工會副主任，1974 年「下放勞動」。

130 以上資料全部引自金光耀、筆者、金大陸 2009 年 9 月 11 日對張伯生的訪談。

還有一類造反，是因為對領導有這樣那樣的意見。例如汪湘君¹³¹的造反，就是因為對廠黨支部簡單粗暴的工作作風不滿。她是廠工會的女工委員，曾經獲得過「三八紅旗手」的先進稱號。但因為和廠裏另一個男工多說了幾句話，廠黨支部就認為他倆「關係不正常」，將她調去上海停經片廠。她很生氣，這不是沒來由的亂猜測嗎？會影響她的名聲和夫妻關係。她就寫了大字報，貼回原來工作的工廠。這是廠裏的第一張大字報。公司馬上派出工作隊，原來的工廠和新去的工廠，兩個廠圍攻她，「那些天廠裏所有的大字報都是對着我的，我日子難過。」她去延安西路市委接待站告狀。可能是市委接待站的干預，廠裏撤了對她的大字報。她文革後回憶：「我倒不是什麼路線覺悟，什麼是路線鬥爭其實我到現在也搞不明白。」¹³²

王腓利¹³³的造反也是對領導有意見，而且是對領導在文革中的行為不滿。他是退伍軍人，在廠裏的工作是車間統計員。文革前夕，他因為表現好，受到信任，被調到市委四清工作隊當隊員，後來又分到市委第八工作隊，分管自己工作的工廠和其他幾個廠。文革開始後，他並不是廠裏第一個貼廠黨委大字報的。廠部技術科有人貼黨委大字報，他還貼大字報與他們「商榷」，不同意他們對黨委的指責。他後來對廠黨委有看法，是因為他們對北京紅衛兵的態度。當時他們廠裏也派了老

131 汪湘君，女，1938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夕是上海紡織機械配件廠工人(文革初期被調往上海停經片廠)，工會女工委員，曾被評為三八紅旗手。文革初期造反，1968年被作為「工代表」派駐「工總司」；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婦聯主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6年。

132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11年3月6日對汪湘君的訪談。

133 王腓利，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第三機床廠的車間統計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0年回廠勞動。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0年。

工人，去延安西路市委大樓前與北京紅衛兵辯論。他聽到廠黨委幹部對那些老工人佈置說：如果有紅衛兵問起，你們就說是自己去的。他覺得這樣太不光明磊落，明明組織人去，卻又不敢承認。他於是貼出大字報揭露此事，「就這樣和廠黨委有了隔閡。」¹³⁴

還有施尚英¹³⁵，當時是江南造船廠船體安裝車間的工人，共青團員，參加車間四清工作隊，也是積極分子，共產黨的依靠對象。運動初期，有人給他們車間的車間主任貼大字報，說他是「四清下台幹部」。這個車間主任是個南下老幹部，人很隨和，和工人的關係很好，施尚英打抱不平，施尚英打抱不平，貼了反擊大字報，說他不是下台幹部。那些貼大字報的人當時是保市委觀點的，大多是後來的老保；而施尚英不久參加了工總司的成立大會，就這樣成了造反派。

王明龍也是這種情況。¹³⁶ 王明龍原是學徒工，1955年參軍，在部隊入黨，1960年退伍。退伍後被分配進上海重型機床廠，擔任廠長辦公室秘書。他工作的工廠在上海郊區的閔行工業區。

文革開始時，重型機床廠的運動在工作隊領導之下。《十六條》公佈後，加上那時已經有紅衛兵去他們廠串聯，王明龍認為廠裏的運動不符合《十六條》精神。他後來回憶說：「群眾拿小工具回家，食堂管理員揩油飯票，都要交待。所以我覺得工作隊的路線有問題，和中央精神不一致，群眾的問題

134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135 施尚英，男，1942 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技術學校，文革前是江南造船廠工人，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後期的主要負責人。文革結束後被判刑 13 年。

136 王明龍，男，1935 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重型機床廠廠部秘書，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中共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委員會常委、機電一局工會主席。文革結束後被判刑 12 年。

不應是主要問題。」王明龍於是和廠裏的一些工人貼大字報，目標對着工作隊。就這樣造反了。不過，大字報貼出後，沒有遭到反擊和圍攻，黨委也沒有找他談。王明龍所以沒有感受到大的壓力。¹³⁷

丁德發，¹³⁸ 當時是學徒工。上海紅八月的8月23日這天，廠黨總支支持下成立的職工紅衛兵組織將六十四名職工在廠區遊街，接着又抄他們的家。這些人中有「資本家」、「小業主」、「壞分子」、「反動技術權威」，還有四清中被揭出的「反革命小集團成員」、說過「反動話」的黨員幹部，等等。丁德發覺得打擊面太寬，貼大字報提意見，還去市委上訪告狀。廠黨總支沒有組織回擊，但丁德發在去市委告狀的過程中，認識了來上海串聯的北京紅衛兵。¹³⁹

對領導作風不滿的還有張寶林。¹⁴⁰ 他是天津人，16歲進當地技校學習電焊，因成績優秀，1958年大躍進時被提前分配到上海鋼窗廠(後改名為上海玻璃機械廠)做電焊工，和潘國平一個廠。1960年參軍，1965年退伍，回上海鋼窗廠。1966年初，上海要在衡山公園底下造地下建築，是個保密工程，要挑選一批「政治表現好」，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過硬」的工人，審查非常嚴格，張寶林被選上，進上海基礎公司工程四隊當電焊工。提起自己當初的表現，他說：「我工作的公司是承建保密工程的，政審要求很嚴，百里挑一，我的祖宗三代都被查了一遍。而且我技術好，尤其仰焊，當時很少人能掌握。我這樣的人，難

137 以上關於王明龍的造反經歷，均為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10 年 5 月 4 日對王明龍的訪談。

138 丁德發，男，1946 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五一電機廠檢修學徒工。文革中曾任上海五一電機廠革命委員會委員。

139 以上關於丁德發的造反經歷，均為筆者 2013 年 11 月 21 日對他的訪談。

140 張寶林，男，1940 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職業學校)。文革前是上海基礎公司電焊工。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第一任負責人。文革結束後被判刑 7 年。

道不是共產黨所信任的嗎？」他造反，是因為文革初期，隊裏出了一起安全事故，死了一個工人，隊裏卻沒有重視。他當時雖然沒有貼大字報，但卻對隊裏的這種漠然很不滿。¹⁴¹

小結

文革之前，一般來說，批評幹部必需十分小心。因為幹部代表黨，批評某個幹部，有可能被認為是對共產黨的不滿。

《十六條》允許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給了群眾批評幹部的權利，使得底層群眾得以在《十六條》的文革話語下，行使部分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從本質上說，文革中的造反派並沒有真正具有這個憲法保護的公民權利。而且造反派也不是從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去尋找造反的合法依據。他們的行動始終追隨中央決策，他們造反的合法性，更多來自毛澤東暫時開放的政策。這些政策的信息，來自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報刊社論，以及《十六條》。所以造反派們非常注意中央決策層釋放的信號，王洪文、黃金海、戴立清等都認真學習《十六條》，從中尋找造反依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造反派造反，更多具有的是規則意識，而不是公民意識。¹⁴²

但是，即使是中央釋放的信息，在最初也不是很容易辨別。1966年6月以後的中共中央公開出現兩個聲音，這是1949年以來所從未發生過的，因為過去中央決策層對外始終顯示「團結一致」。而自從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以後，中央實際形成兩個決策中心，即先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及為毛澤東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組，而且後者的話語正在日益取代前者的話語。聽哪一個？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們與工作組矛盾迭起的整個1966年下半年，正是中央兩個決策中心並存時期。兩個

141 筆者 2010 年 8 月 1 日對張寶林的訪談。

142 這個觀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一再提出的。

聲音通過兩個渠道向下傳達。工作隊和各級黨組織所聽從的聲音，是從中央書記處到地方的黨組織，通過層層會議或文件，正式傳達下來的。這個渠道由中共嚴密的組織架構和運作程序形成，是一貫的法定程序。黨委或工作組沒有覺察出中央有兩個聲音，抑或是不願意覺察，因為違反程序的任何操作，都是違反組織紀律原則的政治錯誤，是共產黨生活的大忌。

王洪文們聽從的，是來自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決策層的聲音，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不斷發布一系列支持群眾造反的講話，使造反派們發自內心地認同他們。但是，從反右等一系列「應召」提意見者的下場來看，還是有着莫測的風險。而且，作為共產黨員的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只選擇《十六條》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等傳遞的信息，而不選擇工作單位黨組織通過組織渠道所傳遞的信息，既需要政治上的敏感，更需要勇氣，選擇聽從非正式渠道的信息，是一種自我選擇，一旦出錯，是「立場錯誤」、「政治錯誤」，沒人為選擇者承擔後果。

中共自從1949年執政以後，一次又一次地發動政治運動，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對政治名份的又一次劃分。而且每一次劃分都是由各級幹部掌握劃分標準和劃分權，自上而下地評定誰是依靠對象，誰是又一輪打擊對象。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劃分，由底層群眾評定哪些幹部應該被批判。聶元梓大字報，標誌着政治名份評定權的轉換。只是，1966年6月至8月，各級幹部並沒有意識到這個轉換。於是，1966年的6月至8月，自上而下打擊提意見群眾和自下而上批評幹部，兩種現象並存。群眾顯然處於弱勢，直到8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十六條》公佈，文革的話語權和政治名份評定權才逐漸置換。對照《十六條》，造反派對自己政治身份的認知和幹部對他們的評定不對稱，衝突由此而起。

在文革中，共產黨員作為「先鋒隊」的成員，黨對他們的

要求就是作群眾的帶頭人。所以他們一定都是以自己對文革的理解投入文革，無論是當造反派，還是當保守派，都是對黨所發動的運動的積極參與，都是他們理解文革的行動。他們或者成為造反派的領袖，或者成為保守派的領袖。這是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群眾對他們的推舉。這個現象，不但在工人中，而且在學生中也十分顯著。例如紅衛兵中紅革會的馬立新，紅反會的蔣彪、上紅總部的李本榮、韓烽火，等等，都是學生中的共產黨員。人們以自己的解讀投入這場運動。在保守派是「捍衛」，在造反派是「打倒」。無論捍衛還是打倒，都是為了表明自己對文革的積極參與，更是為了表明自己對共產黨的忠心。

以上所提及的工廠中的這些最早的造反派，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文革前就是緊跟黨的積極分子。這個自我認知的革命名份，很可能與他們檔案中被各級幹部派定的實際名份並不一致。所以一旦他們給黨的幹部貼大字報，立即會遭到回擊。而回擊的內容，大多是從檔案中拋出的。其中有被偷偷記下的他們自己過去的言論，也有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成員或社會關係情況。而從他們的實際表現看，真正違反道德和法律底線的，只有曾經有過盜竊行為的鄺三騰。文革結束後，評價造反派，說他們在文革前便都是「社會渣滓」；或者給造反派貼上另一種標籤，說他們都是受共產黨政策壓抑的受壓制者，因而對共產黨不滿甚至仇恨。兩種說法都有偏頗之處。實際上，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文革前，有一部分人已經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而其他許多人，也都是努力使自己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積極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積極投入各項政治運動，積極申請入黨入團。換句話說，他們雖然是底層工人，但卻都不是邊緣人物。即使以當時的政治標準衡量，許多人也符合主流政治的要求。他們努力爭取的，正是「黨的依靠對象」或「積極分子」的名份。

所以他們「響應毛主席號召」，給自己工廠和車間的黨的領導或駐廠工作隊貼大字報提意見，以求得主流政治的認可。

而且，他們最初所提意見和十七年鬥爭方向一致：大多數都是指責基層黨組織對政治分層執行不嚴：「包庇地富反壞右」、「不抓階級鬥爭」。他們並不是指責整個幹部階層，更不是批判整個體制。而因為他們大都身為底層普通工人，主要根據自己的經歷和處境去理解這場運動，所以其中可能也會摻雜着個人恩怨。但昔日主宰工人命運的幹部們，一則不甘心自己的政治權威遭到挑戰，二則為顯示自己的革命堅定性，立即起而還擊，給他們加上「反黨」的罪名；他們或被批判，或被圍攻，有的甚至還被毆打關押。

其實，從他們文革前的表現和文革初期的造反經歷來看，促使他們造反的，並不是他們的個人品質，也不是他們的個人境遇，而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造成的久被壓抑的社會矛盾。由於缺乏社會監督和批評機制，更由於整個社會缺乏法制意思，公民的許多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於是所有的矛盾無法及時宣洩化解，加上封閉的就業環境，一些積怨就這樣沉澱發酵，無法通過就業流動淡化或消解，只能靠幾年一度的政治運動讓群眾出氣。文革初期，這些矛盾又被當權幹部沿襲慣性思維進一步激化。毛澤東成功地將底層群眾對幹部的這些不滿，轉化成文革社會動員的能量；而《十六條》，正是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時期，賦予底層群眾的可資運用的政治和政策資源。使王洪文、黃金海、葉昌明這些造反派覺得特別親切，「好像就是在指我們廠」。

對比紅衛兵造反派，工人造反派的崛起要艱難得多。這一方面是因為學生自1966年6月3日停課鬧革命，有的是時間；工人必須嚴守八小時工作制，只能在業餘時間鬧革命。更為艱難的是與當權派的關係。學校對學生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他們造反再激烈，也最終會因為畢業分配而離開學校，這使他們今後不會再面對那些曾經被他們革過命的領導。而工人造反派則沒有這樣的緩衝餘地。尤其文革前凝滯的勞動人事制度，造成他們與工廠的凝固人生依附關係，他們將可能長期甚至終身

處於那些被自己批判過的幹部的掌控之下，造反成本非常高；而且對成年人的處罰從來都比學生嚴厲得多。這使他們對自己的造反行為不得不小心謹慎，而且一旦造反，就一定要訴求有關領導對自己造反行為的認可，杜絕被「秋後算賬」的後顧之憂。因為他們有可能被加上各種政治異己的名份，從此成為邊緣人物。他們以後說自己當初是「提着腦袋造反」，雖然言過其實，但也確實有着某種真實。

造反派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文革前相比其他普通工人，具有更多自我意識及個性，比較不安於現狀，對自己的人生有着自我設計和追求。這樣對自己人生意義有着明確追求的人物，是任何社會都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當時所有政治和物質資源被執政黨高度壟斷的中國，他們只能努力使自己符合共產黨的要求，積極投入各種政治運動；此外，他們業餘時間讀夜校，學技術，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術和受教育水平。而這場文革政治運動，又一次為底層提供了通過在運動中的表現，積累政治資源、提高政治名份，從而提高社會身份的可能。這些都更激發了許多人性格中的不安分因素。

但階級鬥爭這個壓倒一切的價值取向，將他們中的一些人視為異類進行打壓。造反派中也確實有個人道德品質較差者，在那個將道德泛政治化的年代，這些人尤其被視為社會渣滓。到1967年年初中央明確支持造反派，造反風險大大降低之後，這樣的人一哄而起，更是給造反派的形象打上了深深的陰影。

第七章

工總司成立 艱難的公民結社

毛澤東要求工礦企業開展文革

工廠工人造反派的興起，必然會產生成立全市性組織的意願。這個意願和毛澤東的意願是一致的。1966年的國慶節一過，10月9日，毛澤東便將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委主要負責人找去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原定三天，但由於參加會議的各省市領導對文革的態度基本都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結果一再延長，到10月28日方結束。只有山東省委書記王效禹的態度鮮明，支持造反的學生。他以後成為省委書記中唯二的「能夠正確對待文革」的革命派，另一位是山西省委書記劉格平。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做了關於執行資反路線的檢查；陳伯達作長篇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這兩個月中，不但上海，全國各地都發生驅趕北京紅衛兵以及工人圍攻學生事件。毛澤東認為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來、陶鑄，到各省市黨委，都還是沿襲老一套思路。於是繼批判劉少奇後，毛澤東接着批判他所認為的從中央到地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文革初期形勢的又一個重大轉折。¹

曹荻秋和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等參加了這個會議。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剛做鼻癌治療，身體虛弱，正在養病。10月

1 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第95頁。

7日葉群打電話給他，說林彪、江青都很關心他；林彪怕他落後形勢，特地讓她打電話，要他去參加會議，「哪怕坐一兩個小時聽聽也好。」陳丕顯於是抱病參加會議。² 10月17日，曹荻秋代表陳丕顯、魏文伯在第三小組作聯合發言，匯報上海文革情況，也檢討了組織工人保衛市委之事。據當時的傳單說，這是張春橋讓曹荻秋檢討的。³ 之前曹本來希望張春橋或姚文元能幫忙修改這個檢討，但這兩個昔日的下級一口拒絕。張春橋甚至開會時的編組都不和上海的幹部在一起，他說自己代表的是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上海市委。幫忙修改檢討書的是戚本禹。⁴ 戚本禹從小生活在上海，文革前他每次來上海，曹荻秋都親自接待。他對曹荻秋的印象非常好，覺得曹為人厚道誠懇。

張春橋會議期間去陳丕顯住處，向陳表示對曹荻秋和魏文伯的不滿，提出希望陳丕顯回上海後出來主持工作。陳丕顯聽了沒吭聲。會議期間江青兩次請陳丕顯吃飯，這是江青表示親熱的信號。陳丕顯以後回憶，席間談到上海情況，江青表示對曹荻秋和魏文伯不滿，說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看來是搞不下去了。我們希望你站出來。」江青親熱問候陳丕顯的身體情況，說「我和春橋願意做你的顧問」；江青還要陳丕顯對年輕人「順着點」。江青強調說，青

2 陳丕顯著《在一月革命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3 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中記載：「會上陳丕顯、曹荻秋拒不承認犯了方向錯誤、路線錯誤，經張春橋同志嚴正指出後，才在 17 日的小組會上作了假檢討」。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

4 戚本禹，1931 年生。1949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 年 12 月 8 日在《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受到毛澤東稱讚；他關於太平天國李秀成的論文也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譽，並且引起史學界的重視。1966 年任《紅旗》雜誌副總編，後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1967 年 3 月 30 日在《紅旗》雜誌第 5 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1967 年底成為王關戚集團成員被抓。文革結束後被判刑 18 年。1986 年出獄後在上海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1990 年代初退休。

年學生到工廠去串聯，中央過去有限制，今後は限制不住的。但是陳丕顯不接茬。後來造反派以此作為陳丕顯頑固不化對抗江青的罪狀。對此陳丕顯文革中解釋說：「我耳朵不好，沒聽見。」⁵ 30年後，陳丕顯在回憶錄中說，他其實是不願意，曹荻秋和魏文伯當時工作都事先向自己匯報和商討過，他和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⁶

江青其實傳達了毛澤東的思想。1966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不幾天，毛澤東提出：光是學生不行，工礦企業也要搞文化大革命。⁷

如何在工廠開展這場運動，中共中央早在文革剛開始的6月便已有考慮，中央將上海作為工廠的文革試點，因為上海是文革策源地，又是全國工業最集中的城市。當時全國所有工廠都不開展文革，只有上海是例外，第六章已提及。彼時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向毛澤東建議：對「上海正在進行四清的四十萬職工的企業，決定用文化革命運動為中心的方法進行。我們已答覆同意，看看他們的經驗如何，再行推廣。」劉少奇特地強調：「這是一個重要決定，請主席考慮決定。」毛澤東於兩天後的7月2日即批「同意你們的意見」。同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7月22日，又發出《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補充通知》，要求工廠職工在保證完成生產的條件下，結合四清運動，分期分批開展文化大革命。⁸ 劉少奇的苦心可見：以「結合四清開展工廠文革」為

5 《陳丕顯檢查》，載於1967年3月26日上海《工人造反報》，「上海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編。

6 陳丕顯2005年著《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7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錄》第657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8 《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1966年7月2日，中發〔66〕336號。《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引自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2006年版。

名，讓工廠企業的文革由工作隊領導，實際限制文革浪潮波及工廠。

8月，紅衛兵運動興起。劉少奇和鄧小平失去權力，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於9月7日組織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論抓革命促生產》。還在9月下達了一系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文件：《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中央批轉總參、總政『建議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⁹於是正在蓬勃興起的也命名為「紅衛兵」的職工組織，全部被先後解散或更名。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後來回憶說，毛澤東對這樣的做法非常不滿，認為工廠文革運動三起三落。劉少奇搞的那個通知和補充通知，將工廠文革納入四清軌道，還要「分期分批」；陶鑄的那篇社論強調工人的職責是搞好生產，呼籲學生不要去干預工廠的文革運動；另幾個文件不許工人進行串聯，還說工廠的文革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等等，毛都非常不滿意。毛認為這樣是將工廠的文革壓下去了。毛雖然也在那些文件和社論上畫了圈，但畫圈不等於同意。¹⁰

王力又回憶說：「安亭事件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不久，毛主席就提出工礦企業要搞文化大革命，光是學生不行，毛主席認為中國革命最早都是從學生開始，學生起來後，還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來還是不行。」毛說文革中工人最早也是

9 《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及附件》，中共中央 1966 年 9 月 14 日，中發〔66〕478 號；《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中共中央 1966 年 9 月 14 日，中發〔66〕469 號；《中央批轉總參、總政（建議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中共中央 1966 年 9 月 25 日，中發〔66〕509 號。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659 頁。

曾經起來的，可是領導沒有很好引導。¹¹ 王力還說：毛澤東認為一定要搞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後面文化大革命就會半途而廢。毛澤東認為如果不搞工礦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基礎就搞不掉，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就搞不掉。

11月8日，張春橋在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五名紅衛兵時說：「搞工廠是方向問題，我們打算下一步應該這樣走。至於怎麼樣搞，你們去闖，去摸索經驗」，「還是靠你們去闖吧！找幾個工人談談心。」¹² 張春橋不會不知道陶鑄等對職工群眾組織的反對態度，以他一貫的謹慎，他應該是領會了毛澤東想將文革推進到工廠的想法。

而各省市黨委包括上海市委，顯然不知道毛的這些最新想法，他們還是一如既往，一廂情願地希望大串聯早日結束，希望至少能將紅衛兵擋在工廠大門之外。為此，9月7日，上海市委特地以市委文件形式向下發了一個通知，後面還附了一個電話通知：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通知

滬委〔66〕第91號

市委各部委、各區委、縣委、黨委：現將中央緊急電話通知即發給你們，請你們立即通知各工廠企業、學校和公社黨組織，根據這個通知精神進行工作。

中共上海市委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緊急電話通知

中央要搞個指示，決定幾條，主席已同意了。指示正在寫，陶鑄同志先電話通知，要各省市馬上通知地(市)、縣委

11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953 頁。

12 《北航紅旗五名戰士與張春橋、戚本禹同志談論紀要》，1966 年 11 月 8 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和工廠、企業單位。主要內容為：一、農村，縣以下不要去串聯。二、學生不要去工廠串聯。總之，要把縣以下和工廠穩住。外地的學生去了，要同他們講道理，勸他們回來。各省市要找外地和本地的學生開會，講明中央指示不要下農村、工廠串聯。有意見，可以派少數代表座談、送大字報。幹部要挺起身來，講道理，生產搞不好，沒有飯吃，什麼也不能搞。講這是中央決定，指示馬上就要下達。

1966年9月7日下午1時

周恩來正在起草有關文件，文件明令學生不要去農村、工礦企業串聯。周恩來並要陶鑄打電話向華東局打招呼，聽反應。中央的這個文件毛澤東到9月14日方批覆。但上海市委已經等不及了，在9月7日便將這個與陶鑄通氣的電話，以市委文件發了下去。¹³ 上海市委的預感完全正確。就在這個市委文件發下去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學生紅衛兵，正在去工廠與工人造反派串聯，1966年11月6日，就在北京，一個名為「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的組織在東單體育館宣告成立。¹⁴ 最初有三千人參加。而三天後，上海的工人組織也將成立，上海文革力量的對比，將因此大大改變。

工總司籌備會議

1966年11月5日，上海西面靜安區，愚園路311號一幢花園小洋房裏。房主已被趕到一個角落，現在的主人是首都三司聯絡站的北京紅衛兵。這個北京紅衛兵的聯絡站，就是前面第四

13 金大陸《陳丕顯、曹荻秋等反對紅衛兵大串聯的態度和舉措》。《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編。

14 北京職工造反組織成立的日期轉引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秘書組1966年12月12日傳單《上海和北京及各地在京革命造反派座談會紀要》。

章提到的北京紅衛兵第三次大規模南下時在上海成立的組織，負責人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姜濤。首都三司聯絡站一成立，便在市委延安西路辦公大樓門前和不遠的靜安公園貼出成立布告。許多支持他們觀點，或在單位受到壓制的學生和工人造反派，看到布告紛紛找上門，和北京紅衛兵建立聯繫。

南下的北京紅衛兵中有一個名包炮的中央美術學院學生。他原名包常甲，「包炮」這個名字是文革中改的，取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之意。¹⁵ 他和幾個中學紅衛兵來到上海串聯，同行者到上海後又去其他地方串聯，他留在上海。包炮後來回憶，第一個讓他震驚的來訪者，是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的工人。這個上海工人告訴他，他們因為支持北京紅衛兵，被南洋模範中學紅衛兵毒打，以後又被送回所在工廠繼續挨打。這使包炮產生幫助上海工人成立組織的想法。來訪的工人都表示要去北京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告狀，他感到不合適。此時，中央剛於幾天前的10月30日，向各省市黨委轉發給安徽省委的回復，要求工人不要離廠外出串聯。包炮覺得工人造反派不必去北京，可以在上海成立自己的組織，向壓制他們的領導作鬥爭。包炮將自己這個想法對姜濤說了，但姜濤不積極，姜當時的着重點在學生運動。包炮於是自己行動。11月5日，他根據來訪登記簿上的記錄，讓聯絡站的其他紅衛兵給來串聯過的工人造反派打電話，邀請他們明天下午來聯絡站參加座談會，交流工廠文化大革命情況。¹⁶

上鋼三廠的戴祖祥，是最早與首都三司聯絡站聯繫的工人之一。他的弟弟戴祖大是淮海路上新世界服裝商店的店員，被作為「壞分子」批判。戴祖祥帶了跟着自己學習美術的四個徒

15 包炮，男，1940年生，1966年是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五年級學生。順便在此解釋一下，有書上說包炮的母親是康生家的保姆，這是完全沒有的事情。她母親一輩子沒有出過自己生活的東北小鎮。

16 金大陸、筆者、金光耀 2009年11月18日對包炮的訪談。載於《世紀》雜誌 2012年第3期，中央文史研究館、上海文史研究館主辦。

弟，在批鬥會現場搶出了弟弟。新世界服裝商店告狀告到戴祖祥工作的上鋼三廠，戴祖祥於是也被廠裏批判。戴祖祥和戴祖大聽說上海戲劇學院有個造反派組織革命樓，就去那裏串聯，想為自己討個說法。他們認識了革命樓的負責人侯邦琪，兄弟倆乾脆就住在戲劇學院，不回工作單位了。兩三天後，通過革命樓的紅衛兵，他們又認識了包炮，包炮對他們說：他們可以這樣迫害工人，工人難道不可以起來反抗他們嗎？包炮讓他們來參加座談會。

822廠的技術員岑麒麟，¹⁷ 也是最早與這些北京紅衛兵聯繫的工人之一。他在一所大學觀看大字報時，認識了姜濤。11月5日傍晚，岑麒麟去首都三司聯絡站，姜濤說，現在有很多受壓的造反派到首都三司聯絡站來告狀，要求幫他們平反，上海工人應該建立自己的組織。他們已經聯繫了一些人，決定明天(6日)下午到首都三司聯絡站來開籌備會議。姜濤要工人們再去聯絡一些人來開會。¹⁸ 第二天，11月6日一早，岑麒麟來到愚園路311號打電話通知他所認識的其他工廠的工人造反派。這時滬光燈具廠工人黃文海找上門來。¹⁹ 黃文海11月4日在廠裏組織了個「硬骨頭造反隊」，受到廠領導的指責，他到首都三司聯絡站是來告狀的。黃文海並表示，他們一個廠的造反派單獨造反很吃力，希望能像紅衛兵那樣，與其他廠的造反派聯合起來。紅衛兵告訴他說，我們現在正在籌備，歡迎參加。於是，黃文海馬上與

17 岑麒麟，男，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822廠技術員，中共黨員。文革初期參加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任工總司委員，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業餘工人大學領導小組成員、上海機電二局革委會副主任，上海822廠革委會主任。文革後被判刑5年。

18 岑麒麟1978年11月29日。筆者覺得岑麒麟的這個回憶中，所提及的姜濤應該是包炮。

19 黃文海，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滬光燈具廠的工人。工總司發起人之一。1967年因「分裂工總司」被關押，1969年回廠勞動。1973年後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手工業局工會委員。文革結束後回廠勞動。

岑麒麟一起打電話。他倆共通知了幾十家工廠的造反派。²⁰

黃金海是北航紅旗的紅衛兵呂英豪去他廠裏串聯時，向他邀請的。黃金海想起王洪文，馬上讓人給國棉十七廠打電話，希望他們也派人去參加。²¹ 所以王洪文是黃金海通知的。陳阿大是自己去的。6日中午，岑麒麟吃過午飯出家門，還想多聯繫幾家工廠的造反派，路過江浦路上的良工閥門廠鑄工車間，造反隊員小蔣接待了他。岑麒麟告訴小蔣，北京紅衛兵下午要開上海工人串聯會。陳阿大在一旁聽了，下午，就自己趕去愚園路。潘國平這些日子病假在家。廠裏另一個工人造反派小王11月6日上午在廠接到邀請開會的電話，正遇上來廠的潘國平，就動員他一起去：我不善說話，你小潘能說會道，一起去吧。潘國平就這樣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的謝鵬飛和蔣周發。謝鵬飛11月3日逃到巨鹿路691號的炮司後，就住在炮司，不回廠也不回家；身上沒有錢，飯還是紅衛兵給他打的。11月6日，炮司的紅鷗對謝鵬飛說下午在愚園路開工人串聯會，讓他也去參加。葉昌明、范佐棟、丁德發、徐美英等，也都是上門告狀時被邀請的。

被通知的有幾十家工廠，11月6日那天實際到了17家工廠共三十多人。首都三司聯絡站負責人姜濤沒有參加會議。會議記錄上的主持者是岑麒麟，實際主持會議的是包炮。參加會議的北京紅衛兵有北航紅旗的呂英豪、北京體育學院的林波。²² 上

20 黃文海 1978 年 2 月 13 日。

21 黃金海 1977 年 7 月 9 日。

22 在王年一所著《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載於《黨史研究資料》2002 年第 2 期)中，引用文革後潘國平的回憶說，主持會議的還有北京紅衛兵姜濤，而且會議開始後姜濤還說是受中央文革小組的委託來了解上海工礦企業文革的發展，但筆者覺得這是潘國平在 40 年後的回憶有誤；筆者所能見到的潘國平文革剛結束被審查時的多份交代中，都沒有說到中央文革小組與這次會議的關係。筆者所看到的其他與會者的回憶，以及會議記錄，全都沒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更而且，其他所有與會者開出的主持會議的北京紅衛兵的名單中，都只有包炮，沒有姜濤。筆者訪談包炮時，

海的紅衛兵大都是炮司的：復旦的周谷聲²³、師院的江必雄，交大的許雲飛、華紡的林翌，²⁴市東中學的紅鷗²⁵，還有紅反會的方勁戎，等等。²⁶會議在底層一間狹長的大房間進行，房間中擺放着一張狹長的桌子。會議記錄者是丁德發和黃文海。丁德發的記錄被保留到文革後，為歷史存留了更多的真實和細節。

這個工人造反組織的成立，究竟有沒有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或是暗示？會議組織者包炮後來回憶說，他當時根本不知道毛澤東希望工人組織起來的想法，也沒聽說張春橋「搞工廠是方向」的講話。包炮回憶時再三強調，幫助上海工人成立組織完全是他自己一個人的想法，也是他一個人去行動的，沒有和任何人商量。雖然有好幾個紅衛兵協助他作聯絡工作，但主意是他想出來的。他就是根據毛澤東1939年在兩篇文章中的論述：學生運動是革命的先頭兵，只有工人運動起來，革命才能真正取得勝利。「這是我的理論基礎，是我想幫助工人成立組織的唯一根據！」²⁷

包炮也說姜濤那天沒參加會議。筆者在2013年，又特地再向會議參加者葉昌明、黃金海、戴祖祥、江必雄，詢問姜濤是否參加會議，他們都說沒有姜濤參加的印象。

- 23 周谷聲，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物理二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紅衛兵組織「炮司」負責人，1967年初參與「1.28炮打張春橋事件」。1970年因「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被關押。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 24 江必雄、許雲飛、林翌，都是炮司成員。
- 25 紅鷗，真名侯美度，女，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市東中學高二學生，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紅衛兵組織「炮司」中學部負責人；文革中畢業上山下鄉去河南省蘭考縣農村，1970年因「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被揪回上海關押近3年。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 26 方勁戎，文革前是上海大同中學學生。文革中是上海的中學紅衛兵組織紅反會負責人。
- 27 筆者2007年6月8日對包炮的訪談；包炮所引的毛澤東語錄出自毛澤東1939年5月1日所著《五四運動》，以及1939年5月4日所著《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會議一開始，戴祖祥首先控訴自己被廠工作隊打成反革命並被關在防空洞的遭遇。岑麒麟、潘國平、葉昌明、徐美英、謝鵬飛等，也紛紛控訴自己廠的黨組織或工作隊。其中，葉昌明關於紅雷青年小組是市委樹的假標兵的發言，對大家震動很大。因為其他人說的都是工廠範圍的事情，涉及到公司或者局一級已經了不得，而葉昌明揭露的卻是上海市委的問題。激起大家憤慨的還有謝鵬飛的控訴，他拿出了血衣。²⁸ 而此時，和他一個廠的周國定、鄭三騰等還被關在廠裏。比起其他人，謝鵬飛他們的遭遇是最讓人唏噓的。別人最多只是受到圍攻，謝鵬飛他們卻是不但挨打，還被關押了近兩個月；而且還是華東局的直接指示。大家認為這是一起將群眾打成反革命的典型事件。包炮說：「這是炮打上海市委的一張王牌」。²⁹ 據這次籌備會後不久編的一份大事記載：「有11個工廠的工人被打成反革命」。³⁰ 王洪文來晚了，他帶着廖祖康和國棉十七廠的造反隊員共三人最後到會，坐在黃金海旁。

包炮介紹北京和上海的形勢，那天他的嗓子都啞了。他主旨鮮明，建議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下面是丁德發當時記錄的包炮講話：

上海市的是冷冷清清，是一個反動路線，在五個月以來，少數派被壓力，是全國的事外逃援(世外桃源)，工廠的反動路線是一直貫徹着，63(6月3日批判)賀綠汀、周信芳等反黨的當權派，(毛主席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可是)816(8月16日曹荻秋)在師範(學院)的講話，曹荻秋說要整這些學術權威是不容易的，要擺事實，擺道理，(上海市委)把北京的

28 筆者 2005 年對謝鵬飛的訪談記錄。

29 後來赤衛隊寫了一張針對這句話的《揭穿工總司的一張王牌》。

30 這個數字引自《上海鐵路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大事記》，原文為打字油印件，無編者及成文日期，估計是 1967 年編寫。

紅衛兵小將圍攻，把農民工人召來，把紅衛兵逼回北京，(市委還)設立上海市的「十條」路線(「十條規定」)。市委是貫徹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上海成立紅衛兵司令部(「上紅總部」)是在上海市委指導下工作的

北京市委派工作隊來整學生，大革命的緊要關頭，毛主席發出號召，撤出工作隊在全國也發生群眾鬥群眾，學生鬥學生，這個反動路線在上海還是存在，在上海的反動路線相當瘋狂，運動一來把在上海運動的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我們成立工人的造反組織)這個組織是(符合)憲法的，造反有理，同這個反動路線鬥爭進行到底，希望革命組織起來革命，把上海反動路線打倒，把上海反動路線打倒，堅決打倒上海反動路線

必須串聯少數派，敢於造反派，議程內容

主要通過控訴大會，據目前有些人還不敢站出來，需要激發。發動大都(多)數群眾。進行大串聯，

必須定名稱，讓上海每個工人心中有這樣一個組織，有利於造反，揪出黨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保皇勢力很大³¹

值得注意的是，包炮在發言中援引憲法保護的結社權，證明成立工人組織的合法性。這個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利，對共產黨執政後的中國人，包括來參加會議的工人們，卻早已是個越來越遙遠甚至陌生的名詞。1966年8月22日北京清華大學的萬人大會上，周恩來在講話中曾提及這個久已虛設的結社自由權：

不管什麼組織，代表着在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

31 《1966年11月6日工總司籌備會議記錄稿》，這份記錄由參加會議的五一電機廠工人丁德發記錄。因原文是記錄稿，許多句子不完整，句與句之間大多是空格和點，筆者將空格和點全部改為逗號；段落是原有的。括號內的詞語是筆者為行文顯得通暢些所加。

不同意見的組合，這是結社的自由……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你們有自由，有合乎我們社會主義憲法的自由和權利。³²

周恩來的這個講話在工人中沒有引起反響。1949年後制定憲法，其中的言論、結社等自由，寫上顯然只是不得已，從來沒有對公民大力宣傳過。文革中周恩來重提，也只是針對學生的紅衛兵組織。至於工人，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所有針對工廠的措施，就是不允許工人成立組織。工人曾一度學着學生也成立紅衛兵組織，被中央發文禁止；這個9月25日頒發的中央文件，內容是「工人不要成立紅衛兵組織」，其實真正的意思是不准工人成立組織。

來參加會議的工人造反派大多只是來串聯，尋找支持，互通情況，沒有想到要成立全市性的組織。文革結束後，從王洪文的交代看，他認為工總司完全是紅衛兵串聯起來的：「我們這些與會者當時只考慮到自己在本單位受到壓制的問題；根本沒有想到上海市委，沒想到要造上海市委的反。」而文革結束後，黃金海被審查時在交代中也說，關於成立上海工人造反組織，「這點事先是沒有打算的。」³³但包炮召開這個會的目的就是打算成立全市性工人組織。

岑麒麟和戴祖祥因為前一天就和包炮聯繫上，所以知道包炮的這個打算。據參加會議者後來回憶，岑麒麟說關於成立全市性組織的事，我們已經準備了一下，組織名稱就叫「上海工人赤衛隊」，圖章也刻好了，我們打算蓋了章到市委去備案，不怕市委不承認。戴祖祥拿出自己刻的一枚石膏圖章，給大家傳着看。但大家不贊成他們的做法。因為本來說開會是串聯交

32 周恩來 1966 年 8 月 22 日在清華大學萬人大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3 轉引自王年一《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2 年第 2 期。

流情況的，怎麼連圖章都刻好了？這有點給人真主意假商量的感覺；大家尤其認為私刻圖章是違法的。³⁴ 坐在黃金海身邊的王洪文首先表示反對。大家也都對戴祖祥不滿，甚至懷疑他是「政治扒手」，轟得戴祖祥很窘，還是紅衛兵出來打了圓場，說他們前一天已經一起商量過成立組織的事情。

王洪文向大家說起他去北京告狀的經歷，眾人都感興趣，要他坐到當中講。王洪文便坐到長桌子的中間，岑麒麟和戴祖祥被冷落在一邊。³⁵ 這時已經是深夜10點，包炮看看時間已晚，估計有些人家裏有事，便建議各廠選出代表留下來，吃過夜點再繼續討論籌建組織事宜。17個單位留下了各自的代表，他們不久都將成為上海文革舞台上的活躍分子。³⁶

工總司的誕生

吃完夜點心後繼續開會。首先商量推選成立大會的主席團籌備組負責人。丁德發記錄了推選出的五個候選人：

-
- 34 葉昌明、黃金海、徐美英、潘國平、謝鵬飛等人在向筆者回憶工總司籌備會時，都說到他們當時對戴祖祥私刻圖章的反感；但是戴祖祥 2010 年 5 月 15 日在對筆者和金大陸、金光耀的訪談時卻說自己沒有事先刻圖章。是戴祖祥記憶有誤，還是在場的別人刻的？存疑。
- 35 筆者 1989 年 5 月 2 日對徐美英的訪談。
- 36 這 17 個人是：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中共黨員；上海玻璃機械廠工人潘國平；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工人葉昌明，共青團員；良工閥門廠工人陳阿大，共青團員；國棉三十一廠工人黃金海；上海保溫瓶二廠工人范佐棟；滬光燈具廠工人黃文海；上鋼三廠工會美術人員戴祖祥；822 廠技術員岑麒麟，中共黨員；五一電機廠工人丁德發；人民電機廠工人張伯生；色織拈線廠工人陳金星；有色金屬壓延廠工人孔繁胤；江南金屬制品廠司機王漢青。此外，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工人謝鵬飛認為自己「出身成份不好」，推薦同廠另一位工人蔣周發留下來；147 服裝社的女工徐美英惦着家中四個孩子，回家去了，留下同廠工人史梅龍。還有一個無線電儀器廠的造反派代表。江南金屬制品廠是戴立清工作的工廠，不過此時戴立清正在北京告狀，參加會議的是王漢青，廠裏的司機。戴祖祥的弟弟戴祖大也參加了會議。

組織研究

有組織、有機構、有統一領導安排

每個工廠都起碼一個代表參加，籌備一個領導小組進行系統性調查，幹得好的願為大家服務，就是好的，凡不合毛澤東思想的，就要罷他的官。這個頭就要有徹底的革命性，選頂得住的，鬥爭中學會鬥爭的，候選人五人：國棉十七廠王洪文、玻璃機械廠潘國平、國棉三十一廠黃金海、上鋼三廠戴祖祥、良工閥門陳阿大³⁷

包炮希望這個即將成立的工人組織是由上海工人自己籌備成立的。他要求大家先報身份，包括自己的出身、成份、簡歷和為什麼要造反，然後推舉負責人。他還建議，成立大會召開以後，再由參加大會的工廠代表，正式選舉負責人。於是大家各作自我介紹。

在所有與會的工人造反派中，王洪文和潘國平給人的印象最深。紅衛兵大都趨向選擇潘國平，因為潘的語言表達能力非常好，能說會道，會上表現比王洪文活躍，紅衛兵們認為他造反精神足。但是工人們覺得王洪文更好：貧農出身，復員軍人，參加過抗美援朝，工廠保衛科幹部，共產黨員，舉止也比潘國平穩重。黃金海後來回憶自己當時對潘國平印象，覺得他不是很「穩」，有點「海派」。黃金海提名王洪文。³⁸ 黃金海以後回憶說，他之前去國棉十七廠串聯時，就對王洪文印象很好，覺得王洪文穩重，又是黨員；而潘國平這些方面都不及王洪文。王洪文的東北普通話，也給大家一個非常好的印象。1949年以後，大批原籍北方的共產黨幹部南下掌政上海權

37 丁德發《1966年11月6日工總司籌備會議記錄稿》，標點符號是筆者加的，原文只是點或空格。

38 據黃金海對筆者說，王洪文是他提出的。而據戴祖祥2010年5月15日在對筆者和金大陸、金光耀的訪談時回憶說，是潘國平提名王洪文的。筆者認為可能兩人都曾提名。

力，北方話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權力和真理的符號，在上海這個南方吳方言區，操北方口音者往往會帶着些語言強勢。總之，王洪文的政治身份無疑是最好的，所以黃金海提議王洪文為負責人，大家都贊成。黃金海後來回憶說：「與會者們雖然互不相識，但對共產黨和黨的幹部是一致信任的。」³⁹ 參加會議的上海炮司紅衛兵周谷聲等也都提出：「王洪文是黨員，建議王洪文多負責點。」其實，這些人中有兩個黨員：王洪文和岑麒麟。但岑因為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對農村餓死人有過議論，被視作是「喪失階級立場的錯誤言論」，四清中暫緩黨員登記，岑麒麟沒有隱瞞這個情況。而且幾個當事人後來都回憶說，岑麒麟因為相貌原因，給人第一印象不好。⁴⁰

包炮贊成王洪文當籌備組負責人，他也覺得潘國平不如王洪文穩重。他文革後回憶：「我當時特別擔心出錯，擔心『扒手』當選，所以王洪文一報成份，大家都說好，我也覺得好，他不但是貧農，而且還是黨員和保衛科幹事。尤其是保衛幹部，當時一定都是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擔任。王洪文口才也清楚，當時給我的印象也較穩重，又是大廠出來的。當時我很高興，第一次開會就能選出王洪文這樣好政治條件的造反派工人。」⁴¹ 最終王洪文當選。

王洪文就這樣成為上海工人造反派領袖。這個領袖地位，王洪文將保持整整十年，這在文革中其他城市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中是少見的。後來的事實證明，王洪文的黨員身份，既對王洪文起了自我規範和約束作用，也使他比其他造反派容易被保守派和老幹部認可和接受，尤其被毛澤東看中從而培養提拔；這又反過來增強了王洪文在造反派中的威信和地位，而且也決

39 以上黃金海的回憶引自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黃金海的訪談。

40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對黃金海的訪談。岑麒麟的長相還被徐美英等參加會議的人都提及，說他給人第一眼感覺不好。

41 筆者 2007 年 6 月 8 日對包炮的訪談。

定了上海文革在全國的領頭地位。對於自己的當選，王洪文後來回憶說：

我同意包炮的觀點。他提出工人應該組織起來。江蘇、湖北組織得比較早。大家一起議論了文化大革命制定的《十六條》中講到工農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主力軍為什麼不動呢？應該組織起來。開始我不了解那人情況，有些猶豫，但在那種極「左」路線的情況下，採取個人報名，自己說一番個人情況。大家議論要組織起來，我也同意，主要是包炮的主意。組織起來人少怎麼辦？先籌備推選領導人。在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黨員，還有一個叫岑麒麟(公安部822廠技術員)是暫緩登記的黨員。我就作為籌備組的負責人，還選了潘國平，後來他變得很壞。⁴²

另外，推選了由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陳阿大與戴祖祥組成的成立大會籌備組。⁴³ 不過這個名單第二天便有所改動。以後的會議由王洪文主持。

在討論組織名稱時，包炮認為，岑麒麟他們起的「赤衛

42 轉引自王年一著《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岑其林」應為岑麒麟。

43 這個名單是丁德發記錄稿中所記載的。文革結束後，一些當事人回憶說是七人籌備組，其中有徐美英、蔣周發和葉昌明，沒有戴祖祥。筆者對照丁德發的記錄稿和徐美英等人的回憶，7人名單應是第二天即11月7日重選的，下文將會講到。

順便更正一下，在文革結束後的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材料，以及本書引用相當多的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所編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中，都提供了一份20多人名單，其中分核心、委員、總務、保衛等職務，說是工總司籌備會的分工，名單中有耿金章和孫玉喜(在第144頁)。這份名單應該不是籌備會議的名單，因為耿金章和孫玉喜，還有名單中的戴立清、繆南生、王腓利等，都沒有參加工總司的籌備會，不可能出現在籌備會的名單上。名單沒有寫明時間，但從所列人員上看，應該是工總司在「安亭事件」之後的名單，但決不可能是1966年11月5日和6日籌備會上的名單。

隊」名字不新鮮，不像紅衛兵那樣，讓人聽了耳目一新。包炮主張叫「造反隊」，說現在都叫造反派。但是，黃金海感到叫造反隊不妥，有點刺耳，會被人抓住小辮子質問「你們造誰的反」？經過「下來」風波的黃金海在這方面特別當心。當時，造反組織的名稱雖然各色各樣，但還沒有直接起名為「造反」的。黃金海擔心「造反隊」這樣的名字會使老工人產生接受障礙，王洪文等也都贊成黃金海的意見。但紅衛兵們堅持要取造反隊這個名字，說這個名字給人全新的感覺，而且體現文革精神。紅衛兵們還大聲誦讀毛澤東那條關於造反的語錄。一些工人被紅衛兵說服了。黃金海於是提出，既然要取名造反隊，那麼建議在「造反」前再加上「革命」兩字：「革命造反」。黃金海後來回憶說：

我當時主要考慮，「造反」不利於團結大多數。共產黨領導下，「造反」，造誰的反？容易被誤解。所以我提出將「造反」的含義和性質明確一些，加上「革命」二字。⁴⁴

大家都贊成黃金海的建議。另外，也學紅衛兵組織叫「司令部」。就這樣，決定組織名稱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黃文海又提出在「司令部」前再加一個「總」字，說北京紅衛兵分裂成幾個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派不要再分裂，⁴⁵大家同意。「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就這樣誕生了。⁴⁶王洪文隨即講話：

44 這是當筆者將這個章節的底稿送黃金海，請他核對史實時，他在底稿上批注的。

45 「總」字是黃文海提出的，是潘國平的回憶，轉引自王年一《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

46 以上關於工總司籌備會上的情況，有葉昌明、黃金海、徐美英、謝鵬飛等人的對筆者的回憶，以及他們文革結束後被審查時的交待。

我沒有經驗，因同志們對我信任，選我主任，進一步研究籌備方法時間，什麼時間開始，什麼時間召開控訴大會。

我們這裏成立總的，以後各區各塊便於聯繫，據我了解，(國棉)三十廠是我點的火，串聯了一下，像這樣的單位很多，我的看法，分區分塊便於工作，因咱沒有經驗，因咱人不熟，(如果我幹不好)該罷就罷，我要依靠大家，因時間急，發動各單位少數派。⁴⁷

紅衛兵運動在學校興起以來，成人的文革組織亦步亦趨地仿效着學生們，連組織的名字和形式都跟着稱「紅衛兵」。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在成人中建立紅衛兵，9月25日發文，要求工廠和企事業單位以及農村等，停止發展紅衛兵。⁴⁸於是成人的文革組織叫什麼名稱？保守派組織一般都從共產黨的革命歷史中尋找資源，取名「赤衛隊」、「糾察隊」之類，而造反派組織還沒有響亮的名字。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的建立，使成人造反組織有了共同的名稱：「革命造反隊」，從此與學生的「紅衛兵」區別。而且還將派生出一個新的政治名份：「革命造反派」。

紅衛兵提出，上海市委正在召開全市三級幹部會議部署上海文革的運動，所以一定要搶在三級幹部會議結束之前召開工總司成立大會。於是會議決定將成立大會時間定在11月9日，「讓市委措手不及」：⁴⁹

47 《1966年11月6日工總司籌備會議的記錄稿》，丁德發記錄。因原文是記錄稿，許多句子不完整。原文句與句之間大多是空格和點，筆者將空格和點全部改為逗號；段落是原有的。括號內的詞語是筆者為行文顯得通暢些所加。

48 《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的批示》，1966年9月25日；中發〔66〕509號。

49 葉昌明1980年1月4日供詞，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什麼時候開會，一定要在星期三以前……

主要搶時間，三級幹部開會。⁵⁰

三級幹部會議是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10月28日周恩來作總結講話後特別佈置的，他要求各省市回去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回上海後，即佈置召開上海的三級幹部會議，時間正是幾天前的11月2日。

紅衛兵提議，將成立大會會場選在人民廣場，但大家覺得人民廣場太大，擔心到時候來人不多。於是決定放在文化廣場。⁵¹ 大會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全部由紅衛兵包下。大會海報由炮司和工總司一起起草。會場聯繫和海報、宣言的印刷和張貼，還有大會會標，紅反會紅衛兵方勁戎提出都由他們包了。⁵² 會上還確定葉昌明、蔣周發等11人在大會上發言。⁵³ 大會執行主席由工人擔任，大家公推王洪文。但王洪文說，他當籌備組負責人可以，但主持大會不行，因為他講話不行，尤其在人多場合講不好話。大家便推選潘國平主持大會，因為潘國平普通話標準，表達能力強，思路清晰。⁵⁴ 於是，大會主席團負責人是王洪文，大會執行主席是潘國平。就這樣，籌備會上實際產生出兩個工總司領袖：王洪文和潘國平。

搶紅布行動

籌備會上還決定了工總司的袖章樣式。會議結束時，有

50 丁德發《1966年11月6日工總司籌備會議的記錄稿》。

51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對葉昌明的訪談。

52 同上。

53 這11份發言稿原為參加工總司籌備會議的上海炮司保存，1968年移交工總司，文革結束後移交上海市檔案館。

54 轉引自王年一著《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

人提出，成立大會上造反隊員要戴上袖章。但做袖章的紅布哪裏來？陳阿大說：「向布店借，不肯借也要硬借。等組織成立後，寫個證明，叫他們去向曹老頭結賬！」江南金屬製品廠的王漢清是司機，開了一輛卡車，載着眾人駛往八仙橋。途中發現汽油沒了，趕快開到延安路附近一個加油站，加完汽油，眾人登上卡車剛欲離開，被油站工作人員攔住。當時加油都要汽油票，工作人員向他們索要，他們遞上一張紙條：「上海市委加油100公升」，說「向曹荻秋去要！」

戴祖祥的弟弟戴祖大建議去八仙橋的協大祥綢布商店，戴祖大在服裝店工作，對這一帶比較熟悉。協大祥綢布商店是一家有幾十年歷史的老店，破四舊時被改名為長征綢布商店，但因「長征」之類的店名重複太多，後再改名為北京綢布商店。這時已經是深夜12點。商店早已打烊，店大門用木頭的門板排上。大家問王洪文怎麼辦，王洪文說：「這麼大的店，一定有後門，到弄堂去找！」他帶着人找到後門，值班人員開門出來，領他們上了三樓臥室，叫醒店黨支部書記。王洪文說他們因革命造反急需紅布二百尺，支部書記要他出示證件。王洪文拿出首都三司聯絡站的介紹信，支部書記說，紅衛兵介紹信不能作憑證，他要王洪文出示工作證，王洪文說沒帶，范佐棟和另兩個人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證。⁵⁵ 支部書記見了工作證後，告訴他們，店裏沒有紅布，不信可到商場去找。支部書記帶他們去二樓貨棧查看。果然只找到一百尺紅府綢。王洪文說府綢也要，我們借了！值班人員拉着他們讓付錢，范佐棟寫了張收條。出了門，大家議論說這點紅布可能不夠。戴祖大說附近有家棉布批發站，肯定有紅布。他們又直奔那裏，正好有個值班人員開門出來上廁所，大家便一湧而進。知道這些人是來找做袖章的紅布的，值班人員將他們帶進庫房，幫他們找到紅布。

55 筆者1992年對范佐棟的訪談。

眾人扛走了六、七大捆。⁵⁶ 這是工總司成立後的第一次「革命行動」，也是文革中上海第一起不付款而強行索要物資事件。不過後來工總司有了活動經費，即派丁德發去結賬還了錢。⁵⁷ 1970年9月毛澤東在上海與王洪文曾經有過一次談話。當王洪文談到這次搶紅布行動時，毛澤東說：「那有什麼辦法，人家不承認，不給你們嘛。」⁵⁸ 毛澤東沒有批評他們的行動。

第二天，11月7日晚上，蔣周法、謝鵬飛與黃金海等帶領幾十人，乘着一輛卡車去江灣，直奔蔣周法和謝鵬飛工作的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他們是去搶黑材料，為大會發言作準備的。到達廠辦公室後，他們先將電話機的聽筒拆下，然後要值班者交出黑材料，遭拒絕後，他們便自己動手翻查，最後搶走了一個鐵箱，裏面主要是廠裏的四清材料，馬上貼上封條，也沒有來得及細看裏面的材料，將箱子帶回到愚園路。這是工總司成立後的第二次「革命行動」，也是有案可查的上海工廠第一起「搶黑材料」事件。而在這前一天，11月6日，上海戲劇學院剛發生搶「黑材料」的事件；第二天，11月8日，不遠的復旦大學也將發生紅衛兵搶檔案事件。

工總司成立後最初的兩個行動，都是反規則而且是搶奪性的，這為工總司帶來「打砸搶起家」的名聲。工總司反秩序反規則的組織特性，也在這最初的兩次「革命行動」中充分展現。

炮司的紅衛兵又去與鐵路裝卸機修廠交涉，說他們關人打人是私設公堂，是非法的；工廠才將仍被關押着的鄭三騰等人釋放。

56 以上材料來自：范佐棟 1980 年 8 月 29 日證詞，陳阿大 1977 年 5 月 25 日交待，原協大祥綢布店工作人員蔡耕源、馬明良 1976 年 12 月的揭發，上海紡織公司批發部工作人員揭發。

57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黃金海的訪談。

58 王洪文 1980 年 6 月 16 日審訊筆錄(王洪文 1980 年 6 月 26 日在上面簽字)，中央檔案館收藏。這個筆錄是王年一 1990 年 3 月 20 日親自抄寫寄給筆者的。

宣言、海報、袖章和大旗

11月6日晚上，工總司籌備會議快結束時，王洪文提出，籌備成立工總司大會，要有個辦公處，但首都三司聯絡站地方太小。炮司紅衛兵林翌表示，工人造反派可以在他們的司令部辦公，那裏而且有電話。這樣，工總司在愚園路311號只開了一次籌備會議，第二次活動就搬到了巨鹿路691號。這座花園小洋樓也是紅衛兵強佔的，原是著名中醫陳筱寶後人的私宅，客堂裏還停着一具壽材。

11月7日清晨，王洪文等搶了紅布後，來到巨鹿路691號。上午，徐美英帶着一台縫紉機，自費叫了輛三輪車拉到這裏，她是用平時積攢的加班時間調休的。王洪文等人在裏間開會，包炮和炮司的紅衛兵也參加。參加者還有交大反到底的紅衛兵楊小兵，⁵⁹他是被交大反到底作為聯絡員派到炮司的。

徐美英在外間將搶來的紅布做成袖章和工總司大旗。袖章上的字是戴祖祥用毛筆寫的仿毛澤東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隊」，寫在一塊硬板紙上；由國棉三十一廠的陳竹伯和上海輕工業學校的紅衛兵將字刻成鏤空，再用黃色油漆刷到紅布上。戴祖祥還用一個石膏像的底座，以一根縫衣針為工具，刻了個工總司字樣的圖章。他刻圖章是想蓋在徐美英做好的袖章上。但只蓋了十幾個袖章，石膏圖章就裂成幾塊。大家生怕沒蓋圖章的袖章「不合法」，所以開大會那天實際沒發下去。⁶⁰大旗上的字需用黃布剪了貼上去。徐美英去附近一家

59 楊小兵，真名楊安禮，男，1945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交通大學68屆一系120專業學生，共青團員，班級團支部委員。文革初期造反，是交大紅衛兵組織「交大反到底」成員，參加1967年初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起草；文革中加入共產黨，畢業分配至上海江南造船廠工作，歷任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文革後被取消中共黨籍。文革結束後回上海江南造船廠從事技術工作。

60 關於圖章和袖章之事，引自筆者、金光耀、金大陸2010年5月5日對戴祖祥的訪談。

布店想用工作證「借」，卻正是昨天被搶紅布的那家店。店員不肯，說你們的人昨天半夜已經來搶過了。當時購買紡織品需用布票或紡織品專用券，徐只好用自己的專用券購買。因帶的專用券不夠，沒買足尺寸。所以大旗上的一行小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最後那個「部」字的耳朵偏旁，布不夠了，只好用黃漆寫了補上。大旗中間是「造反隊」三個大字，也是戴祖祥仿毛澤東字體設計的。⁶¹

裏間的人正在討論大會主席團人選。有人提出，昨天選出的幾個人中沒有女同志，於是將徐美英叫進去，要她自報出身。徐自報是生產組長、女工委員，又報造反原因。大家就說通過，女的有了。就這樣，選舉了王洪文、潘國平、范佐棟，葉昌明、陳阿大、戴祖祥、蔣周法和徐美英，組成大會主席團。王洪文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潘國平是大會執行主席。⁶² 參加會議的交大反到底楊小兵等提出，大家相互之間不熟悉，各人的情況都是自己報的；建議對主席團成員進行調查，防止混入壞人。包炮同意由首都三司聯絡站和炮司組成聯合調查小組，調查每個主席團成員的政治情況，介紹信由首都三司聯絡站開具。

葉昌明與蔣周法在三樓起草大會發言稿。工總司的成立宣言由人民電機廠工人張伯生起草。⁶³ 炮司給了他一些資料，他嫌房間裏太吵，躲進廁所去寫：

當時我對自己被廠裏圍攻的遭遇很氣憤，所以是帶着一股

61 大旗的情況引自筆者 1989 年 5 月 2 日對徐美英的訪談。

62 筆者 1989 年 5 月 2 日對徐美英的訪談。徐美英說自己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但在范佐棟 1989 年對筆者的回憶名單中，其他人都有，沒有徐美英。有些人的回憶中還有黃金海，但黃金海對筆者說他不是的。

63 據王年一著《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所引王洪文回憶，說宣言是包炮寫的。但范佐棟和岑麒麟都回憶說是由人民電機廠的張伯生和交大反到底的紅衛兵楊小兵一起撰寫。張伯生回憶說是自己起草的。而且 1967 年 12 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召開時，張春橋為此還特地提名張伯生為委員。

激情寫這個宣言，把參加開會的紅衛兵們拿來給我的幾份傳單東抄西摘，東拼西湊，組織成一篇宣言。其中一句「砍掉腦袋不過碗口大的疤」，就是從一篇紅衛兵宣言中摘錄下來的。⁶⁴

第一稿寫出後，張伯生拿給大家看，然後按修改意見修改，前後修改了三次被通過，形成了工總司的第一個文件。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毛澤東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言

(草案)

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們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就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搏鬥中宣告成立了！

我們上海工人從來就有革命造反的光榮傳統。過去，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起來造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打出了人民的江山！今天，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企圖在我國實現資本主義的復辟陰謀。上海市委也貫徹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向各單位派出了大量「工作組」、「工作隊」，以及採取其他種種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給運動訂下了條條框框。他們抓住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挑動工人鬥學生，挑動群眾鬥群眾，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在有

64 金光耀、筆者、金大陸 2009 年 9 月 11 日對張伯生的訪談。

些地方造成了解放十七年來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使上海的階級鬥爭蓋子至今尚未揭開，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大大落後於全國各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絕不能坐視不管！

因此，我們就要大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大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們要奪權，就是要把人民的權力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回來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我們要把那些企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一個不漏地揪出來，鬥臭！鬥垮！鬥倒！再踏上一隻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要造反，當然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甚至會遭受迫害，遭受犧牲。革命，還能輕輕鬆鬆？造反，還能一帆風順？我們頭可斷，血可流，革命的造反精神不能丟！割掉我們的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砍掉腦袋也不過碗口大的疤！過去，我們連國民黨的大刀水龍也不怕，今天，難道還怕你們小小圍攻和恐嚇嗎？！過去，我們連殺頭坐牢都不怕，今天難道還怕你們扣什麼「反革命」、「反黨分子」等等帽子嗎？！

老實告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老爺們，我們工人造你們的反是造定了！這個反是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逼出來的。我們既然起來造反了，這場造反仗打多久，打到什麼地步，就由不得你們了！反正，不獲全勝我們決不收兵！

全市革命的工人、革命小的將、一切革命的同志們：讓我們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集中火力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攻，徹底鏟除其流毒，使我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從而對世界革命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隊全體隊員向您宣誓：我們對您永遠赤膽忠心，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辭！革命需要我們流血，我們決不皺眉，革命需要我們獻出生

命，我們決不後退！我們要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乾淨、徹底地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使人民江山永不變色！

我們的最高統帥是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我們的戰鬥武器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我們的行動綱領是十六條。

我們的任務和目的是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徹底打倒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徹底清除其惡劣影響。鬥垮、鬥臭、鬥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⁶⁵

這個宣言和當時社會上各種宣言、聲明一樣，充滿了流行的革命語言。其中一句話比較突出：「我們要奪權」。這在造反派的宣言中雖然不是第一個，但也是比較早提出的。「奪權」兩字早在兩年前中共中央關於四清的文件《二十三條》中就第一次提出。文革開始後報刊社論以及《十六條》中也有提及，但都是指由上級黨組織撤換和委派下面的幹部，誰都沒有預料到後來一月革命式的奪權。張伯生等顯然也是為了引起轟

65 工總司辦公室資料組 1967 年 7 月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文獻匯集》。

動效應而照抄此話，⁶⁶ 他們當時肯定沒有理解和想到其真正含義。但文革結束後，宣言中的「我們要奪權」成為工總司造反派的罪名，說他們一開始造反就是為了奪權。

葉昌明去市委接待站與市委交涉，要求印發這個宣言，起初市委不答應，後來答應印二千份。但去印刷廠交印時，印刷廠表示，時間太緊，9日成立大會前交不出。於是決定出海報擴大影響；在海報中，特地加上市委和各級領導不得阻攔參加會議的內容；由參加籌備工作的紅衛兵幫忙油印。海報內容如下：

海報

我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隊，定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點正在文化廣場舉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大會」，會上將徹底批判和控訴上海市委壓制革命運動，迫害革命群眾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們希望全市各工礦企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支持我們，聲援我們，積極參加大會。並熱烈歡迎一切革命群眾參加大會。

我們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礦企業的領導，不得用任何藉口阻止、刁難革命造反派來參加這次大會，不准戴帽子、扣工資，不准挑動群眾鬥群眾。違令者就造你們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籌備組⁶⁷

海報油印了幾百份，大家馬上分頭四處張貼。

66 筆者在和金光耀、金大陸採訪張伯生時，也問過他，當時怎麼會寫上「奪權」的，他說他當時沒有想過「奪權」是怎麼回事情，就是照抄其他傳單的。

67 同上。

市委的「三不」方針

工總司在籌備成立大會時，首先想到要求上海市委領導人參加大會，承認他們的合法性。潘國平負責去找曹荻秋參加大會。11月8日上午，他先去交通大學找到交大反到底的紅衛兵申志明，與申志明一起去市委康平路辦公處。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劉冠英接待了他們，他們指名要曹荻秋接見。潘國平提出三項要求：1. 必須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2. 曹荻秋必須參加9日下午的大會，接受批判；3. 提供宣傳和交通工具。⁶⁸ 潘國平限令市委當天下午2點之前答覆。市委辦公廳秘書長李家齊隨即用電話將這一情況報告曹荻秋秘書。

曹荻秋這些日子為躲避造反派，改在衡山賓館辦公。聽了匯報覺得事關重大，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並馬上向中共中央常務書記陶鑄電話請示。陶鑄明確答覆：不得成立跨行業跨系統的工人組織，並強調這是中央意見。曹荻秋於是決定對工總司的成立採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方針。他和魏文伯當天晚上去看望在西郊賓館養病的陳丕顯，陳表示支持他們決定。⁶⁹ 陳丕顯還定下原則：「不贊成，也不反對，個人意見也不能發表。」⁷⁰ 曹荻秋後來對這個三不方針解釋說：「建立了工總司這樣的組織後，工廠的矛盾不是縮小，而是會把一個廠內部的矛盾擴大為外部矛盾，矛盾就難以解決，局勢就難以控制，生產就沒有保證。」⁷¹ 曹荻秋還對他的秘書說：「工總司

68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146 頁。

69 陳丕顯著《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70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梁國斌 1967 年 3 月 31 日《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滔天罪行》。

71 《上海黨內頭號走資派陳丕顯、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檢討》，1967 年 7 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最新鬥爭大會》印。

的負責人，有些是社會渣滓，要注意。造反派中確有一些不純的人混在裏面。今天這些人上台，明天那些人上台。一個組織成份不純，影響生產，最後是站不住的。我就不參加大會，我參加就是犯錯誤了。」⁷² 其實，曹荻秋還有一個擔心，就是如果到會如何表態？他後來說：「當時請我去參加或者市委派別人去參加，我們考慮派人去參加不好表態。」⁷³ 造反派們在交大找到另一位市委書記馬天水，請馬參加大會，馬天水也沒答應。

下午，市委將曹荻秋的不三方針通知辦公廳副主任劉冠英。為了不激化矛盾，要劉以個人名義，根據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精神，答覆工總司代表。但是，由於電話號碼搞錯了，劉一直未能與工總司聯繫上。市委還立即通知基層黨組織，要求他們說服職工「不要離開生產崗位去參加大會」。曹荻秋又特地佈置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做好接待的準備。張祺後來回憶：「曹荻秋說，工人有工會組織，為什麼還要成立什麼造反組織？這裏有問題。並關照我對受到蒙蔽的工人群眾一定要做好工作。」⁷⁴

造反派們一定要曹荻秋參加大會，表明他們對市委權威的仍然認可，也表明他們對自己行為的不自信。雖然在籌備會議上包炮曾強調工人成立自己的組織受憲法保護，他們對憲法的權威仍抱懷疑。黃金海後來對此做過解釋，說他們一再要求曹荻秋參加大會的目的：

目的是想請市委參加成立大會，講幾句話給予支持，反映了當時雖然對市委壓制群眾不滿，內心還是承認市委是黨

72 曹荻秋的話轉引自曹荻秋的秘書糜欣祥文章：《回憶曹荻秋同志》，刊於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9 年《上海文史資料》。

73 轉引自《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1968 年 10 月編。

74 曹荻秋的話轉引自張祺著《回憶曹荻秋同志》，載於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9 年《上海文史資料》。

的領導的心態。否則根本無需市委參加。……

曹荻秋決定不參加十一月九日大會的消息，當天下午我們才知道的。上午還有消息說曹來參加大會，大家非常高興。故大會一直等到下午。王洪文不可能在十一月八日就得知曹不參加，而且說「曹老頭兒，明天我給你點顏色看看」這樣的話。當時我們儘管在文革開始階段受壓制，但大家對中共上海市委還是信任的，希望市委參加、支持。否則要請曹來幹什麼？⁷⁵

曹荻秋認為工人有工會就可以了，顯示了中共幹部對公民結社權的真實底線，即只允許自己掌握的組織例如工會這樣的官辦組織存在。然而，此時官辦的各類群眾組織，恰恰是文革阻力，是毛澤東決心要摒棄的。

工總司成立大會

11月9日下午，工總司成立大會在上海最大的室內會場文化廣場召開。會場周圍佈置了許多糾察隊員，門開得很小，要使勁才能跟着人流擠進去。參加大會的大都是造反派，也有不少造反派的對立面。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去了八百人。⁷⁶ 陳阿大工作的良工閥門廠和岑麒麟工作的八二二廠各去了一百多人。

海報起了廣告作用，絕大多數人都是看到海報後去的。戴立清這天正從北京告狀回來，一下火車，就在車站出口的廣場邊上，看到一塊單獨立着的牌子，上面貼着有兩張《解放日報》那麼大的紅底黑字海報，正是工總司的成立海報。戴立清讓和他一起回來的同廠工人幫忙把行李帶回去，自己直接去文

75 黃金海《〈「四人幫」興亡〉一書的得失——與葉永烈商榷》，載於網上刊物《記憶》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

76 上海第17棉紡織廠1975年編寫《上棉17廠文化革命事記》。

化廣場。他在主席台邊第一次見到王洪文。王洪文那天穿着褪了色的軍裝，舉止穩重，讓戴立清第一眼就覺得他肯定是個復員軍人。戴立清廠裏來了許多人，都是參加工總司籌備會議的王漢清用卡車拉來的。他是司機，他開的那輛車在工總司成立的最初日子裏，幾乎成為工總司總部的專用車。王秀珍也是看到海報後去參加大會的，她還組織了同廠的幾十個工人，自己帶隊，用五噸卡車載着開去會場。耿金章廠裏的一個同事看到海報後，來約耿金章。耿金章前一天上晚中班，這天正在家休息，於是和同廠六個工人一起去參加大會。⁷⁷ 王腓利是廠裏別的青年工人當天看到海報，告訴他，他和幾個工人相約一起去。但到了廠門口，黨支部書記攔着不讓他們出廠。王腓利說，那你就算我們曠工吧。⁷⁸ 施尚英也和王腓利一樣，不顧廠領導勸阻而參加大會。他和一些工人看到海報後，因為與上班時間有衝突，就向車間的文革小組要求讓他們去參加，車間文革小組不敢擅自答應，層層上報，廠部不同意，施尚英他們說，那我們用加班攢下的調休去參加。他們一不做二不休，到廠工會去借了鑼鼓家什，乾脆敲鑼打鼓地舉着海報在附近的幾個車間兜了一圈，以讓更多的工人知道這個大會，然後去了會場。⁷⁹ 還有張寶林，他前一天去愚園路上的首都三司聯絡站看大字報，正遇上過去曾經和他一個工廠工作過的潘國平。潘國平告訴他，11月9日要開大會，而且打頭的王洪文是黨員，保衛科幹部。張寶林覺得保衛科幹部政治上一定可靠，就參加了大會。⁸⁰

據後來不久工總司的《工人造反報》與《一月風暴》小報合編的小冊子《上海工總司鬥爭紀實》中說，這天原估計到會一千多人，沒想到來了四萬餘人。而十年後文革結束時的清查

77 筆者 2010 年 8 月 1 日對張寶林的訪談。

78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79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11 年 1 月 16 日對施尚英的訪談。

80 筆者 2010 年 8 月 1 日對張寶林的訪談。

材料說，那天實際到會只有一萬餘人，會場稀稀拉拉。但是，參加大會的當事人都回憶說那天會場坐得滿滿的：王洪文回憶說會場裏坐滿了人；徐美英回憶說連過道裏也坐滿了人；她廠裏四百個工人，有半數趕來參加大會。⁸¹當時的上海文化廣場有座位一萬二千五百個，從這些回憶來看，會場裏擠滿人，當在二萬人左右。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1975年編寫《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中，也說到會者約二萬左右。黃金海更是回憶說，那天連文化廣場附近的陝西南路、永嘉路和復興中路上都站滿了人。參加大會的工人們大都從廠裏直接來會場，穿着各種不同的藍色或白色的工作服或背帶工作褲，許多人工作帽還戴在頭上，臉上的機油都沒有擦去。

主席團成員的資格審查，刷下了戴祖祥，因為他父親1949年前曾經做過錦江飯店的大廚，有人說他父親為資本家服務，是資本家的奴才；⁸²還有陳阿大，紅衛兵組成的資格審查小組去他居住的居委會調查，居委會說他父親「有問題」：一個資本家在紅衛兵抄家時，將一些黃金藏到陳阿大父親陳七二家，但不久東窗事發，陳七二被紅衛兵以窩藏資本家黃金之罪名揪鬥遊街。戴祖祥和陳阿大就這樣都被取消坐主席台的資格。陳阿大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戴祖祥倒是沒鬧情緒，仍然在主席台前忙碌，做接待工作。⁸³對王洪文的審查是炮司的周谷聲和紅鸛負責的，他倆去了國棉十七廠。紅鸛提出找工作隊，因為工作隊是王洪文的對立面，王洪文如果有什麼問題，他們肯定會告知。接待他們的正是駐廠工作隊長施惠珍，施向他們介紹了王洪文反工作隊的情況，而在周谷聲和紅鸛看來，這恰好說明王洪文造反精神足。調查下來很滿意：黨員、復員軍人、保

81 筆者 1989 年 5 月 2 日對徐美英的訪談。

82 筆者、金光耀和金大陸 2010 年 5 月 15 日對戴祖祥訪談。

83 丁德發《陳阿大造反與其他》。

衛幹部，當時還很少有造反派工人具有這樣過硬的政治身份。⁸⁴

大會海報寫着中午12點開會，但因為剛開始時來的人不多，且主持會議的潘國平遲到，所以時間推遲了些。主席台上，王洪文、葉昌明、徐美英和蔣周法等已經入座。范佐棟不在，他上午和幾個紅衛兵去尋找市委負責幹部，想請他們中哪一位參加大會，到大會開始時還沒到會場。

2點45分，潘國平宣佈大會開始。他首先介紹大會主席團成員。但還沒說幾句，剛介紹到自己，一個青年女工跳上台，說這個會議是北京紅衛兵操縱的，是個大陰謀，還說主持大會的潘國平不是上海工人，而是北京紅衛兵，因為她在北京紅衛兵衝市委時，幾次在市委延安西路辦公大樓前，看到戴着紅衛兵袖章的這個人。潘為自己辯護，說自己確實是上海工人。會場秩序頓時混亂，許多人要求潘證明自己的身份。還有許多人紛紛跳上台搶話筒。潘國平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證和工會會員證；但接着他所在工廠的一個工人上台，揭發說潘國平在廠裏表現一貫吊兒郎當，出身黑五類，根本不能代表工人，會場一陣騷亂。潘國平工廠另一個工人又跳上台，證明潘出身不是黑五類。大會執行秩序的糾察人員將所有自己跳上台的人都趕下台。有人去找來了一塊大黑板，將大會主席團成員的名字、工作單位、是否黨團員以及家庭出身等情況，抄寫在上面，放在主席台前，讓大家都能看到。⁸⁵

會場這邊，待秩序稍平息，潘國平宣佈大會繼續進行。蔣周法宣讀工總司成立宣言，葉昌明代表合成纖維研究所紅旗戰鬥小組發言，批判上海市委宣傳紅雷青年小組是「大陰謀」。接着蔣周法發言，發言稿是謝鵬飛起草的，內容是控訴他們被

84 筆者2001年3月7日對侯美度(紅鸞)的訪談。

85 據丁德發2011年對筆者回憶：大會秩序大亂時，王洪文吩咐他，趕快去將參加過1927年共產黨領導的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老工人孫長勝請來參加大會。丁德發叫了出租車趕去孫退休前工作的工廠，但廠工會不同意，說你們這個組織我們沒有聽說過。孫長勝於是沒有被請到。

毆打和關押經歷。蔣周法沒有說幾句就哭了，哽咽得說不出話。台下聽眾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又開始喧嘩。於是謝鵬飛上台接過話筒，繼續控訴。他出示了血衣、用來毆打他們的鐵刨花、醫院開具的驗傷單，以及工廠派人抄他們家時給的收據。會場的氣氛達到高潮，「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聲響徹會場。⁸⁶後來又有人往台上擠。會場秩序越來越亂，原來準備了七八個人發言，實際上發言的只有三個：葉昌明、謝鵬飛，以及王洪文所在國棉十七廠的造反隊代表。台上、台下展開辯論，一片混亂。

在後台維持秩序的上海基礎公司的張寶林⁸⁷，跳上台搶過話筒，身材高大的他將話筒高高舉在手裏，指揮主席台上的糾察，將衝上台來的人統統趕到台邊。黃金海則指揮一些工人手挽手築成圍牆，將王洪文保護在主席台中間。潘國平被人擠到台邊，張寶林就將話筒交給王洪文。王洪文接過話筒，沒說上幾句，又有人衝破糾察線，跳上主席台，一把揪住王洪文。是國棉十七廠的工人，揭發王洪文是「政治扒手」。還是張寶林，用帶領高呼口號的辦法，勉強穩住了秩序，宣佈了工總司的成立。王洪文以後對此回憶說：「開始宣佈工總司成立大會，幾句話後就發言。發言還未完，大會就被衝散了。這個大會計劃開兩個小時，實際開會半小時也沒有，各派就開始辯論，搶話筒的時間多。」⁸⁸

上北京告狀

大會進行中，工總司多次打電話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到會

86 這是謝鵬飛對筆者的回憶。

87 張寶林，男，1940年生，文革前是上海基礎公司電焊工人，受教育程度高中(中等技術學校)。文革中任工總司委員、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1973年回廠勞動。文革結束後被判刑7年。

88 轉引自王年一著《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

接受批判。下午6時左右，去請市委領導的范佐棟和紅鷗等總算來了，他們找不到曹荻秋，只在交大找到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張說要請示市委。但他去打了兩次電話，回來都說市委不同意。范佐棟等不由分說，將他硬推上吉普車，帶到文化廣場，再推上主席台。但張文豹不肯表態，范佐棟將話筒塞到他前面：「熱烈歡迎市委領導講話。」與會者都拍手歡迎。張只說「我是被硬拖來的，不能代表市委」，其他一句話都不肯講。這下，下面響起一片罵聲：「滾！」

曹荻秋不出席大會，作為市委幹部的張文豹，若能夠代表市委講上幾句話，可能會暫時稍微平息大家的情緒，但張文豹始終不肯講話。這下激怒了參加大會的工人們，更激起大家的擔心：市委不肯參加大會，好容易來了個人，又不肯表態。當時工人們還不知道市委的「三不」，但從張文豹的沉默，能讓人感覺出市委對這次大會的態度，這使所有的與會者感到不安。台下哄了起來。包炮從後台走到王洪文身邊說：「人不能散，到市委請願去！」王洪文於是宣佈：「曹荻秋原來同意參加大會，但到現在還不來。既然市委不肯表態，那麼，現在大會主席團決定，全體會議參加者，集體到市委去請願！大家不要散，到會的造反隊員留下來聽候命令！」⁸⁹ 戴祖祥扛着徐美英做的那面工總司大旗，跳上主席台，大聲喊道：市委領導不來，我們到市委去，要曹老頭接見！

從文化廣場裏出來的有幾千人，一些人從會場出來就回家了。餘下的人群跟着王洪文聚集到延安西路市委大樓門前。大樓對面有個平台，紅衛兵們立即在平台上拉起電線，身為電工的戴立清爬上去裝上擴音喇叭。這時已是晚上9點，工總司要求曹荻秋在10點半前接見，答應工總司的條件，仍沒回音。有人指揮大家唱起《工人階級硬骨頭》，《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歌曲，還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高呼

89 黃金海 1980年1月15日。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毛主席萬歲！」等口號。但等到10點40分，市委還是沒有人來。⁹⁰ 王洪文、潘國平和包炮等進入市委大樓找人，大樓內早已人去樓空，昏暗一片，不見一人。有人提出去北京告狀，但王洪文提出，還是等市委領導來解決問題。後來終於有一個市委工作人員來了，讓大家去離市委不遠的上海展覽館的友誼電影院。大家以為曹荻秋將在那裏接見，便湧向友誼電影院。這時隊伍已經不成型了，連大會主席團的人都互相找不到。

大家沿着延安路，向上海展覽館進發。到了友誼電影院，因劇場小，大部分人只能等在場外。這時，天上下起淅淅瀝瀝的冬雨。多數工人都是中午直接從工廠去會場的，許多人中飯都沒吃，此時又過了晚飯時間。眾人在雨中等了整整三小時，又餓又冷，直等到11月10日凌晨2時，等來了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張祺只是反復勸說：「你們這個組織是《十六條》上沒有的，《十六條》沒允許工人成立全市性的組織」，「你們還是早點回家休息，不要影響明天的生產」。張祺的勸說遭到怒氣衝天的工人們起哄。到這時候，工人們才知道市委有個「三不」指示。⁹¹ 這更激起大家的擔心，怕回廠會遭到批判，於是更非要市委表態承認工總司，以杜後患。黃金海後來回憶：「如果市委當時有人出面，代表市委安撫一下，就不會有後面的安亭事件發生。」⁹²

正在混亂之際，一個拿着手提喇叭的紅衛兵反復呼叫：「我們要到北京去，我們要見毛主席！」而另一個喇叭也在反復廣播：「特大喜訊！特大喜訊！周總理來電話說，曹荻秋不

90 以上情形以及幾個時間坐標都是引自傳單《評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列出的。傳單作者是「首都齊衛東」、上海市二女中紅衛兵「驅虎豹」戰鬥隊、上海市海關學校紅衛兵「代紅」，1966年11月18日初稿，12月11日修改。

91 《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之一》，載於1967年5月19日《工人造反報》。

92 黃金海2013年《〈「四人幫」興亡〉一書的得失——與葉永烈商榷》。

接見你們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見！」這樣的廣播對走投無路的人群無疑是提醒，許多人提出，去北京去上訪。王洪文等商量後也覺得只有這條出路了，於是決定帶領大家北上。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周總理來電話」，當時在場的范佐棟、戴立清和紅鸞等，都曾親耳聽見，而葉昌明文革中1966年11月14日的工作筆記，也提到這個廣播。范佐棟在安亭事件後，曾經查詢過這個「總理來電」是怎麼回事，沒查出個所以然，王洪文對此說：事情已經發生了，有沒有都是一樣了。事實上，這個廣播的作俑者，是上海自行車三廠工人孫福祥。後來，1967年3月，已經是戰到底負責人的孫福祥，在與戴祖祥一起躲避工總司的通緝時，告訴戴祖祥，那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他解釋說：「不這樣說，當時的氣氛調動不起來。」⁹³

小結

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催生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工總司的成立，打破了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控制。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確定了公民的集會和結社權，但這個權利從來沒有兌現。相反，制止民間結社，是1949年以來的一貫宗旨。目的就是隔離各種勢力和意願，不使這些勢力和意願相互聯繫形成與政府對抗的群體和力量。紅衛兵成立初期，受到學校和工作組激烈反對和壓制，沒有毛澤東支持，紅衛兵早就會像過去所有自發組織一樣，被作為「反革命小集團」遭到嚴厲處置。

而從文革初期各種中央文件對職工組織的規定看，只允許工人在工廠或車間成立組織，不准成立跨地區、跨行業組織。這樣的政策，就是要將各種造反勢力置於同級黨組織的掌控和監視之下。「跨地區、跨行業組織」，實際就是全市性、全國

93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10 年 5 月 5 日對戴祖祥的訪談。

性組織的代名詞。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都只想將自由成立組織的權利局限在學生中，不想再擴大範圍。

陶鑄等極力想守住的，歸根結底兩條：職工不得離開工作，不得像學生那樣成立全市性組織。前者是為眼前的國民經濟考慮，後者則是為共產黨自身考慮：決不允許不受控制的任何體制外社團或組織存在，這是條不可逾越的剛性規定。共產黨自己最初就是靠秘密組織起家的，深知有組織群體的巨大能量。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廣場宣佈成立自己的組織時，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衝破共產黨十七年所牢牢固守的無形禁令，挑戰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他們只是簡單地覺得，既然紅衛兵能自由成立組織，那他們成立組織應該也被允許。

其實，即使是紅衛兵，也從沒能發展成立全國性統一組織，因為這種實際上的政黨或準政黨，是最被共產黨忌諱的。就在工總司要求上海市委承認的同時，學生們正在再三要求，成立全國性紅衛兵組織。這個要求被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小組在內的決策層再三明確否定。中央對群眾組織的一系列規定，最初的底線是不許成立全市性職工組織，但上海工總司的成立不久將衝破這個規定。於是不准成立全國性群眾組織是最後的底線。以後，曾經有企圖成立全國性的組織，但馬上就被禁止，例如全紅總，後面章節將會提及。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將工總司成立大會後引出的安亭事件，說成是上海市委逼迫的結果；文革結束後批判造反派，又將造反派的行為說成是無理取鬧。兩種思維不在一個層面上。工總司召開成立大會，是根據憲法賦予的公民結社權利。這個權利意識，周恩來在不久前曾經對紅衛兵們強調過，幫助催生工總司的紅衛兵們也十分清楚。工總司籌備會議上，丁德發所作的會議記錄記下了包炮引用憲法有關條款時的講話。只是中國的憲法從來沒有讓人覺得神聖和高於一切，工人造反派對憲法賦予的權利根本不自信。十七年從來沒有真正行使過自己權

利的底層工人，一旦與共產黨的官員對抗，心底極不踏實。為降低風險，他們成立組織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希望上海市委承認他們的組織，承認他們行動的合法性。這對後人來說肯定是一個費解而矛盾的舉動：要求自己的批判對象、不久升級為打倒對象，承認自己行動的合法性。或者換句話說：要求被自己斥為「對抗革命」的對象，賜予自己革命的名份。而事實證明他們的擔心並非多餘，上海市委不出席他們的成立大會，表明了當政者對公民結社權的真正態度。曹荻秋拒絕參加工總司成立大會，映射出憲法在中國的真實地位。曹荻秋不敢擅自做主，根據的是十七年的實際規則，以及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這些中共中央文件，比憲法更權威和更具實際效力。

以後張春橋說曹荻秋怕群眾，說如果他早點接見群眾，事情就不會鬧大。事實上，曹荻秋們怕的不是群眾，他怕的是比憲法更具實效的真正規則。而且，曹荻秋等各級幹部，根本不知該如何對付造反派群眾，沒有先例，也沒有可以遵循的規則。共產黨執政後沒有與民眾平等對話的習慣，平等對話被視為軟弱和遷就，尤其群眾要求與黨政幹部對話的聚眾行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往往被視作「鬧事」，甚至被定為「反革命行為」。各級幹部對待「鬧事者」的態度，往往事發時不直接接觸，事發後懲罰性整治；不可能平等地面對面地聽取鬧事者的要求，更不可能與他們對話甚至談判。因為對話或談判，不但意味着對鬧事者的縱容、姑息，更意味着承認鬧事者與自己同等地位同等權利。

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幹部會選擇依照無形規則辦事，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所謂「政治錯誤」，其實就是跟着中央或上級指示犯錯，即使知道是錯的也執行不誤。而「組織錯誤」則是違背中央或上級指示按照自己的感覺處理問題或事件。這是共產黨政治生活的大忌，尤其與那些被視為異己的人物或組織對話，更是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曹荻秋們

正是牢牢守住「嚴格按照中央文件規定辦事」的底線，不敢犯組織錯誤。但這一次，毛澤東想做的卻正是打破中央文件的規定。他以暫時開放久違了的公民結社而且是不受限制的結社，獲得了底層最廣泛的呼應和支持。

第八章

安亭事件

工人造反派崛起

(上)

安亭攔截火車事件

鐵路上海火車站，也稱北站，是上海當時最大的客運火車站。11月10日凌晨1時許，滿載造反隊員的四輛卡車開來；接着，2時以後，近萬名造反隊員跑步而來，佔領了月台和停站的列車。王洪文、潘國平和包炮都在其中。他們找到北站的一個負責幹部，要車站增發去北京的列車，限10日早晨4點半前答覆。上海鐵路局馬上請示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委立即向國務院匯報。

自從紅衛兵大串聯以來，鐵路運輸秩序越來越混亂，幾乎所有客貨列車都嚴重晚點，圍車、攔車、阻車事件不斷。十天前，10月3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剛發出《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秩序的緊急通知》：「嚴禁攔截和阻止列車運行。嚴禁強迫鐵路延長列車運行區段，或改變列車運行方向」，「在車站和列車上任何人都不得用任何藉口妨礙鐵路職工執行任務」。¹ 這個文件於工總司成立大會的前幾天剛發出。在這個文件發出的前一天，10月30日，中央還下發了《中央關於工人不要離廠外出串聯的指示》，² 這兩個文件對上海這批準備北上告狀的工人們顯然十分不利。

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秩序的緊急通知》，1966年10月31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 1966年10月30日中發〔66〕532號，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舉着工總司第一面大旗的戴祖祥，帶着一千多人最先到達車站。上海北火車站擠滿人群，一片混亂。當時的情景被一張傳單描繪：

他們打碎了窗口玻璃，撞壞了檢票口的大門，無理衝進車站。他們一進站，強行登車，紛紛從窗口爬進列車。他們見到停在北區的滿載革命師生的一列長大列車——626次將要出發，幾百人就站立軌道，並將「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紅旗插在火車頭上，不讓開車。當時車上有幾千革命師生對此表示堅決反對，這樣車上車下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整個上海站內外就此大為擁擠和混亂。³

眾人擠上已經滿載乘客即將發車開往北京的626次列車，王秀珍也在這批人中間。王洪文和潘國平見這列車廂已擠滿，便率一千多人上了發往鄭州的756次列車，謝鵬飛等也上了這列車。范佐棟和葉昌明因為會後留在文化廣場的會場做善後工作，沒去車站；黃金海覺得這麼多人湧去車站上北京不太可能，也沒去車站，而且他胃疼，就回廠部醫務室看病去了；陳阿大雖也去了北站，但沒能擠上車；戴立清因為要把廠裏司機開去北站的一輛卡車開回廠，也沒上車。

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這天值班，接到上海市委的報告後，在電話中指示：盡量勸說工人，實在勸說不了，不要影響正常發車。⁴ 李干成副市長將這一指示轉告上海鐵路分局，但上海鐵路分局根本勸說不了這些工人。上海鐵路局局長邵光華請示鐵道部運輸局，運輸局的王效斌回答說你們執行市委的決定。於

3 傳單《非常大的安亭事件》，上海鐵路「二七戰鬥隊」1966年11月14日晚上9點。

4 傳單《曹荻秋同志在11月20日談話記要》，國棉16廠、國棉31廠部分革命職工，華師大「五敢」聯絡部翻印，1966年12月12日。

是，11月10日早晨5時，戴祖祥、王秀珍他們登上的626次列車被放行。王洪文他們登上的756次列車原來發往鄭州，臨時改為602次列車，上了二千五百多人，於上午7點正時發車。其餘一些上不了車的人仍滯留在上海站。

被放行的602次列車剛過南翔，邵光華又接到王效斌打來的緊急電話，問車開出沒有，說剛才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了此事，周恩來堅決不同意這麼多工人北上。王效斌要求馬上設法將列車停在上海附近的車站，就地解決問題，並說很快會有相關電報發來。邵光華接到緊急電話，立即執行停車命令。此時602次車已過黃渡站，來不及停了，又不能退回去；下一個是安亭站，上海鐵路局於是急令火車停在安亭。⁵ 這個連大多數上海人都不知道的安亭小站，因為602次列車的停靠，頓時成為全國注目的焦點，在文革史上留下重要一頁。

火車停下後，被摘下車廂，機車頭單獨駛往常州戚墅堰，失去動力的602次車動彈不得，趴在鐵軌。這時是1966年11月10日上午8時17分。⁶ 潘國平等下車打聽，方知前面就是上海郊區嘉定縣內的一個小站——安亭車站，他們所乘的列車被停在安亭車站旁的一個卸煤岔道裏，軌道邊堆着一堆木材和一堆煤，四周一片曠野，既無村莊，更無房子；後來才知道，這裏離安亭鎮還有好幾里。包炮等找到車站站長的小木屋，想打電話給市裏或北京，但打不通。他們要求站長放行。站長表示，沒有上海鐵路局調度室的命令，他不能隨便放行。

戴祖祥、王秀珍等人登上的626次列車，也在這天中午接到指令，被停靠在南京車站。

這幾趟火車發出後，又有幾百名造反隊員陸續趕到上海火車

5 以上關於602次列車發車和停車的資料，全部引自上海鐵路局長邵光華1968年3月22日對造反派的說明。

6 這個時間引自《控訴上海市委鎮壓工人運動的滔天罪行——安亭事件真相》，作者鉗工董興茂，載於1966年12月28日《工人造反報》。

站，登上又一列火車，但直到10日下午，火車也沒開出。他們聽說先行者被攔在安亭，於是，10日下午5點，四五百人在徐美英的帶領下徒步北上，張寶林也在隊伍中。他們順着北站旱橋下的鐵軌向北進發。經過十小時步行，11日凌晨3點左右到達安亭。

就這樣，北上的工人造反派被分割成南京、安亭和上海三截。

正當602次列車從上海火車站開出，11月10日清晨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播送了《人民日報》當天的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由陶鑄主持撰寫，毛澤東劃了圈。上海市委立即通知上海火車站和安亭站，馬上廣播這篇社論，並讓報社立即加印幾萬份，派出以上海工業政治部副主任夏明芳為首的大批幹部，帶着這篇社論趕去安亭，散發報紙並勸說造反派們回滬。市委還組織各廠，往安亭送去大量麵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禦寒物資和藥物。有的工廠將廠裏造反派工人的家屬，以及與造反派關係較好的工人，也動員去安亭做說服工作。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是最早派人去安亭勸說的，也是最早送去食品、衣物和藥品的，⁷ 當時廠裏共有384名造反派工人去了安亭。

但幹部們的勸說無濟於事。鐵了心北上告狀的工人造反派們，不但不願走回頭路，而且還幾次攔截其他火車，不加载他們就不放行。最先攔下來的是一小列貨車，造反隊員們要求司機掛上他們的列車，將其拉出岔道，被司機拒絕。工人們圍着他不放，司機看脫不了身，假裝同意，要求攔車者離開鐵軌，說讓他向前開出一段距離以便倒回掛車。但他上了車頭，卻沒有倒車，越開越遠，一去不返。⁸ 接着，北上的648次臨時客車

7 這個人數引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紅色堡壘」——記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人革命造反派的鬥爭》，載於1968年8月20日《文匯報》；以及馬驥1989年7月6日對筆者的回憶。

8 《血與火的戰鬥洗禮——安亭事件》，海港躍進區「心向黨造反隊」安亭事件全體隊員，載於《一月風暴》第三期，1967年11月，上海工人革命造

被攔截。近百人站在鐵軌上，揮舞着大旗。火車帶着巨大的慣性，拉着汽笛衝過來，放出的蒸汽伴着巨大響聲瀰漫在列車兩邊，十分可怕。但總算在攔車者前靠十公尺左右處停下。⁹ 這趟車被阻滯了兩小時，因車上乘客本已超載，只得往車廂裏再塞進十幾個人後，放行列車。¹⁰ 據潘國平後來說是他趕去現場說服後放行的：

我覺得這樣做不妥當，工總司剛成立，這樣一攔火車會遭到群眾反對，對攔火車的人要做點工作。這樣我就來到現場做了一些勸說工作。攔車的計有二十多人，經勸說後他們提出要上北京去，火車上的人也答應帶一些人。這樣十幾個人上了火車，火車就開了。¹¹

而據當時造反派的傳單說：

648次臨客經過安亭，被工人攔下，要上車，爭執了兩個多小時，鐵路人員答應602次開車，工人們才放開。648次開走後，602次還是不開，工人發現又上當了。¹²

10日中午12點零2分，造反派們在黃渡車站和安亭車站之間的地方，攔截了從上海開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¹³ 這次他們

反總司令部《一月風暴》編輯部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9 謝鵬飛在筆者採訪他時，告訴說，這是他親眼所見並親身參加的。

10 董興茂《控訴上海市委鎮壓工人運動的滔天罪行——安亭事件真相》，載於1966年12月28日《工人造反報》。

11 潘國平1980年1月6日。

12 傳單《評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首都齊衛東」、上海市二女中紅衛兵「驅虎豹」戰鬥隊、上海市海關學校紅衛兵「代代紅」，1966年11月18日初稿，12月11日修改，新北大紅色造反聯軍新北大紅衛兵革命委員會印，1966年12月於上海。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3 這個時間引自傳單《非常大的安亭事件》。

沒有再站在軌道上。剛才參加攔車的謝鵬飛和周國庭都是鐵路職工，覺得這樣太危險。周國庭建議用紅布包住信號燈。於是派人在車站前一公里處，用大旗包住信號燈，迫使14次列車停了下來。據安亭三個工廠的職工當時寫的傳單描繪：

在「總部」一小撮人策劃下，他們用一面大紅旗遮住鐵路上的信號燈。14次特快車快到安亭時，他們又用兩面紅旗在鐵路上揮舞，幾十個人擁到鐵路中間，幾個人臥在鐵軌中，就這樣把14次列車攔了下來，使整個鐵路線阻塞……

安亭車站的電話，全被他們控制，使車站工作人員無法行使職務，只好臨時安裝了一個，才勉強解決了業務聯繫的問題。可煤球廠和煤棧的電話又全被他們佔住。¹⁴

又據當時上海鐵路局的一份傳單說：

開始是去北京的648次通過安亭站被攔，後來又把去北京的乘有外賓的14次特快列車攔了下來。整個滬—寧鐵路就此開始中斷。

在這14次特快列車被攔期間，在整個滬—寧鐵路開始中斷以後，在場的許多工人和革命師生向他們進行了多次勸告和耐心說服。他們全然不理。他們中有一個小眼睛，滿臉疙瘩，矮個子，穿一套黃衣服，自稱轉業軍人，手持一面大紅旗，坐在14次機車前頭的鋼軌上，聲嘶力竭地說：「攔住14次，是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給我的任務，不管對不對，我的任務就是攔車」。¹⁵

14 傳單《我們是安亭事件現場真相的見證者》，安亭裝卸社、安亭煤球廠、安亭煤建批發站革命職工，1966年11月15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但後來許多在場的當事者都回憶說，第一次是站在鐵軌上攔車的，但沒有「臥軌」；第二次是將信號燈用紅旗蒙住，使火車停下的。

15 傳單《非常大的安亭事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這張傳單的起草者之一，是上海鐵路分局黨委秘書陳阿春。他當時曾前往安亭勸說造反派回滬，在現場親眼看見兩面大旗交叉插在鐵軌上，四五個人坐在軌道上。¹⁶ 文革後，有人說安亭事件不是「臥軌攔車」，而是站在軌道邊或坐在軌道上。其實，不管「臥軌」、「坐軌」、還是「站軌」，都是迫使火車停下的攔截火車事件。

造反隊員們找到列車長，要他同意將602次列車的車廂掛在14次列車後面。列車長不同意，他請示鐵路局，鐵路局回答：不能開這個先例。

據記載，從11月10日中午12點零2分始，「14次列車停了21小時，直到11日上午8點23分才開出。但開出沒多遠，到昆山又被另一夥人攔住，直到11月11日下午4點54分，才又從昆山開出。」¹⁷ 整個滬寧線這才開始回復通車。雖然在昆山攔車的不是上海工總司的造反派，但當時的傳單和後來的資料，大都把昆山被攔時間也算上，將整個安亭事件引發的滬寧全線停車時間，算作31小時34分。¹⁸

16 筆者 2005 年 11 月 20 日對文革前的上海鐵路分局黨委秘書陳阿春的訪談。

17 這個停車時間引自傳單《非常大的安亭事件》。

18 當年的造反派的《工人造反報》、紅衛兵傳單，保守派的傳單，都是用的這個數據。不過，據參加攔車的謝鵬飛文革後對筆者的回憶，他們沒有將 14 次列車攔截那麼長的時間。下午 5、6 點鐘，他們又攔下 22 次列車，攔過夜，第二天早晨放行的是 22 次列車。黃金海和葉昌明也都對筆者說，他們認為 14 次列車沒有被攔下那麼長時間，因為他們去安亭時，沒有看到停着的火車。謝鵬飛認為，鐵路中斷 20 多小時，是由於他們先後攔截了好幾輛車造成的。但是，據傳單《非常大的安亭事件》中，說第二天早上 8 點 23 分放行放行的車是 14 次。陳阿春文革後告訴筆者，鐵路停車時間根據，是當時上海鐵路分局調度室當時的調度記錄。此外，上海鐵路二七戰鬥隊 1966 年 11 月 10 日晚上 9 點 30 分的傳單《十萬火急的呼籲！！！！》中寫道：「另一夥人，在安亭站臥軌，將乘有外賓的 14 次特快列車攔阻在黃渡至安亭兩個車站中間，從上午 8 時 52 分到現在不讓通過。造成整個南京到上海的這條鐵路線，到現在已經中斷了 12 小時。」筆者認為，這是事發當時的傳單，又是鐵路局的，應該是準確的。從這張傳單看，至少 14 次列車被攔截到當日晚上 9 點，而不是 22 次車被攔。黃

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¹⁹ 安亭雖是個小站，卻是滬寧鐵路要道，南來北往必經之地。安亭被塞，引起連鎖反應，一系列南來北往列車被迫停開，排隊靠在沿線各站：

安亭東面被迫停下來的有12趟，上海站36趟應該開的列車不能出發；安亭西面一直到蚌埠，在長達五百多公里的鐵路線上，往上海來的近百趟客貨列車都被迫停在沿線各站。²⁰

安亭攔截火車事件究竟是誰組織的？國棉三十一廠工人錢杏根說是他一人幹的：「當時我一心想到北京去，看見一部從上海去北京的14次列車，我就手搖紅旗，左右猛搖，使這列火車停了下來，直到第二天上午6時才開車。這次停車、開車都是我一人作主的，沒有人佈置我。事後我也沒有向任何人匯報過這次停車事件。」²¹ 王洪文則說自己當時主張攔車，他在1967年4月工總司委員整風會議上說：

攔火車是我主張的，當時舊市委對我們壓力太大，第二次攔火車是我做了工作的，怕攔了時間長對國家造成損失。²²

金海和葉昌明等沒有在安亭看見被攔截的火車，是因為火車不是在安亭被攔，而是被攔在黃渡和安亭之間。再者，14次列車如果不是被攔了很長時間，不會如此震驚中央。

19 在此之前，已經發生過多次攔截火車事件。據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91頁載：1966年10月6日，上海、江蘇、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市二百三十六個學校的一千八百六十餘名學生，乘坐往北京方向的652次臨時客車，在江蘇鎮江附近的高資站，停車避讓14次特快列車時，652次列車上的一些學生下車坐在鐵軌中心，攔截14次列車。經勸說14次列車被攔二小時十七分後，方重新開出，造成二十趟列車相繼晚點。相比之下，安亭事件影響更大，造成的全線停車時間更長。

20 傳單《非常大的安亭事件》。

21 原上海國棉31廠工人錢杏根1980年12月20日的證詞。

22 工總司1967年整風會議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文革中，市委寫作組成員蕭木曾問王洪文：你們在安亭事件中攔截列車，我是老鐵路了，知道那可是要犯殺頭大罪的呀！當時你哪來那麼大膽子？

王洪文脫口回答了一句：「那是被逼的呀！」停了一會又說：「你想嘛，到了那一步，什麼老婆兒子、身家性命，全都顧不上了，只想到一點：工總司如果不被承認，那麼多工人都成了反革命，那我真是罪該萬死啦！」²³

不過，文革結束後，王洪文在被審訊時卻說自己當時沒有攔過火車，也勸別人不要攔車，但沒有用，勸不住：「我雖然不主張他們攔截火車，也做了工作，但是主要責任還是我，因為我是頭。」²⁴

潘國平在文革後談到安亭事件時，說自己當時不贊成攔車。11月10日早上，

我因從9日中午至今沒吃過東西，就和幾個人一起去買東西充飢，回來時聽說，有一部分人把一列火車攔下了，我覺得這樣做法不妥當，工總司剛成立，這樣攔火車會遭到群眾反對，對攔火車的人要做點工作，這樣我就來到現場做了一些勸說工作。攔車的計有20多人，經勸說後，他們提出要上北京去，火車上的人也答應帶一些人，這樣十幾個人上了火車，火車就開走了。我回到岔道上的車廂，想找找籌備時熟悉的人商量一下怎麼辦，但沒找到人，我因太疲勞了，找了個位置睡着了。

23 這是蕭木文革後對筆者回憶的。

24 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轉引自王年一著《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載於《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4期。

他還說：「下午一二點鐘，又有人來叫我，講又有一些人攔下了一列到北京的火車，我趕到現場又勸說了一陣，因列車上把門窗關緊，不讓人上去，攔車人又不聽勸說，我就回來了。」²⁵ 潘國平所說下午攔的車，應該就是14次列車。

留在上海的造反派紛紛去安亭。黃金海第二天去巨鹿路工總司總部，說自己打算去安亭，守在那裏的范佐棟就讓他帶去兩捆剛印刷出來的工總司成立宣言。黃金海自己掏錢叫了輛出租車，和另外兩個工人趕去安亭。葉昌明第二天早上騎了輛自行車趕去北站，人群已散，只看到徐美英等人還在北站，說他們要步行去安亭，葉昌明便說，我回去動員人來支援你們。他回到總部，與紅鷗等三個女紅衛兵在靜安寺攔了輛宣傳車趕去安亭。到了安亭，只見到處都是一堆堆坐在鐵軌或路邊的人群，但找不到王洪文。戴立清也是第二天趕去安亭的。陳阿大11月10日下午送食品醬菜等去安亭，他後來回憶說，當他看到造反派攔截的火車停在鐵軌上，「我心裏害怕了，沒有與王洪文等聯繫，悄悄又回上海。」²⁶

各路紅衛兵也紛紛趕往安亭，11月12日成立了「聲援臨時指揮小組」。其中，復旦大學東方紅公社、華東紡織工學院炮司，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的紅衛兵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央討論安亭事件

14次列車被攔截在安亭，鐵路運輸中斷。上海市委即刻便得到消息，馬上報中央，中央立即召開會議討論。據王力回

25 潘國平 1979 年 5 月 30 日。

26 陳阿大 1978 年 12 月 5 日供詞，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憶，會議由周周恩來主持，參加者有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陶鑄；康生、陳伯達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也都參加。王力認為這次會議實際是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而不是由中央文革小組處理這個事件。會上一致意見：不承認跨行業職工組織，不認為攔截火車、中斷交通的行為是對的。會議決定給上海發兩份電報：一份發給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一份發給滯留在安亭的工人造反派們。兩份電報都由陳伯達起草。發給韓哲一的電報，起草時張春橋也參加，電報內容與上海市委的意見基本一致，張春橋沒有表示異議。²⁷

中央直接發電報給韓哲一，而不是給華東局或上海市委，有着細心的考慮。柯慶施去世後，由誰接替華東局主事未定，暫時以過渡辦法，讓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作為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韓哲一繼續分管華東地區的工業和交通工作。按說，處理安亭事件，應當是上海市委職權範圍內之事。但陳丕顯住院，曹荻秋被造反派視作主要目標，無法正常工作；而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有心臟病，連中央點名要他參加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也未能履職。所以中央認為由華東局分管工交的韓哲一出面處理比較合適。²⁸ 給韓哲一的電報先發出，內容如下：

據鐵道部報告，上海有幾千工人要乘火車來北京，現在安亭停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研究了這個情況，請你立即往見工人同志，同他們好好商量，希望他們回滬，堅守生產崗位，有問題可以就地解決。²⁹

中央要主管工業及交通等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共

27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 653 頁。

28 《原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追述——我所親歷的安亭事件》，載於上海市檔案館主辦《檔案春秋》2005 年第 1 期，姜龍飛執筆。

29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154 頁。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提出意見。李提出派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代表身份去安亭解決事態，任務是恢復通車，鐵路不能中斷。周恩來和陶鑄都同意。陳伯達文革後也說，是周恩來、陶鑄派張春橋去處理事件的。

張帶着陳伯達給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信去上海。行前王力問張是否要帶助手，張說「我不要」，「我上海有班子」。³⁰ 與此同時，陶鑄打電話給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告訴說中央已派張春橋往上海解決問題，並再次強調不同意成立全國、全市性組織。用張春橋後來的話說：「陶鑄給的方針，就是把工人趕回上海，對他們的組織，不支持，不承認。」³¹

韓哲一接到中央給他的電報後，於11月10日傍晚立刻與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趕往安亭車站，同去的還有上海工業政治部副主任夏明芳，以及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楊愷等人。他們趕到安亭，只見周圍到處是露宿的工人，但不知道該找誰談判。經過一番交涉，工總司方面派出6名代表，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來到地處安亭的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二樓辦公室，這是韓哲一他們落腳的臨時談判處。後來知道，他就是潘國平。整個談判過程中王洪文始終沒有露面，主要是潘國平擔任工總司的全權代表。

市委方面有8人。李干成的態度比較強硬。韓哲一向工人們傳達了中央的電報和陶鑄的電話精神，要求他們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產。³² 韓哲一答應工總司可派少數代表到北京去，但前提必須是鐵路暢通。

30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

31 張春橋1967年4月14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2 《原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追述》。工人和市委談判代表人數，以及李干成的態度，是葉昌明提供的他文革中的工作筆記11月12日上記錄的。葉昌明筆記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談判進行到深夜，沒有任何進展。韓哲一表示：我們無權超越權限作任何肯定的答覆，若要滿足工總司的要求，必須請示中央，我們必須返回上海和中央聯繫。潘國平等因談判無果不肯放韓哲一等離開，但安亭又沒有連接中央的直線電話。潘國平最後只好讓步。11日凌晨，韓哲一等返回上海，立即撥通陳伯達的電話，表示無法做通造反派的工作，華東局也無法承擔京滬線癱瘓的重大責任。擱下聽筒，韓哲一又給陶鑄撥電話，然而連續撥了兩個多小時也沒撥通。天亮後才知道，這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中央領導們天不亮都去了天安門城樓。於是，電話由中南海轉到天安門，這才找到陶鑄。陶鑄告之：中央已經以陳伯達名義起草電報，直發安亭，勸工人造反派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產；中央已派張春橋親赴上海，處理安亭事件。³³

11日上午10點左右，韓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等在安亭車站與工人們見面。³⁴ 韓哲一答應工人們可以派少數代表去北京，這是李富春副總理的意思。據當時的一份傳單說：

11月11日上午11點20分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在安亭車站接見了去北京控告的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工人。……

記者和韓哲一同車回來的路上，韓談到最近中央負責同志都在開會，李富春副總理打電話給我，表示可以讓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工人來北京向毛主席匯報情況。韓哲一還

33 《原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追述》。

34 韓哲一11月10日晚上在安亭與造反派工人談判，當時的所有傳單都不見記載；但11月11日上午10時左右在安亭接見工人，當時的許多大事記都有記載。估計第一次因為在半夜，大多數人不知道，而潘國平之所以肯放韓哲一回上海，應該是韓哲一當時答應請示中央後還會回安亭。不過，在上文所引的韓哲一的那篇回憶中，說自己與潘國平談判是即去車站與工人見面。筆者估計這個記憶有誤，韓哲一應該是11日凌晨回上海請示中央後，第二次再去安亭車站與工人見面的。

說到如果車擠的話，我們還要安排車皮，讓工人平安到達北京，我回去後馬上要秘書解決。³⁵

韓哲一站在塔吊上向工人們講話。他保證馬上調車皮讓選出的代表去北京。在場的造反隊員們當即選出北上代表。³⁶ 一些代表要求韓哲一在他們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韓哲一寫上「敬祝北上成功」，簽了名。³⁷

但車皮最終沒有調來。因為中央不同意。³⁸ 造反派們以為很快會有火車來送代表們去北京，卻等來了陳伯達的加急電報。

陳伯達電報

韓哲一11日凌晨向中央匯報後，陳伯達即根據周恩來指示，覆電韓哲一：不能承認攔截火車是革命行動，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同意這些人去北京。同時，陳伯達又給在安亭的造反派發了一份電報。中午12時電報到達上海市委，由兩個穿着棉大衣的市委工作人員送到安亭。此時天色已黑，徐美英打着手電，潘國平墊着牆壁簽收了電報。電報態度很鮮明，不支持造反派臥軌攔車。全文如下：

35 傳單《特急新聞》，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團」《從來急》記者1966年11月11日12時半於交大，上海工總司第三大隊隊員羊毛衫廠工人常天麟、洪善申1966年11月15日午12時翻印。而實際上，根據張春橋1966年11月16日的一次講話，這個決定是谷牧說的。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36 《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之一》，載於1967年5月19日《工人造反報》。

37 傳單《安亭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周振良、宿國良、史海林三人整理，1966年11月14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38 「中央不同意」，是張春橋1966年11月16日在蘇州鐵路中學接見工總司部分工人時，講話中提到的，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工人同志們：

十日夜，我們聽說你們有幾千人要求來北京，在安亭同鐵路管理局爭執不下。我們打了一個電報給華東局韓哲一同志，請他勸你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以免影響本單位的生產任務和京滬鐵路的運輸。剛聽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同志已經回去，這樣做是很好的，很對，很對。但是，據說，有些工人同志，還是留在車站，不願回去。我們認為，工人鬧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須緊緊牢記毛主席、黨中央再三強調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堅持生產崗位，把生產搞好，完成國家計劃。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這是大道理。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全世界的一切人們都在注視我們，注視我們的活動，注視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動態。工人同志是為我們祖國爭光的先鋒隊，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搞好生產這個大道理。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搞革命，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麼，你們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搞不好。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你們有多少道理，有這樣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工人同志們！我們的行動，時時刻刻都要顧全整個工人階級的大局。

我們絕對不能因為一部分的利益，因為有些人一時意氣用事，而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損害我們偉大祖國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損害，也是不好的。

事實上，你們這次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即回上海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

這是我們再三再三考慮才發出的電報。我們熱烈希望你們接受我們的意見。向你們致無產階級的最高敬禮

1966年11月11日12時陳伯達

潘國平去找王洪文。之前他一直找不到王洪文，直到陳伯達電報來後，才聽說王與國棉十七廠的造反隊員都在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車的車廂內。而據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文革中寫的大事記解釋，到安亭後，王洪文身體不好，一直在車廂睡覺。肚子餓了，就到附近農村向農民要點東西吃，直到後來廠裏送來食物和棉大衣。

王洪文不相信電報真是陳伯達寫的，說：「不可能！這份電報是假的！」潘國平問王洪文怎麼辦？王洪文也拿不出主意。³⁹ 潘國平急得哭了，⁴⁰ 王洪文也急得快掉眼淚，事後他說「我的眼淚都要流下來，當時真想寫一張大字報給陳伯達。」⁴¹ 王洪文與潘國平去找包炮。包炮此時躺在車站後面一間小屋裏。他摔了一跤，膝蓋磕破了，工人用拖拉機將他送到安亭一家醫院，傷口縫了十針，剛回車站。包炮認為這份電報口氣像陳伯達寫的，不會假。王洪文問包怎麼辦，包說：「電報上沒有承認我們是革命行動，我們不能回去！」⁴² 潘國平和包炮都覺得，不能反對陳伯達，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也不能回去，回去了誰知道市委會怎樣處置我們？

潘國平出了個主意，說「現在是不管真假，我們都說市委送來的電報是假的」⁴³ 而據國棉十七廠文革中寫的大事記說：

39 潘國平 1980 年 1 月 6 日。

40 岑麒麟 1979 年 9 月 1 日。

41 王洪文在工總司委員整風會議上的發言，《工總司委員整風會議記錄》，1967 年 4 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2 包炮 1980 年 11 月 12 日證詞。

43 轉引自亞衣著《訪原「上海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載於美國《北京之春》1996 年 9 月 40 期。

王洪文「手捏着這份電報，當機立斷毅然說：『向同志們宣佈，這份電報是假的！』」⁴⁴ 潘國平找來各工廠造反派的負責人，宣佈說：「我們收到一個電報，說是陳伯達寫的，要我們回去，我們不能回去。現在我們的處境，回去和不回去，結果都將一樣！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⁴⁵ 就這樣，電報下午6時送到潘國平手裏，王洪文和潘國平等一直沒有向在場的工人們宣讀。直到晚上9點，因為有些工人已經知道中央有電報來，要求廣播，這才不得不廣播。⁴⁶

張春橋赴安亭

11月11日晚上10點左右，張春橋乘坐的軍用專機在上海虹橋機場降落。到上海後，張春橋給陳伯達打了第一個電話：「是先到上海市委去，還是先到群眾中去？」陳伯達答覆：「先到群眾中去，趕快制止群眾到北京來。很快把問題解決了。」⁴⁷ 韓哲一、李干成以及楊愷等市領導早已在機場等候多時；曹荻秋照例也應該去的，但當時他為了躲避造反派，東藏西躲，韓哲一等人沒有找到他。韓哲一後來回憶，張春橋和他們在機場休息室談了一個多小時，主要是通報安亭情況。張春橋當時也持和他們一樣的觀點，即不承認工總司，也不支持他們的行動，必須說服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抓革命，抓生產。⁴⁸ 當時在場的楊愷文革中也對人說，張春橋「下飛機時還說要頂住」。⁴⁹ 張春橋請奔波了兩天的韓哲一回去休息，並提出要找

44 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 1975 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45 筆者 2007 年對潘國平的電話訪談。

46 傳單《我們是安亭事件現場真相的見證者》。

47 陳伯達 1979 年 11 月 29 日審訊記錄，轉引自王年一著《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載《黨史研究資料》2002 年第 2 期。

48 《原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追述——我所親歷的安亭事件》。

49 轉引自組織組楊心培揭發，載於《魏文伯對抗毛主席指示，攻擊中央文革

幾個熟悉情況的紅衛兵一起去安亭。打電話後，兩個北京紅衛兵趕來。張春橋在楊愷和北京紅衛兵陪同下，直奔安亭。⁵⁰

半夜12點左右，車到安亭，現場亂糟糟，找不到領頭者。張春橋後來對自己妻子文靜形容說，在那裏指手劃腳的都是紅衛兵。等了一會兒，原先來安亭做說服工作的市委幹部找到了潘國平和包炮。談判還是在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舉行，這時已是11月12日零點以後。與張春橋談判的共九名工人，⁵¹包括後來趕到的王洪文。還有拄着拐棍的包炮，以及炮司的周谷聲、江必雄等紅衛兵。⁵²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參加了全程談判，他以後回憶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過程說，兩個陪張來安亭的北京紅衛兵未參加談判。他印象中，談判的主要對手就是潘國平和包炮；其他人，包括王洪文在內，說話都不多。而且王洪文當時給他印象不深，他是後來聽王洪文自己說那天也參加了安亭談判的。

參加談判的共十多個人。張春橋首先說話。在場的謝鵬飛幾十年後還清楚地記得，他開口就狠狠訓斥了造反派們的攔截火車行為：

你們這樣離開生產崗位，攔截火車，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前的規定，光憑你們破壞交通命脈，就夠殺頭了。現在你們給我回上海，叫工人統統

小組，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材料摘編之二》，華東局機關革命造反派專案小組，1967年4月10日。

50 陪張春橋的兩個紅衛兵是誰？有人回憶說是姜濤和許小昆，但筆者2009年採訪許小昆時，他說陪同張春橋去的不是他和姜濤。當時姜濤弄了輛車，要許小昆代表「首都三司」去安亭，許小昆就去了，但他是自己去的，不是和張春橋一起去的。姜濤沒去。筆者採訪包炮時，包炮也說不是自己。

51 參加談判的有9名工人，是甄文君1966年11月12日下午5時10分致周總理的電話的記錄，轉引自王年一著《關於工總司成立的一些資料》。

52 何秀文《關於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況》，1979年12月22日。

回上海，今天商量的是回去不回去的問題，有什麼事，到上海再說。⁵³

王洪文被訓得低下頭，一句話都不敢反駁，潘國平當場哭了，王洪文也掉眼淚。⁵⁴ 只有紅衛兵對張春橋的斥責不買賬。包炮說：「春橋同志，你是堅定的左派，在北京，你是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堅決支持我們首都紅衛兵，你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怎麼到了上海就完全變樣了？就來壓制上海的工人運動了？」包炮還說，這些工人不是自己來安亭的，是上海市委把他們乘的火車停在安亭的，他們攔車是被逼出來的。但張春橋不為包炮的話所動，堅持要王洪文和潘國平答應將工人們帶回上海。

事實上，在張春橋到安亭前，火車已經通了。張春橋和工人造反派談判是在12日凌晨，而此前在韓哲一等的勸說下，11日上午8點造反派已經放行了14次列車。所以，談判的焦點不是放行列車恢復交通，而是回上海。張要工人們全部先回上海，其他問題回上海再談。而潘國平堅持要張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否則不回去。潘國平後來回憶，當時與張春橋的談判就是兩點，第一，要張承認我們這個組織；第二，要他與群眾見面。⁵⁵ 潘國平情緒激動，幾次講得控制不住，哭了起來，邊哭邊講。潘國平說，中央得到的關於安亭停車的報告，是被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歪曲了的片面情況。我們受上海市委資反路線迫害，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報告真實情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先同意我們乘車去，但車到安亭就不開了，騙了我們。陳伯達的電報也是一味指責我們，抽象地講什麼大道理、小

53 這是謝鵬飛對筆者的回憶。謝鵬飛的記性極好，非常準確，許多回憶，與當年的傳單等文字記錄基本吻合。順便說一句，記性準確的還有王腓利和王知常。

54 同上。

55 轉引自亞衣《訪原「上海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

道理，被上海市委利用，大量印刷，到處廣播，對我們壓力很大。張春橋表示：中央得到的鐵路不通的情況，首先是鐵路系統報告的，不是上海市委。我今天一下飛機就到安亭來了，也沒有和上海市委聯繫過，所以沒有什麼偏聽偏信。張春橋堅持要求工人們先回上海，什麼事都到上海再談。整個談判主要就是包炮與潘國平對張春橋的較量，潘國平等還幾次走出會場商量對策。王洪文很少說話。⁵⁶

在談判現場，還有一個目擊者：中央文革小組駐滬聯絡員甄文君，一個五十多歲的軍隊師級幹部。⁵⁷ 1966年11月12日下午5時10分，他向周恩來總理匯報的電話記錄說：「張春橋同志昨晚9點多抵滬，即赴安亭車站，跟九工人代表談判，談判中間有波折。九人中有三個同志同意說服工人回上海，六個不同意。一直談到天亮，未達成協議，他們堅持要步行去京。」⁵⁸ 從甄文君匯報中可看出安亭事件的處理過程，是直接向周恩來匯報的，周恩來始終在關注着事態的進展，儘管他沒有直接出面。甄文君還匯報了工人的幾種態度：

對伯達同志的信(按即電報)有意見，說只講生產，不講革命，他們不同意。有些人談起來情緒激昂，進行控訴。

現在看，有少數人是堅決主張到北京的，他們起領導作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上海聯絡站支持他們。

第二種是多數人。他們提了五個條件，如答應他們，

56 何秀文《關於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況》。

57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從軍隊抽調一批幹部，作為中央文革特派記者，派往各省了解動態，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內部簡報《快報》提供消息來源，要求他們「只帶眼睛，不帶嘴巴」。他們的對外身份是《解放軍報》記者，只有各大軍區司令員才知道他們的真正身份。但駐滬特派記者甄文君的身份卻沒有對上海市委保密，顯示這時的中央文革小組並沒有認為上海市委有多大問題。甄文君1966年11月3日到上海。10日和韓哲一一起去機場迎接張春橋，張春橋與工人造反派談判時，甄最初也一直在場。

58 轉引自王年一著《關於工總司成立的一些資料》。

他們就回上海：1.承認工人造反司令部，發給袖章；2.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3.此次事件的責任在市委；4.曹荻秋要做檢討，承認錯誤；5.後天要開控訴大會。

第三種人，也是少數，主張應聽中央的話，回上海去。但他們不佔領導地位。據有些工人私下談，他們有顧慮：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個單位，除一個單位來的人很多，有300多人外，都是零星的來一些人，其中有些還是受過批評的，擔心回去後被圍攻、挨整。

.....

擠在安亭的工人，生活問題市委已注意，不會出問題。鐵路交通，昨天已恢復，工人的那一列車，停在叉道上。張春橋同志還在安亭。⁵⁹

談判中王洪文表示可以回去勸說自己廠的工人回滬。⁶⁰ 王洪文後來在工總司整風會議上，解釋過自己那時為什麼答應回上海：

春橋來之前我主張北上，張春橋來了後，我就想回來，我相信他是中央派來的，毛主席派來的，應該相信他能解決問題。

春橋來了後當時我思想是堅決要回上海。⁶¹

筆者估計甄文君匯報的那三個同意說服工人回上海的人中，有一人應該就是王洪文。張春橋妻子文靜後來回憶說，張春橋安亭談判後回家對她說，安亭事件中王洪文幫了他大忙：「當時工人談判首席代表是潘國平」，「小潘一會兒同意回上海，一會兒又變卦」，而王洪文則是密切配合，「給了張春橋一個很好的印象」。⁶² 王洪文造反性格中的另一面，在安亭事

59 轉引自王年一著《關於工總司成立的一些資料》。

60 何秀文《關於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況》。

61 工總司 1967 年 4 月整風會議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62 文靜 1979 年 8 月：《從安亭事件到「4.12 炮打」，看「四人幫」的滔天罪行》。

件中最初顯現。談判進行得很艱難，時間拖得很長，包炮先行離去。潘國平堅持要張春橋去現場聽聽工人的聲音，張不肯去。正在此時，有人進來報告，說在外面等候談判結果的一部分工人，已經等得不耐煩，正集合隊伍打算步行去北京。張春橋聽到這個情況，立即結束談判，讓人去將他們追回來。張春橋說：「既然你們說不通，那我就直接去和大家說！」⁶³ 潘國平馬上從談判所在的工廠找了輛大卡車，裝上高音喇叭，開到停着列車的煤棧。此時已經是11月12日上午8點不到。

準備步行北上的，是謝鵬飛等一行人。他們剛走出煤棧，就見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兩邊裝着兩個喇叭，迎面開來，在他們前面停下。張春橋、王洪文、潘國平等都在卡車上。潘國平在喇叭中喊道：請大家回到煤棧，中央首長張春橋要和大家講話。眾人於是跟在卡車後面，回到煤棧。⁶⁴ 張春橋和潘國平站在後面的車廂上，正好露出頭部。天上下着雨，工人淋在雨裏，王洪文在張春橋身後替他打傘，張春橋不要，穿着棉軍大衣和工人一樣淋在雨裏。張春橋和大家見面的這第一個舉動，一下博得了工人們的好感。

張春橋讓王洪文和潘國平動員大家回上海。潘國平剛講完讓大家回去的話，大家就轟起來，說你們這是背叛造反派。張春橋於是講話。他的第一句話就鎮住所有人：「工人同志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前來看望你們！」下面群情激動，「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久久不息。⁶⁵ 接着，張春橋從陳伯達的「大道理、小道理」說起，講到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目的，講到工人階級在文革中的使命，整整講了近一個小時，最後又回到要大家回上海的主題上。

張春橋的講話剛停，拄着拐杖的包炮第一個發言，他重

63 何秀文《關於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況》。

64 這是謝鵬飛對筆者的回憶。

65 同上。

覆了剛才與張春橋談判的那些話。接着，炮司紅衛兵江碧雄跳上車頭，指責張春橋不支持工人。謝鵬飛緊接着江碧雄發言。他站在汽車的保險槓上，與張春橋面對面，他說：大家不要忘了，張春橋本來也是上海的書記，是當權派。謝鵬飛將自己和廠裏的那些工人因貼大字報被廠黨支部毆打關押之事，向張春橋控訴了一遍。⁶⁶ 之後的發言秩序越來越亂，大家搶話筒，爭着發言。潘國平讓大家遞條子，一個一個發言，不要亂七八糟搶着說話。接着，有人控訴，有人起哄，有人爬上卡車與張春橋辯論，現場秩序很亂，卡車車頭的外殼被踏出癰凹。王洪文想幫張春橋說服眾人，但被一些爬上卡車的人轟下去；潘國平動員大家回上海，也被起哄叫他「靠邊站」。⁶⁷ 有人懷疑陳伯達電報的真實性。張春橋從衣袋裏拿出陳伯達電報原稿，念了一遍又高舉起揚了揚，說：這就是陳伯達同志的電報稿，這就是中央文革的聲音，就是黨中央的聲音，就是毛主席的聲音！全場再一次被張春橋的話鎮住，鴉雀無聲。⁶⁸ 張春橋一直堅持來滬之前中央交待的口徑，沒有承認攔截火車是革命行動，也沒有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這一天張春橋說的話與陳伯達的電報精神相同，就是勸說大家回上海，沒有作任何承諾。張春橋自己後來也說：「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態，我一直沒有表示。」⁶⁹

工人向張春橋的控訴，從12日上午8點持續到下午3點多。潘國平要求張春橋對大家講話。此時，張春橋的語氣有所改變：承認上海市委執行了資反路線，大家的行動是革命行動。

66 這是謝鵬飛對筆者的回憶。

67 以上現場情況主要引自何秀文《關於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況》，以及謝鵬飛對筆者的回憶。

68 這是謝鵬飛對筆者的回憶。

69 張春橋 1966 年 11 月 16 日在蘇州鐵路中學接見工總司部分工人時的講話。

這些情況可以由他負責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報告。⁷⁰顯然，在聽了那麼多工人的控訴後，張春橋的態度開始轉變。他表示，聽了大家的控訴很有觸動，原來對一些情況不很了解。你們的行動是上海市委逼出來的，看來，上海市委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⁷¹不過，張春橋此時還是沒有明確地表示支持安亭事件，也沒有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只是說人先到上海，有事到上海再談。⁷²張春橋講話後，王洪文、潘國平表示：「要聽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並呼籲大家都盡快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產。⁷³

對整個安亭談判，張春橋後來回憶：

我下了飛機就趕到火車站找工人代表談話。夜裏12點到的，談到天亮，毫無結果。我勸他們回上海，我們一塊到上海去談。不行，達不成協議。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這些代表沒法談了，要他們把我的意見給群眾談談，他們說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眾見面給群眾談。在車站廣場上開萬人大會，從天亮一直開到下午4點，才把他們說服了。

就這樣連着開了十六個小時的會，中間也沒吃飯，也沒喝水。工人那個罵起來可是兇呀，他們有好多人，我只有一個人，來的工人我一個人也不認得，在場的究竟張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時我就是聽哪。因為我出發以前，以陳伯達同志的名義發了個電報給他們，勸他們回上海，說我到上海去給他們談話。他們就在那個萬人大會上罵，說陳伯達這個電報是個大毒草，是修正主義，說我要

70 何秀文《關於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況》。

71 黃金海文革後對筆者的回憶。

72 潘國平 1979 年 5 月 30 日在《我在「文革初期」的情況》。

73 張寶林 1980 年 7 月 8 日。

把他們騙回上海，是個大陰謀，說我是和華東局、上海市委勾結好的，要騙他們回去。

總而言之，整整在那裏攻了我十六小時就是了。我講話頂多一個多鐘頭，那就是攻了我十五個小時。你要惱火，那一下子就鬧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麼人，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腦子裏也確實考慮過。有時也覺得不對頭，怎麼罵起陳伯達來那麼兇，指着我的鼻子罵，我們又都是第一次見面，我是好心好意來的，而且我確實是中央派來的，為什麼那樣攻我。

但是那一次我還是沉着，因為處理這樣的問題，還有一點經驗。⁷⁴

整整13個小時，大家沒有吃中飯，張春橋也和工人一樣沒有吃飯。經過13小時的艱苦談判，張春橋眼看再拖下去不會有結果，就要身邊的王洪文宣佈最後決定。王洪文拿起話筒宣佈：工總司決定，全部人員回上海解決問題。張春橋接着說：

工人同志們，你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回廠抓革命促生產，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派我來上海，是來解決問題的，我一定要把安亭的事情處理好，解決不好，我決不回北京！⁷⁵

這是張春橋的最後一句話。說完張春橋便離開了。張春橋以後回憶說：「我也沒有發火，沒有抓他們的人，也沒有過多的責備他們。聽了他們的意見，感覺他們講的有道理，承認了他們有些講的是有道理的，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決。這樣到

74 張春橋 1967 年 5 月 5 日在濟南軍區機關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5 這是謝鵬飛對筆者的回憶。

了4點鐘才回去了。」⁷⁶ 中午，國棉十七廠派出的車子來到安亭，王洪文帶頭乘上車，帶着廠裏四百多名工人首先離開了安亭。潘國平隨火車回上海。下午4點，張春橋離開安亭。許多人看看不會再有什麼結果，也都陸續坐上返滬的火車，或者市委派來接他們的十幾輛公交大客車。11月12日下午6時，最後一批滯留在安亭的造反派被大客車拉回上海。

文化廣場談判

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當天，11月12日下午，中共上海市委專門發了一個《通知》，要求各工廠領導幹部做好工作。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通知》

本市有些工廠的部分職工集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後一部分人要求去北京，列車到達安亭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到安亭，說服他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他們已經同意回來。市委要求你們在他們回廠的時候：

(1)對他們聽黨的話，回廠同廣大職工一道抓革命促生產的行動，表示歡迎。

(2)對他們的行動不要指責，不要同他們辯論，不要扣帽子。

(3)他們這次離廠期間的工資可以照發。下不為例。

中共上海市委11月12日

顯然，上海市委對這個文件是經過斟酌的，既不超越自

76 張春橋 1967 年 5 月 5 日在濟南軍區機關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己的底線，不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不承認攔截火車是「革命行動」；又不激化矛盾，保證對參與者「不扣帽子」，而且還「工資照發」。

中央派張春橋到上海，任務是恢復鐵路運輸，說服工人回滬。現在鐵路已經通暢，造反派也大部分返回上海，張春橋的使命應該完成了。但是，安亭事件並沒結束。11月13日清晨，徐景賢，接到北京齊衛東許小昆的電話，說有一部分從安亭回來的工人，集中在文化廣場不肯回廠，要市委對他們去安亭的一系列問題給予明確說法。許小昆說他們沒法找到張春橋，請徐景賢無論如何設法轉告張春橋。

這部分工人是黃金海帶領的。黃金海在安亭時就對張春橋說，回去可以，但我們不能回廠，否則會被廠裏打成反革命。我們集中在文化廣場，等你為我們解決問題後再回廠。張春橋答應了。所以黃金海帶着隊伍從安亭回上海後，直接全部拉到文化廣場，表示：「問題根本沒解決，我們不能走！」1949年以後的中國，有過多少次「既往不咎」的承諾，但基本都沒兌現。工人們覺得張春橋口說無憑，希望得到更明確的保證。黃金海派出的人找到許小昆，讓許小昆通過徐景賢告訴張春橋，他們上千名工人造反派正等在文化廣場，等着張春橋接見。徐景賢當即往張春橋家打電話。文革開始後徐景賢和張春橋沒有過任何聯繫和接觸。正是許小昆的這個要他找張春橋的電話，使他與張春橋重又聯繫上。

張春橋剛起床。他在安亭談判十幾個小時，在卡車上接見時淋了一天雨，回到上海又在風雨操場接見同濟東方紅的紅衛兵，又是四五個小時淋雨，因此感冒發燒。但聽徐景賢說了情況後，他還是答應去文化廣場見這些工人；他要徐景賢先去找工總司負責人聯絡會面之事。徐景賢又去找潘國平。找到正在巨鹿路辦公處睡覺的潘國平時，已經是中午，他們約定下午在文化廣場與張春橋見面。

曹荻秋得悉張春橋下午將去文化廣場與工總司代表進一步談判，立即決定中午召開市委書記處緊急會議，討論談判方針，張春橋參加。到會的市委書記們都認為不能承認全市性跨行業的組織工總司，更不能承認工總司阻攔鐵路交通是革命行動，說這個口子如果一開，上海的局面將更難收拾。曹荻秋當即給陶鑄打電話請示，通話後，不掛斷電話，讓陶鑄再直接對張春橋說。陶鑄將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的意見，又對張春橋重複一遍。張春橋沒有表示不同意見。⁷⁷

上海市委的書記們不承認造反派攔截火車是革命行動，不但依照過去的一貫準則，而且有幾天前剛收到的中央10月30日和31日的兩個文件為依據，前文已經提及。市委不願承認工總司還有緣由：上海市委已經以歷次運動慣性做法，對王洪文等工總司負責人的個人背景作了調查，認為工總司是烏合之眾組成，造反派們都是些與共產黨離心離德的落後分子，光憑這一條，也不能承認工總司。

1966年11月13日，天氣很冷，文化廣場來來往往人群不斷，都是戴着工作帽、穿着藍色工作服或藍色棉工作大衣的工人們。⁷⁸ 黃金海從一早起就佈置糾察，守住文化廣場的所有八個大門，只留8號門進出。他還派人到處找王洪文和潘國平，但直到張春橋來了都還未找到。下午2時半左右，張春橋帶着秘書趕到文化廣場8號門，徐景賢已在那兒等候。黃金海安排張春橋、徐景賢和何秀文三人，先在後台第一間的小休息室休息一下。此時交大等幾個學校的幾個紅衛兵也擠進來，他們指責張春橋把工人從安亭騙回來，是鎮壓工人運動。黃金海覺得「張

77 陳丕顯著《陳丕顯回憶錄》。

78 據在現場的中學生胡曉嵐的回憶，她當時感到場景很像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裏的斯莫爾尼宮，她還說她後來在椅子上睡着了，醒來後談判已經結束，身上不知被誰蓋上了一件深藍色的工作棉襖。紅鷗也回憶說當時的情景像斯莫爾尼宮。

春橋畢竟是中央文革派來的，而且連警衛員都沒有帶就主動來了，這樣罵不像話」，讓糾察將他們統統趕出房間。下午3時左右，潘國平和紅衛兵等十幾人陸續來到。炮司周谷聲、邱勵歐也趕來參加了談判。王洪文沒趕到，他從安亭回上海到了文化廣場後，隨即便將自己工廠的工人全部動員回廠回家。

北京紅衛兵和交大反到底的紅衛兵首先發言，指責張春橋不該把去安亭的工人動員回上海，說應該支持工人北上告狀，還說陳伯達電報打擊了造反派。紅衛兵說了許久後，張春橋講話。他說陳伯達的電報是聽了上海市委片面報告後寫的，他自己也是在安亭聽了工人控訴後，才了解了真實情況，覺得上海市委是有責任的，工人們到安亭去是迫不得已的， he 自己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一邊的。他回北京後一定會將這些情況轉告陳伯達，相信陳伯達會同意他的看法。⁷⁹ 張春橋講話時，越來越多的人湧進談判的休息室，休息室擁擠不堪，而此時，接到通知的王洪文帶着廖祖康趕到。潘國平提議換個大點的房間，黃金海於是將他們安排在後台西面一間大點的化妝室談判，自己仍然守在外面。⁸⁰

眾人都去了大房間，只剩張春橋還在休息室。據留在休息室的北京紅衛兵許小昆後來對人說，他當時看到張春橋坐立不安，到另一間房間不斷地打電話，每次回來，都很焦躁。從張春橋的臉色看，不是電話沒打通，便是沒得到什麼指示。後來，張春橋乾脆不打電話了。他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屋子裏來回走着，從這個牆角踱到另一個牆角，從另一個牆角踱到這個牆角，來來回回地走着對角線。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進行着一場

79 徐景賢 1978 年 10 月 2 日。

80 王洪文和廖祖康參加談判是徐美英 1989 年 5 月 2 日對筆者的回憶，不過參加這次談判的潘國平和徐景賢都說王洪文沒有參加，王洪文自己以後也從不提此事，當時留下的照片，張春橋正在簽字，兩旁只見徐景賢和潘國平，沒有王洪文。

激烈的鬥爭。終於，他像下了決心似地走出房間，來到西邊的那間房間。⁸¹

西面的房間裏有一張長桌子，三十多人圍着桌子，張春橋在桌子盡頭坐下，徐景賢坐在他身後。潘國平說：「我們相信中央文革，相信陳伯達和張春橋同志，但是不相信上海市委，我們回廠後肯定有些人要被打成反革命，有些人要受到圍攻、被扣發工資。」潘國平提出希望簽署一份書面的東西。張春橋對潘國平的要求當即表示同意。⁸² 潘國平見張春橋如此爽快，倒有點意外。⁸³ 他連忙和紅衛兵們商議，將事先由炮司紅衛兵、上海師院學生江碧雄起草的要求，作了些許修改，除了將攔截火車說成是革命行動、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群眾組織外，又加上要上海市委和華東局對安亭事件造成的全部後果負完全責任，以及要曹荻秋作檢討兩項，然後重抄了一遍，遞給張春橋。⁸⁴ 張春橋仔細看了一遍，說：「其他幾條都可以，就是關於『這次到安亭去是被迫的革命行動』這一條，我建議後面加上一句，『今後遇到類似的情況，可以派少數代表上北京』你們看如何？」張春橋拿起那張紙，又反複看了幾遍。按在場的許小昆的觀察，他「還是有些猶豫地，口氣有保留地在上面簽了字。」⁸⁵ 簽字後，應潘國平和黃金海要求，張春橋到前台，

81 這是許小昆的同學、當時同是北京紅衛兵「齊衛東」的忻鼎亮 1990 年時告訴筆者的，他說是許小昆在文化廣場談判後親口告訴他的。但後來筆者在 2009 年採訪許小昆時，許小昆說他已經不記得有這事了。筆者再問忻鼎亮，忻說他沒有記錯，許肯定對他說過，他當時印象很深。

82 這是參加談判的徐景賢和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都回憶到的。但是徐景賢在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出版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中的回憶又有不同：「張春橋說成立全市性跨行業工人組織將對全國造成影響，勸他們遵守中央的規定，但紅衛兵和工人堅持自己的意見。談判僵持了一個多小時沒有結果」。

83 徐景賢 1978 年 10 月 2 日交待。

84 同上。

85 筆者 1992 年 5 月對原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北京紅衛兵組織「齊衛東」的許小昆的朋友忻鼎亮的訪談。

向等在那裏約二千名工人造反隊員們，宣讀了他所簽字的「五條」，台下一片鼓掌和歡呼。

這個五條馬上被印發成傳單，全文如下：

特急喜訊

張春橋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工人同志提出的五點要求。我們熱烈歡呼：

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勝利，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堅持鬥爭的結果。

(1)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2)承認十一月九日大會以及被迫上北京控訴是革命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先派少數代表)。

(3)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

(4)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

(5)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同意張春橋(簽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上海工人造反派總司令部印發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⁸⁶

張春橋在掌聲和歡呼聲中講話，

同志們：

大家在這裏守了很久，剛才在這裏跟你們總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問題，現在說明一下。

86 工總司辦公室 1967 年 7 月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文獻匯集》。

頭一個問題，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不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的組織？我認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二、11月9日的大會後有人到北京去控告，這是一個什麼性質？我說這是個革命的行動，在這個問題上我要講一點意見，以後再在這種問題上碰到這個問題無論是工人和農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為集體去會影響生產。

三、現在這個事情造成的後果，你們代表提出這責任應由上海市委和華東局負責，我也同意這個意見，我聲明市委昨天已發出通知，你們回去後不應受到打擊和責難，工資照發，如果刁難你們，就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知道市委有這個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證，你們回去不被圍攻，我覺得凡是搞革命的人就不怕，採取這個態度問題就好解決了。

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開向群眾檢查，這個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關心我的安全問題，我到這裏來沒有懷疑，我不當你們是壞人，如果你們都是壞人，我就不會一個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問題，我希望有事講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檢查不行，還可以來第二次。

五、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提供方便，這一條我同意，我想提一點意見，就是咱們工人要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要像那些組織，汽車、錄音機、照相機我們盡可能少用一些，繼續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大會後，我還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廠遇到什麼問題，你們如何解決革命和生產的關係，曹荻秋同志檢查時間和下次會議的準備。我希望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好，成為全國的模範，上海有二百萬工人，是有光榮傳統的，一向最熱愛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上

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國的前面，如同在工業上一樣。⁸⁷

張春橋講話後，又應黃金海要求，與造反派們在主席台的後台照相留念。包炮生病沒參加談判，待包炮趕到文化廣場，張春橋已經在和工人們一起照相了。張春橋還為造反隊員在《毛主席語錄》上題詞「11月9日上海市工人敢於革命造反北上革命的行動」，「上海工人革命總司令部好得很」。

張春橋在工總司的五項要求上簽字，對工總司的存在起了決定性作用，工總司的造反派們非常感激張春橋。王洪文後來說：

張春橋到底是中央文革副組長，很有水平魄力，很大膽，敢於支持承認我們工總司，給我們簽訂五條，如果沒有張春橋支持，我們肯定垮台了，老實說就沒有我們今天。我們不能忘記張春橋冒着危險支持我們。⁸⁸

那張有張春橋簽字的紙條，王洪文隨即作為憑據，讓徐美英去長江刻字社刻了工總司的圖章。以後，又作為「文化大革命文物」被收藏，還曾經在1967年的「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展覽會上展出過。

毛澤東支持張春橋

張春橋在文化廣場簽字後，馬上回家給陳伯達掛電話，匯報文化廣場談判結果。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當時正在陳伯達

87 張春橋 1966 年 11 月 13 日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團代表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8 陳阿大 1978 年 12 月 5 日供詞，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那裏，張春橋給陳伯達的電話，他也聽到。他回憶電話裏張春橋說：

我不能不簽字，工總司《五項要求》我不能不簽字，也來不及請示華東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組，不然火車就不能通，他們不肯回上海。張春橋還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害怕群眾。早和群眾見面，早到群眾中去，就沒有這些事情了！⁸⁹

張春橋電話剛掛，陳丕顯電話也跟着到了。上海市委的書記們得知張春橋簽字後十分吃驚，認為張不與上海市委商量就簽字，置上海市委於被動。曹荻秋和魏文伯立即趕往陳丕顯住處，三人商量後，馬上由陳丕顯打電話給陳伯達。陳丕顯向陳伯達提出一連串質問：「身為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有沒有權力，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同工人組織簽字，達成協議，反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張春橋違背國家法律以及黨中央的指示和政策，擅自簽約，他眼裏還有沒有國家法律以及黨中央的指示和政策？」⁹⁰ 曹荻秋則打電話給陶鑄，質問「張春橋個人有什麼權力違反中央精神，改變市委決定？有什麼資格要我們作公開檢查？」當日下午5點半，陶鑄給曹荻秋回電：

工廠文化革命情況還沒有完全掌握，要進一步研究。工人不搞全市性的組織，聯絡性質的組織可以，但不建立機構；搞文化革命不能影響生產，生產時間以外，可以交流經驗。……

春橋已同意，那要做工作。要市委多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市委要多做另一方面的工作。……

89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654頁。

90 同上。

工廠怎麼搞法，中央要開會，你們要準備材料。⁹¹

聽得出，陶鑄對張春橋簽字有保留，他希望中央對此事再作研究。所有反對者反對的真正核心是工總司的成立。擔心這個體制外不受共產黨控制的在職職工組織必將產生的示範效應。上海市委根據陶鑄電話，當日向各單位發了一個口頭通知，重申不能建立全市性工人組織：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他們自己搞起來的。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按照結社自由的原則，就同意了。

關於組織問題，中央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這一類性質的組織。區以下，在不影響生產、不影響工作前提下，在業餘時間，可以建立交流經驗的聯絡性組織，但不設機構。

已經建立了造反司令部這一類性質的組織，要按照中央這一精神，加以改變。

關於這個問題，中央將有通知下達。⁹²

上海市委在這個口頭通知中，仍然堅持不允許成立全市性職工組織。他們顯然明白自己與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鑄始終堅持的這個底線，正是文革要突破的障礙。他們已經一退再退，這是他們最後的防線。據王力回憶，陳伯達接到陳丕顯電話後很為難，因為張春橋已經簽字了，而且陳伯達知道張春橋在毛澤東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放下陳丕顯的電話，就與王力一起去到釣魚台11樓找到江青，問江青怎麼辦。江青態度鮮明，認為

91 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電話記錄，1966年11月14日下午五點半。

92 轉引自《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1968年10月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陳丕顯不對，怎麼能這樣對待張春橋?!她說：「我看上海市委就是要整！」江青還說：「我馬上報告主席，連夜報告，不能讓陶鑄先報告。」⁹³

11月14日下午，毛澤東在釣魚台14樓召開常委擴大會，參加者有陶鑄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會議一開始，不待任何人發言，毛澤東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毛澤東從來不把憲法當回事，1957年曾寫信給周恩來等指示取消學校憲法課程，⁹⁴但當需要反駁不同意見時，他也會想起憲法。上一回是對着劉少奇，在1964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這次是第二回。毛澤東念了一段關於公民結社權利和集會自由的條文，說：「工人有沒有結社自由？憲法你們看不看？」毛澤東接着講認識論，說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政策，張春橋是對的，根據事實改變了過去的政策。過去的政策脫離群眾。⁹⁵毛澤東說可以先斬後奏。毛澤東一言九鼎，事情沒有了任何回旋餘地。其他常委都不敢再發表不同意見，只能檢討，陶鑄也只好檢討。會後，王力馬上打電話將毛澤東的裁決告訴張春橋，張接到電話後馬上告訴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說毛主席支持他的簽字。⁹⁶

幾年後，毛澤東與王洪文有一次長談，提到安亭事件。王洪文文革後回憶這個談話：

1970年9月毛主席在上海，主席和我談話，這是時間最長的一次。從我在工廠貼第一張大字報問起，到工總司的成立，安亭事件等，主席對我說：市委很蠢，不承認工總司，承認「赤衛隊」；中央承認你們工總司，不承認「赤

93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655頁。

94 毛澤東1957年3月17日《關於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給周恩來等的信中指示「恢復中學方面的政治課，取消憲(治)法課」。

95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655頁。

96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654、955頁。

衛隊」(筆者注——安亭事件時赤衛隊尚未成立，毛這裏記憶有差錯)，停車的事變成了好事。我問主席「先斬後奏，先有事實，後有概念」是不是主席說的，主席說是。⁹⁷

毛澤東表了態，陶鑄還是不願鬆口。14日當天，他給上海市委的電話通知重申工人不能成立全國、全市性組織：

「上海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是他們自己搞起來的，昨天(13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張春橋同志在回答他們問題的時候，按照結社自由的原則曾表示同意。

關於組織問題，中央的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國性的、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這一類性質的組織。區以下，在不影響生產，不影響工作前提下，在業餘時間，可以建立交流經驗的聯絡性組織，但不設機構。

關於這個問題，中央將有通知下達。

1966年11月14日⁹⁸

張春橋為什麼簽字

張春橋從北京出發時，對如何處理安亭事件的意見，從所有史料看，似乎和陶鑄一致，沒有分歧，為什麼後來會有那麼大轉變？在回上海處理安亭事件之前，張春橋一直不願意介入上海文革運動。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上海市委幾次向處於決策中心的張春橋求助，他都不置可否。派張春橋去安亭，是中央突然的臨時決定。王力回憶錄中說張春橋對此沒有

97 王洪文 1980 年 6 月 16 日審訊筆錄(王洪文 1980 年 6 月 26 日在上面簽字)，中央檔案館收藏。這個筆錄是王年一 1990 年 3 月 20 日親自抄寫寄給筆者的。

98 轉引自葉昌明提供的他文革中的工作筆記 1966 年 11 月 15 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思想準備；王力而且說，據他了解，張春橋不想去上海，「他願意在中央文革，因為他自己也是當權派，沒有一個當權派有好日子過，他不如將中央文革作為他的避風港，他可以超脫，說說風涼話，做些指示。」王力認為張春橋是沒頂住群眾包圍的壓力：「張春橋開始不是那麼理直氣壯的，他是被迫簽字的。不簽字工人還要鬧，他就簽了。」⁹⁹

但張簽字不是在安亭，而是在文化廣場。本來，張春橋經過艱苦說服，終於使絕大部分滯留在安亭的造反派回了上海，鐵路也已通車，中央交給他的任務已經完成，這時壓力應該不大了。誰都沒有料到，張春橋會簽字同意造反派的要求。而且張春橋在文化廣場談判時很快答應工人的要求，似乎他到文化廣場來前就下了決心。¹⁰⁰但張春橋後來說，他下這個決心「用了24個小時」。¹⁰¹張春橋以後一再說，他是在安亭聽了工人的控訴後，轉而同情工人的。他說：

從這個談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廠裏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來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們為了造市委的反，就組織了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開成立大會請市委參加，市委不參加，開完了大會，要求市委接見一下他們的主席團也不接見。實在無可奈何了，才上火車到北京告狀。而上火車之後，又把他們甩在這個小車站上，已經三天三夜了，市委一個人都不來。工人越來越憤怒。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按着陶鑄那個方針做，工人根本不會回上海。要趕回去就要鎮壓。這一批人，已經被打

99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657頁。

100 這是筆者2007年3月14日對潘國平電話訪談時，潘國平說他當時有這樣的感覺。

101 張春橋1966年11月16日在蘇州鐵路中學接見工總司部分工人時的講話。

成「反革命」，再加上這次「破壞了交通」，實行白色恐怖，實行鎮壓，不是理由很「充足」嗎？是工人群眾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導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關頭沒有犯大錯誤。我答應認真負責地解決他們的問題，才說服了他們回上海。¹⁰²

張春橋在安亭終於將工人勸回上海，卻沒有想到，這批造反派只是挪了個地方，從安亭轉移到上海文化廣場，不得到對他們組織合法的承認以及對他們攔截火車行為的肯定決不罷休。張春橋自己也說，他是在文化廣場談判時才明確表達對安亭事件的看法的：

13日回到上海，同他們的代表繼續談。把情況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現象，是結果，工人起來鬧革命才是本質，才是根源。決定承認他們的組織是革命的組織，合法的組織；只是勸他們，火車中斷是不好的，以後不要採取這種手段，沒有過多的責備他們。¹⁰³

在另一個講話中，張春橋說：

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在文化廣場等我，我本來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了解情況。結果沒有來得及，趕到文化廣場，到了文化廣場和那裏的同志交換了意見，繼續了解情況。到最後在那裏達成了五點協議，同志們可以了解，從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態，我一直沒有表示，這是不是革命行動？是不是革命群眾組織？到文化廣場我明確地表示我的

102 張春橋 1967 年 4 月 14 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3 同上。

意見，這對我應該是一個進步吧。對這個問題認識比在安亭大進了一步。我也看到問題關鍵在什麼地方，本質在什麼地方，這次我可以下判斷了。這樣就是說用了二十四小時，我這個決心下得還很不慢吧。而且我組織手續並不完備，沒有和華東局同志商量，也沒有和市委同志商量。¹⁰⁴

張春橋的簽字，是個影響全局的重大行動。按共產黨的辦事規則，這樣的行動一定要得到上級有關部門批准，不能擅自決定。張春橋對此說過，當時這樣做他自己也覺得沒有把握。他還曾對王洪文等人說：對安亭事件如何處理，「中央是有爭論的。陶鑄是反對的。陶鑄叫我來，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對此沒有決定，我是提着顆榔頭(即「腦袋」——筆者注)簽字的，我想過，可能弄不好坐班房。」同樣的話，他對妻子文靜也說過多次：「處理這件事要麼立一大功，要麼犯一大罪。但想不到主席以後肯定了。」¹⁰⁵

張春橋為什麼敢於反常規？他簽字前，有沒有找誰商量過？有些研究材料認為張得到江青的支持。因為在王力的回憶錄中說，張臨去上海前，找了江青。¹⁰⁶此外，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文革後的交代說，張春橋簽字，江青的支持是關鍵。戚本禹說，11月12日張春橋從安亭回來後，「迫不及待地首先掛電話和江青取得了聯繫，張對江青說陳伯達的電報行不通，表示他要承認工總司，和工總司一起造反，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核心的上海市委，得到了江青的肯定和同意。」¹⁰⁷張春橋簽字前向江青匯報，符合他的政治性格。深知

104 張春橋 1966 年 11 月 16 日在蘇州鐵路中學接見工總司部分工人時的講話。

105 《上海文革史話》第 174 頁。

106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 956 頁。

107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173-174 頁。不過，戚本禹的這個說法是文革剛結束他被審查時的交代。幾十年後，2008 年，筆者託朱永嘉再向他求證細節，他又說張春

張春橋的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文革後說過，如果沒有一點把握就貿然違抗中央意見，這不像張春橋一貫的行事方式。可是，王力所說張春橋臨行前找過江青，江青說了些什麼，張春橋後來從未提及。似乎江青沒有和他說什麼關鍵性的話。王力在回憶錄中又認為，張春橋在整個事件中沒有與江青聯繫過：「張春橋去之前還請示過什麼人我不知道。據我所知，張去後中央文革小組沒接到任何報告。陳伯達、江青都沒接到報告，張自己就處理了。」「張春橋沒與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也沒有請示北京就擅自答應了。」¹⁰⁸ 而且，張春橋因簽字遭到上海市委書記們的反對和圍攻時，從未將江青作為擋箭牌，以後提到安亭事件的所有講話中，也從未提及江青；倒是提及過毛澤東的表態「主席已經表態你們還這樣。」¹⁰⁹ 而喜歡自我表功的江青，也從未提及自己在安亭事件中的作用。此外，在一個講話中，張春橋說他當時從安亭回上海後沒來得及向陳伯達匯報，因為已經夜深，而且也找不到陳伯達：

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認為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是完全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對你們的組織，你們的行動作出了判斷完全正確的，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都參加了會議，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

橋沒有得到江青的支持。筆者在2010年的一次聚會上又親自問戚本禹，回答仍是否定的。但是，安亭事件的親歷者紅鷗2013年所著由香港時代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迷茫——十年浩劫》中說：張春橋12日晚上和江青通電話：他告訴江青安亭事件是上海工人登上文革舞台的標誌，他要支持工人造反派。江青同意他的看法，說主席很關心安亭事件，她要將這些新情況向主席匯報。

108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653、954頁。

109 王洪文1967年1月6日在「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上的發言《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載於1967年1月7日《上海工人造反報》：據朱永嘉告訴筆者，王洪文這個發言的資料來源，是之前市委常委會的會議記錄。

正確的，這樣，我在這個過程裏，包括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和陳伯達同志在最後就這個問題認識是有個過程的。¹¹⁰

這裏張春橋也只說他簽字後得到江青等的支持，沒有說簽字前得到江青支持，張春橋不會敢於抹去江青的功勞。在另一個講話中，張春橋則說自己簽字前沒有來得及和中央文革小組通電話：

我組織手續並不完備，沒有和華東局同志商量，也沒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沒有和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因為來不及就下了決心。……

從文化廣場回到我的住處，才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¹¹¹

顯然，張春橋是冒着違反共產黨組織紀律原則，自行決定簽字的。毛支持紅衛兵運動，周恩來、陶鑄等中央官員們不得不對紅衛兵咄咄逼人的要求一再讓步。允許紅衛兵這個體制外的組織迅速發展，就是最大的讓步。深知張春橋的徐景賢，以後對此評論說：

張春橋敢於簽字不能說是什麼投機，更主要的是他善於省時度勢，順勢而為。在安亭事件中，張春橋做出了毛澤東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事：在最大範圍內把群眾發動起來，更廣泛地動員群眾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證這場運動的勝利。¹¹²

文革開始以來，對許多事情的處理已經不按慣常規則，違

110 張春橋 1966 年 11 月 16 日在蘇州鐵路中學接見工總司部分工人時的講話。

111 同上。

112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反共產黨的一貫原則，張春橋不是第一個。而且，張春橋完全了解毛澤東希望將文革推進到工廠的迫切心理，他在簽字前，肯定想到毛澤東之前多次說過光是學生不行工廠也要開展文革之類的話。毛澤東這些話，陶鑄沒有聽懂或不願聽懂，張春橋完全聽懂了。這應該是張春橋敢於冒險的底氣，他走出這試探的一步，正是實現毛澤東在工廠開展文革的打算。

蘇州談判

11月13日的文化廣場簽字後，工人造反派們陸續回廠。但安亭事件仍沒有完全結束，還有兩批人，一批在蘇州，一批在南京，尚未返滬。

11月12日下午張春橋離開安亭時，大多數工人被勸說回滬，還有許多工人堅持北上。領頭的是謝鵬飛以及同廠的周國庭和陸雲龍。他們覺得自己曾經被華東局的幹部去廠裏宣佈為反革命，就這樣回廠，肯定還會被算賬。所以他們堅持要去北京告狀。上海第五鋼鐵廠的孫玉喜舉着一面大旗，大聲喊道：「誰要繼續北上，跟着我們走！」就這樣，一千多人，分成三個大隊。耿金章、上海第九無線電廠的周寶林和國棉三十一廠的程琳，分別任三個大隊的大隊長。耿金章參加步行北上，據他自己後來說，是隨大流，想去北京看看。¹¹³ 當晚他們步行到昆山境內的小鎮天福庵。休息一夜後，第二天繼續步行。但此時，新新機器廠的工人們接到廠裏的電話，要他們立即回廠，說這是中央軍委的決定，因為新新機器廠是國防工業廠。帶隊的黨員季方井不得不帶着廠裏的三百多工人離去。整個隊伍於是還剩六百多人。¹¹⁴

天上下着濛濛細雨，13日隊伍下午到達昆山。由「尖刀

113 耿金章 1979 年 3 月 6 日陳述筆錄。

114 這個數字是葉昌明文革中的工作筆記 1966 年 11 月 16 日記載。

班」打前站，聯繫了昆山中學，眾人在昆山中學休整了一夜。11月14日下午，王洪文趕到昆山，告訴說張春橋已經簽字，勸說大家回上海。是張春橋要王洪文去勸說的。耿金章說王洪文「動搖軍心」，讓尖刀班將他關在音樂教室，王洪文只得逃出了上海。¹¹⁵

此時，北上大隊下面在悄悄議論，說帶隊的謝鵬飛等三個鐵路系統的工人是反革命。因為在安亭時，謝鵬飛向張春橋控訴說華東局和市委將他們打成反革命，在場的人都聽到。中午眾人在昆山中學召開全體會議，問他們三人傳說是否屬實。大家認為，既然他們的反革命是華東局和市委定的，那一定是真的反革命；不像別人，都只是大字報上的指摘。大家商議另推領導。有人高呼：「有沒有共產黨員，站出來！」隊伍中的上海紙漿廠工人推舉耿金章，說他是共產黨員，復員軍人、民兵連長。另外還推舉出兩個共產黨員：建築工程研究所的陸家賓和寶山縣一家工廠的工人俞阿香。就這樣，耿金章成為這支隊伍的領頭。¹¹⁶

重選領導人後，隊伍繼續步行北上。晚上10點，到達蘇州，人員分幾處住下，耿金章等負責人住在一家浴室。耿金章覺得人員居住太分散，讓人去蘇州市委要求馬上安排住宿，蘇州市委將他們安排在蘇州鐵路中學。11月15日早晨，分散居住的人員被找齊，一路高呼口號，集中到鐵路中學。正當他們討論下一步如何行動時，蘇州市委派人來通知他們，說中央領導同志晚上在市委招待所接見，要他們派兩個代表去。耿金章等人推測「中央領導同志」可能就是張春橋，肯定是來勸說他們回滬的。他們於是比照文化廣場《五項要求》，由上海無線電九廠的工人周寶林起草，擬定了又一個「五項要求」，推耿金章和周寶林為談判代表。¹¹⁷

115 這是謝鵬飛告訴筆者的。

116 耿金章 1979 年 3 月 6 日陳述筆錄。

117 同上。

往蘇州勸說工人回上海的正是張春橋，還有曹荻秋和韓哲一。他們抵達蘇州後，聯絡員匯報說，這批工人準備提出又一個五項要求。曹荻秋與張春橋於是在蘇州南園賓館會客室討論如何應對，要不要簽字同意又一個「五條」，兩人激烈爭論了整整兩個小時。曹荻秋後來說自己抱着不簽字的決心來蘇州；他說：「我是準備他們把我押到北京去的。」曹荻秋認為來蘇州就是動員工人回上海，不是在又一個要求上簽字，況且上海市委沒有授權於自己。張春橋說，既然來蘇州，就是來談判，來談判就是要簽字。張春橋並逼問：那你對第一個五條是什麼態度？曹雖然此時已經從張春橋處知道毛澤東支持第一個五條，仍然回答：「我組織服從，思想不通。」會客室裏頓時寂靜無聲，氣氛緊張。張春橋說：「你不簽，我簽」，「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簽字！」¹¹⁸ 韓哲一打圓場：「還是問問家裏的意見。」他和曹分別打電話給陳丕顯和魏文伯。不久，魏文伯回電轉達市委意見：「既然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簽字，我們就不必再堅持不同意見了。」

15日上午，耿金章與周寶林到蘇州市委招待所。前來參加談判的，除了張春橋、曹荻秋和韓哲一，還有炮司和交大反到底的紅衛兵，以及蘇州市委的人員。耿和周提出事先擬定的五條。這時參加談判的人員中，有人要耿金章靠邊站，並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張春橋說「你們究竟誰是代表誰是頭？一會兒一個人出面提出一些條件，一會兒又一個人出面提出又一些條件，這樣說話不算數，沒法談！」張表示拒絕再談判下去。僵持了一段時間後，還是耿金章作為談判代表。耿仍堅持原來的五條，張春橋聽後說：「這個問題不大，我在上海已經簽定了

118 《鐵骨錚錚，正氣浩然——記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張春橋一夥的鬥爭》，
糜欣祥(曹荻秋當時的秘書)著，載於《文史資料選輯》第53輯，中國人民
政治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月出版。

個五條，無非是雙五條吧。」他當即簽字。曹荻秋和韓哲一也簽字，這時已經是中午。¹¹⁹簽字後，張、曹、韓都講了話。

蘇州的這個五條和上海文化廣場的五條以後被合稱「雙五條」。全文如下：

五項要求(1966年11月15日，蘇州)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控告隊向張春橋同志，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提出一下五項要求：

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一個革命組織，自十一月九日以來，特別是到北京去控訴上海市委貫徹執行的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行動是革命的，並立即領發蓋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公章的袖章。

二、絕對保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每個人員的政治。人身安全，經濟保障。

三、要曹荻秋檢查，親自把我們領回上海，並用公共大轎車送回家去。

四、要開動除廣播台、報紙以外的其他宣傳機器對前階段謠言進行辟謠，不許再出現惡劣攻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謠言，否則，概列非法之行。

五、對這次上北京控訴上海市委貫徹執行的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一切後果完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

張春橋韓哲一曹荻秋(簽字)

當時在場的黃金海對這個五條很不理解，問張春橋為什麼有了文化廣場五條，還要再簽這個五條，而且這第二個五條以工總

119 何秀文 1979 年 12 月 22 日《關於張春橋去蘇州簽訂「雙五條」的一些情況》。張寶林的回憶，簽字也是在中午。但耿金章的回憶說簽字在下午 6 時。筆者認為何秀文的回憶更可靠。因為耿金章的其他回憶，有弄混了時間或事件的錯誤，而何秀文的其他回憶一般都很準確。

司名義提出，但耿金章卻不是工總司總部的人。張春橋回答說：反正內容差不多，現在重要的是先把大家動員回上海。¹²⁰

從蘇州返滬的工人共有480人左右，¹²¹於11月18日乘大客車返回上海。耿金章提出，臨回上海的那天早晨，要每人發兩付大餅油條。市委滿足了他的要求。¹²²

北上告狀的工人全部回滬

安亭事件中最後返滬的是11月10日凌晨，先於王洪文他們登上626次列車的那批工人。這趟車當天中午12時50分被停靠在南京，帶隊的是戴祖祥。在南京，戴祖祥也要求「共產黨員、復員軍人站出來」。於是選舉了負責人，戴祖祥是負責人之一；幾個共產黨員還成立了臨時黨支部。¹²³

南京市委接待了他們，為他們安排食宿，給他們送去二千斤餅乾，勸他們回滬。一部分人回去了，還有一部分人堅持北上。他們第二天早上乘船擺渡到長江對岸，又步行到浦口。安亭的造反派攔車的後果此時已經顯現，京滬線堵塞，他們被困在浦口。天氣很冷，有11人病倒送往醫院。王秀珍也在這批堅持北上的人群中。她那天參加了工總司成立大會後，和廠裏的一些同去的職工跟着人群湧到延安西路33號的市委辦公大樓，又跟着人群湧到友誼電影院，最後跟着人群湧到北站，乘上了626次車。據文革中的一篇文章描寫：她當時幾天幾夜沒有東西吃，病倒了，體溫高到40多度(原文如此一筆者)，她想到南京有幾個親戚，希望親戚們能幫助他們北上，但是親戚們卻都不支

120 這是黃金海告訴筆者的。

121 這個人數是耿金章1967年3月5日的陳述筆錄中說到的。

122 客車和油條之事，是筆者2011年3月7日對紅鷗的採訪；謝鵬飛對筆者也說起過這個細節。1967年初工總司批判耿金章的傳單中也提到耿要求派客車之事。

123 筆者、金光耀和金大陸2010年5月15日對戴祖祥訪談。

持她。她向一個親戚借錢買火車票，這個親戚說：「你到哪裏我都給錢，就是到北京不給。你是黨員，你究竟在造誰的反？趕快回去抓革命促生產！」王秀珍的另一個親戚在鐵路工作，也不肯為王秀珍買火車票，還勸她：「陳丕顯、曹荻秋都是老革命了，你們想把他們拉下馬？你們自己不做反革命也就差不多了。」¹²⁴

11月12日凌晨，南京市委安排這批滯留在浦口的上海工人住進南京農機分院。他們等了三天，始終沒能乘上火車。11月15日凌晨，大家眼看等車無望，決定步行北上。當天隊伍步行至江蘇省的六合縣，晚上住在六合中學。第二天，一行人舉着徐美英縫製的工總司第一面大旗繼續步行北上。戴祖祥在大旗上加了一行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第一路軍」，用黑色毛筆寫在一方白布條上，縫在旗子上，並派了6個人輪流舉大旗。¹²⁵

隊伍從六合出發半小時後，一輛吉普車追上了他們，穿着棉軍大衣的潘國平跳下車，一起的還有戴祖祥工作的上鋼三廠的車間黨支部書記，以及紅衛兵。潘國平等人是受張春橋和上海市委之託來勸說他們回上海的。隊伍於是回到六合中學，開了個會，由臨時黨支部的書記主持會議。潘國平告訴大家，張春橋已經簽字同意工總司要求，大家的目的達到，應該返滬。¹²⁶ 戴祖祥見潘國平穿着簇新的軍大衣——這是潘國平剛向人要來的——說潘國平被當權派收買了，將潘關在六合中學的廁所裏。戴祖祥說「要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電報才回去！」。

124 《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堅強戰士——記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王秀珍同志》，載於《1968年上海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大會發言專集》。但據同去南京的戴祖祥2010年5月15日對筆者和金光耀、金大陸的回憶，王秀珍當時一再表示要回滬。

125 這些細節都是筆者、金光耀和金大陸2010年5月15日對戴祖祥訪談時，戴祖祥說的。

126 同上。

潘國平翻牆逃出，遇上也到南京來做說服的王洪文和陳阿大等人。他們於是一起再回去勸說。11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長途電話到南京，要江蘇省文革小組負責人轉告上海的這批人：中央委託張春橋赴上海解決問題，滯留安亭的工人已經都回上海，張春橋也已經同意工人的要求。戴祖祥終於被說服。11月18日，隊伍離開六合回到南京，11月21日凌晨4時半，這批北上告狀至南京的工人終於返回上海。他們離開上海前後歷時12天。當天上午，在紅都劇場，張春橋接見了他們並講話。曹荻秋、韓哲一等也出席。王洪文見到回來的王秀珍，驚訝而又高興地說：你也在這個隊伍中？

至此，安亭事件中北上的工人造反派們，除少數人外，全部返回上海，安亭事件終於結束。

安亭事件結束了，在事件中所形成的幾個群體都看到了造反的威力。耿金章和戴祖祥等人在短短的幾天中，通過和張春橋的談判或被接見，從普通工人成為群體的中心人物。他們不願輕易放棄自己在安亭事件中形成的政治和人脈資源，決定充分利用這些資源，自拉隊伍，另立山頭，種下了日後上海工人造反派內訌和分裂的根子。

第九章

安亭事件 工人造反派崛起 (下)

市委會議上的分歧

工總司堅持要上海市委將張春橋的簽字，以市委文件形式發到基層。市委雖然對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不滿，但還是在11月20日發出滬委(66)第116號文件：

通知

現將張春橋同志十一月十三日簽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五項要求和張春橋、韓哲一、曹荻秋同志於十一月十五日簽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控告隊》的五項要求印發。市委同意上述要求，各級黨組織、行政組織務必切實執行。

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此件應在各工廠公佈。

這是上海市委在1949年後，第一次以市委文件的形式下發一個群眾組織的要求，顯示上海市委對張春橋簽字雖極度不滿，但又無可奈何的尷尬處境。

張春橋完成使命，要回北京去了。返京前一天，11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張春橋參加會議。討

論中心圍繞着安亭事件，常委們紛紛批評指責張春橋。曹荻秋說：「我思想是不通的。承認這個組織我是可以的，但為什麼要把『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也寫上去？對一部分不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對工人說清楚，你們不能支持這批人。如果你們要這麼做，對你們政治上不利。」市委書記王一平說：「那次簽字(第一個五條)是使得我們一點沒有準備，沒有充分認識可能會帶來什麼問題。要變被動為主動，在這個問題上主動了，在大量問題上又被動了。那天春橋同志一回來，我就感到突然。」上海市委委員、市委工業政治部副主任楊慧潔說：「多數派實際上是聽我們話的，他們對荻秋同志的答覆不滿意，要找春橋同志，說張春橋怕死，出賣了工人階級利益。工作隊的話，多數派是聽的，問題是工作隊思想還沒有扭過來。」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主任周璧說，下面的群眾「紛紛責問市委：張春橋、韓哲一、曹荻秋為什麼要簽字？這樣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條？問題提得很尖銳」，說群眾「還要求召開萬人大會，聲討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指兩個五條的簽字)，還要採取革命行動，搗毀造反司令部」，「要找張春橋辯論」。市委組織部長楊士法說：「工廠企業有它的特點，正在搞四清，職工隊伍比較複雜，有地、富、反、壞，肯定會有人翻案的。學生根本不了解情況，如果沒有階級觀點，就上當了。」副市長宋季文說：「我們現在要做最艱苦的準備，亂無非大亂、中亂、小亂，小亂就像眼前這樣，影響百分之十，中亂影響就大些，大亂就影響生活，成為癱瘓狀態。究竟怕不怕？不怕就不怕，讓它亂。」副市長張承宗說：「搞一條、五條，實際上影響了生產。是不是可以這樣搞下去，方針究竟怎麼樣？思想上當然要準備大亂的。」

面對眾常委的指責，張春橋態度很強硬。他說：「不能說造反派工人對黨沒有感情」，「不能因為一個組織中有幾個壞

人，就說它不是革命組織。中國共產黨中間也會有壞人，中央常委中不是還有牛鬼蛇神？」「承認這個組織，不僅是憲法上已有規定的問題，還有個對群眾組織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你去解散他，豈不是成了陳獨秀？」張春橋事後對人說：「當時市委書記處沒有一個人支持我，我那時在市委是孤立的。」¹

對於毛澤東肯定張春橋簽字的那段話，曹荻秋沒有馬上在市委上層幹部中傳達，更不說在基層幹部和群眾中傳達。張春橋在市委常委會議上還質問過曹荻秋為什麼不傳達。對此，曹荻秋又一次表示「想不通」。² 曹荻秋後來說自己「僅告訴了書記處和常委一部分同志」。³ 曹荻秋為什麼不及時將毛澤東的裁決傳達下去？可能一是因為中央過去對毛澤東講話的傳達從來有很嚴格規定，不允許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公開；二可能是因為曹荻秋不贊同毛澤東的支持。曹後來承認自己「總希望有朝一日把它(工總司一筆者注)取消。我把希望寄託在中央工業交通座談會上，力爭將不建立全市性工人組織寫進新的文件。」⁴ 因此，許多上海市委的幹部甚至包括市委工業書記馬天水，都不知道毛的態度。12月初，馬天水去北京參加全國工交企業政治工作座談會，才在北京聽到毛澤東支持張春橋的簽字。而以市委幹部之口告訴群眾毛澤東對張春橋的支持，是在12月12日。楊慧潔那天對一個群眾組織承認，說毛主席的確說過關於安亭

1 以上資料全部引自1967年1月7日《上海工人《工人造反報》》所載王洪文1967年1月6日在《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上的發言《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王洪文的這個發言的資料來源，是當時上海市委常委会的會議記錄。

2 張春橋1966年12月23日接見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及工人代表時的講話。

3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 《曹荻秋的假檢討》，載於《上海黨內頭號走資派陳丕顯、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檢討》，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大會印，1967年7月。

事件的話。⁵那時已經離安亭事件整一個月了。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有那麼多保守派工人反對工總司的原因。他們不知道毛澤東站在造反派一邊。

安亭事件後，市委成立了工人造反派聯絡站，專門負責工人造反派組織的袖章和其他物資的供應。工總司總部於是申請到10輛自行車，一台手搖油印機，還有公交月票、餅乾等。

安亭事件突破中央規定

毛支持張在安亭事件中的簽字，希望籍此作為突破口，發動工人參加文革。這是毛的決心，誰也無法改變和動搖。但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陶鑄，卻沒有領會毛的意圖。毛對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表態支持兩天後，11月16日至12月3日，全國工交企業政治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工業交通的5個部委及上海等7個工業大城市。會議焦點是要不要在工礦企業和農村開展文革。與會者要求在文件中寫明，不能讓學生和工人結合起來造反；現在工廠裏組織已經不少了，有工會、民兵、黨、團，還建立那麼多群眾組織幹啥？大家要求對「不准建立全市性工人聯合造反組織」不要鬆口。上海和東北更主張將已經建立的全市性工人組織取消。整個座談會就是一場大辯論，中央文革派與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幹部各持己見，觀點對立。反對工人建立組織觀點的最大理由，就是這樣下去會亂，會影響生產。

會議原定開5天，結果開了20天。會上討論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起草的關於在工礦企業開展文革的十二條指示(草案)。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都反對這個草案。大家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幾條：1. 對工交系統要有正確的估計，2. 工廠的文化大

5 傳單《號外！毛主席同意張春橋同志的意見和做法》，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隊閘北區司令部，1966年12月12日。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革命不能全面鋪開，3.一定要堅持黨委統一領導，4.工廠中不能建立群眾組織，5.不准許學生到工廠串聯，6.一定要搞好生產。陳伯達起草的十二條被與會者否定後，在陶鑄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組織草擬了《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簡稱十五條)，核心就是工廠不開展文革：結合四清，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聯，堅持八小時生產。

但是，陶鑄的這個十五條被毛否定，要求另寫。於是又由中央文革為主，回過頭去修改十二條，寫成了《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這個草案雖然還是要求工人「抓革命、促生產」，但是允許工人成立組織，允許學生去工廠串聯，也允許工人在本市相互串聯。工交系統分期分批開展文革。⁶這是中共中央正式承認職工在文革中成立自己組織的權利，也是對工總司合法性的追認。

陶鑄就此結怨於毛。因為陶鑄參加了毛支持張春橋簽字的常委擴大會，明知毛的主張，卻態度依舊地反對在工廠開展文革；而且在會上根本不傳達毛澤東11月14日的講話，使得工交政治會議開得偏離毛的意圖，最後還是林彪講話以及周恩來表態才扭轉方向。毛對陶鑄非常不滿。陶鑄試圖阻止文革向工廠蔓延，結果是自己覆滅，不久，陶鑄被打倒。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講了一席針對陶鑄的話：

任何阻擋這場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言論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歷史潮流衝掉。……

我同陶鑄爭論的實質就是這個。⁷

6 關於工交座談會的資料，全部引自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第95頁。

7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696、697頁。

安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安亭事件之前，文革基本在學校進行，文革的主力是大、中學生，儘管鬧得天翻地覆，受影響的除了校園，主要是因大串聯而超負荷運行的鐵路運輸系統，以及因紅衛兵的炮轟而運轉不靈的各省市。安亭事件之後，文革向經濟領域的深層蔓延。張春橋簽字的雙五條，最核心就是兩點：允許離開生產崗位開展文革，允許成立全市性組織。這兩點是周恩來和陶鑄等極力想守住的兩道防線。第一點涉及生產。第二點涉及結社自由。尤其後者，王力回憶說「這本來是中央最反對的」。⁸這是共產黨執政後，在任何時候都牢牢守住的不可觸動的強硬底線。張春橋簽字，兩條底線衝跨，工廠的文革轟轟烈烈地開展，工人造反派很快代替紅衛兵，成為文革的主力軍。這正符合毛澤東的意願。不久後的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他請江青、王力、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到中南海吃晚飯，再一次提到他認為的工人參加文革的意義：

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⁹

按照毛澤東的這段話，文革發展到工人參加，才算真正進入正規和正題。

安亭事件使張春橋與上海市委乃至整個幹部階層徹底決裂。毛澤東和江青對張春橋的堅決支持，在張春橋與上海市委之間劃出鴻溝，從此張春橋只能選擇緊跟毛澤東。張春橋以後在一次閒聊時提到魯迅，說魯迅講自己吃藥、治病，不只是為了愛他的人，也是為了恨他的人。張春橋說他自己也是這樣，

8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954頁。

9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第1462頁。

接着張春橋表示：「自從安亭事件後，我已經別無選擇！」¹⁰
這應該是他真心的表達，也是十年文革中他的真實處境。

市委調查王洪文等人

安亭事件對張春橋和王洪文的政治生涯，都是一個歷史性轉折。張春橋從此更被毛澤東賞識，倍受重視。王洪文也因此成為文革中的工人領袖。為了紀念安亭事件，後來造反派在安亭現場建了一座毛澤東塑像。上海電影廠製片廠在一年後的1967年5月專門去安亭拍紀錄片。王洪文特地帶着參加過安亭事件的工總司總部人員，浩浩蕩蕩開去現場補拍紀念照，讓鐵路局把火車、汽車和貨場的吊車都盡量按原樣開動起來。接着，工總司又舉辦《上海「一月革命」萬歲展覽會》，通過上海市博物館徵集文物，還做模型，雕塑，以非常大的聲勢宣傳。工人造反派們非常珍惜自己的這段造反歷史，這是他們革命的起點。

安亭事件的參加者以後都說自己是冒着生命危險造反的：

以陳、曹(即陳丕顯、曹荻秋—筆者注)為首的舊市委和公安局已經把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的組織者，15名革命工人打成反革命，並作出定案。其中有的判處死刑，有的同志分別被判不同年限的徒刑，並已作出決定，打算將這些同志分配到安徽等地××農場勞改。¹¹

另一篇文章甚至說得更具體：

10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蕭木說張春橋這話是在1975年秋天時說的。那時張春橋身體不太好，常有低燒。一次，他打電話要蕭木去「隨便聊聊」，其間說了這樣一段話。蕭木回憶說，由於語境比較特別，所以他至今印象很深。

11 《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之一》，載於1967年5月19日《工人造反報》。

上海舊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從九日大會起就一直在收集我工總司主要負責人十六位同志的黑材料，並將三名同志判處死刑，三名同志判處無期徒刑，其他根據情節不同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並分配好勞改地點，準備瘋狂鎮壓上海的工人運動。¹²

對於這個空穴來風的說法，葉昌明曾經相信是真的：「我一直以為在市公安局內保存有當時的這些黑材料。」造反派掌權後，葉昌明一再設法尋找，打聽當初是哪個部門派人收集黑材料的，收藏在哪裏，想用來展覽。但始終沒有找到。¹³對此，張春橋曾對妻子文靜說過：「王洪文吹牛說市委要殺他，我看了市委的調查材料，人家根本沒有要殺他，是他吹牛。」¹⁴

判死刑肯定不曾有，因為即使市委想懲治王洪文，王洪文的行為在當時也夠不上殺頭；送去勞改，似乎也不可能。毛澤東對安亭事件的態度市委已經知道，市委應該不會馬上將毛澤東支持的對象送去勞改。但背景調查確實有過。安亭事件結束後，城市社教辦公室負責人、市委委員楊慧潔，組織城市社教辦的十幾個聯絡員，對工總司11月9日成立大會主席團成員、在會上發言的幾個代表、以及在安亭與張春橋談判的一些代表，進行了秘密調查。11月12日，華東局文革辦公室也派人到市委工業政治部去，要了解王洪文等6人材料，因工業政治部無此方面材料，又去城市社教辦了解。¹⁵

這是馬天水佈置的。他當時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工交企業政治工作座談會，會議期間他聽江青說：「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去

12 張寶林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鬥爭概述》，載於《一月風暴》第四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一月風暴》編輯部編，1967年12月。

13 葉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待我的反革命罪行》。

14 文靜1977年5月29日。

15 揭批陳曹大會上市委城市社教辦公室造反派代表的發言，1967年1月6日，載於1967年1月7日《工人造反報》。

談什麼多數、少數……」江青是為處於少數的造反派辯護；而馬天水卻理解成相反的意思，以為江青「對少數、多數的看法有了轉變，對造反派要作階級分析」，便打電話回上海，要楊慧潔對造反派進行調查。¹⁶ 這種調查以及調查後可能遭到的政治清算，正是安亭事件參與者們最擔心的。¹⁷

創建《工人造反報》

自1949年後，隨着出版印刷行業的國有化，到完成公私合營以後，所有的印刷機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下，民間得不到政府的許可根本無法自行印刷任何物件。甚至中文打字機也被控制，購買鍵盤式中文打字機需要單位介紹信，個人不被允許擁有。這是當局對出版自由的控制，不允許任何不受控制的民間出版業和印刷業存在。文革中，伴隨着結社自由的網開一面，出版自由也在一段時間得到兌現。這體現在文革初期各種小報的興盛。¹⁸

16 馬天水在1967年4月4日批判陳丕顯、曹荻秋大會上的發言《我的檢討》；載於1967年4月7日聯合版第4期《大會專刊》，《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聯合編輯。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7 謝鵬飛告訴過筆者，他在1966年1月期間，曾經親眼看見過要逮捕他們的文件的影印件，他看到的貼在上海鐵路分局進門牆上的，一張紙上左右兩個豎排，五排共10個名字。他記得的有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還有他謝鵬飛。不過名字被寫成了「謝朋非」。他當時聽說這是造反派從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王鑑的辦公室抄出的，後面還有王鑑的簽字。

18 文革初期群眾組織的傳單小報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鋼板刻寫油印，以蠟紙墊着特殊鋼板刻寫文字後，手工在細網上滾筒油印。這種印刷方式非常簡便，一學就會，而且所需設備不多，只要一塊半個雜誌大小的刻寫鋼板和一支刻寫筆。缺點是最大只能印16開，印數只有幾百張；因為是手工印刷，速度較慢；而且刻寫者的刻寫水平和字迹好壞，直接影響印刷和閱讀效果。第二種是打字油印，即以鍵盤式中文打字機打在蠟紙上，再以手工滾筒油印，或者以手搖油印機油印。打字機打出來的都是規範印刷體，閱讀效果遠超手工刻寫的手寫體，不過能夠印刷的份數也超不出千份，而且只有經過專門培訓的專業打字員才能會使用複雜的中文打字機；也可請商業的打字謄印社打字印刷，但要付錢。第三種印刷品是鉛印，閱讀效果

上海地區文革中第一份群眾小報，是1966年9月16日出版的上紅總部的4開鉛印《紅衛兵報》；赤衛隊同年12月創刊的《革命戰鬥快報》是上海地區文革中第二份群眾小報。這兩份小報在1966年底都隨着這兩個組織的消亡而停刊。而在這一時期，造反派組織的報紙如雨後春筍迅速發展。最初只是號稱全市性的組織編有小報，不久，就連掛在市級組織之下的二級三級組織也出版小報。一般都是造反組織派人找了市委哪個領導，經簽字同意，發給經費，由解放日報社或文匯報社、新民晚報社鉛字排印。據上海市革會政宣組1967年7月統計：全市共有各類群眾報刊256種，鉛印發行的報紙五十多種，刊物65種。其中由市印刷接待站承印的報紙25種，刊物36種。¹⁹ 其中，炮司1966年9月創刊的《工學運動》是較早的造反派小報。紅革會1966年11月17日創刊的《紅衛戰報》是上海地區紅衛兵小報中影響最大的。

而職工造反派組織最有影響的是工總司的報紙。安亭事件後不久，在與保守派組織的較量中，王洪文提出工總司應該辦一份自己的報紙，在輿論上壓倒反對派。1966年12月解放日報事件發生，整個事件中，工總司都是靠打字油印的傳單宣傳自己的主張。這些傳單有許多是送到盧灣區膳印社打字油印的，當時還欠了膳印社的賬，後來工總司有了經費才償還。王洪文再次提出，工總司光靠寫傳單不行，還應該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12月6日，張春橋和姚文元在北京政協禮堂接見工總司的范佐棟和蔣周法，范佐棟向張春橋匯報工總司打算辦報紙的計劃，張、姚表示支持。張春橋還引用了憲法：「憲法規定有

最好，數量可達幾萬甚至幾十萬份，但這樣的印刷設備只有報社和印刷廠才有。而報社和印刷廠一般都有自己的日常印刷業務，要再排印群眾組織的傳單，需經市委或相關領導簽字批准，因為這不只涉及出版控制，而且涉及紙張供應。

- 19 市革委會政宣組1967年7月7日《關於壓縮小報出版的請示報告》，轉引自金大陸《上海文革運動中的群眾報刊》，《史林》2005年第6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

出版自由，一切工作輿論在先，這些工作我們需要注意。」²⁰ 范佐棟回上海向王洪文匯報後，王洪文即召集工總司總部常委和總部各組負責人開會。會上決定以工總司的名義創辦一份報紙，定名《工人造反報》。1966年12月11日，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大會結束後，王洪文向到會的曹荻秋提出辦報要求，曹荻秋同意，並簽署了「同意辦工人《工人造反報》」紙條，交王洪文；王洪文交給一旁的王腓利，讓他去籌辦。王腓利拿着字條，去找解放日報社總編馬達交涉。王洪文就這樣為工人造反派爭取到辦報權利。²¹

12月12日，市委工業政治部副主任楊慧潔在講話時傳達毛澤東對安亭事件的評價。王腓利打算將毛澤東的話刊登在第一期《工人造反報》上。王洪文和范佐棟都贊成，但又強調消息來源一定要可靠。於是，派蔣周法去北京打聽毛澤東這段話的真實性。蔣周法對北京不熟悉，當時在工總司總部宣傳組協助工作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李衛民²²，毛遂自薦，陪同蔣周法一同去北京。

《工人造反報》的創刊詞，由王腓利根據王洪文的指示起草。王洪文說創刊詞要寫得帶號召性，要寫出辦報宗旨。王腓利寫好後，電報發去北京，由在北京的李衛民修改後，又通過聶元梓轉交《紅旗》雜誌社的林傑修改，最後交張春橋和姚文元審定。修改後的稿子回到上海，內容有了很大變化：文章激烈了許多，增加了許多內容：明確提出《工人造反報》是工總司的機關報；指責中共上海市委「反對毛主席」，這在文革中是很重的罪名；提出「萬炮齊轟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上

20 張、姚的話轉引自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十六：「工人《工人造反報》」清查情況」，上海市總工會清查運動領導小組 1978 年 4 月 14 日。

21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22 李衛民，原名李金鎧，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

海市委」；還加了「攻擊中央文革小組就是炮轟無產階級司令部」等內容。²³ 這個創刊詞刊登在第一期《工人造反報》上。報頭是毛體字。之前，王洪文曾派戴祖祥去北京要求張春橋為報紙題字。但張春橋沒有答應；²⁴ 戴祖祥只好根據毛澤東的幾個相應的毛筆字，拼出刊頭。

1966年12月28日，作為工總司機關報的《工人造反報》創刊，是份對開的大報紙。第一版上刊登《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支持我們工人革命造反派》：「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同意張春橋同志簽署的關於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五項要求」。本來說好每期為50萬份，但第一期實際只印了近28萬份。

王洪文非常重視這份報紙，張春橋也十分重視《工人造反報》，對辦報方針多次講話。1968年2月，王洪文到《工人造反報》傳達了這些講話：

《工人造反報》火力還可以強點，不然的話，要這樣報幹什麼？有些文章文匯報不能登，《工人造反報》、紅衛兵報火力要超過文匯報。……

出一期報紙要使有些人睡不着覺。要力應該很強，別人不敢講的《工人造反報》你們要大膽講。有些文章，大報已經登了，《工人造反報》不要重複登，可以騰出版面登一些新的東西。像那些事火力還可以猛一些。……

工人造反報社論太長，以後可以短一些，太長了，人家沒有時間看。²⁵

23 王洪文指示王腓利寫創刊詞的資料為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張、姚審定《創刊詞》，引自《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十六：「工人造反報」清查情況》。

24 同上。

25 轉引自工總司 1968 年 2 月 20 日《內部參考》第 8 期：《王洪文同志傳達張春橋同志對工人造反報的指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王洪文在傳達張春橋講話時，引用王少庸的一句話為《工人造反報》定位：「我們的報紙可以說是官報，也可以說是民辦。」²⁶而從張春橋不久後對《工人造反報》提出的批評，這應該是張春橋的意思，張春橋曾長期當過報紙總編，對報紙的內容和讀者群的定位有着豐富經驗。1967年1月張春橋回上海時，對王洪文評價說「第一期看過了，方向是對的」，「你們這張對開報紙氣派倒很大，今後你們可以通過它發號施令」，「報紙要辦得潑辣，敢於講話」。張春橋還要求：「今後你們每出一份，給我送二十份，我要轉給其他中央首長看。」後來報社就通過徐景賢，每期都送張、姚。

最初《工人造反報》由解放日報社承印。不久因為解放日報社實在太忙，而此時《新民晚報》已經停刊多日，正閒着，於是改由新民晚報社印刷。報紙的編輯部最初沒有固定的辦公室，1966年底，經總編馬達同意，解放日報社給了工總司兩個房間作為編輯部，在解放日報社二樓靠漢口路的一面。²⁷1967年1月3日左右，報紙改由新民晚報社印刷後，編輯部也從解放日報社搬往香港路上的原新民晚報社倉庫樓上的三樓。但因為樓下是倉庫，來人要先在樓下大聲喊叫，由樓上辦公室裏的人將鑰匙扔下去方能進樓，很不方便。於是不久又搬到圓明園路上原新民晚報編輯部所在地。報紙還是由解放日報社承印。因為新民晚報社的印刷機只能印4開的報紙，而《工人造反報》是對開的大報。後來新民晚報社留下的工人想方設法，用原來的機器印出了對開報紙，以後《工人造反報》就全部由新民晚報社承印。²⁸《新民晚報》停刊後，原工廠部的工人大都留下，劃歸工人造反報社，一直到終刊。工人造反報社接收了新民晚報社的全部資產。1929年創刊的《新民晚報》留下了大量寶貴

26 同上，《王洪文同志傳達張春橋同志對工人造反報的指示》。

27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年3月21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28 王腓利對筆者的回憶。

的圖書和資料，以後全部都散失在工人造反報社工作人員手中，²⁹ 成為歷史的永久遺憾。

《工人造反報》的業務，最初由工總司總部宣傳組負責。當時王腓利是宣傳組負責人，而作為總部常委的范佐棟也主要負責工總司的宣傳工作。因此從籌備辦報開始，就是范佐棟和王腓利共同負責。但這時王洪文與范佐棟關係已經出現裂痕，很多具體事宜，王洪文直接找王腓利佈置；而且第一期出版後，范佐棟分管組織組去了。所以後來由王腓利實際主管，直到第15期。1967年4月王腓利離開，報紙暫由原來的編輯人員王成龍³⁰ 負責，兩個月後，由倪淑英主要負責。倪淑英離去後，由童光正負責；童光正後來被調工代會負責宣傳組工作，又由王成龍負責，直到停刊。

《工人造反報》初期的大多數社論為王腓利撰寫，每期社論起草前他都請示王洪文，有時王洪文也會修改一下。據王腓利回憶，創刊的最初階段，對《工人造反報》最具影響力的是王洪文和范佐棟兩人。王洪文非常重視《工人造反報》，在報紙的初創階段經常去報社，與編輯人員討論報紙內容；最初的許多重要文章都是王洪文佈置撰寫。

最初的工作人員，許多是總部當時負責組織工作的丁德法去找來的，包括王成龍。這些工作人員來自各方，其中有兩人是中學語文教師，還有幾人是《紅衛戰報》派來幫忙的復旦大學學生，其餘編輯大多是工人。所有工作人員，沒有一人當過

29 有關《新民晚報》的資料引自《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十六：「工人造反報」清查情況》：具體幾次搬場日期是王腓利回憶的，尤其從《解放日報》社搬往《新民晚報》社，他記得是1967年初，工總司剛搬往市總工會大樓沒幾天，天氣很冷。

30 王成龍，男，1940—1977年，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上海搪瓷五廠廠長室文書，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工人造反報》負責人，《文匯報》社黨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自殺。

編輯或記者。工作人員的工資都仍由所在的工作單位發，工人造反報社不付報酬，紅衛兵們更是義務勞動。1967年2月，徐景賢建議，調一些工人作者去充實工人造反報社。共擬調十人，都是文革前上海知名工人作家：胡萬春、唐克新、費禮文，等等。但那天胡萬春去報社時，卻與王成龍產生不快，當場離去。事後得知這一情況的王腓利，第二天趕去向胡萬春道歉，但胡萬春等工人作家卻再也不願回去。過了很長時間，王腓利從王洪文處得知，調工人作家去工人造反報社是張春橋的意思，王成龍當時不知道這個情況，不夠尊重他們。³¹

1967年6月，為增強業務水平，工總司總部從新民晚報社和原上海市總工會抽調了十多人去工人造反報社，並進行業務分組。設立了採訪組、評論組、編輯組、大批判組、通聯組和排字印刷組；後來又增加了專門處理來信來訪的群眾工作組。

隨着《工人造反報》名氣的擴大，報社人員逐漸增加。許多人是工總司下面的各聯絡站推薦或派去的，一些人業務能力不強，卻以工人造反報社的名義在外隨便表態。1968年1月15日，工人造反報社組室全面清理人員。至當年4月，大部分人回廠，只留二三十人。再重新調入人員，包括印刷排字工人。³²新調入的人員大都是文革前就在工廠從事工會或黨委宣傳工作的基層工人幹部，還有工人文藝創作和時局評論的活躍分子，都有一定的寫作和採編能力；又調入一些原來的成人教育教師，受教育程度都是大學。這樣的採訪編輯班子以後基本穩定，保持到1971年報紙停刊。

剛開始時由於沒有辦報經驗，編輯人員依樣畫葫蘆：版

31 這是王腓利對筆者回憶的，他說，他當時不知這件事，事後是姜延良告訴他的，姜並說調工人作家是徐景賢建議的。後來過了很久，一次王洪文批評王腓利，提到王成龍驅趕工人作家之事，說派工人作家去《工人造反報》，是張春橋要徐景賢出面建議的。

32 《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十六：「工人造反報」清查情況》；以及筆者2010年11月2日對《工人造反報》原工作人員吳林深的訪談。

式版面設計參考《解放日報》和《文匯報》。這使《工人造反報》一問世，就和其他群眾組織小報顯著不同。不過張春橋對造反派追求正規報紙風格的辦報方針不以為然，他主張群眾報紙要有自己的特色。1968年3月他曾對此有過批評：現在《工人造反報》跟在文匯、解放後面轉，向正規化發展……如果這樣，《工人造反報》不必要了。³³

《工人造反報》和其他群眾小報的不同還在於，它所登的文章基本都是原創，緊貼時事，文風犀利；不刊登「文革動態」、「情況摘編」、「參考消息」之類，這些動態性的信息是當時大多數群眾組織小報的主要內容，基本都是你抄我，我轉你，未經核實，不知真假。不刊登這類內容是王洪文的意思。剛開始辦報時王洪文就要求內容一定要靠得住，不要刊登那些道聽途說的東西。所以，雖然當時工總司總部有「動態組」，動態組負責人每次出版手抄複寫的「動態」時，總要送《工人造反報》一份，但編輯們始終拒絕刊登。對於所有小報竟相轉抄刊登的「首長講話」，《工人造反報》也從不轉載，只刊登上海市革委會領導人的講話。這反映了工總司的辦報自信，不以那些抄來轉去的內容吸引眼球。王洪文還要求，《工人造反報》對重大事件，對其他群眾組織，尤其是對外地的局勢，不要輕易表態。因此《工人造反報》除了對赤衛隊，以及一、二、三兵團有過宣傳攻勢，基本沒有再自行對其他組織抨擊和批判，即使是對工總司看不慣的機關聯絡站。而對外地形勢，1967年第11期曾經對浙江嘉興地區局勢表態，但下一期就檢討，後來就再不擅自表態。如果有批判其他組織或對外地局勢表態的文章，一定是轉達了上海市革委會的態度。³⁴ 這樣的辦報特點，使得《工人造反報》給人以其他群眾組織小報所沒有的正規感；尤其到中後期，儼然主流話語，更是給人以準官方的感覺。

33 工總司 1968 年 3 月常委會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34 以上情況是王腓利對筆者回憶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工人造反報》也有着群眾組織報紙的特點，尤其是在批評和抨擊時局方面。市革委會不便於在《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說的話，往往由《工人造反報》出面說，例如對支農司的批判，對聯司和支聯站的抨擊，對青浦事件的表態，其實都是市革委會的態度。此外，《解放日報》等正規報紙，一般不便於刊登地方領導講話，於是由《工人造反報》刊登。市革委會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等人在一些大會上的講話，有時原文刊登，有時稍加修改以社論或「本報評論員」的形式或名義發表。「工宣東」是《工人造反報》用得比較多的評論員筆名。

這一切使得這張報紙既有官辦報紙所沒有的靈活性，又有群眾小報所沒有的權威性。它所刊登的許多文章，是當時上海基層必須學習的政治讀物；更有不少文章被中共機關刊物《人民日報》或《紅旗》雜誌轉載。外省市造反派也將上海《工人造反報》上的文章，作為中央報刊的補充讀物，以學習上海經驗，揣摩中央決策層最新精神。當時，《工人造反報》與上海的另三個刊物：《解放日報》、《文匯報》、《支部生活》，合稱為上海的「三報一刊」，此說是對應中央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顯示了《工人造反報》在上海文革中的話語權地位。

在眾多的群眾性文革小報中，撇開政治傾向不論，《工人造反報》被認為是無論從編輯、版面、印刷、發行等方面都是拔尖的。它創下了上海文革時期群眾組織小報的多項第一：在上海職工造反派的報刊中創辦最早：1966年12月28日。存在時間最長：1966年12月28日至1971年4月15日。出版期數最多：445期。發行量最大：最高單期發行量達64萬份。運用出版形式最充分：包括喜報、號外，增刊、特刊、專刊。此外，還同其他較有影響的群眾組織的小報，發行過多期「聯合版」。³⁵

35 這五個「最」是文革研究者陳國康在《工人造反報總目錄說明》中提出

《工人造反報》最初是非賣品。1967年1月7日出版的第二期上，還特別印上「非賣品」三個字。報紙剛發行時，由工總司下面的區、縣、局聯絡站自己去領取，再發到下面工廠的造反隊。但那時工總司下屬組織繁多，和總部關係密切的能夠及時領到報紙；和總部關係疏遠的就不一定領得到報紙。於是許多下屬組織或工廠造反隊要求自己出錢購買報紙。這樣，從1967年2月23日第9期開始，報紙零售，每份3分錢。1967年6月開始，又改為零售4分(如遇六版，售5分)，由解放日報社幫忙結算。儘管收費，9個多月後發現還是累計虧損1.67萬餘元，只能經市革委會批准，向市財政部門報銷了。³⁶ 經市革委會協調，第9第10兩期報紙，托郵局代售；從第11期，交郵局徵訂發行，接受訂閱。由於那時出版日期還沒有固定，所以收訂按期數計算。直到1968年2月開始，才定為每周兩期，逢周四、周日出版。

第一期的《工人造反報》，發行數量幾近28萬份，³⁷ 後來因為收費，數量有所下降。改為訂閱後，基層單位都將其作為公費必訂報刊，全國各地訂閱數目也很大，發行量又不斷增加：1967年為16.5萬份。1967年8月以後，上海的其他小報被市革委會以整頓名義，全相繼停刊，《工人造反報》卻在1968年擴大發行，發行量達到27萬份，1969年平均每期40萬份，最多為64萬份，超過當時上海黨報《解放日報》。增刊最多為105萬份。³⁸ 因發行量大，到1971年停刊時，報社積攢了40萬元結餘。³⁹

《工人造反報》共出報紙445期，喜報、號外13期，增刊、

的，載於人民網《陳老頭子的集報博客》。

36 虧損和報銷之事引自《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十六：「工人造反報」清查情況》。

37 總工會的清查資料說最初是3萬份，但王腓利回憶是28萬份，而且他回憶說是他親自從機器上搬下清點的。

38 《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十六：「工人造反報」清查情況》。

39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葉昌明的訪談。

特刊、專刊30期，共計文章5491篇；還有內部印發的《內部參考》100期，《群眾反映》320期。⁴⁰

工總司總部最初的分工

在11月5日的工總司籌備會上，曾決定17個發起單位，每單位派一人到總部工作。後因緊接着發生的安亭事件未及實行。安亭事件結束後，11月16日，參加過工總司籌備會議的造反派們重又聚在一起開會，以17個發起單位為核心，每個單位派出一個代表，成立工總司的總部。⁴¹ 雖然這個17人指揮部後來實際沒有真正運行過，但其中大部分人在工總司初期活動中都起着很大作用。

總部還幾次討論過工總司名單和組織分工。根據葉昌明當時的工作筆記記載，11月12日或14日左右，曾進行組織分工：籌委會委員：王洪文、潘國平和黃金海。還有宣傳組、總務組、組織保衛組、聯絡組。不過這個名單幾天後，便被另一份名單取代。11月16日或17日，王洪文召開會議，以17個發起單位為基礎，成立17人的工總司籌委會：葉昌明、徐美英、丁德法、繆南生、黃文海、范佐棟、張伯生、黃金海、王洪文、孔繁胤、蔣周法、陳金星、蔣財良、陳阿大、潘國平、張潮生、戴立清。這個籌委會後來沒有成為委員會，但籌委會人員，後來實際都成為工總司總部工作人員。⁴² 同時還進行了總部分工，定下了工總司總部最初的工作班子：秘書材料組，成員有

40 《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十六：「工人造反報」清查情況》。

41 根據當天(1966年11月16日)葉昌明的工作筆記記載，這17人是：葉昌明、徐美英、丁德法、繆南生、黃文海、范佐棟、張伯生、黃金海、王洪文、孔胤繁、蔣周法、陳金星、蔣財良、陳阿大、潘國平、張潮生、戴立清。這些人中有些如戴立清雖沒有參加籌備會議，但因所在工廠有人參加，所以作為發起工廠的代表。原資料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42 葉昌明工作筆記 1966年11月16-17日。

范佐棟、黃文海、葉昌明、張伯生、王漢清；組織保衛組，成員有王洪文、孔繁胤、陳金星；總務組，成員有徐美英、岑麒麟、王廼元；宣傳組，成員有潘國平、黃金海、朱澤民、李林、王湘伯；聯絡組，成員有丁德法、繆南生、蔣財良、謝鵬飛、蔣周法。⁴³

1967年年初，工總司總部組織構架又有幾次調整。據當時的葉昌明工作筆記記載：核心領導小組成員是王洪文、潘國平、葉昌明、蔣周法、范佐棟、陳阿大。這六人被視作工總司總部常委，到1967年12月的造反派代表大會前，總部沒有再正式選舉過。筆記上還寫着耿金章，但又被圈掉了：耿金章曾經一度也被算作常委，不過他從來不去總部開會。秘書材料組，有范佐棟、戴立清、房佩仙、黃文海；宣傳組有張伯生、丁德法、王腓利、王廼元；總務組，有陳阿大、徐美英；保衛接待組，有耿金章、陳金星；聯絡組，有葉昌明、蔣周法、蔣明才、繆南生；各區聯絡組工作組，有王洪文、潘國平。⁴⁴不過，這個構架也沒有實行多長事件，到1967年3月，精兵簡政，工總司總部機構又有大的變化。

工人造反派的構成

安亭事件結束了，參加過安亭事件的工人造反派，可以說都是工廠中較早造反者。他們後來被稱為「老造反」。工人造反派中的核心人物也喜歡自稱老造反。對於老造反有兩個界定時間，一是以參加籌建工總司和參加安亭事件為限，即1966年

43 葉昌明工作筆記 1966 年 11 月 16-17 日。

44 葉昌明工作筆記 1967 年 3 月間。原筆記未註明日月，但從前後內容的日期上看，當在 1967 年 1 月底左右。而且 1967 年 2 月初開始，王洪文與耿金章的矛盾加劇，2 月 25 日耿金章被抓，所以，安排耿金章作為工總司總部常委之事，應該是在雙方矛盾還沒有激化的 1 月，那時王洪文還想團結耿金章。

11月中旬以前的造反者，這樣全上海只有幾千人。另一個是以參加過1966年工總司早期活動的「三大事件」，即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為限，也即1966年12月底前的造反者，這樣就有幾萬人。文革中，「老造反」和「老幹部」一樣，是有着特定含義的稱呼，是文革中特有的政治名份，造反派的核心，意味着文革的資歷，也是一種政治資源。

老造反文革前的表現，可以從1967年12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後來被迫認為上海第四次工代會)的工總司總部委員名單分析。這份名單中的44名工總司委員，除去楊富珍、周林妹和戚榮繁3位勞動模範和先進人物外，其餘41人都是老造反。這41人中，文化革命前受過各種處分者8名；其中4名曾受過廠級或行政處分，還有4名曾受過黨紀處分。受處分原因，2人因造成生產事故；2人因婚外性行為，當時稱「生活腐化」；1人因鄰居糾紛時動手打人；1人1965年時「說錯話」，筆者估計是政治牢騷；1人是由於「為妻子不肯贍養生母辯護」；還有1人是由於「拿同學皮夾子」即錢包。⁴⁵

在上海這個全國最大工業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廠工人被賦予「產業工人」的政治身份。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中，產業工人是工人階級的核心。老造反中，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黃金海所在工廠，都是上海的幾千人甚至萬人大廠，潘國平、陳阿大等所在工廠規模也不小。他們都是產業工人，而且是當時國民的經濟支柱產業或骨幹產業的工人。他們的產業工人身份，更使他們成為上海造反派的象徵。

工總司1970年1月，曾經對所屬區、縣、局及公司、工廠的聯絡站或造反隊負責人的情況做過大規模登記。這些負責人都是老造反。筆者匯總了其中一部分資料，這些資料涉及工總司：工業交通系統的22個主管局、1個管理處和10個區的工總司

45 筆者根據1967年12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通過的工總司」(即第四屆工代會)名單統計。

聯絡站，輕工業局所屬全部10個公司的工總司聯絡站，紡織工業局所屬全部13個公司的工總司聯絡站，輕工業局鐘錶公司所屬31家工廠的造反隊，第一機電工業局所屬18家直屬廠或研究所的造反隊，第一機電工業局機械製造公司所屬72家工廠的造反隊。對所謂文革中的「新幹部」，統計表格做了說明：「新幹部係指廠級造反隊隊委和結合進廠革會的群眾代表」。這些單位共統計1,756名新幹部，其中，在1966年11月，也即安亭事件左右或之前造反的有726人；如果以1966年12月底為限，參加過文革初期「三大事件」者，則有1,067人。前者佔被統計人數的41.3%，後者佔60.8%。這兩個比例數字應該是新幹部中老造反的大致比例。⁴⁶

此外，又據1970年1月工總司輕工業局聯絡站的《新幹部統計表》，312家工廠的造反隊及六個主管公司的聯絡站，職工人數為116,876，參加造反隊的工人數66,825，為57.6%；其中1967年1月前，即參加過三大事件的老造反有4,438人，為職工人數的3.8%，為造反隊員人數的6.6%。這兩個比例數字可以看出老造反在一般職工和一般造反隊員中的大致比例。

工人造反派非常珍視自己的老造反身份，努力將自己區別於一般造反派。而在事實上，他們也確實是工人造反派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代表，是造反派的骨幹和核心。「老造反」意味着造反時間比一般人更早，對文革的認同比一般人更強。這也意味着文革更應依靠他們。而事實正是如此。老造反中的許多人後來先後進入權力機構，即使由於各種原因包括觸犯刑律，暫時下台，但老造反的身份使他們可能有機會東山再起。

工總司總部對老造反特別關注，一次又一次地調查老造反的情況和境遇，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關照這些昔日一起造反的弟兄們。以下是老造反的情況表。⁴⁷

46 筆者根據工總司1967年12月印發的《新幹部統計表》統計，上海市檔案館收藏。

47 這一節中的表格，除了注明出處的，都是筆者根據上海市工工代會1970

表1：老造反的年齡⁴⁸：

單位：人

年齡組	1965年上海 職工年齡構 成(%)	1966年11月前和11月 造反的老造反		1967年1月前和1月 造反的老造反	
		被統計人數	%	被統計人數	%
16歲-25歲	13.6	201	28.0	449	25.4
26歲-35歲	30.8	402	55.9	976	55.1
36歲-45歲	30.1	115	16.0	338	19.0
46歲-55歲	18.6	1	0.1	7	0.4
56歲以上	6.9	0	0	1	0.1
合計	100.1	710	100.0	1,771	100.0

表2：老造反的工齡

單位：人

工齡組	1966年11月前和11月 造反的老造反		1967年1月前和1月 造反的老造反	
	被統計人數	%	被統計人數	%
1年-5年	120	30.0	310	27.4
6年-10年	94	23.6	259	22.9

年1月的表格匯總。表格填寫單位為：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上海市輕工業局、上海市冶金工業局、上海市化學工業局、上海市儀錶電訊工業局、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華東電業管理局、上海市第二機電工業局、上海市物資局、華東物資局、上海城市建設局、上海市房地產管理局、華東電業局、上海市公用事業局、上海市園林管理處、上海市郵電管理局、上海市交通運輸局、長江航運局、上海港務局、上海海運局，共20個上海工業、交通系統的管理局。此外還有上海10個區的工總司聯絡站，以及上海市輕工業局所屬10個專業公司、上海市紡織局所屬13個公司的聯絡站，還加上工總司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所屬84家工廠、6所研究所的造反隊，共143個單位、1510人次(但各單位所填表格在有些項目上會有缺損)。原表格為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筆者匯總成統一表格後，由Perry的學生在電腦上統計。在Elizabeth J. Perry與筆者合著的 *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 中引用。這裏的5份表格引自這本書。

全部引自都是筆者根據工總司表格匯總統計。

- 48 表格中1965年職工「年齡組」和「1965年上海職工年齡構成」欄的數據引自上海市統計局1966年製《1965年上海職工基本情況統計——職工年齡》，上海市檔案館收藏。

10年-15年	69	17.3	233	20.6
16年-20年	90	22.6	239	21.1
20年以上	26	6.5	90	8.0
合計	399	100.0	1,131	100.0

表3：老造反文革前的職務

單位：人

文革前職業	1966年11月前和11月 造反的老造反		1967年1月前和1月 造反的老造反	
	被統計人數	%	被統計人數	%
工人	600	84.9	1,366	80.1
一般管理人員	94	13.3	291	17.1
管理層負責人員	6	0.8	18	1.1
工會幹部	2	0.3	8	0.5
專職黨務幹部	5	0.7	20	1.2
合計	707	100.0	1,703	100.0

表4：老造反的受教育程度⁴⁹

單位：人

分類	1965年上海職工 受教育程度情況	老造反的受教育程度	
	%	被統計人數	%
文盲半文盲	4.99	1	0
小學	41.46	107	19
中學(包括技校中專)	48.98	425	75
大學以上	4.57	32	6
合計	100	565	100.0

49 此表格的 1965 年職工受教育程度部分引自《上海工運志》中所載：《1950-1965 年上海職工文化程度分類佔比》，上海市總工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 1997 年 9 月出版。

表5：老造反中的黨團員比例⁵⁰

單位：人

分類	1965年上海職工 黨團員數		1966年11月和11月 前造反的老造反 黨團員數		1967年1月和1月 前造反的老造反 黨團員數	
	被統計人 數	%	被統計人 數	%	被統計人 數	%
共產黨員	186,510	12.1	104	15.7	269	18.2
共青團員	115,425	7.5	115	17.4	196	13.3
群眾	1,237,990	80.4	443	66.9	1,012	68.5
合計	1,539,925	100.0	662	100.0	1,477	100.0

從表格中看，35歲以下職工中老造反比例最高。這個年齡段本來就是當時上海職工隊伍中人數最多的，都是1949年革命以後進廠者，對打倒走資派口號較容易接受。加上他們絕對人數多，一般工齡都在五年以上，既知道廠裏的各種情況，也了解工人的思想和情緒，一旦造反，很容易帶動周圍一批工人。表格還顯示，老造反中受過中學教育職工的比例，比只受過小學教育比例高許多。相比1949年之前進廠的工人，這些受過一定教育的工人們自我意識較強，容易對束縛個性的體制產生逆反情緒，也更容易接受毛澤東張揚個性的造反有理口號。

表格中顯示出較高的黨團員比例，這和當時人們通常認為的「造反派裏落後分子多」的習慣說法不一致。表格中1965年上海職工中的黨員比例是12.1%，而且這個統計數字包括機關、學校等黨員比例較高的單位。而1966年安亭事件前及安亭事件中，以及1967年一月革命後的老造反中，黨員比例卻高出職工中的黨員比例數，團員比例更是高出許多。黨團員相加達30%多，相當高。這個現象很值得注意。這說明，上海最早的工人

50 職工黨團員數 1965 年部分引自上海市統計局 1966 年《1965 年上海職工基本情況統計——職工文化程度和政治情況》。

造反派中，雖然有受過處分、有着不良記錄的「落後分子」，但也有相當數量的黨團員。他們絕大多數都是1949年革命後入黨入團的，他們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和宣傳影響，積極投入各項政治運動；也是為了爭取較高的政治名份和社會身份，實現人生目標。1949年以後，作為普通工人，要脫離底層，最現實有效的途徑就是當幹部。要當幹部，就必須入黨入團，這是工人被提拔為幹部的必由之路，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所決定。

但是，與過去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不同，文革剛開始時，對運動有着兩種不同理解，於是產生兩種不同的積極投入方式。一種理解沿着十七年思維慣性，認為保衛各級黨委就是積極投入運動；以這樣方式投入運動的是保守派。另一種理解認為響應毛主席號召造反才是積極投入運動，這部分人即造反派。可以說，黨團員都是文革初期的最積極參與者。筆者手裏沒有保守派中黨團員比例。但筆者相信，如果將造反派中的黨團員數與保守派中的黨團員數相加，一定基本相當於上海工人中的全部黨團員數。文革初期不積極投入運動的黨團員肯定只佔極少數。

小結

工總司成立時，希望上海市委賦予他們「革命群眾組織」的名份，但上海市委就是不予理睬。公民本來應有的結社權利，被共產黨幹部視作可由他們控制而相機行事的政策。於是為了這個革命的名份，工人造反派們攔截火車，這卻是違法的。本來是合法的要求，只有以非理性抗爭才能實現；憲法賦予的權利，卻要用違法的手段才能兌現。顯示在中國，只有賜予的名份，沒有天然的權利。安亭事件引發的直接結果是全國各地工人造反派組織紛紛成立，與當地黨組織發生衝突。11月底，安亭事件剛結束，四川成都的上千工人造反派赴北京告狀，中央只得連忙派人將他們堵截在武漢，勸他們回成都。

安亭事件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上海造反派開了攔截火車卻被賦以革命行動的先例，此後，全國鐵路運輸被截被攔事件層出不窮，都是以革命的名義。毛澤東用久違的憲法，支持工人造反派成立組織的要求。於是，因為這個要求合法，為了達到這個要求的攔截火車的違法行為，也成了革命行動，具有了合法性。毛澤東一貫的只要是為了革命，可以不擇手段的思路和行為模式，就這樣又一次在安亭事件中勝局。毛澤東又一次違反常理，將一場本屬破壞社會和經濟秩序的事件，變成突破對手防線的出擊，為自己贏得了比紅衛兵更具優勢的政治資源而且是更順手的社會力量。

安亭事件催生了工人造反派崛起，這是繼紅衛兵之後的第二股文革勢力，完全改變了文革力量的格局，工人造反派迅速發展壯大，很快就成為取代紅衛兵的文革力量。毛澤東親自支持工總司，這在全國工人造反組織中是唯一，決定了上海十年文革的基本格局。安亭事件對全國工人造反派，起着強烈的示範效應，全國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紛紛成立組織。這是1949年後共產黨在毛澤東的強硬態度下，對公民結社權的唯一的一次讓步。但是這個讓步的時間非常短暫。四個月後，1967年3月，毛澤東便提出「大聯合」。而大聯合實際促成了造反派組織的解散。

對比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的崛起過程，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差別：紅衛兵成立初期，雖然面臨學校方面強大壓力，卻毫不妥協，有着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以及把握自己政治命運的自信。他們給毛澤東寫信，遞交的不是要求毛澤東出面調停的告狀書，而是驚世駭俗的兩篇宣言：《一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二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這些高幹子女在秘密成立紅衛兵組織時，根本就沒有考慮需要得到哪一級機構的承認，他們橫空出世，捨我其誰，完全不把學校黨團組織和領導放在眼裏。工人造反派則缺乏這樣的自信，尤其缺乏把握自己政治命運的自信。他們成立後所做的第

一件事，便是要求自己的批判對象承認自己組織的合法性和行動的革命性，以降低造反的成本和風險。這顯示工人造反派在造市委反的同時，實際仍然承認市委的權威和權力。雖然1949年後的工人，有着理論上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優勢，但所有這一切優勢，都是共產黨分配的，是一種賜予。這使他們對共產黨和政府，在經濟上從而在政治上有着先天的依附性，他們在實際行動上比紅衛兵軟弱得多，這是以後他們比紅衛兵更聽話的根本原因。因此，工總司得到毛澤東承認的更大的意義，在於這是一支可以取代學生，而且比學生聽話的政治力量。而不久後興起的全國奪權運動，工人造反派更成為領頭者，成為毛澤東文革的主力。

安亭事件也使本來批判《海瑞罷官》有功的張春橋再立新功，由此更鞏固了張春橋在文革中的地位；同時也使王洪文作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代表脫穎而出。文革就這樣在上海選擇了張春橋和王洪文。以後文革的發展證明，對毛澤東的文革，這是兩個十分重大的選擇，決定了文革十年的格局和走向。

第十章

工人赤衛隊 文革遭到強大阻力

二·七戰鬥隊

安亭事件剛發生，一張反對派的傳單便貼遍上海大街小巷：《十萬火急的緊急呼籲！！》，這是上海街頭最早對安亭事件的反應。大字報署名「二·七戰鬥隊」。這是個保守派的組織。

保守派最初被稱為「保皇派」。這是從1966年6月5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而來。不久，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沿用了這一稱謂，將不同意他們反工作組的師生稱之為「保皇派」。但是保皇派畢竟是歷史名稱，有它的本來涵義；而且毛澤東也不贊成使用這個名稱。毛在8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保皇派這個名稱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麼不保？」¹ 周恩來隨即在一次講話中建議改稱保皇派為「保守派」。於是，保守派成為文革中和造反派相對應的又一個特定的政治名份。最初，因為保守派人數比造反派多，所以又被稱為「多數派」，造反派被稱為「少數派」，不過，這個稱呼沒有被使用多長時間，民眾對保守派的稱呼始終是「老保」。

安亭事件標誌工人造反派誕生，也催生工人保守派結盟。

1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1439頁。

上海最早的全市性保守派組織，是本書第二章中已提及的紅衛兵組織：上紅總部和上紅大專總部。剛成立時，也像北京紅衛兵那樣自稱為造反派，鬥老師，破四舊。但當北京紅衛兵南下衝擊上海市委時，與黨內幹部的天然聯繫，使他們毫不猶豫地站到了保衛市委的立場，從上海學校中最早的造反派，變成了保守派。

上海職工保守派作為工人造反派的對立面，幾乎是同時產生的，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聶元梓大字報後，上海工廠的一些工人也貼工廠黨委的大字報，而另一些工人，則起而「保衛」黨委。這是工廠中最初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北京紅衛兵南下衝擊上海市委，是觸發上海工人造反派與保守派走向社會的直接原因。在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的日子裏，工人造反派去上海市委門前支持北京紅衛兵，工人保守派則去那裏保衛上海市委。之前兩派都還未形成有組織的行動。在這些活動中，工人保守派開始形成自己的骨幹隊伍，各廠紛紛成立與造反派對立的赤衛隊、糾察隊等組織。但是，這一時期這些組織的活動範圍只在工廠，還未走向社會。推動保守派走向社會的是安亭事件。鐵路系統有規定：正線中斷一小時就算大事故。安亭事件加上火車後來又在昆山被攔截，致使滬寧線中斷三十多個小時，那真是非常大的事故。車上大都是串聯的紅衛兵，沒吃沒喝。上海鐵路局和上海鐵路分局²的領導和機關幹部們，馬上前往安亭，勸說工人放行被攔火車。

安亭事件發生時，最先得到信息的，是上海和華東地區鐵路運輸中樞神經、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人員。鐵路調度所是要害部門，一百多個工作人員從分局四萬名職工中百里挑一，不是黨團員，也是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對造反派的攔車阻斷交通

2 上海鐵路局(簡稱「路局」)，管轄安徽、江蘇、浙江三省和上海市內的鐵路運輸；上海鐵路分局(簡稱「分局」)，分管上海境內以及滬寧、滬杭線到上海的部分路段；路局是分局的上級單位。

行為，大家深感驚訝和憤怒。11月10日下午，調度所職工在一起議論：「幹部們去勸說不通，我們發傳單向社會呼籲！」正在議論，分局副局長李殿元走進調度所，大家對李局長說：我們要寫傳單！李殿元來調度所之前，剛參加了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在北站紅衛兵運輸指揮部召集的會議。會議正是討論安亭事件的，會上分局黨委書記王華生提出，要向全市發呼籲書。所以聽到調度所職工要寫傳單，李殿元馬上支持：「你們要寫就寫吧。」於是調度所值班主任汪培元起草了一份傳單。寫畢交李殿元過目，李建議由分局的局長辦公室秘書陳阿春修改。

陳阿春在造反派攔截火車事發的當天晚上，曾和李殿元連夜開車去安亭。只見現場亂哄哄的，他和李殿元試圖說服那些造反派，但沒有結果。陳阿春對安亭發生的攔車事件強烈不滿，讓他修改傳單，他覺得義不容辭。但他又覺得由局長辦公室出面到社會上散發傳單不妥當，他想到了北站紅衛兵運輸指揮部。這個指揮部是應對紅衛兵全國大串聯而建立的臨時機構，下面設組織、宣傳等若干組，其中宣傳組專門負責對外宣傳。陳阿春想，何不讓宣傳組去印發傳單？於是他打電話給擔任宣傳組長的鄔科長，鄔科長一口答應。陳阿春即將傳單原稿包封，請通訊員送到在上海站的鄔科長手裏。鄔當即向正在上海站的分局黨委書記王華生匯報。此時剛才召集會議的副市長李干成還在，李干成說：「群眾要發，就讓他們發吧！」陳阿春送走傳單底稿，下午7時下班時間過後不久，正要離開辦公室回家，接到分局政治部副主任田丹的電話，要他留下來修改傳單。接着，李殿元、田丹，還有分局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張傲佐，一同來到局長辦公室，共同修改傳單，陳阿春執筆。傳單的題目定為《十萬火急的緊急呼籲！！》。此時是10日晚上的9時30分。³

3 傳單《十萬火急的緊急呼籲！！》，上海鐵路局「二七」戰鬥隊 1966 年 11 月 10 日晚上 9 時 30 分。

傳單以什麼名義散發？曾考慮過用「三個革命群眾」、「部分革命群眾」等。最後李殿元說，鐵路工人有「二·七」大罷工的革命傳統，建議署名「二·七戰鬥隊」。既能體現作者是鐵路工人，而且以當時流行的戰鬥隊名義，還可以為今後的發展留下餘地。底稿連夜被送往路局印刷廠。第一批印六千份，11月11日凌晨天沒亮全部印出。一直等着的調度所副主任王玉璽等，馬上分東西南北四路火速張貼。11日天亮後，上海滿城都張貼着這張傳單。

這是上海街頭最早對安亭事件的反應。傳單貼出去後一再被翻印，反響強烈；四方支持者紛紛到上海鐵路分局的接待站打聽二·七戰鬥隊情況，甚至還有前往掛鉤者，要求將自己的戰鬥隊掛在二·七戰鬥隊名下。人們從署名猜出，傳單一定是鐵路職工撰寫。而事實上，此時的二·七戰鬥隊還只是傳單上的署名，尚沒有實體的組織。⁴

陳伯達的電報到安亭，批評造反派攔車行為「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調度所職工非常高興，認為中央文革小組也不支持造反派的行為，決定再寫一張傳單。因為他們覺得第一張傳單對造反派影響鐵路交通的後果，寫得太籠統。於是由調度所資料員唐兆元起草了第二份傳單。這張傳單的全部數據，都來自調度所當時的生產記錄，即列車運行圖，不是事後估計。因此所提供的因造反派攔車造成的鐵路全線停車的時間及狀況，應該是真實準確的。以後所有提及安亭事件後果的數據資料，全都源自這張傳單，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們當時的傳單，包括

4 本章資料均來自筆者2005年11月20日對陳阿春的訪談，以及引自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寫的《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供討論修改用第二稿），王一魯、陳其賢執筆，上海市總工會檔案；同時還參考了傳單《上海鐵路分局黨委是上海市委鎮壓革命破壞生產的頭號幫兇（從安亭事件到建立二七戰鬥隊、工人赤衛隊的經過事實真相）》，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派鐵路總部上海鐵路分局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派，1967年1月16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文革結束後對造反派們的起訴依據。⁵ 王玉璽將底稿交陳阿春修改，題目定為《非常大的安亭事件》，這是套用陳伯達電報中的一句話：「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署名仍是二·七戰鬥隊，印刷八千份，連夜張貼全市。這張傳單，本書前面的章節已引部分段落。前一份傳單寫作過程中，鐵路路局和分局黨委曾經過問，這份傳單則完全由調度所職工自己撰寫。陳阿春曾請示分局政治部副主任田丹，說我們打算再寫一張傳單，田沒表態，實際默許了。

這份傳單用調度所的數字說話，影響更大，被反對造反派攔截火車的群眾組織一再翻印。南京路、淮海路、外灘等繁華地段紛紛出現「堅決支持」的大標語、大字報；許多組織上門表示支持、要求共同行動的人和組織，更是不計其數。李殿元建議他們乾脆成立二·七戰鬥隊組織。於是，以調度所職工為基礎，正式成立了「二·七戰鬥隊」，推王玉璽為隊長，陳阿春為顧問。這是上海第一個有全市性影響的工人保守派組織。它的出現顯示了上海工人保守派正在組織起來。二·七戰鬥隊誕生於一張傳單，可以說是先有其名，後有其實。⁶ 從二·七戰鬥隊的成立過程看，既是自發的，也有幹部們的默許和引導。

市委與上海工人保守派

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上海工人中以對上海市委和北京紅衛兵的評價為界，分成不同觀點。但是那時還只是個人觀點，沒有形成組織。有組織地到市委門前去「保衛上海市委」的，都是工廠黨委組織的，不是工人自發的群體行為。安亭事件後，以對安亭事件的態度為界，上海工人分成了兩大派。張春橋與工總司的簽字引發許多上海市民不滿。當時毛澤

5 筆者 2005 年 11 月 20 日對陳阿春的採訪筆錄。

6 同上以及《忠於黨的上海人民赤衛隊》。

東的裁決尚未傳出，一些工廠工人紛紛反對張春橋的簽字。國棉三十一廠的工人，在地處外灘的上海紡織工業局大門口，張貼巨幅大字報《致張春橋的公開信》，還委託二·七戰鬥隊將大字報的複件帶去北京，希望向毛澤東控告張春橋。上海玻璃機械廠貼出大幅標語「重炮猛轟張春橋」，每個字兩張報紙大，還要鐵路職工帶去同樣的標語貼在北京天安門城牆上。此外，「張春橋拿原則作交易」，「張春橋出賣上海二百萬產業工人的根本利益」等大標語、大字報比比皆是。反對安亭事件者，一定反對造反派，成為老保的中堅。

在許多造反派活躍的工廠，保守派也特別活躍。許多工廠，往往工總司的造反隊上午剛成立，下午保守派組織也馬上針鋒相對地成立。最有意思的是，產生工總司骨幹分子的工廠，也產生了以後全市性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的骨幹分子。比如：

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有馬驥；⁷

陳阿大所在的良工閥門廠，有金瑞章；⁸

潘國平所在的上海玻璃機械廠，有潘月法；⁹

黃金海所在的國棉三十一廠，有李劍鈺；¹⁰

7 馬驥，男，1966年時是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中共黨員，文革初期曾是國棉十七廠「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發起人，1967年1月被造反派扭送公安局，關押1個月後回廠勞動。文革結束後平反，曾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六屆委員、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工會副主席。

8 金瑞章，男，文革前是上海良工閥門廠工人，文革中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常委，1967年1月被關押，1968年被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宣佈「帶壞分子帽子，並管制3年，交本單位革命群眾監督勞動」，文革結束後平反。

9 潘月法，男，文革前是上海玻璃機械廠工會幹事，文革中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常委，1967年1月被關押，1968年被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宣佈「帶壞分子帽子，並管制3年，交本單位革命群眾監督勞動」。文革結束後平反，任上海玻璃機械廠工會主席。

10 李劍鈺，男，文革前是國棉三十一廠黨委組織科幹事，中共黨員，國棉

謝鵬飛、蔣周法等所在的上海鐵路分局，有王玉璽¹¹、陳阿春¹²；

葉昌明所在的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有高根才；¹³

.....

而且一些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原來關係不錯，例如馬驥和王洪文都是廠保衛科的幹事，兩人原來關係很好，無話不談；高根才原來和葉昌明關係也不錯，當初葉昌明去靜安寺附近看大字報，經常和高根才一起去。他們大都成為後來全市性赤衛隊組織的發起人。

推動這些人走向社會的正是安亭事件。安亭事件發生後，上海二十多家工廠的代表組成了「安亭事件聯合調查組」，赴安亭現場進行調查研究。這個調查組的主要成員就是上面提及的金瑞章、潘月法、李劍鈺等人，他們與鐵路分局二·七戰鬥隊聯合行動，寫出傳單《拆穿西洋鏡》。這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的第一次聯合行動，這個聯合調查組是上海工人赤衛隊最早的雛型。

1966年11月18日，上海五十多個單位的四百多位工人代表聚集在上海展覽館咖啡廳，要求張春橋接見。張春橋同這批工

三十一廠赤衛隊發起人之一。1966年12月28日被公安局關押，1967年2月被釋放回廠「勞動」。文革結束後平反，後擔任上海第三十一棉紡織廠工會主席。

- 11 王玉璽，男，1933年生，文革前是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副主任，中共黨員，文革初期擔任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負責人，1967年1月5日被關押，1971年由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判刑4年，釋放後回廠「勞動」。文革結束後平反，任上海鐵路分局調度科長，以及擔任上海鐵路局工會主席等職務。
- 12 陳阿春，男，1934年生，文革前是上海鐵路分局局長辦公室秘書，中共黨員，文革初期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的顧問，1967年1月被市公安局留局審查10個月。1967年10月回原單位工作。文革結束後平反，任上海鐵路中級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
- 13 高根才，男，文革前是上海紡織纖維研究所的工人，文革中曾任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常委。

人從早晨9點一直談到下午5點。工人們質問張春橋為什麼要簽訂雙五條，抗議他向造反派讓步「出賣原則」。張春橋寸步不讓，說自己簽字符合憲法。「工總司只要不是反革命就是合法的」，「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並不等於違法」。工人指責工總司的成立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張春橋說：「你們也可以組織起來嘛！」¹⁴ 辯論進行了六小時，毫無結果。會後，這些工人醞釀也成立全市性組織，與工總司對抗。

第二天，11月19日，七百名反對雙五條的工人代表聚集在上海市少年宮，抗議張春橋的雙五條，要求市委領導接見。待曹荻秋趕到少年宮，已是20日凌晨2時左右。國棉三十一廠的李劍鈺也是這些工人代表中的一員。他們提問的矛頭直指張春橋和工總司。曹荻秋回答：「我只支持造資產階級的反，不支持造無產階級的反，如果有人利用組織反對無產階級，他們遲早會暴露出來，落在人民手掌之中。」曹荻秋還說：「你們都是黨員、團員、老工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黨還是要依靠你們的！」工人代表能夠聽出曹荻秋的弦外之音。他們認為曹荻秋希望他們成立組織與造反派對抗。

曹荻秋確實一直希望反對造反派的工人們組織起來。他曾說「造反派人數雖少，但活動能力很強，如果多數派也起來就好了」，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對市總工會主任張祺說「多數派沒有用，為什麼還不起來？」¹⁵ 因此，當保守派工人表示也要成立組織時，曹荻秋心裏的欣喜是必然的。工人代表要向中央

14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 1983 年 9 月編寫的《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供討論修改用第二稿)，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15 轉引自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在 1967 年 4 月 7 日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上的揭發：《曹荻秋、陳丕顯是赤衛隊的後台大老闆》，載於 1967 年 4 月 13 日《大會專刊》，《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合編。

發一份反對雙五條的《抗議書》，曹荻秋馬上答應：「我一定負責轉交中央。」曹荻秋回去後，當即將抗議書交給市委副秘書長，說：「工人要求市委代他們用電報發中央，市委加點說明。」幾天後當曹荻秋在滬西工人文化宮與保守派工人再次見面時，他告訴他們：「我已經轉拍中央了。」¹⁶ 曹荻秋希望中央決策層能聽到底層民眾的另一種聲音，這後來成為曹荻秋的一條罪名。

11月23日，保守派們在楊浦區平涼路526號中共楊浦區委會議室，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上海玻璃機械廠、上海良工閥門廠、國棉三十一廠等23個工廠的工人保守派代表。組織取什麼名稱，良工閥門廠的金瑞章說，他們廠已經成立了「工人赤衛隊」，這個名稱符合共產黨的歷史傳統。¹⁷ 大家都同意他的提議。為了與造反派的「司令部」區別，他們決定不稱「司令部」，而稱「總部」，定名為「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會上決定起草成立宣言和控告張春橋的電報。赤衛隊從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成為張春橋和工總司的對立面。

第二天，11月24日，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在延安西路的市少年宮與上海市委聯繫，要求參加處理安亭事件的市委領導張春橋、曹荻秋以及韓哲一接見。張春橋說自己下午馬上就要回北京，沒空接見。事後他多次對人說：「保守派，我一個也不接見。」¹⁸ 曹荻秋本來事先已經答應參加紅革會的一個批判大會，就不去參加那個批判會。11月25日上午，曹荻秋叫上市委組織部長楊士法，在上海滬西工人文化宮會見赤衛隊籌委會的

16 曹荻秋在少年宮的接見情況引自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17 「工人赤衛隊」是1927年中共發動的廣州起義時，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武裝組織。

18 張春橋1967年1月11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工人代表。¹⁹會上，大家向曹荻秋提了三十多個問題，都是針對張春橋簽字的雙五條，指責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是錯誤的，要求市委收回批發雙五條的市委116號文件。曹荻秋對成立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表示支持，他說：「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成立，我看，你們要成立這個組織，我們也是支持的，你們要成立，我們不反對。」²⁰曹荻秋還建議，在「總部」後加上一個「籌」字，「因為搞籌備委員會比較主動，如果中央一些決定下來，就是說不建立這些組織，那我還是個籌委會，可以馬上主動退卻。」曹的這個建議鑑於中央一再要求工人不要成立跨行業的全市性組織。大家都贊同。²¹比起當初對工總司成立時的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三不方針，曹荻秋對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籌)的傾向溢於言表：「你們建立了這樣的組織，要什麼袖章啊，只要你們成立了這樣的組織，我們承認、支持了你們，當然可以發袖章！」「到那個時候，你們建立時，市委一定派負責同志參加你們的會。所以你們建立這個組織我們完全表示支持的態度。」²²

楊士法對安亭事件直言不諱地表示了反對態度，還說「兩個五條是有問題的，由於我的職務關係，不能再講下去了，我只能講到這裏為止。」²³最後，楊士法對大家說：「你們應該這樣！」他邊說邊舉起了握緊拳頭的雙手，「這樣，才會有力

19 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陳丕顯、曹荻秋是赤衛隊的後台大老闆》，載於《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1967年4月13日聯合編輯的《大會專刊》聯合版第5期。

20 《曹荻秋在滬西工人俱樂部接見部分工人代表時的講話錄音》，轉引自工總司1968年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1968年10月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傳單《揭市委召開的一次黑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駐昆聯絡站，1967年1月11日。

量，一定要組織起來啊！」²⁴ 楊士法又建議：「你們是工人階級，辦公地點還是放在市總工會好。讓總工會給你們找房子。這個問題，由市總工會張祺同志負責。」²⁵

曹荻秋自己對於這次接見是這樣回憶的；

在接見全體代表前的幾分鐘接見了少數代表，他們提出要求建立工人赤衛隊，我當時曾經勸說他們，並告訴他們中央正在開工交會議，據我所知有許多人不同意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組織，如果中央同意這個意見，你們建立起來了，也要取消。後正式接見全體代表，他們對舊市委支持兩個五條提出了意見，對工人造反派提出了意見，我對這些意見作了些解釋工作(解釋記錄舊市委辦公廳打印了一些，可審查此記錄)，繼而他們提出要建立籌備會，對他們的要求，我沒有繼續反對，也沒簽字，但實際是同意了他們。²⁶

會議中途，紅革會紅衛兵打聽到曹荻秋在滬西工人文化宮，便趕來要將曹「借去」參加他們召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就是即將引出解放日報事件的那個大會。²⁷ 曹荻秋被紅衛兵「借」走之前，對工人說：「你們有事可找楊士法聯繫。」第二天，曹荻秋生病；後來直到12月23日赤衛隊人民廣場大會前，曹荻秋一直沒再與赤衛隊接觸。²⁸

24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 1983 年 9 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25 同上。

26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7 當時各群眾組織開會都一定要市委領導出席。最初由市委接待站安排會見時間，後來群眾組織索性自己相互協商，將這些領導「借」來「借」去，一個下午幾個群眾組織輪流「借去」自己的批判會。

28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會後，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籌)負責人在市委機關工作人員陪同下，到愚園路郵電支局，以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籌)的名義，向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和江青發了一份加急電報。電報要求上海市委立即宣佈張春橋與工總司簽訂的雙五條無效，要求開動除廣播台、報刊以外的一切宣傳工具，肅清上海市委剛簽發的關於雙五條的116號文件後果，要求責令張春橋、韓哲一、曹荻秋立即向上海群眾作公開檢查。²⁹ 這份實際對着張春橋的電報，卻表面上抗議上海市委，顯示工人保守派鬥爭策略的改變。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他們公開打出保衛上海市委的旗幟，但是當造反的口號已經逐漸為人們接受之後，他們也起來「造上海市委反」，但造反的矛頭仍是指向張春橋和工總司。

會後，楊士法指定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與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籌)直接聯繫。張將赤衛隊總部辦公室安排在市總工會辦公大樓103室。

三個組織合併為赤衛隊

就在曹荻秋會見赤衛隊代表的同一天下午，上海另一個工人保守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糾察隊」，在徐家匯的徐匯劇場召開成立大會。這個組織得名於1927年共產黨領導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的「工人糾察隊」，由市內82家工廠的群眾組織串聯而成，以上海建築材料研究所為活動中心。參加成立大會的工人代表近千人。市委仍派楊士法出席大會。楊士法坐在主席台上聽着大會發言，覺得這個組織的宗旨和上午他所參加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籌)很像。他對坐在身邊的人說：「上海已經有個工人群眾組織，與張春橋開展過大辯論，組織過幾千人抗議張春橋的遊行，還給黨中央發電報控告張春

29 傳單《急電！急電！！急電！！！控告張春橋直達中央文革小組》，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籌委會，1966年11月24日中午。原文為手抄複寫件。

橋。」大家聽了很興奮，馬上打聽詳細情況。楊士法說：「他們的觀點跟你們差不多，成員以黨團員、老工人、勞動模範為主，你們可與他們聯繫。」

與會者馬上討論，決定派出10名代表，第二天趕到市總工會，找到剛搬到103室辦公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籌)成員。雙方交談後，意見一致，當場決定合併。上海鐵路分局二·七戰鬥隊也加入。於是就在總工會大樓成立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籌委會，簡稱「赤衛隊(籌)」。在聯合會議上，三個組織各報出身和職務，商定科長以上職務不能擔任總部領導。於是確定了赤衛隊總部16名委員。³⁰推選負責人時，大家認為上海鐵路分局二·七戰鬥隊成立早，影響大，擬邀請陳阿春當負責人。陳阿春說自己是分局長辦公室的秘書，如果當頭頭，會使赤衛隊被造反派抓把柄。陳阿春表示自己不當頭，但會盡力為赤衛隊工作，他推薦了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副主任王玉璽。王玉璽於是被推為赤衛隊總部的負責人。此外，還為國棉十七廠保留了一個委員名額。這是王洪文所在的工廠，也是上海舉足輕重的大廠，大家希望這個廠能產生制約王洪文的力量。籌委會還決定在各區、縣設二十八個聯絡站，發展基層隊伍。

上海市委指派市委接待站工作人員周某，作為與赤衛隊聯繫的聯絡員，上海市總工會也派出總工會工作人員徐力作聯絡員。在徐力等人的幫助下，赤衛隊(籌)迅速解決了辦公用具，證件公章、袖章紅布等用品。這些聯絡員以後被作為上海市委操縱

30 筆者根據文革中工總司對赤衛隊的調查、文革中一些傳單小報，參照筆者文革後對一些原赤衛隊總部人員的採訪，匯總赤衛隊總部十六個委員名單以及部分個人情況如下：王玉璽，中共黨員，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主任；金瑞章，良工閥門廠工人；尹平，中共黨員，上海壓縮機廠保衛科幹事；徐雲生，中共黨員，上海第二機電管理局幹事；李品銀，118廠；李詩音，上海試劑一廠工人；郭雲輝，上海華生電扇廠技術員；潘月法，上海玻璃機械廠工會幹事；高根才，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工人；此外，還有丁成江、何建華、何錫鈞、彭光禮、陳如柏、陳文初，朱學增。

赤衛隊的證據。當時市委為了解情況掌握動態，向所有群眾組織都派了聯絡員。向赤衛隊(籌)派的是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向工總司派的是市委工業政治部副主任夏明芳。只是赤衛隊將市委派的聯絡員當作顧問；工總司則不接受，認為是「密探」。

經徐力提議，總部聘請了7名上海著名勞動模範和先進人物當赤衛隊顧問以擴大社會影響。他們是：滬光科學儀器廠工人工程師王林鶴、三輪車工人程德旺、復旦大學電光源實驗室工人工程師蔡祖泉、閘北區果品公司經理勞動模範周信禮、參加過北伐戰爭期間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老工人孫長勝、上海耐酸搪瓷廠技術員勞動模範孟德和、著名共產黨烈士李白的夫人裘慧英。³¹ 列入名單沒有請到的是國棉一廠紡織工人楊富珍，她正在日本訪問；還有海運客輪服務員楊懷遠，他所在的輪船出海了。

赤衛隊(籌)剛成立，全市各工廠就聞風而動，滾雪球般迅速建立了自己廠的赤衛隊，全市的工人保守派全部聚集到赤衛隊(籌)的旗幟之下，迅速匯聚成一股對抗工人造反派的勢力。短短幾天，1966年12月6日，便達到二十多萬人數。³² 這個組織以工人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先進生產者為骨幹力量，思想傾向符合大多數幹部對文革的看法，所以一樹起旗子就得到大多數幹部支持，為赤衛隊提供種種方便。不少工廠的工會將辦公室騰出作為赤衛隊的辦公室；有的幹部在幕後出謀劃策，有的幹部在台前調度指揮，他們都難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傾向。至於普通工人們，有相當一部分人參加了赤衛隊，當然其中不少人是隨大流的。赤衛隊一時在各個工廠佔據了絕對優勢。

赤衛隊迅速發展的同時，正是11月16日至12月3日全國工

31 這七人的名單引自《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成立》，載於《革命戰鬥快報》第二期，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編，1966年12月9日出版。

32 這個數字引自工總司1968年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

交企業政治工作座談會召開期間，這不是偶然。前已敘，這個會上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幹部，都極力反對在工廠企業開展文革，上海派去參加會議的主持工交工作的市委書記馬天水，在會上作了尖銳發言，反對支持工總司等工人造反派組織。上海市委支持赤衛隊，應該和這樣的背景有關。赤衛隊的骨幹成員都是共產黨十七年一貫依靠的對象，市委希望他們能夠制約文革和造反派的行為，進而影響中央的決策。

1966年12月6日，赤衛隊(籌)在人民廣場召開成立大會。近30萬赤衛隊員到會，與赤衛隊同一觀點的上紅總部和上紅大專總部，以及其他群眾組織參加大會助陣，市委候補書記王少庸代表市委出席並致賀詞。

由上紅大專總部紅衛兵起草，陳阿春修改定稿的《赤衛隊的成立宣言》體現它的宗旨：

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條是我們的行動綱領。十六條是毛澤東思想最新體現，是我們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方方針和政策。我們要堅決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十六條。要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敢於革命，善於革命，要堅持文鬥，不許武鬥，向形形色色違反十六條的思想和行為作堅決鬥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關係到中國和世界革命的命運和前途的頭等大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我們必須迎頭痛擊他們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造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生死存亡的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

的階級大搏鬥。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我們工人階級深受舊社會的苦，深感新社會的甜。我們最懂得什麼是壓迫，革誰的命，怎麼革命。不管道路多麼漫長曲折，不論遇到多少艱難險阻，我們一定要頑強戰鬥，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不論過去和將來，誰敢動我們社會主義江山一根毫毛，我們就叫他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廣大革命群眾奮起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告破產了。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不破不立，不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徹底清除這條錯誤路線的惡劣影響，就不能正確貫徹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這裏，不能採取折衷主義。「調和」、「折衷」，就是「混淆黑白」。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是沒有中間道路可走的。我們工人階級一定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一邊，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從思想上、政治上把它挖深挖透，肅清它的流毒和影響。勝利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抓革命、促生產」，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針，一再強調的方針。十六條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動力」。我們要一手抓革命，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鬥倒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們還要一手抓生產，堅守生產崗位，遵守勞動紀律，更出色地完成黨和國家交給我們的生產任務，奪取革命、生產雙勝利。對於一切違反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錯誤行為，我們一定要開展不調和的鬥爭。³³

33 《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宣言，1966年12月6日，載於

「抓革命、促生產」，「要文鬥，不要武鬥」，幾乎可以說是1966年保守派的兩個最具代表性的話語。赤衛隊的這個宣言既宣佈自己的宗旨，又針對着造反派。而宣言中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部分，明顯是為了爭取政治主動不得不加上去的表態，非常空泛。赤衛隊成立後的中心活動就是反對和制約造反派，在不到一星期的時間內，連續召開了三次反對雙五條、控告張春橋的會議，並經上海市委之手向中央發出三份控告張春橋的電報。

與以後多得不可勝數的造反派組織相比，除了觀點不同外，上海的保守派組織有着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即在所有的工廠、學校或單位，保守派的組織都始終只有一個。不像造反派，哪怕只有一個人也會成立一個造反司令部，而且組織與組織之間互不服氣，你攻我砸地打派仗。例如工總司，剛成立就分裂成總部和一、二、三兵團。保守派組織的骨幹成員大都是共產黨執政十七年的積極分子，深受大一統、一元化觀念影響，當一旦知道還有別的與自己觀點相同的組織時，馬上會高興地與之合併。當然，另一個重要原因也不應疏忽，即上海保守派組織存在時間很短，到1967年年初即被造反派全面擊垮，不再被允許存在，沒有遇上以後「奪權」、「結合幹部」等最容易引發不同觀點導致分裂的因素。

赤衛隊總部機關報是《革命戰鬥快報》，由《解放日報》社的編輯丁、賈兩人幫助編輯。第一期上刊登《赤衛隊總部宣言》。前後只出兩期，解放日報事件後停刊；計發行24萬份。

工人中的老保：王玉璽、陳阿春

王玉璽和陳阿春都是上海鐵路分局職工。王玉璽1951年18

《革命戰鬥快報》第二期，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編，1966年12月9日。

歲進上海鐵路局南京站，1953年調進上海列車段當車長，同年入黨。1954年進調度所當調度員，1960年擔任調度所副主任。調度所是鐵路要害部門，調進去的人員非絕對可靠者莫屬。王玉璽能進入調度所並擔任副主任，可見他工作非常負責，也非常被信任。使王玉璽捲進文革漩渦的是安亭事件。他幾十年後回憶時還有些激動：

造反派攔截火車，鐵路運輸停了三十多個小時，一百多輛列車停在鐵軌上，這還叫革命嗎？我所以反對張春橋的雙五條。³⁴

王洪文他們強登的602次車被停靠在安亭，正是經王玉璽調度。11月10日上午，鐵道部要求將造反派強登的602次車就地停靠。王玉璽接到命令後，馬上調度，他先是欲將火車停在黃渡，因為黃渡站有三股道，停了一股，還有兩股可交會。可黃渡站說，通過信號已經鎖定了，他於是安排火車停在黃渡下一站的安亭，安亭站只有兩股道，他就安排火車停在貨運裝卸線。³⁵鐵路分局成立二·七戰鬥隊，王玉璽被推為頭；上海赤衛隊成立後，他又被推為赤衛隊的負責人。

陳阿春出身鐵路世家，父親也是鐵路工人。陳阿春1951年18歲時考進上海司機養成所讀書，畢業後在上海機務段先後當火車司爐、副司機、司機，1954年入團入黨。1959年調上海鐵路分局黨委宣傳部負責理論教育，其間被送到上海鐵道學院政治學習半年。1962年調分局長辦公室當秘書。

造反派在安亭攔截火車之後，陳阿春和上海鐵路分局副局長李殿元連夜去安亭，半夜2點趕到現場。只見車前車後到處是人，兩面大旗十字交叉，插在正線軌道上，鐵軌旁信號燈上蒙

34 本節內容均為筆者2005年12月1日對王玉璽的訪談。

35 同上。

着紅布。天非常冷，陳阿春穿着棉大衣都覺得擋不住寒氣；鐵軌上坐着的四、五個人，動也不動。他和李局長勸說攔車者整整兩個小時，「真是說破嘴皮」。有人被說服了，但有人沒被說服。後來才知道，那個最堅決者是潘國平。張春橋和造反派簽訂的雙五條出來後，陳阿春一開始不相信，認為是造反派編的，怎麼可能攔截火車反而成了革命行動。待到雙五條以上海市委文件名義下發，「我真是大失所望」。陳阿春後來回憶說，自己當初並沒有想到去保過誰，「我既不認識陳丕顯，也不認識曹荻秋」，「我最初就是反對攔截火車」。二·七戰鬥隊那兩張有影響的關於安亭事件的傳單都是陳阿春修改的。所以赤衛隊成立時許多人推他當頭，但他認為自己是「當權派」的秘書，擔任頭容易使赤衛隊被造反派抓把柄，推薦了王玉璽。³⁶

工人中的老保：馬驥

赤衛隊11月26日合併成立時，為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保留了一個總部委員名額，希望這個廠能有制約王洪文的力量。而就在前一天，國棉十七廠的工人保守派已經開始行動。11月25日下午，國棉十七廠「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在工廠俱樂部召開成立大會，參加者五千，帶頭人是馬驥，³⁷ 與王洪文同一個科室工作，也是廠保衛科幹部。馬驥17歲當養成工，共產黨執政後，在夜校入團，1950年考入國棉十七廠的前身裕豐紗廠，先當加油工，後來當統計員，入黨後從車間團總支書記、廠團委委員，一直當到車間黨總支書記，1955年被工廠送去幹部學校培訓，回廠後進保衛科工作。

36 以上情節均引自筆者2005年對原上海鐵路分局局長辦公室秘書陳阿春的訪談。

37 本節關於馬驥的情況和引言，均為筆者1989年7月6日對馬驥的訪談，載於上海歷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發表時題目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王洪文比馬驥小二歲，原是二紡車間治安保衛主任，已經是廠保衛科幹部的馬驥負責聯繫二紡車間的保衛工作，因此和王洪文很熟。後來王洪文也被調到保衛科，兩人關係就更密切了。王洪文寫第一張大字報時，馬驥正好出差去青島，沒有參加簽名。馬驥以後回憶說，他當時如果在廠裏，也會在王洪文大字報上簽名的。因為他對廠黨委也有意見。他以後這樣剖析自己：「我當時的思想比較左，我們這些搞保衛工作的人，工作內容就是抓階級鬥爭，所以思想都有些左。我們廠黨委對那些過去的資本家、小業主一向比較客氣，我們就認為廠黨委在包庇他們。」

馬驥出差回來後，自己一個人寫了一張大字報，質問黨委副書記張鶴鳴幾個為什麼。在以後的一些日子裏，馬驥也和王洪文一起寫過大字報，還和王洪文連夜去國棉十七廠的上級領導機關上海市紡織工業局，告王洪文所反對的廠黨委副書記張鶴鳴的狀。十幾年後，馬驥感慨地說：「我也是最早的造反派。但我和王洪文他們的造反是兩碼事！」馬驥和王洪文到市紡織局告狀後，局裏和市裏先後派來工作隊。馬驥認為工作隊是黨派來的，應該相信工作隊，幫助工作隊。紡織局派來的第一個工作隊支持王洪文，沒多久撤回去了，又由市裏派來了第二个工作隊。這個工作隊既沒有表態支持王洪文，也不批判王洪文所反對的廠黨委副書記張鶴鳴。於是王洪文又反對這個工作隊。馬驥說：「向領導提意見我不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號召大家起來提意見。但我反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馬驥和王洪文的公開分手，是在王洪文成立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後。到安亭事件時，他倆的分歧爆發。馬驥覺得：

王洪文的造反隊中，受過各種處分的人多，我看不慣；王洪文他們把毛主席用來鬥地主的語錄去鬥幹部和黨員，我

不能接受。我覺得，王洪文已經不是在造資產階級的反，而是在造無產階級的反。

幾乎在王洪文的永忠隊成立的同時，10月24日，馬驥也成立了個「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簡稱「捍衛隊」），和王洪文對着幹。永忠隊搶工作隊的材料，捍衛隊就掩護工作隊。「我們認為工作隊是黨派來的，不該亂鬥。」王洪文寫了馬驥很多大字報，批判他是保皇派。馬驥也寫王洪文大字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我們廠裏的造反派》：

我們廠裏有一些造反的勇士們。他們打着「造反有理」的旗號，實際上常常幹出無理的事情。

他們口頭上忠於毛澤東思想，而行動上就是違反《十六條》、違反毛澤東思想。

他們口頭上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千方百計，取消黨的領導。

他們對待不同觀點的同志，動輒勒令、通令，殺氣騰騰，對廣大革命群眾實行訓政，把群眾當阿斗，說老工人是「老糊塗」、「保皇派」、「狗崽子」，把自己當諸葛亮。

他們對揭發他們錯誤缺點的同志，進行逼供信，說這是革命行動。

他們霸佔廣播站，只許他們講話，不許別人發言，把廣播站變成他們的一言堂，這也算革命行動。

他們存心拆工作隊台腳，今天勒令這個回去，明天勒令那個回去，不同意時，竟然以罷工相威脅。³⁸

馬驥這張大字報中對造反派的指責，正是保守派與造反派

38 傳單《我們廠裏的造反派》，「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國棉17廠大隊部」1966年12月4日。

的主要分歧。大字報一出，便被廣泛傳抄翻印。但其實，馬驥當時的思想很迷茫：

我總在想，中央是否知道下面的實際情況？我們這些人都是黨培養的幹部，黨的依靠對象，如果我們對黨的路線都不理解，都灰心了，黨還依靠誰？

最初，馬驥主張只在廠裏和造反派鬥，不主張介入社會上的事件，因為他覺得「社會上情況複雜，我們搞不清」。但是後來王洪文們製造了安亭事件，震動全國，馬驥說：「怎麼攔截火車破壞生產倒成了革命行動？我們反對」，「我們不能不採取行動了！」11月25日，國棉十七廠「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成立，一下子便有四、五千工人參加。而當時，廠裏加入王洪文的造反隊的工人人數還只有一千多人。³⁹ 成立大會結束後，馬驥提出舉行示威遊行。此時是下午2點，正好是早班和長日班工人下班時間，許多下了班的工人加入遊行隊伍。數千名工人排成浩浩蕩蕩的隊伍，從國棉十七廠門口舉着標語喊着口號出發：「抗議張春橋出賣上海工人階級利益」，「雙五條是大毒草」，「抗議張春橋在上海執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後這條標語是馬驥擬的。國棉十七廠所在楊浦區的中共楊浦區委書記高華傑打電話來勸阻，但馬驥他們還是出發了。一路上許多市民加入遊行隊伍，原來只是一個廠的遊行，就這樣變成上海保守派工人的大遊行。遊行隊伍最後來到外灘的市人委辦公大樓門前，要求曹荻秋接見。

我們知道市委領導和我們是一個觀點，但我們不希望被造反派抓住小辮子，說我們是保皇派。我們要求向北京、黨

39 這個一千多人的數字是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1975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中記載的。

中央反映情況，問張春橋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曹荻秋沒去。接待他們的市委幹部要遊行到友誼電影院去。馬驥帶領國棉十七廠赤衛隊在友誼電影院整整三天。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候補書記王少庸前往電影院，同意他們派15名代表去北京。國棉十七廠保守派遊行的情況很快傳到赤衛隊總部，總部委員潘月法趕到友誼電影院，代表赤衛隊總部向他們表示支持。11月28日，由潘月法帶領，馬驥和40名工人組成的赴京控告團出發。上海市委提供了赴京的火車票。臨行前，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叮囑他們，到北京後可以通過上海駐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找到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工交企業座談會的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上海市委顯然希望通過這些工人，再一次向中央反映上海的情況。但是，馬天水此時已經決心造反，拒不與這些保守派工人見面。這些循規蹈矩的工人們上告無門，只得找到全國總工會，要求全總將他們的控告轉交黨中央和國務院。控告團快快而歸。

馬驥感到自己搞不過造反隊，

我們感到自己搞不過造反派。他們會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會打人，我們卻只會實打實地講道理。形勢也越來越令我們不理解，黨中央發的這個或那個文件，越來越使我們搞不懂了。我想，我們的想法中央都已經知道，為什麼形勢還是這樣發展？！

馬驥的迷茫，正是所有赤衛隊員們的迷茫。

工人中的老保：李劍鈺

李劍鈺⁴⁰是赤衛隊發起人之一，他和工總司的發起人黃金海是一個工廠的工人。他生於1939年，1956年進國棉三十一廠的前身申新六廠，當時只有17歲，是申新六廠最後一代練習生。練習生是學習當管理人員的，必須受過小學六年級以上教育，李劍鈺符合這個條件。學習結束後，他當了印染車間的統計員。與馬驥一樣，李劍鈺也因為工作努力受到培養。1957年他被調華東紡織局第二幹部學校進一步學習統計業務。畢業後不久，參軍入伍，在部隊入黨，1963年復員回廠，分配在廠黨委組織科任幹事。

文革開始的1966年8月，李劍鈺正被借調在上海第十八毛紡廠四清工作隊當隊員。雖然人不在國棉三十一廠，但因為住在廠對面的工廠宿舍，每天吃早飯都要進廠區，廠裏的大字報都能看到。他後來回憶說，自己對有些大字報很看不慣：

這些人本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卻對黨委左一個質問，右一個勒令，自己屁股不乾淨，硬說別人整他黑材料，今天圍攻這個廠級幹部，明天圍攻那個黨委委員，每天下班後鬧得很厲害。

當時開展運動都是在下班後。8月初，他寫了第一張大字報《山雨欲來風滿樓》，不同意造反派貼出的一些大字報的觀點。雖未點名，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寫的是誰。大字報一貼出，就受到另一派圍攻，說他的大字報是黨委的「救命稻草」。李劍鈺後來回憶：

40 本節關於李劍鈺的情況和引言，均為筆者1992年7月3日對李劍鈺的訪談，載於上海歷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發表時題目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其實，沒有任何人要我或暗示我寫大字報，我是看不慣，打抱不平。我在黨委組織部工作，對黨委的情況了解，對那些人的情況也了解。我的經歷，我所受的教育，決定了我當時的思想方式：認為矛頭不應指向黨，有意見可以提，但要實事求是，不要把所有的幹部都當作運動對象。

李劍鈺文革後認為，對造反派中有些人，以當時階級鬥爭的觀念看有問題，而文革結束後再看，不是問題，例如父親是國民黨少將，「出身不好」。但是，有些問題至今看來也是問題，例如在廠托兒所管賬，克扣嬰兒奶粉和經費，四清中被責令退賠；又如詐騙別人錢，事情被戳穿後翻爬外國領事館圍牆避難未遂；還有幹活吊兒郎當不負責任，等等，他看不慣：這是道德問題，放到哪個時代都會被指責。

李劍鈺向自己所在的工作隊提出，他想回廠參加運動。10月，他回到國棉三十一廠。不久，上海發生安亭事件，他很不理解。他原來就對張春橋沒好印象，覺得他左，現在又是他簽訂雙五條，將中斷鐵路交通說成是革命行動。安亭事件剛結束的11月15日，李劍鈺就去上海市委和華東局，要求說法。11月19日，他參加了曹荻秋在市少年宮與保守派工人的對話。他向曹荻秋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組織，我們是否也能成立全市性組織？曹荻秋表示全市性組織要看中央決定，建議他們成立籌備性質的組織。

以後不幾天，工廠根據中共中央銷毀「黑材料」的通知，要各方派代表參加。國棉三十一廠是工作隊為一方，廠文化革命委員會為一方，造反派組織為一方。李劍鈺對工作隊長說「我也要參加」。工作隊長反問他一句：「他們代表組織，你代表什麼？」李劍鈺說：「那我們也成立個組織！」隊長說：「你們要成立是你們的事，我不管！」兩人說話是在下午3點，

李劍鈺馬上去出海報、發通知，到下午5點便召開了赤衛隊成立大會。李劍鈺後來回憶說：

我們廠赤衛隊的成立，是我們自己要成立的，造反派有組織，動不動以組織出面，我們沒組織，不能形成力量制約和抗衡他們。我知道，黨委、市委思想感情上是支持我們成立組織的，但他們並沒有直接指示我們。雖然有暗示，但確實是我們自己成立組織的。

為了表明這個組織與「當權派」無關，李劍鈺他們規定：只有人事編制是工人編制的可以參加，基層幹部，只要人事編制是工人，也都可以參加。但是人事編制屬於幹部編制者不能參加，「大多數幹部感情上是傾向我們的，許多幹部要求參加，我們全叫他們別參加，以免被造反派抓把柄。」

赤衛隊迅速發展

另外一些赤衛隊總部常委或委員的情況，也大都和王玉璽、陳阿春、馬驥、李劍鈺等相似：赤衛隊總部常委潘月法，當時是上海玻璃機械廠的工會幹事，赤衛隊總部委員尹平，當時是上海壓縮機廠保衛科幹事，赤衛隊總部常委徐雲生，當時是上海第二機電管理局科室人員。他們都是共產黨在工廠長期信任和培養的對象，許多人是共產黨員，並在工廠的政治部門工作。還有許多赤衛隊的積極分子，也都是工廠科層的人員。雖然是工人編制，但又不同於普通工人。與普通工人相比，他們與領導幹部的關係更密切，手中還有些普通工人沒有的權力，例如保衛或組織幹事，有權調查工人的家庭或本人情況。他們因積極投入各項政治運動而得到信任和培養。他們是共產黨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是共產黨各種政策的終端執行

者；他們是工廠最基層的幹部，是共產黨與普通群眾之間的最直接的紐帶。這種情況在赤衛隊中非常多。只是文革將大多數幹部或科層人員當作打擊對象，許多工廠的赤衛隊都像李劍鈺那樣，規定幹部編制或科以上幹部不能參加。這樣做一方面是怕被造反派說是保皇派，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表明不受當權派操縱，顯示組織的獨立性。否則，赤衛隊中基層幹部的比例肯定會更高。

赤衛隊一時在人數上壓倒了造反派。在國棉三十一廠，安亭事件前，全廠八千多工人中，造反派只有108人，被稱為「一百零八將」。這是中國古典小說《水滸》中對梁山造反者的稱呼。而李劍鈺的保守派組織，儘管成立在安亭事件後，那時造反派已經得到來自中央的支持，但李劍鈺組織的成員還是達到七百多人。⁴¹ 在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參加安亭事件的造反派四百人不到，而馬驥的赤衛隊一成立，便有四、五千工人參加。一些被文革攪亂了工作秩序的系統，赤衛隊員的比例更高。例如鐵路系統，目睹安亭事件以及大串聯造成的混亂，客車車輛段、列車段以及機務段的職工大多參加了赤衛隊；而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八十多名職工，更全部是清一色赤衛隊員。又如郵電系統，安亭事件過後不久，爆發解放日報事件，因不滿造反派硬要郵遞員夾送造反派報紙，大多數郵遞員加入了赤衛隊。

勞動模範、先進人物成為赤衛隊員的更是非常多。1968年4月，工總司曾經對上海部分工業、市政、交通系統的勞動模範以及五好工人的情況作過調查：

共調查89個單位，110人(其中黨員100人，共青團員2人)：原來參加過赤衛隊的有31人，佔28.2%；其中擔任顧問的9人。⁴²

41 筆者1992年7月3日對李劍鈺的訪談。

42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1968年4月22日《情況調查》，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這個調查把1962年至1965年上海評出的五好工人也算了進去。五好工人當時的評比面，佔當時工人總人數的10%，條件比較寬；而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的評比面只佔0.1%。所以如果不算五好工人，則勞模、先進人物中參加赤衛隊的比例還會高得多。這些勞模、先進人物是由黨政幹部千人挑一選出，被作為全社會學習楷模，有着很高榮譽，並在提級提薪以及技術和政治培養等實際利益方面，有着普通工人所沒有的優先權。他們必然在感情上傾向於那些黨政幹部。受這些勞模先進人物影響，他們所在工作部門的同事加入赤衛隊的人數也相當多。如紡織行業著名先進人物楊富珍，所在小組的工人絕大多數參加了赤衛隊；著名先進人物、三輪車工人程德旺，所在車隊的二十多個工人除一人外，全部加入了赤衛隊。⁴³ 到1966年12月中旬，赤衛隊成員迅速發展到40萬人，最多時號稱達到80萬。而當時上海全市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職工人數是271萬。⁴⁴

許多人最初組織或參加赤衛隊，就像馬驥和李劍鈺他們一樣，是對造反派看不慣，尤其不滿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造反派組織成立後一系列的反規則行為，讓平時遵守秩序的人們不能接受。他們被造反派稱為老保，視為反文革勢力。其實他們真心擁護文化大革命，就像他們過去擁護每一次政治運動一樣；在1966年6至9月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階段，他們中許多人響應號召積極投入運動，寫了許多大字報。但大多數普通工人參加赤衛隊，則更多只是出於政治表態，表達自己對黨委的忠誠態度。而且當時赤衛隊人數比造反派多得多，赤衛隊中黨團員等一向受共產黨重用信任的積極分子又非常多，底層群眾當然會覺得，加入赤衛隊是最安全的政治選擇。著名先進人物

43 《上海市 1968 年「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發言稿匯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4 《上海統計資料簡編》，上海市統計局 1979 年編，上海市檔案館。

程德旺，後來在赤衛隊被解散後，曾在一次大會發言中這樣分析自己當初加入赤衛隊的動機，很有代表性：

赤衛隊總部成立時，我看到主席台上都是熟悉的五好工人，覺得這個組織的人員不錯，就也參加了，並同意當顧問。⁴⁵

可以說，赤衛隊中真正佔多數的就是這些「隨大流」者。也正是因為大多數人都在隨大流，所以當以後造反派得到毛澤東的明確支持後，造反派成為大流，人們又轉而去隨造反派的大流。

赤衛隊成立後，市委要求上海市總工會與之聯繫，並在上海市總工會辦公大樓騰出一間辦公室供赤衛隊使用。市總工會主任張祺對市總工會副主任周炳坤說：是曹荻秋通知決定的，要把赤衛隊放在市總工會。⁴⁶ 不過，曹荻秋後來的檢查中說，將赤衛隊總部辦公室設在市總工會，是楊士法決定的，後來因為工總司反映說市委支持赤衛隊多，支持他們少，「經查，才知道他們掛鉤在總工會，我們認為不妥當，改由工人革命組織聯絡站負責。」⁴⁷ 赤衛隊總部的辦公室於12月初，搬往地處閘北區的番瓜弄47號；後來又搬往皋蘭路接待站。

市委確實給予赤衛隊大量物質支持。不但為其在市總工會安排辦公地點，還立即送去筆墨紙張、打字機、油印機等許多辦公用品以及自行車。以後又用總工會的吉普車送去紅布50匹，還請了6名工人日夜為赤衛隊趕製袖章。⁴⁸ 據造反派後來揭

45 《上海市 1968 年「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發言稿匯編》。

46 轉引自工總司 1968 年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中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周炳坤的揭發，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1968 年 10 月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7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8 轉引自工總司 1968 年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中赤衛隊總部委員金的揭發。

發，曹荻秋一次就批款4萬元給赤衛隊。⁴⁹ 市委要市總工會派人聯繫赤衛隊，總工會於1966年11月26日派出工作人員徐力作為聯絡員。徐曾問張祺，他與赤衛隊聯繫時，可否發表自己的看法，張答：「可以影響他們。」徐請示對赤衛隊的經費如何掌握，張答：「工會錢那麼多，現在是用脫一點的辰光了。」於是十天內市總工會向赤衛隊提供了12.5萬個袖章。⁵⁰

市委將赤衛隊看做「自己的」組織，甚至還曾有讓赤衛隊代替總工會的設想。⁵¹ 市委希望即使不能像文革前那樣領導，也要在政治路線上施加影響。市委工業政治部副主任楊慧潔打電話給徐力：「你們對赤衛隊要加強政治領導，不能光做物資供應站！」楊並要市總工會增派一名處級幹部去加強聯絡員工作，說只有普通幹部徐力一人聯繫，力量太小。於是又派去市總工會的一個副部長施鉅康。還叮囑市總工會副主任周炳坤，必要時周應該親自「去做赤衛隊負責人的工作」。⁵² 就這樣，從赤衛隊成立後到康平路事件，短短一個半月時間裏，上海市委先後派出了5名聯絡員。幫助赤衛隊出謀定計，幫助制定宣言，修改發言稿和一些批判材料。⁵³ 曹荻秋以後承認自己對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感情上確實有不同；

認為青年的政治思想沒有定型，還在變化過程多數派、少數派中都有左、中、右，不能過早地認定誰是左派。我喜歡多

- 49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揭發材料匯編》，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1967年3月25日。
- 50 轉引自工總司1968年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中市總工會派往赤衛隊的聯絡員徐力的揭發。
- 51 轉引自工總司1968年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中市總工會主任張祺的揭發。
- 52 轉引自工總司1968年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中市總工會副主任周炳坤的揭發。
- 53 轉引自工總司1968年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中赤衛隊總部委員王某的揭發。

數派的黨團員多，基層幹部多，成份好，過去是我們的依靠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樣也是我們的依靠力量，這個力量在鬥爭中可能出現真正的左派，或成為左派的核心。……

認為少數派的成份複雜，不能作為依靠力量。⁵⁴

認為少數派造反精神好，但不注意政策，不講究鬥爭策略。多數派注意政策，講究鬥爭策略，但造反精神差。這說明我不是首先肯定敢於革命，而是過多強調善於革命；不是首先肯定鬥爭的大方向，而是過多的注意枝節問題。……

實際我是偏於多數，喜歡多數派，更多的支持多數派，並希望在中多數派中出現真正的左派（因為他們當中黨團員多）。……

多數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幟舉得不高時，總希望他們的旗幟舉得高些。對少數派是不喜歡的，當他們取得勝利時，我就不高興，他們遭到失敗時，就高興。有時，我也說要多做少數派工作，目的並不是把他們作為依靠力量，而是要使他們變得溫和些，甚至使他們發生分化。⁵⁵

這不但是曹荻秋的感情趨向，也是當時大多數幹部的感情趨向。

洪雙壽事件和色織二十四廠事件

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成立了自己的組織，雙方摩擦越來越頻繁。1966年12月1日，上海玻璃機械廠的造反隊搶「黑材料」，廠裏的赤衛隊前往制止，雙方發生衝突。附近工廠的造反隊和

54 《曹荻秋的假檢討》，載於《上海黨內頭號走資派陳丕顯、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檢討》，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大會印，1967年7月。

55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赤衛隊全都聞訊趕來。赤衛隊要打電話給上海市委，造反隊割斷電話線，又引起衝突。一個名叫洪雙壽的赤衛隊員，從一輛駛出廠門的造反派的卡車上摔下，當場重傷去世。這是上海兩派衝突中發生的第一次死人事件。赤衛隊認為，洪雙壽摔下來時，手中還緊握着被造反派割斷了電話線的電話筒，他是因為抗議造反派的行為，被造反派綁架上車的，卡車急轉彎時，他被顛出車子，所以造反派要對他的死負責。造反派則分辯，洪雙壽是自己上車的，他大概不知道這輛卡車是造反派的，所以他的死，造反派沒有責任。

赤衛隊總部得到消息後，立即派人到現場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匯報市委。赤衛隊總部打算組織抬屍遊行，向工總司抗議。上海市委得知後，擔心擴大事態，加深兩派矛盾，立即要求市總工會派幹部趕去勸解。市委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和中共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第二天也前往說服。總部負責人聽從了市委的規勸，取消了組織遊行的計劃，改為12月2日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抗議集會。會後，王一平和市總工會主任張祺，與赤衛隊總部負責人一起去萬國殯儀館看望死者家屬。家屬要求將洪雙壽追認為「革命烈士」。市委認為不能開此先例，但同意撫恤條件可以比因公死亡優越一些。

赤衛隊與工總司另一次衝突，是在1966年12月8日。那天晚上，赤衛隊長寧區聯絡站給總部打電話，說上海色織二十四廠的造反隊從外廠調去很多人，與廠文革委員會和廠赤衛隊發生衝突，還打傷一個女赤衛隊員，現在醫院。晚上，總部又接到色織二十四廠赤衛隊打來的電話，說造反隊與赤衛隊發生衝突，情況嚴重。

色織二十四廠地處長寧區，事情的起因是駐該廠工作隊的撤離。12月3日，市委召開派駐全市工廠企業的四清工作團和工作隊負責人會議，宣佈工作隊不再領導工廠企業文革。第二天，12月4日，全市工作隊奉市委統一佈置，一夜之間全部撤出

所駐工廠企業。色織二十四廠工作隊在撤出時，遭到廠裏造反隊阻攔。造反派認為工作隊撤出前將「黑材料」移交給了廠黨委，要求交出黑材料，攔着工廠大門不讓工作隊離開；該廠赤衛隊前往解圍，雙方發生衝突。

文革初期，因「黑材料」問題，在許多學校和工廠都發生衝突。後來，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文，要求工作隊或各級黨組織銷毀文革中整群眾的材料。但在如何界定「黑材料」時，又發生分歧甚至衝突。共產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鼓勵和發動人們相互告密揭發，文革初期也是如此。這些告密的材料如果被當事人看到，肯定會引發矛盾和仇恨。曹荻秋後來解釋說：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眾起來貼了黨委、工作組的大字報，有的黨組織和工作組不是積極支持他們，而是把矛頭對準他們。他們有的遭到了大字報的圍攻，有的被迫作了書面檢討，有的被批判鬥爭，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有的沒有遭到這樣的對待，但對他們排了隊，整理了材料，準備「秋後算賬」。這些鎮壓革命群眾的反動行為，我們過去是認識不足，估計不夠的，以為上海公開打成「反革命」的不多。其實，採取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把革命群眾變相的打成「反革命」，準備把他們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則為數不少。……

以後的事實證明，有的黨組織並沒完全交出而卻隱藏了一部分整學生、整群眾的材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被全部交出。同樣，對整學生、整群眾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讓造反派群眾看的，但怕引起群眾鬥群眾而堅持不讓看，也加深了兩派之間的對立，造成群眾鬥群眾。⁵⁶

56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色織二十四廠事件就是這種情況。當時這個廠造反隊員五十多人，赤衛隊員則有二百多人，兩派衝突，力量懸殊。戴立清接到求援電話後，和自己廠裏的一個造反派工人趕去該廠支援，也被保守派包圍。戴立清隨即打電話向工總司總部和工總司長寧區聯絡站求援；色織二十四廠赤衛隊也向赤衛隊總部和赤衛隊長寧區聯絡站求援。雙方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這場衝突背後，還有另一個原因。當時社會上盛傳工總司要對所有十七級以上幹部抄家，並衝砸全市各級赤衛隊組織。事後證實這個消息是假的。但當時赤衛隊總部信以為真，當天晚上開會討論對策。決定：「造反隊搞當權派我們不管，如果搞赤衛隊決不讓步！」⁵⁷ 接到告急消息後，赤衛隊總部立即調集幾萬人對色織二十四廠進行反包圍。戴立清等人被圍困在色織廠裏整整兩天。無法脫身的戴立清，向廠裏女工們要來箍髮辮的橡皮筋，做成彈皮弓，將求援的紙條彈射至廠邊小河對岸。後來，廠外的造反派，調來了工總司一些區聯絡站的造反隊員，終於為造反派們解了圍。⁵⁸

這場衝突持續一個多星期，造成色織二十四廠停產多天。眾多的赤衛隊員前往包圍色織二十四廠，脫離自己的生產崗位多天。以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為己任的赤衛隊，終於逐漸偏離自己最初的宗旨。

57 轉引自工總司 1968 年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

58 在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中，認為戴立清去調來臨時工組織「紅工司」；紅工司組織部長孫福祥文革後的回憶錄《我的文革生涯》中，也說 1966 年 12 月 8 日他們正在文化廣場召開大會，晚戴立清去會場向他們求援。但是，筆者 2007 年 9 月 8 日採訪戴立清時，戴立清說他沒有去找過紅工司，說他當時被圍困在色織二十四廠無法脫身。

小結

文革後，許多人將保守派說成是共產黨的忠實擁護者，這樣的評論似乎過於政治化。保守派反對造反派，確實有對共產黨十七年統治的擁護，以及對共產黨幹部的肯定。但是如果進一步分析，剝去那些帶有強烈時代特徵的話語外殼，人們可以感受到保守派思想的核心，是反對文革對秩序和權威的顛覆，反對暴力和無序。赤衛隊並沒有提出在黨委領導下開展文革，他們反對的是激進的革命。而敬畏既有權威和秩序，尊重既有價值和現實，這樣的政治性格，是一切社會的保守派所共有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這些文革最初的反對派稱作保守派，是比較確切的。這是保守派最可貴的價值，也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文革拋棄這些穩定因子，社會動蕩不可避免。

但是，保守派所反對的只是文革中的過激行為，以及造反派的個人品質，而不是文革本身。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陷入無法逾越的混亂：他們所捍衛的正是文革的對象，他們所反對的卻是文革的動力；但是他們並不意識到自己是反對文革，反而以文革積極參加和擁護者的姿態出現。因此在文革初期與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較量中，只要他們被指責是反對文革，便會下意識地檢查和糾正自己。這使他們的行動始終充滿着矛盾。

保守派捍衛的是共產黨和政府的權威，而在事實上，他們捍衛的更是評判革命行動和共產黨依靠對象的標準，因為這涉及他們自己以往被共產黨賜予的一系列革命名份，以及在政治分層中的地位。因此，1966年底保守派與造反派的鬥爭，是對政治名份解釋權的爭奪，從而也是對政治名份地位的爭奪。

對大多數參加保守派的底層群眾而言，參加保守派組織，是最安全也是成本最低廉的選擇，這是他們從十七年歷次政治運動得出的經驗。1966年10月前，中央決策層中的文革派言論，雖然直接和群眾見面，但決策層中的反文革勢力尚在位，

他們的言論也直接與群眾見面。而此時，毛澤東對各級幹部的態度還不是十分清晰。這使本來應該十分清晰的文革決策信息顯得不確定，解讀不一。最安全的選擇，就是繼續跟着原來的權威，即還在台上的那些幹部。這是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只是這一次，這個經驗暫時地失效。

與文革中崛起的造反派組織相比，保守派組織的最大不同，在於它與地方黨組織的聯繫。1966年康平路事件後，造反派將赤衛隊說成是上海市委和各級黨組織一手扶植的，這種指責不是沒有依據。從許多材料看，市委和各級黨組織對保守派組織確實大力支持：工作隊長的暗示，曹荻秋의默許，都傳遞了這種認同；不像他們對工總司那樣，從一開始成立就堅決明確地表態不贊成不認同。而從另外一些材料中，甚至還可以感受到，市委是怎樣急切希望保守派能盡快成立組織，以及希望將赤衛隊的活動納入自己的政治需要。

但是，與文革前的群眾組織相比，文革中保守派組織的最大不同，又在於組織的自主性。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至1968年底，是共產黨執政後唯一允許自由結社的時期。不但造反派組織一哄而起，就連循規蹈矩的保守派，也紛紛成立自己的組織。正因為這些組織是工人自己拉起來的，因此必然比過去被各級黨委牢牢控制的所謂群眾組織如工會等，有着更多的自發和自主性：領導成員完全由自己推舉，參加人員的條件完全由自己決定，不必報黨委批准。而且這些保守派組織不像文革前的工會那樣完全由市委掌控，市委說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市委說不該幹什麼就不幹什麼。赤衛隊的行動並不經過市委的同意，也無須經過市委批准。赤衛隊所有大的行動都是自己做出決定，市委最多只能施加影響，但無法操縱指揮。這正是赤衛隊與文革前工會等「群眾組織」的最大區別，也正是文革初期各省市和基層黨的權威和權力下降的又一具體體現。

第十一章

解放日報事件

工人造反派取代紅衛兵

聶元梓以常溪萍為突破口

11月20日，上海來了兩員文革猛將——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聶元梓，還有北大「捍衛團」的孫篷一。孫篷一在北京大學造反派中屬強硬派，因為是上海人，所以陪同聶來上海。聶元梓此行的第一目標是常溪萍，來上海的當晚，她便在華東師範大學召集紅衛兵座談會，說原華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是叛徒，出賣北京大學社教運動；上海市委包庇常溪萍，心中有鬼。

常溪萍原是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副部長，兼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1964年奉調帶領40名從上海各高校抽調的幹部參加北京大學社教運動，任北大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黨委副書記兼西語系工作組長。北大社教工作隊一進駐北大，就讓校黨委書記陸平靠邊，並根據「群眾的揭發材料」，揪鬥校、系兩級五十多名負責幹部，還一律規定要在十天內形成批鬥高潮。常溪萍認為運動打擊面過大。1965年2月，他回上海過春節，向上海分管文教的市委書記張春橋和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談了自己對北大社教運動的看法，張、楊都同意，認為他的這些意見，可以向北大工作隊提出，也可以向直接領導北大社教運動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反映。

但是，常溪萍回去向工作隊負責人、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提意見後，張不但拒不接受，反而將常調離西語系。常於是先

後兩次寫信給張春橋和楊西光，表示要向中央反映情況。這封信，先由張春橋圈閱，然後由上海市委書記處討論，一致同意常給中央寫信。常溪萍於是給分管北大社教的鄧小平與彭真寫信，信中主要內容，就是反對把什麼都往階級鬥爭上靠，不同意打擊一大片。鄧小平對常溪萍的信作了批示，1965年4月，中央撤換張磐石，解散原來的工作隊，增派常溪萍與許立群、陸平、彭珮雲等人組成九人領導小組，對前階段運動重新調查核實以及平反。常又提出不要整肅前一階段過於激進的教工，責任不在他們。常溪萍在北大的表現，令中央對他器重，中央組織部打算提拔他任高教部副部長。但上海市委捨不得放，將他從上海教育衛生部副部長提升為部長。

北大社教運動的軌跡與聶元梓有點關係。當初工作隊進北大前，張磐石曾在北大作過一段時間調查研究，據說開頭查不出什麼「情況」，後來聽了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的建議去看幹部檔案，發現「北大黨組織嚴重不純，許多壞人混入了黨內」，於是根據這個基調揪鬥幹部。常溪萍給中央的信就是希望制止這樣的揪鬥。北大社教運動一年後，文革開始，北京市委和彭真、北大黨委和陸平，因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被毛澤東讚揚而受到衝擊。聶元梓於是將常溪萍與彭真、陸平聯繫起來，說常溪萍向鄧小平和彭真寫信反對張磐石，是「出賣北大的社教運動」，所以「是北大社教的叛徒」。¹ 鼓動北大哲學系一些教師給常溪萍貼大字報。

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的妻子曹軼歐，將他們的大字報寄給在上海的張春橋。上海市委接信後沒有馬上討論。二十多天以後，北大寫大字報者見上海方面沒有反應，又寫了份大字報《常溪萍在北京大學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更稱常溪萍是「鎮壓北大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劊子手」。這次聶元梓也簽名，並於7月26日將大字報交給前往北

1 聶元梓 2005 年著《聶元梓回憶錄》。

大召開大會的江青，說一個月前已經送去一篇大字報，未見動靜。聶元梓要求中央文革幫助將這篇大字報轉上海貼出，江青立即答應。江青將大字報交張春橋，張春橋第二天交給來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曹荻秋。曹荻秋請示鄧小平，因為當初就是鄧處理北大社教問題的。鄧小平說，北大社教問題中央書記處已經作了處理，這個問題不要再挑起，大字報不要送回上海。

上海市委不打算貼出大字報的消息，江青很快得知。會議中途，江青找到曹荻秋，要上海一定將聶元梓的大字報貼出：「如果不在華師大很快貼出來，你們市委要被動！」張春橋也寫條子給曹，要他回去後馬上和市委討論，「不然很被動」。²張春橋在上海工作時是文教書記，常溪萍是他的部下，聶元梓批判常溪萍，就是從張春橋曾經負責的系統打開缺口。張春橋要曹荻秋趕緊將聶元梓的大字報貼出，看來是想以這個姿態，撇清常溪萍與自己的干係。當時，市委秘書長李家齊曾經再次向在北京的張春橋打電話，請示如何處理常溪萍之事，張春橋一聽是問這事，沒有任何回答，咔嚓一下馬上就把電話掛了。³

8月13日，曹荻秋不得不讓秘書從北京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處，讓將聶元梓等的大字報貼出去。還要求對常溪萍做點工作，使他思想上有準備。8月14日，市委將北大送來的兩份大字報分別貼在市委教衛部和華東師範大學，同時停止常溪萍的上海市委文化革命小組成員職務。曹荻秋頂着壓力，冒着風險，盡可能地保護常溪萍。甚至在貼出聶元梓大字報後的第三天，8月16日，他從北京開完八屆十一中全會回上海，特地趕到華東師範大學，頂着潮水般批判常溪萍的大字報，對學生為常說好話：「常溪萍是好同志」，「市委是信任常溪萍的」。⁴還說：

2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109 頁。

3 這件事是當時擔任上海市委秘書長的李家齊 2008 年 3 月 5 日親口告訴筆者的。

4 轉引自《向以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登載於

「當一個幹部沒有發現重大問題之前，應該信任他，很好地使用他」。⁵但這一切努力沒有成功。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華東師範大學貼出後，不僅在華師大，而且在全市大專院校引起震動，也陷上海市委於極大被動。前往華師大看大字報的人絡繹不絕，同時，一批又一批的大專院校師生湧往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回答與常溪萍的關係。僅大字報貼出後的第二天，8月15日，就有47批260人去市委質問。激進的師生質問市委：是否知道常溪萍在北大的問題？為什麼要提拔常溪萍擔任上海教育衛生部長？北京大學的大字報是7月寫的，為什麼到8月才貼出？市委說要讓常溪萍到北京去接受審查，是不是幫他逃避上海的批判？等等。各校都有學生貼出勒令，要校黨委或市教衛部派出的學校工作組，交代與常溪萍的「黑關係」。

8月29日和30日，常溪萍連續在市委教衛部和華師大作檢查。獲得許多師生的諒解，認為是「好人犯錯誤」。但還有許多激進的師生不肯放過他，認為聶元梓的大字報不會沒有根據。

此時正值北京紅衛兵南下，這些來自首都的欽差大臣，將常溪萍作為炮轟上海市委的重磅炮彈。而當時還在北京的聶元梓，聽說常溪萍在上海打而不倒，而且還有不少同情者，便在9月又寫了一份長達八千字的大字報，題目是《常溪萍在北大社教運動中是個叛徒，是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鎮壓北大社教運動進行反革命倒算的急先鋒》，聶元梓等17人簽名。據說，聶元梓自己稱這是「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⁶

聶元梓領頭簽名的第一張大字報被毛澤東肯定，在一段時間裏成為文革的偶像，尤其青年學生對她十分崇拜。她寫常溪萍的大字報，張張都是對常溪萍的致命打擊。聶元梓來上海後

《革命造反報》大會特刊第一版，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11 月 24 日。

5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

6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 760 頁。

對人說，她來上海目的就是揪常溪萍，「常溪萍問題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鄧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陳丕顯為首的上海市委」，她不但要揪常溪萍，還要通過常溪萍打擊上海市委。⁷

聶元梓到上海後，擺出一副指導上海文革運動的姿態，引起上海一些群眾組織的反感。甚至張春橋也對聶元梓很反感，打電話給王力問：怎麼回事？聶元梓為什麼打着中央文革旗號？為什麼有事不同我商量？王力據此認為張春橋不贊成聶元梓在上海的做法。⁸

紅革會佔領解放日報社

11月下旬，市「紅三司」準備召開成立大會，邀請聶元梓參加。聶元梓建議他們將大會開成批鬥常溪萍和批判上海市委資反路線的大會。

「資反路線」，全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提出的，林彪當天在天安門城樓的講話中號召對其徹底批判，肅清影響。不過，真正的提出者是毛澤東。毛澤東認為文革的阻力來自黨內幹部的抵制，這股抵制力量，經張春橋、陳伯達的討論修改，經毛澤東同意，定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北京的「紅三司」召開十萬人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大會，並作重要講話。10月8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旨的工作會議，繼續克服來自各級領導的阻力，文革進入又一高潮。先前囿於「出身」、

7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118 頁。

8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 759 頁。

「成份」的學生或職工，終於被解除了因政治名份而不准革命的枷鎖。群眾真正被發動起來了。

11月22日下午，上海紅三司在文化廣場召開「向以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暨「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大會，參加者據他們自己說有一萬五千人。紅三司負責人安文江主持大會。大會將曹荻秋、楊西光、楊永直、常溪萍、以及上海市教育衛生工作部副部長兼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姚力揪入會場，聶元梓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講話」。聶元梓聲討上海市委對她那兩張大字報的抵制，聲明他們此行上海目的就是揪出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會後，紅三司印發大會特刊，登在11月24日出版的紅三司小報《革命造反報》上，套紅，與《解放日報》等正式報紙同樣大版面。當時的小報都只有四開，這是文革中上海第一張對開的紅衛兵小報。「暴風雨般的掌聲」這句話就是這期大會特刊上形容的。紅三司向市委要求將這期《革命造反報》夾在《解放日報》中一起投遞，市委同意並照辦了。這也有先例：之前赤衛隊的《革命戰鬥快報》便是與《解放日報》一起投遞的。11月15日，投遞人員在每份《解放日報》裏都夾送一份《革命造反報》。⁹《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被稱為黨報，發行量較大，不但機關、工廠公費訂閱，還有非常多的個人自費訂戶，是當時上海發行量最多的官方大報，另一份報紙《文匯報》，面向知識界，發行量小些。

不想，11月25日，《革命造反報》隨《解放日報》夾送當天，便受到訂戶抗議。僅報社的編輯部就接到六百多個質問電話，說我們訂的是《解放日報》，夾送其他造反派報紙是強迫我們閱讀。接着，保守派紅衛兵集會，抗議市委夾送造反派報紙。而郵遞工人也抱怨說，夾送造反派報紙加重他們的郵包，

9 傳單《兩位工人同志談〈解放日報社〉裏發生了什麼？》，上海交通大學工農兵革命縱隊、徹底革命戰鬥兵團、革命先鋒隊，1966年12月4日。

加大他們的工作量。當時相當一部份郵遞員都是背着郵包步行投遞郵件，其餘也是騎自行車投遞。市委此時也意識到夾送口子一開，以後可能會引出更多夾送要求。於是就勢當場檢討，郵局也作檢討，並將檢討印成傳單隨報附送訂戶。¹⁰

市委沒有想到門既已開，再關上就沒那麼容易。就在市委檢討並表示不再夾送造反小報的當天，11月25日，又一個「徹底埋葬以曹荻秋為代表的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召開。也在文化廣場，也號稱到會者1.5萬人，也將曹荻秋揪到會場，也邀請聶元梓等出席並講話；不同的是，還請了清華大學的著名紅衛兵造反派領袖蒯大富。這個大會的組織者，為首者是紅革會。會後，紅革會提出，也要印大會特刊，市委同意了；版面也要套紅對開，市委同意了。11月28日，作為大會特刊的《紅衛戰報》第9期印刷出版。紅革會又提出，也要隨《解放日報》夾送發行。這下市委沒有同意。¹¹ 紅革會要求一起發行，理由是這期《紅衛戰報》上有一篇文章《〈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所以要「《解放日報》放毒到哪裏，《紅衛戰報》就消毒到那裏」。

《紅衛戰報》是紅革會的機關報刊，1966年10月12日紅革會成立大會上，市委書記陳丕顯簽字同意《紅衛戰報》出版。創刊時，編輯部設在復旦大學紅旗樓，後為了印刷方便，將編輯部設在文匯報社。編輯人員主要由復旦大學新聞系、歷史系、中文系的紅革會成員組成，還有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華師大和交大也有學生參加。¹² 最初版面是四開，第一期

10 傳單《解放日報事件真相》，「解放日報社革命工人、革命幹部」，1966年12月9日。

11 筆者估計，市委當時運轉艱難，聯繫失靈，曹荻秋被大會批判，可能來不及知道當天市委對夾送紅三司《革命造反報》的檢討，所以簽字同意紅革會要求。

12 關於《紅衛戰報》編輯成員的情況，引自筆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與勞元一的電話談話。

由紅革會編輯出版，第二期便與中學紅衛兵組織紅上司合辦。據說這是上海市委的安排，說是大學紅衛兵組織與中學紅衛兵組織一起辦報，可以節約紙張。¹³ 原定創刊號只印2萬份，最多不超過6萬份，但第7期發行量已達到了8萬份，第9期特刊，版面擴大到對開，甚至達到65萬份，遠遠超過當時《解放日報》的平均發行量。

特刊出版的前一天，紅革會派代表到市郵局的報刊發行處，要求隨《解放日報》夾送發行第9期《紅衛戰報》。報刊發行處連忙請示市委，市委拒絕。曹荻秋對此後來解釋：

我們當時之所以拒絕這個要求，主要是我們曾經同意過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所辦《革命造反報》同《解放日報》一起發行，遭到了多數派和一部分《解放日報》訂戶的反對。為了避免來自這方面的反對，我們同意兩報分開發行，拒絕了紅革會一起發行的要求。¹⁴

除了夾送紅三司《革命造反報》引出的訂戶抗議，周恩來的一個講話，可能也是市委拒絕紅革會夾送要求的底氣。周恩來11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的一次接見中，要求紅衛兵不要干擾報紙的正常工作。說有意見可以貼大字報，但不要中斷它們的業務。¹⁵

市委不同意夾送，紅革會便「採取行動」。11月29日晚上10時許，由勞元一帶隊，摩托車隊開路，三百多人的自行車隊隨後，湧到蘇州河北岸郵電總局的市報刊發行處。他們再次要求夾送，再次遭到拒絕。紅衛兵們於是搶去郵車的鑰匙，關上

13 這是紅革會負責人馬立新文革後告訴筆者說的。

14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檢查》。

15 傳單《中央文革小組同志證實周總理關於不要干擾報社的緊急指示千真萬確》，文匯報部分革命群眾，1966年12月3日下午6時，《井岡山》戰鬥隊翻印。

郵電總局的大門，不讓郵車進出，接着，又有幾百名紅衛兵趕來，團團圍住了郵電總局，但郵電總局頂着不鬆口。紅衛兵們於是換個地方，來到不遠的解放日報社，找解放日報社的總編輯馬達談判，提出三項要求：

- 一、《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內一起發行，版面要與《解放日報》一樣大小；
- 二、《解放日報》必須全文轉載《紅衛戰報》的文章：《〈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
- 三、把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和市委對報社的指示告訴他們。¹⁶

馬達當然不同意，作為黨報總編輯的他，必須與市委保持一致。紅革會總部馬上召開常委會，決定進駐報社，逼迫報社同意他們的要求。凌晨1時左右，從各學校調來的大批紅衛兵，由市紅革會常委、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李功佐帶隊，進入漢口路274號解放日報社大樓，佔領了樓下的發報間，說如果報社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就不准當天的《解放日報》發行。天亮以後，湧進報社的紅衛兵越來越多，辦公室、會議室、禮堂和印刷車間到處是紅衛兵，已經印刷好的報紙，也被紅衛兵扣住不准發行，報社工作被迫停止。

在報社造反派的幫助下，紅衛兵們找到了報社大樓裏集中張貼職工大字報的地方。其中，報社採訪組體育部記者關震民寫的大字報《從報社中的問題看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使紅衛兵們大有收穫。¹⁷ 這張八千字的大字報把上海

16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182 頁。

17 馬達著《辦報生涯 60 年》第 44 頁，文匯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所有傳媒：《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青年報》、《黨刊》和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絕大部分前任和現任總編輯、副總編輯一網打盡，說他們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首要分子」，還說市委控制和扼殺報社運動，通過報紙「對紅衛兵進行隱蔽的鬥爭」，「運用報紙進行反文化革命的宣傳」。紅衛兵們原來對新聞媒體內情並不了解，這張大字報的信息被他們認為非常豐富而又及時。於是立即轉抄、翻印和張貼。當時，所有批判《解放日報》的大字報和傳單，論據和事例全部都引自這張大字報，無一例外，再無第二個來源。

經過整整一天活動，紅革會宣佈：「現在主要矛盾變了，不僅是發行《紅衛戰報》的問題了，我們現在是要佔領解放日報社，批判《解放日報》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佔領了二樓一間會議室，成立火線指揮部。《解放日報》被勒令停止發行。消息傳開，上海幾乎所有的造反組織都紛紛前往聲援：同濟東方紅的陳敢峰¹⁸，率領一百多人進駐報社；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上體司」）胡永年¹⁹，帶領「尖刀班」以先遣隊名義進入報社參加火線指揮部；赤衛軍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赤革會」），組織了一千多人前往解放日報社門口，遊行聲援紅革會；與紅革會合辦《紅衛戰報》的中學紅衛兵組織紅上司，更是動員了幾千中學生，在解放日報社門前的漢口路上靜坐示威。12月2日，新聞界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聲援紅革會。解放日報社內的造反組織「造反聯合司令部」和文匯報社的造反組織「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發

18 陳敢峰，原名陳錦霖，男，1943年生，文革前是同濟大學城市建築系學生。文革初期是同濟大學紅衛兵造反組織「同濟東方紅」負責人；文革中歷任同濟大學革委會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第九屆委員會候補委員；「林彪事件」後被審查，後去上海第五鋼鐵廠當工人。文革結束後被判刑八年。

19 胡永年，文革前是上海足球隊的運動員，文革初期是上海體育界造反組織「上體司」負責人，文革中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文革後因有人命案，被判死刑緩期。

表聲明支持紅革會。群眾運動需要一個接一個的中心事件，保持和升級對運動的狂熱參與，繼安亭事件後的解放日報事件，就這樣成為全上海造反派共同關注的又一個中心事件，又一場革命的狂歡。

只有紅三司沒有行動。事情發生後，紅三司曾經向紅革會要過有關資料，紅革會不肯給他們。安文江等覺得對情況不了解，還是不要貿然參加。²⁰ 最初沒有行動的還有工總司。王洪文對紅革會封解放日報社的行為不贊成，認為群眾組織佔領黨報不應該；而且，這樣大的一個行動，應該事先和各群眾組織商量，統一行動。王洪文說，紅革會僅僅為了自己報紙的發行，就把報社封了，這樣容易引起社會上的反感。王洪文表示，工總司不介入。²¹

工總司支援紅革會

12月1日上午，許多沒有收到當天報紙的市民來到報社，對紅革會的行為提出抗議。報社門口的人群絡繹不絕，越來越多。保守派紅衛兵和工人更是組織隊伍到報社門前向紅革會示威，高呼「我們要看解放日報」，「強烈抗議一小撮暴徒佔領解放日報社！」解放日報社被保守派圍得水洩不通。人們只要看到人群中戴着紅革會袖章的學生，就拖住辯論，圍着不放。紅衛兵們只得全部退守到報社大樓裏面。中午，報社大樓外的人群試圖往大樓內衝，紅衛兵們守着大門不讓他們進入。紅衛兵在樓裏緊閉大門和底層窗戶，保守派就用十二磅重的大榔頭強攻大門，還開來了架修電線用的急修車，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進攻。紅革會的廣播車則在街上廣播：「解放日報社門口，發生群眾毆打學生的流血事件，緊急呼籲各界給予支持！」

20 筆者 2008 年 5 月 16 日在佛山對安文江的訪談。

21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10 年 1 月 16 日對戴立清的訪談。

大樓被圍，進出被封鎖，紅革會被困在報社大樓內。這麼多人滯留報社，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廁所不夠用，沒幾天便污物四溢，有些人就在大樓角落隨地大小便，所有樓道都臭氣熏天。吃飯也是大問題，²² 一塊榨菜都是好東西，紅衛兵們一人咬一口地傳下去。

紅衛兵們沒有料到事態如此擴大。12月2日下午，紅革會的李功佐打電話給工總司的潘國平，要求「工人老大哥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王洪文馬上召集工總司頭頭在復興中路總部開會。王洪文對紅革會的行為本來不贊成，說紅革會搞這麼大行動，也不和工總司等造反組織商量，太冒失。但這時認為，《紅衛戰報》是為造反派說話的，紅革會是造反派組織，造反派應該相互支持，既然事態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人家也要求我們工總司支援，我們工總司應該支持，要把紅衛兵接出來，不能讓他們困在裏面；接出來後到外面作宣傳工作，爭取群眾。²³ 王洪文後來回憶：

研究的結果覺得還應該支持紅革會的行動，認為紅革會是革命的行動。會後，就派了幾百人進入了解放日報社，支持紅革會。²⁴

王洪文讓潘國平代表工總司去解放日報社。報社大門已被封鎖，潘國平他們只得從邊門上的一個小窗翻爬進去。紅革會向潘國平介紹了情況，潘國平說，不讓人家看報總不得人心。他建議紅革會撤出報社，撤出去後再與市委談判。李功佐感到進退兩難，說不能出去，出去會被外面包圍的人給打死的。最

22 安大峰的博客《文革雜碎——解放日報事件逼上海市委入死胡同》，2009年：hi.baidu.com/andafeng

23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10 年 1 月 16 日對戴立清的訪談。

24 王洪文 1981 年 3 月 12 日供詞，轉引自紀希晨著《史無前例的年代》。

後決定將市委書記找來報社談判，潘國平和李功佐等人設法出了報社。聽說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正在長寧區少年宮接見紅革會的紅衛兵，他們找到王一平，王一平答應了。下午，王一平從邊門小窗爬進報社大樓。²⁵ 潘國平認為王一平進入報社與紅革會談判，沒自己事了，當時他又正發燒，便想回家休息。不想被報社外面圍觀的人群認出。潘國平因此被圍攻了整一晚，直到凌晨3點才被工總司黃浦區聯絡站搶出。²⁶ 潘國平的離去，使工總司又一次缺席解放日報社現場。正在報社的北京師範大學教師李衛民，在深夜包圍報社人群最少的時候偷偷跑出報社，趕到工總司總部向王洪文報告，再一次要求工人出面增援。

王洪文於是要陳阿大、戴立清等人，調集工總司各區聯絡站的造反隊員前往解放日報社。同時，他要自己工作的國棉十七廠造反隊派出三百多人進入報社，把守住第一道大門。各區聯絡站的七百多人先在人民廣場集合。然後，一部分人進入報社，一部分人則在報社外舉行示威遊行，內外呼應，以壯聲勢。後來，又從靜安區調了近三千人前往助陣。耿金章的二兵團，也調來幾千個造反隊員。12月4日，王洪文也進入報社。²⁷ 12月5日，工總司發表《告全市革命同志書》，支持紅革會的行動，呼籲「每個關心國家大事的革命同志，暫時不看《解放日報》。都看《人民日報》！」，還要求「解放日報社必須徹底改組」。

工總司的介入，使得進入報社的工人人數遠超過紅革會的紅衛兵。原來由紅革會挑起的解放日報事件，主角向工人造反派轉移。12月3日凌晨3點，佔領報社的各派組織經商議，決定由工總司與紅革會共同組成火線指揮部，工總司總部負責人王洪文、耿金章、戴立清，以及紅革會負責人李功佐、馬立新、

25 潘國平 1979 年 4 月 24 日，1979 年 11 月 28 日。

26 同上。

27 王洪文進入報社的日子，引自李衛民《我在上海活動的全過程》。

勞元一，炮司負責人周谷聲等，都參加了指揮部，王洪文和勞元一為總指揮。²⁸ 但王洪文在報社沒待多久就出去了，實際參加指揮部的工總司人員是戴立清，他在報社裏面好幾天。

會上，勞元一和馬立新說，他們找了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要何打電話給張春橋，希望中央文革表態，但沒回音。於是，決定派出一個由四人組成的赴京控告小組，由馬立新帶領，隨帶一千份《紅衛戰報》，向中央文革小組告狀。告狀小組的工人代表是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一名工人。²⁹ 但這個告狀小組沒見到張春橋。報社內的造反派組織「造反聯合司令部」打電話給陳伯達尋求支持，陳伯達沒表態。聶元梓認為不表態就是支持。12月4日聶元梓特地去解放日報社旁的山東路體育場，對在那裏的紅革會和工總司的造反派說：「《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許多組織打電報給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態。中央文革沒有表態，這種不反對的態度就是支持我們！」「不要從《解放日報》輕易撤出來，要堅持到市委垮台為止。」³⁰

火線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頭可斷，血可流，《解放日報》決不可發！」「我們一定要堅守解放日報社，決不後撤半步」！「我們的口號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用鮮血和生命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³¹

赤衛隊與工總司的較量

解放日報事件發生時，赤衛隊正忙於籌備成立大會，總部

28 據勞元一對筆者說，總指揮是他和王洪文；而據李功佐在金大陸、金光耀和筆者對她的訪談中說，紅革會方面的總指揮是她。

29 金大陸、金光耀和筆者 2010 年對馬立新的訪談。

30 聶元梓的話轉引自陳丕顯著《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31 傳單《緊急通告》，「解放日報火線指揮部」，1966 年 12 月 4 日。

對解放日報事件沒有全力關注。但為了防止安亭事件市委簽字雙五條情況再現，赤衛隊與上紅總部、上紅大專總部等八個保守派組織一起，在12月3日下午散發傳單《正告上海市委：必須堅持原則》：「上海市委必須堅持原則，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決不允許重演11月25日的錯誤做法」，要求上海市委不向紅革會讓步。所謂11月25日的錯誤做法，即指對紅三司報紙的夾送。傳單還要求紅革會公開承認錯誤，主動撤出解放日報社。

整個事件期間，許多組織和市民不斷打電話到赤衛隊總部(籌)，詢問他們對解放日報事件的態度，赤衛隊各區聯絡站也紛紛要求總部拿出明確決策。全市保守派都關注着赤衛隊總部(籌)的態度，希望他們出面遏制造反派。許多基層的赤衛隊組織和赤衛隊員，更是早已主動投入事件。去解放日報社門前示威的人群，大多數是赤衛隊員，還有上紅總部所屬的保守派紅衛兵。12月4日，赤衛隊總部(籌)在閘北區番瓜弄辦公處開會研究對策，決定採取行動。總部會議剛結束，上海市總工會聯絡員徐力趕來，說市總工會主任張祺要找總部負責人去談話。王玉璽、金瑞章、尹平三人隨即與徐趕到市工人文化宮，在三樓見到張祺。張祺詢問了赤衛隊總部對正在發生的解放日報事件的態度，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幾個頭頭從這次會見判斷，市委希望赤衛隊有所行動。³²

但事實上，這是個錯誤判斷。在赤衛隊開會的同時，上海市委書記處也在開會，研究對解放日報事件的處理意見，決定向工總司與紅革會妥協。為了慎重起見，曹荻秋打電話給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要他了解保守派組織的態度。³³於是市委辦公廳蘇超打電話給市總工會，要張祺出面了解赤衛隊的態

32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寫的《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供討論修改用第二稿)，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33 曹荻秋要張文豹了解保守派組織的態度一事，引自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派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度。張祺很謹慎，見了赤衛隊頭頭，只問了他們的態度，卻沒有把市委的打算告訴他們。³⁴ 赤衛隊總部不知道市委態度已經起變化，相反卻從張祺態度誤認為市委希望他們有所動作。當天，赤衛隊總部商定了一個「先禮後兵」、「先輿論後行動」方案，決定先由陳阿春起草一份《鄭重聲明》，表明赤衛隊總部立場，如無反應，再採取行動。³⁵

在總部發表《鄭重聲明》之前，許多工廠的基層赤衛隊已經開始行動。赤衛隊員們高呼着口號，想方設法要衝進報社。有的用汽車跳板衝撞報社鐵門，有的掄着幾十磅重的榔頭砸鐵門，有的架起梯子想從窗口爬進去。佔領者則將報社大門、後門、邊門統統堵死，只留一個小窗口作為進出口。他們用竹竿、木棒和自來水鐵管以及砸碎的窗玻璃做守衛武器，驅趕包圍在外面的抗議者。他們拆毀報社的辦公桌和椅子，將拆下的木板木條朝人群中扔。衝突中，雙方都有人被打破腦袋，打傷眼睛鼻子，打得昏迷過去。³⁶ 每天都有數次搶救傷員的救護車，焦急地打着鈴，在擁擠的人海中緩慢地爬行；送往附近同仁、同濟兩所醫院的受傷者達71人。³⁷ 4日下午，衝突達到高峰。解放日報社前的幾條馬路上擠滿人。報社外，赤衛隊等保守派組織安裝了六個高音大喇叭，後來又運來十幾個嶄新的喇叭，連包裝紙都沒拆，就裝在了報社大樓四周。近二十個高音喇叭對着報社呼喊著口號，震耳欲聾。而紅革會只有三個小喇叭，聲音全被保守派的宣傳蓋住。李功佐打電話給自己學校

34 張祺在1967年4月6、7日召開的批判陳丕顯、曹荻秋大會上的發言《陳丕顯、曹荻秋是赤衛隊的後台大老闆》，載於《大會專刊》1967年4月13日聯合版第5期；以及工總司1968年編《吳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聯絡員徐的揭發。

35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

36 傳單《解放日報事件真相》。

37 傳單《解放日報事件本來面目》，載於《紅衛戰報》1966年12月17日，「紅衛兵上海大專院校委員會」、「紅衛兵上海司令部」合辦。

的紅革會，讓他們將學校的兩套廣播器材和大喇叭拆下運到南京路。外語學院也運來喇叭。紅革會在距離解放日報社不遠的南京路上，每兩個電線杆上裝一個喇叭，從外灘附近的和平飯店，直排到西藏路附近的華僑飯店。功率最大的500瓦喇叭裝在南京西路西藏路口的中百一店樓上，從早上一直播到晚上。³⁸

12月6日赤衛隊總部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到會赤衛隊員近30萬。³⁹ 會後十幾萬赤衛隊員排着隊，高喊「我們要看解放日報」的口號，前往解放日報社門前示威整整幾小時。這是赤衛隊與工總司的第一次正面較量。

市委再次妥協

紅衛兵和造反派們想方設法尋找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人以進行談判。12月3日早晨，工總司和紅革會先後找到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蔣文煥和上海市委副市長李干成。蔣文煥被扣二天一夜；李干成患心臟病和高血壓，正在家裏養病，被揪到報社扣了36個小時，邊吃藥邊挨批鬥，後來病情加重，才被允許離開。李干成離開時，還被造反派挾持着去找曹荻秋。曹荻秋也在生病，不知藏在哪家醫院，找不到。造反派們在華東醫院找到正在發高燒的中共華東局書記韓哲一，將韓揪到解放日報社，不讓睡覺，鬥了一天一夜。韓哲一高燒升到39度，還是報社職工用擔架把他抬往醫院搶救。

4日下午，報社門外的赤衛隊員用汽車跳板猛力衝撞報社大門。守衛大門的造反隊員把一張乒乓球桌豎立起來，堵住門口，但是桌面被跳板一端的鐵鉤撞了個大洞。造反隊員將蔣文煥拉到門口，用他的身體去堵那個破洞。直到蔣文煥休克過去，造

38 金大陸、金光耀、筆者、2010年1月24日對原紅革會成員卞全的訪談。

39 30萬這個數字引自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

反派才讓報社職工把他送往醫院。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與副市長宋季文在報社被扣押的時間最長，白天談判，晚上被帶到一個小屋，蹲在牆角通宵挨批判。⁴⁰ 報社工作人員也被騷擾。夜班編輯部七個編輯，三個被鬥；文藝部十名記者和編輯被限制行動；佔領者還任意翻看報社工作人員的辦公桌抽屜。整個報社到處擠滿人，走廊也水洩不通，報社的工作停止了好多天。⁴¹ 到12月4日，紅革會佔領解放日報社已經五天，報社的許多工作人員自己出電報費，紛紛聯名致電中央文革，報告目睹狀況，希望中央出面制止事態。但是一直得不到回音。

幾天前，解放日報事件剛發生時，中共上海市委就立即報告中央，還讓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工交座談會的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就近請示陶鑄。陶鑄此時自己處境困難，毛澤東對他主持制定的工業十五條非常不滿意，正在做檢討。陶鑄的回答十分強硬：《解放日報》就是停刊一個月，也不能同《紅衛戰報》一起發行。⁴² 解放日報社被紅衛兵佔領後，印好的報紙一直發不出去，總編兼黨委書記馬達往華東局與王一平商量，希望再一次向中央文革反映。王隨即打電話給陶鑄，陶鑄在電話中回答：

- 一、群眾組織的報紙和黨報是兩種性質的報紙，不能夾在一起發行。
- 二、如果紅衛兵衝擊，要說明，這是個原則問題，要頂住，要堅持原則。
- 三、可以分開發行。

40 傳單《解放日報事件真相》。

41 上海市清查辦1988年：《揭批四人幫材料之一》：《全面奪權的反革命鬧劇的前奏——揭批林彪、「四人幫」導演解放日報事件的罪行》。

42 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梁國斌1967年3月31日《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滔天罪行》。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條》的規定，不能在報上亂點名。⁴³

這個指示精神和上海市委的態度完全吻合。市委對解放日報事件制定的原則是：「堅持原則，盡快解決，防止衝突。」⁴⁴馬達匆匆趕回報社，想把這個消息告訴大家。但未等馬達傳達陶鑄的話，造反派已在傳達南京傳來的電話，說江蘇的《新華日報》報社被紅衛兵封了，毛澤東說「新華日報被封門了，有什麼了不起」。還傳達江青的話：「報紙搞資反路線，就是要衝，要封。」⁴⁵毛澤東的這個態度，使紅革會的行動更有依據。12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在沉默了幾天之後，終於表態：

總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報附帶發行紅衛戰報無非是揭露市委的錯誤，應該歡迎。……

地方報紙停那麼幾天，沒有什麼了不起。⁴⁶

要上海市委向紅革會讓步的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組。周恩來也委託陶鑄電告上海市委：「紅衛兵提出把他們的報紙同解放日報一起發行，可以一起發行嘛。」⁴⁷

在此之前，即12月4日之前，上海市委一直不肯妥協，出面談判的王一平和宋季文一直沒有鬆口。接到中央文革小組電話

43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第186頁。

44 赤衛隊總部成員高根才《戰鬥快報出籠記》，載於《工人造反報》85期專刊1967年12月25日。

45 馬達著《辦報生涯60年》第44頁。

46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189頁。

47 紅革會負責人馬立新1979年10月22日交代，轉引自上海市公檢法《關於審訊江青反黨集團在上海骨幹馬、徐、王案件中有關專題是否列入起訴書》。而當時在工總司總部的葉昌明1981年4月14日交待中也回憶，他那時聽說是周恩來打電話要上海市委出面處理的。

和周恩來的轉告，市委馬上決定簽字。12月5日，王一平和宋季文按市委指示，在紅革會的《三項決定》和工總司的《四項要求》上簽了字。據說簽字消息傳出，報社職工上下一片哭聲，大家心裏實在是想不通。⁴⁸

紅革會的《三項決定》主要內容是：(1)《紅衛戰報》第九期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2)解放日報社黨委交出整群眾的黑材料，允許紅革會查閱報社有關文章、底稿等；(3)解放日報社黨委就執行資反路線作出檢查交代。工總司《四項要求》的主要內容是：(1)支持紅革會的要求；(2)市委要採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組織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組織的行動；(3)解放日報事件產生的後果由市委負責，並作出公開檢查；(4)保證工人革命造反隊員回廠後不受刁難，否則引起的後果由上海市委負責。⁴⁹其中第二條明顯是針對赤衛隊的。

上海市委再次在造反派的條款上簽字，承認錯誤，並於12月8日作為市委文件下發：《滬委(66)第119號》，12月10日曹荻秋又補充簽字下發《滬委(66)第120號》，要求廣泛宣讀這兩個簽字條款。後一個文件是工總司對自己《四項要求》的修改，重新又讓曹荻秋簽字。補充的內容主要為：造反隊員在解放日報事件中佔用的生產時間以公假論處，曹荻秋要親自向傷員極其家屬公開道歉，傷員的一切醫療費用由市委負責。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赤衛隊總部(籌)只在12月4日發表了一個《鄭重聲明》，要求造反派撤出報社，要求赤衛隊也作為一方參與解放日報事件的談判。但這份聲明開始散發時，王一平與宋季文正在造反派的條款上簽字，實際上沒起什麼作用。中共上海市委代表簽字同意造反派文件的消息傳開後，赤衛隊明白這意味着事件已經結束，他們採取行動為時已晚。赤衛隊總

48 陳丕顯《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49 紅革會的《三項決定》和工總司的《四項要求》，原文都載於1966年12月30日的《紅衛戰報》上。

部(籌)只得於市委簽字後的第二天，12月6日，與上紅總部、上紅大專總部等八個組織聯合發了個《嚴正聲明》，譴責市委的簽字是「完全放棄了原則，嚴重損害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表示「最強烈的抗議和最堅決的抵制」。

馬天水轉變立場

上海市委在解放日報事件中頂了足足八天不簽字，但到12月5日卻態度大轉變地簽字了。前已敘，中央文革來電和周恩來讓陶鑄轉告的電話，固然是促使市委轉向原因。而從整個大背景看，毛澤東對推進文革的堅定態度，是上海市委轉向的根本原因。

上海市委幹部中，轉向的第一人是馬天水。事情還是與全國工交企業政治工作座談會有關。如前所述，會議前期，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兼計劃委員會副主任谷牧等，堅決反對在工廠開展文革，但後來在毛澤東干預下會議不得不轉向。上海派去參加會議的是馬天水。馬天水去北京開會之前，陳丕顯打電話向谷牧詢問會議宗旨，谷牧說他打算向毛澤東匯報文革存在問題。陳丕顯便要馬天水多收集一些文革影響上海經濟和工業生產的負面信息，以向中央匯報。陳丕顯說：「寧可現在犯錯誤，不要將來犯錯誤」。⁵⁰

馬天水生於1911年，1931年參加共產黨，資格比張春橋老，在共產黨內地位也比張春橋高，張春橋還是市委常委時，馬天水就已經是市委書記處書記了。文革前馬天水是負責上海工業生產的市委書記處書記，被稱馬老。當年被人尊稱為「老」的上海市委領導人，只有「柯老」柯慶施，「魏老」魏

50 馬天水 1967 年 3 月 23 日在《我的揭發》，載於《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專刊，《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聯合版。

文伯。而柯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第一負責人；魏是華東局書記。馬天水的「馬老」是毛澤東叫出來的，五十年代毛澤東在上海見到馬天水，半開玩笑地叫他馬老，那時他只有四十出頭，比周恩來還小好幾歲。毛澤東稱他為馬老，於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馬老。馬天水對計劃經濟下的上海工業生產情況十分熟悉，工作非常盡力而且深入。上海一萬多家工廠企業，他親自去過的少說也有五六千家；⁵¹ 是計劃經濟時期共產黨內能從全局領導工業生產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上海幹部乃至普通工廠工人中有着很高的威信。直至文革結束後的幾十年，當年馬天水去過的工廠老工人，仍懷念馬天水深入而實際的工作作風，懷念他端着搪瓷飯碗，和工人一起在食堂排隊打飯的情景。

但是，馬天水只抓業務，不關心什麼「路線」或「政治」，曾經被柯慶施批評，說他不問政治，政治性不強。據說市委文革前曾經打算另換他人頂替馬天水的位置，後來因為文革開始，也就不了了之。

馬天水敢講話，愛提意見，是黨內有名的「大炮」。在全國工交座談會上，他放了不少炮。會議期間還不斷打電話來上海，要求幫忙補充收集工總司成立後工人兩派尖銳對立的資料。他告訴上海市委：「關於工廠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問題，各省市與中央文革小組意見分歧很大，看來一場大辯論不可避免。」他轉達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的話：「現在應該是反映情況的時候了，不反映情況是不對的」，並表示決心要把「官司」打到底。他在北京提了很多意見，這也是受陳丕顯、曹荻秋囑託。會議期間他打電話回來說，已經向周恩來總理反映了三個問題：一是不同意張春橋簽字，二是人身無保障，三是各級黨委沒有發言權。⁵² 馬天水還在會上發言反對工人成立全市

51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52 《魏文伯對抗毛主席指示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材料摘編之二，華東局機關革命造反派專案小組 1967 年 4 月 10 日。

性組織，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不滿。他的講話遭到張春橋駁斥。在會上，他說一句，張春橋就駁斥一句。馬天水不理會張春橋的駁斥，堅持講完自己的意見。張春橋則說馬天水糊塗，不代表上海。馬天水這時還不知道毛澤東已經對張春橋的簽字表態支持。後來張春橋說曹荻秋對馬天水封鎖毛主席指示，害馬天水犯錯誤。

工交座談會在毛澤東干預下轉向。12月6日，林彪在會上講話，話很重。一開始就直截了當地說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林彪說，對於文革，「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有意識地把它擴大起來，深入起來，堅持下去。」林彪一語道破文革的目標，說文革就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對幹部的運動」，「也是批判我們這個當權的黨」。林彪在講話中還點了馬天水的名。林彪的講話振聾發聵，他在黨內的威信使所有與會者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對文革的態度和立場。會後，江青和張春橋一起找馬天水談話。中央決策層尤其是林彪、毛澤東對文革的強硬態度，對馬天水影響巨大，他不得不考慮如何「站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張春橋後來對人說：「馬天水直到政治局會議林彪同志講了話，才跟我說：『我這回死了心了』。」⁵³

「不問路線、政治性不強」的馬天水，一轉向，就是徹底轉向。馬天水回上海後，立即在市委書記處傳達中央要求各級幹部支持造反派的指示，12月12日，又在全市區、縣、局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中央工交會議精神，並現身說法，剖析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馬天水的講話在市委書記中引起震撼。上海市委不得不考慮如何順應文革，支持造反派。所以，即使沒有中央文革和陶鑄的來電，大勢所趨，上海市委最終也只能與造反派妥協。

從解放日報事件後，上海市委對造反派態度明顯轉變，不

53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3 日月與上海工總司代表王洪文、陳阿大等的談話記錄。

再硬頂。12月14日，由曹荻秋主持召開工總司等18個造反派組織的聯席會，會上曹荻秋就市委前一陣對文革的態度和立場作檢查。這個檢查是和陳丕顯討論過的，陳丕顯還建議曹荻秋在市委找一二個有「造反精神」的幹部，幫助起草這個檢查。但檢查沒有被通過。造反派一致認為市委這是「假檢查，真反撲」。⁵⁴

佔領者撤出報社

市委簽字，解放日報事件應該結束了。但是，佔領者沒有馬上撤出。復旦和師院的紅革會主張撤，勞元一和李功佐等認為，既然市委已經簽字，目的已達，那就應該撤出。但華師大的紅革會不同意撤，工總司下面工廠進駐報社的一部分造反隊也不肯撤。他們的理由是：市委簽字還沒兌現，要等到報紙送到訂戶手中才能算數。工人造反派孫福祥，成立了一個名為「戰到底」的組織，更是聲稱要死守大樓，血戰到底。

王洪文在解放日報社旁的一座小樓內開了個會，戴立清、耿金章、陳阿大等都參加。王洪文堅決主張撤。他認為造反派還處於少數，進入報社的又都是各廠造反派的骨幹力量，這樣長期耗在報社，會影響各工廠文革的開展。工總司不能將有限的力量都陷在一個地方。⁵⁵ 王洪文後來回憶：「我當時認為，不應該圍在裏面，應該衝出來發動更廣泛的群眾。」⁵⁶ 王洪文還說：

紅革會搞了那麼大個事件，事先沒和各個群眾組織商量弄得

54 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印。

55 李為民《我在上海活動的全過程》。（成文日期可能在1968年至1969年）。

56 《工總司整風會議記錄》王洪文的發言，1967年4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很被動，現在市委簽字同意他們的要求，再繼續留在報社就沒有理由。工人不能被學生左右，他們不撤，我們先撤。⁵⁷

12月6日，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數百名造反隊員首先撤出解放日報社。紅衛兵們非常不滿，說這是機會主義，逃跑主義，王洪文是張國燾式的人物，不承認王洪文是工總司負責人，提出要王洪文「靠邊」。為撤還是不撤，又整整辯論了兩天兩夜。王洪文說服了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負責人姜濤。終於，在各群眾組織代表和火線指揮部的聯席會議上，經過激烈爭論，以兩票的多數，表決通過王洪文的建議。⁵⁸ 12月8日上午，王洪文往工總司設在復興中路的總部，佈置調集造反隊員前往解放日報社，接應佔領者撤退。戴立清調動長寧區聯絡站的造反派接應。耿金章也調集二兵團一二千人，下午3點來到報社附近。由戴立清和王腓利指揮，幾千造反隊員，不佩戴造反隊袖章，呼喊著「我們要看解放日報」的口號，從集結的人民廣場，排着方隊，跑步至解放日報社。這是戴立清的主意，他擔心這些前往報社的應接人員被赤衛隊攔截，所以他們不戴袖章而且喊著赤衛隊的口號。包圍在報社外面的保守派以為是工人赤衛隊來了，紛紛讓出路來。工人造反派隨即包圍了報社，將裏面的造反派接出報社。⁵⁹

但實際上，這次撤出的只是數量不多的造反隊員，因為報社的廣播室被「戰到底」控制，工總司關於撤出報社的決定傳達不下去，大多數人不知道。王洪文只得讓李衛民再度返回報社去勸說，並以工總司總部名義做出決定，將孫福祥等二人開除出工總司的造反隊，寫成文字，蓋上工總司公章，要李衛民帶在身邊，隨時可以公佈。就這樣，留在報社的造反派們又展

57 戴立清 1982 年 6 月 26 日。

58 李為民《我在上海活動的全過程》。(成文日期可能在 1968 年至 1969 年)。

59 這是戴立清以及王腓利對筆者的回憶。

開激烈爭論，最後統一意見，同意全部撤出。這時已經是12月9日凌晨。⁶⁰

持續了九天九夜的解放日報事件終於結束。紅革會在事件中一舉成名，成為上海最大最有影響的紅衛兵組織。

但是許多組織對紅革會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的表現不以為然，認為紅革會的頭頭「根本沒有認識到這場鬥爭的偉大意義」。他們批判說：紅革會當初佔領報社，不是為了通過批判報社批判上海市委，而只是為了夾送，就憑這條理由，不作宣傳輿論，不同其他造反派商量，就一屁股坐下來。這是典型的左傾盲動主義；在保守派大批包圍報社時，如果不是工總司出手，紅革會已經想打退堂鼓，這是逃跑主義；而在市委簽字後，一部分人又想賴着不走，這是山頭主義。⁶¹

確實，還在事件高潮時，紅革會勞元一看到那麼多人圍着報社，就感到事情搞大了，而且紅衛兵在報社吃喝都成問題。勞元一決定趕快收場，只要市委一簽字就撤。後來王洪文找他商量，說他們工人造反派要撤出去，因為許多工人有家有小還有老，無法扔下不顧；而且總不去工廠上班要被扣工資。王洪文說他們先出去，學生頂在報社，頂到市委承認佔領報社是革命行動時再撤。勞元一答應了。⁶² 不過事實上，後來紅革會是和工總司一起撤的。只有少數「戰到底」的人不肯撤出，但三天後工總司還是派人將他們全部接出。

小結

從解放日報事件，可以看出群眾運動的投機和隨意性。

60 李為民《我在上海活動的全過程》。

61 《誰是真正的英雄》，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漫天紅」，載於紅衛兵雜誌《工學運動》第3期，1967年1月，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主辦。

62 筆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對勞元一的電話採訪。

紅革會當初只是不甘落後紅三司對批判資反路線的表態，也趕緊開了個表態性的全市大會，顯示自己對中央決策的緊跟。只是因為夾送要求遭到市委拒絕，行動於是升級。文革初期，幾乎所有的事件都是這一模式：群眾組織對某一具體事情提出要求，遭到拒絕，於是這成為他們的新理由，引出下一輪抗議行動。幾乎所有的衝突，都是當權者與群眾組織的互動。本來，造反組織對各級黨委的批判，都只是空洞地重覆報紙或文件或中央決策層人員的講話，並沒有抓到堅實具體的罪名。運動中各級黨委對待群眾組織的態度，才是具體的罪名。用當時的文革話語說，他們在抵制群眾運動中，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各級黨組織最初的具體罪名，都是在與群眾組織的互動中積累的。

解放日報事件是工人和學生兩股造反勢力的交匯點。在此之前，雖然工人造反組織是在學生的催生下產生的，但工總司成立後，還只是較多地在工廠活動。從解放日報事件起，工人造反派開始走上社會，介入上海社會上的運動。解放日報事件又是上海文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如果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上海文革一直由紅衛兵左右着運動，那麼，從解放日報事件起，工人造反派開始取代紅衛兵，逐步成為文革的主力。紅革會貿然進入報社，陷自己於被動；工總司在關鍵時刻進入報社，幫了紅衛兵大忙。而在整個事件中，工人造反派有進有退，得理便收兵，顯示出比紅衛兵實際得多的政治策略。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點，或者可以說是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的特點。這個特點以後將始終體現在工總司的文革行動中。

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文革重要轉折的另一方面，還體現在上海市委對文革的態度上。整個事件的前階段，市委一直頂着，不肯鬆口。但中央文革小組和周恩來的一個電話，市委馬上轉變態度，顯示了狂飆突進的革命，正在摧毀幹部們對他們所堅持的原則的自信。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以往的規

則全被否定，群眾運動天然合理，對抗群眾就是對抗文革。上海市委將「支持造反派」，等同於答應造反派的一切要求。市委的權威，就這樣被徹底解構；而市委的各級幹部，也自覺地等待着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一個過去評判他人政治名份的操作指揮系統和權力階層，將迅速淪為被評判對象；各級幹部將被貼上各種政治標籤。給他們判定走資派等各種新的名份的，將是過去被他們評判的底層群眾。文革就這樣顛倒了政治分層的權力。

市委和各級黨委的政治分層權力瓦解，以後造反派不再需要市委和各級單位的幹部來證明自己的行動是否革命，更不需要他們來劃定自己的政治名份，只需自己宣佈自己是革命的。為了顯示自己的組織是符合文革要求的「革命造反組織」，所有造反組織都想方設法尋找表現自己革命性的機會。如果說，解放日報事件之前，造反派的許多行為是為了反抗來自各級黨委的壓力；那麼，解放日報事件之後，市委已經決定支持造反派，沒有了壓力，造反派的行為更多出於表現自己的革命性與造反精神，成為一種政治表演。他們的各種批判大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政治表態的表演儀式。一些組織競相尋找鬥爭目標，發起事端，極力使自己的組織表現得比其他組織更具有革命性和造反精神。

解放日報事件也是市委對保守派態度的分水嶺。從這之後，保守派的地位將急轉直下，局勢將越來越不再屬於保守派，赤衛隊將立即面臨生存危機。以保衛原有秩序為己任的赤衛隊，本應是這次事件中的又一方強勁勢力。解放日報事件為赤衛隊提供了與造反派正面較量的機會，但赤衛隊忙於自己的成立大會，總部沒有真正投入這次事件。保守派習慣於服從和接受指示，缺乏主動的進攻性。他們適合在權威的指導下做一名勞動模範或積極分子，而在失去了權威的政治環境中，形勢越是複雜，他們的弱點越是明顯。在毛澤東和中央決策層越來

越明顯而強硬地支持造反派的形勢下，即使他們在解放日報事件中有所行動，即使他們可能一時贏得上風，壓倒造反派，他們的失敗仍是注定的。

第十二章

寫作班造反 市委心臟爆炸

寫作班的由來

解放日報事件風波平息沒幾天，又是一個爆炸性新聞：原市委寫作班集體造反，領頭的是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¹文革初期，工廠、學校、機關都有人造反，但全只是個人行為。寫作班集體造反，轟動全市。

市委寫作班的前身，是華東局《未定文稿》編輯部下的寫作小組。1963年，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反修批修，中蘇第二輪論戰又起，中央成立《內部未定稿》編輯部，設在北京釣魚台，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負責。上海市委也於1964年初，在華東局編輯內部刊物《未定文稿》。這是中共華東局的重要內部刊，向華東各省市組稿直屬中共中央華東局領導，當時稱為「內刊」。最初由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長、上海市委文教書記、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兼任主編。石西民一般一兩個星期去《未定文稿》編輯部一次，或開會傳達上面的精神，或討論選題。石西民調任中央後，張春橋兼任主編，華東局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周原冰任主持工作的副主

1 徐景賢，男 1933 年生，中共黨員，受教育程度高中和大專夜校。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幹部，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第九、十屆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 15 年。2007 年逝世。本節內容主要引自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出版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徐景賢家人整理。

編。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有時也到場，不過不太說話。華東局政策研究室主任龐季雲任編輯部主任。此外，還設置兼職編委，編委同時也是各編輯組的組長，主要負責選題和審稿；哲學組長是市委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沈竹，經濟組長是《文匯報》副總編欽本立，歷史組長是復旦大學近代史教師金沖及，文學組長是解放日報社文藝部主編姚文元。《未定文稿》沒有正式編制，所有人員都是借調。

《未定文稿》刊登的文章都是內部討論觀點。所謂「內部討論觀點」，當時主要涉及「蘇聯修正主義」。內容有：對中蘇邊境歷史的考證，對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批判，對蘇聯經濟學家利別爾曼的批判等等，其中有些文章後來刊登在公開的報刊上，也有些文章最終沒有寫成。不久，為了開展對「國內修正主義傾向」的批判，1964年5月，市委決定成立專門的寫作班子，人員從華東六省一市和上海文化單位以及大學借調。被借調人員的條件要求十分嚴格：必須政治可靠，具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政治身份；必須「筆頭硬扎」，並曾經發表過此類文章。² 1964年8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成立，最初設在上海西區華山路丁香花園內，本是清末高官李鴻章家族的別墅，因園內多丁香樹得名。

寫作班下設專題小組，其中成立較早的是歷史組，最初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一個寫作集體，成員都是歷史系的青年教師：朱永嘉、王知常³、朱維鏗和吳瑞武。歷史組的辦公室在丁香花園內兩幢建築之間的一個走廊內，被稱為「老虎尾巴」。⁴ 文學組由文藝理論家、上海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葉以群負責。葉以群從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調來一批研究文學理

2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3 王知常，男，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成員，中共黨員。文革中是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班成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2年。

4 王知常2009年5月16日對金大陸、筆者、金光耀和的回憶。

論的青年，這些青年都是各大學中文系畢業生，黨員或團員，寫作能力強且發表過文章。例如戴厚英、李子雲、陳冀德，都是文學研究所的；還有王紹璽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徐緝熙是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教師。因為打算批判托爾斯泰，又從華師大調來曾經留學蘇聯者，以閱讀和翻譯俄文。文學組建立後約一個月，市委宣傳部的徐景賢也來到丁香花園，成立了電影組，連他共四人，辦公室在東樓西側一間屋子。徐景賢和文學組的大多數人本來就認識，又和大家年紀差不多，很快就和大家親密無間。一個月後，電影組的寫作計劃撤銷，人員與文學組合併。徐景賢成為文學組副組長。葉以群當時身兼《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等數職，沒有時間管文學組，徐景賢成為文學組實際負責人。⁵ 文學組與電影組合併之前，曾被命題從哲學上批判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的「無差別境界」。但是，文章寫成送審後，卻一直沒有發表。因為周谷城的美學理論與哲學上不承認矛盾是兩個不同概念，批判者卻將其混為一談。不久，文學組被佈置批判電影《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林家鋪子》、《舞台姐妹》，以及戲劇《李慧娘》和《謝瑤環》。還批判《中國電影發展史》和瞿白音的《「創新」獨白》、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論，等等。寫就的文章陸續刊登在《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上。文學組的筆名有丁學雷、方澤生等，其中「丁學雷」影響比較大。當時正提倡學雷鋒，丁學雷即丁香花園內學習雷鋒之意。⁶ 後來又成立了哲學組和自然辯證法組。哲學組組長是沈竹，主要撰寫哲學方面的大批判文章，當時哲學界正在批判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哲學組批判楊獻

5 原寫作班文學組成員王紹璽 2009 年 10 月的《與景賢相處的日日夜夜——徐景賢逝世二周年祭》，載於網絡福壽園徐景賢紀念文館：<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joursid=93416>。

6 同上。

珍，還批判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這一時期成立的，還有經濟組。

各組寫作內容不允許向外披露，組與組之間也不互相交流。姚文元當時是華東局《未定文稿》編委，在丁香花園辦公，但不住在那裏。朱永嘉、王知常、戴厚英、陳冀德等，因為家比較遠或因沒有住房，都住在寫作班。所有寫作班成員都是借調的。這種「借調」經常是為了上級佈置的某個非常規的臨時任務，大多是政治運動派生的政治任務，從基層各單位抽調人員，組成一個臨時的機構或部門。借調來的工作人員工作在借調單位，但人事關係仍在原單位，工資由原單位發。事情做完，機構解散，人員原則上回原單位。也有被看中，工資和人事關係全部轉去，正式留下，從此改變人生軌跡的。而因為寫作班成員的工資和人事關係仍在原單位，因此單位有事或者運動來了，他們都必須回原單位。以後整個文革十年，這些寫作班成員，包括後來調進的新成員，工資和人事關係都在原單位。這也是整個文革時期的人事特點：大量人員被借調到上級或其他部門工作，但人事關係始終還在原來的單位，還是原單位的人，還由原單位發工資。

1964年5月，據毛澤東指斥文化部全部垮了的講話，文化部黨組改組，成立以蕭望東為書記，石西民、顏金生為副書記的新黨組。石西民調北京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臨行前，內刊召開編輯部大會，當場宣佈今後由張春橋負責內刊。張春橋接任分管文教的上海市委書記，但張春橋在華東局沒有職務，分管華東局所屬內刊沒有名份，於是《未定文稿》與寫作班分家。《未定文稿》搬到宛平路11號，仍屬華東局領導；上海市委另成立寫作班，由張春橋直接領導，市委宣傳部教育處負責具體聯繫。下設文學和歷史組，都搬到武康路18號。同年10月，市委寫作班又搬到武康路2號。張春橋接手市委寫作班後，

成立了寫作班黨支部，徐景賢任寫作班黨支部書記。⁷張春橋不常去寫作班，寫作班日常事務由徐景賢處理。由於徐景賢是從市委宣傳部借調來，在寫作班人員中，他的工作單位市委機關，是級別最高的，所以大家也把徐景賢看成寫作班主要負責人。

石西民進京時帶走了歷史組的金沖及和哲學組的沈竹，歷史組就由朱永嘉負責。張春橋經常將徐景賢、朱永嘉連同姚文元，召到他在康平路的辦公室商討工作。張春橋與寫作班的密切關係，從這時開始。姚文元開始秘密撰寫評《海瑞罷官》文章時，張春橋讓朱永嘉和王知常等人為姚文元提供和核對明史資料，寫作班為批判《海瑞罷官》出了力，後來受到江青表揚。⁸

沈竹被金沖及帶去北京，加上哲學組因沒有寫出文章，另兩個成員回原單位，哲學組無形解散。1965年又重新成立哲學組，調來華東政法學院哲學系主任郭仁傑，市委黨校的程綺華、謝宗范等人。後來又成立了自然辯證法組。郭仁傑擔任了寫作班的黨支部副書記。比較而言，歷史組和文學組的人更會寫文章，寫作也努力，發表的文章較多，受到表揚。

寫作班由兩類成員構成。一類是原來的機關幹部，受過一定教育，大多擔任秘書或做文字工作，以徐景賢為典型。另一類是1949年以後培養的大學生，畢業後在大學任教或在文科的研究所工作，是中青年教師或研究人員中的活躍分子和佼佼者。以朱永嘉、王知常為典型。

寫作班有着特定的寫作程序：第一步編資料。將有關資料收集整理成冊，有的還摘錄出「有問題」的部分，印成大字本。這些資料都上報市委領導，同時供寫作班各組內部參考，

7 以上關於《未定文稿》的資料均引自徐景賢2005年著《上海寫作班的來龍去脈》，刊於《百年潮》2005年12期，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發表時署名「羅玲珊」。

8 徐景賢2003年《十年一夢》。

有時也由解放日報社和文匯報社提供給外界特約作者，撰寫特定的批判文章。第二步擬出重點批判文章選題。第三步，寫出初稿後送市委，由負責宣傳工作的市委書記審定選題；最初由石西民審定，他調任北京後，由繼任的張春橋和楊西光審定。最後由這些市委領導決定何時在何報刊發表。⁹

市委機關幹部徐景賢

徐景賢是1949年後進機關的青年。他生於1933年，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上海交通大學講師。小學畢業後，徐景賢考入南洋模範中學。在中學，他接近中共地下黨，參加過反蔣反美的學生運動，是政治上的活躍分子。共產黨執政上海後，他參加了學校第一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1年高中畢業，他沒有按父親的希望報考大學，而是報名參加了上海市政建設幹部訓練班。當年9月學習結束，上級知道他愛好寫作，就將他分配進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從此開始機關幹部生涯。那時他還不滿18歲。1953年徐景賢成為中共預備黨員，但一年後的轉正沒有被支部大會通過，原因是被認為驕傲自大，其實就是比較自信，在當時被認為是缺點。這是徐景賢生平受到的第一次挫折。¹⁰ 後來又因為入黨介紹人丁景唐被認為與胡風案有牽連受審查，徐也受影響，一段時間甚至不被分配工作。直到1956年6月，徐景賢的預備黨員方被轉正。

徐景賢最初分工聯繫群眾文藝，以後又聯繫文學界。他的工作性質實際就是秘書：寫情況反映、調查報告、工作總結、報刊述評，為領導寫各種各樣的文章和發言稿，等等。當時許多署名市委領導幹部的文章都由徐景賢代筆。他修改的文章文字清新流暢，主旨清晰；他沒有文人相輕的陋習，以扶持他人

9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10 同上。

為己任。¹¹ 機關工作之餘，徐景賢參加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函授大學，還堅持業餘寫作。對於自己為什麼會選擇寫作這條路，徐景賢文革後曾剖析自己：

我1951年到市委工作的時候，還不滿十八歲，在黨的高級機關工作了幾年之後，深感黨內的論資排輩和等級思想非常嚴重，像我這樣一個年輕幹部，又是解放後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在黨的機關裏脫穎而出，簡直難上加難。我曾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徐平羽的秘書孫錫鈞兩人個別議論過：像我們這樣有點志氣的人，能不能做到：二十歲當幹事，三十歲當科長，四十歲當處長，五十歲當部長，六十歲當市委書記。兩人估量機關的形勢後，一致認為：不可能！因為黨的領導機關裏「老資格」太多了……每次提拔幹部，都要「論資排輩」；住什麼房子，吃什麼灶，甚至連用什麼辦公桌，坐什麼椅子，都要講職務，按級別，不得逾越。所以像我們這樣解放後參加工作的新幹部、新黨員，即使自認為有能力，有才幹，想要在仕途上謀求發展，希望是微乎其微的。於是，我選擇了從事寫作的道路。¹²

徐景賢說，他那時很佩服姚文元，決心像他那樣，「始終高舉批判的旗幟，自覺成為黨的喉舌和黨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實行全面專政的工具」。¹³ 姚文元與徐景賢認識較早。他倆1954年在一次討論工人文學創作的座談會上認識，此後一直有着較多來往，關係始終比較密切，經常一同下班，一路回家。¹⁴

11 原寫作班成員劉景清2008年著《書生徐景賢》，載於網上福壽園「徐景賢紀念館」，2008年12月13日，網址：<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

12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13 徐景賢2005年著《上海寫作班的來龍去脈》。

14 徐景賢1977年12月25日。

1957年毛澤東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徐景賢也寫了篇文章《破教條主義之戒，開群眾文藝之花》，登在當年6月號的《群眾文藝》雜誌上，對共產黨文藝政策中的教條主義提出意見。誰知接着而來的反右派運動，有人撰文批判他，說他有右傾言論。後來幸虧市委宣傳部領導出手保護，只讓他在文藝處作了黨內檢查，否則他很可能被劃成右派。這段經歷向他顯示了一條鐵的規律：左比右好，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這是我長期以來的認識」。他事後總結經驗：

我在反右運動中以挨批評過了關，但這件事在我思想上造成一個錯覺，即無論如何一定要學姚文元，寫文章的姿態要左。姚文元當時總是寫批評別人的文章，我感覺到自己要在寫評論文章時站住腳，就要走姚文元的路子：站在每次運動的前列來批評別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現，才能被領導視為革命左派。¹⁵

在文學創作方面，徐景賢最初引起人們注意的作品是1960年出版的人物傳記《黨的兒子穆漢祥》。穆漢祥是國民政府時期交通大學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在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前夕，被國民政府處死刑。徐景賢的父親在交大任教二十多年，這使徐景賢熟悉交大的歷史。這本書出版後得到好評，被列為當時上海「紅旗讀書運動」的推薦書目，還被翻譯成外文出版。書的發行量很大，被眾多青年人傳閱。六十年代初，上海戲劇學院教師陳耘寫了部話劇《年輕的一代》，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正在提倡「大寫十三年」，很喜歡這齣戲，但又提出對戲中的主要人物還可以提高。柯慶施讓派人幫助原作者加工。徐景賢被調去參加了修改，成為作者之一。話劇上演後，在1964年文化部會演中獲全國話劇優秀作品獎。接着又改編為電影，已經

15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擔任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的張春橋親自抓改編，周恩來總理還親自對其中的「讀遺書」等部分提出修改意見。電影公映後也是反響強烈，風靡全國。在這一時期，徐景賢還寫了一批散文和報告文學，其中《生命似火》是關於被柯慶施讚賞的科學家彭加木的長篇報告文學，發表在《萌芽》，後來又作為《萌芽叢書》，加上徐景賢的其他文章，匯集出版。這是徐景賢的第二本書。這些作品使徐景賢成為上海當時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

徐景賢曾經兩次直接在張春橋手下工作。一次是在市委文藝工作部，張春橋是部長，徐景賢是幹事。不過因為不是直接領導，所以雙方接觸不多，只是認識。另一次是話劇《年輕的一代》改編成電影，張春橋親自過問改編，增進了對徐景賢的了解。張對徐比較欣賞，徐景賢寫文章送他審查，總是順利通過。¹⁶

作為上海市委機關幹部的徐景賢，給人印象是能幹，謹慎，與人為善。他個子瘦瘦高高，微微駝背，說話總是不緊不慢，平和沉靜，溫和謙虛。¹⁷他有着大機關秘書型幹部特有的善於領會對方意圖和做事縝密認真負責的特點。他工作不違反上級規定的政策原則，處世不逾越機關部門的人際規則；他能夠非常準確地領會上級意圖，也總是非常周到地完成上級交辦工作。徐景賢文革後曾非常感慨地形容當時的自己：「我那時腦袋長在別人身上，自己沒有腦袋。」¹⁸與徐景賢有深交的朱永嘉文革後這樣評價徐景賢：「他是典型的秘書類型，做事認真負責仔細，但唯上。上面說什麼，他便做什麼；上面怎樣說，他便怎樣做，沒有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去想去做的事情不多」。¹⁹

16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17 原寫作班成員高雲著《我所知道的徐景賢》，載於載於網上福壽園徐景賢紀念館<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

18 這是徐景賢文革後對筆者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再三說過的話。

19 朱永嘉 2008 年與筆者的一次漫談。

另一方面，徐景賢與許多五十年代參加共產黨工作的青年一樣，也有着那個年代所特有的理想主義激情。他的激情，不但反映在他的著作中，還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把早期幾篇文章所得稿費全都上交市委作為黨費。後來進寫作班後，他又主動提出不要稿費，不要市委給寫作班成員的伙食補貼，這個補貼相當於伙食費的兩倍，而他每月的工資並不高。他的這個建議也得到文學組其他青年的響應，文學組的青年們也都不需要稿費，不要伙食津貼。當時在市委辦公廳黨刊編輯室工作的蕭木，日後這樣回憶徐景賢：

他那儒雅的氣質，敏銳的觀察力，溫斯文的談吐，給了我極好的印象。……

老徐是我那時結識的上海年輕一代作家中最具有書卷氣，同時又是最懂得政治，最富有革命激情的一個；只是他的激情是內在的，不是鋒芒畢露、咄咄逼人那一種，只有相處久了才會感受到。他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代就接觸革命、後來又參加了革命，這使他在五、六十年代那種政治氛圍中，可以游刃有餘、從容自如。所以「輕盈宛若白雲」這個意象我在當時就有。²⁰

1964年石西民和宣傳部副部長長楊永直商量，決定從宣傳部調徐景賢去寫作班。徐景賢後來回憶，當石西民找他和葉以群談話時，「我的內心是興奮的，因為我感到自己越來越受到黨的領導的重視，而且覺得自己這幾年走的這一條寫作道路走對了。」²¹

20 原寫作班成員蕭木著《你走了，輕盈宛若白雲》，載於網上福壽園「徐景賢紀念館」，2008年12月13日，網址：<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

21 徐景賢2005年著《上海寫作班的來龍去脈》。

1966年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上海文化革命小組，徐景賢是成員之一。小組成員除姚文元、吳雲溥和徐景賢，其他人都是身居高位的共產黨領導幹部。姚文元是批判《海瑞罷官》文章作者，吳雲溥是為市委起草文件的幹部，徐景賢以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的身份成為市文革小組成員，市委對徐景賢的重用可見。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達後，張春橋赴北京參加中央文革小組工作，市委明確由楊西光分管寫作班。但不久復旦大學紅衛兵運動興起，楊西光疲於應付批判，無暇顧及寫作班，寫作班處於無人管狀態，甚至連姚文元也一時沒什麼事幹，直到江青將他調去中央文革。時局越來越亂，沒人再向寫作班佈置寫作任務。雖然大家還是照常去武康路2號上班，但整天就是為市委搜集情況，接待來訪者。留戀業務的，趁機多看書，為自己積累業務知識；關心運動的，四處去看大字報。徐景賢後來回憶說：

1966年下半年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我們市委寫作班成員也是我的苦悶期，日子比較難過，文章也很少寫。因為報紙上登的文章已經不是一般的思想戰線方面的鬥爭了，而是直接進入政治鬥爭的領域了。分管寫作班的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被紅衛兵到處揪鬥，再也沒有人管我們了。整個寫作班單獨懸在那裏，所有成員除了參加學習、開會、接待、值班外，不知道幹些什麼才好。²²

這種狀況，維持到1966年的8月下旬。此時，北京紅衛兵開始來上海串聯。市委從市委和市政府各部門抽調幹部，成立了紅衛兵接待站，後來又成立職工接待站，回答和處理各種問題和事件，從華師大借調來寫作班文學組的王紹璽，被調去擔任

22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本節內容除注明外，全部引自此書。

紅衛兵接待站政宣組的組長。徐景賢也常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到接待站去接待北京紅衛兵。他以市委統一布置的口徑，用「丁學雷」的名義，回答紅衛兵對市委的質疑：上海市委不同於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緊跟毛主席、黨中央的，上海市委領導了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有本質的不同。8月底9月初，北京紅衛兵幾次衝擊上海市委時，寫作班的人都被叫去，和其他機關幹部一起，守在市委大樓門口。他們和前來保衛上海市委的那些工人或紅衛兵保守派們觀點相同。對北京紅衛兵的打、砸、搶行為看不慣。漕溪北路那個打死老太太事件，市委就是派徐景賢去處理的。徐景賢因此還讓王知常和朱維鈺在一個晚上，去南下兵團下榻的黃陂南路體育宮貼大標語：「要文鬥不要武鬥」。徐景賢後來回憶說：「我當時的政治態度是要盡心盡力地維護市委的領導。」²³

市委此時對寫作班仍非常信任。市委苦於信息不通，要派人去北京收集文革情況，首先想到的就是寫作班，派去了歷史組的朱永嘉。徐景賢也幫着一些市委領導代筆檢討，曹荻秋給中央的檢查和向群眾的檢查就是徐景賢起草的。曹荻秋還讓徐景賢列席市委常委會議，更多了解市委決策，以方便起草。可以說，此時的市委完全將徐景賢當作自己人使用。

北京紅衛兵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鮮明的態度，更使上海的造反派隊伍在各行各業迅速壯大，每個批判大會都要求市委書記或常委到場。書記和常委們對這類大會能躲則躲，盡量讓下面的幹部代為出席。徐景賢就曾出席過這樣的大會。10月，文藝界和電影界的造反派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大會，徐景賢代表市委接受批判。在台上挨批鬥時，他心裏直埋怨市委領導，覺得自己是代人受過。他後來回憶自己當時的思想：

23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我感到，他們的日子固然難過，我自己又何嘗好過呢？從前我們在寫作班參加「戰鬥」的時候多麼光榮，能夠完成一項又一項的寫作任務，能夠直通中央，到現在怎麼變成了這種狀況？所以，有相當一個時期我的心裏非常苦悶，不知道出路在哪裏。……

我感到厭煩和苦悶，內心不願再為市委做「擋箭牌」，可是我一時又找不到出路。²⁴

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由北京紅衛兵首先傳到上海，他們將之抄寫成大字報，貼在市委的紅衛兵接待站。徐景賢最初不相信，覺得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麼會讓非黨的北京紅衛兵帶來？黨組織為什麼不逐級傳達？他認為自己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居然不能從正常管道聽到毛主席的聲音。他去詢問市委領導，市委領導沒有否認，默認了。但徐景賢此時還是認為上海市委「基本上總還算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吧」，沒有將上海市委與張春橋、姚文元分開。「我還沒有決心和市委決裂，這一時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信息的不暢通，使得徐景賢更希望聽到來自中央決策層的消息。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知道他與姚文元較熟悉，要他多與姚文元聯繫：「多了解一點消息，我們現在很被動。」但徐景賢幾次給姚文元打電話，姚文元都不接；唯一的一次接電話，是為于會詠。于會詠在北京幫江青搞現代京劇改革，原單位上海音樂學院的造反派紅衛兵要將他揪回上海。姚文元接電話為于會詠說話的同時，表示不方便與上海經常聯繫。姚文元寫文章很衝，但現實人際關係中，卻是個很謹慎的人，口風很緊。去北京打探消息的朱永嘉，和姚文元也很熟，但也沒有能聯繫上他。

首先使徐景賢轉變對文革態度的，是北京紅衛兵「齊衛東」。這個北京科技大學的駐滬紅衛兵組織，本書第四章已經

24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做過介紹。主要成員許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頭，比徐景賢小十多歲，但他們的思想卻十分犀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們給徐景賢送各種傳單資料，約徐景賢參加辯論，多次與徐景賢談話。他們是徐景賢的造反啟蒙。徐景賢幾十年後，還記得當時許小昆目光炯炯的堅定神態，

他們告訴我：毛主席發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都檢驗一下，看他們能否過得了社會主義的關。……

他們說：現在的體制和機制都是保護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的，他們長期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搞特殊化，還憑借自己手中的權力千方百計地發號施令、鎮壓群眾，聽不得不同意見，所以群眾一起來，他們因為害怕群眾，就執行了壓制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對他們進行「炮打」，猛擊一掌，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也讓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他們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要把社會主義的命運，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廣大群眾手裏。現在群眾覺悟高漲，需要通過群眾說明幹部，把他們的立場轉變過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過程：通過文化大革命確立反修防修的機制，建立群眾今後有監督領導的權利制度，建立群眾有充分發表意見的大民主制度，這才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這才能保證我們的江山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啊！……

他們說：我們的前提就是要亂一亂，打亂原體制的陣腳，打碎它原來的一套。不然，這些幹部一貫認為反對他們就是反黨，而且有原來體制的保護，他們有恃無恐，根本不會來理睬你。我們通過群眾的批判和監督，搞得他們很狼狽，使他們不

得不放下架子，他們才會聽你們的。大多數人才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堅定地走社會主義的道路。²⁵

這是年輕紅衛兵對毛澤東文革的理解。徐景賢從內心被他們折服，覺得他們無私、真誠，沒有個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宣傳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對他們的話，徐景賢在很多地方有着共鳴。他後來回憶，他原來就對黨內的特權不滿意。他去外地採訪時，發現許多地方的黨委都在最好的地塊建造高級招待所，專給中央領導人和各地的負責人居住，設施齊備，警衛森嚴。上海也是如此。陳丕顯生病，就住在上海西郊最好的招待所，專門為他進口最好的醫療設備，組建最強的醫療班子。這樣的特權享受，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形成強烈對比。徐景賢對黨內的等級制度也不滿意，覺得黨內等級森嚴，什麼東西都講等級，食堂吃飯分大灶、中灶、小灶，分房子按級別給面積，甚至用什麼辦公桌，坐什麼椅子，都以級別論處，不得逾越。他覺得，「參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麼現在等級越來越森嚴，封建餘毒越來越厲害。」市委在文革中的作為，更讓徐景賢不滿：

市委自恃一貫革命，一貫正確，對於革命的群眾運動抱着嚴重的抵觸情緒。凡是北京紅衛兵或是上海的群眾對市委提出比較尖銳的意見，或是貼出批評、炮轟的大字報，市委就要派專人外調，追查別人有沒有政治歷史問題，企圖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們把保市委的人封為左派，調動工人、農民和一些勞動模範站出來保市委，挑動群眾鬥群眾。市委又把我們這些機關工作人員推到第一線，而領導人自己卻躲在幕後策劃指揮，把我們作為擋箭牌和滅火器。市委領導人還把一批知識分子作為資產階級

25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反動權威拋出來，把一批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作為反動資本家拋出來，到後來實在混不過去，就把一些部、局級和大專院校的黨員幹部作為修正主義分子拋出來，而自己卻想蒙混過關。我認為市委執行的是一條打擊群眾、壓制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背道而馳。

徐景賢文革後回憶，這一切，使得他認為，應該通過文革，「將黨內的特權思想、等級觀念和幹部制度好好地焚燒一下」，「把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真相揭露出來」。徐景賢對文革越來越認同，他的造反，已經只是時間問題了。

不久，徐景賢也走上造反道路。他一旦造反並當上領導後，便將自己的命運完全與文革綁在一起。而許小昆和欣鼎亮在經歷了短暫的狂熱參與後，很快被現實的巨大反差激醒，重新思考文革，他們也因此都在1970年對造反派的整肅中遭到關押或審查。這是後話。

大學講師朱永嘉

與徐景賢不同，朱永嘉原來是做學問的知識分子。朱永嘉和姚文元同年，也生於1931年。從外表看，朱永嘉身材高大，不修邊幅，經常穿件中山裝或中式衣服，冬天，風吹拂起棉襖罩衫，露出棉絮，他也毫不在意。他講話作報告，引經據典，娓娓從容，完全是一介書生模樣。

其實朱永嘉政治上很活躍。他出身於一個企業主家庭，共產黨執政前，他在上海一所教會中學讀書，1949年3月他還在中學讀高二時，就秘密加入共產黨，邊讀書，便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學生工作。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他是上海中學生中的共產

黨骨幹，曾擔任過南市區幾個學校聯合黨支部的書記，還是上海第一屆學生代表大會的執行主席。1950年他高中畢業，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同時錄取他的還有北京大學地質系，那是他為投身國家建設而填報的志願。但他所在的黨組織沒捨得放他去北京，將他留在上海。他進了復旦大學，擔任歷史系學生會主席，後來又奉復旦大學黨組織之命參加學生會競選，當上復旦大學學生會主席。1952年，復旦大學黨委需要幹部，讓他提前畢業。他先後擔任過數學、新聞等系的黨支部書記。1956年以後，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勝任繁重的黨務工作，他回到歷史系。朱永嘉的歷史業務從這時真正開始，跟着明史專家陳守實教授學習明史。

朱永嘉喜歡鑽研業務，對政治雖敏感但對名利地位卻不計較，對級別和職稱這些名份身份都無所謂。從做黨務工作改行回歷史系研究業務後，和他一樣資歷的在校黨委工作的黨務工作者，級別工資都比他高，他不在乎，他只求能夠研究自己喜歡的歷史。沒有了對名利地位的爭執，也就少了人際關係的矛盾。他文革前在復旦大學和黨總支與校黨委關係都很好，與同事相處也很和睦。1959年朱永嘉被評為講師。那時，青年教師能評上講師的都是業務尖子，非常少。

朱永嘉不但熟悉史料，而且對歷史頗有自己看法，文革前曾引起明史專家吳晗注意。當時毛澤東要吳晗繪製出中國歷朝地圖，吳晗將這個課題交給復旦大學歷史系譚其驤教授。朱永嘉也參加了課題組，專攻地圖。他帶領歷史系的大學生查資料，做了大量研究。1963年冬天，學術界在上海召開關於歷史地圖的討論會，吳晗作為課題牽頭人參加會議，住在錦江飯店。朱永嘉與譚其驤先生也參加了會議。吳晗和朱永嘉都是研究明史的，吳晗研究重點在明朝前半段，元末明初；朱永嘉治學重點在後半段，明末清初。晚上休息時，兩人切磋明史。朱永嘉談他對明朝滅亡原因的看法，說明後期社會矛盾、階級關

係，兩面作戰造成財政困難是根本原因；農民起義、賦稅、宦官、清軍以及南方地區階級關係等等矛盾積重難返；這些矛盾只有改朝換代才能解決。所以清軍入關，一切矛盾迎刃而解。吳晗聽了直點頭。一二天後，吳晗通過譚其驤轉告朱永嘉，說自己有意收朱永嘉作學生。²⁶ 吳晗是明史研究權威，他欲納朱永嘉入門下，顯示對朱業務的讚許。但朱永嘉因為自己在復旦已有陳守實教授為導師，出於人際關係考慮，他沒有回應。會議結束後，吳晗熱情地對朱永嘉說，去北京可以找他。

朱永嘉對歷史學業務非常鑽研，在學業上很有造詣，是當時青年教師中業務佼佼者。他對浩瀚的明代史料極其熟悉。寫作班有年輕人抄史料抄漏了句子，他不用查對原書就能發覺並糾正。但他與埋在古紙堆裏的老一代學者不同，他受1949年以後政治環境影響，信奉古為今用原則，同時被鼓勵投身現實政治活動。他善於思考問題，也喜歡將現實對照歷史。他文革後曾對筆者分析他自己和徐景賢的不同：

徐景賢沒有自己的想法。上面怎麼說他就這麼做；我和他不同。當然，對文革大的方面我也沒有自己思想，但在具體事情上我有自己的想法。徐景賢做事較多考慮是上面允許做還是不允許做。我這方面考慮較少。我考慮的是該做還是不該做，我是從道理上而不是從個人得失去考慮該不該做的事情的。²⁷

徐景賢對朱永嘉的評論是「小事不計較，大事清楚」，認為朱永嘉是個可以做大事的將才。徐景賢曾將朱永嘉與寫作班另一個骨幹王知常比較：「王知常小事清楚，大事不清楚。」²⁸

26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載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7期。

27 朱永嘉對徐景賢的評價來自筆者、顧訓中2008年2月24日對朱永嘉的採訪。

28 徐景賢對朱永嘉的這個評價是文革中曾經是上海市革會寫作班工作人員的許國良1989年8月30日在筆者向他採訪時轉敘的。

徐景賢還認為「朱永嘉思路寬，點子多，筆頭雖然不及蕭木、王知常，但是個能夠出主意的人才，在這方面，我不如他。」²⁹據說，張春橋也很欣賞朱永嘉，原市委寫作班的一個青年文革後回憶說，他覺得張春橋看得上的人很少，朱永嘉是個例外。³⁰對此，寫作班的另一個成員陳冀德文革後評論：「朱永嘉骨子裏是個十足的文人，說他士為知己者死，決錯不了。只可惜欣賞他的人偏偏是張春橋、姚文元。」³¹

朱永嘉可以說是1949年後共產黨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而且是那時提倡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典型。1964年以後，在毛澤東階級鬥爭綱領下，學術界越來越政治化，朱永嘉和復旦歷史系的一些青年教師也受到影響。他和王知常等組織了個寫作集體，取名「羅思鼎」。這個名字也與學雷鋒有關，因為雷鋒主張做「黨的螺絲釘」，羅思鼎即螺絲釘的諧音。羅思鼎撰寫了關於乾嘉學派的文章，批判考證式的治學方法。這個寫作集體引起市委注意，1964年夏天，羅思鼎被集體借調到華東局的內刊編輯部，還調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金沖及，只有不是中共黨員的朱維錚暫時沒去。四人搬去寫作班時，從復旦的圖書館和復旦歷史系的資料室借了五百本書，用面包車運去丁香花園，一時在寫作班傳為佳話：歷史組的人不來則已，一來就帶那麼多書，真是孔夫子搬家。他們被佈置撰寫批判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的文章，因為他曾經提出中國古代疆域是以長城為界的。文章寫成後發表在《未定文稿》上。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國將領李秀成的文章《評李秀成自述》發表沒多久，羅思鼎也寫了篇《大節、氣節、晚節》，頗有影響。羅思鼎令《未定文稿》領導颯目相看，不放他們回復旦，將他們留下組成市委寫作班下的歷史組，編輯《未定文稿》歷史方面的文章，「羅思

29 徐景賢 1977 年 12 月 25 日。

30 這個感覺是許國良對筆者說的。

31 陳冀德 2008 年著《生逢其時》。

鼎」也成為歷史組的筆名。³² 歷史組的負責人是金沖及，金沖及被石西民帶去北京後，朱永嘉成為歷史組負責人。

1965年5月左右，姚文元來丁香花園的「老虎尾巴」，找歷史組的朱永嘉，要他幫自己準備明史方面的資料。朱永嘉原來對姚文元只知其名，未曾謀面。朱被借調到《未定文稿》編輯部後，也沒見身為《未定文稿》編委的姚來過。他知道姚文元文章很厲害，尤其是批判賀綠汀寫的關於德彪西的文章，以及批判周谷城的「無差別境界」，以尖刻聞名。這次幫姚準備明史資料，兩人才初次見面。一開始，姚文元沒對朱永嘉透露他正在準備批判吳晗。朱永嘉知道到黨的機關工作，和相對寬鬆的學校不一樣，不該問的事不問。所以特別小心，只做好自己的資料工作，幫姚文元一條一條核對資料，從不去打聽姚文元寫什麼文章，雖然他能感覺到姚文元正在寫的文章有背景。

直到文章發表前，朱永嘉才知道是江青讓寫的。不過這也不是姚文元告訴他，是他自己猜出來的。因為在此前後的一段時間內，江青一直在上海審查樣板戲。有一次朱永嘉和寫作班一幫人也去看戲，坐在後面，前面一排座位空着。到快開演時，燈光暗了，來了一批人，其中有江青、張春橋。還有一次他到康平路去，聽說江青剛剛來過。看見江青如此頻繁出入上海，朱永嘉隱約感覺這可能和姚文元文章有關。不過，此時他仍然不知道這一切實際都是毛澤東的佈置。姚文元寫了七八稿後，大約在1965年的夏天，將稿子給朱永嘉看。朱永嘉看後才知道，原來姚文元在寫批判吳晗的文章。但朱永嘉還是不知道姚文元文章來頭。他當時對姚文元文章的感覺是帽子太大，不過他沒有當面對姚文元說。

知道姚文元在撰寫批判吳晗的文章，朱永嘉不敢告訴吳晗。一場針對他的風暴正在醞釀。「我和吳晗之間沒有個人往來。」

32 此段關於寫作班歷史組的資料，主要引自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

而且黨員的組織觀念也不允許我將情況洩漏給當事人」，「我能做的只有落實材料，不出差錯，盡量自圓其說。」³³ 吳晗曾經要收朱永嘉做學生之事，在開展對《海瑞罷官》批判時，引出一點小波折。有人告訴姚文元，說朱永嘉是吳晗看中並打算收作弟子的。姚文元聽後嚇了一跳：自己在批判吳晗的同時，竟然請吳晗看中的人當助手。經過朱永嘉解釋，姚文元也就不再追究。³⁴

姚文元文章第七稿寫出後不久，1965年7月左右，復旦大學師生下鄉參加四清。朱永嘉和寫作班歷史組的王知常、吳瑞武，都被派往寶山縣橫沙島新生大隊，朱永嘉是新生大隊的四清工作隊隊長。三個月後，11月不到，《文匯報》副總編陸灝打去電話，說姚文元文章快發表了，你們幾個趕快回來，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朱永嘉先被叫回上海，幾天後，王知常、吳瑞武也被召回上海。在他們下鄉四清期間，寫作班與華東局《未定文稿》分家，寫作班歸上海市委分管，文教書記張春橋是具體分管者；寫作班從武康路18號搬入武康路2號。

歷史組的全部人員重又聚集在武康路2號：朱永嘉、王知常、吳瑞武、加上沒有去農村四清的朱維錚。《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姚文元需要更多資料，於是歷史組成員全都為姚文元查找資料。不過，這些幫姚文元查找資料的助手們，都不能過問姚文元的寫作內容；而且不准向復旦大學匯報自己在幹些什麼，儘管他們全都是從復旦大學借調來的，人事關係仍在復旦。姚文元與歷史組的四人在二樓朝南的辦公室，六張寫字台一字排開，其中兩張是姚文元的，他喜歡大台子。朱永嘉的寫字台緊挨着姚文元的寫字台。姚文元另外還有一間單獨的辦公室，在朝北的一個小間。姚文元不常去武康路2

33 朱永嘉 2008 年與筆者的一次漫談。

34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載於《炎黃春秋》2011 年第七期。

號，如果去，往往下午去，也不和朱永嘉他們說什麼，很多時間都在那個小間裏埋頭寫他的文章。³⁵張春橋說要聽聽學術界意見召開兩次座談會時，歷史組所做工作就是準備討論會，收集意見，引起討論。朱永嘉參加了黨外專家會議。

這一時期歷史組主要工作是配合姚文元，當姚的助手。1966年1、2月，姚文元又寫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評「三家村」》，也是朱永嘉為他準備材料。姚文元對朱永嘉說要批判北京的鄧拓，朱永嘉說那只有批鄧拓的《三家村札記》。朱永嘉還陪他去徐家匯上海圖書館藏書樓查閱鄧拓、吳晗的歷史材料和文章，找出後夾上書籤。這樣陪了姚文元三個下午。³⁶

雖然毛澤東在12月21日杭州談話中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但沒有馬上傳達到寫作班，寫作班此時還是按照學術批判的思路寫文章。吳晗說海瑞曾經給農民退田。姚文元的文章說海瑞沒有退還農民的田，退的只是中小地主投獻的土地。吳晗在1965年12月27日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辯解說，海瑞退的不是投獻的土地，是白奪的農民土地。歷史組便以羅思鼎筆名又寫了《從「投獻」看吳晗的自我批評》，論證「投獻」和「白奪」是一回事。朱永嘉說這篇文章是「從學術上幫姚文元堵漏洞，支撐姚文元的文章。」³⁷文章由朱永嘉起草，王知常執筆。刊登在1966年2月1日《文匯報》上。還寫了《論告狀》，也用羅思鼎之名，刊登在1966年4月底《文匯報》上。³⁸中宣部被毛澤東批判為「閻王殿」後，歷史組以「康立」為筆名，在1966年4月的《文匯報》，刊登了《〈論「清官」〉質疑》。這篇文章完全按照姚文元定下的重點和目

35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載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七期。

36 同上。

37 同上。

38 同上。

標寫就，批判目標是中宣部，因為之前中宣部周揚組織的署名文章中，暗示自己早在姚文元之前已經批判吳晗了。歷史組這篇文章已經不再是坐而論道，而是火藥味很濃的政治批判了。

姚文元《評「三家村」》發表後不久，《五·一六通知》下達，發動群眾運動，寫作班便沒事可幹。張春橋去北京中央文革小組，也顧不了寫作班。從1966年6月到10月，朱永嘉他們雖然還在武康路2號上班，但不再處於上海政治中心，基本在運動外圍，沒什麼事要他們幹，寫作班內部也不搞運動，朱永嘉有時就到復旦去看看大字報。

但朱永嘉的悠閒日子沒能過上多久。1966年6月，復旦大學教工中有人提出，大家都在學校參加運動，為什麼羅思鼎小組卻老在外面，為什麼他們不回來參加復旦的文革運動？還說朱永嘉是最典型最標準的「三脫離」——「脫離勞動，脫離群眾，脫離運動」，關在丁香花園寫文章，說是去農村四清，可去了沒幾天就回來了；還說他沒有狠批周予同和周谷城這兩個反動學術權威，等等。又說羅思鼎那兩篇登在《文匯報》上的文章尤其是投獻的那篇文章，是對吳晗的假批判，真包庇，是想把政治批判引向學術批判。

歷史系黨總支對朱永嘉是保護的。6月8日和9日，係總支連開兩天擴大會議，批評想批判羅思鼎的教工是打橫炮，是將鬥爭矛頭錯誤地指向左派。朱永嘉也在會上說：「我們在前線作戰，你們在後面放冷箭，這算什麼？」³⁹ 朱永嘉知道，自己的人事關係和黨組織關係都仍在復旦，在市委寫作班工作只是借調，最終管自己的還是復旦大學。如果真有人和自己過不去，非要批判自己，那自己在市委寫作班是待不下去的。所以對黨總支保自己，朱永嘉很感激，認為這其實也是復旦大學黨委對自己的態度。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他在隨後6月13日至15日的

39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載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七期。

三天中，給歷史系學生和青年教師開了一系列座談會。在座談會上，他向大家介紹市裏運動情況，身居政治中心市委寫作班的他比別人知道得多。他為市委、校黨委和歷史系黨總支講了許多好話，說上海市委是緊跟中央的，和北京市委不一樣；復旦大學是楊西光的點，是緊跟市委的；系黨總支是緊跟校黨委的。所以大家不要把矛頭對準校黨委和系黨總支。⁴⁰ 朱永嘉這番話，成為他「保復旦黨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證據。

復旦大學鬥鬼風蔓延時，朱永嘉正在學校，他對這樣殘酷批判那些知名教授很不贊成，認為黨委不應該不出面制止，但他也不敢出面反對。他的導師陳守實教授被批鬥得實在吃不消。陳教授的兒子找到朱永嘉，希望朱能幫忙向歷史系黨總支打招呼。朱永嘉要陳的孩子轉告陳教授，不管怎樣都不要自殺，說着眼淚都掉下來，但他最終還是沒去打招呼。⁴¹

北京紅衛兵到上海，第一批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朱永嘉和寫作班的人就站在市委大門口攔着，盡量不讓紅衛兵進大樓；第二批紅衛兵到上海時，他又和寫作班的人一起寫大字報，呼籲要文鬥不要武鬥。當時強調文鬥者，都被視作保守派。朱永嘉對北京紅衛兵有看法緣於自身經歷，他家這時也被抄。他父親是資本家，住在武夷路上一幢小洋房內，北京紅衛兵一來，父親住房被搶。父親肝硬化，腹水，躺在床上起不來。紅衛兵卻硬把他從床上拖起來，要他掃街。朱永嘉只好讓自己的兒子每天代爺爺去掃街，將父親送去姨媽家養病。朱永嘉他們還幫市委處理應急事件。北京紅衛兵打死人，他們去公安局整理上報材料；哪裏有突發事件，他們去解圍。直到9月底市委派他去北京收集情況。

40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前前後後》，載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七期。

41 筆者 1989年8月30日對原上海市革會寫作班工作人員許國良的訪談。

朱永嘉去北京時，正是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丕顯已在北京。據說陳要姚文元幫忙修改自己的檢查，姚文元不幹。朱永嘉不知張春橋和姚文元住在哪裏，沒去找他們。到北京後正值毛澤東第六、第七次接見紅衛兵。朱永嘉有《文匯報》的記者證，可以走近距天安門城樓很近的金水橋。他在金水橋上看到在天安門上的張春橋，張春橋也看見他。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不幾天，張春橋和姚文元來到朱永嘉在北京下榻的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北京辦事處看望他，估計是在北京開會的陳丕顯將朱永嘉在京的住址告訴他們的。他們問朱永嘉在上海的情況，姚文元特地問寫作班還寫不寫文章，朱永嘉回答說不寫了，寫作班的人都無事可幹，反正是市委叫做什麼就做什麼。朱永嘉那時對局勢心中無底，也談不出什麼自己的看法。張、姚問朱到北京來幹什麼，朱說是陳丕顯讓來的，任務是搜集首長講話，還有北大、清華的大字報和傳單，給上海市委作形勢參考。張春橋說：這有什麼意思？中央有什麼精神我們會告訴市委的，而且你也看不到什麼東西的，還是回去好。⁴²朱永嘉說，我來北京是陳丕顯派我來的，總不能沒有組織通知就自己回上海。張春橋也就不再說這個話題。張春橋轉入另一個話題，說要到群眾中去，要到少數派中去，支持群眾，這是中央全會精神。張春橋還說，你們不要在上面機關裏閒蕩，要到群眾裏面去，去支持群眾的造反，不要做市委安排的那些沒意義的事，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心意思就是要寫作班到群眾中去，要支持造反派。朱永嘉以後回憶，他感覺張春橋要他們不要去為市委做事，雖然張礙於當時和市委關係還未破裂沒有說得很明白。⁴³

送走張春橋和姚文元，朱永嘉馬上給徐景賢打電話，告之張、姚的話，還給復旦大學歷史系黨總支書記打電話，要他

42 筆者 1989 年 8 月 30 日對原上海市革會寫作班工作人員許國良的訪談。

43 筆者、顧訓中 2005 年 7 月 23 日對朱永嘉的訪談。

「屁股坐到造反派一邊去」。寫作班的人本來都比較聽市委的。局勢的發展，加上朱永嘉轉告的張、姚的話，他們思想開始轉向。但是，究竟怎麼支持造反派，朱永嘉也心中無數。朱永嘉沒有馬上回上海。在北京事情不多，整天就是到清華、北大、北航等大專院校看大字報；還有就是給上海打電話，寄傳單，通過徐景賢三天兩頭向上海市委匯報。安亭事件時，部分工人造反派到了北京，朱永嘉還曾去勸說他們回上海。在上海的徐景賢等人也一樣，不知如何行動。接到朱永嘉傳達張春橋談話的電話後，他們仍然一直沒有動靜。

黨支部書記郭仁傑

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副書記郭仁傑，是寫作班哲學組的組長。1965年底市委寫作班重新成立哲學組，郭仁傑被從華東政法學院調來，寫作班黨支部成立後，郭擔任黨支部副書記。

郭仁傑出身很苦，山東煙台人，參加革命很早，資格比徐景賢和朱永嘉老得多，年齡也大了好幾歲，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幹部，參加過八路軍。共產黨執政前夕曾經上過華東革命大學，在學校編過校刊。1952年大專院校調整，原華東革命大學副校長李正文調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將郭仁傑也帶了去，任哲學系黨總支副書記。原是地下黨的李正文是知識分子幹部，和工農出身的軍隊轉業幹部副校長王零關係不融洽，後來李調走了，留下郭仁傑。郭和校黨委及系黨總支書記也搞不好關係，1959年反右傾時又挨了批判，從此乾脆不管事。郭仁傑為人直爽，說話直來直去，講義氣，表裏如一，有什麼意見就直說，而且有自己的獨特想法。例如他堅持認為對毛澤東思想也要一分为二，這在當時是非常忌諱的命題，因為這意味着被認為是絕對真理的毛澤東思想，也有可以被質疑的一面。⁴⁴ 而

44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當時復旦大學黨委則認為他是個愛擺老資格，對領導不買賬不聽話的幹部；那時復旦校園內經常可以見郭仁傑背着氣槍打麻雀，一副無所事事的樣子。1964年8、9月間，郭仁傑調離復旦大學，到華東政法學院任哲學系主任。

與徐景賢、朱永嘉等相比，郭仁傑沒有系統地上過學，沒有受過完整的專業教育。雖然去過華東革命大學，但這一類的「革命大學」，確切地說只是政治培訓班。郭仁傑屬於共產黨一類幹部的類型：長期以外行的水平在專業部門裏領導內行們，對業務不甚精通，對政治運動卻很敏感。不過他與同是機關幹部的徐景賢又不同，他畢竟是在最高學府，即使從事黨的政治工作，也是為教育業務服務，在學校，教學總是第一位的。學校畢竟不是機關，政治上束縛少許多。

哲學組當時的任務是批判楊獻珍的物質和意識同一性，也即被稱為「合二而一」的哲學觀點。但是，重組後的哲學組成員都不是科班出身，都沒有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程綺華等雖然在市委黨校從事哲學教學，但嚴格說來那只是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讓他們寫哲學批判文章實在是勉為其難。寫了好幾個月，哲學組始終沒寫出能夠發表的像樣文章。讓郭仁傑批判赫魯曉夫的人性論，郭仁傑下筆千言，離題萬里，文章開頭，說赫魯曉夫「枉披人皮，不吐人言」，石西民看後連說，這怎麼是理論文章，瞎搞！⁴⁵

文革開始後，分管寫作班的張春橋去了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徐景賢忙着為市委領導們寫檢討，寫作班沒人管。當寫作班其他人都在閒蕩觀望時，郭仁傑卻很早就造反了。還是在8月，紅衛兵運動剛興起時，楊西光將郭從華東政法學院調回復旦大學，讓郭處理復旦學生中的混亂。8月底9月初，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市委組織機關工作人員輪流值班，阻止他們衝進市委大樓，郭仁傑也被安排值班。別人值班總有幾

45 金光耀、金大陸、筆者 2009 年對王知常的訪談。

分緊張，郭仁傑卻非常輕鬆活躍，在紅衛兵中穿來穿去，如魚得水，一點不像是守方。陳冀德值班時，從門外的紅衛兵那裏聽說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不大相信，去問郭仁傑，郭仁傑說，很可能真有這事，有人不信，難道就不存在了？他雖然沒有親眼看見，但是他相信。⁴⁶

郭仁傑家就住在復旦大學旁邊，他喜歡人際交往，和許多學生的關係很鐵。他沒事就泡在復旦看大字報，認識了紅革會負責人，進而參加了紅革會。寫作班後來集體造反，他起了很大作用。10月12日市紅革會成立那天，郭仁傑也去參加。那天，正值朱永嘉準備去北京。郭仁傑喜歡喝酒，那天老酒喝得醉醺醺地找到朱永嘉，說今天紅革會成立大會你們為什麼不去參加。還說：你們這幫子人就知道關起門寫文章，不關心運動，不關心國家大事。確實，直到1966年10月甚至11月，整個寫作班成員對文革運動都還在一邊作壁上觀，只有郭仁傑積極投入運動，加入了造反派。

大學教師王知常

和郭仁傑一樣講義氣的還有王知常。他生於1932年，上海一個普通職員的家庭，父親是世界書局的會計。作為傳統意義上的長房長孫，在他祖父的督導下，從小就背誦四書五經，打下了扎實的國文國學基礎。1949年5月，共產黨執政上海，他正在讀高中。和那時許多青年一樣，他懷着對新政權的美好憧憬和一腔熱血，報名參軍，旋即隨軍南下剿匪，因表現出色，獲得過嘉獎，從普通士兵一路升到連長，1954年在部隊入黨。後來，因為有高中學歷，他被抽調到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工作，曾兼任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蕭望東的文化教員。離開部隊時他已經是中尉軍銜。但是，因為對歷史的愛好，他放棄了軍

46 陳冀德回憶錄《生逢其時》。

隊升遷機會和優厚的部隊待遇，1957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當一名普通學生。1962年畢業於復旦歷史系，留在歷史系任助教。⁴⁷

王知常知識面非常廣，喜歡談天說地，評古論今，被寫作班同事稱為「萬寶全書缺只角」，上海俚語「知識淵博」的意思。他熟讀中國經典，記性又極好，舉凡孔孟老莊韓荀墨，他都十分熟悉，《史記》文革前就通讀過三遍，《漢書》、《三國志》通讀過兩遍。魯迅是他最佩服的作家，《魯迅全集》更是讀過好幾遍。他思路敏捷，文風犀利，筆頭很快，點子也多，自詡寫文章立馬可待。他業務面寬，中國外國、古代近代、正史野史、筆記小說、事件人物、宮廷民間，樣樣來得。還是在大學一年級讀書時，他便在1958年的《學術月刊》上發表論文：《評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很早就出過《孫中山小傳》等書。他發表過多篇論文，1963年又和朱永嘉一起撰寫《評周谷城的〈禮樂新解〉》，由他定稿，署名羅思鼎，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王知常業務能力強，也看不上業務差者。他給人的印象是矮矮身材，戴着深度近視眼鏡，不修邊幅；喜歡喝酒，酒量過人，寫文章時大杯黃酒放在一旁，邊喝邊動筆；興致來時滔滔不絕，口若懸河，話不投機時悶聲不響，一言不發；他性格透明，說話直率，恃才自傲，不拘禮節，對好感的人掏心相待，對看不慣的人直言相駁，是個性情中人。他嚴守承諾，做事投入認真。被認為是文化人和底層平民的矛盾結合體。⁴⁸而他對自己的評價是：

我自幼受各類文藝書籍的熏陶，性情好走極端，極熱烈而又極冷靜，極疏狂又極精細，極善於處世而又極不會處

47 王知常的兒子王征 2014 年 5 月《一個兒子眼中的父親》。

48 這是王知常兒子王征對父親的評價，《一個兒子眼中的父親》，載於網上新浪博客《我母親的博客》，2014 年 5 月。

世，極喜觀察社會又往往沉溺於幻想之中，性如烈火又極心軟，自尊而自卑，最服忠厚長者而又最愛鬥心計。況我見事遲，既經不起捧場，又吃不住激將，一激動，往往鬧出大禍。我讀書多，閱歷廣，出手極是狠毒，過後又後悔莫及，此我喜怒無常之性格之由來也。⁴⁹

王知常和朱永嘉一起被從復旦調去市委寫作班。在寫作班，那篇令人矚目相看的文章《大節、氣節、晚節》，就是由王知常執筆，曾經得到姚文元好評，說是寫作班最好的三篇文章之一。姚文元所說的另外兩篇是《評方求〈論清官〉》、《習慣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對話》，前一篇也是王知常執筆的。⁵⁰

王知常和朱永嘉風格不同，朱永嘉作風嚴謹，辦事認真；王知常落拓不羈，不拘小節。但王知常與朱永嘉又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對中國歷史有相當精深的研究，既「以天下為己任」，又「士為知己者死」，而且王知常經常掛在嘴邊。王知常的這個特點，連不愛說話的姚文元都向他指出過。姚文元的辦公室就在王知常的歷史組隔壁，武康路2號的二樓。他和姚文元原來不熟，成為工作鄰居後，漸漸熟了。一次周末，別人都回家了，他們兩人在屋裏烤火聊天，姚文元談論起歷史組的幾個人，他很少這樣評論人。他說吳瑞武比較穩扎，做事把細，但過於平穩；說朱維錚不夠扎實；說到王知常，評價說「你這個人，最大毛病就是士為知己者死」。王知常認為姚文元說得對，「實際正是這樣，我這個人武俠小說看得多，江湖義氣第一樁」。⁵¹ 和徐景賢一樣，王知常那時對姚文元也十分佩服，

49 轉引自司馬東去著：《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50 同上。

51 同上。

而且「佩服得五體投地」。⁵² 姚文元在政治上的敏感給王知常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批判《海瑞罷官》的過程中，王知常寫了一篇批判清官論的文章。姚文元幫他修改，文章起始，劈頭就是一句：地主和農民誰養活誰？讓王知常吃驚，也讓王知常佩服——文章原來可以用這樣的大白話作開頭。以後，王知常寫批判文章，就是向姚文元學習，「他好像是我的引路人」，王知常後來這樣回憶說。⁵³。

朱永嘉宣佈「我要造反」

郭仁傑造反後，想方設法動員整個寫作班造反。他首先想到朱永嘉。因為朱永嘉是復旦的教師，郭仁傑與復旦紅革會熟悉，讓復旦學生逼朱永嘉造反，比較順理成章，也容易操作。而且朱永嘉又是寫作班歷史組組長。寫作班歷史組和他郭仁傑的哲學組兩個組如能造反，寫作班造反也就成功大半。郭仁傑為紅革會出主意：把朱永嘉從北京叫回來，逼他造反。11月23日，兩條大標語刷在歷史系辦公樓門前：「朱永嘉必須回來參加運動」，「朱永嘉必須接受革命群眾批判」，都是歷史系紅革會刷的。復旦黨委馬上向市委匯報。11月24日，徐景賢打電話給朱永嘉，通知他回上海參加運動。朱永嘉知道參加運動無非就是挨批鬥，但還是當天就買了機票飛回上海。到上海第二天，朱永嘉便去了學校。

保守派「乘風破浪戰鬥組」馬上搶在造反派前面對朱永嘉進行批判。「乘風破浪」的主要成員是六名教工，大都是學生指導員，此時的形勢已經是從中央到市委一邊倒地表示支持造反派，「乘風破浪」欲以批判朱永嘉的行動表明自己的組織也造反了。11月26、27日兩天內，「乘風破浪」連續在歷史系召

52 轉引自司馬東去著：《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

53 金光耀、金大陸、筆者 2009 年對王知常的訪談。

開三次大會批判朱永嘉，主要內容是說朱永嘉貫徹資反路線，保復旦黨委，因為朱永嘉說過「復旦黨委是正確的」之類話；說朱永嘉的文章都是根據彭真《二月提綱》寫的，朱永嘉為文匯報座談會起草的關於開展對《海瑞罷官》討論的提綱，都是學術問題，是呼應《二月提綱》不要把學術問題上綱到政治問題的旨意。他們說要追根子，「該追到哪一級就追到那一級，絕不手軟！」⁵⁴ 與此同時，造反派也動員朱永嘉造反，他們對着朱永嘉念毛澤東1949年寫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要他認清時局。

保守派和造反派，兩邊都批判朱永嘉，朱不想被兩派夾攻，決定造反。這正是郭仁傑希望達到的結局。郭仁傑曾對王知常承認，是他鼓動造反派去揪朱永嘉的，否則朱永嘉不會起來造反。11月28日，朱永嘉寫了一張大字報《我要造反》。他後來回憶自己當時思想：

我想，不表態也不行，而且張、姚在北京時，就曾示意我要到少數派一邊去……

一些書上說我回復旦的目的就是要造反，實際上我是被動造反的，實在沒有別的路好走，只有造反這條路的情況下起來造反的，是被逼上梁山。⁵⁵

但是，紅革會卻做過了頭。在召開批判朱永嘉大會的同時，11月26日晚，復旦大學紅革會去抄朱永嘉的家，沒抄出什麼東西；27日晚，紅革會的「前衛兵團」又去武康路抄寫作班的辦公室。朱永嘉被復旦揪回批鬥後，他的寫作班歷史組組長職務被解除，改由吳瑞武擔任組長，所以紅革會敢於去

54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192 頁。

55 朱永嘉、金光耀 2006 年未刊稿《已申春秋》。

抄朱永嘉的辦公室。紅革會抄了朱永嘉的寫字桌，拿走了羅思鼎的資料文稿；順便又抄了另一張桌子，拿走了所有資料。徐景賢當時在場，勸他們不要拿走這些文字材料，說你們拿走了以後還得原樣還回來。紅衛兵們根本不買賬，將所有材料裝進麻袋，揚長而去。紅衛兵們不知道，他們抄的另一張桌子是姚文元的，而且抄走的是批判《海瑞罷官》和批判三家村的原始稿件。徐景賢馬上打電話向姚文元匯報，姚文元非常生氣，馬上報告張春橋，張春橋又報告中央文革小組。張、姚與王力、關鋒、戚本禹議論後，決定干預。⁵⁶ 造反派抄寫作班辦公室之事，就這樣驚動中央文革。

紅革會又提出朱永嘉和王知常執筆的一篇文章實際上是為市委塗脂抹粉。這篇以「羅思鼎」名義發表的文章，題目為《評文科教材——周揚在大學文科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大陰謀》，刊登在1966年8月11日的《解放日報》。紅革會認為抓住了朱永嘉保市委的要害，決定乘勝追擊。朱永嘉託人給紅革會打招呼：「文章是張春橋同意發的，你們要追後台，就追到張春橋頭上去了。」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也找到紅革會負責人，勸他們再不要在《紅衛戰報》上將要發表的《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工具》中，有批判羅思鼎的內容。但是11月28日出版的第9期《紅衛戰報》還是發表了這篇文章，而且點名批判羅思鼎。這第9期《紅衛戰報》，正是紅革會要求和《解放日報》一起夾送，引出解放日報事件的那一期。

保守派那邊，11月28日，「乘風破浪」在復旦大學學生宿舍的中央食堂再一次組織批判朱永嘉。這次批判會規模比前兩天更大。朱永嘉寫的那張《我要造反》大字報就貼在會場門口，高音喇叭反復廣播這張大字報，全校各派紅衛兵都來了；學校黨委書記和歷史系黨總支書記等，也都被要求到場。正在批鬥朱永嘉時，王知常和朱維錚等人來了。他們上台搶了話

56 引自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763頁。

筒，質問「乘風破浪」矛頭對着哪裏。接着，紅三司的安文江也上台批判「乘風破浪」。批判會開得不了了之。

就在「乘風破浪」批判朱永嘉的第二天，11月29日晚，姚文元和徐景賢通電話。姚文元說：我和春橋同志商量的，復旦要進一步追羅思鼎小組的根子，告訴他們好了，根子就是張春橋，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誰要揪，到北京來揪好了！還說：關鋒、戚本禹聽到復旦揪鬥朱永嘉，都感到很氣，準備送大字報到復旦去！⁵⁷ 徐景賢的筆記本上記錄了這次通話的內容：

宣讀(在左派中宣讀)姚給丁電話

(1) 聽說復旦黨委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搞羅小組，揪朱。張、姚驚訝！關戚憤。

(2) 根子是：追根問題話要講得硬，本單位本校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朱的問題為什麼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要追張春橋。⁵⁸

徐景賢後來回憶說：「這是在整個文革期間聽到的姚文元的一次最強硬的表態。」⁵⁹ 他當即向寫作班郭仁傑等傳達。姚文元打一次電話還不放心，過了會兒又一次打電話給徐景賢，要他以丁學雷名義，將中央文革小組的意思直接轉告復旦兩派：羅思鼎在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線是對頭的，和姚文元合作很好。寫作班在前一時期是受張春橋直接領導的。⁶⁰ 姚文元還要徐景賢傳達時「把話講得硬些」。徐景賢後來回憶說：他當時接電話的第一反應就是：

57 轉引自王知常 1980 年 7 月 7 日交待。

58 徐景賢工作筆記 1966 年 11 月 29 日。

59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60 徐景賢 19779 年 10 月 19 日交待。

「這是姚文元去北京後給我打的最重要最交底的一個電話。他這樣說，完全把我們作為張、姚自己的嫡系部隊，高度信任，全力支持」。⁶¹ 中央文革小組出面保朱永嘉，寫作班的人心裏有底了。

「乘風破浪」不甘於前一天的會議結局，12月29日深夜再開批判會。但會上寫作班的吳瑞武上台宣讀了剛才姚文元電話的記錄全文，一下扭轉了會議氣氛。復旦大學局勢也因此大變，造反派聲勢大振，佔了絕對上風；保守派被指斥「批判朱永嘉是為了矛頭對準中央文革」，內部紛紛倒戈，無形解散。朱永嘉也就此解脫。

對張春橋出面保自己，朱永嘉很感激：「因為張、姚的話幫我度過了保守派門我這一關，所以我對張、姚可以說是感恩戴德的，認為他們能這樣保我是很不容易的，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拉了我一把，對我很好。」⁶² 以後整個文革十年，還發生過幾次有人想碰寫作班之事，張、姚都迅速回擊。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當初批判朱永嘉的六個保守派指導員都被復旦大學清查。

朱永嘉造反後，復旦大學的紅革會和紅三司，都把朱永嘉的造反，看作是自己的成就，而且都想利用羅思鼎這個能與中央文革直接聯繫的政治資源。紅革會的「前衛」兵團對朱永嘉說：羅思鼎一舉一動都要事先徵得他們同意；紅三司安文江希望朱永嘉去他們那裏辦公；就連郭仁傑也干預朱永嘉的行動，朱永嘉去動員校黨委和系總支領導造反，郭仁傑對他說：「老朱，紅衛兵還沒討論決定讓哪個幹部造反，你怎麼就來插手了？」朱永嘉和王知常、吳瑞武討論後決定，哪派都不參加，離開復旦，回寫作班去。

61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62 以上資料均引自朱永嘉、金光耀 2006 年未刊稿《已申春秋》。

寫作班召開全體會議討論

徐景賢也希望朱永嘉他們回寫作班。但是此時朱永嘉感到自己已經宣佈造反，回寫作班後，怎麼和還沒造反的徐景賢相處？他們於是商量也動員徐景賢造反，由郭仁傑先去動員。

徐景賢對造反一直很猶豫。畢竟，作為一個長期在執政黨高層機構工作的機關幹部，要走出這一步很難。此時，雖然毛澤東號召造反，但那是中央的號召，中間還缺了幾個層次。幹部們要行動，必須得到直接上級的佈置。過去歷次政治運動從來就是這樣層層佈置，層層行動。而且，徐景賢如果造反，還與朱永嘉不一樣，朱永嘉只是造歷史系黨總支和復旦大學校黨委的反；徐景賢卻身在上海市委，要造反就是造市委的反。在中央沒有對上海市委做出是否打倒的表態之前，作為一個市委幹部，很難做出超前的行動決定。尤其處世行事一貫比較謹慎的徐景賢，朱永嘉形容他是「諸葛一生唯謹慎」。

動員徐景賢造反最起勁的是郭仁傑。他不是機關幹部，機關那些清規戒律對他影響較小；加上原來就對誰都不大買賬的性格，沒有那麼多顧慮。12月12日下午，郭仁傑在寫作班敦促徐景賢造反。有剛因解放日報事件名聲大振的紅革會作後盾，郭仁傑對造反很有信心。在場的寫作班文學組成員陳冀德後來回憶說，郭仁傑那天對徐景賢的講話「很硬」。但徐景賢還是猶豫。郭仁傑於是邀他第二天去復旦大學看大字報，感受一下這所被稱為上海文革風向標的大學的造反氣氛。

當晚，徐景賢給在北京的姚文元打電話，姚文元問徐景賢：「你們是寫文章，還是上第一線？」⁶³ 姚文元雖然沒有直接表示要徐景賢造反，但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寫作班不要再關門寫文章。姚文元當時可能也沒有想清楚，作為市委機關幹部該如何造反；畢竟，那時只有學生和工人造反，還沒有幹部造

63 徐景賢工作筆記，1966年12月12日。

反先例。但姚文元要徐景賢不要再為市委寫檢討效力的意思應該是清楚的。姚文元的支持令徐景賢心動。第二天，12月13日早晨，他對陳冀德說，我們去復旦看看吧。陳冀德當時覺得，徐景賢昨天還猶豫猶豫，怎麼睡了一個晚上就精神大變，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姚文元的電話。徐景賢與陳冀德同去復旦大學串聯，他們稱之為「留學」，結識了紅革會和紅三司的馬立新、安文江等。復旦大學貼滿大字報，復旦教師郭仁傑和吳中傑等陪同徐景賢等看大字報。郭仁傑、朱永嘉、吳中傑等都鼓動徐景賢造反。徐景賢又去參加一個正在舉行的紅衛兵會議，會上即興發言，將郭仁傑比作暴風雨中的海燕，博得了紅衛兵的掌聲。中午，他們在朱維錚家吃了簡單午餐，然後與王知常、郭仁傑以及吳中傑等，一起討論到底要不要造反。徐景賢表示，此事需與寫作班全體成員一起討論。

在寫作班醞釀造反之前，王知常已經提出要造寫作班的反，要揪出寫作班的走資派。如果真是這樣，那徐景賢就成了造反對象。因為吳瑞武的反對，說還是大家一起造市委的反，才使徐景賢免受一次可能的衝擊。⁶⁴ 傍晚，徐景賢等回到武康路2號。當晚，寫作班全體成員：文學、歷史、哲學三個組近二十人，在武康路2號樓下開會。這次會議開到深夜，是寫作班成立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關於這次會議，徐景賢在工作筆記本上做了詳細記錄。對照後來其他人回憶，可以大致感受當時氣氛，了解寫作班各人的造反態度：

郭仁傑：市委某些人玷污這個班子的旗幟……楊(楊永直)來避難，常(常溪萍—筆者注)來避難。有的做消防隊員，有的做勤務(原文如此—筆者注)……控訴、揭發反動路線的毒害。拿寫作班當蔡祖泉、楊富珍，怎麼讓丁學雷去抵擋造反派。

64 司馬東去著：《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

楊永直叫老徐寫檢查。(要徐景賢為楊永直寫檢查——筆者注)

姚文元來電話問還是寫文章還是上來第一線，意思很清楚。

「革命才知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

到了決定我們寫作班命運的時候了！曹(曹荻秋——筆者注)、楊死了還是有新的阻力。楊西光或者曹倒了，保的勢力和阻力還是存在。要準備有被人砸。

如果因為中間人多，旗幟不鮮明，可以考慮。現在市委機關正需要一個衝出來的旗幟。

朱永嘉：兩個階段，張、姚在，是正確的。姚走，寫作班和文革小組基本上在楊西光的控制下。楊要我們的材料具名，在會上點我們的名，為自己撈政治資本。在市委門口受受圍攻，挨挨罵，事實上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和當權派，和資反路線站在一起。我們對北京同學或造反派的看法，是折中的，是錯誤的，我們組執行反動路線是最頑固的。楊公開說，對你們這個小組很有興趣。產生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的資立場，世界觀未解決，對黨對人民不利。

和資反路線……(原文不清——筆者注)是一個鬥爭。宣佈造反到肅清影響有一個過程。對當權派的感情深，而對造反派有距離。要縮短這個距離，還是要到群眾中間去。還會有各種各樣反動路線的影響。過去我們總希望黨委不完全垮。

思想準備：來自當權派的阻力。另外，周圍的人。

要準備不能做第四司令部，要和革命造反派的大部分在一起，另打旗幟，另搞旗號，就要出問題。

方向：不主張內外結合，但準備內外結合。阻止我們的理由，有一個是黨的機密問題。

我看到現在為止，市委書記處還是在頑固地執行資反路線，頑固地保走資道路的當權派。

楊(楊西光—筆者注)對孟(孟波—筆者注)、楊學說(原文如此—筆者注)「在敵人面前不要認錯」那天：都包在我身上辦了。

[楊的一個材料，藝術檔案，關於櫃台(文革前的一個戲—筆者注)的一個講話。

對李青山問題的態度，在敵人面前不要認錯。

黎(黎家健—筆者注)等利用多數派，竊取少數文件，拍照。

選舉文革代表，谷虹介紹，組織紅衛兵要抓領導權。

給楊寫檢查。楊、孟叫去和少數派談判，簽字，印數】

問我們這裏可靠嗎？蔡、劉。(支開)

宣傳部大字報紛紛藏起。

要我們了解高冀芬的身份(高冀芬是北京來滬串聯的紅衛兵—筆者注)。(撒謊，說不知道)

抓白毛女(11中以後，在市委會上作了一個很壞的發言)
劉貴琴事

思想上個人得失：提拔，市委文革，是城南，沒有受壓抑

楊永直講：「我犯了路線錯誤；人家就是正確，張春橋就是「正確的」

楊永直打電話給張春橋，向紅衛兵致敬是毒草(指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筆者注)，精神不一致。⁶⁵

朱永嘉還說，春橋、文元要我們到群眾中去，不要關門寫

65 以上郭仁傑和朱永嘉發言均引自徐景賢工作筆記 1966 年 12 月 13 日，因為是會議記錄，原文不少地方是縮寫簡寫，有些無法看清字跡的句子，筆者只能捨去不引。標點符號是原來的(除了因筆者看不清字跡加的省略號)，有些括號內的句子是筆者為方便理解而加的，後面注明「一筆者」；沒有注明的括號內文字，是原文所有。

作，這是對我們的愛護，再不採取主動，寫作班勢必成為市委對付造反派的工具，怎麼對得起春橋文元吶。⁶⁶

王知常發言：

王知常：

思想消沉，四個原因：1. 脫離人民，2. 安逸的感覺；3. 受感情支配，楊西光很壞，大家去受圍攻；4. 反右鬥爭的框框束縛。市委下來總是正確的。奴隸主義。⁶⁷

而在幾十年後，參加當時會議的陳冀德回憶說，王知常發言最激烈：

會議在王知常對徐景賢一通臭罵中開場。他跺着雙腳，直指着徐景賢的鼻子，說道：《海罷》的發表標誌着文革的開始。老兄，我們造反比聶元梓還早！結果呢？在市委門前值班，受人圍攻。歷史組被砸，朱永嘉被綁，市委把丁學雷、羅思鼎拿出來做擋箭牌、滅火機，對得起誰啊？再這樣老保下去，對不起，我們一拍兩散。到時候，批鬥會上見！⁶⁸

其他所有人發言，都認為寫作班在文革開始以來的一個階段迷失了方向，市委利用寫作班對付群眾，在市委門口站崗，做御林軍、消防隊，糟蹋了寫作班名譽。革命造反，就要反到底，想走第三條路，想再獨樹一幟，是不可能的。寫作班哲學

66 朱永嘉、金光耀未刊稿《已申春秋》。

67 徐景賢工作筆記 1966 年 12 月 13 日。

68 陳冀德 2008 年著《生逢其時》。不過，從徐景賢筆記來看，開場的不是王知常，而是郭仁傑，然後是朱永嘉發言，朱發言後，還有幾個人發言，然後才是王知常發言。陳冀德引的內容，未見於徐景賢的筆記本，也可能徐沒有記錄下來。

組全部人員在這次會議前已經跟着郭仁傑造反，歷史組組長吳瑞武也贊成造反。哲學組和歷史組態度都很明確，主張造反，就看文學組了。文學組的陳冀德比較猶豫，認為郭仁傑、王知常等太激烈。另外兩個組員吳立昌和劉景清也不願意造反，他們對政治鬥爭不感興趣，認為市裏的事我們管不了那麼多，沒必要軋進去，還是管自己寫文章。

徐景賢終於下決心

十幾個寫作班成員，全部來自高校、社科院和文化系統的單位，只有徐景賢是市委機關的幹部。徐景賢是文學組長，也是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實際負責人，在寫作班一向威信比較高。寫作班集體造反，最終要由他來拿主意，但他一直不表態。王知常急了，言辭激烈。但即使王知常指着徐景賢鼻子斥責，徐景賢也一聲不吭，他後來回憶自己猶豫的原因：

第一，我認為上海市委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過程中，包括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中，整體是站在革命方面的……陳丕顯還參與領導了對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討論，這是我親眼所見。……

第二，一九六四年我從市委宣傳部調到市委寫作班以後，市委對我非常重用，我是一個既得利益者。……市委對我的確不薄，如此重用，我不能忘恩負義，感到一下子難以與市委決裂……我對自己已經到手的一些既得利益，捨不得丟掉。……

第三，長期以來黨內有一種思維定勢：群眾運動起來以後，牛鬼蛇神必然要自己跳出來……我擔心，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會不會像反右派那樣，先發動大家鳴放、造反，到最後來一次總算賬和大反擊，抓一大批右派。如果誰帶

頭的話，說不定將來會劃成右派或者什麼分子。……

第四，十多年來黨一直教育我要遵守黨的紀律，特別是因為我在黨的高級機關工作，更覺得要注意保守黨的機密，注意黨內外有別，注意一言一行的影響，顧及黨的利益。至於首腦機關像省、市委這一級能不能造反，這在全國是沒有先例的，市委的領導人也一再強調這些觀點。⁶⁹

文革後徐景賢曾說，他對寫作班造反的事，整整猶豫和考慮了三天。這三天應該就是從1966年12月12日姚文元來電之後。到寫作班開會後的第二天早上。寫作班開完會已是12月14日凌晨，大家都去睡一會兒。第二天早上，14日早晨，徐景賢碰到朱永嘉，第一句話就是：「想想過去市委對我也沒什麼好處，下決心造反了」。⁷⁰

13日寫作班全體成員會議爭論的焦點是：究竟造寫作班直接上級市委宣傳部的反，還是再往上造市委的反？對於造反，大家已經都沒有異議，但造反造到哪一級？多數人都主張既然造反，就造到底，造市委反！⁷¹ 徐景賢14日早上，以寫作班支部書記的身份，正式表示同意造反，造市委的反。徐景賢決定了，造反之事就沒有異議。12月14日上午接着開會，文學組那兩個曾經反對造反者，既然大家決定集體造反，他們也就跟着走了。在人際關係上，寫作班始終非常單純和團結。絕大多數寫作班成員更在乎自己業務出成績，對權力和地位不甚熱心。文革前大家融洽相處，相互之間沒有人際糾葛，有意見當面提，有時意見提得相當激烈甚至尖刻，但誰也不會往心裏去。文革開始，外面世界已經是大字報遍地，寫作班內部卻始終

69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70 朱永嘉 1979 年 10 月 21 日交待，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71 王知常 1979 年 10 月 20 日，同上。

風平浪靜，就像是颱風中心的颱風眼，沒有一張大字報，更沒有你來我去的相互揭發或批判。這也是寫作班會集體造反的原因：要行動，就大家一起行動。寫作班這種團結一致，一直保持到文革結束。

決定造反的1966年12月14日晚上，徐景賢又往北京給姚文元打電話，向姚匯報和請示。姚文元聽了徐景賢的匯報後，不直接表態說我們支持你們，只是說，你們願意革命，我們總是支持的。他不用「造反」，而用「革命」兩個字，當時給徐景賢印象非常深。⁷² 姚文元在電話中，還要徐景賢把主攻矛頭指向陳丕顯和曹荻秋，以批判資反路線打開市委缺口。姚文元認為，造反派在解放日報事件策略上考慮不夠，沒有輿論準備，要吸取經驗教訓，加強輿論工作。姚文元還告訴說，馬天水在北京經過張春橋做工作，已決心造反，要徐景賢找馬天水。徐景賢記下了姚文元的話：

曹從十一中全會到現在，態度肯定是非常頑固的。……

工業發下了，搞農民(指《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筆者注)，允許工農起來革命。……

解放日報的大方向，佔領，支持革命行動，策略上佔領前更多考慮，效果更好。沒有輿論準備。……

大方向總是這樣。(先搞反動路線)……

為啥要死保楊西光、常溪萍，陳曹講到這個人就非常好。死保裏肯定有問題。……

馬在會上表態度，開始不好，林(林彪——筆者注)批評，走以前，春橋找他談過一次，堅定站到毛主席司令部這邊來。願意改過。(找馬天水)⁷³

72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73 徐景賢工作筆記 1966 年 12 月 14 日夜。

市委機關聯絡站串聯成立

寫作班造反醞釀之前，上海市委機關內部一些部門已有造反組織，但影響不大。造反最早的是市委黨刊編輯室的工作人員。市委黨刊編輯室，是市委辦公廳下的一個辦公室，與市委秘書室平行。說是「室」，其實編輯有四個刊物：面向基層黨支部的《支部生活》雜誌、面向上海郊縣農村黨支部的《農村支部生活》雜誌、面向十七級以上黨內幹部的《黨的生活》雜誌、還有不定期內刊《未及發表的信稿》。文革開始後，支部生活編輯部人員很早造反，批判黨刊編輯室負責人丁柯。丁柯因「生活問題」，文革前夕已被所在黨支部內部教育，文革興起後，更是被貼大字報。1966年9月，除了編委們，全體編輯和工作人員都造反，召集人是編輯部的凌岩等。

寫作班決定造反，由哲學組程綺華、謝忠範負責串聯工作。他倆原來是黨校教師，市委局機關的黨員培訓都由市委黨校管，所以他們對市委機關各部人頭熟悉，他們去串聯，能夠發動更多機關幹部。程綺華去黨刊編輯室串聯，找到凌岩，凌同意加入，隨後便在室內宣佈了此事。支部生活編輯部編輯王承龍⁷⁴聽到後，第二天去了寫作班，自我介紹是黨刊編輯室派出的聯絡員，事實上，王承龍是自己去寫作班聯繫的，並不是黨刊編輯室派去的。王承龍一進寫作班的門就說：「寫作班造反好！市委後院起火，心臟爆炸！」後兩句話後來成為寫作班的造反口號。

王承龍生於1931年，原是黃浦區一家五金商店的店員，1952年入團，1954年入黨，一直做工會工作，業餘時間在上

74 王承龍，男，1931年生。文革前是上海市委《支部生活》編輯部群眾來訪組工作人員，文革中是機關聯絡站負責人之一。1967年「一月奪權」後，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辦公室負責人。1970年被「下放勞動」。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0年。

海市總工會業餘中學的夜校學習。1955年王承龍以夜校中學學歷，報名南京工學院精密機械系，被錄取。但因文化基礎較差，加上擔任班級黨團工作佔去很多時間，學習頗感吃力。他只得以犧牲休息趕學業，患了神經衰弱，嚴重失眠，經常頭疼，無法繼續學習。後經學院領導動員，只好肄業回原工作單位。回上海後，他一度任中心店黨支部書記。1959年，市委要求各區選送一名人員去解放日報社培訓，中心店所在的中共黃浦區委選送了王承龍。王承龍先在解放日報社工業組當實習記者，學業結束後回黃浦區委；1961年，又被黃浦區委推薦至市委黨刊編輯室，做群眾來信來訪接待工作

程綺華還聯繫了自己工作的上海市委黨校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市委宣傳部是徐景賢的工作單位，由徐景賢自己去串聯，聯繫了「一心為公革命造反戰鬥組」的劉耀宗。不到一天時間，寫作班串聯到不少造反組織，初具規模。12月15日，串聯單位在一起開會，因為是市委各個機關的造反派組織串聯，聯合而成的，所以決定將新成立的造反組織名字定為「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機關聯絡站」），並決定12月18日在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

但是，他們與文化廣場聯繫，得知18日下午的會場已借給華東師範大學的紅革會，他們要開批判常溪萍大會，而上海只有這麼一個大型室內會場。徐景賢立即派朱維錚去華師大打交道，希望他們讓出會場。朱到華師大後才得知，那個大會是由北京大學「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與華師大的紅革會聯合籌備的。朱又去找北大捍衛團在滬負責人孫蓬一。孫蓬一聽朱說明來意，先不談會場之事，而是反復盤問，機關幹部造反大會是誰召開，哪些人參加，徐景賢是何許人，大會準備揭發什麼問題，有否重磅炮彈。盤問了很久，孫蓬一突然表態說同意轉借會場，但有個條件，這個大會必須批鬥常溪萍，要把常溪萍

押上台，大會口號中要加上「砸爛常溪萍」。⁷⁵ 朱趕回寫作班向徐景賢匯報，徐景賢當即答應。他沒想到補充後的口號將會引起毛澤東極大興趣。

這一切都瞞着上海市委秘密地進行。那幾天正好市委辦公廳副主任蘇超到處找徐景賢，要他去幫曹荻秋起草檢討。徐景賢向寫作班的值班人員佈置：凡市委找他，就說他外出，不知上哪裏去了，找不到。在亮出造反旗幟的前一天，徐景賢還以替市委領導同志寫檢查工作需要為名，向市委辦公廳要求在武康路2號寫作班辦公室裏，裝了一部保密電話。當時向中央打電話，用普通電話打過去很難接通。為區別於黑色的普通電話，保密電話都是紅色的，稱為「紅機子」。徐景賢考慮得非常周到，有了這個紅機子，就可以隨時直接與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通電話，他和中央決策層的聯繫就這樣架通。他指派陳冀德日夜守着這部紅機子，其餘什麼事情也不要幹，有情況直接報告他。

12月16日，機關造反派們在武康路2號召集籌備會議。會上，根據姚文元「先搞反動路線」指示，將大會定名為「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根據郭仁傑建議，將大會口號定為「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到開大會前，又加上「砸爛常溪萍」，這是對華師大造反派讓出會場的承諾。⁷⁶ 還決定邀請工總司和紅革會造反派參加大會，為大會撐腰。機關幹部本來人數就不多，郭仁傑和徐景賢等擔心到時候參加大會的人太少，聲勢不足；還擔心機關幹部造反本來心理負擔就比較重，如果保守派來衝擊大會會場，造反夭折，再要鼓動大家造反就比較困難，一定要一次成功。

75 朱維鈺 1979 年 10 月 31 日。

76 徐景賢 1979 年 10 月 16 日對機關聯絡站造反大會籌備會記錄原件的說明，載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大會籌備在非常保密的狀況下進行。準備了共六個發言：支部生活編輯部「革命造反戰鬥隊」、市委宣傳部「一心為公革命造反戰鬥小組」，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戰鬥隊」，上海、北京和各地來滬串聯的造反派各一篇發言，寫作班丁學雷和羅思鼎聯合發言，再加上徐景賢個人發言。還決定，大會的攝影、燈光、會場佈置等，由天馬電影製片廠全包。⁷⁷ 籌備會議之後，徐景賢又與姚文元通電話匯報，姚文元對會議的名稱、批判的內容、叫什麼人來接受批判等，都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但對是否要開這麼大的會有異議，說是否能小一點，放在市府大禮堂開就可以了。⁷⁸ 不過徐景賢沒有聽從他的這個建議。

大會組織工作由郭仁傑負責，包括發言稿審查；王承龍負責會場、保衛及聯絡。徐景賢閉門寫自己的發言稿，這是整個大會重點。徐景賢發言題目為《造反才知主席親》。這句話是紅衛兵流行語，被徐景賢借用。但徐景賢的發言稿被大家討論了幾次通不過，說他火力不足，沒有重磅炸彈，說他還在為市委捂蓋子。攻得最厲害的是王知常，說「造反表態要堅決，拖泥帶水不行，這是背水一戰。」

爭論最激烈的是「內外有別」，說這個限制不打破，大會發言沒法準備。內外有別，是共產黨和政府機關一貫的工作紀律，即內部和外部有區別，一些內部討論或決策過程，出了機關不准隨便議論，更不准洩露，其實就是保密原則。在討論中，大家認為一定要打破內外有別原則，提出「保密要分析是國家機密，還是走資派的機密；是走資派的秘密就不保，就是應該向廣大革命群眾揭露市委在文革中制定和執行資反路線的真相」。所以，大家覺得徐景賢發言稿中揭發出來的內部材料還太少。徐景賢是文革小組成員，又因替曹荻秋等市委領導們寫檢討而被准予列席部分市委常委會議，大家認為他知道的情

77 徐景賢工作筆記 1966 年 12 月 16 日。

78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況一定很多，卻不肯揭發，是受到內外有別限制。在眾人翻來覆去的討論修改後，徐景賢的發言稿才得以通過。

大會籌備過程中，徐景賢又讓王承龍找到中央文革小組聯絡員的甄文君，告訴他寫作班造反的打算。甄文君馬上趕到武康路2號，認真地聽取了徐景賢他們對市委的看法和造反大會的籌備工作，表示立即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徐景賢覺得甄文君是直接「通天」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匯報的，他對自己即將的造反行動更感到心裏有底了。

寫作班宣佈造反

1966年12月18日下午2時。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在文化廣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正式亮出造反旗幟。大會主席台兩邊張貼着巨幅大會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將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也作為主要批鬥對象，這顯然是會議的主要組織者紅革會提出。四個口號有區別，寫作班當時更多是為了避免文字重覆，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要區別對待這四個人。這個大會只是亮相，宣佈造反，關鍵是寫作班的造反要獲得造反派的認可。

在此之前，造反派組織召開批判大會，都要求市委領導幹部到場接受批判。但那都是零星的。哪個系統的造反派召開大會，出席的就只是分管這個系統的市委領導。而且，市委領導尤其市委書記處的書記們都東躲西藏，很難找到，第一書記陳丕顯更是因生病，從不在公眾場合露過面。徐景賢這些市委機關的幹部知道市委領導的藏身之處，書記和常委們躲不過他們。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幹部陳丕顯、魏文伯、曹荻秋、王一平、梁國斌、王少庸、宋季文、李干成等，以及各部、區、

縣、局領導幹部，都被他們勒令到場接受批判。陳丕顯文革以來第一次上台挨鬥。徐景賢他們認為，上海的文革雖是曹荻秋負責，但陳丕顯一直在幕後指揮，不能再讓他躲在幕後，一定要他到場聽取批判，逼他到前台來。⁷⁹ 楊西光、常溪萍被宣佈為反黨分子，押上主席台。常溪萍已被紅衛兵們折磨多日，連站都站不穩。

工總司派出數百名工人為大會作糾察，這是郭仁傑去聯繫的。大會籌備期間，王洪文曾經去寫作班所在的武康路2號串聯，對寫作班的造反表示支持。⁸⁰ 紅革會在解放日報事件中和工總司關係密切，郭仁傑去一說，工總司立即應允，派出一千五百多名工人參加大會。大會的基本群眾是華師大和復旦紅革會的紅衛兵，加上市委機關幹部和工總司工人造反派。其中紅革會當時最有影響，他們前不久在解放日報事件中一炮打響，正在如日中天之時。紅革會的負責人馬立新全力支持寫作班造反大會，派出幾千紅衛兵為大會助陣。這麼多人參加大會，很有聲勢。聶元梓沒有出席大會。

大會由郭仁傑主持。王洪文代表工總司應邀出席大會並坐上主席台。寫作班戴厚英領呼口號。王承龍宣讀開幕詞。開幕詞宣佈：第一，我們要戳穿上海市委散佈的所謂顧全大局的謬論；第二，我們要徹底打倒上海市委套在我們頭上的修正主義的組織性、紀律性；第三，我們堅決反對你們所謂的內外有別，你們害怕裏應外合，我們就是要裏應外合；第四，我們決不保守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機密！徐景賢以市委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和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身份，作長篇重點發言，時間長達一個半小時。他揭發市委和曹荻秋，說曹荻秋怎樣保常溪萍和楊西光，還揭發陳丕顯怎樣在幕後操縱反對張、姚，怎樣

79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80 王洪文去寫作班串聯之事，是吳瑞武 1977 年 3 月 18 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中回憶的，上海揭批「四人幫」辦公室編。

反對紅衛兵運動尤其是反對北京紅衛兵。徐景賢發言時，提到哪個人，就叫哪個人出來交代：

我時時不忘記把揭發的重點放在陳丕顯、曹荻秋身上，比如我揭發市委要在這次運動中「抓跳出來的反面教員」，而且說「五七年反右時，全國揪出幾十萬右派，這次可能還要多一點。」我要陳丕顯、曹荻秋當場交代，陳、曹兩人都推說「不知道」。我緊接着就要市委秘書長李家齊站出來揭發，他當場指證陳、曹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講過這些話，他自己又如何向下傳達的，揭穿陳、曹的「謊言」。我又讓陳丕顯的秘書出來揭發他如何接受陳的佈置，向機關黨委了解北京紅衛兵的情況，說明陳丕顯稱病躲在幕後指揮的真相，搞得陳丕顯十分狼狽。⁸¹

徐景賢還用了專門的篇幅，表明自己怎樣從想造反但又害怕造反，到最後再也不猶豫動搖，終於起來造市委反的心理轉變過程。會上還宣讀了《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聲明》：

從《海瑞罷官》批判開始後，我們在張春橋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帶領下，為捍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進行過戰鬥。這一時期，雖然我們做的工作很少，缺點很多，我們的大方向始終沒有錯。⁸²

這份聲明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表示要緊跟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在當時造反派的宣言聲明中還是第一次，當時造反派宣佈要緊跟的都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馬立新代表紅革會，實際上是代表所有造反派發言，堅決支持寫作班造反。在會上

81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82 「上海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大會」會刊，1966年12月。

發言的還有市委宣傳部和市委黨校造反派，最後由郭仁傑作總結。大會發言印成會刊，標題是《市委心臟爆炸，曹家後院起火》，前半句就是王承龍去寫作班聯繫時，一進門時說的話。會刊由馬天水簽字同意，印發十萬份。

市委各部、委的幾乎所有的部門，包括最基層的工勤人員中甚至食堂，都成立了造反隊，向機關聯絡站掛鉤。連市委警衛處的警衛人員也造反了，他們組織的名稱叫「紅色警衛員造反隊」。警衛處本來是保護市委領導的，他們幫助市委領導東躲西藏，群眾要找市委領導談判、開批判會，都由警衛員保衛。警衛員造反，陳丕顯、曹荻秋等市委領導再也無法逃脫造反派的搜尋。⁸³

寫作班造反前夕安裝的紅色保密電話，以後起了很大作用。靠着這部紅機子，徐景賢得以直接與張春橋、姚文元聯繫，隨時請示匯報，而張春橋、姚文元也隨時向他發布指示。兩個星期後，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身份回上海。姚文元讓徐景賢今後就通過這部紅色電話機和他與張春橋直接聯繫，他與張春橋的電話號碼只有徐景賢一個人知道，不能外傳。靠着這條熱線，徐景賢得風氣之先，成為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實際代言人。機關聯絡站經常召集各造反派組織，向他們傳達張春橋、姚文元指示。無形中，機關聯絡站成了上海各造反派組織的核心。就連看不起文人，對機關聯絡站不以為然的工總司負責人們，也不得不經常屈尊到寫作班去打聽「上面」的動向。

大會之後，參加大會的各機關造反派組織，馬上開會宣佈成立機關聯絡站，推徐景賢、郭仁傑、王承龍和程綺華組成勤務組，除了王承龍，其他三人都是寫作班的。王承龍因為是黨刊編輯室的聯絡員，成為負責人之一。這也是文革中的一個現象：許多最初的聯絡員，後來代表自己單位造反組織，成為市

83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級造反組織的負責人。機關聯絡站下設秘書組、聯絡組、宣傳組、後勤組；不久張、姚回上海後，又設調查組(又稱「材料組」)。調查組對外不公開，主要為張春橋和姚文元收集傳單小報等資料以及上海文革動態，由王知常負責編輯成簡報，每期只送張、姚、徐景賢和王承龍。前後共出一百期。機關聯絡站的辦公地點最初設在寫作班所在地武康路2號，後來因為前來掛鈎的機關造反組織越來越多，武康路2號地方不夠，1967年1月搬往淮海中路市委黨校。武康路2號只剩陳冀德等幾個人留守。

寫作班集體造反後一個多星期的12月26日，全體成員為毛澤東73歲生日祝壽吃麵條，第二天下午，大家正聚集在武康路2號的草坪上，商量下一步該幹什麼時，姚文元來電話要徐景賢接聽。自從姚文元調往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後，很少主動給徐景賢打電話，這次他忽然主動打來。電話中，姚文元一反平常平淡的語調，以按捺不住的興奮語氣告訴徐景賢：毛主席從中央文革的《快報》上看到了你們造反的消息。毛主席認為大會提出的四句口號提得好，有策略，對幹部區別對待。毛主席說：「上海學生起來了，工人起來了，機關幹部也起來了，上海大有希望。」還說：「內外有別，可以打破。」⁸⁴ 毛澤東高度評價寫作班造反，徐景賢非常興奮，立即召集機關聯絡站勤務組全體負責人和下屬各造反組織負責人開會傳達。徐景賢還特意通知了紅革會負責人。寫作班雖然已經宣佈造反，毛澤東對他們造反的高度評價仍具震撼性。他們畢竟大部都是機關幹部，造反不但逾越十七年政治生活準則，也逾越機關工作準則。現在毛澤東支持他們，而且對他們最擔心的「內外有別」表態說可以打破，終於徹底解除了他們最後的心理障礙。徐景賢後來回憶：

84 徐景賢著《十年一夢》。

我想我宣佈造反的時候，雖然有張春橋和姚文元做後盾，但心裏還是不很踏實的，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為我們撐腰了，我還怕什麼?!晚上，在武康路二號寫作班二樓的玻璃棚陽台上，由我主持開了一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骨幹會議。會上先由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緊接着哲學組、歷史組，文學組以及市委辦公廳《支部生活》編輯部的人員紛紛爭着發言，有的噙着眼淚，有的莊嚴宣誓，大家的神情異常忠誠、肅穆。⁸⁵

「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為我們撐腰了，我們還怕什麼?!」這不但是徐景賢的想法，也是文革中所有造反派的共同心聲。

小結

寫作班造反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影響和意義，不亞於工總司成立，當時被稱之為「上海市委後院起火」。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開展快半年，紅衛兵由北京走向全國，但各地造反派組織還只在萌芽狀態，各省市黨政領導人打而不倒，黨政機關仍舊運轉或半運轉。即使有一些機關幹部起來造反，也只是個別行為。來自幹部階層的抵制仍然十分強烈，他們的態度影響了絕大多數群眾，尤其是保守派群眾和基層幹部。如何使幹部階層接受文革，減少衝突成本，成為文革急需。

上海市委機關「後院起火」，是工總司成立後又一個重大事件。在全國，這是繼工總司突破不得成立跨行業組織後的又一個「第一」，即第一個省市級幹部的造反組織。這是來自黨政科層機關核心的爆炸。雖然，他們造反遲，人數少，但他們長期在市委機關工作，了解市委內部情況，掌握市委工作機

85 徐景賢著《十年一夢》。

密，他們造反對市委是沉重打擊，從根本上突破了市委抵制運動的防線，並且立即造成市委指揮系統實際上的癱瘓，完全改變了力量對比格局，這是人多勢眾而又轟轟烈烈的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做不到的。作為黨政機關的各級幹部，是整個社會中對文革最抵制的階層，是保守派的核心。而處於政治中心的寫作班，一向是整個機關中最有文化也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一部分人，他們的造反給廣大幹部帶來巨大的思想和心理衝擊，既對上層領導幹部造成壓力，也給基層幹部作出榜樣。

寫作班在造反大會上宣佈反對「顧全大局」，打倒「組織紀律性」和衝破「內外有別」界線，在某種意義上是打破幹部階層對公共決策信息的壟斷優勢。文革以來，信息不對稱是底層百姓參與運動的最大顧忌，卻又是幹部們抵制群眾衝擊的最好保護。寫作班造反打破這一規則，與毛澤東在文革中所試圖突破的方向一致。毛澤東後來說：「機關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僅僅有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工人運動，沒有機關幹部起來積極投入到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問題，就是依靠機關來揭露的。」⁸⁶

如果說，馬天水的轉向，是市委高層決策幹部向文革投誠；那麼普通機關幹部的造反，則是基層執行政策的幹部對文革開始認同；尤其寫作班，更是市委領導機關的智囊和政策的解釋者。上下幹部和智囊都轉向，科層的轉向完成。

寫作班成員文革前，就是知識分子群中最受執政黨信任的，他們也為自己的被信任被重用而自豪。即使在文革初期，他們也仍然受到重用，而且直接被市委主要領導重用，例如徐景賢替曹荻秋寫檢討，朱永嘉被市委派去北京打探消息。但是，當市委受到衝擊後，他們不願意將自己的政治命運再拴在市委那些領導幹部身上。當張春橋和姚文元打電話要他們造反時，他們便毫不猶豫地奉命造反，因為張春橋、姚文元過去是

86 毛澤東 1967 年 1 月 9 日談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他們的直接領導和同事，現在又代表着文革的方向。這有點像他們過去奉命寫作一樣。他們過去寫作是為政治服務，緊跟上面意圖，將上面意圖化作自己的寫作題目；現在造反又是奉命造反，緊跟上面意圖，將上面意圖化作自己的造反行動。造反其實就是過去寫作的延續，都是奉命，都是為了保持和強化自己的政治名份與身份。

但是，他們又和別的受市委重用的幹部不同。他們文革前就在張春橋領導下工作，和姚文元共事，這使他們彼此在思想和感情上更容易相互接受。尤其張春橋和姚文元文革前所表現出的艱苦樸素作風和敏銳的思路，使寫作班成員首先從個人感情和道德上接受張、姚；文革中張、姚又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工作，這更使寫作班在政治上有安全感。而張、姚也很了解寫作班成員對工作的嚴謹認真，了解他們的能力、才幹和個人品德。這是張春橋和姚文元願意反復催促寫作班造反，寫作班也馬上將張、姚催促付諸行動的重要因素，也是不久張、姚回上海後，馬上將寫作班作為自己工作班子的原因。

寫作班是繼紅衛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之後，崛起的又一股造反勢力，也可以稱為上海第三股造反勢力的文人造反派。寫作班的優勢，在於他們與處在中央決策層的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聯繫，以及張、姚對他們的了解和信任。而這種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渠道的暢通，是上海所有其他群眾組織都不具有的，更是外地任何造反派組織所不具有的。尤其從中央書記處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統統被打倒，中央決策層的信息無法按正常程序層層往下傳遞，而下面的困境又無法讓上面及時了解，寫作班的信息優勢鞏固並提升着他們的地位。一方面，他們比其他任何組織都要及時得多地知道上面的決策，從而減少在風雲突變的亂世可能付出的犯錯誤成本；另一方面，上面也能及時知道他們遇到的危機，從而出面干涉和保護他們。而當他們作出符合上面意圖的決定和行動時，上面又能及時肯定和推廣

他們的做法，從而提升他們的政治威信。寫作班這個優勢，後來在一系列事件中得到充分體現；而且整整持續了十年，貫穿於文革始終。這也是上海與外地相比，在政治資源方面的顯著優勢。

第十三章

康平路事件 造反派統領上海文革 (上)

市委轉向支持造反派

赤衛隊總部成立不到半個月，隊伍發展到80萬人。絕大部分工廠和基層單位，都成立了赤衛隊，各區和局也相應成立區和局指揮機構。但這只是表面鼎盛。老保們不知道，毛澤東並不支持他們。11月上旬，就在赤衛隊人數發展到壓倒造反派的絕對多數時，毛對陳伯達說：「認為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要基層黨組織領導，要依靠老工人，這個觀點是錯誤的。」¹ 12月6日，陶鑄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檢討自己對工廠開展文革認識不足；而在此前，周恩來態度已經轉變。至此，中央決策層支持造反派的態度趨於一致。中央工交座談會精神很快傳達到基層。一系列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件陸續出台：1966年11月15日的《中共北京市委關於給革命群眾平反的緊急通知》，1966年11月16日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等等。上海市委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派強大壓力下，也已經開始轉向，解放日報事件簽字就是轉向信號。但保守派沒有意識到，還以為市委這次簽字，和安亭事件中的簽字一樣，又是被迫簽字。

12月8日，赤衛隊召開成立大會後沒兩天，一個中央文件在上海各工廠引起混亂。這份文件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和總參謀部9

1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956頁。

月發出的：《建議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的通知》。時間已過三個月，市委又要求各基層重新宣讀這個文件，解釋說是為了制止有些單位以紅衛兵組織取代民兵組織引起的混亂。文件中說：「建議農村、工礦企業、事業、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和赤衛隊等組織，主要還是搞好民兵工作。」文件中提及的「赤衛隊」是指全國各地有些單位成立替代民兵組織的赤衛隊，並非特指上海的工人赤衛隊，而且上海的工人赤衛隊與民兵組織毫無關係。但是，這份文件在此時此刻宣讀，引出另一種解讀。赤衛隊員們認為這是上海市委故意作出的某種暗示。各工廠赤衛隊紛紛打電話向總部詢問，要總部作出解釋；有的工廠赤衛隊表示服從中央文件精神，要求退出總部。例如上鋼三廠有幾個車間的總支書記下命令解散赤衛隊。各工廠造反派藉此機會佔領赤衛隊辦公室，驅趕赤衛隊員離廠。每天都有基層赤衛隊員前來赤衛隊總部告狀求援。赤衛隊總部負責人十分惱火：「市委在搞鬼，為什麼在總部剛成立時就佈置基層讀這種文件！」

12月10日，赤衛隊總部在番瓜弄47號召開會議，研究如何穩定下面的情緒。最後決定同市委談判，要求市委再一次明確承認赤衛隊是「合法的群眾性革命組織」，而且也像對造反派安亭事件雙五條和解放日報事件七條那樣，專門為此發文。這樣可以穩定下面的情緒。² 12月12日上午，赤衛隊總部派出代表團，在上海展覽館與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談判，但華東局和市委遲遲沒有來人。赤衛隊總部於是調動兩萬人去華東局請願。中午12時，中共華東局書記韓哲一和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等，接見代表並進行談判。赤衛隊代表拿出前兩天總部討論的「四項要求」，內容主要是：1.市委發文承認赤衛隊是合法的革命的群眾組織，並給予一切日常工作方便；2.上海市委必須向上

2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海人民檢查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3.承認郵電工人不夾送《紅衛戰報》是革命行為；4.嚴格執行11月20日的通告。³此時正值解放日報事件剛結束，第二條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就是指市委的簽字；而且，儘管市委簽了字，以赤衛隊員為主的郵電工人，卻仍然拒絕夾送《紅衛戰報》，第三條便是針對這一情況。王一平等不同意第三條。於是，在場的赤衛隊顧問陳阿春建議將此條改為：「今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到群眾組織相互關係的重大問題，應該會同一起協商解決。」王一平簽字同意。

赤衛隊以為取得了市委的簽字就是取得了市委的承諾，但等了好幾天，遲遲不見市委發文。他們沒有感覺出，此一時已非彼一時。文革在毛澤東強勢推動下，向各級幹部尤其是省市市委主要負責人施加了強大壓力。毛澤東明確要求各級幹部支持造反派，上海市委必須轉向。12月11日陳丕顯主持市委各部委、各區委負責人會議。這是文革開展以來，陳丕顯第一次出面主持這樣的會議。在此之前，陳因患癌症養病，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會上，陳丕顯要幹部們轉變立場。市委轉向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市委書記馬天水的表態，本書第十一章已述。馬天水的現身說法，比中央文件更有說服力，在上海各級幹部中造成震撼性影響。市委將馬天水談自己立場轉變的講話稿，印發到基層各廠，還以播放錄音帶方式，將馬的講話傳達到普通工人。

但是，反對造反派而又與市委和各級幹部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赤衛隊，卻正是市委轉向的障礙。上海市委對赤衛隊態度開始改變。馬天水特地到友誼電影院找到王玉璽、尹平等赤衛

3 以上材料及「四項要求」的內容引自工總司1968年10月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上海市總工會檔案。文中「11月20日通告」內容是什麼，原文未寫明；筆者估計是1966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轉的北京市委通告，內容主要是「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隊總部負責人以及陳阿春，做他們思想工作。馬天水表明自己是怎樣從看不慣造反派到支持造反派，明確指出「赤衛隊大方向錯了」。⁴ 談話後的12月22日，馬天水打電話給張春橋，匯報談話經過以及赤衛隊組織情況。⁵ 市委還特地向幹部們傳達毛澤東對安亭事件的講話。在此之前，民間雖有傳言說毛澤東肯定安亭事件，但都是非正式渠道的「小道消息」。曹荻秋後來對此作過說明。他說，12月初，

在安亭事件後上海出現一股反對張春橋同志簽字的逆流，對舊市委支持兩個五條也不滿，我們在幹部和群眾中作說服工作碰到困難，我在電話上與馬天水商量是否可以把中央常委會上，毛主席同意張春橋同志的簽字向幹部傳達，通過幹部向群眾解釋，把這股逆流打下去，他請示了張春橋同志，張春橋同志同意了。據此，我在一次幹部會議上作了傳達。⁶

曹荻秋所說「逆流」顯然就是指赤衛隊反對工總司的行動。所以，曹荻秋此舉顯然一是希望幹部們認清時局，二是希望通過幹部們將毛澤東的話轉達給赤衛隊員，讓他們轉變立場。市委書記處甚至還打算對保守派們反對張春橋的行為，「擬寫一個反對這股逆流的通知，因寫得不好被擱置了。」⁷

保守派的思想基礎，就是他們對幹部階層評判真理權力的高度認同。如今，各級幹部們的迷惘，使赤衛隊失去思想支柱和上層支持；下面群眾的思想混亂，又動搖了赤衛隊的根基。

4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5 這個日期引自張春橋1966年12月23日同工總司代表的講話。

6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檢查》。

7 同上。

赤衛隊成立才一個星期，已經感到處境一天不如一天。市總工會主任張祺代表市委與赤衛隊聯繫，原先他一直支持赤衛隊。但是此時張祺特地趕去番瓜弄，要赤衛隊認清形勢，掌握鬥爭大方向。張祺說：「如果你們還是原來的水平，不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那市委雖然非常同情你們，也無法支持你們了。」⁸ 市委副秘書長杜淑貞甚至這樣評價赤衛隊：「赤衛隊嚴重不純，五多：勞模多、黨員多，團員多，先進生產者多，老工人多。」⁹ 這五類人長期以來是共產黨的依靠對象和基本隊伍，不久前還在為自己的「純紅五類」和「黨的依靠對象」的身份自豪，現在卻成了「不純」分子；而且這話竟然出自市委領導幹部之口，不能不使赤衛隊員們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優勢正在失去。他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行動方針。赤衛隊的負責人王玉璽等，甚至幾次對馬天水和張祺等市委幹部表示，如果市委不支持赤衛隊，希望你們明確表態，我們可以主動解散。但是這些市委幹部們都沒有接茬。這給赤衛隊負責人感覺：「市委對赤衛隊表面不敢支持，但內心是歡迎的。」¹⁰

赤衛隊總部當即派出十位代表去華東局，向魏文伯和韓哲一質問杜淑貞的那番話，要求市委收回杜淑貞的話，並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隔天赤衛隊又在虹口體育場召開萬人大會，大會執行主席是徐雲生，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與市委書記王一平參加出席大會。韓哲一和王一平在講話中都肯定了勞模、老工人、基層黨團員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作用，並表明這些人「仍將是我們黨的依靠力量」。¹¹ 但是，杜淑貞的那個評價，已經深深刺痛了許多赤衛隊員，因為這不但是市委負責幹部說

8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9 同上。

10 這是陳阿春告訴筆者的。

11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出的話，更是眼前的事實：他們正在被越來越邊緣化，文革看來不再依靠他們。所以，任憑韓哲一和王一平在會上如何解釋，仍打消不了他們的疑惑和憤怒。整個大會開得亂糟糟的。會後，赤衛隊總部金瑞章等，要求韓哲一和王一平將12月12日簽字的那份「四項要求」（後來改為「五項要求」），作為市委文件發到基層。赤衛隊總部急切希望市委能夠像對待工總司那樣，簽字承認自己是革命群眾組織，並以市委名義發文到各基層單位，這樣就有正式文件保證赤衛隊地位。韓哲一答應了。

但實際上，市委事後始終沒有付諸於實。

赤衛隊被拋棄

12月初，赤衛隊總部在鐵路文化宮召開各工廠赤衛隊隊長會議，由陳阿春代王玉璽作「掌握鬥爭大方向」的報告，這個報告是陳阿春建議的，王玉璽同意了。報告中提出要批判市委的資反路線，還提出要和造反隊加強團結，支持他們的造反精神。但報告沒有收到預期效果。一則陳阿春對形勢也很困惑，無法解釋連自己都弄不清的形勢；二則下面的隊長們轉不過對造反派的想法。會場上許多人斥責這是「投降政策」，要陳阿春「靠邊站」。

形勢的發展對赤衛隊越來越不利。赤衛隊總部意識到，再不改變大方向，赤衛隊將無法生存。無論如何，赤衛隊必須改換角色，順應潮流，在打擊對象上向造反派靠攏，變保衛市委為批判市委。12月23日下午，赤衛隊總部在人民廣場召開有30萬人參加的「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奪取新的勝利大會」。這個大會，與其說是批判大會，不如說更是一個宣佈轉換立場的表演。曹荻秋、韓哲一、李干成等華東局和市委領導幹部，第一次作為批判對象出席赤衛隊的會議，而不久前，他們還是赤衛隊盡力保衛的對象。所有發言者都批判揭發

市委，說自己不久前的行為是受了市委蒙蔽。

為了表示立場的轉變，赤衛隊向工總司發出和解信號。大會召開的上午，赤衛隊總部常委潘月法，在玻璃機械廠工廠食堂遇見工總司總部的王洪文、潘國平、王腓利等。潘月法邀請他們參加下午的大會。王洪文推說自己沒有時間，潘國平也說去不了。與黃金海同廠的造反派工人婁金寶在場，王洪文對婁說那你代表工總司參加吧。¹² 晚上開大會時，赤衛隊總部將婁作為工總司代表，請他坐上主席台。陳阿春還與婁金寶在人民廣場二樓主席台後大廳內會談，討論今後不要再互相衝突，兩大派工人組織聯合起來，共同批判走資派。又約定有事由潘月法與潘國平通過電話直接聯繫。¹³ 潘國平和潘月法是上海玻璃機械廠的同事。

大會結束後，在後台，赤衛隊總部通過大會執行主席李品銀，交給曹荻秋一張紙，上面寫着赤衛隊總部提出的七項要求，要曹荻秋代表市委簽字。七項要求中有兩條明顯針對造反派：「有關重大問題，市委必須與有關群眾組織協商，單方面簽字無效」；「嚴禁私設公堂，對私自綁架抓人者嚴肅處理」。這兩條要求是王玉璽提出的。他後來說：提出這幾條，實際是想縛住造反派手腳，不讓市委單方面答應造反派要求；造反派若想向市委提出要求，必須與赤衛隊協商，而赤衛隊可以用多數派的優勢否決。¹⁴ 之前，赤衛隊希望市委對12月12日那天的「四項要求」發文，遲遲不見動靜；這次赤衛隊總部下決心，一定要讓市委對自己組織的地位有明確的表態。

他們萬萬沒有料到的是，此時市委已經連承認他們是「革

12 這個細節是王腓利對筆者回憶的，而《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中，說婁金寶是王洪文派去的。婁金寶因為參加了赤衛隊的這個大會，後來被關一個多月。

13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14 同上。

命群眾組織」都不願意了。在赤衛隊召開這個大會前，陳丕顯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出席大會時曹荻秋如何表態。陳丕顯表示：市委一定要轉變立場，堅決支持造反派，他要曹荻秋向赤衛隊明確表態支持造反派，而且告訴保守派們，如果他們不轉變立場，市委不再會支持他們。¹⁵ 陳丕顯的態度表明，他決心緊跟毛澤東，以拋開赤衛隊的行為，帶領市委取得造反派的認同。

曹荻秋出席大會，一開始堅持不肯簽字，一再告誡赤衛隊負責人，一定「要把鬥爭矛頭對着我，對着市委的資反路線」。爭執僵持了一個多小時，直拖到半夜12點，會場秩序越來越混亂，台下的人衝上主席台，玻璃門窗被砸壞，照明電源被切斷，曹荻秋被擠得幾次昏了過去。最後曹荻秋提出再增加一條「徹底批判市委資反路線」，共八條，才簽了字。

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

八項要求

一、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向華東局、上海市委所貫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二、《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是群眾性的革命組織，市委必須為其抓革命、促生產和日常的工作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條件。

三、上海市委必須深刻地向全市革命群眾公開檢查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

四、上海市委所屬各級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也必須向各單位的革命群眾公開檢查，並且在接到《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會議通知時必須準時出席，聽取革命群眾的揭發批判。

五、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涉及到各群眾性的

15 傳單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重大關係問題，市委必須與有關革命組織取得協商一致，解決問題，任何單方面無原則的簽字都無效。

六、上海市委十一月廿日所頒佈的嚴禁私設公堂，和私自抓人、綁架、拷打等的重要通告，必須堅決執行，如發現違法者，應立即由司法機關嚴肅處理。《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和其他革命組織有權對違反黨紀國法和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行為採取必要的革命行動。

七、《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隊員參加該組織的一切活動，應按「抓革命、促生產」的原則，盡量少佔用生產時間，如有必要的集會、遊行等應按假日處理。十一月九日至今扣發的工資必須如數補發，不得刁難。

八、凡屬《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所批准的工作人員，一律按人事調動助勤辦理，不得借故刁難。

以上八項要求由上海市委簽字，限令在十二月廿四日十八時發至各級黨政機關執行，並向廣大群眾宣讀。

《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意代表市委並發文，下午發文

今天算公假

曹荻秋

十二月廿四日三點三十分

同意

曹荻秋

十二月廿三日十二時

在市委已經決定不支持保守派後，曹荻秋為什麼最終還是簽字？曹荻秋後來對此曾有解釋：

我最初加以拒絕，後來，由於兩個原因：一、他們以上北京控告、停電、停水、停交通相威脅。我怕釀成大事；二、我主觀上認為他們還是革命的，只要他們能夠轉變大方向就行。因此，頂到最後我提出條文必須修改，他們同意了我修改，我將某些明顯針對造反派的條文作了修改，並加了一條徹底批判舊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共八條，我簽了字（當時，群眾已湧上主席台，我擠暈了），我以為這樣可以端正他們的方向。……

按照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的原則，對群眾要求建立的組織都一概加以承認。¹⁶

顯然，曹荻秋認為，既然赤衛隊宣佈要造反，要批判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至少顯示了赤衛隊對文革態度的轉變；而且，既然以憲法的結社自由承認工總司，也應該一視同仁地對待赤衛隊。

赤衛隊以為爭得了市委的簽字，就有了生存權，立刻將曹荻秋簽字的八條送去印刷廠，趕印八萬份。但這些傳單還沒來得及張貼出去，事態便急轉直下。曹荻秋12月23日半夜簽字，陳丕顯第二天早上聽說後很着急，上午立即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曹荻秋對赤衛隊的簽字。主持會議的陳丕顯說：市委已經決定支持造反派，曹荻秋簽字是政治立場錯誤，這件事要由曹荻秋個人負責。陳丕顯還提出：要同赤衛隊商量，讓赤衛隊主動取消簽字；如果商量不通，最好由曹荻秋自己聲明作廢。他

16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我的檢查》；以及《曹荻秋與國棉一廠工人張海生的問答》，上海鍋爐廠革命藝徒造反司令部 1966 年 12 月 31 日翻印。

還要曹荻秋為自己的簽字作檢討。¹⁷而在此之前，市委曾打電話去北京，問張春橋如何處理是好？張春橋後來對王洪文回憶自己當時的態度：

他們給我打電話，問我這件事怎麼辦，我說我沒辦法。一聽到曹荻秋簽了字，我就預料到一定會出大事。……

當時我估計他會承認，不久一個接一個電話就來了。¹⁸

從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到赤衛隊要求市委承認是革命組織，張春橋在每一個上海文革運動的關口都袖手旁觀，不給建議，冷觀過去的上級們一步一步陷入滅頂。

參加市委書記處會議的書記、副市長梁國斌與市委候補書記王少庸一起，也指責曹荻秋：

我和王少庸提出嚴厲批評，這簽字不能代表市委，要他公開宣佈作廢，要開一個常委會作檢討。曹荻秋解釋說是昏倒了才簽的字。而陳丕顯對此不疼不癢地講了幾句。¹⁹

陳丕顯要跟上中央決策層，下決心轉彎支持造反派。而橫在上海市委和造反派間的最大障礙，就是反對工總司的赤衛隊。曹荻秋在這個時候還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仍然給老保組織以生存空間，顯然會為造反派攻擊上海市委留下口實。陳丕顯批評曹荻秋，他不得不批評曹。這個姿態也是做給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駐滬聯絡員甄文君看的。之前甄文君接到陳丕顯的電話，通知他下午3點去開會，但直到天黑以後才

1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8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3 日接見工總司王洪文等人時的談話記錄。

19 梁國斌 1967 年 3 月 1 日在上海揭批曾、曹大會上的發言：《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滔天罪行》。

有車來，將甄接去會場，估計這段時間市委已經討論，作出決定。甄到達會場，只見陳丕顯正在會上批評曹荻秋，說曹違背中央關於支持造反派的精神，違背市委決定。這個責任要曹荻秋自己承擔。甄文君當時覺得，陳丕顯通知自己參加這個市委會議，是想通過自己向中央匯報：上海市委是支持造反派的，上海市委決定改變對文革的態度。過去市委開會從未通知他參加。而據當時在場的陳丕顯秘書于寶年回憶：

陳丕顯和其他書記在會上提出，曹荻秋的簽字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印發，最好由曹荻秋自己發表聲明作廢。曹荻秋當時除了強調客觀原因外，答應發表聲明簽字無效。²⁰

又據市委書記王少庸在文革中揭發：

有人對曹荻秋進行了批評，提出召開一次常委會議，聲明曹荻秋的簽字不能代表市委。陳丕顯卻要曹荻秋本人發表聲明簽字無效。²¹

曹荻秋最初還為赤衛隊辯護。但在大家的圍攻下，最後答應聲明簽字無效。12月26日陳丕顯去機關聯絡站，對機關聯絡站的造反派表示：「如果說這條路線以陳丕顯為代表，那大家研究去，是否與我的策劃有關係？我的秘書可以證明，我沒有策劃。開會、報告沒有和我商量。有些事同我商量，我還發過脾氣。」同時，陳丕顯也替曹荻秋解釋，說曹荻秋對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支持工人造反派思想不通，是因為曹荻秋認為「多

20 轉引自工總司1968年10月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以及陳丕顯秘書于寶年陳述。

21 王少庸1967年3月18日在揭發批判陳丕顯、曹荻秋大會上的發言《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的反動本質》，載於1967年3月20日聯合版第2期《大會特刊》。

數、少數兩派中都有左、中、右，應該一視同仁」。²²

上海市委不打算再繼續支持赤衛隊，造反派們也不給赤衛隊生存空間。12月25日下午，工總司等八個造反派組織在文化廣場召開《為奪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新勝利誓師大會》。這個大會完全針對12月23日赤衛隊的那個大會。會上，曹荻秋對兩天前簽字同意赤衛隊「八項要求」一事，作了檢討，聲明簽字作廢。曹荻秋聲明自己之前的簽字無效的全文如下：

我的聲明

12月23日，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開了一個大會，我出席了大會。會上主席團提出了八項要求要求叫我簽字。在少數人的強迫下，我沒有堅持原則，簽了字。這件事沒經過書記處討論，我犯了一個嚴重錯誤。現在我聲明這個簽字作廢。我堅決地站在革命左派一邊，支持革命左派，徹底批判以我為首的上海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曹荻秋(簽字)²³

12月25日，赤衛隊總部看到了曹荻秋聲明。大家全都驚呆了。他們以「保衛黨」為己任，雖然兩天前他們開始向上海市委「猛烈開火」，但是，「黨的支持」仍然是他們的精神支柱。現在，黨的領導曹荻秋既否定自己，又否定赤衛隊，支撐

22 轉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23 傳單《我的聲明》，上輪二廠工人革命造反隊 1966 年 12 月 30 日印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他們的精神支柱崩潰。一個赤衛隊總部負責人事後形容自己的心情：「我當時思想混亂，信心喪失，彷彿幼兒沒了母親，不知所措了。」²⁴ 更為嚴峻的是，曹荻秋의 聲明意味着市委公開表態不支持赤衛隊，這更是對赤衛隊原本困難的處境雪上加霜。赤衛隊不得不考慮自己的生存了。為保衛市委而組織起來的赤衛隊，現在不得不考慮保衛自己。下午，總部立即在長樂路召開會議，研究如何應對。誰也拿不出主意。最後，大多數人主張赴北京控告。失去了上海市委的支持，他們不能再失去中央的支持，這是他們最後一絲希望。

晚上，赤衛隊總部在共舞台劇院召開各工廠赤衛隊隊長以上負責人緊急會議。到會者1600多人，都是赤衛隊基本骨幹。他們接到開會通知時，被告訴「多穿點禦寒衣服」。會上，人人情緒激動，紛紛主張立即北上赴京。一個火車司機上台宣佈：「我們鐵路工人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為你們準備好火車，送你們到北京。鐵路上司機、檢票員、調度員都是赤衛隊員！」緊接着另一位上海鐵路機務段的赤衛隊員上台宣佈：「同志們，我是鐵路局的，列車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司機也在這裏，只等總部命令，全部出發！」只有一個人表示反對。他是江南造船廠赤衛隊負責人，上台搶了話筒，大聲疾呼：「千萬不能派代表去北京！一是不會起任何作用，二是會授人以離開生產崗位的口實。80萬赤衛隊員會因此被擊垮，不僅害自己，還會害家屬！」²⁵ 但是。大多數人根本聽不進他理智的預見，他的講話幾次被打斷。人們紛紛登台，搶話筒，發表己見，主席台上一片混亂，總部負責人王玉璽被人趕到後台。代表市委出席會議的市委組織部長楊士法，成為大家對市委不滿的出氣筒，被按腦袋，要他低頭認罪，他頭上戴的帽子也被

24 上海市總工會 1982 年為編寫赤衛隊史召開的座談會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5 以上資料全部引自工總司 1968 年 10 月編《吳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

掀掉。²⁶ 經過兩小時激烈爭辯，會議組成1300人的「赴京控告團」，由總部常委金瑞章等帶隊，馬上編組前往火車站。人群潮水般湧出劇場，許多人事先沒有準備，連錢和糧票都沒帶，就跟着隊伍走了，丟下上百輛自行車在劇院門前的街道上。楊士法請示市委，經同意，他也隨控告團一起赴京。這時是12月26日清晨4點半左右。²⁷

而從12月20日起，造反派組織聯合行動，衝砸紅衛兵保守派組織和工人保守派組織的辦公處。12月20日，復旦大學紅革會和上海第一醫學院紅色造反縱隊等組織，率先查封上紅總部、上紅大專總部的辦公處及其所屬區級組織；接着，各校造反派紅衛兵紛紛衝砸學校的老保組織。12月26日，文藝系統和出版系統的赤衛隊總部遭衝擊。與此同時，不少地區造反派統一行動，以「赤衛隊是非法組織」為名，砸抄各廠赤衛隊辦公室。下面的基層赤衛隊紛紛向總部求援，許多赤衛隊員為避免傷亡，紛紛離廠出逃，湧到總部避難。

留在上海的王玉璽等人想開會商議，但找了好幾個地方，都有隨時遭衝砸的可能，最後找到市委的皋蘭路接待站，這時已經是12月26日晚上8點。他們一直討論到第二天凌晨。面對大勢已去的局面，誰也拿不出辦法。赤衛隊楊浦區聯絡站的負責人陳英烈²⁸ 提出去康平路請願，要求曹荻秋承認對《八項要求》簽字繼續有效。王玉璽答應了這個沒有辦法的辦法。總部推陳英烈為首席談判代表，帶着一大批赤衛隊員，立即去康平路談判。陳英烈帶人去康平路後，總部不斷接到從那裏打來的電話，都是報告他們人被打被抓，要求增援。後來，每一

26 以上資料全部引自工總司1968年10月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

27 同上。

28 陳英烈，文革初期是赤衛隊楊浦區聯絡站負責人，康平路事件時是赤衛隊在康平路的現場指揮之一。康平路事件後被以「衝擊柯慶施、張春橋家」罪名關押，後交他所工作的良工閥門廠「處理」。文革後任良工閥門廠保衛科幹部。

次電話都是要求再增派人去。赤衛隊各區聯絡站於是陸續派人前往。對上海市委的失望，以及希望改變以往保守派形象的願望，去康平路請願的赤衛隊員們打出了「打倒曹老頭」，以及「我們也要造反」的標語口號。

王玉璽等總部代表，在27日凌晨2點去延安西路市委接待站，發現那裏已經被前往求見市委幹部的赤衛隊員們佔據，唯獨找不到市委工作人員。總部代表趕回總部，隨即電話通知紡織、公用兩個系統，集中赤衛隊員去康平路請願。

張春橋告誡造反派

康平路位於上海西南方向的徐匯區，是一條二里多長的小馬路。這條看似幽靜的小馬路卻是上海的政治中心，上海市委書記處的辦公樓群，就坐落在康平路165號大院裏，中共中央華東局的辦公處以及華東局幹部的住宅，還有上海市委的許多機關，也在這條路或臨近的馬路上。不過，如同中共其他辦公地一樣，這裏的機關對外也從不掛牌子。自從9月初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這條小馬路一下熱鬧起來，人行道邊，不時可見一群群站着、坐着，甚至躺着的人群。人們終於知道，延安西路的市委辦公大樓，只不過是執行政策的辦公機構，上海真正的決策心臟其實是在這裏。當越來越多人知道康平路大院真正地位時，康平路大院已經唱空城計。書記們早就不來這裏辦公，都轉移到不易找到的地方，辦公廳一級的幹部也都躲了起來，用電話保持聯繫。守在這裏的只是辦公廳副主任及一些普通工作人員，文件檔案早已轉移一空。住在大院內的書記們和家屬，也已陸續搬走，只剩下張春橋和柯慶施兩家未搬。張春橋在北京，其妻文靜帶着孩子住在大院；柯慶施已去世，其妻和孩子一直沒有搬出大院。

12月27日上午，調集而來的赤衛隊員們開始湧入康平路

165號大院。28日，王玉璽們終於找到市委接待站負責人、市委副秘書長杜淑貞。他們要求杜打電話給張春橋。杜淑貞後來回憶說：

這時，赤衛隊幾位為首的同志提出，要我帶他們去打電話給張春橋，要張春橋下令禁止工總司採取這類極端的行動，否則赤衛隊被迫採取相應措施，後果誰來負責？我考慮了一下，當時市委要出面對工總司做工作已經做不通了，如果找張春橋，也許還有點作用，至少明天絕對不能在上海這個大都市裏爆發「三停」這類嚴重事件，否則後果不堪設想。²⁹

杜帶着兩名赤衛隊員去銅仁路市人委的外事辦公室，爬窗進去，找到一部能夠接通中央的「紅機子」，接通了中央辦公廳，要值班人員馬上向在北京的張春橋匯報上海的緊急狀況。然後，她又到市委接待站另一個負責人、市婦聯主任關建家，按曹荻秋留下的號碼與曹通上話，報告當時正在蔓延的經濟主義風情況。此時已是12月31日凌晨。³⁰

在這兩天裏，越來越多的赤衛隊員湧入康平路市委大院，連同大院附近衡山路上的風雨操場內，共聚集了三萬多名赤衛隊員，後來也有人回憶說是六萬人。他們焦急地等待談判消息，認為以他們這麼多人請願，市委應該會再次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據目擊者回憶，整個大院的路上、廣場上、草坪上以及辦公室裏，到處擠滿了人。在康平路大院小禮堂所在的辦公大樓裏，凡是開着門的房間內，走廊裏，樓梯上下，全都坐滿了人，連走路都很難插腳。大院裏容不下，隊伍就等在康平路及附近的馬路上。但是，對於凡貼上「機要重地，閒人莫入」

29 杜淑貞著《春陽秋雨話平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

30 同上。

紙條的檔案室等，赤衛隊員「很自覺地不進去」。³¹

28日那天，杜淑貞還交給赤衛隊的代表們一張小紙條，讓他們按照上面的地址去找馬天水。代表們按紙條，在陝西北路和北京西路交界附近教堂旁的一座花園洋房中找到馬天水，將馬天水帶往康平路談判。和馬天水談判的不是總部成員，而是個別區和一些基層的赤衛隊員。談判持續將近一天，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曹荻秋也沒有出面。總部負責人既忙着調度在康平路人員的運輸和吃喝問題，又窮於應付下面赤衛隊與造反派的衝突，還加上外地保守派組織向上海的求助。28日下午，在和馬天水談判中，赤衛隊代表要求馬打電話給張春橋，馬便在張春橋家，借用他家的紅機子給張打電話。由於身邊有赤衛隊員，馬天水不便將話講得十分明顯，只說赤衛隊要求市委承認他們是革命群眾組織，他們也要打倒市委和曹荻秋。

12月28日深夜(或29日凌晨)，張春橋打電話回家，向妻子文靜詢問赤衛隊進入康平路大院的情況。文靜告訴張，赤衛隊進入康平路大院，要求曹荻秋接見，要求市委重新承認「八條」有效，等等。張對妻子說：赤衛隊現在也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口號，要提醒上海各造反派組織注意。勝利果實不能被赤衛隊奪去。造反派應該趕快採取行動。張還要妻子想辦法將他的話轉告造反派。文靜以後回憶說，張春橋是從馬天水的電話猜測出康平路大院的情況：

他當時感到馬天水說話吞吞吐吐地，他想馬天水身邊一定是有赤衛隊，他就想到如果赤衛隊勝利了，勝利果實被赤衛隊奪去。他要想辦法告訴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但是他無法通知造反派，大概是馬天水打電話的第二天，他打了個電話給我，說：勝利果實不能被赤衛隊奪取。要告訴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你有沒有辦法通知造反派。當時我

31 張春橋秘書何秀文 1978 年 2 月 21 日。

們家裏有兩個電話號碼，都是在安亭事件時張春橋記下來的，一個是徐景賢的，一個是軍報記者的。通過他們可以通知造反派。我對張春橋說，我試試看吧。我就打電話給徐景賢，一下打通了，我把黑指示告訴了他。³²

文靜放下電話，便打電話給徐景賢，向徐轉告張春橋的話。徐景賢馬上派人去找工總司的王洪文和潘國平等人，但一個也沒有找到。他只好先向機關聯絡站的負責人們傳達張春橋指示：

赤衛隊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為什麼看着不動？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一想這件事的後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簽字同意赤衛隊的要求了，那麼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衛隊的了，桃子就要被赤衛隊摘去了；想辦法告訴工人造反隊，趕緊動員工人去康平路，對赤衛隊搞政治攻勢，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輕易投降。³³

這個指示的中心，就是不能讓上海市委承認赤衛隊，不能讓赤衛隊再存在下去。在此之前不久，重慶曾發生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大武鬥。重慶的工人保守派組織「工人糾察隊總部」也是宣佈摒棄原來的保守路線，轉而造市委和省委反，在12月4日召開造反大會，會間與前來衝會場的工人造反派組織發生衝突，釀成大規模武鬥，在全國影響很大。重慶造反派費了很大勁也沒能將保守派完全壓下去。

從張春橋要妻子轉告的話中可以看出，張春橋顯然擔心市委會拋出曹荻秋、承認赤衛隊。這樣，曹荻秋被打倒的功勞

32 文靜 1980 年 9 月 16 日交代，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33 朱維錚 1980 年 9 月 13 日證詞《揭發張春橋等製造康平路事件的罪行》。

便會屬於反對造反派的赤衛隊，而且使赤衛隊得以繼續生存。另一方面，市委拋出曹荻秋，換個負責人繼續工作，市委也得繼續生存。這兩種結局顯然都是張春橋最擔心的。所以張春橋要妻子提醒造反派不能讓赤衛隊摘桃子。張春橋此舉也是對着陳丕顯的，陳丕顯在市委書記處會議上批評曹荻秋，張春橋不會不知道。陳丕顯所有的舉動，都是表示自己決心支持造反派，但張春橋就是不給陳丕顯轉變的機會。他以後打壓陳丕顯的態度和做法，不斷證實他非打倒陳丕顯不可的決心。

赤衛隊進入康平路大院後，機關造反派們最初認為是「市委與赤衛隊的內訌」，只在一旁看熱鬧，沒有當成大事。接到文靜電話後，方意識事態嚴重，不能不佩服張春橋在此關鍵時刻的提醒。徐景賢馬上於29日清晨召集會議，被通知參加的有紅衛兵，也有工人造反派，約三十多人，但沒有找到王洪文和潘國平。徐景賢主持會議，傳達張春橋電話指示，要大家做好宣傳攻勢，對赤衛隊進行分化瓦解。徐景賢、朱永嘉、王知常等人馬上起草講話和大字報，在緊挨康平路大院邊上的《支部生活》編輯部樓上和康平路周圍馬路上，裝上高音喇叭，反復廣播。

耿金章赴現場指揮圍攻

12月28日晚上10點多，正在北京的「工總司二兵團」負責人耿金章接到一個電話，要他馬上回上海。耿金章後來回憶，說是張春橋的秘書打的這個電話：

張春橋的秘書打電話找我說，張春橋要你馬上回上海，上海發生了緊急情況，是王洪文打電話來講的，我問有什麼急事，他說你不要再問了，回上海你就知道了。³⁴

34 耿金章 1980 年 9 月 9 日供詞，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

耿金章是12月20日去北京的，他打算成立「上海工人造反革命聯合委員會」，正在托聶元梓幫忙引見張春橋，想得到張春橋的同意。卻接到要自己也回上海的電話。他便馬上借錢買了機票，於次日中午12月29日趕回上海。二兵團派車子去機場接耿金章。在車上，耿金章問上海發生了什麼事情，被告知幾萬赤衛隊員進了康平路大院，而且赤衛隊還抄了康平路大院內張春橋和柯慶施的家。車子直接開到二兵團在永福路的辦公處。³⁵耿金章馬上召集二兵團常委開會，討論如何對付赤衛隊，此時已經是29日下午2時。常委們匯報說，二兵團已經派出二千多人去康平路，耿金章說太少，再調二萬人去。

當晚8點左右，耿金章和二兵團的其他人來到康平路現場附近的榮昌路60號，召集二兵團各區聯絡站負責人會議，會上決定：「到明天天亮前，赤衛隊如果還不撤離康平路大院，我們就衝進去，把赤衛隊趕出來。」耿金章說：「有造反隊就沒有赤衛隊，有赤衛隊就沒有造反隊！」³⁶

越來越多造反隊員湧進康平路大院，徐景賢看到這個情景後，擔心引起大的衝突甚至武鬥，讓人趕快去找王洪文、潘國平，希望他們撤人，但是到處打電話都找不到他們。耿金章也曾經幾次打電話找王洪文，沒找到。

耿金章的臨時指揮部就設在緊挨康平路大院邊的榮昌路66號。12月29日晚上，造反派和紅衛兵們聚在一起，討論如何對付被包圍在大院裏的赤衛隊員。在場的有機關聯絡站的幹部們，有紅革會負責人勞元一、馬立新等，還有來滬串聯的北大

珍等人的罪證之一》。電話是「由張春橋秘書打的」一事，只有耿金章的回憶。但究竟是哪個秘書打的，耿金章的交代沒有說明。

35 耿金章 1978 年 9 月 4 日談話交待。

36 耿金章 1980 年 9 月 9 日供詞，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聶元梓大字報的幾個簽名者。其中李醒塵對討論作了記錄，這份原始記錄記下了這樣的內容：

孫玉喜(二兵團負責人之一——筆者注)：準備組織力量突擊，要很好了解地形，要把道口截斷，人多組織好，多處突擊，大部分力量要安排好缺口，猛打猛衝，要採取計策，掌握戰機，我們還有後備力量待命，準備出動。

馬立新：抓他們的頭，衝一下，他們就跨了。

吳國瑞(機關聯絡站成員——筆者注)：要馬上抓，是個好機會，主張今晚就衝，衝之前可以搞些宣傳，談清楚為什麼要衝進去，以後衝進去辯論。時間要馬上衝進去。³⁷

和聶元梓一起造反的北京大學孫蓬一，坐在屋子正中間，面對着一張攤開的地圖，主張立即向造反派下令往大院裏衝。在場的機關幹部造反派們都不贊成，說這樣勢必引起武鬥，而且會損壞市委書記處的辦公設施和房屋。他們堅持要文鬥，要對赤衛隊員做說服工作。爭論間，機關聯絡站負責人之一王承龍來了。王承龍是徐景賢派去的。王也不贊成武鬥，說，張春橋是說對赤衛隊採取政治攻勢，還是不要打。孫蓬一很生氣，指着他們說：「你們機關幹部就是右傾，春橋叫調動造反隊，幹什麼？政治解決就是鬥爭解決，幹革命不能文質彬彬，搞溫良恭儉讓！」³⁸ 雙方爭論激烈，誰也不能說服誰。10點左右，耿金章帶了一幫人到了。大家都說：工人階級來了，聽工人的！耿金章一語定局：「上！」

12月29日，整整一天，造反派隊伍源源不斷開往康平路，大都是耿金章調來，也有工總司下面的組織前往增援的，還有

37 轉引自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清查辦公室編《康平路事件概要》年代，原文無成文年代，估計在1980年左右。

38 原「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成員朱維鈺1980年9月13日證詞。

紅革會等其他造反派組織。康平路被層層包圍，康平路外圍也被層層堵截，除非插着造反派旗幟的機動車輛，其他車子根本進不去。赤衛隊外援完全被切斷，形勢越來越嚴峻，一場重大衝突迫在眉睫。赤衛隊總部派人設法進入康平路大院，通過赤衛隊黃浦區聯絡部的一輛宣傳車，召集集結在大院內的赤衛隊區、局負責人，勸說他們立即集合人員撤離康平路。這樣，到12月29日下午，連同康平路附近地區，李劍鈺等說服陸續撤走了二萬人(有說是六萬)。

但是，由於信息不通暢，還有近二萬多赤衛隊員滯留在康平路大院和附近的馬路上。這二萬人中有許多人沒接到撤退通知，還有一部分人在等待總部代表與市委談判的結果。³⁹等到他們準備撤退，卻發現為時已晚，他們已經被十幾萬造反隊員團團包圍，四面八方都是新架設的高音喇叭，敦促他們投降，他們的手提喇叭發出的聲音根本無法聽見。不少赤衛隊員已經來了兩天兩夜，又冷又餓。與他們對峙的造反隊員近在咫尺，雙方只有幾步之隔，衝突一觸即發。為避免衝突，赤衛隊派出兩個代表前往與耿金章談判，要求造反隊撤圍，讓赤衛隊員撤出康平路，耿金章拒絕，說撤不撤要取決你們的態度，你們把赤衛隊區以上負責人交出來我們才撤。此時下面人來反映說有赤衛隊員衝出包圍了，耿金章下令壓回去。談判沒有結果。⁴⁰

終於，12月29日傍晚，曹荻秋進入康平路大院辦公大樓三樓，與赤衛隊談判。赤衛隊談判代表指責曹荻秋「出賣了我們」，「是你自己拼命把我們培養起來的，現在你又把我們踢開！」⁴¹曹荻秋無言以答，他只能說：「我並沒有全面否定你們的大方向，如抓革命，促生產。你們起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

39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40 孫玉喜 1979年10月26日交待。

4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線開火，我也是肯定你們的。問題要作具體分析。」⁴² 而據曹荻秋自己回憶：

29日要我接見，我接見了他們，接着就圍攻我，我沒有承認他們的組織是革命的，我的答覆是革不革命不能由領導決定，而是要在鬥爭中由群眾鑑定，廣大赤衛隊員是要革命的。由於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又以停電、停水、停交通，到北京控告相威脅。⁴³

晚上9點，陳丕顯從西郊賓館打電話給曹荻秋的秘密，要他轉告曹荻秋：如果赤衛隊提出要市委承認他們是「合法的群眾組織」，可以同意，其他要求給予物資上的方便等等也可以同意。⁴⁴ 曹荻秋於是立即和赤衛隊談判代表達成了部分協議。

但這個協議來得太晚了。

上海第一場大規模兩派衝突事件

凌晨兩點，曹荻秋還沒離開，造反派發起行動。身強力壯的工總司鋼鐵兵團男造反隊員，從康平路北大門湧進大院。那裏是紡織系統赤衛隊員集中的地方，女工多。造反隊員很快便衝進了一號樓，要赤衛隊員高舉雙手，交出赤衛隊袖章；甚至還強迫赤衛隊員低頭認罪，匍匐地上，從他們的人牆中挨着拳打腳踢，爬出院子。⁴⁵ 而在康平路大院南面，則由紅衛兵開路。

4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43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4 傳單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45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 年 9 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造反派們終於蜂擁進入大院。曹荻秋在辦公大樓的四樓，看到了康平路大院內兩派衝突全景。談判代表潘月發和陳英烈都親眼清楚地看到，曹荻秋流下了痛心的眼淚。赤衛隊首席談判代表陳英烈，讓人將受傷的赤衛隊員抬到曹荻秋面前，曹荻秋向傷員詢問了衝突的情況，然後進入四樓樓梯旁的廣播室，打開了廣播機，一遍又一遍呼籲停止衝突。曹荻秋的呼喊無濟於事，沒有人理睬他。造反派們衝上四樓，湧進曹荻秋和赤衛隊談判代表所在房間，押走了曹荻秋。⁴⁶

對康平路大院內赤衛隊的驅趕，整整進行了一夜。到12月30日清晨6時，康平路大院全被造反派佔領。據目擊者後來描繪：

榮昌路的大鐵門撞壞了，架門的石柱被撞歪倒了。32號樓的樓梯上的銅的欄杆扶手有兩公尺多長的一段被打壞了，扶手的鋼管被作為武鬥工具而砸扁了，辦公大樓的玻璃大門打壞了，小禮堂的樓梯的木質扶手均被打壞作為武鬥工具了，其他如椅子、沙發、門窗玻璃打壞的更多。⁴⁷

到處是狼藉一片，棉鞋、單鞋、帽子、手套滿地都是，還有大批搪瓷的杯盤碗碟和吃剩的麵包餅乾，樹木花草全被踐踏。一萬多名赤衛隊員被迫脫下袖章，兩手抱著頭蹲着，這大概是耿金章想出來的，他當過兵，戰場上就是這樣對待俘虜。赤衛隊員們被迫排成長長的縱隊，到指定點自己脫下赤衛隊的袖章，剝下的袖章有六大堆，然後魚貫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門。他們被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馬路上集中，聽造反派訓話。⁴⁸矮個子，黑臉膛，滿臉鬍子茬的耿金章，披着一件灰色的軍大衣，戴着一頂翻毛皮的帽子，穿着高筒雨靴，儼然勝利者，用

46 《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47 何秀文 1978 年 2 月 21 日《我所知道的康平路事件情況》。

48 徐景賢著《十年一夢》。

帶着山東口音的普通話向俘虜們訓話。

這就是康平路事件，上海文革中第一場大規模兩派群眾衝突，後來也被列為全國第一場大規模衝突。由於造反派目的只是將赤衛隊驅逐出康平路大院，而赤衛隊一向反對武鬥，也沒有激烈抵抗；加上湧入大院的雙方都是赤手空拳，所以衝突基本止於推搡拉扯。⁴⁹ 儘管如此，雙方還是有不少人受傷。據徐景賢當時工作筆記記載：「華東醫院、中山、華山，受傷一百多人，重傷兩個，一個是大腿骨折，女的××（筆者注：這兩字看不清）。」⁵⁰ 最嚴重的是大腿骨骨折，估計是被從二樓推下跌傷的。受傷者由康平路大院工作人員，叫來救護車送往附近的華山、中山和華東三家大醫院。沒有死亡記錄。

抄張春橋家事件

在康平路事件中，造反派驅趕赤衛隊的最大理由，是赤衛隊抄了張春橋和柯慶施家。柯慶施的家最初確實有人進去過，據當時在家的柯的女兒回憶：

忽然一位30來歲瘦瘦高高的女子發現了鋼琴上的照片，輕聲地一叫：「柯老！」人們立即都安靜了下來，把目光投向照片。不知是誰帶頭摘下頭上的棉帽，男子們都隨着脫下了帽子。沒有人說話，大家自發地向爸爸的照片鞠躬行禮，然後安靜地退出小飯廳從陽台走了下去，從小庭院離去。

……第二天早上，發現家門外的牆上貼着一張紙，上

49 有的書中說參加衝砸的造反隊戴着藤帽，拿着長矛鐵棍，這不符合歷史事實。那時還沒有戴藤帽的風氣，有藤帽的只是建築工人，大多數工廠工人只有布的工作帽，藤帽和長矛要到1967年的8.4砸聯司後才興起。鐵棍也不可能。竹棍和木棒倒是有可能，是從康平路大院的籬笆或傢具上現拆下來的。

50 徐景賢1966年12月31日工作筆記。

面寫着幾個大字：「這裏是柯老的家」。⁵¹

12月28日晚上，有幾個赤衛隊員曾經進入張春橋的家。當時大院裏人擠得滿滿的，連腳都難插，他們想找個地方坐下休息一會兒。張春橋秘書何秀文那天下午5時左右，他曾去張春橋家看望過，張的妻子文靜對他說：「開始，赤衛隊有幾個人進到家裏，是想找地方坐下來的，但看到是住家，有老有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門外走廊和樓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上了，以後再沒有進屋。」⁵² 文靜還告訴何，柯慶施的妻子于文蘭曾給她打過電話，也說有人先敲門進屋，但一進屋看到柯慶施的遺像，馬上就退出，再也沒有進去過。張春橋女兒張維維當時在家，她後來也證實：

赤衛隊進來以後，秩序比較好，他們住滿了大院的原辦公室和其他已經搬走的人家裏。我家也有一些人進來。晚上，他們坐在走廊裏，也有人叫我燒些水喝，這時沒有發生過抄家打人的情況。⁵³

而當時造反派方面的傳單，雖說赤衛隊員們對張春橋家屬態度很不好，但也說他們很快退了出去：

為首的帶隊人，態度極其惡劣，講了很多無理的話。如揚言「要造張春橋的反」，「控告張春橋」等。此外，還有一部分赤衛隊員曾闖入了柯慶施的家，但發現誤闖後隨即退出。後來，在廿九日，赤衛隊又有一些人進入張春橋同志的

51 柯慶施的女兒柯六六著《爸爸柯慶施在上海的歲月》，載於《江淮文史》2004年第5期，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52 何秀文1978年2月21日。

53 張維維1978年8月19日證詞。

家，對張春橋同志家裏人的態度也很不好。⁵⁴

可是，還是有傳說赤衛隊抄了張春橋和柯慶施的家。為了證實傳言是否屬實，很多人去張春橋家詢問，文靜都讓女兒張維維出面回答「沒有」。幾個與張維維認識的幹部子女乾脆將張維維的話刻成油印傳單印發。張維維自己也寫了一張大字報，立即被油印成傳單廣為散發：

造謠派破產

我是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我向大家介紹一下情況，赤衛隊是到我家來過的，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們並沒有抄家。他們沒有進臥室，當他們發現了柯老家，有些人就在柯老像片前靜默了三分鐘，並寫了紙條貼在門口，說明是柯老的家，請大家不要進去。有人(赤衛隊員)自動做保護工作。柯老家和我們家大人小孩都很好，請大家放心，革命群眾應該團結起來，向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力開火！

張維維(簽字)

記錄者：徐黃平，史美任(上海電器機修廠)

1966年12.31.上午11時

上海冷鑄廠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印。畜戶羽獸毛加工廠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翻印。毛巾十二廠魯班爆破組翻印。67.1.2.⁵⁵

54 傳單《聯合通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革會)、上海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炮司)、上藝司、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北航紅旗駐滬聯絡站、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哈軍工紅色造反團，1967年1月2日，復旦紅革會井岡山兵團1月3日翻印。

55 此份傳單有的組織在印刷時，題目也有為《謠言破產》。原件為上海復旦

1月3日，針對張維維的大字報，工總司與炮司、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等九個組織發表《聯合聲明》，將「抄家」一詞改為「闖進」：「為了澄清事實，我們特此聲明，張春橋同志家確實被工人赤衛隊闖進過，並且工人赤衛隊曾經在張春橋同志家靜坐示威。」這份傳單還揭露說張維維是「鐵杆保皇派」，「和她父親張春橋同志不是一路人」。

就在上海盛傳張春橋家被赤衛隊抄了的同時，1967年1月3日晚上8點，張春橋在北京接見王洪文等人的那次談話，也提到抄家事件：

廖祖康：你的女兒的聲明，他們到處張貼。

張春橋：我疏忽了，應囑咐他們當作階級鬥爭問題來看。

什麼叫抄家？非得砸爛了才叫抄家？柯老的家有什麼理由進去？我的家又為什麼進去？還要喊打倒張春橋。家裏的人要寫聲明，我讓他們找造反隊去商量。

王洪文：裏面什麼人都有，出出進進敲門搗亂。

張春橋：現在還是這樣嗎？

王洪文：我派人去保護了。

張春橋：市委有責任，市委的人跑掉了，為什麼柯老的家不轉移？我的家是我事先告訴不要動的。準備讓他們砸爛，砸爛了也好。

王洪文：我們商量，寫個聲明，既說明他們闖到你家，弄得不像樣子，又說明沒有抄家，柯老的家也不算抄了，說明是階級鬥爭。

張春橋：只你們寫不行，回去還要張維維讓她出來寫。⁵⁶

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56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222 頁。

但是，張維維最終沒有寫，她當時觀點趨向保守派。1月3日，文靜只好自己按張春橋意思寫了一份支持造反派的聲明，改口說：

連日來，很多革命群眾到我家來訪，很關心我們，我們表示感謝。在這幾天中，我們和很多群眾見了面，也把赤衛隊闖進我家的問題作了簡單的說明。但是也有那麼一些不戴袖章的赤衛隊員長時期的在我們家門口糾纏，嚴重地影響了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我們必須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在這場尖銳複雜的兩條路線的決戰中，革命的同志們要謹防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趁機搗亂和破壞文化大革命，轉移鬥爭目標。有人指望從這裏撈取救命稻草，死死抓住赤衛隊沒有抄張春橋同志的家來表明赤衛隊的大方向是正確的，這是絕對辦不到的。赤衛隊不抄張春橋同志的家，他們的大方向也是錯的。

最後，希望同志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張春橋家屬文靜六七·一·三⁵⁷

還有一個當事人也可證明文靜的改口。還在抄家鬧得沸沸揚揚之時，紅革會負責人勞元一曾去向文靜詢問，文靜對勞元一回答說「沒這回事」。後來文靜改口，勞元一又去問她：「你當時不是對我說赤衛隊沒有抄你家嗎？」文靜笑笑，沒有回答。⁵⁸「抄家」本來就是造反派驅趕赤衛隊員的理由。赤衛隊員既已經被驅逐出康平路大院，這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也就

57 《工人赤衛隊的大方向是錯的——張春橋同志家屬的大字報》，載於文革小報《新聞戰士》1967年1月5日，「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編。原文為文靜手書影印件以及鉛印字。

58 筆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對勞元一的電話談話筆錄。

不必再提。12月30日中午，衝突結束不到半小時，張春橋又給徐景賢來電話，詢問情況，徐景賢一一匯報。張春橋聽完匯報，用他那「由於抽煙過度而顯得有些沙啞的嗓音」，斬釘截鐵地說：「你們一定要始終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大造輿論，大造聲勢。指明這場武鬥完全是市委挑動群眾鬥群眾引起的，他們才是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最後，他又特地關照：「再也不要提赤衛隊抄張春橋的家了！」⁵⁹ 徐景賢找王洪文沒有找到，就以「丁學雷」的名義，讓工總司值班人員把他的話記錄下來轉告他們：

丁學雷傳達春橋來電：12月30日的流血事件是曹荻秋一手挑起的群眾鬥群眾的罪惡行動，現在口號應該提得明確一些，不要以圍攻張春橋的家屬為口號，要針對市委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⁶⁰

康平路事件中的工總司

康平路事件中，張春橋有沒有找過王洪文或潘國平？按常理，他要找工人造反派，應該首先找「司令」王洪文或「副司令」潘國平。為什麼卻打電話給遠在北京的耿金章？據說，張春橋最初先讓在上海的秘書找王洪文和潘國平，但秘書打了許多電話沒有找到，只好再找耿金章，總算打聽到耿在北京的聯繫電話，找到正在北京的耿金章。⁶¹ 當時要找王洪文和潘國

59 徐景賢著《十年一夢》。

60 工總司 1966 年 12 月 30 日值班電話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61 這是筆者文革後，2009 年有一次詢問於朱永嘉，朱永嘉說的，他說這是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文革中告訴他的。但是，筆者 2010 年左右在一次與何秀文的電話交談時，問何秀文，他是否打過這樣的電話，何秀文說沒有這個印象。以後筆者又幾次問過，都回答說沒有。何秀文而且說，文革結束後，專案組也沒有就這個電話的事情詢問過他。而筆者也確實沒有見到

平很難，連工總司常委們都不知他們的去向。找王洪文得通過廖祖康，廖和王洪文一個廠，是廠技校學生，老跟在王洪文左右，人稱王洪文保鏢；潘國平更是人不知在哪裏，很難找到。康平路事件一開始，徐景賢也曾找過他倆，都沒找到。徐景賢只好找到工總司的「鋼鐵兵團」。所以，最先進入康平路大院與赤衛隊對峙的是鋼鐵兵團。

王洪文和潘國平當時都沒有重視發生在康平路大院內的情況。潘國平說，他當時沒把赤衛隊去康平路請願當回事，認為是市委和赤衛隊內訌。潘國平那天晚上看戲去了，不在場。王洪文說自己直到二兵團包圍康平路，他才去康平路現場：

我知道康平路事件時，二兵團、工總司徐匯區分部、紅衛軍等組織已經調人把康平路包圍起來了。開頭我沒有重視，是到事件快結束時，因為雙方調人越來越多，我才重視這件事。……

關於康平路事件我不了解全過程，因為開始我不了解康平路是什麼地方，沒有重視。⁶²

文革中，康平路事件剛過去不久的1967年2月，二兵團散發的一份傳單，說王洪文當天晚上到二兵團永福路辦公處去過。⁶³

何秀文這方面的證詞。至於是誰打的電話，何秀文說他不知道。暫存疑。

62 王洪文1980年8月13日交代：《關於康平路事件問題》，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王洪文的這個交代，顯示他在事件發生前，沒有去過康平路，可是，下面所引曹德宏和方劍華文革後的交代，以及二兵團文革中的傳單，都說事發前王洪文去過現場。筆者請王腓利詢問廖祖康，廖祖康也說康平路衝突之前，他和王洪文的確去過永福路二兵團。

63 二兵團1967年2月14日傳單《二兵團在革命的暴風烈火中誕生》，原文為：「在這樣激烈的戰鬥中，王洪文當天晚上到兵團來講了一句『好吧！那麼我們就大幹一場吧！』就走了，潘國平，據王洪文講，當天晚上竟在看戲」。還說，二兵團調了幾萬人包圍康平路大院後，工總司「總部才陸

當時赤衛隊員一批一批地進入康平路大院，王洪文是去和耿金章分析形勢的，同去的有戴立清。戴立清後來回憶：

那天大概在下午4、5點鐘，當時還沒有打起來，我和王洪文去永福路二兵團辦公地點。我們和耿金章一起分析形勢，當時我們也沒有想到要去打在大院裏的赤衛隊員，只說要密切注意形勢變化。然後又去康平路了解情況，看到了許多赤衛隊員進入大院，還看到赤衛隊要曹荻秋簽字的幾個條件，是一個紅衛兵給我們的。不過那時還沒有說起抄家之事。當時我們不知道是張春橋要耿金章回上海的，耿金章沒告訴我們。⁶⁴

王洪文去找耿金章時，康平路大院裏尚未發生衝突。耿金章29日回上海，30日凌晨驅趕赤衛隊。如此推算，王洪文去二兵團開會商量的時間應該是在29日傍晚。當時，二兵團的頭頭們都去了康平路，只有耿金章和常委方劍華在。王洪文和耿金章討論如何分工：

怎樣對付赤衛隊對策會議，就在二兵團組織駐地召開，參加成員：王洪文、戴立清、耿金章、方劍華。會議時間約一個多小時，當時具體講法記不清了。最後決策：(1)康平路現場歸二兵團負責解決，以二兵團為主成立康平路火線指揮部。(2)各區、各基層赤衛隊老窩由王洪文、戴立清去指揮，工總司造反隊砸掉。經上述分工之後，王洪文、戴立清就回去了，耿金章帶了些人去康平路現場指揮。⁶⁵

續派來了一些造反隊員增援，以二兵團為主，建立了火線指揮部」。

64 筆者2008年7月25日與戴立清的訪談。

65 二兵團負責人之一方劍華1980年2月9日交代，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但據王腓利告訴筆者，廖祖康

會議時間很短，只有一個多小時。會後戴立清即按照會議精神，打電話給工總司閘北區分部負責人曹德宏，要他馬上調隊伍去康平路，盡量多調。曹領命立即調動三十多輛車，一千二百多人。還在附近高安路口的西湖公寓樓下，也設立了個指揮部。晚上8點左右，王洪文和戴立清、廖祖康等人來到這個指揮部，王洪文將曹德宏叫到他小車裏關照，守住從衡山路進入康平路的路口，不要讓赤衛隊的增援進入。⁶⁶ 王洪文自己只是去衡山路那裏看了一下。馬路上全是人，他怕被赤衛隊的人認出脫不了身，沒有進入康平路便離開回廠去了。

康平路大院衝突開始後，在工總司杭州路總部看家的范佐棟不斷接到下屬區聯絡站打來的電話，問康平路那麼多人，總部為什麼沒有負責人坐鎮指揮，要不要派人去現場，范佐棟怕引起大衝突，不敢輕易表態。後來下面來的電話越來越多，12月30日下午，范佐棟和王腓利、陳阿大，三人馬上趕到國棉十七廠找到王洪文，將康平路的情況告訴王洪文。王洪文這一時期和潘國平的關係出現裂痕，曾經表示：我不管了，讓他小潘去管吧。還表示，外面的鬥爭太複雜，還是回自己廠吧。所以這一陣他很多時間都在國棉十七廠。⁶⁷ 王腓利等一定要王洪文去康平路現場看看，說那裏聚了很多，可能會出大事。於是，王洪文要范佐棟仍回總部坐鎮，自己和王腓利坐了十七廠的皮爾卡轎車去北站。一路只見路上停滿卡車，多得不得了，全是赤衛隊的。卡車頭全都朝着西北方向，車上滿載着汽油

說康平路衝突之前，他和王洪文雖然去過永福路二兵團，但沒有進去開過會，只是在門口說了幾句話，議論了幾句，就離開了。

66 曹德宏 1980 年 8 月 30 日交代，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67 王洪文這一時期的心情，是王腓利告訴筆者的。此外，王洪文在 1966 年底曾想回廠，是筆者在 2012 年 12 月的一次原工總司人員的聚會上，聽王洪文妻子崔根娣說起的。

桶。事後，他們才知道赤衛隊要去北京告狀，估計汽油是準備路上用的。王洪文對王腓利說，趁現在赤衛隊主力全部外出，趕快把他們各區和各廠的聯絡站敲掉。於是他們馬上去工總司閘北區分部和工總司閘北區司令部佈置。⁶⁸ 王洪文然後又去了康平路大院，到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家去看了一下：

大約是康平路事件最後一個晚上，我同工總司委員王腓利從國棉十七廠出發去閘北區分部，我親自同馬振龍、曹德宏等調人把西藏路一帶的赤衛隊包圍起來，並收繳了赤衛隊的袖章，我到現場去看過。我記得當時是坐廠裏的小汽車，是誰開的車子不記得了。康平路事件剛結束我就到康平路柯慶施家和張春橋家去看過。因為事件發生以後聽說赤衛隊佔領了這兩家。⁶⁹

在整個康平路事件中，都是耿金章坐鎮康平路現場指揮。文革後，耿金章回憶說，進康平路大院驅散赤衛隊是他自己決定的，他一直沒見到王洪文，「我幹我的，他幹他的」，⁷⁰「解決赤衛隊問題是我自己的決定」，「我做出決定時沒有與王洪文聯繫上」。⁷¹ 顯然耿金章只想單獨完成對赤衛隊的驅趕，向張春橋顯示工人造反派中究竟誰是強手。

68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69 王洪文 1980 年 8 月 13 日交代：《關於康平路事件問題》，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王洪文去張春橋家看望的事，王腓利在 2009 年 3 月 21 日與筆者、金大陸、金光耀的訪談中也說到：「12 月 30 日這天，我和王洪文從榮昌路進去，那時人們還不認識王洪文，我們甩了甩工作證。王洪文先去張春橋家，他進去和文靜講話，我到了門口，就沒有再進去，在門口等王洪文。我等在張春橋家門口時，看到張春橋家裏確實被翻得一塌糊塗，也不知是不是赤衛隊幹的。從張春橋家出來，王洪文又去柯慶施家彎了彎」。

70 耿金章 1979 年 3 月 7 日預審陳述。

71 耿金章 1978 年 9 月 4 日陳述筆錄。

第十四章

康平路事件 造反派統領上海文革 (下)

昆山事件

12月29日，整整一天一夜，赤衛隊總部電話鈴聲不斷，滯留在康平路大院內赤衛隊員連連告急，各區聯絡站來電要求總部集中隊伍對造反派反包圍。一些聯絡站已經集結隊伍準備出發，王玉璽考慮再三，沒有同意。他擔心大規模正面衝突將造成流血事件。12月30日，終於傳來了赤衛隊在康平路全軍覆沒的消息。總部決定在人民廣場舉行集會抗議造反派。¹赤衛隊總部負責人希望以和平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怒，這也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的行動特點。他們最初的成立宗旨之一，就是反對文革中的武鬥行為，他們要求曹荻秋簽字、後來又被曹荻秋聲明作廢了的《八條》中，就有「嚴禁私設公堂和私自抓人、綁架、拷打」內容。現在他們自己遭到這樣的行動了。

十二三萬赤衛隊員，分四路，集結在外白渡橋、長寧區、西藏路橋和天目路橋。但是，人民廣場附近的道路都已被造反派佈置堵截。在外白渡橋、北站，不時發生造反隊與赤衛隊的摩擦。為避免衝突，王玉璽將集合地點改在北火車站。大批赤衛隊員在北站廣場集中，按區、局集合隊伍。總部規定：赤衛隊員將毛主席像章佩戴在右胸，而不是通常的左胸，以區別於

1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普通旅客。赤衛隊總部決定北上告狀，求助於他們一貫忠於和效力的毛主席、黨中央。他們北上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在一片激憤、混亂和倉促中，赤衛隊總部顯然沒有來得及仔細考慮。他們只是覺得：

上萬的人進京控告，肯定會引起中央的重視，黨中央會派人來解決的，那時我們再和來人談判，達到我們的要求。……

我們去那麼多人，你市委知道後必然要追我們回來，那時我們可以和市委進行談判，也有達到我們的八項要求的目的。你市委不來，我想中央知道也會派人來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如果我們能得到中央的支持，那麼我們在上海就能和造反隊公開地幹了。²

上海市委得知消息後，立即派人驅車前往，希望找到王玉璽談判，但車子剛到西藏路，就被在那裏造反的華東六省一市來滬人員扣下了。上海市委與赤衛隊聯繫從此中斷，赤衛隊失去與市委談判的最後機會。

12月30日下午5時3刻，一萬多名赤衛隊員在王玉璽帶領下，分兩路，由一輛宣傳車引路，冒着霏霏冬雨，徒步向北進發。12月30日深夜，隊伍步行至安亭。他們中的許多人一個多月前曾來過這裏，那是在安亭事件中，為了勸阻工總司的造反派北上告狀。現在他們自己也北上告狀了。上萬人沉默地通過安亭，安亭市民用商店全部徹夜營業的特殊行動，表達了對他們的同情。³ 12月31日下午2點，兩路隊伍約一萬人⁴ 抵達臨近上

2 王玉璽陳述筆錄，轉引自工總司1968年10月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

3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4 這個數字是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年9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中所說的，也有材料說是二萬人，而文革中徐景賢讓人編寫的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中則說到達昆

海的江蘇昆山。經過一天一夜的跋涉，赤衛隊總部負責人已經開始冷靜，感覺到這麼多人北上，不是明智之舉。上海市郵電局的赤衛隊與昆山郵電局聯繫後，在昆山郵電局召開了會議，商議是否還要繼續北上。

但是，時間已經不容他們再舉棋不定。僅僅一小時後，下午3點，164輛大卡車，滿載着造反隊員，追到了昆山，在鎮洋橋前下車集結。他們大部分是二兵團的造反隊員，是耿金章調集的。此外，還有復員軍人造反組織「紅衛軍」也派出人馬。一共二萬多人。工總司沒有調人去，王洪文不贊成：

二兵團他們調了十萬人去追，被我知道後攔住了。結果二兵團就調了四萬人追去。我是主張不追，而是抓革命促生產。⁵

而據徐景賢當時的工作筆記記載，那是張春橋的意思：

工人造反司令部不拉大隊伍去，以免引起武鬥，要其它組織去說服進行工作。⁶

下午2時至5時，繼康平路衝突後，又一場衝突在昆山的鎮洋橋上展開。橋這一頭赤衛隊員們手挽着手，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橋那一頭，造反隊員們也高呼着口號湧來。昆山地區的幾萬居民和附近農民，圍在河兩岸，觀看着這場上海兩大派工人的衝突。不少昆山市民也加入助戰。⁷不過，這場衝突也只是推來搡去，所以雖有傷者，都只是輕傷。上海兩大派工

山的赤衛隊員有七、八萬。

5 王洪文 1968 年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對敵，掌握政策大會」上的報告。

6 徐景賢工作筆記 1967 年 1 月 1 日。

7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1983 年 9 月編《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王一魯、陳其賢執筆。

人的衝突就這樣又向昆山蔓延。事態不斷擴大，昆山的鐵路運輸也受到影響，滬寧線部分中斷，公路也被堵塞。

不過昆山事件後來沒有持續，這與張春橋有關。張春橋說服工人造反派不要再增派人員去昆山，以免衝突延續和擴大。他提出要多派些學生和機關幹部去昆山做說服工作。⁸ 1967年1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和市工業生產委員會的周壁，趕到昆山與赤衛隊談判，勸他們回上海。就這樣，勸回了一部分人；最後仍有六千至七千名赤衛隊員，自蘇州分乘兩列火車去了北京。⁹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造成上海鐵路運輸又一次癱瘓。上海鐵路局調度所的80多名調度員幾乎都是赤衛隊員。他們去康平路請願，然後又北上告狀，除幾個人留守，絕大部分都離開了調度台。鐵路交通無人調度，中樞神經癱瘓。而造反派也有不少人去康平路和昆山。兩大派工人大批離站，上海鐵路再次全線癱瘓。據文革中的一份資料記載：

調度所80多個人，除留幾人看家外，全部離開了調度台。從早上5時起，調度完全停止，機車不出庫，列車不開行，貨物不裝卸，正在路上跑的列車也停下來，滬寧、滬杭線全部癱瘓。到31日早晨，總共26個半小時中運輸無人指揮。這期間的損失是：上海站停開客車26列，五萬多旅客乘不上車；南京、杭州方面開來的二十八列客車停在沿線各站，5萬多旅客擱在路上，沿途小站吃喝都成問題；上海地區停開列車38列，2025車貨物堵在車站；南京、杭州開來的22列1119輛貨車被迫中途停車；上海地區少裝車759輛（應裝1128輛，實裝369輛），少裝貨物25735噸；少卸車1280

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9 這個數字引自《關於對赤衛隊案審查情況的綜合報告》，赤衛隊專案組 1968 年 4 月 1 日，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輛(應卸1608輛，實卸328輛)，少卸貨物42880噸。31日後雖然局部復工，但正常生產秩序已被打亂，客車時發時停，絕大部分開不到終點；貨車滬寧、滬杭兩線加起來只開6、7對，不到平常的12%。各地紛紛來電告急。工廠原料、海港運輸等都起連鎖反應。西南、西北地區物資部門還來電告急。¹⁰

當初造反派北上告狀攔截火車，造成滬寧線全線中斷，沒有受到懲罰反而獲勝；現在保守派北上告狀，雖然沒有攔截火車，但也引出滬寧線甚至滬杭線中斷的連鎖反應。遲到的懲罰終於來臨，不過卻是落在了赤衛隊的頭上。

「三停事件」

康平路事件從組織上擊垮了保守派，赤衛隊的骨幹和負責人紛紛被抓。但是，赤衛隊真正被從政治上取消存在資格，卻是在1967年的1月下旬。1月19日，工總司的機關報《工人造反報》刊登《請看赤衛隊一小撮領導人的反革命大陰謀》，文章披露赤衛隊總部委員李詩音寫的交代，說赤衛隊總部「曾經打算策劃停水、停電、停交通」。這份交代說赤衛隊總部決定「三停」，而且已經佈置下去，還說12月30日早上，鐵路、吳淞發電廠以及郵電開始停工。

1949年以後，工人階級雖被奉為「領導階級」，但是他們並沒有罷工的權利，所有的鬧工潮者最終都受到了嚴厲處分。造反派攔截火車，中央文革其實也反對。陳伯達和張春橋最初都不贊成，一再說服滯留在安亭的造反派回上海。張春橋一到安亭就對王洪文等人表示：「你們這樣做是違法的，是要殺頭的！」只是由於毛澤東正要尋找學生紅衛兵之外的社會力量，

1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才認可工總司的攔截火車行為。但這種認可仍是有保留的，在張春橋與工總司簽訂的第一個《五項要求》中，只寫了「承認『11.9』大會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沒有明文承認攔截火車是革命行動。保守派卻只看到造反派攔截火車獲勝一面。走投無路之際，他們也開始模仿對手。

保守派想對市委施加壓力，在康平路事件發生前便已有端倪。那是在解放日報事件剛結束時，市委指示各單位重新宣讀中央軍委批轉的有關「工礦企業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不成立紅衛兵，赤衛隊等組織」通知，造成基層廠工人紛紛退出赤衛隊。赤衛隊負責人十分惱火，在總部會議上發牢騷，說市委是蠟燭，不點不亮，造反派鬧一次得逞一次，我們只有把事情鬧大，市委才會承認我們；說索性停工、停水、停電，看市委承認不承認我們；說把事情弄大，要中央出來講話。¹¹ 12月23日，赤衛隊逼迫曹荻秋在《八項要求》上簽字，以停工、停水、停電即「三停」要挾，曹荻秋在後來的檢查中提到此事，前文已引。最初以反對工總司攔截火車中斷交通而成立的赤衛隊，急不擇路地打算重覆自己曾經批判過的行動，而且還打算將事態搞得比對手的安亭事件更大。

12月27日至28日凌晨，就在大批赤衛隊員前往康平路請願抗議的同時，赤衛隊總部連續開會討論如何應對危局。一些局和區的赤衛隊聯絡站紛紛指責總部太軟弱，說：「你們總部就是軟弱無能」，「不停水、停交通對市委沒有壓力的」。當時楊浦區聯絡站負責人帶去康平路的大部是紡織廠的工人，大家在討論中認為楊浦區這樣做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總部應出面，而且還應該再增加一些人，人多了，市委總要解決，最好中央派人來解決。許多人提出：

紡織工人有很多赤衛隊去華東局了，如果曹荻秋不出來承

11 工總司 1968 年 10 月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認錯誤的話，財貿也停下來，如果還不出來承認錯誤，清潔也停下來。……

赤衛隊員全部停工到華東局、市委去。交通、商店、水、電一停，用不到幾小時，中央就會出面講話。……

有的提出要停水、停電、停煤氣、有的主張塊塊停，有的主張條條停。(筆者注：「塊塊」即地區，「條條」即行業)

上海公用事業局的赤衛隊負責人說：

公用分部的人大部分是赤衛隊，有啥事一句話，水廠如果一停馬上就起作用。……

公交不要通知，實際已經停了。車子開不出去。……

如果叫清潔工人，一天不倒馬桶，馬上就變成一個臭上海。

港務系統的赤衛隊負責人說：

如果我們港務一停的話，輪船上貨物沒有人卸，這時曹荻秋一定要出來公開向全市赤衛隊認錯，說不定中央文革還會派人來上海接見赤衛隊。

上海鐵路分局的赤衛隊負責人說：

我們鐵路已作了準備，我們大多數列車員是赤衛隊員。……

鐵路已經停了，沿線各站正在通知，現在人已都集中，馬上可以拉來。

一些工廠的赤衛隊打電話到總部，有紡織廠要關車的，甚至有個廠打電話來要停水。大家希望以這樣擴大事態的方式逼

迫市委承認赤衛隊，逼迫中央像對待安亭事件那樣，再一次派人來上海：

如果張春橋同志接見，我們不要，我們要周總理接見或者陳伯達同志接見。後來大家講：「只要有中央文革的人接見就可以了，我們的組織就是合法的。」

最後，比較統一的意見是：

一方面繼續派人支持康平路，並成立指揮部，另一方面決定先停紡織廠，其次停財貿、港務、公交跟上，具體時間由總部打電話通知。

而根據赤衛隊閘北區聯絡站負責總務的一個會議參加者當時作的記錄：

第一步驟：

1. 從今天夜裏開會時起，向華東局、上海市委逐步增加人數。
2. 製造輿論、開動宣傳廣播機器，進行宣傳，使得家喻戶曉。
3. 採取行動前，要得到群眾支持。

第二方案：

1. 要利用條條和系統結合，抽調人數。
2. 應該具體指揮，果斷下達命令。
3. 要機動、靈活分析形勢研究下步工作。
4. 具體分工，指揮部分二線或三線絕對不能暴露。
5. 以楊浦區紡織廠先停，外港停三、五、九，三個區，這樣會有國際影響。

第三決定：

1. 停紡織；2. 停財貿；3. 停交通；4. 停外港；5. 最後全全部停下來。¹²

會議結束後，12月28日早晨，總部向中央發了一份電報，這份電報不久被作為赤衛隊總部要挾中央的證據：

中共中央、國務院；北京：

曹荻秋挑起群眾鬥群眾，赤衛隊無法繼續生產，遭綁架，揪打，甚至失蹤；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群情激憤，有全市性停工危機，總部勸說無效，目前群眾又出現系統停工趨勢，但鑑於目前情況總部難息群眾激情，事關全國影響國際，涉及抓革命，促生產的大問題，總部已處困境，特電呈總理務請速派人員於七點專機抵滬，急辦十萬火急。

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

十二月二十八日五點十分於滬王玉璽¹³

各區、各局的赤衛隊分頭打電話通知自己系統的赤衛隊前往康平路集中。徐匯區在康平路附近的淮海中學集中了一千多人；紡織系統28日這天去了三四千人，僅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就有近二千八百多人離開車間，全廠40%的機器停轉；公用事業局12月29日往康平路調了八千名赤衛隊員，其中電車二場約三百餘人，造成許多電車因無人駕駛只能拋錨，個別路線更是只有二、三輛車行駛，而原來應行駛二十輛左右。¹⁴

以上這些材料全部來自工總司1968年編的一份內部資料，

12 以上材料全部轉引自工總司1968年10月編《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中的赤衛隊負責人1967年的交代。

13 同上。

14 同上。

都是赤衛隊的會議記錄或赤衛隊負責人和骨幹事後的交代。事實上，港務系統的停工，也正是在上文所引的上港三、五、九區。而在鐵路系統，赤衛隊總部當天打電話給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的赤衛隊負責人，通知他：調度所所有人員全部去北京控告。所以當天晚上下班後調度所的人都走了。¹⁵ 王玉璽帶頭北上告狀。身為上海鐵路分局調度室副主任，他應該知道那麼多調度員的離去，將會造成怎樣的後果。但是對造反派的憤怒，使他沒有周全地考慮形勢。

鐵路和海港最先癱瘓，上海的煤和存糧告急；而煤無法正常供應，更使上海發電廠幾乎停電。1967年1月19日《工人造反報》上刊登的那篇李詩音交代，就是內容之一。此外，文革中的一些造反派編的資料，也記載了當時上海的部分情況：自12月31日

早晨5點多，上海的吳淞地區部分工廠開始停工。六點不到，郵電部門開始停工。公交系統也部分停工。¹⁶

但是，文革結束後，對於赤衛隊是否曾經策劃過三停，許多當年的赤衛隊負責人都堅決否認。王玉璽和潘月法斬釘截鐵地說，我們不可能策劃三停，這是工總司栽贓，那些文革中的交代都是斷章取義、移花接木，甚至逼供誘供，不足為信。即使個別人有過議論，也只是他們的個人行為，不足為據，總部根本沒有做過任何三停的決定。¹⁷ 而國棉三十一廠赤衛隊負責人李劍鈺則認為，赤衛隊總部那天開會，即使有人說要停生產，也最多是氣話：

15 筆者 2013 年 1 月 6 日對謝鵬飛的訪談。

16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7 筆者 2005 年 12 月 1 日對王玉璽的採訪，2006 年 1 月對潘月法的電話採訪。

三停是肯定沒有的。《工人造反報》上那篇揭發赤衛隊搞三停的文章影響非常惡劣。當時可能有人講了些氣話，說市委蠟燭，造反派不生產停交通倒是革命的，難道非要我們也將生產停下來。但這最多只是氣話，最終沒有形成決議。當時的決議是決定遊行抗議，如果不能遊行，就派先遣隊去北京。而在那篇文章中，赤衛隊似乎已經通過了決議，並已佈置實施。這不符合事實。¹⁸

赤衛隊總部沒有意識到自己處境的險惡，沒有意識到即使是氣話，也會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張春橋在不久的一個講話中就把「策劃三停」作為赤衛隊垮台的原因：

上次我來處理安亭事件時，最大壓力是生產，對工人造反隊是最大壓力，對我也壓力很大，說我拿原則做交易。這些人當時還覺得自己力量最大的，但革命沒壓下去，他們就連原則也拋棄了。我們沒來時接電話聽說，赤衛隊三停，幾萬人包圍了康平路衡山賓館，幾萬人上北京。赤衛隊來電報很多的，壓中央文革派人來，我們感到這是件大事了。但也預感到赤衛隊要垮台了，他搞三停就完全脫離上海人民，幾萬人上北京，你要不要生產？！我們就與一些同志打電話趕快把抓革命、促生產旗幟舉高高的，過去他們拿來壓革命，現在我們拿來促革命。¹⁹

赤衛隊負責人中，確有人曾以三停威脅過曹荻秋。而且赤衛隊下面一些系統或基層的負責人還在總部辦公室打電話要基層三停。但從所有可以查到的當時資料，以及赤衛隊負責人

18 筆者1992年7月3日對李劍鈺的採訪筆錄。

19 張春橋、姚文元1967年1月11日同北京高校駐滬聯絡站人員座談，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事後的交待，都可以看出，那是一些系統或工廠赤衛隊負責人在混亂和憤怒中的各行其是，總部負責人王玉璽等，從未做出過三停的決定，更沒有向下部署。那天總部討論的同時，康平路大院即將發生對赤衛隊的圍剿行動；緊接着，大批赤衛隊員不堪批鬥，或紛紛出逃，或北上告狀。工廠裏已經沒有赤衛隊員。總部無法再指揮下面，因為根本找不到基層赤衛隊負責人；而且總部負責人自己也無處藏身，不可能再打電話佈置決策。但是，大批赤衛隊員離開生產崗位，北上告狀或躲避批判，卻造成了三停事實。

其實，上海工業生產癱瘓和半癱瘓跡象早就出現。安亭事件中，全市幾千造反隊員離廠造反，只是因為當時參加造反隊的工人數量不多，少數人離廠還未從根本上影響生產。康平路事件中，赤衛隊和造反隊雙方工人都大批離開工廠。緊接着，造反派對赤衛隊實行全面圍剿，所有工廠的赤衛隊辦公室不是被封，就是被砸，骨幹被通緝，普通隊員上班遭批鬥，大批赤衛隊員離廠躲避。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當時共有職工八千多，離廠的赤衛隊員就有三千多，「有的準備到北京，有的回家躲避起來，還有一部分聚集在公安局門口抗議」。²⁰ 工廠無人生產的嚴重狀況陡然顯現：

由於大批受蒙蔽的赤衛隊員離開生產崗位，楊浦區的紡織工廠開始部分停工，普陀、長寧等區的部分工廠也跟着陸續停工。革命生產都受到嚴重損失。如國棉十七廠，由於2900餘名赤衛隊員被騙離廠，從1966年12月29日到1967年1月9日，十天中，損失棉紗1787.61件，棉布6281公尺，合計產值達156萬元。在印刷行業中，也由於大批赤衛隊員離廠，單在12月26日到29日4天內，就少印了「老三篇」24萬冊，毛主席寶像18萬萬張。²¹

20 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 1975 年編《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2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而恰恰在這個時刻，赤衛隊總部有人提出三停，即使是沒有實施的激憤之言，也給對手送上摧毀自己的最堅實理由，同時也為生產大幅度下降，提供了最現成的責任承擔者。

造反派強行解散赤衛隊

12月30日早晨，在康平路附近的衡山賓館，王洪文主持會議，佈置「盡量迅速地徹底摧毀赤衛隊的區聯絡站」。接着第二天，工總司又印發《特急通令》，下令：

把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及各區、分部的頭子統統抓起來，押送公安局。各工礦企業工人赤衛隊頭子中，有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文革小組人員的反革命罪行者，也一律抓送公安局。²²

不過，比起後來外地的一些大派組織對不同意見群眾組織的處理，工總司並沒有宣佈赤衛隊是「反革命組織」。

工總司全線出擊，赤衛隊各級聯絡站紛紛被砸，赤衛隊負責人被抓後，先是遊街，然後被送往公安局。許多人還被硬逼着穿上用幾十個赤衛隊袖章拼縫的馬甲背心，在各車間遊鬥。赤衛隊骨幹被關押或強迫辦「學習班」。據1968年赤衛隊專案組的報告：

在市、區二級274名赤衛隊骨幹分子中，先後依法拘捕8名，經群眾扭送公安機關教育釋放的80名，被群眾批鬥的96名，未作處理的63名。²³

22 工總司傳單《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特急通令》，1966年12月31日。

23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赤衛隊專案組1968年4月1日《關於赤衛隊案審查情況的綜合報告》，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而文革結束後，上海市公安局預審處《關於赤衛隊平反的請示報告》記載：

被工總司抓去的市區二級負責人23名，關押時間最長達2年零2個月，被造反派扭送公安局拘留的有61名。這個數字，不包括各廠自己設立的刑訊室和隔離室中所關押的赤衛隊幹部和普通隊員。²⁴

不過這份報告的數字不盡準確，《報告》解釋說，當時拘留手續很不完善，從檔案上看不出關押、釋放的時間。單是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就有二十五名赤衛隊員被扭送公安局。²⁵

13年後，1981年上海市總工會統計：

赤衛隊總部負責人王玉璽被判4年徒刑，3名常委被打成壞分子。市、區兩級赤衛隊的主要成員243人被公安機關拘留關押。許多工廠赤衛隊的骨幹，被扭送公安分局、派出所，遭受迫害。²⁶

公安機構關押赤衛隊員，最初的指示來自周恩來。據徐景賢回憶，抓王玉璽是周恩來直接給陳丕顯打電話下的指示。那天是1967年元旦，凌晨零點10分，張春橋打電話給徐景賢，說：

上海的赤衛隊鬧着要乘火車到北京來告狀，中央不同意，

-
- 24 上海市公安局預審處1978年12月5日《關於赤衛隊平反的請示報告》，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一》。
- 25 這個數字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218頁。
- 26 上海市總工會黨組1981年12月30日《關於進一步做好原上海工人赤衛隊的平凡工作的報告》，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但是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有一個赤衛隊的負責人，名字叫王玉璽，他利用職權同意調車，我們知道了都很生氣。剛才張、姚開會研究了，已經由總理直接打電話通知上海市委陳丕顯，要他到上海鐵路分局去對王採取措施。²⁷

而周恩來在康平路事件剛結束時的一個講話中，說王玉璽是「壞分子」，並說自己已經佈置上海市委逮捕王玉璽：

保守派中有壞分子，把正常的車停下來，上邊調度所主任非法開出了兩列車(現已有一輛抵京)，把其他車停下來。因此我們採取措施，把調度所主任逮捕了，非法開車是不允許的。²⁸

張春橋也打電話指示抓赤衛隊員。康平路事件剛結束，張春橋直接從北京給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長打電話：「現在造反隊受壓，公安局不能再按老規矩辦事，要介入社會，凡造反派扭送公安局的赤衛隊員，公安局要收留審查」。張春橋還說，要逮捕王玉璽，說：「這個人起碼要判他五年！」²⁹ 王玉璽在12月31日的昆山事件之前，已乘吉普車往蘇州。在蘇州他沒有找到總部的人員，就回了上海。但上海總部已經被砸，他於是買了車票去北京。中央接待站要他們回上海，說上海問題上海解決。他在北京待了三天，告狀無果，只好回上海。他還不知道兩天前周恩來已經佈置上海市委逮捕他。到上海第二

27 轉引自徐景賢著《十年一夢》。

28 周恩來 1967 年 2 日接見全國鐵路系統在京代表的講話。文革結束後筆者曾告訴王玉璽說，逮捕他的指示是周恩來下的，他怎麼也不願相信，認為這是造反派偽造的，誰會想到自己忠心耿耿要保衛的對象竟會下令逮捕自己。

29 張春橋的這兩段話都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218 頁。

天，他就在南站被鐵路造反派抓獲，先送去南站派出所關押。因為是周恩來下令關押的，所以南站派出所派向北京匯報後，又轉送市裏關押。³⁰ 王玉璽後來被判刑四年，1971年1月被釋放，回上海鐵路分局「勞動」。四年關押中從不放風，雙腿幾乎萎縮。此外，赤衛隊總部負責人潘月法、金瑞章和李詩音，都被在全市大會上宣佈「戴壞分子帽子，管制三年」。

對大批普通赤衛隊員來說，處境變化不是太大，他們過去是普通工人，現在還是普通工人。如果說有什麼影響的話，那就是相當一部分赤衛隊員受到的經濟損失。³¹ 許多工廠以廠裏赤衛隊員「站錯隊」為由，扣發了他們當月或當季的獎金還加上年度獎。康平路事件正值1966年年底，接着便是1967年初各工廠發放1966年的年度獎金。年初正逢中國最重要的節日春節，在收入普遍較低的年代，年度獎成為許多家庭的春節購物資金，於是許多赤衛隊員因此沒錢購買春節年貨。而有些被認為態度頑固的赤衛隊員和負責人，被扣獎金時間更長達數月。

赤衛隊骨幹或負責人的處境變化則比較大。他們中許多人過去都是工廠黨組織長期依靠和重用對象，現在卻被甩到邊緣。這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通例。對那些運動打擊或批判對象，先降政治名份，再降職業身份。如王玉璽、馬驥、李劍鈺等人，過去都在重要部門工作，康平路事件後，他們被長時間批鬥和關押。之後又被發配去幹世人認為最低賤的工作。王玉璽刑滿釋放後，一直在鐵路上當普通工人。馬驥被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一個多月，釋放後被分配去廠裏的二紡車間，清理布機垃圾，每天身前身後各掛一塊侮辱性牌子，經常被一個車間一個車間地巡回遊鬥。1972年總算「落實政策」，但也只

30 筆者 2013 年 1 月 6 日對謝鵬飛的訪談。

31 當時獎金屬於工人工資外超額勞動收入，每月發放，稱月度獎(也有的廠按季度發放，稱季度獎)；還有年終獎，幾乎所有單位都在第二年年初發放。1966 年改稱「附加工資」。月度獎相當於普通工人 1/8 至 1/10 的月工資；年終獎相當於普通工人 1/3 甚至 1/2 的月工資。

是讓他去廠部食堂當管理員，再也不讓他回保衛科。李劍鈺被關押二個多月，釋放回廠後，先是當清潔工，後又被派去車間當輔助工，直到1973年才被「落實政策」，調到廠供銷科當計劃員。但和馬驥一樣，再也不讓他回工廠權力中心的組織科。還有陳阿春，被市公安局關押十個月，放出來後先下基層「勞動」，1969年又被發配去上海在南京的梅山鋼鐵基地。以後，在入黨、提拔、加工資等政治或經濟利益的關口，當年的赤衛隊負責人或骨幹乃至一些普通隊員，總會遇到打壓。

在赤衛隊遭到解散的同時，保守派的上紅總部和上紅大專總部及其各區分部也遭強行解散。其實，解放日報事件之後，上紅總部和上紅大專總部已經很少活動。本來這兩個組織就都非常鬆散，領導成員沒有領導經驗，也缺乏活力。加上市委自身遭受衝擊，根本無暇給予指導；為了避免被說是操縱保守派組織，也不敢給予指導。於是，上紅總部和上紅大專總部不知該幹什麼，除了8月底的全市性大抄家，上紅總部幾乎再沒有什麼有影響的行動，無所事事。造反派興起後，上紅總部和上紅大專總部的負責人，在自己的學校都被貼大字報。為躲避批判，大部分負責人都外出串聯。1966年12月左右，擔任上紅總部政治部主任的張維維離去。臨走，她寫了一封信，說她父親張春橋不贊成她參加上紅總部，因為這個組織是保守派，所以她要退出。這封公開信被印成傳單。張維維的退出，給上紅總部沉重一擊，從此大家都不去總部。³² 到康平路事件前，上紅總部和上紅大專總部已經名存實亡。康平路事件之前的12月20日，上紅大專總部已被復旦大學和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造反派紅衛兵查封；康平路事件後，上紅總部更是從此停止活動，無形解散。

32 金大陸、金光耀、筆者 2009 年 12 月 26 日對張小坊的訪談。張小坊 1966 年曾經擔任過「上紅總部」政治部主任。

赤衛隊員轉變觀點

康平路事件後不久，1967年1月21日，工總司總部召開會議，討論要不要吸收赤衛隊員進造反隊。王洪文主張歡迎原來的赤衛隊員加入造反隊。王洪文後來回憶這次會議：

從我們工總司來說，如何團結反對過自己的人，這個教訓我是多次說過了。一是工總司成立不久，對待赤衛隊問題，當時總部有兩種觀點，鬥爭很激烈，在國棉三十一廠開會，從晚上6時吵第二天早上6時，拍桌子，打板凳，辯論就是要不要吸收參加過赤衛隊的人加入造反隊。辯論時很多人不同意，有的同志到一月革命以後還不通。³³

反對意見認為，不能讓老保加入造反隊，要對他們進行長期考察。保守派人數遠比造反派多得多，如果現在就吸收他們，弄不好造反隊會被他們「吃掉」。王洪文堅持要吸收保守派。他說革命不分先後，現在我們造反也不應該分先後，要團結大多數，把佔工人大多數的赤衛隊員排斥在造反隊外，會使造反派孤立。他還說，一般赤衛隊員都是受蒙蔽的，只要他們與過去劃清界限，起來造反，就應該吸收。最後，王洪文的意見佔上風。這也是張春橋的告誡，張春橋幾次對王洪文說，不要把廣大赤衛隊員拒之門外。³⁴但是，老保不能擔任造反隊的主要負責人，這是一條潛在的真正規則。

工總司總部立即佈置下面的造反隊，歡迎赤衛隊員回廠生產，對一般的赤衛隊員不要批鬥。於是在許多工廠，造反隊在

33 王洪文 1970 年 6 月 23 日在「工代會」常委會上的講話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3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以及朱永嘉 2004 年 8 月 5 日對筆者的回憶。

工廠門口貼出大標語：歡迎赤衛隊員回廠抓革命促生產；有些工廠的造反隊，還在門口敲鑼打鼓增強歡迎氣氛。不過，此時工總司總部威信不是很高，對下面約束力不強，所以在許多工廠還是發生不少對赤衛隊員批判侮辱的現象。

雖說對普通赤衛隊員不追究，但張春橋要求批判赤衛隊的領導人。1967年3月的一次對工總司總部負責人講話時，張春橋批評工總司：

對赤衛隊的問題，從來沒有開過一次批判大會，只是抓，抓了又沒有很好地審訊，審了又沒有很好地將材料進行批判。³⁵

對赤衛隊最致命打擊，來自幾天後中央四個機構的賀電。毛澤東的強權，終於使對造反派看不慣的老保閉嘴。但是，他們心底的抵制，卻總是會自覺不自覺地冒頭。像王玉璽、馬驥、李劍鈺這樣的老保，可能一時會在強大的政治宣傳下，強迫自己改變看法，「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但他們不會願意真正投在造反派門下。他們的行動老是顯出與造反派的不合作，令造反派覺得「保守勢力依然存在」。如王玉璽，刑滿釋放後，被派去鐵路搬運段當普通工人。造反派十分注意收集他的政治態度，但他始終保持沉默，對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如批林批孔、批鄧、批天安門事件，全部一言不發，³⁶以沉默表達自己對文革的抗議。又如馬驥，被關押釋放後，仍然給張春橋寫信，還具上真名，反映自己對王洪文的看法。1969年國棉十七廠恢復黨委，全廠有三個黨員不投王洪文的票，其中之一就是馬驥。為此，他被關在工廠裏，專人看管，不准回家，不准與外人接觸，受到一個多月的「隔離審查」。馬驥以後對自己的思想這樣分析：

35 《張春橋 1967 年 3 月 10 日接見工總司委員記錄》，原文為手寫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36 上海市工代會 1974 年《對原赤衛隊負責人表現的調查報告》。

王洪文越向上爬，我越想不通，我覺得，論文化程度，論工作能力，論思想水平，論口才，他都與我差不多，當個廠長、廠黨委書記已經很可以了，怎麼還升到了市裏甚至中央去。他的底牌我了解。這麼大的中國交給這樣的人怎麼行，我想不通。我感到王洪文總有一天要掉下來的。³⁷

和馬驥一樣，李劍鈺也因與造反派格格不入而屢遭批判。他回憶：

我心底始終有想法，但只好盡力不去想。有時實在熬不住，私下裏講講，就被當作典型批判。批右傾翻案風、批鄧，還有其他什麼運動，我反正都是反面典型。……

1972年廠裏要批文革前的《工業70條》，我認為70條沒什麼不好，不肯批判，於是我又挨批判。1974年「反擊右傾翻案」時，造反派將大字報貼到我的辦公桌上。³⁸

許多像王玉璽、馬驥、李劍鈺這樣的赤衛隊骨幹，文革中都有同樣的遭遇。許多人後來雖然被「落實政策」，但那也只是不再懲罰性地讓他們「勞動」，而不是恢復他們過去的工作職務。他們許多人過去都是政治工作幹部，現在只能當行政管理人員。在官本位的中國，政工幹部接近權力中心，社會地位比管理幹部高得多。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赤衛隊骨幹或負責人都被逐出權力中心。那些文革前就有一定名聲，康平路事件後又能積極批判自己者，被樹為典型，廣為宣傳。例如楊富珍，雖然不是赤衛隊

37 筆者1989年7月6日對馬驥的訪談，載於上海歷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發表時的題目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38 筆者1992年7月3日對李劍鈺的採訪筆錄，載於上海歷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發表時的題目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負責人，卻是著名保守派人物。她大會小會、逢運動必表態，說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在經過很短一段時間的挨判後，她重新獲得「毛主席的好工人」的政治名份，政治地位很快回升，甚至超過文革前。文革前她是國棉一廠的工人；文革中她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普陀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區委書記、工總司常委，上海市第五屆工代會副主任。又如程德旺，文革前是小集體所有制的三輪車工人，文革中任上海市公用事業管理局的革委會委員，上海市第五屆工代會委員。他倆的體制身份都得到提高。

老保中相當一部分人是文革前的勞模和先進人物。他們因「黨叫幹啥就幹啥」而出名。過去黨需要他們在生產建設中帶頭，文革中黨需要他們在對文革的態度上帶頭。工總司1968年曾對勞模先進人物參加赤衛隊和造反隊等情況進行調查，共調查工業、交通、市政系統所屬八十九個單位的一百十個文革前的五好工人和勞動模範，其中：

原來參加赤衛隊的31人，佔28.2%，其中擔任赤衛隊顧問的9人。……

現已參加造反隊的101人，佔91%，其中當選工代會代表的43人，佔39%，擔任各級造反隊隊委委員的21人，佔19%。……

擔任各級革命委員會委員的50人，佔45.5%，其中廠級的19人，公司、局區級的6人。

評選為出席各級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代表的50人，佔45.5%，其中出席市的34人，佔30.9%。

根據廠內反映，現在表現好的50人，佔45.5%，一般的44人，佔40%，較差的16人，佔14.5%。³⁹

39 工總司常委秘書組 1968 年 4 月 22 日第 31 期《情況匯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又據工總司1973年對上海文革前歷次評出的735名較有影響的勞模先進人物所作調查：

表現好的和比較好的有561名，佔76%，表現差的有29名，佔4%。⁴⁰

報告將「表現差」歸結為：「不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即對文革有抵觸情緒。「表現差」者比例不高，「表現好」和「比較好」，即是對文革有認同。這說明文革已經基本肅清了來自保守派的障礙。

小結

又是一起因要求給予自己「革命群眾組織」名份而引發的大事件。上海1966年的三大事件：安亭、康平和解放日報事件，都與要求自己的革命對象承認自己行動是革命的有關。這似乎也是整個中國在這一時期狀況的寫照。顯示出所有的底層群眾，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對自己行為的不自信，以及對當局決不秋後算賬承諾的不相信。

基層的黨團員、老工人、先進人物，是共產黨歷次政治運動的傳統資源，這些人也十分清楚自己在運動中應該如何表現，扮演怎樣的角色，所以會有《我們老工人要說話》、楊富珍《給毛主席的急電》，都是為了鞏固和強化「黨的依靠對象」的名份。但是，這一次，毛澤東卻將他們擠於一邊，剝奪了他們的這個榮耀，甚至放話說各省市黨委依靠他們是錯誤的。他們以往積累的政治名份資源，就這樣貶值。許多人因為沒有符合文革要求，失去以往的名份不算，甚至還因此被降了職業身份。

40 工總司 1973 年 1 月 26 日《有關勞動模範的一些情況》，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保守派骨幹都是文革前共產黨培養的積極分子。他們之所以成為積極分子，就是因為「聽黨的話，跟黨走」，他們習慣在黨的幹部的指令下開展工作。一旦離開了黨的指示，他們便無所適從。所以保守派的崩潰是必然的，作為文革的反對派，他們反對的是文革中的過激行為，是造反派的個人品質，而不是文革本身。當毛澤東明確支持造反派，當上海市委為轉向而拋棄他們，他們便失去方向；在感到自己被邊緣化的同時，他們不知該怎樣行動。赤衛隊的成立是為了對抗造反派，當中央決策層越來越明顯而堅決地支持造反派時，他們便失去了生存空間；赤衛隊的行動目標是保衛上海市委，當各級黨委都被打倒，他們也失去存在價值。

所謂的「三停」，實質上就是總罷工。在現代民主社會中，這是工人手中的天然權利。即使當時赤衛隊真的曾經策劃過三停，實質也是以總罷工形式，抗議當局的文化大革命決策。但1949年以後的憲法，沒有賦予中國工人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工人所擁有的天然權利。赤衛隊試圖以三停取得自己組織的存在權利，結果適得其反。這個最終沒有真正全面實施的企圖，給赤衛隊帶來的打擊卻是毀滅性的，以後更被工總司作為赤衛隊主要罪狀，大張旗鼓地撻伐。而且，生產的停頓，還為造反派下一步的接管和奪權提供了理由，這是保守派和幹部階層始料不及的。而赤衛隊員們自己，當文革後他們得到平反，卻沒有一個人提出，當初即使實施過三停，也是他們應有的權利；相反，所有當事人都認為「策劃三停」是王洪文們栽贓，「我們當時沒有也不可能策劃三停」。體現了這些當年的保守派們一貫的權利意識。

保守派政治性格中，最可貴的是對現實、秩序和權威的尊重，這是一個社會不可缺少的穩定因素。作為中國最早的開埠城市，上海人對法律的敬畏和對生命的尊重遠遠超出外省許多城市。康平路事件中，保守派們即使以革命的名義也不願意流

血死人；而造反派方面，在取得全面勝利之後，除了對保守派負責人的批判，對普通群眾也沒有再窮追猛打。正是雙方的節制，使上海避免了更大規模甚至可能是曠日持久的流血衝突。這是上海文革從初始就與外地的不同。但是當保守派也向造反派學習，文革的破壞性便向深層發展。而這也不失時機地為決策者找到了清除反對派的理由，1966年底文革的瓶頸，正是無法收拾的越來越糟的生產和經濟形勢。赤衛隊的行動，將自己作為替罪羊送上祭壇。而陳丕顯逼着曹荻秋取消簽字，這個顯示自己轉向支持造反派的行動，卻造成兩派群眾的大規模衝突，為陳丕顯增添了「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又一罪名。

康平路事件開群眾組織大規模衝突先例。雖然，這場衝突比起以後全國風起雲湧的武鬥，包括上海的另一場大武鬥8.4砸聯司，激烈程度要輕得多，基本只是推來搡去，即使個別人使用棍棒，也只是臨時拆除的家具或室內物品，更不說動用武器。但是，這場衝突所起的示範效應，卻是強烈和惡劣的。這是全國首例一派群眾組織調動人員，圍剿和取締另一派群眾組織的大規模行動，卻得到文革決策者的首肯。毛澤東十幾天後，讓中共中央等最高機構向上海造反派發聯名賀電，也間接表明了他對康平路事件的態度。康平路事件首開以革命名義取締對立面組織之風，是日後群眾組織之間以武力互相衝砸之源頭，而且武鬥規模越來越大，從拳頭上升到長矛直至升級到槍炮。全國各地的武鬥，就這樣在決策層的縱容和鼓勵下開端。

從康平路事件開始，造反派便偏離了自己的初衷。工總司當初成立時，造反派引用憲法的結社權為自己爭取權益。但只兩個月不到，他們就對其他組織大打出手，不允許與自己觀點不同的組織存在，而且得到中央決策層的支持。這是文革中群眾運動的真諦。造反派沿襲着當初市委對待他們的思路：凡是反對革命的組織，都沒有存在的權利。

王洪文冒着工總司總部大多數人的反對，堅決主張將所有

赤衛隊員吸收進造反隊。以後的事實證明，這樣做，有效地從情緒上和組織上解構了造反派的對立面，大大降低了造反派對付反對勢力的阻力，降低了造反派進行社會整合的成本。工總司下面的造反隊，在大多數工廠成為多數正是這個時候開始，因為絕大多數保守派也加入了造反隊。而在其他許多省市，造反派組織始終不肯吸收老保，將保守派長期排斥在造反隊外。保守派於是換一面旗幟重新整合自己的隊伍，作為組織力量長期與造反派對立；例如武漢的百萬雄師，例如四川的產業軍。許多城市長期武鬥不斷，幾敗俱傷，最後不得不由軍隊出面收拾殘局。而在上海，自從康平路事件以後，大批保守派反戈一擊，加入造反隊，保守派勢力徹底瓦解，造反派從此一統了上海的文革天下。

第十五章

接管《文匯報》 一月奪權的開端

毛澤東生日祝酒辭

康平路事件的前幾天，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讓江青請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和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飯。這天是毛澤東73歲生日，毛從不過生日，這次以生日名義請文革核心人物聚會，顯示聚會的不同尋常。但毛沒有請林彪、康生和周恩來。席間毛澤東向大家談自己的文革思想。毛澤東對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大會上那四句口號非常欣賞，「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認為體現了區別對待。毛澤東高度評價上海文革運動：

上海的革命學生起來了，革命的工人起來了，革命的機關幹部起來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¹

姚文元馬上問毛：「上海市委強調內外有別，怎麼辦？」毛澤東回答：

內外有別可以打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²

1 轉引自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9 日對上海各高校紅革會負責人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毛澤東向大家祝酒：「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³ 不過張春橋1967年的一次講話中傳達毛的祝酒詞是「祝你們明年過社會主義關」。⁴ 毛用了許多時間講在工廠和農村開展文革的重要性。王力後來回憶毛這些講話：

他說一定要搞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半途而廢。他認為如果不搞工礦農村的文化大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基礎就搞不掉，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就搞不掉。……

鬥、批、改，改什麼？光在文化部門、機關學校改，改些什麼？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麼？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工礦農村還是老一套，那還改什麼呢？那就沒有目標了。……

學生一定要下廠下鄉，把學生革命運動和工人農民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合成一體，才有一個幾億人的大軍，才能解決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⁵

王力說，在此之前，工廠和農村開展文革兩個文件他都參加起草，但他這個起草人之前也沒有認識到文件意義。直到毛生日家宴一席話，他方明白，毛認為在工廠和農村開展文革，是文革中心問題。第二天，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到上海市委寫作班，向徐景賢傳達了毛澤東的這次講話，第十五章已述。

此時安亭事件結束沒多久，工廠和農村亂局還沒有完全顯現。毛整個講話對文革非常自信。不料，幾天後，康平路事件爆發，上海一片混亂。大批工人離開工廠，這個中國最大工業

3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錄》第696頁。但是江青當時的秘書閻長貴2014年2013年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質疑，說毛澤東當時說的是「祝全面內戰」，而「全面階級鬥爭」是被關鋒改了的。

4 張春橋1967年1月17日傳達毛主席四點指示。

5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錄》第696—697頁。

城市的經濟生產處於癱瘓或半癱瘓。尤其是鐵路運輸又一次癱瘓，文革對經濟的巨大破壞力終於開始凸現，而且以後更將一波接着一波。

陳丕顯簽字《急告上海人民書》

1967年元旦凌晨，一個電話將徐景賢從睡夢中叫醒，是張春橋打來的。徐景賢當日工作筆記記錄的時間是凌晨1點半：

中央文革經過討論，認為現在滬寧、滬杭路交通中斷，旅客紛紛打電報給中央，有人在路上生病，情況比較嚴重。這個情況的造成，原因就在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為了從國家利益考慮，希望轉達各個革命左派，及早恢復鐵路交通，市委及工人赤衛隊的一小撮人既破壞革命，又破壞生產，我們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抓革命促生產。……

給陳丕顯一個機會。但是，支持陳丕顯，我們是按照中央的指示辦事。陳丕顯的賬，以後要算的。⁶

張春橋對徐景賢說，現在陳丕顯說話可能不靈了，造反派負責人不肯聽他的，所以我打電話給你。張春橋還說赤衛隊負責人王玉璽利用職權，同意調車讓大批赤衛隊員北上告狀：「已經由總理直接打電話通知上海市委陳丕顯，要他到鐵路分局去對王玉璽採取措施」。⁷ 徐景賢趕緊穿衣起床，趕往離家不遠的東潮招待所。

然後，張春橋又給陳丕顯打電話，告訴陳丕顯中央要他出來工作，首先解決鐵路交通問題，並說一會兒周恩來總理會打電話給他。陳丕顯自文革以來因患癌症休，上海工作一直由市

6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696-697 頁。

7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長曹荻秋主持。現在讓患病休養的陳丕顯出來收拾亂局，看來中央認為曹荻秋在康平路事件後權威盡失，再繼續面對造反派有困難；陳丕顯因養病沒有公開與造反派發生過衝突，所以讓他出來主持工作。聽張說總理要自己出面解決鐵路問題，陳丕顯立即趕往位於北火車站的上海鐵路局公安處。陳丕顯去鐵路公安處，是因為周恩來要求處理昆山事件的同時，還要求把王玉璽抓起來。⁸ 陳丕顯去鐵路公安處，就是處理這事。凌晨2點多，周恩來電話打到鐵路公安處。周恩來向陳丕顯詢問了昆山事件情況後，對陳說中央決定你出來工作，要盡快解決昆山事件，緩和事態，暢通鐵路。⁹ 周恩來並要陳丕顯「與革命左派商量商量」。¹⁰ 陳丕顯接到張春橋和周恩來電話，立即派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副市長李干成和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主任周璧，趕去昆山勸說赤衛隊員回上海。

陳丕顯讓秘書于寶年去通知造反派來開會：

陳丕顯同志對我說：「張春橋打來電話說，周恩來總理指示要我出來工作，解決鐵路癱瘓問題。我當時問他，現在市委和機關都癱瘓了，我出來怎麼能工作呢？張春橋說，你找造反組織，他們有辦法。」說完之後，陳丕顯同志說你現在通知市級各造反組織和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請他們晚上到東湖招待所開會，研究怎麼辦。……

當時，我用電話通知了紅革會，並請他們代通知市一級各大造反組織。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是我電話通知徐景賢的，並約好時間，他在瑞華公寓門口等我一起乘車去東湖招待所。¹¹

8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9 陳丕顯 2005 年著《陳丕顯回憶錄》。

10 徐景賢工作筆記，1967 年 1 月 1 日。

11 陳丕顯的秘書于寶年 1978 年 11 月 23 日《有關〈告全市人民書〉、〈緊急

東湖招待所是市委的一個招待所，在淮海路上。自從康平路成為群眾組織的關注點後，陳丕顯就把東湖招待所作為臨時辦公處。1月1日凌晨3點左右，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絡繹不絕地來到東湖招待所餐廳。工總司王洪文等人，機關聯絡站徐景賢、朱永嘉等人，還有紅革會、炮司、交大反到底等上海紅衛兵組織，以及北京和外地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或代表，都來了。王洪文到得較晚，他穿着一身舊棉軍裝，戴着棉軍帽，滿臉病容。王洪文是12月31日半夜接到開會通知的，當時王明龍正在向他匯報工作。王洪文接到通知，便讓王明龍和他一起去東湖。最後到的是耿金章，他說自己在昆山圍堵赤衛隊，剛從那兒回來。等了兩個多小時，凌晨3點左右，穿着一身軍裝的陳丕顯從鐵路局趕來。陳丕顯兼上海警備區政委，有軍籍，但過去他很少穿軍裝，現在特地穿上軍裝以示受命在身。陳丕顯首先向大家傳達周恩來和張春橋電話指示，說周恩來讓他出來抓工作。他告訴大家上海面臨的嚴重局勢，「最嚴重的，就是上海只剩一個星期的存糧了」，他希望造反派能支持他，一起扭轉這個局面。陳丕顯還說，那個調度所負責人王玉璽，擅自簽字同意發車，破壞交通，我已經按照總理指示，把他扣押了起來。¹²

紅衛兵們不相信中央會讓陳丕顯出來主持上海工作。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的聯絡員楊小兵，把陳丕顯的傳達記錄整理成文，然後跟陳的秘書于寶年一起，用紅電話機與遠在北京的總理辦公室核對，證實準確無誤。大家這才相信周恩來確實對陳丕顯有指示。¹³ 徐景賢傳達了剛才張春橋打給他的電話，炮司紅衛兵一字一句地記下張春橋的中央文革特急來電，馬上出去印發傳單。

通告〉前後的概況》。而徐景賢回憶錄中說是張春橋讓他告訴陳丕顯，要他召集各個造反組織負責人開一個會，討論一下怎麼把上海秩序穩定下來。

12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13 楊小兵 1977 年 1 月 12 日證詞。

王洪文整個會上沒說一句話，據王明龍後來回憶，王洪文從會議開始到結束，都坐在靠牆座位上睡覺，直到天亮六點散會時，他一覺醒來，向王明龍打聽了一下會議情況，說：「這種會有啥開頭，沒有一個名堂！」¹⁴ 散會後，王洪文對徐景賢解釋說自己感冒發燒，精神不好。

會議實際由造反派主持。徐景賢建議出一個聯合聲明：號召全市群眾把矛頭對準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歡迎赤衛隊反戈一擊，回來抓革命、促生產。大家都贊成他的建議，陳丕顯也表示同意。¹⁵ 於是，由交大反到底兵團的紅衛兵楊小兵，以及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舒澤池等人，在華山路922號起草傳單。¹⁶ 陳丕顯的回憶錄說，傳單的主要觀點是他提出的：

由我提議並提出主要觀點。在當時情況下，只好由造反派起草。成文後，儘管文中的有些觀點我不贊成，但抓革命、促生產畢竟是壓倒一切的大事，處於穩定和維持大局的考慮，我還是決定簽字，同意發表，並印刷傳單20萬份，在上海市廣為散發。¹⁷

耿金章介紹昆山情況，並提出，還有許多赤衛隊員滯留昆山，要大家一起去把他們勸回來。陳丕顯提出自己親自去昆山解決問題，耿金章也主張陳丕顯一起去。但是，炮司堅決反對，已經趕往昆山的西軍電、哈軍工、北航的紅衛兵，也在半途打電話回上海說，「堅決制止陳丕顯到昆山去」。陳丕顯只好給張春橋打電話，要求去昆山，張春橋卻同意紅衛兵們的意見。陳丕顯只得留下，造反派說是讓他負責交通和食品供應，

14 王明龍 1977 年 3 月 3 日。

15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16 楊小兵 1977 年 1 月 12 日。

17 陳丕顯 2005 年著《陳丕顯回憶錄》。

但實際上，陳丕顯已經指揮不了這些事，只能在一旁等着楊小兵和舒澤池等人起草傳單。¹⁸ 紅衛兵們不讓陳丕顯去昆山，顯然是不相信周恩來會讓陳丕顯出來工作。張春橋阻止陳丕顯去昆山，顯然是不想給陳丕顯任何表現的機會。

會議一結束，匆匆吃了幾個食堂剛出籠的饅頭，耿金章帶着王洪文、徐景賢等群眾組織負責人，坐上他弄來的小三輪卡車，馬上直奔昆山。¹⁹ 但王洪文始終對中央讓陳丕顯出來工作心存疑竇，而且也對剛在康平路打了勝仗趾高氣揚的耿金章不屑。去昆山途中半道上，他忽然讓同行的廖祖康下車，要廖馬上去廠裏借二百元錢，說準備去北京。到昆山不久，王洪文便離開徐景賢他們。²⁰

徐景賢他們在昆山忙了一天，與當天趕去的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以及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一起，總算說服滯留在昆山的二千多名赤衛隊員，讓所在廠各派出車輛將他們接回滬。然後，徐景賢等又趕往蘇州。由於鐵路停車堵塞，很難調度列車，費盡周折，總算調來一列客車，將滯留在蘇州城外一座大廟裏的上千赤衛隊員，全都拉回上海。

留在上海的起草者們第二天拿出初稿，大家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見，最後定稿為《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急告全市人民書》（後來簡稱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全文如下：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

18 炮司等不讓陳丕顯去昆山之事，引自《把新工人貴族耿金章拉出來示眾》，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滿天紅」，載於工總司宣傳組1967年2月26日編《傳單匯編》。

19 王洪文和耿金章一起坐車去昆山，是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回憶的，而據筆者2011年3月7日對同是會議參加者紅鸛的採訪，她說徐景賢和王洪文不願意讓陳丕顯指揮，中途就退場。

20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幾個月來所開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運動，已經取得了極大的勝利。我們在勝利的戰歌聲中，跨進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元旦社論指出：「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也就是說，一九六七年將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線崩潰徹底瓦解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的偉大勝利的一年。

上海市廣大革命群眾，在批判上海地區黨內一小撮人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也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並進入了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

我們上海市工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衝破一切阻力，洶湧澎湃地向前發展。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聽毛主席的話，堅決執行毛主席親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毛主席教導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我們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的生產就會迷失方向，就會滑到資本主義的方向上去。

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親身經歷的事實越來越多地證明：只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產才會有更大的發展。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的看法，是錯誤的。

可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十分仇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他們千方百計地對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他們的陰謀手段大致表現如下：

運動初期，他們以「抓生產」為名，來壓制革命，反對抓革命。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來革命，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就以生產任務壓工人，給我們扣上「破壞生產」的大帽子。他們是真的要「抓生產」嗎？不是的，他們是為了保他們自己的烏紗帽，企圖阻撓我們革命。我們戳穿了他們的陰謀詭計，勇敢地起來造反了。

於是，他們又拋出了另一種花招，以極「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詞句，煽動大批被他們蒙蔽的工人赤衛隊隊員借口北上「告狀」為名，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以達到他們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動的傢伙在陰謀策劃停水、停電、停交通。對這樣一些反動的傢伙，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嚴加懲辦，決不能讓他們的罪惡陰謀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們！緊急行動起來！堅決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我們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鋒和骨幹，而且也要做促生產的先鋒和骨幹。我們上海是一個全國最大的工業生產城市，它在國家的整個經濟生活中起着極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廠中出現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衛隊員停止生產、離開生產崗位的現象，這就直接違反了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規定，直接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和國民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們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記着毛主席的教導，頂着這股逆流，發揮了高度的革命負責精神，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頂起了全廠的生產，有力地打擊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企圖用破壞生產來打擊革命的大陰

謀。這樣做得對！做得好！我們全體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們學習。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們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氣，有決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產搞得更好，實現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

工人赤衛隊的廣大的要革命的階級兄弟們！「抓革命，促生產」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針，是黨中央一再強調的方針，是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重要方針。擁護不擁護、執行不執行這個方針是一個原則問題，大是大非問題。你們受他們煽動而離開生產崗位，究竟是對誰有利呢？你們這樣做到底是使誰高興、使誰心痛呢？我們希望你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騙了，趕快覺悟過來，回到生產崗位上來，回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一定會熱情地歡迎你們回來，和我們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產，我們一定不會責怪你們，因為我們都是階級親兄弟，因為你們中絕大部分是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毒害的人，是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蒙蔽的革命群眾。

全市一切革命學生和革命的機關幹部們！讓我們和廣大革命工人緊緊結合在一起，為了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廣泛地開展宣傳和鬥爭，更堅決地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打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切新反撲，將工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一個新高潮！

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無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來，革命前程燦爛輝煌。我們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一切勞動者同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並肩戰鬥，乘勝前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最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革會)

上海市反到底聯絡總部

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

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

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

首都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滬聯絡站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

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文革臨委會駐滬聯絡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陳丕顯簽字同意付印：

文匯報社：即印二十萬份 不得延誤 陳丕顯

留下來的還有工總司的夏林根，他和潘國平一個工廠。他建議將這份傳單刊登在《工人造反報》上。於是楊小兵和他去了上海晚報社，那裏現在已經成為《工人造反報》編輯部。楊小兵找到正在那裏的王腓利。王腓利說《工人造反報》的第二期要後天才能出版，無法及時刊登，但他還是幫忙讓新民晚報社排出了傳單小樣，因為陳丕顯的簽字是讓文匯報社印傳單。小樣出來後，王腓利忽然想到，乾脆將小樣送去《解放日報》刊登。楊小兵說找不到王洪文和潘國平，王腓利是否能代表工

總司同意傳單的內容？王腓利表示同意，對傳單稍作修改，署上工總司的名，然後讓王成龍陪楊小兵和夏林根去解放日報社。但解放日報社不肯刊登傳單。王腓利又建議送文匯報社試試。²¹ 文匯報社剛發生接管事件(下面小結將會詳述)，加上有陳丕顯簽字，接管後負責報紙編輯的邵傳烈和周國榮同意刊登。陳丕顯也讓秘書于寶年馬上打電話給文匯報社，請他們立即排印。此時已是1967年的1月4日。

在傳單上簽名的共十一個群眾組織，工總司名列第一。機關聯絡站沒在傳單上簽名。因為會議結束後，徐景賢他們都去昆山了。徐景賢後來在讓人撰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中，對傳單上沒有機關聯絡站的簽名解釋：「3號晚上，在最後通過並簽字時，機關聯絡站、二兵團、紅三司、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四個組織由於未通知而漏掉了。」而實際情況應該是大家都沒把這張傳單當回事。誰也沒有料到這張傳單不久將引起毛澤東的重視。

王洪文在昆山離開耿金章和徐景賢等人後，第二天，1月2日，帶着陳阿大、廖祖康飛往北京。他想通過關係找張春橋，但沒找到。後來張春橋知道了，便通過聶元梓通知王洪文，約定1月3日晚上8點半，在解放軍報社二樓一個會議室，和姚文元一起接見他們。²² 在場的還有炮司和北京的紅衛兵，以及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師李衛民，還有中央文革秘書處的王廣宇。張春橋詢問康平路事件情況，王洪文說赤衛隊搞三停。張春橋說：「他們真要搞三停，停上半年，他們就完蛋了。安亭事件，我和你們的被動，就是由於交通問題。」

21 以上是王腓利對筆者的回憶，他代表工總司同意在傳單上署名，但他不記得自己是否簽字了。楊小兵在文革後對金大陸、金光耀和筆者的訪談中說，是他代工總司簽字的；而據范佐棟文革後對筆者的回憶，是他代表工總司簽字的。筆者估計，事後有人再去工總司找到范佐棟，讓他簽上名。

22 王洪文在1968年2月16日工總司第三次整風會上的報告，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收藏。

王洪文一直對中央讓陳丕顯出來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心存疑竇，向張春橋打聽：

目前市委普遍唱高調，王少庸找到我們，什麼條件都答應，行動跟不上；馬天水回去就找我……本來陳丕顯不出來，現在出來了，比任何人都急。聽說總理和你都打過電話給他，他找我們想辦法，他們都表示堅決站在革命左派一邊。他們是要溜，他們現在要什麼給什麼，我們不要。

張春橋回答：

這件事我們商量過。曹荻秋雖然說話也沒人聽了，沒人出來不行。你們從上海來的人都說陳丕顯是幕後操縱，索性讓他出來表演一番。

王洪文說：「陳丕顯一出來就高姿態。」張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姚文元問赤衛隊是否與上海市總工會有關係，王洪文說有。張春橋建議工總司搬到總工會辦公大樓去。²³張春橋此時剛被毛澤東找去談過話，毛澤東要他和姚文元回上海指導上海的文革運動。但張春橋沒有將此告訴王洪文、陳阿大他們，只說「我們很快就會又見面的。」

上海造反派籌備打倒上海市委

1月2日，上海造反派組織在武康路2號召開聯席會議，主要討論「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備事宜。這個大會是根據張春橋1966年12月28日指示而決定召開的，就是那個讓妻子文靜向徐景賢轉告的電話指示：要造反派注意勝利果實不能讓赤衛隊摘

23 以上對話均為張春橋1967年1月3日接見工總司王洪文等人時的談話記錄。

去。張春橋的話對造反派是重要提醒，即「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不能讓赤衛隊提出，應該由造反派提出。徐景賢接到文靜轉達的張春橋話後，馬上向機關聯絡站傳達，並且和幾個核心人物商量，如何落實張春橋的指示。徐景賢認為：「春橋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們造反，讓赤衛隊摘了果子，豈不前功盡棄？」徐景賢提出：「我們召開大會的口號看來要升級了，不能再用火燒、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過了元旦就開大會，口徑要統一，按春橋同志的電話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²⁴ 上海造反派們就這樣在張春橋啟發下，決定以召開大會形式宣佈打倒上海市委。

1967年1月2日，康平路事件剛結束，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給機關聯絡站。徐景賢還在昆山處理昆山事件沒回來，機關聯絡站朱維鈺接的電話。姚文元再一次告誡造反派們，一定要抓住批判市委資反路線的大旗，不要就事論事地批判赤衛隊，要把赤衛隊問題掛到市委推行的資反路線上。據朱永嘉後來回憶，他們本來雖已決定召開大會，但對這個大會還是沒怎麼太重視，因為那時這種批判大會很多，喊「打倒」也就是顯示造反性和革命性強而已。在張春橋和姚文元一再提醒和引導下，上海造反派們終於意識到這個大會的重要性，決心將這個大會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

當天半夜，機關聯絡站另一個負責人郭仁傑，馬上在武康路2號的造反派組織聯席會議上，傳達姚文元電話，討論如何從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批判市委資反路線。參加會議的有：工總司戴立清，機關聯絡站郭仁傑，紅革會馬立新，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姜濤，北京大學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簽名者之一李醒塵，以及中央文革小組駐滬聯絡員甄文君等，共四十多人。戴立清說他們工人筆頭不行，不會寫發言稿，郭仁傑於是讓王知

24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常去幫他們起草；又打電話給正在昆山的徐景賢和王承龍，要他們馬上回上海，商議大會日期和議程。

1月3日清晨徐景賢從昆山趕回上海，第一件事便是研究《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接着，往機關聯絡站檢查大會準備工作。徐景賢發現，那些造反派組織只知道到處高喊打倒口號，卻連一篇發言稿都拿不出。徐景賢因此對機關造反派強調：「只能由我們先做幕後工作；到開會的時候，大會的主持人、發言人，宣讀通令和給毛主席致敬電的人員，要由各造反派的負責人來擔任，因為只有他們能夠拉出工人和學生的隊伍來。這次大會要正式宣佈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有一個大聯合的聲勢，如果光靠我們這些機關造反派，那是孤掌難鳴的。」²⁵於是又開了幾次各路造反組織的協商會，最後定在1月6日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

會上還決定，由各群眾組織分頭負責各項大會籌備事宜：工總司和紅革會等負責保衛組和後勤組，同濟東方紅和哈軍工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等負責宣傳組，機關聯絡站負責秘書組。但是紅革會不願意負責後勤工作，紅革會負責人說：「這些工作要我們幹，真是豈有此理！」紅革會提出由他們負責宣傳組，他們認為宣傳組是比較重要的工作。1月3日下午，紅革會一批人來到宣傳組，說他們要負責大會的宣傳工作，否則，「你們幹你們的，我們不參加大會，我們自己搞個大會。」²⁶他們派出自己的一個負責人，召開宣傳組工作人員會議，重新討論大會宣傳事宜；而且將大會海報也重新修改。本來，上午同濟東方紅等已經起草了大會海報，紅革會去掉原來海報上「籌備單位」名單中的炮司、交大反到底和同濟東方紅等組織

25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26 陳向黨著《這絕不是偶然的》，載於 1967 年 2 月 24 日《火線報》《挺進報》聯合版，上海機械學院革命造反委員會編。

的名字，將海報重新送去付印。²⁷ 紅革會從造反派組織最初的合作始，就和其他一些組織不甚融洽。

大會全部秘書工作主要由機關聯絡站負責：朱永嘉和另一人負責撰寫大會全部發言稿，郭仁傑等撰寫大會三個通令，程綺華負責大會組織工作。大會九個發言中最重要的兩個：一個是王洪文關於安亭事件後曹荻秋和市委部、局幹部圍攻張春橋情況的發言，另一個是批判上海市委的發言。王洪文的這個發言，材料來自市委辦公廳檔案中的市委常委會議記錄。毛澤東支持寫作班造反，說內外有別可以打破，保密制度不再成為束縛機關幹部造反的障礙。機關聯絡站負責人郭仁傑建議，利用寫作班在市委核心工作的優勢，將市委檔案室裏的檔案調出來，作為批判市委執行反動路線的炮彈。徐景賢於是寫了條子交市委書記馬天水批准後，讓幾個黨員進市委檔案室，摘出有關內容。

後來在1月6日大會上，最具轟動效應的，果然就是王洪文的《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這篇發言稿是機關聯絡站吳瑞武起草的，整篇發言裏沒有一句話是王洪文自己的，朱永嘉說：「無非是借他的嘴巴，借他的工人身份而已」。²⁸

毛澤東派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

要陳丕顯出來工作，並由周恩來直接通知陳丕顯本人，這顯然是中央的意思。是否毛澤東的意思，待查。但至少是周恩來的安排。而在毛澤東方面，他的安排是派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1966年12月26日毛過生日時，還沒有提出讓張、姚去上海。這個決定是1月2日臨時作出的。為什麼1月2日突然決定

27 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反修戰鬥隊」《炮打紅革會頭頭一紅革會的修正主義思潮必須批判》，載於紅衛兵小報《東方紅》1967年1月30日第9號，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上海東方紅兵團」編輯。原件為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28 朱永嘉、金光耀 2011 年《朱永嘉談〈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讓他們回上海，估計也許與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有關。派他們回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身份回上海看看，掌握上海動態。毛澤東要張春橋直接與王力聯繫。張春橋有什麼事報告中央，毛澤東有什麼話要傳達給張春橋，都經過王力。為此，特地設立了直線電話，而且還在電話上安裝了抗干擾器，別人無法竊聽，連總機都聽不到。²⁹ 此時，毛還沒有要求他們去領導上海的運動：「給張春橋的任務很簡單，就是向中央匯報情況，沒說叫他們去掌握上海局面。」「當時不是去改變上海領導班子，是作為文革小組的調查員去看看，把上海情況及時地、準確地匯報毛主席。」³⁰ 張春橋、姚文元作為毛澤東耳目去上海，顯示毛澤東此時尚未打算打倒上海市委。他沒有明確讓張、姚去代替上海市委領導上海文革，他只是希望通過張、姚，了解更直接更生動的上海文革狀況。他們倆原來就在上海工作，對上海各方面的情況比較熟悉。

張春橋臨行前的1月3日下午，特地要姚文元打電話給徐景賢，問他武康路2號寫作班原來的辦公處現在幹什麼用？徐答說現在成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內部辦公地點。姚問，張春橋和他想要用這個地方行嗎？徐景賢連忙答行。姚文元沒有說他們明天就將回上海。但徐景賢很敏感，他和郭仁傑等人分析，得出結論：張春橋和姚文元肯定要到上海來了。果然，1月4日上午11時，姚文元又來電話，告訴徐景賢說，他和張春橋已經到上海了！姚文元說，他們第一步想找一些機關的左派了解情況，人數不要太多。他還要徐景賢對他們來到上海之事，暫時保密兩三天。³¹

當天下午2點半，張春橋和姚文元稍事休息後，就趕到武康路2號。他們倆雖然在軍隊沒有職務，現在也都穿起了軍裝。

29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764 頁。

30 同上，第 764、781 頁。

31 徐景賢 1967 年 1 月 4 日工作筆記。

張春橋、姚文元先與徐景賢單獨談話，了解機關聯絡站人員情況。雖說他們對機關聯絡站中原寫作班人員大都較熟，但對市委辦公廳及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不都熟悉，特別是對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現不了解。自從安亭事件文化廣場談判時見到張春橋，徐景賢後來再沒和張春橋接觸。即使那次在文化廣場，因為主要是和工總司的談判，所以徐景賢和張春橋也沒有說上幾句話。這次談話，可以說是徐景賢文革中與張春橋接觸的真正開始。張春橋讓徐景賢把機關聯絡站成員郭仁傑、朱永嘉、王知常、陳冀德、王承龍、朱玉佩³²等十三人找來開個小會。這些人中除了王承龍和朱玉佩，都是原來寫作班的人員。張春橋熱情地和他們一一握手。張春橋告訴他們，毛主席對他們的造反評價很高：

張說：毛在12月25日夜說，工人起來了，農民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形勢很好。對上海的口號(主席)連背了兩遍，區別對待。內外有別——春橋說我連問了主席兩遍，主席說不是已經打破了嗎？到2日常委會上又說，到3日開會時主席說運動向全國發展，次序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內地再讓他亂一亂。上海等要產生新的局面。³³

張春橋提出，他和姚文元就把機關聯絡站作為他們的工作機構。其實，說是機關聯絡站，不如說是寫作班更準確。張春橋回上海後，第一個召見的就是機關聯絡站中的原寫作班成員，顯示他對寫作班不是一般的信任，而且這種信任將在十年文革中始終貫穿。在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的最初階段，寫作班是他們的秘書班子和對外的工作班子，通知開會、起草文件等

32 朱玉佩，女，文革前是《支部生活》編輯部編輯。文革初期曾任市革委會辦公室召集人，1968年被王承龍解職「勞動」。

33 徐景賢 1967年1月4日工作筆記。

事務性工作，都由寫作班打理，甚至開會地點都在寫作班。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市革會成立。寫作班的武康路2號，成為張春橋經常接見和召開群眾組織會議的地點，他和姚文元回上海後住在興國招待所，有事就去寫作班。武康路2號就這樣成為上海一月奪權時期各造反組織的碰頭處，成為上海一月奪權的中心。³⁴

徐景賢和郭仁傑匯報他們正在籌備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之前徐景賢在接到姚文元說他和張春橋已經回到上海電話後，馬上就召集朱永嘉等開了個小會，了解各人負責的1月6日大會發言稿的內容和進度，所以他現在匯報得很清楚。當徐景賢匯報到王洪文發言內容是揭發安亭事件後上海市委圍攻張春橋的情況時，張春橋馬上表示出很大興趣，問：「這個情況你們怎麼知道的？」徐景賢說是從市委常委會原始記錄中摘出來的。³⁵這份發言稿張春橋後來親自作了修改。最後，張春橋表示：

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來，是中央文革派我們來的。我們兩個來了當然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聯絡站就作為我們的工作機構。我們到上海來的任務，是做調查研究，然後向中央報告；所以我們不想介入上海的具體活動，同時，我們到上海來的消息，暫時也不想公開。你們的工作還是按照原來的進行，不必等我們³⁶

上海雖然有中央文革特派記者，但遇到情況，由他們講話或處理不方便；毛派張、姚去上海，給他們身份是「調查員」，既可向中央反映情況，必要時又可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身份處理問題或講話表態，可謂進退靈活。面對亂世，毛顯然

34 武康路2號的資料引自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談〈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35 以上資料均引自徐景賢2003年出版《十年一夢》。

36 徐景賢2003年出版《十年一夢》。

還沒有想出下一步怎麼走。作為調查員的張、姚非常謹慎，毛只讓他們回上海及時掌握情況向中央匯報，沒有讓他們回上海指導運動，他們也就再三對造反派宣佈：

我們的任務是幫助左派，搞搞調查，開開會，聽聽各方面的意見。……

我們來上海，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調查員。四日來以後，開過一些座談會，還沒有在大會上和群眾見面，不是怕群眾，而是為了爭取時間，工作從容一些。調查員顧名思義是作調查的，不是來當保姆的，不是來包辦代替的。主要靠自己，你們有什麼工作最好不要和我們商量。我們沒有來以前，你們不是幹得很好嘛。上海的情況，我們可以向中央匯報，中央有什麼指示可以傳達，我們不會對大家保密的。³⁷

張春橋的謹慎，讓他後來差點放過幾個重大契機。

1月4日傍晚。張春橋與陳丕顯見面。這次會面是陳丕顯提出的。³⁸張春橋文革開始後去了北京，第一次回上海是為了處理安亭事件，這是第二次回上海。兩次只相隔一個多月。但是兩個人地位關係幾乎逆轉。第二天，張春橋對徐景賢說起與陳丕顯見面之事。給徐景賢的印象是：

他把陳丕顯找到興國路招待所去談過話，因為中央的意見是希望陳丕顯站出來工作，但是，張春橋說在談話時陳丕顯表示站出來有困難。張春橋的最後結論是：看來這個人也確實難以工作了。³⁹

37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11 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

38 陳丕顯的秘書于寶年 1978 年 11 月 23 日《有關〈告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前後的概況》。

39 徐景賢 1978 年 11 月。

中央讓陳丕顯出來工作是1月1日的事，張春橋在1月4日就對徐景賢說陳丕顯看來不行。張春橋顯然就沒有打算讓陳丕顯工作。而在陳丕顯方面，周恩來1月1日剛打電話給陳丕顯，要他出來工作，三天後陳丕顯就對張春橋說出來工作有困難？是陳丕顯真的不想出來工作，還是只是向張春橋表示工作有困難，實際是希望張春橋能支持他開展工作，而張春橋卻以此作為陳丕顯不肯出來工作的口實？從後來張春橋一定要打倒陳丕顯的執着來看，應該是後者。

《文匯報》被接管

1月4日，送到訂戶手中的《文匯報》讓人覺得陌生。這張創辦於1938年1月25日的報紙，原來以老書法家譚澤闓題字作報頭，沿用近三十年。這一天報頭突然改用黑體字。在頭版頭條位置，套紅重新發表了毛澤東1957年7月1日為《人民日報》撰寫的那篇著名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頭版下半版，刊發了文匯報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的《告讀者書》，宣佈接管《文匯報》：

我們懷着無比激動的心情宣告：經過一段時期的艱苦鬥爭，從今天起，我們「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接管了《文匯報》。

我們決心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刀兩斷。我們堅決聽毛主席的話，緊跟毛澤東思想，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邊。⁴⁰

1月5日，第二份期接管的《文匯報》出版，第二版上，刊

40 《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告讀者書》，載於1967年1月4日《文匯報》。

登了那份陳丕顯簽字印發的傳單《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張春橋、姚文元在武康路2號接見工總司負責人的會議結束以後，徐景賢收到了這份《文匯報》，他馬上將報紙送給正在東廳休息的張、姚。張春橋翻看着報紙，頗感意外地說，這件事我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啊，連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也不打個招呼！徐景賢連忙回答：他們接管報社沒有和我們聯繫。姚文元說：這件事我們還需要向中央請示匯報。說罷，他們匆匆返回興國路住地。

文匯報社的造反派早在6月9日，就貼出第一張批判總編輯陳虞孫的大字報。以後成立了各種戰鬥隊，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最出名，主要成員有體育記者朱錫琪⁴¹、評論組的邵傳烈⁴²、以及理論部的周國榮⁴³等人。朱錫琪進文匯報社工作前當過商店職工、夜校老師。1960年柯慶施提出要對上海的報刊「摻沙子」，增加工農成份人員，市委宣傳部即舉辦報刊編輯訓練班。朱錫琪被工作單位送去，學習了三個月後被分配進文匯報社，先當夜班編輯，後來當記者。文革前朱錫琪是文藝部的體育記者，批判《海瑞罷官》時期，他被調到報社的海瑞罷官討論辦公室，收集對姚文元文章的反應。文革開始後，他們不同意報社文革領導小組的運動方向，反對運動初期對許多職工的批判。他們還認為，《文匯報》許多事情被批判，實際上

41 朱錫琪，男 1933 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文匯報》社文藝部體育記者，中共黨員。上海人民公社核心成員、市革會政宣組長。1968 年因參與 4.12 炮打張春橋被審查關押 3 年。文革結束後 1977 年獲平反，1984 年又被重作結論，定為「三種人」，開除黨籍。

42 邵傳烈，男，文革前是《文匯報》社評論組記者，中共黨員。文革中任《文匯報》社革委會副主任；1968 年因參與 4.12 炮打張春橋被審查關押 3 年。文革結束後 1977 年獲平反，1984 年又被重作結論，定為「三種人」，開除黨籍。

43 周國榮，男，文革前是《文匯報》社文教組記者，共青團員。文革中任《文匯報》社革委會副主任；1968 年因參與 4.12 炮打張春橋被審查關押 3 年。文革結束後 1977 年獲平反，1984 年又被重作結論，定為「三種人」。

都來自市委的指示，不應該只批判報社的幹部，市委應該承擔責任。他們成立了「星星之火」戰鬥隊，後來參加的人多了，又起名為「星火燎原」。不過，到解放日報事件時，由於星火燎原的幾個負責人支持紅革會，許多人退出星火燎原，原來一百多人，最少時只剩八人。⁴⁴

1966年8月文匯報社總編陳虞孫被打倒，市委將原《解放日報》副總編王景調去替職。但王景根本無法開展工作，因為當時整個報社，24個中層幹部17個被「靠邊」，無人領導業務；記者也不知如何寫稿。於是每天的版面，只能刊用新華社統發稿。從1966年11月左右至12月底，《文匯報》便基本沒有刊登過自己採編的文章。《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內容越來越相同，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特點。後來有人建議乾脆《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聯合版。報社許多職工覺得，出聯合版實際就是兩報合併。整個報社人心惶惶：《文匯報》將成為多餘，那麼多職工將可能面臨工作調動，在這亂世之際，不知會被胡亂塞到哪裏去。另一方面，解放日報事件後，文匯報社也被紅衛兵搞得不得安寧：12月下旬，一幫什麼司令部的紅衛兵，載來兩輛卡車人佔領了文匯報社，還揚言要封《文匯報》。「星火燎原」的造反派商量，外面的造反派天天來鬧，上面的領導又要合併報紙，與其被封掉或合併，不如我們自己接管。⁴⁵ 怎麼接管，大家提出了三點看法：

第一是「封」……我們一直認為停刊鬧革命也很好。但是現在又出現了新情況，現在是報社那些領導很需要停刊，因為他們欠了一屁股債，還不掉，最好停刊，可以賴賬，拍拍屁股溜走。市委也要《文匯報》停刊，停掉了，他們就

44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代表1967年1月16日《文匯報是怎樣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新生的》。

45 筆者2012年12月6日對朱錫琪的訪談。

沒有責任了，可以逃跑。另外，我們還想到，報紙是重要的宣傳陣地，造反派的同志還在創辦新的報紙，我們有了現成的報紙為什麼要把它停掉，而不能把它改造過來呢？

第二是「改」。那就是充實擴大原有的編輯小組(即編委會)，造反派的同志們參加進去。早在初期我們曾經提出過這樣的要求，他們堅決不同意，而在十二月底他們卻主動提出這個問題，要我們派人參加編輯工作小組。事實是，現在他們搞不下去了，是要把我們作替死鬼，把我們造反派推上第一線，而實際還是由他們操縱，把我們作為他們的工具。我們堅決不幹。我們認為改良主義是不行的，也許在一、兩天內會變一下顏色，但終究是不會讓我們這樣幹下去的，這樣，我們一進去，就會天天吵架。

第三是「奪」。徹底把報紙的領導權奪到造反派、革命左派的手裏來，把他們那批人全部踢開。我們認為這個方案比較好，但究竟如何幹法，心中無數。不過既然革命群眾提出了要接管的要求，這是群眾對造反派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也是最大的鞭策，我們應該擔起這個責任來，在關鍵時刻不能手軟。我們就和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的戰友進行研究，他們都支持我們走第三條路：要求把《文匯報》出下去，不准改良，只能革命，要把領導權徹底奪過來。⁴⁶

1966年12月23日，文匯報社造反派正式商量接管之事；31日，又進行了一系列緊張具體的籌備工作：撰寫宣佈接管的《告讀者書》，準備四篇社論，研究接管後如何辦報。決定於1967年1月1日施行接管。但後來考慮，1月1日中央肯定會有重要的元旦社論發表，而1月2日又逢報社放假休刊慣例，於是決定在1月3日「暴動」。⁴⁷

46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代表1967年1月16日《文匯報是怎樣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新生的》。

47 同上。

畢竟接管媒體沒有先例。他們先去請示陳丕顯，陳丕顯也不知該怎麼處理，讓他們去北京請示。1967年1月1日，朱錫琪和周國榮兩人去北京，飛機票是陳丕顯的秘書于寶年幫他們買的。到了北京，他們先去找姚文元，沒找到，幾經周折，找到《人民日報》總編辦公室主任魯瑛。當晚，見到唐平鑄，唐平鑄說：「你們又先走了一步」，他答應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⁴⁸兩人在北京只待了25個小時，第二天匆匆趕回上海。即使他們不回上海，上海這邊也一定要行動了。因為按慣例，每年1月2日休刊不出報，但1967年1月2日這天，《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版了第一份聯合版。這讓造反派感到緊迫，兩報合併在即，再不接管不行了。1月3日下午，邵傳烈等召集報社各部、組負責人和各車間骨幹開大會。接着又在當晚7點以後，召開全報社職工大會，宣佈由「星火燎原」和報社其他的造反組織，聯合接管文匯報社。據文匯報社的造反派後來向來訪者介紹：

當我們在大會上宣佈這個消息時，大家高興得不得了。由此可見，我們是在報社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和堅決支持下進行接管的。⁴⁹

說是全報社職工大會，但沒有讓總編王景和總支書記周天國參加。會議時間不長，9點多結束。決定由邵傳烈主要負責《文匯報》的業務工作。晚上11點左右，北京的電話終於來了，是北京日報社辦公室的陳聽濤打來的，說傳達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主要三條：一，報紙接管，沒有這種先例，社會上只有封報紙，沒有像你們這樣的做法；二，不要在報紙上點劉

48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唐平鑄的表態，是筆者2012年12月6日對朱錫琪訪談時，朱錫琪說的。

49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代表1967年1月16日《文匯報是怎樣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新生的》。

少奇和陳丕顯的名字；三，辦報要慎重。接電話的邵傳烈問是哪位中央領導的意見，陳回答說：你們是聰明人，我就不回答這個問題了。朱錫琪與邵傳烈等立即討論這個中央來電。他們覺得，電話似乎不支持他們的接管行動；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沒有強烈反對，否則，不會說不要點名，要慎重之類的話。最後決定還是繼續行動，不過，這個電話不向大家傳達。事後知道，這是周恩來的意思。⁵⁰

由造反派代行原來報社領導負責的文革運動和報紙新聞業務，這是個真正具有實質意義的奪權行動。但是，《文匯報》的造反派們沒有稱自己的行動是「奪權」，而說是「接管」。為什麼他們當時只稱接管，而不稱奪權？朱錫琪後來回憶說，他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奪權。他們當時的理解，奪權是奪黨內走資派的權；而他們是因為原來的領導報紙辦不下去了，他們把原來由報社文革領導小組負責的辦報工作，接過來管理，所以他們當時認為這是「接管」。⁵¹

1月4日，被接管的《文匯報》與讀者見面。當天晚上，交大反到底的楊小兵，拿着陳丕顯簽過字的《急告全市人民書》到文匯報社，與剛上任的接管負責人邵傳烈商量，能否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發表。報社造反派負責人在文革中回憶說：

我們也覺得這張大字報很重要，但並不十分理解，更不知道是個十分重要的文件。……

我們只知道這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發言，是真正造反派的聲音，我們的報紙必須讓他們發言。……

這個文件我們是4日晚上拿到的，我們立刻決定刊用！

50 筆者2012年12月6日對朱錫琪的訪談。三條也是朱錫琪回憶的，不過不是當時電話的原話。朱錫琪還回憶說，後來在一次慶祝大會上，他見到陳聽濤，問陳，陳說是周總理的話。

51 筆者2012年12月6日對朱錫琪的訪談。

但當時的《解放日報》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控制着的，當權的是馬達、王樹人。我們把《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送給他們，直到凌晨4點，他們還不能決定到底用不用。他們對我們說什麼這中間牽涉到上海市委囉，還胡說什麼要引起群眾鬥群眾囉。我們說，登不登你們自己考慮吧。⁵²

儘管《文匯報》不是黨報，但只是相對而言，《文匯報》在事實上仍是官方報紙。在公開發行的官辦報紙上發表群眾組織的傳單，尚無先例。謹慎起見，周國榮打電話給機關聯絡站，想通過他們將傳單送給剛剛回到上海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審閱。機關聯絡站的朱維錚去問姚文元，姚文元很冷淡地說：剛回來，許多事不了解，看了也沒法發表意見，登不登由他們自己定吧。⁵³《文匯報》接管者沒有想到自己行動的意義。姚文元也沒想到這份傳單以後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就這樣隨意地放過了。

接管後的報紙送誰審查？問過張春橋，張春橋表示不看。張春橋很謹慎：看了，他就要承擔責任。他不敢對《文匯報》造反派的接管事件有任何評價。畢竟，接管執政黨一向控制最嚴密的新聞媒體是件大事，他不能輕易表態。不過，張春橋對《文匯報》重登《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卻有批評。他1月4日當天下午2點半，在武康路2號接見寫作班徐景賢等人時說：

《文匯報》的左派不能丟掉《文匯報》的旗幟。……

不要輕易把上海的旗幟丟掉。重發《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就是否定了這一點，那就是不懂得抓旗幟。⁵⁴

52 筆者 2012 年 12 月 6 日對朱錫琪的訪談。

53 原機關聯絡站成員朱維錚 1976 年 12 月 23 日回憶。

54 徐景賢工作筆記 1967 年 1 月 4 日。

張春橋沒有料到幾天後，毛澤東會高度評價造反派接管《文匯報》的行動，更沒有料到《文匯報》接管事件，將對上海乃至全國文革運動起着巨大的方向性影響。據當事者文革後回憶，張春橋以後對《文匯報》造反這樣評價：

對於重新刊登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他說主席這篇文章，是五七年反右時寫的，那時革命的對象和任務，同現在都不一樣。他針對報社造反派發表的《告讀者書》說：「《文匯報》早就造反了，批判海瑞罷官就是造劉、鄧的反，現在說文化大革命以來還是資產階級方向，就是自己否定自己」。他又說，《文匯報》假如要表示替造反派說話，可以寫一篇很有份量的社論，題目就叫《永遠高舉批判〈海瑞罷官〉的旗幟》。⁵⁵

《文匯報》的接管，拉開了不久全國奪權的序幕。其實，如果真正追究全國接管開端，《文匯報》不是最早的，上海最早被造反派接管的單位是上海科技大學。1966年8月27日，科大的造反派學生為追查校黨委搜集的「黑材料」接管學校，並要求市委派書記前往處理。市委得知，馬上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書記們都認為，這是政變，是匈牙利事變，不能支持。⁵⁶還有潘國平工作的上海玻璃機械廠，也是較早的接管單位。1966年底康平路事件中，大批赤衛隊員離廠北上告狀，僅鋼窗車間28個小組，四百多名職工就走了一百多，其中包括18個生產組長，及所有調度、材料、技術、工具、資料、計劃人員。12月27日，鋼窗車間造反派貼出第一張接管大字報，要求成立「工人生產管理委員會」，還與其他車間串聯，成立「接管籌

55 朱維鈺 1976 年 12 月 23 日。

56 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備小組」，處理生產問題；12月30日，全廠成立「革命生產委員會」。⁵⁷這是上海第一個代行生產指揮職責的接管機構。

《解放日報》和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被接管

《文匯報》被接管，馬上波及《解放日報》。1月5日，接管後的第一期《文匯報》供不應求，加印五萬份，但這天的《解放日報》卻幾乎無法出版，到半夜3點多鐘還一個字都沒有發排。

1966年12月解放日報事件後，解放日報社內造反派成立了「解放日報造反聯合司令部」。1月3日《文匯報》被造反派接管消息傳來，解放日報社造反派也打算立即接管。但有人提出，《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的黨報，不同於《文匯報》，接管最好請示中央；或者不接管，而由造反派監督出版。最後大家決定，立即派人去北京請示中央文革小組。他們此時還不知道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回到上海了。1月5日下午，派去的人飛到北京，沒聯繫上中央文革小組，只得回滬。與此同時，1月5日下午，上海這邊，「解放日報造反聯合司令部」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是否立即接管。上海紅革會、同濟東方紅，北京清華井岡山、地質東方紅等紅衛兵組織都派人參加會議。文匯報社造反派負責人朱錫琪也到會。紅革會馬立新主張立即接管；朱錫琪介紹《文匯報》接管經驗，主張「敢字當頭，先斬後奏」。最後，解放日報社造反派決定，不待赴京請示者信息，立即接管。於是，起草了《接管通告》，設計了接管後第一張報紙版面。當晚，造反派向報社全體職工宣佈《接管通告》。

《文匯報》改旗易幟，《告讀者書》中還只稱「接管」；而造反派對《解放日報》接管，《告讀者書》中則宣佈是「奪權」：「這個陣地，我們是佔定了！這個權，我們是奪定了！」這個「奪權」口號不久被毛澤東肯定。

57 《文匯報》1967年1月23日。

但造反派對《解放日報》的接管，遭到了報社職工尤其是印刷工人的抵制。解放日報社印刷工人中，有許多是老保，排字房工人不肯排字，印刷車間工人不肯印報。一些工人提出要詢問中央文革是否同意造反派接管黨報，並希望張春橋回答。徐景賢向已經回上海的張春橋轉達這些要求，張春橋拒絕接見，其實是不願或不敢輕易表態。報社保守派工人和造反派僵持了一天一夜，保守派工人還砸壞了造反派已經排好的版子，並追回了送去文匯報社準備開印的紙型。直到1月6日凌晨，《解放日報》還一個字都沒有發排。待造反派全部控制報社，已經是1月6日下午。

解放日報社最先造反的是攝影組，但接管後，編輯部的編輯成為主要掌權者。畢竟每天要出報紙，負責人一定要懂業務，沒有一定文字水平是不行的。

1月7日，又是一個重要媒體機構被接管。這天凌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造反派「廣播電視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廣電」），宣佈接管上海電台與電視台。造反派們認為既然報社可以接管，同是傳媒體的廣播電台等也可以接管。但是，這次接管很不順利。上海廣播電台的另一個造反派組織「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戰士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廣革會」），以及交通大學的紅三司，不承認這個接管，廣電於是宣佈「撤銷接管」。幾天後，中共中央等四個機構給上海發賀電，反對接管的廣革會覺得接管有了依據，於是轉而積極籌備接管，而且要搶在廣電之前。1月17日，廣革會召開「砸爛電台黑黨委」大會，宣佈開除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黨委書記王永賢和副台長楊濤等負責人的黨籍，旋即派人佔領了電台各部門以及播音室。當晚21時，廣革會連續四次向全市和全國廣播《接管聲明》和《向毛主席致敬電》；還在對台灣廣播時間，也插播《接管聲明》。

對於政權來說，廣播電台的重要性遠超過報紙。因為廣播電台即刻便可將信息傳播到千家萬戶，在通訊不是非常發達的1967

年，這樣的即刻對政權是可怕的。上海廣播電台和電視台1月7日被造反派接管的同時，全國各地傳播媒體接管事件也紛紛而起。1月11日中共中央發文，對被接管的廣播電台一律實行軍事管制。1月17日上海電台再次被接管的當天晚上，深夜11點半，上海警備區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對上海的電台和電視台實施軍管。⁵⁸

張春橋、姚文元與工人造反派見面

1月5日下午，張春橋和姚文元召見工總司的工人造反派，地點仍在武康路2號樓下會議室。張春橋一回上海，首先接見以原市委寫作班為核心的機關聯絡站，第二天又馬上接見工總司，顯示他對二者的重視。這兩者，一個是被毛澤東稱為「上層建築」的掌控思想和輿論的機構，一個是被毛澤東奉為「領導階級」的底層造反派群眾。以後在整個文革十年，這兩支力量都將是張春橋最大的社會資源。

王洪文、陳阿大、耿金章、范佐棟等工總司負責人，接到電話趕來。徐景賢、郭仁傑、王承龍等，紅革會馬立新、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姜濤等，還有上海楊樹浦發電廠、上海自來水廠、上海鐵路局、上海港務裝卸區、楊浦煤氣廠等交通和公用事業的造反隊負責人謝鵬飛等，也都聞訊趕來。陳阿大一進門就問：開什麼會？徐景賢只是笑笑，沒回答。他恪守張春橋要他對他們回上海暫時先保密的要求。當張春橋和姚文元走進會場，王洪文等很驚訝。王洪文和陳阿大兩天前還在北京見過張春橋和姚文元。張春橋微笑着說，你們到北京來，我們又不好告訴你們說我們馬上要回上海了。所以那時我們要你們趕快回上海。現在我們不是又見面了嗎？⁵⁹

張春橋講話。他首先向大家劃清自己與上海市委的關係：

58 以上關於上海廣播電台的奪權資料，主要引自《上海文革史話》。

59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我們這一次來的身份，是中央文革的調查員，同時也 and 市委劃清界線，我們兩人都不參加市委工作。……

中心的任務是幫助左派發展。⁶⁰

張春橋說他想聽聽革命和生產兩方面情況。先談革命。講到赤衛隊，張春橋要求盡量動員他們不要去北京。對工總司到處抓赤衛隊負責人，張春橋表示不贊成，「你們人抓得太多了」；而正是他幾天前還從北京向上海打電話，要上海的公安局收押造反派扭送去的赤衛隊員。張春橋又說，他下飛機時，馬天水對他說昆山車站有大批赤衛隊員要見他，「我一口拒絕了。他們一面要打倒我，一面要見我，天底下哪有這樣的事？他們想再搞一個安亭事件，那就讓他們搞吧，我才不理呢！」⁶¹張春橋還說，研究怎樣批鬥陳、曹，光是喊喊「打倒」，「不承認」是不行的。你們工人造反派不要眼睛老盯着黑材料，這不是主要問題了，材料燒了，還是可以搞出來的。不要放掉主要的問題。中國有句古話：「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走資派不打倒，過一二年或三四年，他們又要搞你們的，所以最主要的問題是把走資派揪出來打倒。張春橋又特地提醒王洪文不要被學生左右：

現在赤衛隊跨了，你們這支隊伍的步調是不是一致，關係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兩百萬產業工人，是我們的基礎。上海的工人階級要能夠左右上海的形勢，工人運動不要受紅衛兵特別是外地學生的操縱。這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後首先要接見你們的原因。⁶²

60 《張春橋、姚文元 1967 年 1 月 5 日接見工總司代表時的講話》，朱永嘉記錄並收藏。

61 同上。

62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講到生產，張春橋告訴大家：毛主席派我們來上海，但一到上海，就感到經濟形勢的嚴峻，嚴重到這個地步，中央也沒有料到。我們來上海看了後，比原來知道的情況更嚴重。楊樹浦發電廠的煤只夠用三天，到昨天已經有幾十條外輪停在長江口外，國家為賠償外國貨輪不能即時裝卸，要損失好幾萬英鎊。而鐵路運輸方面，由於滬寧線中斷，沿途積壓了許多火車，造成沿線許多工廠停產待料，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這樣下去，對深入開展文革造成非常大的困難。⁶³ 工總司范佐棟等反映，目前有為經濟而造反的傾向，一些人要求發錢，補工資，還有搶房子，而市委和各級領導卻答應這種要求。范佐棟說：「我們認為這樣不好。」張春橋說：「四川已經發了一百萬。主席聽了這些材料很重視，指出對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來說，增加了一條新的罪狀。對於左派來說，這也是一個考驗。」⁶⁴ 大家反映生產的形勢十分嚴峻，有的部門因大批工人外出，面臨停產。

張春橋說：當務之急是恢復生產。他再三建議：

希望你們造反隊把要害部門鞏固起來，使左派佔優勢。……

你們要考慮一下如何把要害部門工作加強。⁶⁵

工人造反派們說，現在許多幹部都躲起來，找不到了，生產無人管，都是我們造反派頂上去的。張春橋說：他們不管，你們管，先把生產搞上去。⁶⁶ 張春橋這次接見工人造反派，就是為了解決上海越來越嚴峻的經濟形勢，所以他在與工總司負

63 筆者 2014 年 6 月 22 日對謝鵬飛的訪談。

64 《張春橋、姚文元 1967 年 1 月 5 日接見工總司代表時的講話記錄》，朱永嘉記錄並收藏。

65 同上。

66 筆者 2014 年 6 月 22 日對謝鵬飛的訪談。謝鵬飛說，他對張春橋這句話印象非常深刻。

責人見面的同時，又請來鐵路交通、水電等經濟生產要害部門的工人造反派組織負責人。他希望造反派們能恢復這些部門的正常生產。但具體怎樣操作，張春橋顯然也拿不出辦法。

徐景賢匯報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備情況。提議由工總司再推一個負責人主持大會，因為王洪文要作重點發言，大家於是推潘國平為主持人。至於會場，徐景賢建議選在室內會場的文化廣場，因為天氣預報1月6日那天下雪。但陳阿大不贊成，說文化廣場太小，只能容兩萬多人，要開，就要放在能容十幾萬人的室外會場人民廣場。陳阿大的態度非常堅決，說「下刀子也要在人民廣場開」，「否則，工總司不參加大會，而且我要帶人來衝會場」。徐景賢是第一次見到陳阿大。他解釋說自己擔心到時候調不來那麼多人，陳阿大說：調個十萬二十萬人小意思，我們能調一百萬人來，人民廣場站不下，可以站在廣場周圍的馬路上。徐景賢擔心室外廣場音響效果不好，陳阿大說他會通知電話局在人民廣場周邊馬路上拉線裝高音喇叭，「今天連夜搞」。王洪文也支持陳阿大的意見。

張春橋笑咪咪地看着徐景賢和陳阿大爭論。身材胖墩墩的陳阿大戴着一頂灰色毛氈羅宋帽，一口紹興話，解開上衣鈕扣，拍着胸脯保證說這兩件事都包在他身上。姚文元不認識陳阿大，側臉輕聲問張春橋這人是誰？張春橋答：「工總司負責人陳阿大。」⁶⁷

大會籌備一波三疊。傍晚，程綺華哭着來到武康路2號，她代表機關聯絡站在市委黨校籌備大會，和工總司戴立清吵起來了。她也建議會址放在文化廣場，而戴立清一定要放在人民廣場，兩人爭了起來。戴立清大發脾氣，將辦公室的桌椅杯瓶一下掀翻，頓時滿地狼藉。程綺華是女性，過去一直在機關工作，沒見過這樣的粗魯，氣得哭着回武康路2號，對郭仁傑說不參加會議了，

67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跟工總司這幫流氓胚子無法合作。接着她哭着回家去了。⁶⁸

大會會刊由誰署名又生風波，工總司不同意由紅革會的《紅衛戰報》刊登大會專刊，說應該刊登在《工人造反報》上，紅革會則認為，大多數發言是紅革會和機關聯絡站起草的，所以必須刊登在《紅衛戰報》上。雙方各不相讓。最後徐景賢打電話請示張春橋，張春橋說，《支部生活》、《工人造反報》和《紅衛戰報》三家同時刊登。⁶⁹

接着，為上台發言、上主席台以及誰主持會議又起爭執，紅革會等說此次大會都是機關幹部包辦；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組也堅持自己的組織一定要有人上主席台，與徐景賢等爭執。工總司王洪文和戴立清等則不同意紅革會等組織上主席台，雙方辯論到1月6日凌晨。⁷⁰最後，潘國平決定，所有造反組織負責人都上主席台，

工總司堅持大會非開不可，提出三十萬工人造反派已經連夜集會，許多遠的地區已經出發了，這樣鬧下去，如果大會開不成，「工人造反隊員非砸爛我們狗頭不可」。最後多數同志表示贊成，決定立即趕到會場繼續完成最後的籌備工作。這時離開會已只有4小時了。⁷¹

馬立新、姜濤等驅車趕往人民廣場，此時已經是1月6日早晨6點半，而大會通令卻還沒有起草。徐景賢拉住在場的機關聯絡站戴厚英和高玉蓉，讓她們趕快起草，修改後由徐景賢、郭仁傑定稿。⁷²

68 原機關聯絡站成員王知常 1979 年 3 月 29 日。

69 金大陸、金光耀、筆者 2011 年對馬立新的訪談。

7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71 同上。

72 王知常 1981 年 1 月 9 日。

造反派宣佈罷免陳丕顯、曹荻秋

1967年1月6日，天陰沉沉的。昨晚剛下過雪，灰色的殘雪還積在角落和屋頂，地上一片泥濘，這是自上一年入冬後上海最冷的一天。一大早，一列列打着造反隊或紅衛兵大旗的隊伍，一輛輛滿載着造反派的卡車，從上海四面八方湧往市中心的人民廣場。陳阿大說到做到：廣場周圍主要街道全都安裝了新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語錄歌。這些半個夜晚便全部安裝到位的大喇叭，使陳阿大給張春橋以在工人中有號召力的印象。張春橋以後欣賞陳阿大，這應該是最初的感覺。前往參加大會的，少說也有20萬人。整個廣場上人挨着人，密密麻麻，擠得滿坑滿谷。遲來的隊伍沒有機會再擠進會場，就分別排在福州路、西藏路、武勝路、龍門路、望亭路上……人群以廣場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延伸出去，人頭上飄動着各單位的旗幟，一眼望不到邊，場外的人數比場內要多得多。⁷³

而文革中的一份資料，對大會規模的描述非常詳盡：

中心會場設在人民廣場，另有369個分會場，其中包括252個大廠，117個工人俱樂部、影院、劇場和大專院校。4條大馬路、12個交通要道，安裝了上千只喇叭。通過14個廣播中轉站向全市廣播，並用電視轉播實況。大會由4000名工人造反隊員擔任糾察。宣傳大會的廣播車，遍佈10個區，海報、標語直貼到閔行、昆山。規模之大，是上海解放以來第一次。……

許多單位自動把本單位的走資派押來陪鬥。各個分場裏都有這些大大小小的活靶子擺在那裏。⁷⁴

73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7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陳丕顯是耿金章押去會場的。陳丕顯自從1月3日起，便被耿金章等搶到華山路922號市委招待所內，由二兵團的人「監護」，沒有行動自由。被通知參加大會接受批判的還有上海所有部、委、辦、局長以上幹部。這是1月4日晚上，戴立清等人根據市委的一份幹部名單擬出參加大會對象，由陳丕顯簽字後，於凌晨交正在值班的市委辦公廳秘書長李庸夫，讓他通知。機關聯絡站王承龍將所有部、委、辦、局長以上幹部在東湖招待所集中，1月6日早上用兩輛大客車將他們拉到廣場，命令這一百多個幹部在主席台上的毛澤東巨幅畫像下一字排開，站着陪鬥。原定主持大會的潘國平，直到大會快開時仍找不到人影，事後才知他躲在一處睡覺，睡過頭了。⁷⁵ 根據王洪文建議，由工總司范佐棟主持大會。

上午10時，在寒風和口號聲中，陳丕顯、曹荻秋被已經造反的警衛人員押上露天主席台，站在事先搭好的乒乓桌上。其他市委書記、候補書記、市委常委和中共華東局領導：魏文伯、韓哲一、楊西光、梁國斌、常溪萍等，也被押上台，站在陳、曹兩側。雖說講好不搞噴氣式，不搞武鬥，但每人胸前掛着大張硬板紙，紙板上寫着他們姓名，打上紅叉叉。陳、曹兩人站在乒乓桌上，彎腰低頭，整整站了四個小時。凜冽的寒風中，所有批鬥對象都不許戴帽子。由於事先通知陳丕顯不准穿軍裝，陳丕顯這天穿了件灰色棉襖；曹荻秋滿頭白髮，被寒風吹得亂亂的。陳丕顯不買賬，每當發言人要他回答問題，他總是硬頂；曹荻秋則將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前一時期是我主持上海工作，我應該負責任。」對於站在兩邊的市委常委或書記們，點到誰的名字，就將這人押上乒乓桌示眾。當點到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時，馬不同於他人，立即抓緊機會作自我檢

75 據潘國平文革後說，自己當時是存心這樣的。他說他曾經從紅衛兵處聽說，王洪文等在背後說他喜歡拋頭露面出風頭，所以他就設法避開了(潘國平1980年10月17日)。

查：「我有罪，我要向上海人民請罪，我要交代！」不過徐景賢沒讓他下去，這次大會不是時機。

王洪文作最後壓場發言，他的發言稿經過張春橋修改。這是王洪文第一次在全市大會上亮相，他先敬個軍禮，然後念稿子。王洪文標準的普通話、到位的語氣以及對陳、曹的質問，取得了很好效果。⁷⁶

大會高潮是宣讀和通過三項通令，摘要如下

第一號通令：

- 一、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 二、責成大會服務團在會後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批准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
- 三、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革命造反派監督勞動，並責令其徹底坦白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 四、在曹荻秋監督勞動交代期間，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組織如有批判鬥爭，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統一安排進行，隨叫隨到。

第二號通令：

- 一、陳丕顯必須在七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就柯慶施同志逝世後上海市委如何忠實貫徹劉少奇、鄧小平反動路線，以及陳丕

76 以上大會情景全部引自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顯、曹荻秋等與劉、鄧修正主義司令部的黑關係等問題，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黨中央未作出決定改組上海市委前，陳丕顯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責任，滑腳溜走。今後上海市委如有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陳丕顯是問。

三、以上兩項，如有違背，革命造反派有權採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動，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均由陳丕顯負完全的責任。

第三號通令：

一、責成大會服務團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報告中央，請求中央對上海市委進行徹底改組。

二、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王一平、梁國斌，候補書記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須向上海人民老實交代，徹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組織如要他們交代問題，必須隨叫隨到，如有繼續頑抗，定予嚴懲不貸。

三、夥同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魏文伯、韓哲一也必須向造反派和革命群眾老實交代，徹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違抗，定予嚴懲。

四、市委各書記、常委和各部委負責人，在上海市委改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崗位負責生產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監督，不得消極怠工。在此期間，對黨對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繼續害黨害民，則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膽敢破壞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組織有權採取革命行動，其一切後果完全由破壞本通令者負責。⁷⁷

這三個「通令」由機關聯絡站郭仁傑主持，與戴厚英、高

77 1967年1月7日《上海工人造反報》。

玉容一起起草。張春橋後來評價說：「上海三個通令，是全國省市第一個搞的奪權文件。」⁷⁸ 不過，此時大會還沒有提出奪市委權，只是宣佈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巿市長；請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造反派們還沒有想到奪權，只是希望中央撤換上海的領導幹部。

對造反派宣佈不承認自己，陳丕顯和曹荻秋都不以為然。會後，曹荻秋對人說：「一個造反派組織，怎麼就可以打倒上海市委，撤銷市長的職務？」陳丕顯也在會後打電話給曹荻秋：「中央沒罷你的官，公開場合你不能工作了，還可以在後面做些事情。」⁷⁹

張春橋和姚文元沒有參加這個大會。張春橋解釋說：「你們最好自由行動，我們也自由，如1月6日會，我們考慮不參加，要參加就要講話。」⁸⁰ 但他們在住處，從頭到尾觀看了全部電視轉播。張春橋很謹慎，這樣重大的行動，沒有毛澤東點頭，他不敢輕易介入過多，以毛澤東所要求的調查員的身份，與上海運動保持適當距離是最穩妥的。但是，據徐景賢文革後回憶，張春橋還是忍不住在最關鍵處點撥他：大會第二天，張春橋問徐景賢：「你們的那些大會發言稿，還有通令，有沒有報送中央？」徐景賢一下被問住了，他根本沒有想到，要由他們造反派自己報中央，他還以為張春橋和姚文元會匯報。⁸¹ 張春橋說：

我們匯報是我們的事。你們開了大會，宣佈了打倒上海市委，你們又念了通令，宣佈不再承認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可是，你們又不向中央正式報告。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那你們的大會和通令，怎麼能生效呢？不能開過

78 張春橋 1968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市革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79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80 張春橋姚文元 1967 年 1 月 11 日同北京高校駐滬聯絡站人員座談。

81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大會就算了，大會後怎麼搞，不能由我們兩人包辦，你們要直接報送中央。⁸²

徐景賢後來回憶，聽張春橋這一說，他當時緊張得腦門上直冒汗。他問用什麼名義報，張春橋說：「就用你們幾個發起開大會的革命群眾組織的名義報」，「一式十五份，直接通過機要交通送中央辦公廳，這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員都可以看到了」。⁸³ 徐景賢立即佈置照辦。實際上，還在開會的前一天，姚文元已經在向中央報告的《上海工作簡報》上寫道：「明天，造反派開大會，批判市委，口號升了級，變成打倒陳丕顯、曹荻秋！」大會的當天晚上，姚文元又在送中央的《上海工作簡報》上匯報大會盛況：

上海開了10萬人大會，從上午10時到下午3時，有機關、工人、學生代表參加。中心口號：「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陳、曹、魏、韓均到會。會後又通電、通令。不承認曹的市委書記，要求徹底改組市委，立刻軍管，陳一周內交代自己罪行。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說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勢大好。⁸⁴

從張春橋一系列行動看，他處心積慮地要打倒陳丕顯：康平路事件中，他一再提醒造反派「勝利果實不要讓保守派摘去」，造反派按他的這個提醒召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大會開過後，他又要造反派以民眾名義，向中央發報告不承認上海市委；然後，他再向中央報告說，「上海市委完全垮台了」。一環扣一環，相當嚴密。相比之下，他前兩天找陳丕顯談話，

82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83 同上。

84 王年一 1998 年著《大動亂的年代》第 173 頁。

似乎只是做給中央看的一個姿態。

其實，就在張春橋讓姚文元向中央報告說「上海市委垮台」時，上海市委的指揮系統還在艱辛地運轉。雖然徐景賢們造反的示範效應，已經在各機關一般幹部中引起連鎖反應，但所有部、局長們仍都聽命於上海市委。1967年1月1日，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在東湖招待所召開群眾組織會議，制定了《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1月3日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在錦江飯店小禮堂，召開各部委辦和各局負責人會議，工總司的潘國平、黃金海、葉昌明以及炮司、同濟東方紅等紅衛兵組織也參加，討論日益嚴重的全市性停工、停產經濟形勢，會上部局長們都表態說要支持造反派，⁸⁵顯示市委正在盡一切努力扭轉頹勢。即使是1月6日的大會，陳丕顯一發通知，部局長們都到會。如果讓各機關幹部造反派們知道中央要陳丕顯出來工作的信息，幹部們應該都會接受陳丕顯。張春橋顯然不想讓上海市委尤其陳丕顯再指揮上海工作，但他自己向中央寫報告傾向又太明顯。他讓徐景賢以上海造反派群眾名義給中央寫報告，就是要向中央傳遞這樣的信息：上海市委已經癱瘓，是上海造反派要打倒陳丕顯。

但是，毛澤東一直不表態，沒有讓《人民日報》刊登上海大會消息或轉載大會通令，也沒有對上海宣佈罷免陳丕顯和曹荻秋職務的行動作出回應。⁸⁶看來，毛澤東對1月6日大會的三個通令有保留。徐景賢直到後來才知道，毛澤東對打倒陳丕顯確實有保留，毛在12月26日生日這天，讚揚12月18日機關聯絡站的四個口號時，對最後「火燒陳丕顯」那一句評論說：「燒一下可以，但不要燒焦了」。⁸⁷不過這一句話張春橋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告訴徐景賢。

85 葉昌明工作筆記 1967年1月3日，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86 王力 2001年著《王力反思錄》第796頁。

87 徐景賢 2003年出版《十年一夢》。

毛澤東高度評價《告全市人民書》

張春橋用心支持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毛澤東不表態；但兩天後，毛澤東卻對《文匯報》的被接管作出強烈反應。1月8日，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說：

文匯報現在左派奪了權，4號造反，解放日報6號也造了反，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奪權後，三期都看了，轉登了紅衛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轉載。文匯報5號刊登的《告全市人民書》，人民日報可以轉載，電台可以廣播。內部造反很好！過幾天可以綜合報導。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這兩張報紙出來一定會影響華東、全國各省市，搞革命定要搞輿論，「六·一」人民日報奪了權，中央派了工作組，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我不同意另起爐灶，但要奪權。唐平鑄換下吳冷西，開始群眾不相信，因為人民日報過去天冷，又未發表聲明。兩張報紙奪權是全國性的問題，要支持他們造反。

我們要轉載紅衛兵文章，他們寫得很好，我們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讓那些人在那裏吃飯。很多事宣傳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陳伯達）我都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得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華東以及全國各省市。告全市人民書，是少有的好文章，講的上海市的問題，是全國性的。

（有人反映吳冷西他們現在很舒服，胖了）太讓吳冷西他舒服了，不主張讓他們都罷官（留在崗位讓群眾監督）。⁸⁸

88 轉引自傳單《唐平鑄同志在人民日報傳達1月9日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講話》，解放日報社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原件為鋼板刻寫油印，無日期，估計是1967年1月上旬，原件為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了，同時起來掌握了權力，掌握了領導權，全國就有希望。它的影響不但會影響到整個華東，而且會影響到全國各省市。原來的領導人不同群眾站在一起的話，他們就離開，沒有他們，我就不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要馬上廣播。⁸⁹

毛澤東將造反派接管《文匯報》定性為「奪權」，認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顯然，但又由造反派代行權力，是文匯報造反派給毛澤東的極大啟迪。王力後來回憶，雖然過去沒有聽到毛澤東有過這樣主張，但上海發生了這樣的事，毛馬上抓住並堅決支持。毛澤東將消極對抗文革的幹部和積極對抗造反派的保守派都比作「張屠夫」，提出不要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但怎樣奪權？毛澤東似乎還沒有完全想好。他只是接着說了些不能讓被罷官的幹部太舒服了之類的話。毛說不主張讓他們都罷官，留在崗位讓群眾監督。這樣的說法，還只是對被罷官幹部的安排，而不是奪權後的機構形式。

毛澤東評價《文匯報》1月5日刊登的《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又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⁹⁰ 是「少有的好文章」，要《人民日報》轉載，電台廣播。毛澤東吩咐馬上起草一個《人民日報》編者按，代表中央態度。毛對中央文革小組王力說：「當天晚上你王力就要到廣播電台去，立即廣播」。《人民日報》第二天轉載《文匯報》1月5日刊登的那篇《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轉載時將題目改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還配上《編者按》。這篇《編者按》由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執筆，幾乎等於毛澤東口述，王力記錄：⁹¹

89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780 頁。

90 張春橋、姚文元 1967 年 1 月 11 日同北京高校駐滬聯絡站人員座談，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1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780 頁。

編者按：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

隨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⁹²

《編者按》重點不在第一段，而在第二段，即關於《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造反派接管那段。這個《編者按》影響是爆炸性的，周恩來和王力當時就認為，其衝擊力不亞於聶元梓大字報，甚至影響更大。雖然《人民日報》沒有明確說上海發生了造反派對報社的接管，《編者按》中也沒有使用「奪權」二字，而且《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兩個接管聲明毛也沒讓轉載，但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傳單小報，卻立即將《文匯報》的被接管消息傳遍全國。發源於上海的接管風很快推向全國，上海局勢更是發展迅猛。

陳丕顯希望與造反派合署辦公

張春橋、姚文元到上海，毛澤東給他們的職務是聯絡員，不是主持上海的工作。上海的市委書記仍是陳丕顯。而且1967

92 《人民日報》1967年1月5日。

年元旦，周恩來給陳丕顯的電話，明確顯示中央決策層希望陳丕顯出來主持上海的工作。但是，張春橋就是不給陳丕顯這個機會。

為了扭轉上海的亂局，陳丕顯曾經兩次試着提出和造反派聯合辦公。第一次是市委寫作班宣佈造反之後，1966年的12月26日，陳丕顯帶着秘書于寶年去武康路2號機關聯絡站辦公處。徐景賢接待了陳丕顯。陳丕顯說自己是順道來的。他提出希望和機關聯絡站合署辦公。陳丕顯還答應調撥轎車供造反派使用。⁹³ 據當時在場的朱永嘉回憶：

陳丕顯提出希望和機關聯絡站合署辦公。陳這時的態度很好，甚至有點低聲下氣。我們沒有同意。我們要和他劃清界限，所以對他態度很兇，質問的口氣多。問他曹荻秋的做法是你同意的嗎？陳丕顯答，有些是，有些不是。陳丕顯說我不能搞兩套工作班子，再搞也搞不起來。各個系統都是你們在聯繫，市委要運轉，要靠你們。我可以給你們兩輛車，房子也可以再大些。

我們覺得，聯合辦公，我們就會又成了陳的工具。但這話沒明說，只說這事談不上，現在首要是批資反路線，資反路線沒解決，怎麼聯合辦公？再說！⁹⁴

陳丕顯提出與機關聯絡站幹部造反派合署辦公，顯然一是希望以機關聯絡站實際代替市委辦公廳的工作，將瀕臨停擺的市委工作運轉起來；他認為上海不能有兩個指揮中心，聯合辦公，便於溝通。二是表示市委向造反派靠攏的決心。但是，陳丕顯向造反派發出的這個轉向信號，沒被造反派接受。徐景賢馬上問他：「那你對我們提出的揪出曹荻秋有什麼看法？」

93 陳冀德《生逢其時》。

94 筆者與顧訓中 2005 年 7 月 23 日對朱永嘉的採訪。

陳丕顯為曹荻秋辯護說：「荻秋同志處在第一線，他有他的難處。」陳丕顯再一次表示：現在市委機關受到衝擊，工作很難開展，是否合署辦公。他可以提供房子車輛和經費。但被徐景賢一口拒絕。⁹⁵

陳丕顯離開後，郭仁傑第一個跳起來，堅決反對聯合辦公，認為陳丕顯這樣做居心叵測，陳冀德和程綺華也認為，陳丕顯答應給房子和車子是拉攏造反派，我們起來造反不就是反對特殊化嗎？。在場的徐景賢和王承龍也反對合署。⁹⁶ 但王承龍認為不應該拒絕陳丕顯給的東西，又不是陳丕顯拿出來的，公家的東西，他享受，我們為什麼不能享受。⁹⁷

陳丕顯第二次提出和造反派聯合辦公，是在元旦接到周恩來授命電話之後。此時局勢更加混亂，各級幹部都被揪鬥，上海黨政機構陷於癱瘓，根本無法開展工作，陳丕顯試圖與正在成為主流的造反派們，一起解決上海經濟生產的困境。除了借用造反派們名義一起撰寫傳單，他又一次提出和造反派聯合辦公。他顯然是希望和造反派一起工作，至少可能減少些干擾。這是他第二次嘗試。這次，他是對工總司負責人王洪文和潘國平提出的。他說周總理要他出來主持工作，問能否給他在哪個廠裏找個辦公地方，這樣可以和造反派在一起。王洪文提出可以去他工作的國棉十七廠。⁹⁸ 1月9日，陳丕顯被造反派揪到王洪文的國棉十七廠批鬥，陳丕顯對王洪文說：「你們這裏很好嘛，我搬來和你們一起聯合辦公，只要給我裝兩部電話機，一部紅的，一部黑的就行了」。⁹⁹ 陳丕顯覺得有周恩來授命，出

95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96 筆者與顧訓中 2005 年 7 月 23 日對朱永嘉的採訪。

97 同上。

98 潘國平 1979 年 10 月 15 日以及 1980 年 1 月 7 日。

99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一月革命大事記》。此外，戴立清在 1977 年 12 月 5 日的交待中也提到陳丕顯希望和工總司合署辦公之事，戴立清在這份交待中還提到自己曾經聽王洪文說過，陳丕顯當時對王

來工作應該得到造反派們的支持。不想，張春橋不給他這個機會。幾天後一個晚上，王洪文和潘國平正在東湖賓館，潘國平後來回憶：

不一會兒北京有電話來，是市委在賓館的工作人員聽的。後來叫王洪文去聽的，王洪文聽了後，叫我去聽。我接過話筒，才知是張春橋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他講：「你們現在把陳丕顯弄在廠裏幹什麼呢？」「這不是把火往自己身上引咎！」「陳丕顯為什麼要找你們？」「你們不要上當！」我聽完電話問王洪文，王洪文說張春橋也對他說叫他不要上當。後來聽說王洪文把陳丕顯從廠裏趕出了。¹⁰⁰

在此之前的1月4日，張春橋與陳丕顯談話時，陳丕顯表示工作有難度，張春橋就對徐景賢說，看來陳丕顯確實難以工作。但當陳丕顯真打算依靠造反派的力量開展工作時，張春橋卻又處處阻攔。不讓陳丕顯出來工作，顯然是張春橋的真正心願。

陳丕顯自從1月初，一直被耿金章「監護」。1月6日「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結束後，陳丕顯、馬天水乘坐的吉普車剛到人民廣場的東頭，就被嘉興和松江的農民包圍，一二個小時都出不去。耿金章讓陳丕顯穿上工人的藍棉工作大衣，佩上袖章，戴上口罩，化裝成工人，上了另一輛卡車。再叫上兩個工人造反派，穿上陳丕顯和馬天水的大衣，坐在吉普車裏。但四五個小時過去，還是走不了。最後，還是陳丕顯的秘書于寶年向耿金章討了一個造反派的袖章，下車打電話給市委警衛處，請他們來解圍，這才回到華山路市委招待所。但陳丕顯住在華山路招待所的消息被越來越多人知道；1月8日耿金章又將陳丕顯轉

洪文說：張春橋要他有個固定的辦公地點，這樣可以裝電話，張春橋有事就可以找到他。

100 潘國平 1979年10月15日。

移至衡山飯店，仍是不許陳丕顯自由行動。交大反到底的紅衛兵楊小兵覺得這樣不行，要擺脫耿金章的控制。他建議陳丕顯去工總司。於是，1月9日晚上，陳丕顯在楊小兵等的幫助下，趁人不備，溜出衡山飯店，先是到楊浦區的一個碼頭，那裏王洪文正在批鬥海運局黨委書記李廣；然後和王洪文到了國棉十七廠保衛科，住了一夜。1月10日被交通運輸局的造反派弄到南市區的一個地方住了一夜。11日，被紅革會弄到長樂路一幢房子裏住了一夜。12日晚上，陳丕顯去興國路張春橋下榻處談話，當晚又被王洪文搶去國棉十七廠住了一晚。接着，被紅革會弄去上海師範學院「監護」了近一個星期。1月17日被中教司弄到建國西路一幢房子裏「監護」。¹⁰¹

陳丕顯他們就這樣被造反派組織搶來搶去，直到耿金章在一次批鬥會上搶出陳丕顯，和曹荻秋、馬天水、王少庸、張承宗、李干成、楊西光等市委領導們一起，在永福路二兵團總部關了一夜後，又關到商業二局所屬禽蛋公司倉庫；幾天之後，轉移到上海大廈住了一晚，然後送去嘉定縣黃渡鎮上的上海禽蛋五廠。¹⁰² 耿金章吩咐手下要絕對保證陳丕顯等的安全；其他造反派組織要批鬥陳丕顯，必須向耿金章「借」；每次借出去批鬥，耿金章都要派一二十人保護，不讓陳丕顯、曹荻秋等受到身體傷害。有許多次耿金章都不肯「借出」，怕出意外。這

101 陳丕顯的秘書于寶年1978年11月23日《有關〈告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前後的概況》；以及楊小兵文革後對筆者的回憶。

102 同上。又據耿金章1979年3月8日交代，是張春橋要他將陳丕顯和曹荻秋看守起來的。1月5日下午張春橋接見工總司成員時，說：「陳、曹兩個人在外面亂跑，這不行，要出問題的，要想辦法將他們『保護』起來。」在旁的王洪文建議讓二兵團看守，「他們的人比較集中。」此外，孫玉喜1979年4月20日的交代說：「耿金章接受了張春橋的指示，要把陳、曹二人安排下去勞動。」而據禽蛋公司保衛科幹部宋某文革後的回憶，陳丕顯和曹荻秋也確實在禽蛋二廠勞動過二天，後被工人們認出，就不再被安排去勞動了。

使陳丕顯在那一個多月裏避免許多折磨。¹⁰³ 耿金章這樣做一方面是出於對陳丕顯等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算盤。他認為陳丕顯不會被徹底打倒，他希望陳丕顯能支持二兵團。2月10日的一次全市性批鬥會，耿金章不肯交出陳丕顯，徐景賢親自去說服，才在大會已經召開許久後，將陳丕顯等押到。會後，徐景賢向張春橋報告，張春橋下令市委警衛處，將陳丕顯送到康平路上的一個空房子，派專人「保護」。¹⁰⁴ 市革委會成立後，陳丕顯從此被上海市革委會「隔離審查」關押八年。

類似二兵團這樣「監護」領導幹部的，還有一兵團的戴祖祥，他曾經將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和韓哲一藏在一個廢品倉庫，要他們簽字發經費。工總司總部得知後，讓黃金海將他們轉移到和平飯店。¹⁰⁵

小結

毛澤東在1966年12月底生日那天，還對文革有着充分信心，運動完全在他的掌控中。不料一個星期不到，上海就連續發生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不但上海，全國都發生保守派變相罷工，這是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毛所面臨的，已經不只是幹部階層對文革的抵制，而且更是整個社會系統乃至經濟秩序癱瘓。文革成本已經越來越上升到將直接影響民眾生活的地步。毛澤東不愧政治高手。上海的一張連造反派自己都沒重視的普通傳單，到了毛手裏，成為扭轉乾坤的號召。上海造反派

103 這是陳丕顯在2005年著《在一月風暴的中心》說的。

104 徐景賢2003年出版《十年一夢》。但據陳丕顯的《在一月革命風暴的中心》的回憶，他是在1967年2月25日耿金章被王洪文抓起關押後，才被市革委會關押的。

105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傳組1967年2月28日《傳單匯編》第三期：《把政治扒手戴祖祥揪出來示眾》。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在寫這張傳單時，只想到解決昆山事件，毛澤東則看到解決全局困境的契機。

毛澤東不但抓住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毛而且更對《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接管形式感興趣。早在四清運動中，「奪權」便已經被提出；文革剛開始時，陳伯達起草的社論也兩次提到奪權，但那時所說的奪權是自上而下奪權，是上級黨委對下級黨委的改組。毛澤東當時雖然有讓群眾監管部分權力機構的思想，但並沒有提出「自下而上全面奪權」口號。

「奪權」口號曾經出現在工總司成立宣言中，但當時只是一句政治口號。人們理解的奪權，是改組北京市委式的奪權，是群眾批判幹部，中央撤換和委派幹部式的奪權，可以稱之為「改組式奪權」。在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之前，所有的「打倒」口號，內涵其實還是「批判」，而不是罷免，是在承認權力的前提之下對權力的批判。實際還是承認上海市委的權威。「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第一次以群眾組織的名義，提出不承認市委的權力。但是，張春橋雖然想以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罷免上海市委權力，但思路仍是「改組」式的，即請求中央對上海市委進行改組，改組後由中央委派幹部。

而《文匯報》的造反派，雖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動就是奪權，只稱之為「接管」，但從上到下地替代原有的報社領導系統，行使業務和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力，卻是實際意義上的真正奪權行動。這個奪權行動，顯出「奪權」在群眾運動層面的操作意義。這是置換式的奪權，是讓當權派靠邊，由造反派群眾接替和行使權力。毛澤東抓住了這個方式。

毛澤東沒有對打倒上海市委大會表態。但毛澤東卻對造反派接管《文匯報》高度評價，《文匯報》奪權成為全國奪權高潮的先聲。顯示了毛澤東的思考：既要批判和懲罰反對文革的幹部們，又要保持權力機構的運行。毛澤東一貫對科層官僚體

制深惡痛疾，希圖建立起他所心儀的群眾參與式民主。文匯報社造反派的奪權顯然給了毛澤東極大啟發，更為毛找到文革新思路：幹部階層反對文革，就讓他們離開，由支持文革的群眾接替他們的權力。毛澤東用一句俗語表明自己的決心：死了張屠夫，不吃混毛豬。¹⁰⁶

106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第 1465 頁。

第十六章

經濟主義風潮

革命口號下的身份和利益要求

最初的經濟主義要求

毛澤東在生日家宴上對上海文革局勢高度評價。但他此時卻沒有料到，一股與他發動文革初衷格格不入的潛流，正在悄悄湧動。從文革全面發動初期的1966年8月始，一些組織所提出的要求，在政治批判的口號下，正越來越向經濟要求靠攏。

1966年8、9月間，位於外灘的上海市總工會門前，每天總有好幾批人群，敲鑼打鼓地向市總工會送大字報。他們都是上海集體所有制的「大集體」工廠或者是民辦「小集體」里弄生產組的職工們，向市總工會要求自己的單位有權組建工會，他們要加入工會。他們表示加入了工會，就可以明確他們的階級身份，就可以更好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否則，他們總被游離於各種社會主義運動之外。當時共有二百多個單位提出這樣的申請。¹

而事實上，他們的真正動機是為了享有工會會員所能享受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自1949年以來，中國工會全部官辦，工人無權自行組織工會，只能申請加入官方工會。能否加入工會，不但是政治待遇，還與經濟利益密切相關。因為1953年修正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明文規定，對於非工會會員，「疾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間的工資與救濟費，非因工殘廢救濟費，供養直系親屬救濟費，養老補助費，喪葬補

1 上海市總工會 1966 年 8 月 30 日《關於集體所有制工廠企業職工要求組織工會的請示報告》。

助費，只能領取規定額的半數。」²而文革前夕的上海，能夠加入工會的，只有全民所有制單位，以及少數集體所有制單位的職工。上海文革前夕共有272.13萬職工，其中集體所有制職工為59.76萬人。這59.76萬集體所有制職工中，能夠加入工會的，只有17萬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所屬部分合作工廠職工。³據當時上海市總工會統計的上海「大集體」和「小集體」的集體所有制職工人數情況：

全市共有集體所有制工廠企業和民辦事業人員共約42萬多人，分佈面很廣：工業(街道工廠、合作工廠、合作社)方面有25萬多人；財貿(合作商店、菜場)方面約有11萬多人；教衛(民辦學校、地段醫院)方面約有3萬多人；其他(房地產、環境衛生等)方面約有2萬多人。這些單位除手工業局所屬部分合作工廠外，目前都沒有工會組織。⁴

而一些大集體所有制民辦單位的職工，還要求轉為「公辦」的全民所有制，改換體制身份，尤其以民辦小學的教職員工最為突出。⁵1966年10月6日至8日，長寧、靜安、閘北、普陀等區的民辦小學教師去市教育局，要求將民辦小學改為公立小學，市教育局沒同意。部分人於是去北京告狀，造成火車在上海市郊的真如太平橋處被阻停駛。這些民辦小學的職工造反派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1年1月26日公佈，1953年1月2日修正公佈。

3 上海市總工會1966年8月30日《關於集體所有制工廠企業職工要求組織工會的請示報告》。

4 同上。

5 上海中小學原本公立和私立並存，自1956年後，私立學校全部被接收改為公立學校。但兩年後的1958年，正逢1949年後人口出生高峰的孩子們進入上學年齡時段，小學嚴重不足，政府於是鼓勵里弄和街道辦小學，即「民辦小學」。當時正值「大躍進」，「民辦小學」也作為全民辦教育、教育大躍進的成果。但民辦小學教師的工資和福利，遠不及公立小學教師。

後來在1966年12月12日，成立了「上海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小教司」）。要求將民辦小學轉為公辦，背後的動機，也是為了享受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與公立學校職工同等待遇。據上海市總工會當時的報告稱，到1966年8月30日，

目前，在工業、交通、財貿系統的企業中，還有27萬職工未批准享受勞動保險條例的待遇（目前享受比勞動保險條例待遇低的小勞保）。前一時期有200多單位提出了申請，最近也還繼續有一些單位要求實施。⁶

全國臨時工組織的成立

這股要求改善經濟地位的潮流，到1966年12月，被江青的一個講話一下推到了高潮。1966年11月8日，上海工總司成立的前一天，一個由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組成的全國性工人造反組織，在北京成立，取名「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成立當日，首批成員五十多人到全國總工會八樓會議廳靜坐，要求全國總工會承認，全國總工會領導人沒予理睬。12月18日江青接見北京大中學校造反派代表，講話中明確表示同情臨時工、合同工，說臨時工、合同工可以被隨時解僱是資本主義一套。12月26日晚，她又與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等一起接見全紅總代表。江青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她又一次批判合同工制度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制度」，並建議馬上以中央文革名義，對臨時工、合同工問題發個通知：讓他們參加文革；不得解僱他們，工資照發；對1966年6月1日以後解僱的臨時工、合同工，必須馬上讓他們回原單位工作，工資補發。江青又對被叫來接受批判的國家勞動部和

6 上海市總工會 1966 年 8 月 30 日給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請示報告《關於修改勞動保險條例的請示報告》。

全國總工會的兩個負責人說：「他們是毛主席的客人，你們要很好地照顧他們。」⁷ 1967年1月2日，全紅總與全國總工會、國家勞動部合署頒發通告，確定文革中不得解僱他們，已解僱的要恢復工作和補發工資，實際就是保障他們就業，解除他們的就業不安全感，這是臨時工的最大擔憂。

聯合通告簽署後，全紅總立即排版付印，但最終卻沒能張貼出去，因為中央決策層許多人反對。王力後來對此回憶：「上海成立跨行業組織都不行，這個變成全國性組織，怎麼得了？大家都到北京來成立全國性組織，代替中央了，這根本不行，後患無窮。」周恩來、王力等都反對，毛澤東也覺得全國性組織不行。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通知，不許成立全國性組織，已經成立的一律取消；2月17日再發通知，說全紅總與全國總工會及國家勞動部的這個聯合通知是非法的。全紅總寄予極大期望的通告就此夭折。但是，全紅總的行動還是產生了巨大影響。一場文革發動者萬萬沒有想到的當時被稱為「經濟主義妖風」的風潮，就這樣猛烈地颳了起來。

文革結束後，批判者將經濟主義風潮的責任算在江青頭上，其實，江青對臨時工的講話只是起了導火線作用。不是生活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很難理解和想象，以戶口和所有制為基礎的體制等級身份制度，對人一輩子命運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從江青講話看，她顯然是從毛澤東那裏得到相關言語。毛澤東無疑同情臨時工、合同工，他對分配制度從來有着自己「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烏托邦。⁸ 而江青從政治和經濟平等的角度，對臨時工等表示同情，在當時掀起非常大的共鳴和反響。她的講話立即被印成大字傳單發往全國。可以說，她的這個講話所

7 王年一 1988 年著《大動亂的年代》，第 154-155 頁。

8 王力在他所著的《王力反思錄》中認為，臨時工、合同工文革初期造反受到打擊，毛澤東支持他們對文革初期打擊他們的「資反路線」造反，而不是對制度造反。他認為江青混淆了二者。

造成的影響和震撼，不亞於張春橋同意上海工人成立跨行業造反派組織的簽字。她將久已積於人們心中對體制等級身份制的不滿猛烈點燃了。

在經濟主義風潮中，上海這個全國最大工業城市首當其衝。各種要求改善或提高經濟待遇的組織紛紛成立，最先是體制外的職工要求進入體制內，到後來，就連體制內的集體所有制甚至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也以各種名義成立要求經濟利益的組織。經濟主義風潮席捲了上海幾乎每一家工廠。

當時這樣的經濟主義組織有好幾類。

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轉正

第一類經濟主義組織，由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組成。這些體制外工人的造反，幾乎和體制內正式工人的造反同步。不過，他們批判的矛頭，更多指向不平等的經濟和政治待遇。當時在市總工會以及附近市勞動管理局的外牆上，曾貼出許多批判臨時工制度和控訴臨時工遭遇的大字報。

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形式，曾因終身職業制的加強而削弱過。六十年代初，國家主席劉少奇有感於鐵飯碗用工制度的弊病，建議擴大臨時工、合同工和外包工等用工形式，增加勞動用工制度的彈性和靈活性。1964年前後經濟好轉時期，上海許多工廠陸續招收了大量的臨時工和合同工，或將一些生產工序外發給社會閒散勞動力加工。雖然，這樣的就業形式更符合經濟規律，既擴大就業面，又增加用工的靈活性，但這些優點是對於用工企業的；對於被僱傭的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們來說，這使他們始終被排除在鐵飯碗體制的優越之外。

上海街頭最初出現臨時工遊行在1966年10月下旬，遊行者不是上海的臨時工，而是江蘇省蘇州市的臨時工。他們到管轄江蘇、浙江、安徽、上海等六省一市的中共中央華東局要求接

見。華東局辦公處地處上海西區康平路，負責人先是不接見，後來又遲遲不給答覆，這些臨時工便走上南京路遊行請願。這個要求自己政治和經濟權利的行動，最後無果而終，他們被華東局的幹部勸回蘇州，但他們的行動卻啟發和帶動了上海的臨時工等體制外工人。文革中批判劉少奇，劉少奇所主張的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等用工制度，更理所當然地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證遭到批判。最先批判勞動用工制度和工資制度的，正是這些體制外工人。他們的組織就是前面提到的全紅總。隨之在上海，這樣的組織也很快成立。

1966年11月9日工總司召開成立大會時，不少臨時工、合同工也去參加大會。會還沒開，一群穿着中式對襟服裝的女工，已經在會場裏不斷高呼口號：「我們要加工資！」「我們要轉正！」⁹ 安亭事件為成立全市性工人組織打開了禁區，臨時工也成立自己的組織。1966年11月中旬，安亭事件剛結束，上海的臨時工們馬上於11月19日，在市西的華山中學，也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開成立大會前，他們兩次前往工總司總部，希望工總司能派人參加他們的大會。但工總司態度非常冷淡，推說很忙，沒有去參加。¹⁰ 這個臨時工外包工組織，希望能像工總司一樣得到上海市委承認，但他們上千人往返於上海市委和華東局整整四五天，沒有得到回音。他們不撤隊伍，絕食、抗議，直到11月22日，中共華東局工業辦公廳主任黃宇齊，與市勞動管理局局副局長于永實，終於簽字同意他們的《六項要求》¹¹。這個《六項要求》集中體現了臨時工外包工們的願望：

9 原上海市總工會工作人員葉上鶯 1992 年對筆者的回憶。葉上鶯參加了那次大會，親眼看到這個情景。

10 《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原上海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組織部長沈福祥著，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10 年出版。

11 沈福祥著《崢嶸歲月》，2010 年出版。

- 一、承認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組織；
 - 二、承認我們今天的行動(召集大會)是革命的；
 - 三、取消臨時工、外包工等不合理制度。(積極支持將群眾意見向中央反映，請中央批示)；
 - 四、從今天起不得借任何借口辭退臨時工、外包工(黑六類除外)；
 - 五、召集全市臨時工、外包工大會，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
 - 六、文化革命運動中對已辭退的臨時工、外包工兩星期內極快復工，安排工作。(黑六類除外)。
- 附注：里弄集體事業中的一些不合理制度，有關部門應研究改革。¹²

這些要求中，除了「不得借任何借口辭退臨時工、外包工」外，其他幾條都是政治性的，比較務虛，沒有指向工資。

臨時工們召開大會，逼着幹部簽字。1966年12月26日江青講話後更達到高潮。江青在這個講話中，建議被解僱者馬上回原單位並補發工資，消息傳出，1966年6月以後被解僱的臨時工、合同工，紛紛回原來被辭退的工廠要求復工。如此造成有的工廠臨時工、合同工過多，特別季節性生產的工廠，窩工現象更嚴重；一些處於生產旺季迫切需要勞動力的工廠，卻又怕生產淡季無法辭退工人而不敢招工。¹³ 與臨時工相似的家屬工，絕大多數是女工。他們是全民所有制工廠職工的家屬，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被安排進配偶所在工廠工作，但不算正式工

12 上海市勞動局轉發的1966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華東局代表黃宇齊等，簽字同意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六點要求：「《(六六)滬勞企創字第114號》，1966年12月2日」。

13 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1967年2月15日給上海人民公社的報告《急需請示的幾個問題》。

人，工資很低，沒有社會保障和福利。他們要求和廠裏的全民所有制職工同工同酬。

「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不久，為避免被看作是為經濟造反，改名為「上海市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工司」），發展很快，最多時有40萬人參加，他們自己說「是上海僅次於工總司的第二大群眾組織」。¹⁴紅工司曾經參加1966年12月初上海色織二十四廠衝突，聲援工總司。他們希望以這個友軍行動得到工總司支持。他們幾次與王洪文聯繫，但王洪文和工總司其他負責人都無理睬他們。¹⁵這是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們的悲哀。他們本已處於工人的邊緣和底層，文革中希望通過造反改變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但本應是「階級兄弟」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對他們的處境十分冷漠，既沒表現出同情心，更談不上認同和支持。

紅工司在各區、縣都設組織。機關報是《紅工戰報》，但只在1967年的2月6日出了一期。而那時，已是反擊經濟主義風潮的尾聲，紅工司早就被作為經濟主義組織批判，大勢已去。這期小報的內容是表態式地批判經濟主義，與紅工司成立宗旨完全背道而馳。

紅工司後來被確認為是「鬧得比較突出」的經濟主義組織。而且文革中有材料，說他們有「大小卡車、汽車、吉普車、摩托車5輛，永久牌、蘇聯兩用車6輛，新舊自行車17輛，月票30章，僅一個多月就支用國家經費近9萬元」，「負責人挪用2000元」。¹⁶其實，當時其他造反派組織賬目也十分混亂，所用經費不會比紅工司少，只是很少被審計。例如「一兵團」，據一份材料說他們「據不完全統計，吃掉國家麵包、餅

14 沈福祥著《崢嶸歲月》，2010年出版。

15 同上。

16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年3月編寫。

乾計近1.5萬斤糧票，合人民幣1.32萬元，轎車費計算到1月20日，花了1170元……裝備有4輛各式新轎車、5輛機器兩用車、15輛自行車、3輛卡車」。¹⁷

紅工司不認為自己是經濟主義組織。上海紅工司的一位負責人文革後回憶，他們臨時工所求的只是穩定的工作。真正要求補發鈔票的，不是他們這些臨時工，而是工總司下面的造反隊。因為他們臨時工連談判的政策資源都沒有，他們甚至無法找到能夠支撐自己經濟要求的政策條文：

受這股潮流影響，紅工司屬下的造反隊也蠢蠢欲動，有的步工總司造反隊後塵，想如法炮製。但是，臨時工要學樣也難，因為臨時工沒有工資級別，沒有工齡，在一個企業工作的時間較短，長的二、三年，短的幾個月，完全沒有補發鈔票的口實，只能在以工作日計工資上做文章，於是提出要求：按固定工以月計工資，要求補發星期日休息的工資，這樣就使臨時工在限定的狹小範圍內也補得了一點少得可憐的殘羹剩飯。外包工就更可憐了，連這點也做不到。¹⁸

1967年2月18日，中央發文要求解散全國的臨時工組織，幾天後，紅工司自行解散。

回鄉職工要求遷回戶口

第二類經濟主義組織，由「回鄉支農」工人組成。

1958年大躍進後，連續三年經濟衰退，許多工廠開工不足或停工半停工，不得不動員家屬在農村，或能夠回原籍安家落

17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傳組 1967 年 2 月 28 日《傳單匯編》第三期：《把政治扒手戴祖祥揪出來示眾》。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8 沈福祥著《崢嶸歲月》，2010 年出版。

戶的城市職工退職還鄉，「為國家分擔困難」，許諾待國家經濟情況好轉，將優先請他們回廠復職。上海當時共精簡職工31.2萬人，其中18.3萬人回農村，12.9萬人回上海城鎮街道。大部份被精簡者是1958年以前參加工作的老職工，大多被動員回鄉；另一小部份被精簡者是1958年後參加工作的新職工，大多為上海市區原來的社會閒散勞動力，如職工家屬或個體勞動者等，被作為辭退對象。所有回鄉職工戶口都被改為農村戶口。¹⁹但實際上這些諾言只是權宜之計，許諾者沒有認真考慮過兌現的可能。1963年以後，國民經濟開始回升，但是適齡就業人口急劇增長，帶來愈來愈大的城市居民就業壓力，使得當政者根本無暇顧及這些已被動員去農村的當年職工。雖然上海也曾設法解決他們回鄉後的困難，例如將上海郊縣回鄉職工吸收進廠當臨時工，所得收入與所在農村生產隊四六分成，稱為「四·六工」，也稱為「亦工亦農」。1963年以後，上海以這樣方式，陸續安排了三萬餘名回鄉職工。²⁰但這只是杯水車薪，而且沒有恢復他們的城市戶口。

這些被動員回鄉的前職工，一旦離開城市和工廠，立即喪失了鐵飯碗的固定收入，以及作為城市居民的種種利益，更失去了上海城市戶口的體制身份。城鄉之間以及兩種戶口制度之間愈來愈大的經濟及文化差別，加上回鄉後立即遭受到的大躍進所造成的大飢饉，使得他們深刻地意識到城市戶口及鐵飯碗的寶貴。這些當初為國家分擔困難的回鄉職工，發現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錯誤，不但自己從職工變成了農民，從「城裏人」變成了「鄉下人」，而且自己的子女，也永遠變成了地位最低下的鄉下人。農村和城市，不但經濟政治資源極不平等，就連

19 以上數據引自《新上海四十年》，上海市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版。

20 上海市勞動工資委員會1966年12月15日給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中共中央的報告：《現在農村的精簡職工的安置意見》(稿)。

教育資源都反差極大。他們的子女要通過考大學再回城市，將付出比在城市讀書艱辛數倍的努力。他們只能將重返城市和工廠的希望，寄託在當初對他們許下諾言的幹部身上，而當初動員他們回鄉的幹部們也自覺理虧，市勞動局副局長汪力田說：「欠了精簡下放職工的債。」²¹ 那些當初動員他們回鄉的基層幹部們，更是懷着虧欠之心，毫無怨言地接受他們的批鬥。

與其他城市相比，作為老工業基地的上海，1958年前參加工作者，原來就佔了就業職工比例的大部份，大躍進後動員回鄉，只能以他們為主要對象。與此相對照，其他許多城市，原來工業基礎薄弱，大躍進時期為發展工業，招收大批農民，經濟衰退時期重點辭退對象是1958年後進廠的工人也即原來的農村人員。上海被動員回鄉職工因此認為：上海精簡人員工作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一份當時的文件說：「中央原來規定精簡城市人口的主要對象是『58年以後來自農村的新工人』。但上海在精簡時，篡改中央指示，把58年以前進廠的老工人也精簡回鄉（據了解，精簡的職工中，工齡在十五年以上的佔百分之七，四級以上的技工多達一萬二千餘人。目前已有五、六萬人回到上海，要求復工」。被動員回鄉者提出：當初答應將優先讓他們復工的諾言，根本沒兌現，「這是言而無信」。²²

1966年12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處書記王一平，以及上海市勞動局副局長汪力田，簽字同意這些回鄉職工「下廠義務勞動」。²³ 當然，說是「義務勞動」，實在就是這些下放工人希望索回上海戶口，改換體制身份的第一步。到1967年年初，當初被動員回農村的十八餘萬人中，共有超過五六萬人回到上

21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22 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急需請示的幾個問題》。

23 同上。

海。他們提出：「我們要復工」！「我們要飯吃」！²⁴ 1967年1月初，五千多名回鄉職工在南京路上連續幾天靜坐請願。1月下旬更是達到10萬，1月18日至21日，他們連續三天在人民廣場靜坐示威，要求恢復上海戶口，回上海工作。²⁵ 此外，還有一些當年被辭退的近十三萬職工家屬，雖然以後有一半左右陸續進了小集體所有制的里弄生產組或街道工廠，但文革中，他們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體所有制的原廠工作。²⁶

回鄉職工組織，較大的有「上海工人支農回滬造反總司令部」（簡稱「支農司」），成立於1966年11月底，在各區、縣都設有下屬組織。1967年1月6日，支農司曾經打算發佈一個「十條」，其中有幾條的內容顯然是支農司的核心要求：一、責令上海市各公安機關迅速將支農工人戶口遷回上海；二、支農工人立即回廠復工；三、支農工人按下放日期每月補發原工資30%補助金，等等。後來因內部意見不統一，沒有公佈。²⁷ 1月5日，支農司1600餘人佔領了本是內部旅館的上海大廈4個樓面81間客房，作為返滬工人的落腳處。他們要求將戶口遷回上海；要求市委有關幹部簽字同意他們在上海造反期間吃住費用由原工廠解決；他們提出自己回鄉以後生活極端困難，要求原單位給予經濟補助，等等。許多幹部儘管同情他們，卻拿不出解決辦法。因為基層幹部們沒有准予遷移戶口的權力，而且上海對遷入戶口一向卡得非常嚴格。

形勢對支農司越來越不利。1月1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一下頒佈了三個制止經濟主義風潮的通告，2月20日，在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工作的朱永嘉，被支農司揪去上海大廈，要

24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25 這個日期引自中共上海黨史研究室編纂《中共上海歷史實錄》。

26 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急需請示的幾個問題》。

27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求解決他們的戶口和工作，不解決就不准離開。朱永嘉被扣在上海大廈一連好幾天。他只能做說服工作，勸大家先回去，並答應向中央反映大家提出的要求，放在運動後期處理。「放在運動後期處理」，是《十六條》上的話，支農司對這樣空泛遙遠的承諾不滿，他們將批判朱永嘉的大字報貼滿附近的南京路，「打倒朱永嘉」的大標語，從上海大廈的樓頂掛到樓底；不遠處設在原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大樓內的火線指揮部辦公室也被砸。²⁸

形勢的扭轉在2月24日，張春橋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大會講話中，特地對要求回滬的支農職工，以及其他支疆、支內工人講了一段話，要他們回原地：「我把話說死了，是為了大家都死了心好辦事，才能盡快回去。」當晚，謝鵬飛帶人去上海大廈，想把朱永嘉接出來，結果所去的28人都被扣押。支農司將十個區的下屬組織全部集中到上海大廈附近，封鎖了通往上海大廈的外白渡橋，橋兩頭插着支農司大旗。當時連接楊浦區和市中心的公共交通是無軌電車，橋被封鎖，無軌電車又因為必須沿鋪設電纜的街道行駛而無法改道，通往虹口區和楊浦區的交通因此中斷，工人無法上班，釀成「上海大廈事件」。

張春橋要求盡快處理。第二天，同濟東方紅開了兩輛宣傳車去喊話，要求支農司放人並離開上海大廈，但廣播車剛開到北蘇州路口，車子便被支農司砸了，人員被扣。第二天，解放軍開了宣傳車去，支農司沒敢砸。解放軍的廣播車圍着上海大廈喊了整整一天話。第三天，市革委會派出機關幹部與解放軍，還有公革會的公安人員，一起衝進上海大廈，搶出謝鵬飛和朱永嘉等被扣人員，並在上海大廈內當場談判。支農司人員控訴他們「為國家分擔困難」而回鄉，回鄉後卻再無人問津的悲慘遭遇，說有的家庭賣血度日，有的家庭賣了自己的孩子，

28 謝鵬飛 2011 年 3 月 17 日對筆者的回憶。

還有人因飢餓而死。一些控訴者邊說邊哭。謝鵬飛和朱永嘉等都很同情他們，但是回上海恢復戶口和工作，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不要說他們沒有這個權力，就連當初動員這些人回鄉的工廠，以及工廠的上級主管局也沒有這個權力。他們只能反復重覆「放到運動後期處理」。

與此同時，26日與27日，《文匯報》連續發表文章，抨擊支農司，說其大方向錯了。2月27日半夜，上百名警備區軍人及公革會的公安人員包圍了上海大廈，首先將支農司的幾個負責人從床上抓起，銬上手銬，送去地處市西的上海少年教養所；然後一個一個房間，將其餘人員統統叫起到大堂集中，以工總司及其他群眾組織名義，宣佈解散支農司。與此同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已經調集30輛公交大客車，將他們按所來地區編隊，送去碼頭和車站，連夜遣送回鄉；隨後，將被關的負責人也強行送回鄉下。²⁹ 支農司從此不復存在。

支農司佔領上海大廈期間，共吃掉5.6萬斤糧食，單伙食費一項1.8萬元；上海大廈因被支農司搶佔住宿，損失租房費5萬元；³⁰ 還不算被佔領人員順手拆除帶走的床單、被單、毛毯和絲絨窗簾等酒店物品。

支內職工和支疆下鄉青年要求回城

第三類經濟主義組織，由文革前的支內職工組成。

作為全國第一大工業城市上海，歷年派出大量人員支援全國各地工業和文化建設，有些工廠或商店，甚至全部人員、全套設備遷去外地。六十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備戰，在遠離沿海地區的四川、貴州等省，建設了不少工廠，當時稱之為「大

29 謝鵬飛 2011 年 3 月 17 日對筆者的回憶。

30 《請看這一小撮人在造誰的反？》，載於 1967 年 2 月 26 日《文匯報》。

三線」；在距離上海不遠的安徽等省的山區也建造工廠，稱之為「小三線」。上海是這些「三線」的人員和設備供應的重要基地。但上海與內地生活水平差距，使向來追求舒適生活的上海人深感不適。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衰退後遺症，內地城市生活和山裏的工廠更遠比上海艱苦，即使是政府配給的糧食與副食品定量，也經常供應不足；加上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不適應，令所有內遷者後悔。文革中這些被動員內遷的職工，紛紛返回上海，而且許多都是闔家返滬。據載，僅儀錶、化工、第一機電這三個局，文革前兩年支內2.6萬名職工，1967年初返滬已近二萬。更有些內遷廠的原上海職工，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全部都回了上海，如西安變壓器電鍍廠1500名職工都是上海電機廠、上海電鍍廠遷去，全部返滬。貴陽永陽電表廠職工也都是上海遷去的，走得只剩廠長和黨委書記兩個人。上海江寧電機廠有近百職工原定調往江西，行李和家具已於1966年12月托運寄走，1月初都把寄走物件追了回來，不願再去江西。³¹ 返滬的支內職工批鬥當年動員自己內遷的幹部。說當初他們是被強迫動員去的，或是被這些幹部說那裏怎麼好而騙去的。現在他們要求歸還上海的戶口及上海的工作。

第四類經濟主義組織由「上山下鄉」、「支農支疆」青年組成。

六十年代上海為減輕就業壓力，曾動員許多當時被稱為「社會青年」的失業青年和剛從中學畢業的學生，去上海郊縣農場或遠在新疆的農場，這種動員大多是半強制性的，文革前後共動員去了約三萬人。文革中他們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將戶口遷回上海市區，不願再待在艱苦的農場或邊疆。如上海郊縣的長興島，各農場共有下鄉青年一萬多人，跑得只剩一百人，造成牛羊大量死亡。³² 此外1966年上海曾根據新疆要求，

3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32 同上。

將四千多名半工半讀學生分配去新疆工作，此刻也大都回了上海，要求將戶口遷回。

小商小販也造反

第五類經濟主義組織，由小商小販等個體戶組成。

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個體工商戶也開始「社會主義改造」。在計劃經濟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對個體工商戶、行商、經紀人等，統一按行業實行「歸口管理」：或者吸收進全民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或者按行業組成集體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或者乾脆動員回鄉。到1959年，上海還有小商小販等個體戶7萬多人。1959年至1961年經濟衰退時期，上海有些被精簡職工的安置工作沒有被落實，做起小買賣；此外還有部分職工家屬生活困難，也私下從事小買賣，上海無證經營者迅速增加，全市達9萬餘人。1963年上海對個體工商戶重新登記，核發營業執照4.5萬餘份。當時對個體工商戶的發展採取限制、壓縮方針。到1965年底換發營業許可執照時，全市個體工商戶共有3.6萬人。³³

這些小商小販雖然有上海戶口，但他們沒有穩定收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福利，和合同工等一樣，處於上海市民最底層。他們被視作「資本主義苗子」嚴格限制，加上貨源全部嚴格控制在政府手裏，他們的小買賣只夠勉強糊口，沒有發展希望。文革中他們也造反，提出1949年後，對工商業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是形左實右，說「小販頭上兩座大山—稅務局、專業公司」，「現在有三座大山：稅務局、工商科、市場管理所」。他們提出：

33 《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志》，上海市工商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寫，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出版。

貨源要大民主，不要國家過問……

熱門貨要優先照顧個體戶，後合作(即集體所有制的合作商店——筆者注)，再國營(即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商店——筆者注)……

國營公司批發部門商品進出要由小商販派代表監督……

福利金(按營業額提取0.2%的公開積累)不交了，過去交的要分掉……

只交營業稅，不交所得稅。³⁴

他們也提出轉換體制身份的要求。說市委對「資本主義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產物個體經濟，長期以來不予以徹底解決。從此把我們關在社會主義大門之外」，要求「把個體所有制變成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³⁵ 他們中比較大的造反組織，是成立於1966年12月19日的「上海市個體戶勞動者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個勞司」)，在上海十區和四縣都設有分部。

安亭事件後，從1966年11月中旬始，以上幾類人員成批造反，要求復工，要求轉正，要求改換體制身份，要求提高工資及社會福利保障待遇，「來勢很兇，不斷蔓延擴大，有的兩千人集會八天八夜包圍負責同志，不達目的不肯罷休」。³⁶ 這樣為各種實際利益成立的組織，僅在不久後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財務監督清理小組登記的，便有354個。³⁷ 此類組織名目繁

34 以上內容都是1966年1月初，南市、黃浦、閘北等區百貨行業的商販，分別向主管他們的專業公司提出的要求，轉引自《堅決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徹底揭發批判「個勞司」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負責人的罪行》，原文為打字油印件，無撰寫單位，無成文日期，但從行文內容看，筆者估計作者是上海工商管理局人員，成文時間應當在1967年3月以後。

35 《上海市個體勞動者革命造反司令部宣言》，上海市個體勞動者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1月6日。

36 中共上海市委1966年11月24日文件《滬勞委(66)發字13號》，市勞動工資委員會。

3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多。一些組織從名稱就可以知其目的：「革命單身職工造反司令部」：要求將配偶調進上海；「常住臨時戶口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將臨時戶口改為正式的常住戶口；「回鄉職工造反司令部」：要求戶口遷回上海並重新進廠工作；「支疆青年家長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將支邊子女調回上海；「住房困難戶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分配住房；甚至還有一個組織名為「墓屬革命造反員會」，要求歸還被政府或單位侵佔的私人墓地。這些組織都只是為某個目的臨時組成，目的達到便解散。

市委節節退讓

到1966年底，這股經濟主義風潮席捲整個上海包括上海郊縣。人們圍着各級幹部，不簽字就不給吃飯，不讓睡覺，不准上廁所，夜以繼日批鬥。面對越來越膨脹的經濟要求，各級幹部束手無策。他們若簽字同意各種要求，與他們過去一貫堅持的原則不符；但若頂着不簽字，又會招致「對抗革命群眾」罪名。

1966年11月6日，市委簽字同意教育局將民辦小學改為公立，市委在《將民辦中小學改為公辦的決定》上簽字。雖然簽字時，雙方同意工資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後期處理，但這是上海市委為了緩和矛盾，第一次做出的經濟上讓步。12月19日，上海市總工會同意吸收剛轉為公辦的小學教師入工會。³⁸

11月中旬，市委成立以勞動局長王克為首的工作小組，着手處理「四·六工」中的下放工人問題。經過兩次協商，決定從1967年起，工資100%歸下放工人，糧食、食油由生產隊供應，原定他們必須上交的5%公積金、公益金，改由國家支付。為此，需由上海地方財政每年撥款二百萬元。³⁹ 接着陳丕顯同

38 《上海市委是鎮壓小教運動的罪魁禍首》，載於「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編《小教造反報》1967年1月20日創刊號。

39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1967年3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意將地段醫院改為公立，加上國務院財辦曾發出一個對合作小組、合作商店可以改為國營的通知，一些集體所有制單位據此紛紛要求改變所有制。⁴⁰ 11月22日，黃宇齊與于永實，簽字同意臨時工、外包工六項要求，⁴¹ 前已提及。11月23日，上海市勞動局長王克在支農回鄉職工七條要求上簽字。⁴² 11月26日，上海市副市長宋日昌與上海電動工具廠職工簽字，承認「五八」類工資不合理。⁴³ 「五八」類，即1958年大躍進時期進廠的臨時工、家屬工。

11月29日，上海市委成立「勞動工資接待小組」，為首的是分管郊縣工作的副市長宋日昌、分管集體所有制工業的副市長石英，以及市勞動局局長王克等人。據說，曹荻秋對石英說「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搞一個全面方案」。因此這個小組曾打算「將全部集體所有制近六十萬職工改變為全民所有制，提高勞保福利，報中央文革」。但局勢的混亂，使得這個小組從一開始成立起，就遇到極大的困難，根本無法開展工作。⁴⁴

12月1日，宋日昌代表上海市委，同意郊縣下放工人和臨時工萬人大會要求，並同意將11月23日王克簽字同意的支農回鄉職工七條要求，作為正式文件下發。內容如下：

宋日昌同志代表市委同意下放工人、臨時工人萬人大會下列要求：

一、由市委王克同志簽署同意的「郊縣下放工人、臨時工

40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1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42 同上。

43 同上。

44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是大颶經濟主義妖風的罪魁禍首》，市委勞委紅色造反戰鬥隊，1967 年 6 月 27 日。

人聯合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三點革命要求，由勞動局立即下達郊縣各企事業單位。

二、凡目前在市屬、縣屬單位(包括集體所有制單位，下同)工作的下放工人、臨時工人在政治待遇上與基本工一律平等。

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單位領導不得用任何借口，刁難、歧視、打擊、辭退下放工人和臨時工人。

四、企業中下放工人、臨時工人(不包括亦工亦農)中一些不合理分配制度立即廢除。

五、對目前尚未安排工作的下放工人，臨時工人，凡有條件從事工業生產的，今後應根據國家需要，積極地、優先地予以安排。對喪失勞動力家庭困難的下放工人，應予以妥善安排。

六、關於下放工人、臨時工人的轉正問題，市委應立即呈報中央，按中央政策辦理。

七、同志們提出的其他問題，委託總司令部與市委協商解決，上述問題如有與中央指示不符合的，按中央指示辦理。

宋日昌同意

1966年12月1日

對上海市委來說，自工總司成立一個多月來，他們節節敗退，在經濟上作出部分退讓，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後努力。對於普通民眾來說，文化大革命發展到此時，才是到了真正關乎他們切身利益的層面，才給了他們為自己爭取實際利益的可能。但此時，市委的退讓仍有底線，即只是在用工等制度方面讓步。而這些讓步，除了「四·六工」的分配比例，大多數還沒有直接涉及到最現實最直接的利益——鈔票。即使是集體所有制改全民所有制，也仍將「工資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後期處理」。

1966年11月底至12月初，馬天水在北京參加工交會議期

間，王克就曾直接打電話向他請示有關勞動工資福利問題，馬天水答覆，群眾有些經濟要求，可以適當滿足他們。當時馬天水已經決定轉向，他可能認為，在經濟上的讓步，就是對造反派的支持，馬天水後來檢討說：

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交企業座談會後期，市勞動局王克曾同我通了電話，要求解答工資福利待遇問題。我說：「在不改變根本工資制度和所有制，在不影響大局的原則下，地方可以解決的群眾合理要求，可以考慮」。這句話，在當時情況下起了很壞的作用。我又錯誤地同意把街道工業的福利待遇在低於臨時工的前提下可以解決，我同意過在不增加工資條件下有些日工資可以改為月工資，並在日工資改月工資過程中對街道工業中少數低於街道工業本身最低工資標準的，可以調整到最低標準。學徒工中簡單工種縮短期限的問題，也講過經過通盤研究後可以考慮。我同意改變下放工人收入上交社隊不能少於百分之五。我同意過科學單位外出串聯。⁴⁵

1966年12月11日，解放日報事件剛結束不久，陳丕顯主持市委委員會議，這是陳丕顯養病後，第一次主持各部委、區委負責人會議。會上陳丕顯宣讀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指示：

現在很被動，要爭取主動，對他們的要求，要盡量解決。……

群眾運動政治鬥爭必然要衝擊到經濟問題，看來上海群眾運動中經濟制度、體制等問題勢必衝破，看來是頂不住的。……

45 馬天水 1967 年 4 月 4 日下午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熱烈歡迎革命的領導幹部起來造反大會」上的講話《我的檢討》，載於 1967 年 4 月 7 日聯合版第 4 期《大會專刊》。

要獨立思考，獨立作戰，靈活處理。⁴⁶

此時，陶鑄在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谷牧的《匯報提綱》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派的指責批判，只好作檢討。12月下旬，毛澤東要周恩來主持「生活會」批判陶鑄；會後，雖然陶鑄的職務沒有變，但地位已經大大下降。⁴⁷ 陶鑄顯然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政壇，向毛澤東要求「到下面去工作」，⁴⁸ 並向下邊打招呼。12月10日這天，陶鑄給上海市委打來最後一個電話說：「以前對你們幫助不夠，我自己也有錯誤，替你們出了些壞點子，對不住。今後，不要靠中央保，現在靠誰保都保不住。」他還讓陳丕顯和曹荻秋以後不要再打電話給他了。接到這個幾乎是最後告別的電話，曹荻秋非常難受，對人說：「心都涼了」。⁴⁹

12月10日左右，曹荻秋對市委勞動工資接待組說：「對待紅衛兵經濟上可以放寬些，爭取政治上主動」，「我們以前工作所以被動，主要是經濟上卡得太緊」。⁵⁰ 13日，市人委在市人委大禮堂召開接待站工作人員會議。宋日昌要求：「不要搞對立，造成重大事件，發生了問題都要市委負責的。」市勞動局局長王克說：「工人、農民起來鬧革命很自然先是經濟。」他傳達了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的指示：

46 馬天水 1967 年 4 月 4 日下午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熱烈歡迎革命的領導幹部起來造反大會」上的講話《我的檢討》，載於 1967 年 4 月 7 日聯合版第 4 期《大會專刊》。

47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 675—676 頁。

48 同上，第 675—676 頁。

49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50 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經濟上能解決的解決，不能解決的不許願。只是集體轉國營，下放工復工，臨時工轉正不行，大鳴大放爭辯後解決。……

要搞幾條槓槓，大的不能解決，但不能對立。問題不能解決，一、二星期後就起變化，堵不住。⁵¹

散會後，市勞動局即對集體所有制企業和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的勞保福利制定新方案，數日後完成。

12月15日，市勞動工資委員會向中央打報告，希望對群眾要求最集中、壓力最大的一些政策性問題給予明確答覆，市委甚至以書記處名義發電報給中央，要求張春橋回上海指導處理一系列問題，但等不到回音。在得不到中央明確指示的情況下，12月25日，在法華鎮路一個辦公地點，副市長宋日昌、市勞動局局長王克、副局長汪力田等，起草關於將集體所有制改全民所有制和臨時工、外包工勞動福利問題的兩個方案。⁵² 以及《在與群眾協商時對幾個具體問題的暫行處理意見》，共七條。內容主要包括：集體所有制單位人員的病假、產假、工傷、困難補助等勞保福利待遇，可根據本單位經濟條件，先制定一些低標準的暫行辦法；臨時工的勞保福利待遇參照上述辦法；外包工人事關係暫由企業代管，勞保福利待遇參照臨時工；日工資改月工資；學徒期按中央規定辦，過長的可由群眾討論，各局自行決定；精簡人員在中央沒有相關指示前，企業不能自行安排復工；縣屬單位人員的交通費補貼可參照市區規定，市區集體所有制單位人員的交通補貼可根據本單位經濟情況，參照國營企業規定。⁵³ 這七條報馬天水，馬天水同意。

51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5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53 《在與群眾協商時對幾個具體問題的暫行處理意見》，原文為打字油印件，無發文單位，但在另一份手寫底稿上，寫有「打印 60 份，請於 26 日上午打好 汪力田 66.12.25」（汪力田為市勞動局副局長）。

香山路會議

12月底，王克同意將1962年精簡的1958年以前老工人，於一個月內安排工作。曹荻秋聽說後，認為不妥。但是，12月30日，他見到宋日昌時，宋告訴他，王克已經簽了字。曹荻秋要宋轉告王克。絕不能這樣做。而此時，正值臨時工、外包工準備召開全市大會，曹荻秋希望了解外包工制度的來龍去脈。他約了王克。與此同時，前面章節已提及，市委接待站負責人杜淑貞和關健。曾經打電話給曹荻秋，反映說接待工作難於維持，到處逼着她們簽字，她們實在不知該如何頂下去。曹荻秋要杜淑貞也參加會議。⁵⁴

1966年12月31日深夜12時至1967年1月1日，曹荻秋在香山路中山故居召開會議，參加會議者，除曹荻秋外，還有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副市長宋季文、宋日昌、張承宗，市委副秘書長杜淑貞，以及勞動局長王克等八人。⁵⁵ 曹荻秋說：「現在這些問題，請示中央也沒有用，還是自己先幹起來吧！」⁵⁶ 會上，王克為自己的簽字作解釋。王克認為，過去精簡這些工人確實有不當之處，而且許多人回鄉後，生活一直很困難，按照上海歷年安排勞動力情況看，安排六七萬人工作還是有潛力的。王克並說為此馬天水已簽發了一個電報報告中央。宋季文則認為目前工廠勞動力不是多了，而是不足，認為可以安排。曹荻秋原來反對王克簽字，聽他們說明理由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但不同意在一個月內就安排這些回鄉職工工作，要王克另作較長時間的具體安排計劃。王克又提出，社會青年要求安排工作，如何處理？曹荻秋說，都要安排有困難，可根據往年

54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5 同上。

56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經驗，適當安排一些。王克還提出，街道工業要求改國營怎麼辦？曹荻秋答覆可以先戴帽子，其他不變。曹荻秋後來說自己之所以這樣答覆，是因為：

文化大革命以前舊市委曾研究過街道工業的性質，從它的產品由國家調撥，原料由國家供應，利潤上繳地方財政等方面都應肯定它的性質是國營，但為了把這些工廠辦為半工半讀式的新型工廠，我們決定暫時不宜宣佈為國營性質，以免在工資福利方面引起問題。⁵⁷

會議的內容被歸結為五條：

- 一、1958年以後精簡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廠安排工作；
- 二、社會青年要積極安排工作；
- 三、街道工業可以先戴國營的「帽子」，適當增加勞保福利；
- 四、郊區五類地區的工資可以考慮升到八類地區的標準；
- 五、長期臨時工和外包工改為長工。⁵⁸

這個會，後來被批判是「香山路黑會」，說這個會是貫徹陳丕顯的意見：「經濟問題放鬆些，不要頂」。工總司的岑麒麟以後也提到這個香山會議，1967年1月10日他臨去北京參加全國反對經濟主義大會時：

當時收到了二本日記本(似應為「筆記本」——筆者注)，據說是宋日昌、宋季文的，是在元旦香山路開會時的記錄。內容有關經濟主義的。這兩本日記是怎樣搞到手的，我原來

57 曹荻秋 1967 年 3 月 12 日《我的檢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就不清楚，只記得是當時參加會的財政局的人送來的，是誰不清楚，日記內容我也沒有看過，只記得裏面有「經濟上不要克得太緊」。

我們把二本日記交給周總理秘書，他們收下後，沒有下文。⁵⁹

香山路會議後的兩天，1967年1月2日，市委勞動局根據香山路會議精神召開幹部會議，傳達曹荻秋指示，制定了兩個方案：《關於1961年-1963年精簡回鄉支農職工和辭退的里弄工、臨時工以及社會待業人員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救濟問題的初步意見(草案)》，《關於當前若干工資待遇方面問題的初步意見》。並宣佈立即付諸執行。⁶⁰ 1月3日宋季文向市委傳達五條，貫徹到外貿、商業二局、市經委、計委等所屬單位。⁶¹ 而對郊縣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的分配和積累關係，市人委農業辦公室主任對各縣農業局說：「今年生產大隊不要向生產隊提留積累，⁶² 不要引火燒身，自找麻煩，明年買農業機械可以向銀行貸款。」⁶³

勞動工資政策，從來牽一髮而動全身，市委不會不知其中深淺。許多處於第一線的局長書記們，最初一直頂着輪番批鬥不肯簽字，就是知道一旦開了口子，後果不堪設想。市委推出這個不久為自己添加罪名的下策，顯然是亂了方寸。從曹荻秋的檢查看，市委幹部們很同情那些生活困難的體制外職工，以及已經成為農民的下放職工。造成這些問題，一是因為體制，

59 岑麒麟 1978 年 1 月 3 日《交待關於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的問題》。

60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6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62 農村人民公社當時是「生產隊、生產大隊、公社」三級集體所有制。

63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二是當政者說話不算數，積下許多矛盾。但是，在這樣一個非正常的混亂時期，試圖解決這些矛盾，無疑點燃了危險的炸藥包。

港務局首先補發鈔票

前文所說的幾大類組織，目標主要在體制身份，他們掀起的社會影響巨大。但他們畢竟不是正式職工；或者雖是正式職工，但已支內支邊去了外地，沒有了上海戶口。這些體制外和非上海戶口的造反者，所影響的主要是上海的社會秩序。真正使上海的生產和經濟秩序受到巨大衝擊的，是來自體制內正式職工的經濟要求。上海市委在經濟政策上節節退讓，最初還只是對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以及回鄉職工的要求妥協，而且主要是在復工和就業保障方面。但這些體制外工人一旦取得勝利，他們的行為馬上被體制內工人們效仿，經濟主義風潮很快向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蔓延。文革剛開始時，人們的要求沒有直接指向經濟。最初的物質要求與造反活動還算有關係：活動經費、辦公用品、交通工具等，都只是政治要求的附屬品。但很快，許多組織提出的要求越來越物質化。

據記載，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務局所屬第九裝卸區部份學徒工，在搶「黑材料」時，發現一份有關學徒工工資的上級文件。對照這份文件，他們認為自己的學徒期被定長了，於是到上級管理局的北方區海運管理局去造反，要求補發轉正的工資差額，局黨委書記李廣簽字，同意補發一年。⁶⁴ 根據不久上海一些銀行職工給毛澤東、周恩來的一份特急電報反映，港務局學徒工這次補發工資內容是：「藝徒原學習期三年，現改為二年，普遍補發一年差額，滿期後工資並改按『新』標準補

64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發」，⁶⁵ 第九裝卸區為此共發出9.5萬元。⁶⁶ 九區學徒工的成功馬上被港務局其他裝卸區的學徒工仿效。其中，第四裝卸區一次補發近四萬元，每人平均補發三、四百元，最多拿到上千元⁶⁷。當時上海全民所有制企業正式工起點工資每月39元，對這些工人來說，這顯然是一筆巨大收入。

這是上海經濟主義風潮的一個重要升級。在此之前，逼着當權派簽字的，主要還是體制外的臨時工等，人們的要求還沒有直接涉及到補發鈔票。海港青年工人成功地迫使當權派同意補發工資，而且一補發就是一年。這個消息一經傳開，各單位在職職工紛紛起而效仿。十幾年來只能被動地等着黨和政府分配利益的職工們，一旦發現自己能有主動爭取經濟利益的機會，馬上尋找各種理由與當權者談判。幾天之內，這股風便迅猛地席捲了幾乎所有的工廠和企業。所有的局長、處長、科長都成了寶貝，被人們爭先恐後地奪來搶去，逼着在寫着各種經濟要求的紙條上簽字。上海北方區海港，更是因為工人都離崗去找幹部簽字，當天便全區停工。⁶⁸

各級領導幹部在這股經濟主義風潮前束手無策。許多幹部過去都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或工人運動領袖，有着與企業主和國民政府談判的豐富經驗。但他們自己成為政府或企業領導後，卻完全沒有了與群眾談判協商的能力。過去，除了幾年一度的統一加工資外，即使同情職工，他們也沒有隨意增加工資

65 傳單《上海南市區中華路15號人民銀行部分工作人員給中央的電報》，上海市人民銀行小東門分理處革命群眾，上海市南市區人民銀行「滿江紅」革命造反團，1967年1月6日，發報人吳言濤(蓋章)。

66 這個數字引自紅衛兵小報《東方紅》1967年1月24日第7號的《簡訊》；而在1967年1月28日第7期的《東方紅》第六版的《粉碎敵人的新陰謀》一文中，這個數字是「九萬四千八百元(不包括上北京的費用)」。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上海東方紅總部」編輯。原件為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67 同上。

6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或福利的權力。現在，市委鬆了口，群眾又逼得緊，加上或者是對工人處境的同情，或者是希望能以合作的姿態表示自己對文革群眾運動的支持，許多幹部簽字同意群眾的各種經濟要求。

體制內職工的經濟要求

在這場經濟主義風潮中，如果說體制外的非正式職工的臨時工，要求的是體制身份平等；那麼體制內的正式職工，要求的則是經濟分配平等。從筆者所能收集到的材料來看，正式職工的經濟要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認為過去評定的工資級別不合理，要求補發工資。許多人提出，本單位的領導在過去加工資時，沒有按照有關文件辦理，壓低了工資標準，所以要求按當時文件所規定的標準，重新評定自己的工資級別，並補發這些年的差額。如上海圓珠筆廠工人，提出過去評級不合理，要單位領導同意，將凡工資低於1963年該廠平均工資者，一律提高到平均工資水平，並自1963年始補發，如此共補發了七萬多元。⁶⁹ 以同樣理由，上海市郵電管理局1958年招入的家屬工，逼着勞動局副局長汪力田簽字同意工資由30元調整為41元；盲啞福利工廠逼着市民政局幹部簽字同意將平均工資從30元調整為50元，提高70%。⁷⁰

又如鋼鐵行業，1958年市裏曾經招收過一批青年，先讓他們修築上海沿海的海堤，然後轉到當時新建的幾個大鋼鐵廠工作。這批工人提出，多年來技術升級評定不合理，12月底，市委有關幹部簽字，同意這批工人的技術級別，一律從一級半工

69 傳單《上海南市區中華路15號人民銀行部分工作人員給中央的電報》。

7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升到四級工，並補發三年的工資，平均每人補發八百元。⁷¹

補發工資風潮中，許多是學徒工提出。國務院規定學徒工的學徒期限，可以依工種的繁簡，分為技術工三年、熟練工兩年，簡單工半年。上海有些單位卻一律規定為三年。⁷² 學徒期三年的技術工種的技術級別，最高八級例如機械金加工工種；學徒期兩年的熟練工技術級別，最高六級例如油漆工、裝卸機械的操作工；半年的簡單工種沒有技術級別，例如起重指揮工、清潔工。學什麼工種是被分配而非自己的選擇，學徒工沒有工資只拿18元津貼，滿師後起點工資42元。那些熟練工種的學徒期，被從兩年延長到三年。這使熟練工的學徒感到自己不僅在學技術方面吃虧，而且在經濟方面也吃虧。於是許多熟練工學徒紛紛要求按國務院規定，縮短學徒期並補發工資差額。前面所提引發上海在職職工經濟主義風潮的港務學徒工造反一事，即起因於此。上海第二商業局1967年初曾補發工資63.7萬元，主要便是用於學徒轉正期三年改兩年這一項。⁷³ 當時上海此類組織較大的有「五八兵團」，由1958年進廠工作的青年工人組成，要求糾正過去三年的學徒期並補發工資差額。

自1958年以後，職工工資增長速度緩慢，1958年上海全民所有制職工，月平均工資是70.71元人民幣；而在以後幾年最高，也只升到1964年的70.78元；到1966年，又降到66.53元。⁷⁴ 每次加工資的決定權都在幹部手中。1949年以後一次又一次運動，尤其是1957年「反右」、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以及隨即而來的在幹部中「拔白旗」，許多幹部成了驚弓之鳥，不敢為民眾說話，在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政策掌握上，寧左勿

71 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72 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急需請示的幾個問題》。

73 上海市第二商業局1967年6月6日《關於颳經濟主義妖風的情況匯報》，(67)滬二商財王字第70253號。

74 上海市統計局編：《1949年—1978年上海市國民經濟統計資料》。

右、寧緊勿鬆，埋下了許多不滿和矛盾。文革中這些幹部成了走資派，那些對過去工資評定不滿的工人，得以有理由要求「糾正工資評定中的修正主義路線」。

正式職工的要求之二，是改變體制身份：集體所有制要求改成全民所有制，小集體所有制要求改成大集體所有制，等等。然後根據改變後的身份補發工資。

上海當時共有集體所有制職工60萬人。成員以民辦小學教師為主的造反組織「上海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小教司」），要求將集體所有制的民辦小學改為全民所有制的公立小學，教師按公立學校標準發放工資和福利費。1966年11月上旬，市委同意民辦中小學改為公辦；1967年1月6日，張承宗副市長簽字同意，民辦業餘學校教師月工資從22元增加到43元。⁷⁵和民辦小學類似的還有地段醫院的從業人員，也要求改公辦。⁷⁶12月中旬，陳丕顯簽字同意。陳丕顯說：「民辦中小學已經改了，地段醫院也可以改，又不是生產單位，改了沒有關係」。⁷⁷還有上海的人力裝卸運輸工人，要求將他們「統一歸口」，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1月10日陳丕顯簽發同意人力裝卸運輸工由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⁷⁸

正式職工的要求之三，是補發或增發各種勞動福利費用或勞動保護物品。如交通補貼費、早餐費、晚餐費、加班費、洗澡費、有毒有害工種營養費等各類津貼，以及工作服、工作帽、工作棉大衣、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臉毛巾、肥皂、套鞋等勞動保護用品。其中，有些是低福利的集體所有制職工向全民所有制企業福利的攀比，有些則是企業五十年代曾經實行

7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76 上海在五十年代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將遍佈全市的私營診所，逐步統一合併為聯合診所，到六十年代又調整為集體所有制的地段醫院。

77 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11 月編印。

7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過，後來被取消或降低了標準的。1959年至1962年的經濟衰退時期，許多工廠緊縮開支，削減工人的勞動保護費用，諸如延長工作服發放周期、縮減或降低勞動保護用品發放範圍或標準、減少夜班工人的夜餐津貼發放對象、降低有毒有害工種工人的營養津貼標準，等等，一直到1966年國民經濟好轉後仍未恢復。這些勞動保護用品或津貼費用是筆不小的隱性收入。文革伊始，許多工人理直氣壯地要求恢復原有的勞保待遇。上海第二商業局便為此補發了9.5萬元。⁷⁹

例如根據勞動保護有關條款，有些有毒有害工種，原來每個工作日可有一份價值0.14元的牛奶，作為營養補貼；1959至1962年的經濟困難時期以「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將1962年以後進廠工人的牛奶取消，代之以每個工作日發0.10元工廠食堂的菜票，作為營養津貼。工人們覺得勞動保護標準被降低，要求恢復牛奶供應。⁸⁰ 又例如發放勞動保護用品，黃金海工作的國棉三十一廠，以發勞動保護用品為名，給機修工、車床工等有關工種，每人發一雙大頭皮鞋，作為車工的黃金海也發到一雙，但卻不是以往車工穿的那種厚底高幫大頭皮鞋，而是可以日常穿的黑皮鞋。黃金海後來去問是哪裏發的，回答說是根據紡織局的指示發的。⁸¹ 還據說，甚至連陳丕顯的警衛員，也每人發了價值80元的衣物。⁸²

第四是瓜分資金。如年度生產資金，工會基金等。邑廟區扎排組將1963年以來所積累的5萬元生產基金全部分光。個別合

79 上海市第二商業局《關於颺經濟主義妖風的情況匯報》。

80 筆者在1968年底被分配進上海的工廠當油漆工人，這是小組的工人告訴筆者的。油漆屬於有毒有害工種，1962年以後進廠的工人在1967年初曾經很短暫地恢復過每天早晨一杯牛奶的待遇。

81 這是黃金海文革後告訴筆者的。

82 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作企業的職工還抽回入股股金，等等。⁸³

第五是要求發放各種文革活動經費。如串聯費、宣傳費、袖章費等；或要求提供宣傳工具如擴音器、喇叭等，交通工具如轎車、摩托車、自行車等；點心如麵包、餅乾、月票；還有報銷市內交通費、外出用餐費、半夜餐費，會場費、照片費、電話費、外出調查費等等。這方面費用開支非常大，據當時對輕工業、教育、商業、勞動等4個局調查統計：4局共有297個群眾組織，從1966年11月上旬到1967年2月底，將近4個月時間花去經費55.6萬元。又據市糧食局統計，從1966年11月下旬至1967年2月5日，全市糧食供應共增加300萬市斤，大部分是供各群眾組織的點心和開會吃掉的麵包。其中光是益民食品四廠就欠糧20多萬市斤；而市教育局從11月下旬到2月5日共吃掉麵包餅乾6700多市斤。⁸⁴

還可以列出許多內容，但主要是上述幾種。

上海經濟生產危急

經濟主義風潮攪得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上海一片混亂。

上海幾大港務裝卸區，六千多工人幾乎全部停工，據統計，1967年1月初，上海港離開生產崗位的工人達5900人。大家都去找幹部簽字，還有許多人乾脆趁亂不上班，樂得休息。上海港務裝卸工大多由臨時工和四·六工組成，他們不上班去造經濟反，上海港幾乎全部癱瘓。自1967年1月1日起，各港口紛紛停止發運貨物，日裝卸量從日常的9萬噸下降到3.5萬噸，停泊貨輪無人裝卸，港口物資嚴重積壓。從1967年1月1日至9日的

83 傳單《上海市區中華路15號人民銀行部分工作人員給中央的電報》。這個電報中提到的邑廟區，1960年已經撤銷，不過原文如此。

84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1967年3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二市斤等於一公斤。

九天中，大批中外運輸船隻泊港時間超過規定期限，平均每天約有七十餘艘中外輪船無人裝卸，有一天停了114艘船，上海港幾乎癱瘓。大批中外運輸船隻泊港時間超過規定期限，為了賠償這些輪船的非生產損失，這九天中一共虧損幾百萬英鎊。1月4日，有艘希臘船因超過規定時間兩個多小時才能解纜開航，船長將中國國旗倒掛以示抗議。一個英國船長大副向中國的駐船員說：「我今年來過三次，一次不如一次。這不是一天天好起來，而是落下去」。

鐵路運輸也嚴重不暢。自1966年12月31日至1967年1月7日，8天中，上海到北京的直達客車都在中途受到阻攔，沒有一列開到終點站；而從1967年1月1日至9日：

上海開往南京、杭州方面的客車，按計劃是每天21列，實際開出的每天平均只有17列，而且誤點、中途停車事故每班都發生；開出貨車，按計劃應為23列，實際開出平均每日3列。貨物裝卸方面，裝車計劃為650輛22,742噸。實際平均只有72輛2,615噸；卸車按計劃也只完成11%左右。3日到8日，南京、杭州方面開出的列車，每天平均有52列停在沿途各站，無法進入上海站。⁸⁵

長江航運局三十一艘大駁輪和六條拖船停工數天；寶山縣運輸公司全部四十多條船(3600噸位)，從1966年12月28日起停了半個多月。到11日，上海十個郊縣運輸公司輪駁隊更是全部停航。

鐵路運輸和港口裝卸癱瘓，工業原材料和生活資料無法運進上海，上海的生產、生活危在旦夕。電力用煤、生鐵、木材等重要物資積壓在港口，造成上海工業原材料嚴重緊缺，生產受到重大影響。許多重要工業部門面臨停產，僅輕工業局系

8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統，就有一萬名工人被迫停工待料。1月下半月，上海庫存生鐵只剩12.1萬噸，僅夠用半個月。煉焦製氣的煤精量少質差，甲醇庫存只剩150噸，工業鹽的庫存僅餘十天用量。最緊迫的是煤存量。全市七個電廠，存煤平均只夠用三天。其中望亭發電廠最為嚴重，存煤量只夠用一天半；原來小山般高的煤堆幾乎快要鏟完，已經開始在鏟底煤了，該廠不得不將十一個爐子停了五個，致使發電量從每天400萬度急劇下降到200萬度。而楊樹浦發電廠到1月9日，也只剩兩天的存煤。1月上旬上海正常電力需要量為96.6萬千瓦，但實際發電量曾一度降至60萬千瓦以下。沒電就沒水，自來水供應也受到嚴重影響。受到影響的還有糧食供應，1月上旬的糧食每天到貨量只能滿足上海日銷量的70%。

各區、縣、局的幹部，為了躲避被批鬥和強迫簽字，都盡量躲藏起來，上海的生產無人指揮。生產工人紛紛「造不合理的工資制度反」，無心工作。上海的生產連續大幅度下降。在工業生產領域，工人大批離崗，生產車間一片蕭條。1月上旬停工的化工工廠及重要車間有11個。1月計劃鋼產量24萬噸，因大批人員離開生產崗位，焦炭供應不上，上旬生產陷於停頓；上鋼三廠因大批化驗人員外出串聯，六個轉爐停了五個。紡織行業1967年初的缺勤率達10%，國棉十七廠，2400工人停工，持續一星期，損失百萬元。輕工業局所屬562個工廠中，有308個完不成1月份生產任務。上海機械廠6000名職工全部停工，上海第三機床廠也全部停工。

在上海鐵路局，「一些機車司機、票務員、扳道員、信號員、裝卸工都受了蒙蔽，停工去造經濟反。那時北站竟四門大開，無一人驗票」。

郵電局和市內電話局40%的職工離崗，僅積壓的裝拆移工單就有三千餘張，九千多具電話被竊被損，電話欠費近40萬元無人催繳，市內通訊隨時有中斷的危險。

上海市海洋漁業公司的198艘漁輪平均每天只有五、六對

出海。全市魚及水產品的庫存量只有9萬擔，每天供應市場只有一千多擔，不到平時的十分之一。

而在上海郊縣農場，因大量人員外出或返滬，直到2月農田裏還是白茫茫一片。在崇明島的向陽農場和躍進農場，大批棉花沒人收摘，爛在地裏，當時估算有17多萬斤棉花未收進倉庫，40多萬斤棉花腐爛變質，1.5萬畝水稻沒有脫粒，因黴爛或被野鴨吃掉的有11萬多斤。

人們提出各種名目的經濟要求，逼着幹部簽字後便馬上去銀行提現。銀行提款越來越大，幾乎被提空。在北方區海運局所屬上海地區各單位，從1月1日到9日，發出現金148萬元；但日裝卸量卻由9萬噸猛降至3.5萬噸。

在上海鐵路分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全局共簽字63份工資福利協議，金額高達3050萬元；該局1961年技校畢業生每人補發工資1500元。在上海第三鋼鐵廠，1958年後轉入鋼廠的青年工資級別一律從一級半升到四級，平均每人補發三年升級工資800元，共補發60餘萬元。老工人也因青年工人升級而普遍調整級別，又補發了工資近130萬元。在上海內河航運公司周家渡船廠，僅18個工人的補發工資差額便達2.26萬元；有對夫妻，兩人共領到補發工資4128元。在上海第二商業局，對16萬職工以各種名義發出現金118萬元。下面是商業二局1967年所作的支出表格，可以看出當時資金發放內容：⁸⁶

經濟風主要項目	發出金額(元)	佔全部發出數%
1.企業職工補發工資	637,576	54%
2.外出串聯	181,990	15.4%
3.補發臨時工工資	79,803	6.76%
4.藝徒服裝費	40,600	3.44%

86 上海市第二商業局《關於颳經濟主義妖風的情況匯報》。

5.支農人員費用	52,014	4.4%
6.增發勞保福利費	66,767	5.65%
7.補發早點費	28,249	2.4%
8.其他	94,315	7.95%
合計發出金額	1,181,314	100%

經濟主義風潮很快從市區蔓延到郊縣城鎮。川沙縣補發工資等費用支出136萬元，金山縣支出100萬元，嘉定縣支出52萬元。川沙縣財政收入為此下降30%。「嘉定縣有個工人要求從1953年起補發追加工資，總數竟高達萬元。」由於市委和華東局領導簽字同意農村外出合同工的勞務副業收入由原來的公六私四改為95%歸己。農村務農人員與務工人員以及合同工之間的收入立即顯出差異：

寶山縣劉行公社沈宅大隊有個30多人的縫紉組，如按此辦理，每人每年平均可分現金1400元，而同等勞動力的社員，全年實做380個勞動日，卻只能收入現金285元，相差5倍。同時，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也嚴重影響郊區的年終分配。寶山縣羅店公社金星大隊杜家橋生產隊，全部現金3,600元，而退還給外出工上交集體收入需6,000元，社員年終不但分不到現金，還倒欠2,400元。該公社鎮南大隊每個勞動日值因此從去年的七角二分下降到只有三角七分。……

許多公社及農場人員脫產、停工進縣城和市區，成立各式各樣的行會組織，如：「初小畢業生造反司令部」、「某某屆農業中學畢業生造反司令部」等等，僅川沙縣就有一百幾十個之多。⁸⁷

8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6年上海212.44萬名全民所有制職工，月工資總額1,4100萬元。⁸⁸而據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967年4月統計：上海在1967年1月，僅增加、補發職工工資、獎金、津貼、福利費，分掉工會節餘經費、集體公積金、股金，以及發放串聯費、物資等等，就耗資3,500萬元至4,000萬元。⁸⁹相當於月工資總額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其中，華東電業管理局原來每月工資總額33萬，1967年1月5日一天便為所屬工廠提取補發工資128萬元，相當於該局4個月工資總數。

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銀行門前都擠滿了提款人群，僅1月3日這天，就有幾百個單位到銀行提款。⁹⁰全市銀行1月1日至1月7日，共支出3800萬元，⁹¹最多一天支出現金達2800萬元。⁹²由於提款人數多、數量大，上海各銀行現鈔幾乎被擠兌一空。

拿到各種補發款項的人們，馬上趕往商店購買久已渴望的商品。於是本來就短缺的計劃經濟市場貨源更捉襟見肘。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中百一店(上海第一百貨商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總銷售額比上月同期增加25.1%，比上一年同期增長36.3%，尤其是高檔商品銷售量猛漲。1月8日早上，中百一店一開門，早已等候在店外的人潮一擁而進，

一下子有三百多人衝向地下室購買縫紉機，有一百多人衝向自行車，對於手錶更是緊張，往常不大有人買的四千至

88 《上海職工情況統計資料》，上海市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79年版。

89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967年4月《關於清理經濟風時所發款項並要求退還的工作情況總結》。

90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1967年2月27日《各產業局會議記錄》。

91 這個數字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92 這個數字引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1967年3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五千元的進口手錶也幾乎銷售一空；高級呢絨衣料的出售量更是成倍增加，顧客購買商品普遍有種緊張心理，不怕不合用，不怕價錢貴，就怕買不到。⁹³

許多商品脫銷，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搶購囤積煤球甚至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以致郊區及市中心此類商品接連脫銷。

由經濟風又引出搶房風。文革中最初搶占民房的是紅衛兵，佔用資本家或黑幫的房子作為司令部、總部辦公處。地處南京西路上的靜安新村被稱為「頭頭新村」，因為被造反派組織佔作辦公室的房子非常多，成天可見成群的造反派頭頭們進出弄堂。不久搶房風發展為搶佔他人住房自己居住。1966年12月31日一夜之間全市颳起搶房風。房管部門掌握的待分配的新舊空房和造反派組織加封未用的空房，一下子全被搶占。此種搶佔住房的行動，大都借用單位造反派名義，有些人開着卡車去搶房子，甚至一家三口組成一個造反派，去佔領一棟房子。自1966年12月30日自1967年1月3日，除了文革運動對象住房30萬平方米被搶佔外，5天內全市所有待分配空房也都被搶佔一空。長寧區天山房管所原有1,600間空房，可住1,200戶人家，一個星期之內全部被搶光；徐匯區天平街道有200多戶人家搶佔房子，以後始終不肯退還。還有人串聯組成一個全市性的「住房困難戶革命造反司令部」，天天到房管部門去討要使用證、房票簿和鑰匙。有些人怕日後被追究，發明「連環搶」：自己搶了房子搬去，又叫熟人住進自己原來房子，並類推之，試圖造成無法退房實際。在這股搶房風的威脅下，有些私房主眼看房子不保，就讓親友搶住進來，堵住外人來搶房。也有一些危險房屋的業主，搶得好房子後，主動上交原來的危房表示革命。這波

93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搶房風事後核查有19,578戶，房屋使用面積361,737平方米。⁹⁴

公共交通的月票也被造反，原來限定在市區線路使用的6元一張的月票，1967年1月，二個星期之內，擴大月票使用範圍至近郊線路，月票價格仍是6元。市公用事業管理局和該局所屬公交公司的領導

簽署了近郊二十條路線通用市內月票，其中一月份以來，先後開放了近郊十三條路線通用市內月票，促使月票發售量從四十萬張猛增到六十萬張(除去退票共為五十七萬四千張)。……

並且需增加客車二百輛。⁹⁵

上海周邊的嘉定、閔行、吳淞、浦東、川沙、羅店、松江、南匯、周浦，都通了月票。這些地區大多是上海的工業衛星城鎮，許多大中型工廠建在那裏，工人們平時住在工廠宿舍，配偶和孩子住在市區，周末才能由廠車免費送回市區，同家人團聚一天。如果自己平時要回市區，那就只能自掏腰包買公交車票，但如果天天來回，一個月的車錢相當於半月以上的工資。⁹⁶在通月票的那一陣子，大家下班後都高興地天天回市區，享受家庭團聚的天倫之樂。

這場經濟主義風潮颶遍全國，但只有在工商業最發達的

94 《上海房地產志》；《上海房地產志》編纂委員會編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95 「工學運動調查通訊組」《堅決制止鬧近郊月票的歪風》，載於紅衛兵小報《東方紅》1967 年 3 月 10 日第 15 號，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上海東方紅總部編。

96 以閔行工業區為例，通往市區的公共汽車單程票價 4 角，一個月以 26 個工作日計算(那時是每周一天休息日制)，每月來回車票錢是 20.8 元，還不算市內車錢。而當時全民所有制工廠起點工資(即一級工人的工資)是每月 42 元。這還不算多的，松江等地回上海的車費比閔行地區更高出 20% 至 30%。

上海，後果是災難性的。經濟風蔓延至幾乎所有生產企業乃至商業、文教、公交、房管等其他行業，甚至還有繼續向上海郊縣農村人民公社蔓延趨勢：在市郊、城鎮及農村生產隊，許多郊縣企業及社辦企業等，和城裏一樣加工資加福利，發放串聯費，許多生產隊甚至將第二年的生產資金也分光。外地各行業若向上海看齊，後果將不堪設想。

生產大滑坡，金融失控和商品市場短缺，使本已處境困難的上海市委更陷絕地。上海市委「經濟問題放鬆些」的打算，給自己增添了被打倒的又一條堅實罪名。⁹⁷

經濟風中的工總司

在整個經濟主義風潮中，從可以查到的資料來看，工總司總部除了要求文革活動經費外，沒有提出過明顯的經濟要求。而且在後來制止經濟風的行動中，起了帶頭作用。

1月7日，工總司總部在黃金海工作的國棉三十一廠召開會議，討論正在迅速蔓延的經濟主義風潮，王洪文提出必須立即制止，他要求工總司馬上出傳單。當夜，由王腓利等起草，經王洪文審定，以工總司名義發出《緊急通令》。⁹⁸傳單呼籲職工不要脫離生產崗位，不要搶佔住房，不要為工資造反，鬥爭方向要對準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走資派。這是到現在為止筆者見到的上海第一張呼籲反對經濟主義的傳單，估計也是全國第一張。全文如下：

97 本節資料，除了已注明之外，全部引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1967年3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及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98 王洪文要求出傳單並親自審定，是王腓利告訴筆者的。

緊急通令

在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大好形勢之下，鬥爭進入愈來愈尖銳複雜階段。目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貫地、頑固地堅持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一步耍弄花招，唆使大批工人上北京，大開經濟物資方便之門，向中央施加壓力。把重大的政治鬥爭引向單純的經濟鬥爭，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的表現形式，是一個極大陰謀！他們妄想使工人群眾搞單純的經濟鬥爭，從而轉移我們鬥爭的大方向。我們造的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而不是首先造「錢」的反，同志們千萬提高警惕，千萬別上陳丕顯、曹荻秋之流的當！為了牢牢地掌握我們的鬥爭大方向，更深入地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砸爛陳丕顯、曹荻秋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部所屬各級組織必須堅決執行下列決定：

1. 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毛主席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決不允許大批人員脫離生產崗位上北京(必要時只能派少數代表)。

2. 任何人不准私自佔用國家房屋，所有空房均由國家有關機構根據群眾的具體情況，立即着手進行合理分配。凡已佔用者，必須立即退出。

3. 工人同志們應以長遠的革命利益為重，切不可首先為加工資而造反，這是錯誤的！我們是政治掛帥而不是經濟掛帥！如有以工資福利為借口而停止生產或停止營業者，我部造反隊各級組織必須立即勸阻。(如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破壞國民經濟，我總部將採取必要的革命行動，一切後果，由其本人負責。)

4. 再次重申：我們的鬥爭大方向是針對上海市委、華東局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為了鞏固無產

階級政權。政權一定要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掌握，這是一切問題的中心！否則一切暫時的、眼前的經濟利益都是空的！

切切此令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這張傳單登在1967年1月14日的《工人造反報》上。刊登後，王洪文又召集工總司在各區、縣、局以及系統的聯絡站會議，貫徹落實傳單精神，要求大家回去動員工人，將領到的鈔票統統退回去。王洪文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不退回去，那就不要參加造反隊！」⁹⁹ 黃金海發到那雙高幫大頭皮鞋後，「我將這雙皮鞋退了回去，還說服大家都將皮鞋退了」。¹⁰⁰ 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在國棉十七廠托兒所當保育員，是個臨時工，於是當時不少人認為王洪文是臨時工組織的司令。但許多人都回憶說王洪文當時反對經濟主義的態度是堅決的，雖然對臨時工們會有同情，但沒有成立和參加過臨時工組織。¹⁰¹ 工總司總部的戴立清也是臨時工，也未參加臨時工組織。但身為臨

99 王腓利對筆者的回憶。

100 黃金海對筆者的回憶。

101 上海市總工會 1979 年編《市總工會機關「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6 年 6 月—1972 年 5 月)》中說王洪文妻子參加過一個臨時工的組織，還一度和其他人一起，在 1966 年 11 月底駐扎在上海市總工會 5 樓會議室 8 天 8 夜，要總工會的副主任周炳坤簽字，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此外，上海市總工會工作人員沈靜波 1992 年對筆者回憶，當年他曾經接待過來總工會造反的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崔駐扎在 5 樓會議室近兩個星期。筆者在 2010 年的一次飯桌上，特地就沈靜波的這個回憶問過崔根娣本人，崔說沒有此事。此事是別人帶的頭，她跟在後面去過一次總工會，但只是一次，而且沒有住在那裏；她不參加這類組織，因為王洪文如果知道，不會允許，王洪文當時是反對經濟主義的。工總司的戴立清、黃金海等人也對筆者說崔根娣沒有參加過經濟主義組織：一方面他們印象中的崔根娣，是個不關心政治、平時低調的女工，另一方面他們當時也沒有聽說此事。

時工的他，當時對臨時工組織是同情的，與他們的關係也比較近。¹⁰²

工總司當時正在初創階段，組織體系非常鬆散，下面的造反組織各行其是，總部的權威還沒有建立，對下面的組織沒有多少約束力。所以工總司下面所屬的一些造反隊，或多或少投入了這股經濟主義風潮，參加者大多是工廠的普通工人。

小結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千百萬人參加和投入的運動，人們必然會表達和爭取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政治及經濟要求。文革初期對大多數幹部的批鬥，既源於上層政治鬥爭的需要，也源於底層群眾對壓抑感和不滿情緒的宣洩。十七年越來越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日益嚴重地束縛着人的主觀能動性，掌握實權的幹部越來越成為他人命運的主宰。毛澤東反走資派的號召，使群眾得以對這些幹部進行清算。因此，當文化大革命體現於群眾對政治的參與和對幹部權力的制約時，上層的導向與底層群眾的願望，是相互交錯而又相互影響的。但是，文革畢竟是上層政治鬥爭產物，與1949年後所有的群眾運動一樣，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始終只能是對黨中央及毛澤東決策的定向響應，很難充實和發展自己的主體意識，一旦對文革目標有所逾越，便會遭到禁止。充分顯現文革發動者所關心的，只是政治層面元素，無暇也沒有關注民生的真正願望。

經濟主義風潮是文革中最具自發性和自覺性的群眾運動，是在「打倒走資派」的階級鬥爭話語下進行的經濟和身份要求。如果說，1966年下半年的造反，是對政治等級身份的反

102 陳丕顯的回憶錄說戴立清曾經帶領上海的臨時工去北京，筆者詢問過戴，戴說沒有此事，他那一時期沒有去過北京。他還說自己當時已經是工總司成員，而且在總部工作，不會再去參加臨時工組織。

抗；那麼，經濟主義風則是對體制等級身份的反抗，是文革中真正自發的群眾運動。不只是爭取政治名份，更是要求改變被分配的體制身份。而正是由於其完全的自發性，所以不能容於文革。而多年被壓抑積累的經濟願望爆發於一時，也使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與經濟能力無法承受，因此只存在不到一個月便被禁止。

經濟主義風潮，是底層民眾對剝奪人的主動性和選擇權利的的不滿體現，是對等級身份制所造成的經濟不平等的宣洩，也是對社會平等和公正的呼喚。但耐人尋味的是，儘管經濟風矛頭指向計劃經濟體制，反對以行政手段將人劃分等級，反對以行政手段分配經濟利益；但是這些反對行為的思維方式，仍未跳出計劃經濟範疇。沒有一個人提出，應該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由少數握有分配大權的當政者決定大多數人的身份和物質利益的制度。人們反體制的目的，只是為了使自己能進入體制，或更多地享受體制內的特權，只是要求體制對自己網開一面。人人痛恨體制身份所帶來的不平等，人人卻又希望自己能擠進體制身份行列。人們反對因戶口制度和用工制度所造成的體制等級身份，卻不反對因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而劃分的政治等級身份。紅工司在與市委簽訂的要求中，在「不得辭退臨時工、外包工」條款及安排文革中被辭退的臨時工、外包工復職等條款後，都特地注明：「黑六類除外」。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臨時工等體制外工人的遭遇，得不到體制內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有着穩定工作和收入的全民所有制職工，在爭取自己政治權益的同時，對處於社會邊緣的臨時工等漠不關心，認為他們「為私造反」。工總司拒不參加上海臨時工組織紅工司的成立大會，在「反擊經濟主義妖風」時，又毫不手軟地將他們取締；保守派工人也從未關注過他們。而紅衛兵們，對不平等的體制身份也高度認同，參與了對臨時工

們改變身份要求的鎮壓。沒有人想到這些工人應該享有與自己相同的一切權利。

人們在這一時期中提出的要求，雖然當時被作為經濟主義風潮否定，但其中許多要求以後還是得到關注。如學徒期限，自1968年文革中第一批新工人被招收進廠後，便按工種技術程度分為半年、二年、三年不等；工會會員和非工會會員在福利待遇及家屬勞保方面的差別，1971由上海市勞動局發文取消；與此同時，上海按照國務院1971年1月30日下發的《關於改革臨時工、輪換工制度的通知》，將1966年以前進廠的臨時工，分期分批，全部陸續轉為正式工。這些政策變化，不能不說與文革初期這場規模如此之大的工潮般的經濟主義風有關。不過，政府的解決辦法，也只是回到體制中去，讓臨時工等體制外職工轉成正式工；而且文革時期對人的身份控制，比文革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上山下鄉，使得體制身份更是完全被強制分配，沒有絲毫個人選擇自由。工資差別也被縮小到只有工齡差別，而無技能等個人努力程度差別。

臨時工們終於等到了轉正，而支農回鄉職工則無此幸運。1960年向他們許下以後讓他們重返城市的諾言，直到二十年後，即1980年以後才部份兌現：允許他們的子女中，可有一人「頂替」當年父母的戶口和編制身份，回上海工作。不過那已是文革結束後。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比起成年人，年輕的紅衛兵們在文革初期的經濟要求簡單得多。除了要求發放與文革有關的串聯費及活動經費外，沒有發現這些到處造反的學生，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經濟主義風潮中，提出過屬於自己的經濟要求。與工廠的工人要求提高或擴大福利標準相對照，筆者尚未發現有學生要求提高助學金額或擴大助學金發放範圍。此外，在當時大、中學畢業生由所在地區或學校統一分配工作的制度下，許多面臨畢業的大、中學生和紅衛兵領袖們，沒有趁機要

求為自己分配社會地位高或工資福利待遇好的職業，而是響應毛澤東的上山下鄉號召，帶頭去到貧困的農村和邊疆。此中固然有長期接受紅色正統教育，輕信承諾的愚忠，以及不知柴米油鹽稼穡之艱辛的幼稚；但更有年輕一代追求理想主義的一面。

第十七章

中央賀電 上海為毛澤東的文革找到出路

《緊急通告》的產生

其實，就在經濟主義風潮颳起之前，中央許多負責人就已對文革後果提出過警告。1966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兼計劃委員會副主任谷牧匯報11月至12月間召開的工交座談會情況。谷牧在《匯報提綱》中提出大家共同的擔憂：一是生產受到極大影響；二是有相當一部分工人提出經濟要求：集體所有制職工要求改為全民所有制，臨時工、合同工要求改為正式工，前幾年在經濟困難時期精簡的職工要求復工，等等，都涉及體制，關乎全局；三是各類組織林立，將會引出派別對立的嚴重惡果。¹ 這三條正是文革的瓶頸，到1967年初文革的走向正在驗證前兩條，不久還將驗證第三條。但是，國務院務實派的擔憂和警告，遭到毛澤東和文革派的激烈批判否定。毛澤東顯然低估了這場運動必將導致的混亂程度，低估了正在和即將到來的災難性後果。到1967年初，局勢的混亂幾乎不可收拾。

而此時的上海一片混亂：工業交通癱瘓和半癱瘓，銀行幾乎被擠兌一空。一些造反組織感到了情況的危急，紛紛走上街頭試圖阻止惡化的時局。1月7日，工總司、紅革會、炮司和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等群眾組織的造反派，來到地處外灘的中國

1 王年一 1988 年著《大動亂的年代》第 138 頁。

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與銀行員工們一起勸告前來提款的人群。² 1月7日，工總司發出制止經濟風的傳單，前面章節已提及。幾乎就在這張傳單印發的同時，另一部份造反派也在行動，他們是耿金章等人。1月8日，耿金章在接到經濟形勢危急的消息後，與二兵團總部幾個負責人商量，決定立即召集造反派組織開會。他們通知各造反組織下午到衡山飯店開聯席會議。耿金章先給張春橋打電話，希望張春橋和姚文元能參加會議。秘書何秀文接電話說：張春橋這天下午已經安排了其他會議，分不開身參加。耿金章打電話給王洪文，王洪文也說下午有別的會議。徐景賢派出朱永嘉代表機關聯絡站參加會議。耿金章又去找陳丕顯，希望他能出席會議。陳答應不但自己參加會議，還將把各部、局負責人也叫來。

1月8日下午，全市造反派組織與上海各局負責人聯席會議在錦江飯店8樓召開，到會群眾組織三十多個。耿金章和陳丕顯坐在前排，部局長們坐在後排。陳丕顯讓朱永嘉坐到自己身邊，請他記錄到會代表發言。耿金章埋怨和批判部局長們亂簽字，翻來覆去地逼着陳丕顯宣佈撤他們的職。陳丕顯不肯，說對部局幹部的任免要通過中央，我個人沒有權力撤他們職。³

到會的其他組織針對形勢議論出多條意見。朱永嘉將眾人的發言和提議匯總，歸納為十條。第七條針對搶房風，是朱永嘉自己提出的。他以後回憶：「這條我感觸最深，因為我的資本家父親全家被掃地出門，房子被佔，父母都只能居住在親戚家，而且有病在床，生活上的顛簸弄得我很頭疼，所以專門寫上這條。」⁴ 定稿後，大多數組織都簽字。工總司沒人來。耿金章代工總司簽字，並將自己的二兵團簽在工總司下面，第二

2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1967年3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3 胡永年1977年12月9日。

4 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談〈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位。但工總司下面幾個組織認為耿金章只能代表二兵團，不能代表工總司總部。於是有人再去總部，范佐棟在，他代表工總司簽了字。⁵ 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組織「紅工司」的負責人費敏章也到會，但是沒有簽字。費敏章說這張傳單會給臨時工、外包工帶來壓力，提出要增加條文，以示對紅工司和外包工有所區別，「耽誤了簽字」。⁶ 而據另一份材料記載，當時紅工司的代表不肯簽字，結果被趕出會場。與紅工司一起不肯簽字的，還有回鄉工人造反組織支農司和農司，也被一並趕出會場。⁷ 這三個組織，不久都被作為最典型的「經濟主義組織」遭到解散和批判。

最後在傳單上簽字的共23個群眾組織。修改定稿後的傳單，定名《緊急通告》，朱永嘉讓陳丕顯最後審定：

在各個群眾組織簽字的時候，我請陳丕顯把文件再看一遍。因為他畢竟是市委的負責人，應該經過他審定，並問他這個文件是否叫《緊急通告》好，他說可以。我還問他開頭這段關於形勢的分析如此表述是否可以，他看了一下，說可以。前面關於形勢的分析是把三停與經濟主義的問題都歸罪於以他和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並且定性為「上海市委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目的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以物質利益來腐蝕群眾的革命意志」，把罪責都推在他們身上。這個口徑我是根據1月6日打倒市委大會來的，反正把一切壞事都往市委頭上栽，而好事都是造反派的。⁸

5 范佐棟文革後曾對筆者說，當時有人將這張傳單送到工總司總部，他代表工總司簽的字。黃金海回憶說，當時有人認為耿金章不能代表總部，所以再去找到范佐棟的。

6 沈福祥著《崢嶸歲月》，2010年出版。

7 以上資料均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8 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談〈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各個群眾組織在《緊急通告》上簽字後就散會了，陳丕顯也離開了。朱永嘉和兩個紅衛兵留下，對文字作最後整理，所以定稿的筆迹應該是朱永嘉的。⁹ 此時已經是晚上9點多，朱永嘉和一起修改《緊急通告》的紅衛兵趕回武康路2號，將稿子交徐景賢，並匯報會議過程。徐看後說「可以」，簽字後，打電話通知《文匯報》派通訊員來取去，送《文匯報》付印。¹⁰ 第二天1月9日，這份傳單刊登在《文匯報》上，《文匯報》編輯部並加了《編者按》。《緊急通告》全文如下：

《緊急通告》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機關幹部、學生，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又要堅守生產崗位，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

二、呼籲全國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動起來，說服、動員在各地串聯的上海工人、機關幹部、企業事業工作人員、藝徒等立即回滬，搞好本單位文化大革命，超額完成一九六七年生產計劃。

三、凡過去由各單位當權派簽發的外出串聯證明，即日起一律作廢，各單位發出的大量串聯費(車費除外)，一律由當權派簽發者負責追回(可分期退還)。

四、除必要的生產經費、工資開支、文化革命經費、辦公經費及其他正當經費外，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流動資金，自即日起一律凍結，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眾聯合組織監督市級和各級財務機關執行，以保證國家經濟不受損失(群眾在銀行的存款除外)。

五、為了避免轉移鬥爭大方向，關於工資調整、工資

9 朱永嘉、金光耀 2011 年《朱永嘉談〈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10 同上。

補發、福利待遇等，原則上放到運動後期再作處理(特殊情況請示中央另作處理)。

六、學生與工農相結合，是學生改造世界觀，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當權派為了挑起工人對學生的不滿，破壞工學結合，對學生進行「和平演變」，竟發放較高的勞動工資，這完全是修正主義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發放。

七、所有公房及沒收的資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財產，運動後期由國家統一安排，不准任何個人強佔公房，違者由公安局查處。凡慫恿居民搶佔公房者，按情節輕重，依法處理。凡已住入搶佔來的房屋者，限一周內搬回原處。

八、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凡是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生產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運動中破壞社會治安、打人行兇、搶劫和偷盜別人財物者，應立即交回贓物，並按情節輕重依法處理；以後重犯或屢教不改者必從嚴懲處。

九、上述各條，希各單位造反派組織和全市廣大革命群眾立即貫徹執行，開動一切宣傳機器，進行宣傳教育。

十、上述各條，責令市委、公安局照此執行，凡有違犯上述各條者，立即以破壞文化大革命查處。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二兵團

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革會)

上海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紅衛軍指揮部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

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

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醫務界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上海醫藥工業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

上海造紙工人革命造反總部
上海市學徒造反革命委員會
上海革命藝徒造反軍第三兵團
上海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小教革命聯合造反總司令部
上海工人造反聯合委員會
紅衛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員會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
赤衛軍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東北地區指揮部
上海市反到底聯絡總部
上海工人安亭兵團
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三兵團
民族造反司令部黃浦區指揮部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同濟大學東方紅總部
上海第一醫學院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
上海交通大學革命造反指揮部

幾天前由紅衛兵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以十幾個群眾組織的名義向全市人民呼籲，希望大家回到生產崗位上去。而這份有寫作班成員參加起草的《緊急通告》，雖然仍是以群眾組織的名義發佈，但口氣已經不是呼籲，而更像責令，儼然行政命令；而且最後第十條還責令市委和公安局「照此執行」。這是市委的權力和權威已經轉移的標誌。

1967年1月9日，這一天正值《人民日報》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刊登在《文匯報》上的《緊急通告》被安排在第三版，完全被頭版頭條轉載的《人民日報》「編者按」壓住了，沒有引起人們注意。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一樣，誰也沒有料到《緊急通告》將引起毛澤東又一次重視和高度讚揚。

張春橋第二天看到這份報紙。自《文匯報》被接管後，張春橋對《文匯報》所有稿子都一律不預審，說讓造反派大膽工作；所以他事先不知道《緊急通告》一事。待他看到後，便不滿意地說：怎麼搞的，剛發表了個《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又來了個《緊急通告》，現在是執行的問題，總要有人去做事。那麼多文告，光發號召怎麼行？！¹¹ 張春橋還質問徐景賢說你為什麼讓朱永嘉去參加這個會議？徐景賢聽後十分緊張，回到武康路2號把朱永嘉狠狠批了一頓，說他不該擅自代表機關聯絡站在通告上簽字。¹² 徐景賢說張春橋生氣了，弄得朱永嘉也惴惴不安。¹³ 張春橋又讓秘書何秀文打電話給陳丕顯，問是怎麼回事。陳說是自己和造反派一起搞的。當天晚上張春橋去《文匯報》給造反派代表講話，不提這天已經發表的《緊急通告》。

張春橋謹慎地沿着毛澤東的思路開展上海文革，毛高度讚揚《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張便盡快落實這張傳單所呼籲之事，所以他不贊成再發其他通告，分散精力。張春橋沒有料到，這張在他看來起不了什麼作用的普通傳單，將為毛澤東解決文革的又一個大困境。

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在經濟主義風颳得最厲害的高潮，上海各銀行清晨還沒開門營業，門口就擠滿了人，直到晚上關門，人群還不散。各單位為種種補發款項大宗提錢，嚴重影響了市民信心，造成恐慌心理，個人存款戶也爭先恐後地擠兌提款。

最早站出來反對經濟風潮的，除了那些不肯簽字的幹部，

11 朱維鈺 1976 年 12 月 26 日證詞；2007 年朱永嘉在對筆者的一次漫談時，也提到這個細節。

12 朱維鈺 1976 年 12 月 25 日證詞。

13 徐景賢 2007 年發表《毛澤東與上海「一月奪權」》。

就是銀行職工。從能夠查到的資料看，銀行職工是最先向中央告急的。1967年1月6日，上海市人民銀行小東門分理處部分職工，向毛澤東和周恩來發出特急電報，請求毛澤東採取措施：

這幾天，在我們的銀行櫃面，發生了一個新的情況，這一情況發展極快，由於我們面對這一情況不能作出正確判斷，特急電向您老人家匯報，請求指示。……

在上海目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革命群眾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對一些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發起猛烈開火，其中主要的有工資和集體積累兩方面，有些單位在揭發的同時，採取了行動，於是大量的補發工資和分配積累的情況發生了，造成一股「補發風」。……

這股風目前正在發展，現在這股風影響下，有的單位生產資金被佔用，貨幣大量投放衝擊市場，有的人在拿到工資後，出現了揮霍現象。我們認為，這種情況是不符合當前鬥爭大方向的，而且也不利於人的思想革命化。……

為此，我們現立即向全市革命群眾宣佈，凡屬以上性質的款項，在您老人家沒有指示以前，一律暫時停止支付，一俟您老人家指示後，立即堅決遵照您老人家指示貫徹執行。¹⁴

眼見銀行有被提空危險，其他各分理處的銀行職工，也像小東門分理處職工一樣焦慮不安，紛紛向市分行和市財政局告急，希望上級機關採取斷然措施，制止這股風潮。有些銀行職工走出櫃台，勸導人們不要盲目提款；有的分理處採取拖延辦法，宣佈現金提完，要提款明天再來；有的乾脆暫停現款支付。1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根據市人委計劃委員會意見，派員赴京向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告急。經總行向國務院報告，中央立即擬頒發《關於反經濟主義的通知》。

14 1967年傳單《上海南市區中華路15號人民銀行部分工作人員給中央的電報》。

《文匯報》刊登《緊急通告》的第二天，1月10日上午，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和市財政局工作人員的造反組織，以及紅革會炮司、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等紅衛兵組織，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召開座談會，還邀請上海內河航運公司、立新造船廠等八個單位的財會人員參加，商討如何制止日益蔓延的經濟主義風潮。會上決定成立「上海市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簡稱「反經總部」）。這是上海工人、幹部和紅衛兵自發組織的一個反經濟主義機構。

反經總部給自己定的主要任務是：一、審批非正常提款，除正常銀行業務之外，其他支票一律不支付；二、動員返滬人員回鄉或回原地；三、取締經濟主義組織；四、開展反經濟主義宣傳。¹⁵ 反經總部動員了幾萬名學生去鐵路和上海各港務裝卸區，幫助裝卸和疏散碼頭積壓物資，¹⁶ 又組織五百多名學生往崇明農場搶收農作物；更多是說服退還錢款，動員工人們回廠。這些工作，對恢復經濟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反經總部工作人員共七十多名。從名單看，紅衛兵佔大半：47個學生。此外還有銀行職工和大學教師各1名，區勞動局幹部25名，市工人文化宮工作人員8名，基層單位職工18名。¹⁷ 總部辦公室最初設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不久遷往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總部下設秘書組、組織組，調查組、接待組、寫作組、政策研究組等機構。¹⁸ 經費及辦公用品，由市總工會所屬市工人文化宮提供；車費、餐費和工資，由工作人員的原

15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1967 年 3 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16 筆者當年是中學生，雖不是造反派，但也曾和一幫保守派同學一起去上海港務局第五裝卸區，吃住在碼頭工棚兩個星期，參加疏散積壓物資的勞動。

17 上海市財政局檔案 361：《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成員登記表》，1967 年 2 月。

18 財政局檔案室卷號 361，轉引自上海市總工會《工總司大事記》編寫組 1984 年 12 月《工總司大事記》：說明材料之六《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上海市總工會收藏。

單位發放；紅衛兵除領取車餐費外，沒有其他報酬，都是義務工作。

最初的名單中不見工總司的代表。其實，工總司總部的岑麒麟當時參加了成立會議。1月10日他經過外灘，只見一路上各銀行分理處門口都擠滿人，市分行門前更是人山人海。他擠進去了解情況，表示要跟銀行造反派聯繫。此時正值銀行職工和紅衛兵等開會商量成立反經總部，岑麒麟參加了會議。但岑麒麟只是參加了這個成立會，後來就沒有再去過反經總部。¹⁹直到1967年1月20日，國務院來電要反經總部派代表去北京，向周恩來當面匯報上海反經濟主義情況。岑麒麟聽說，便以反經總部代表身份，赴京參加全國反對經濟主義大會。反經總部的工作受到周恩來表揚，張春橋開始重視他們工作，經常要他們匯報情況；工總司和機關聯絡站派去張福昌、孫海明和朱惠民，主持反經總部工作。²⁰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反經總部成為公社下面的一個部門：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而此時，中央關於制止經濟主義風的文件已經下達，不少經濟主義的組織紛紛往市革會登記解散。於是2月7日，公社成立了上海市財務清理監督小組，下轄13個清理接管小組，對群眾組織進行賬目和財務清理。此項工作專業性很強，不是紅衛兵們能勝任的。2月12日，總部將清理工作全部移交給由市財政局科層人員組成的財務監督小組。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3月初，市革委會調整辦公機構，按職能設立各辦公室，反經總部的工作內容因與市革會財貿組重覆，3月17日撤銷，人員全部回原單位。²¹

19 岑麒麟 1978 年 1 月 3 日《交待關於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的問題》。

20 上海市總工會《工總司大事記》編寫組 1984 年 12 月《工總司大事記》：說明材料之六《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21 同上。

鐵路造反派接管調度所

1967年1月1日周恩來要求盡快恢復上海生產交通的電話指示傳達後，上海造反派除了去昆山說服赤衛隊員們返滬，首先設法恢復鐵路運輸。1月4日下午，工總司開會討論如何恢復生產和交通，會後馬上派人去火車站恢復通車，準備發出14次特快列車。但上海列車段乘務員大多加入赤衛隊，康平路事件後他們大批離崗，乘務員人手嚴重不足。紅衛兵們當起了臨時列車乘務員，1月6日由司機張生堂²²駕車出發。這是上海鐵路癱瘓後第一列全程開往北京的客車。而在此之前，所有火車都是開開停停，到半途就停下，沒有一輛開得到終點。火車開到北京時，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這趟14次列車，文革中被譽為「第一列紅色列車」。

張春橋1月5日接見工人造反派時，要造反派抓要害部門，先把生產抓起來。參加會議的謝鵬飛回去後，就組織造反隊到上海鐵路的各單位，尤其是運轉單位，例如開火車的機務段、客車服務的列車段、列車檢修的檢驗段，還有負責編組轉運列車的編組段，恢復生產，疏通運輸。從1967年1月的1、2、3日起，火車發車就不正常，從1月4日開始，幾乎全線停車，他去北站，看到車站裏人山人海，擠滿了乘不上車的人；鐵路沿線停滿車，火車站裏也趴滿了開不出去的列車。調度所連續幾天只有幾個人上班工作，而通常往往是二三十人。此時正值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發生不久，調度所的調度員90%是赤衛隊員，大都參加了赤衛隊的北上告狀，還有許多人為躲避批鬥而不敢上班。謝鵬飛為負責人的上海鐵路工人造反組織，是「工總司上海鐵路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鐵聯」），鐵聯的萬金榮原來擔任過運轉車長，對鐵路運輸業務比較了解。他

22 張生堂後來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第五屆上海市總工會委員、上海鐵路分局黨委委員。

找來十幾個以前做過調度工作的造反隊員，1月9日去調度室頂班。當晚，鐵聯與同濟東方紅一起，宣佈接管調度室。

革命造反派衝進調度所宣佈接管，並立即將赤衛隊負責人拉下馬，頂上了十二名熟悉業務的工人造反隊員。三百名同濟東方紅的紅衛兵小將配合控制了整個北站。兩小時後，鐵路秩序就開始恢復。²³

1月10日，鐵聯接管上海鐵路分局，1月12日又接管上海鐵路局。²⁴

之前《文匯報》的接管，是因為報社的造反派擔心報紙與《解放日報》合併，或者被外來衝擊者封報。鐵路系統的接管，則是為了代行幾近癱瘓的鐵路運輸指揮權，恢復鐵路運輸。而鐵路的指揮樞紐在調度室，沒有調度室的調度，火車無法運行。所以，鐵路系統的接管首先從調度室開始。這是繼《文匯報》被接管後，又一重要接管事件。造反派們終於看到生產癱瘓對文革的巨大威脅，而周恩來要求迅速恢復鐵路運輸，也讓造反派們感到身受囑託，覺得必須挺身而出。接着，9月13日，生產處於嚴重癱瘓狀況的海港，也被工總司海港聯合指揮部接管。由《文匯報》開始的接管，在一片混亂的非常時刻，就這樣首先從鐵路開始，發展成代行生產指揮權的接管行動；不久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更將發展為以後被稱為「一月革命」的「奪權」行動。

造反派行使生產指揮權，到1月12日，鐵路恢復每天發出客車21列。這個數字已經是原來的客運發送的計劃數。1月13日，上海站發送旅客3.806萬人，貨運發送6.4938萬噸。鐵路運輸開

23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24 筆者 2006 年對謝鵬飛的採訪記錄。路局被奪權的日子，引自「上海鐵路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鐵路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始恢復正常。²⁵ 據文革中小報記載，張春橋對謝鵬飛等說，他們的接管行動得到毛澤東的稱讚：

毛主席說，你們接管上海站，接管得好，給全國樹立了樣板。毛主席要你們關於接管上海車站的詳細材料，趕快送去。毛主席要你們好好幹。²⁶

1月8日下午，在陳丕顯和耿金章等在錦江飯店開會撰寫《緊急通告》的同時，張春橋、王洪文、徐景賢等也在開會商討如何解決上海生產和交通困境。張春橋召集市委機關造反派和工總司等造反組織開會。這個會，就是上午耿金章邀他參加群眾組織聯席會議時，他說已有會議安排的那個會議。徐景賢和王洪文等都到會。張春橋告訴大家，上海的存煤量已經降到最低點，發電廠等煤，甚至煤球廠也因此開不了工，造成市場煤球緊缺。煤球是上海許多沒有煤氣設施家庭的生活必需品，有些居民便囤積煤球，張春橋說，有個老太搶購了大量煤球，堆放在家裏的閣樓上，結果造成閣樓倒塌。²⁷ 張春橋又一次要造反派首先將力量放在要害部門，因為這些部門涉及民生，他後來對此解釋說：

在上海，工廠奪權，一開始就明確應奪取哪些單位。有些地方就是要拼命的奪，調動全市力量奪。比如火車站、碼頭、電報局、電廠、水廠等決定全市的要害部門。這些

2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26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19 日接見上海「鐵路聯合指揮部」時的講話，轉引自紅衛兵小報《東方紅》1967 年 1 月 24 日第 7 號《簡訊》，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上海東方紅兵團」編輯。原件為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2013 年在筆者這本書底稿上，謝鵬飛又寫下這段補充回憶。

27 筆者 2006 年對謝鵬飛的採訪記錄。

單位的造反力量薄弱，可以調動外來力量。這樣，他們要起來「造反」，交通還是暢通，全市還是有電，人民有飯吃、有照明，人民就不會反對我們。²⁸

對於其他部門混亂的生產秩序，張春橋認為亂一下沒有關係，而且亂一下還可以改革和精簡機關科層。他說：

既要搞文化大革命，就要準備生產都停掉。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我們精神上要振作，要看清主流和支流，正像北京運動一樣，我們要好好開展工作，不要被嚇住……我們不要太急，運動有它正常的發展規律，剛剛起來，亂一下沒有關係。……

去年三月主席在上海談話，取消五人小組，解散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都做到了。就是部改科，還沒有實現。將來不要部好不好。實際上是科長幹事，部局長做老爺。我們不要求恢復秩序，因為現在機關破壞得不夠。²⁹

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

面對經濟頹勢，中共上海市委非常着急。1967年1月3日，由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主持，在錦江小禮堂召開會議。市公安局、市公用事業管理局、市郵電管理局、交通部上海海管理運局以及市經濟計劃委員會的負責人都出席會議，工總司的潘國平、王明龍和黃金海，炮司的周谷聲，交大反到底的楊小兵等，也都參加會議。大家反映了上海生產和經濟的經濟情況。市計委副主任馬一行告訴大家：「煤的庫存量下降很厲害，有

28 張春橋 1967 年 7 月 4、14、25 日在政協禮堂接見浙江「省聯總」所屬組織及其各縣、地造反派赴京代表團時的講話記錄。

29 轉引自徐景賢 1967 年 1 月 8 日工作筆記。

的電廠存煤只有一天了。」幹部們在會上都表示，要站到造反派一邊。楊小兵建議：「成立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以造反派為主，協同各局黨委組成，主要任務保衛抓革命促生產」。³⁰但這個建議後來沒有實際執行。

火線指揮部的真正成立是在幾天後，1月7日晚，在長樂路670號工總司八一革命委員會辦公處，工總司總部開會，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等都參加會議。王洪文提出目前上海局勢混亂、尤其鐵路交通運輸堵塞，港口貨運物資積壓，造反派有責任挺身而出。王洪文建議成立一個抓生產的指揮部，定名為「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簡稱「火線指揮部」）。會議結束時，已經是1月8日凌晨，王明龍便臨時借用工總司海運聯絡站在海運局辦公大樓二樓的202室，着手組織工作人員的報到。兩天後，火線指揮部搬往福州路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三樓的兩間辦公室。³¹由於火線指揮部成立的最初宗旨是解決交通運輸，暢通物資供應，重點在是鐵路和碼頭，因此核心骨幹是工總司交通六局聯合指揮部的工人造反派組織。³²其餘的工作人員大多由學生組成，共四十餘人，主要是紅革會、炮司、上三

30 引自葉昌明 1966 年 11 月 26 日至 1967 年 3 月的工作筆記：1967 年 1 月 3 日。原件收藏於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31 王明龍 1979 年 12 月 7 日供詞，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一》。

32 工總司交通六局聯合指揮部成立於 1966 年 12 月底。六個局是：上海鐵路分局、長江航運公司、上海港務局、交通部上海海運管理局、上海市交通運輸局、上海市郵電局，都是上海交通系統的主管局。其中上海鐵路分局系統造反派組織最早成立，1966 年 11 月 16 日安亭事件結束不久即在國際電影院成立，名為工總司上海鐵路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鐵聯」），負責人是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的謝鵬飛等人。鐵聯成立後，向上海交通系統另五個局的造反派發出會議邀請書，商討籌備交通六局聯合指揮部，在鐵聯的虹口山陰路辦公處召開籌備會，成立了「工總司交通六局聯合指揮部」。1966 年 12 月 30 日，六局聯合指揮部發佈了宣言。六局聯合指揮部成立的最初宗旨，是針對當時還是多數派的赤衛隊，約定造反派有事相互支援，作工總司後盾。辦公地點在虹口區的多倫路。

司，以及同濟東方紅的紅衛兵。此外還有上體司的造反派。而文革中另一份資料顯示：「全體工作人員就是7名工人，兩名幹部和35名紅衛兵小將。」³³ 當時《人民日報》曾刊登過一篇關於火線指揮部的報道，文中這樣評價火線指揮部：

這個嶄新的組織，同原來的市人委那一套經濟領導機構有根本的區別。它以政治統帥經濟，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業務部門。它也沒有什麼局、處、科、室等臃腫龐大的機構，全部工作人員還沒有原市人委一些局的一個處的人數多。他們不是整天坐在辦公室裏看公文、聽匯報、打電話，而是經常深入到群眾中去，哪裏有問題就到那裏去解決，同群眾一起商量着辦。³⁴

這是一個由工人造反派和紅衛兵共同組成的組織，與之前的各類造反組織不同的是，這個組織的目標不再只是「革命」，而是恢復生產秩序。這樣的代行生產指揮權行動，為以後造反派的「奪權」，鋪墊了話語準備。

王洪文讓潘國平和王明龍代表工總司，負責火線指揮部工作。王明龍沒有參加過安亭事件，但他也是老造反，是工總司閔行聯絡站負責人。1966年12月，他作為閔行聯絡站代表去工總司總部工作，因為是黨員，王洪文將他安排在總部組織組。王明龍工作負責，思路清晰，表達能力強，得到王洪文欣賞和信任。王洪文安排兩個負責人，顯然有所考慮：讓「副司令」潘國平作為主要召集人，顯示工總司對這項工作的重視。但王洪文知道潘國平靠不住，平時坐不住，人不知在哪裏，有事找不到，所以又讓王明龍也作為召集人，具體負責實際工作。

33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34 《人民日報》1967 年 2 月 12 日報道：《上海革命造反派把經濟命脈緊握在自己手中 新創建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顯示威力》。

火線指揮部內設核心組、秘書組、聯絡組、宣傳組共四個組室。此外還有創刊於1967年1月24日的16開刊物：油印的《火線指揮部戰報》。核心組由工總司交通六局聯合指揮部的六個局，各派一人作為「核心」代表，加上潘國平和王明龍；此外，謝鵬飛也以「工總司交通六局聯合指揮部」和工總司「上海鐵路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鐵聯」）的代表身份參加。事實上，潘國平在最初露了一下面後，就再沒去過火線指揮部；而六局派出的核心代表，也基本是掛名，除參加過一、兩次核心組會議外，平時都派代表，自己不常去。日常工作全是王明龍和謝鵬飛在負責。不久，王明龍作為王洪文的全權代表負責籌建全市性奪權機構，日常工作便由謝鵬飛主持。³⁵ 秘書組的華師大紅衛兵霍達每天收集交運各局、尤其海港和鐵路兩局情況，由謝鵬飛送交機關聯絡站，由機關聯絡站的王知常編成簡報報送張春橋、姚文元，再由張、姚報北京周恩來總理處。因為張、姚來上海時，周恩來要他們每天匯報上海交通運輸情況。³⁶

由於經常要向下發文以及向上匯報情況，但會動筆的人沒有；於是1月9日王明龍去機關聯絡站要求支援。朱永嘉向徐景賢表示想去那裏做點具體工作，徐景賢當即同意，第二天朱便前往。他主要協助做些文字工作，如座談會記錄，收集情況，起草文件，幫助謝鵬飛等負責人起草發言講話稿等；也經常參加核心組會議，參與討論和決策。張春橋以後曾經幾次表揚朱永嘉，說：「老朱不錯，原來是拿筆杆子的，現在能夠在文化大革命中參加實際工作，得到了鍛煉，精神面目都不同了。你到火線指揮部去工作，對你今後的寫作有好處。」³⁷

35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上海市總工會 1985 年編《〈工總司大事記〉說明材料之五》；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36 朱永嘉、金光耀 2011 年《朱永嘉談〈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37 徐景賢 1979 年 10 月 13 日供詞，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

火線指揮部成立後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暢通交通運輸尤其是鐵路運輸，以及疏散港口積壓的六十萬噸物資，恢復碼頭吞吐。為此動員和組織了幾萬學生紅衛兵去碼頭幫助裝卸。1月9日造反派接管上海鐵路分局當天，五列火車載着一萬多噸煤炭直達發電廠。³⁸ 而此時上海最大發電廠的楊樹浦發電廠，存煤幾乎用完，已經在鏟緊貼地面的殘存煤屑。當第一車煤運到，發電廠的工人都淚流滿面，高呼毛主席萬歲。³⁹ 火線還曾與其他組織發佈過制止經濟主義的通告，例如關於停止公交車輛近郊路線通用市內月票的緊急通告。⁴⁰ 1967年的春節雖然因為被要求「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而沒有放假，但張春橋還是要求保障春節市場供應。他將這項工作交由火線負責。

當時的上海，雖然生產和經濟一片混亂，但共產黨和政府的權威仍在，失去權威的是各級幹部而不是政體。因此，雖然市人委所屬各部門對下面工作的指導中斷，但經濟生產有其固有規則，而且基層各工廠的造反派和原來的科層管理人員共同頂替被打倒了的幹部，按原來安排和原有規則繼續運作。因此，即使在最亂的1967年初，上海的生產和生活還是慣性運轉。但也因為原有秩序被打亂，所以許多原來的環節發生脫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火線指揮部起到了對上海生產的救急作用。雖然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無法從全局統盤決策。

雖然火線成立時，張春橋事先不知道，但張春橋後來對火線的工作一直支持，多次表揚。張春橋這是順着毛的思路，毛澤東對上海港口情況非常關心，再三關照張春橋、姚文元要解決上海港口裝卸貨物積壓的問題。⁴¹ 1967年1月中旬，張春橋、

等人罪證之一》。

3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39 筆者 2005 年 11 月 22 日對謝鵬飛的採訪筆錄。

40 「工學運動調查通訊組」《堅決制止鬧近郊月票的歪風》。

41 轉引自《張春橋、姚文元 1967 年 1 月 5 日接見工總司代表時的講話》，上海市總工會收藏。

姚文元在武康路2號，接見火線組長以上人員，王明龍、謝鵬飛、朱永嘉等人參加。會上王明龍向張春橋匯報工作情況，張春橋將自己的電話號碼留給了王明龍和謝鵬飛，說如果有困難可以找他。⁴² 張春橋始終在為毛澤東的文革尋突破口。他之所以一再建議要造反派抓緊能源、交通和通訊部門等「要害部門」，是因為他曾打算：

1月16日前奪了鐵路、電廠、自來水等要害部門的權。當時想把要害部門奪下來再奪市委的權。⁴³

火線指揮部的成立，使張春橋覺得找到了方向。他認為可以用火線指揮部代替市人委。1月7日火線指揮部剛成立，1月9日張春橋就上報中央；還曾要火線指揮部以及鐵路、海港等指揮部向中央寫個報告，說今後可能代替原來的市人委等機構。⁴⁴ 1月19日晚上在武康路2號，張春橋、姚文元接見火線指揮部及鐵路局、海港、糧食局、商業一局、商業二局造反派代表。聽取匯報後，張春橋說：

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實際上已經癱瘓了，你們這個機構把市委對經濟工作、工交工作的領導抓了起來，我支持你們的工作。……

火線指揮部可以稱為「經濟蘇維埃」，代替上海市人委。⁴⁵

42 謝鵬飛 1979 年 3 月 15 日交待，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之一》。

43 張春橋 1968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市革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4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45 轉引自上海文史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246 頁。

類似的話張春橋在另一次接見時也說過。張春橋在聽取王明龍等工作匯報後說：

這是個新生事物，火線指揮部班子比較精煉，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新的政權形式，你們應該好好總結經驗。⁴⁶

但是毛澤東一直沒有回應。這種以由群眾單方面組成的機構，代替整個政府原有職能的做法，似乎不合毛澤東心意，毛澤東還在尋找他認為合適的文革政權形式。

而火線指揮部在張春橋說「可以替代市人委」後，便擴大建制，設立了工業組、交通組、市政組、科研組、財貿組、衛生組、接待組，等等，對應市人委原來的各委員會或辦公室，人員也擴展到一百多。各組人員下去既「抓革命、促生產」，又抓奪權問題；而且排斥原來的機關造反派，要各局、公司和工廠向市革會統統向火線指揮部匯報生產情況，擺出準備行使市人委有關部委職能的態勢。而在火線指揮部運作的同時，市人委的各部委以及各局及所屬公司的科層人員，也在對自己所屬領域的生產進行組織指揮和疏通，他們中許多人都參加了機關聯絡站或各局各公司的造反組織，認為應該聽市革會的指揮；而且他們與本單位本系統的關係更直接，指揮生產更得心應手。他們對火線指揮部儼然老大不滿，雙方矛盾很大。

這實際是機關造反派與工人造反派的矛盾，在1967年奪權的最初階段，就已經產生，以後貫穿了文革始終。張春橋讓火線指揮部代替市人委的設想就這樣遭到事實上的抵制。機關聯絡站負責人王承龍也派人收集王明龍、謝鵬飛等工總司人員資料，通過《簡報》、《情況》等報送張春橋、姚文元，告他們的狀。

46 轉引自《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工總司大事記說明材料之五》，上海市總工會1985年編。

終於，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在討論公社建制和人員安排時，由張春橋拍板決定，火線指揮部作為公社領導下的一個職能部門，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火線指揮組」，遷往市人委大樓辦公，只負責一些生產方面的應急或突擊性工作。由此，火線指揮部的職能權限被大大削弱縮小。接着，學生們被要求「復課鬧革命」，原來在火線指揮部工作的紅衛兵回校，朱永嘉後期也不常去火線指揮部，實際只剩工總司的幾名人員留守火線。不久，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建立了工業組、市政交通組等十幾個職能部門，火線指揮部被合併至市革委會新建的工交組。1967年4月5日，火線指揮部撤銷。

毛澤東要中央向上海發賀電

張春橋將精力全都投入了貫徹毛澤東肯定的《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對於正在蔓延的經濟主義風，張春橋沒有重視，更視針對經濟主義風潮的《緊急通告》為多餘。張春橋以為，自己正在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思路指導上海文革運動，卻不料毛又出了另外一張牌。

1月10日，江青向毛澤東報送了兩篇新華社電訊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以及刊登在1月5日上海《文匯報》上的《緊急通告》。前者是1月8日《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兩報記者述評。江青不愧毛澤東的妻子和助手，捕捉各地局勢變化和發展的信息敏感而又及時，而且非常準確地符合毛澤東的政治需要。當時中共中央已經擬定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正準備下發。據說，這個文件被江青推遲了兩天下發，她希望造反派有思想準備。⁴⁷ 現在毛澤東

47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232 頁。

認為中央不需要發文件了，上海群眾組織的《緊急通告》就很好。毛澤東想以這份群眾組織的傳單，代替中央文件：

伯達同志及小組同志們：

一、此兩件很好；二、請你們在二三日內，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起草好了之後，開一次較大的會通過發表。

關於反經濟主義的文件不要發了，上海這個就很好。但需要寫一篇解釋文章。⁴⁸

毛澤東還決定了一個更大的動作，他要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造反派們起草賀電，中央文革小組立即照辦。快定稿時，毛澤東來了。周恩來問毛還有什麼意見，毛提出，最後的署名，除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組。⁴⁹ 1月11日中午，中央文革小組給張春橋和姚文元打來電話，告訴他們：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轉載《緊急通告》，並委託陳伯達，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四個最高權力機構的名義，給工總司等上海造反派組織發一個賀電，高度評價《緊急通告》。賀電已送毛澤東處，正由毛澤東審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社論也已寫好。賀電和社論今天晚上廣播，明天見報。

這個賀電的全文如下：

48 毛澤東 1967 年 1 月 10 日對《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等兩篇電訊稿的批語，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第 1466 頁。此外，那個中央文件第二天還是發下去了。

49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794 頁。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群眾組織：

你們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

你們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你們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

你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你們及時地識破了和揭穿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陰謀，舉行了有力的還擊。

你們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戰鬥任務。

你們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制定了正確政策。

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中共中央國務院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四個中央最高機構聯合署名的賀電當日下午發到上海，上海立即趕印紅色號外散發全市，整個上海沸騰。張春橋、姚文元馬上於當夜11時，在黨校召開群眾組織代表或負責人會議，工總司等四十多個組織出席。張春橋傳達中央賀電，說：

我和姚文元到上海才一個星期，上海的形勢已發生如此大的變化，毛主席、黨中央兩次肯定了上海的形勢。……

以中央四個組織的名義給革命群眾組織，而不是給上海市委，這是從來未有的。上海解放時，中央與中央軍委發過賀電，再也沒有發過賀電。⁵⁰

張春橋建議第二天立即在人民廣場召開盛大慶祝會，會後遊行。張春橋原來不願意在公開場合露面，此時主動提出他和姚文元將參加大會並講話，和上海群眾公開見面。張春橋並建議成立一個上海各造反派組織的聯絡站。

1月1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全文刊登中央賀電，轉載《緊急通告》，並發表社論《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文中特別指出：「毛主席決定向全國廣播上海的兩個文件這個大事，標誌着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下午，『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在人民廣場隆重舉行。『市區各工廠不當班的工人們幾乎全部趕來，人民廣場紅旗如海，有線廣播和電視的規模似1月6日。大會會場外，還在十個郊區增設了十二個轉播站，收聽人數達數百萬，盛況空前。』」⁵¹ 謝鵬飛代表火線指揮部在大會發言。張春橋發表講話，這是他1月4日回上海後，第一次在群眾大會上公開露面：

50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11 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連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況，甚至於上海革命群眾提出來的中心口號毛主席都能夠一字不差地背得出來。……

上海文化革命中間，每當出現了一個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堅決最熱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為標誌的上海革命工人運動的興起，是什麼人首先來支持的呢？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文匯報》、《解放日報》的革命同志們造了反，奪了權，又是什麼人首先出來熱烈地讚揚的呢？又是我們的毛主席。上海各個革命組織發表了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一個文件一傳到毛主席那裏，他就立刻給予最高的評價。一月九日發表的《緊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讚揚。這都一再地說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連心的。……

毛主席最近，當我們出發以前不多久，給我們說過，他說上海很有希望，學生起來了，工人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各方面都起來了，上海搞好了，就會影響華東影響全國，這是毛主席最近講的，對上海的很高希望，那麼今天剛才我宣讀的昨天已經向全國廣播了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更加集中地體現了毛主席對上海革命人民的關懷，這是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對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這一個賀電也是對於一切反對上海革命人民的傢伙們的最沉重的打擊。⁵²

大會在熱烈歡呼聲中一致通過《向毛主席致敬電》，還通過了《關於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組織聯絡站的倡議書》。紅工司

52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12 日《在上海歡呼中央賀電大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負責人非常後悔沒有在《緊急通告》上簽字，趕緊在一張堅決支持《緊急通告》的聲明上簽字。

張春橋、姚文元沒有對《緊急通告》的產生起過任何作用。但後來在1969年1月，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中，卻加了一句無中生有的話：「《緊急通告》發表前，張春橋、姚文元審閱。」⁵³ 那天《文匯報》刊登《緊急通告》後，張春橋讓秘書何秀文打電話給陳丕顯，問是怎麼回事，陳丕顯回答說《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都是他搞的，市委都是表示支持的，「《緊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在錦江飯店，我和幾個造反組織及有關各局負責人研究，由造反派提出意見，我簽字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搞出來的。」⁵⁴ 陳丕顯告訴張春橋兩個傳單是自己組織的，是表明自己支持文革的態度，還有可能是希望通過張，讓毛澤東知道自己與這兩個傳單的關係。但張春橋不願承認陳丕顯的功勞。他事後對朱永嘉說：「真是豈有此理，《緊急通告》怎麼是他搞的啊！《緊急通告》與他有什麼關係？」⁵⁵ 朱永嘉認為，張春橋這樣說顯然是為了堵他這個知情者的嘴：

他這個話是說給我聽的，也是要堵我的嘴。關於起草《緊急通告》的問題，我在張面前是絕口不提，在權力歸屬的問題上張是容不得陳的。說實在的，陳不應該打電話給何秀文向張報告，而應該通過周總理向毛主席報告才是正道。陳也沒能理解他1月8日下午簽發的文件的意思，僅把它當作一張普普通通的傳單而已，想不到後來會引起那麼巨大的反響。⁵⁶

53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54 陳丕顯著 2005 年《陳丕顯回憶錄》第 132 頁。

55 朱永嘉 1976 年 12 月 11 日。

56 朱永嘉、金光耀 2011 年《朱永嘉談〈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的撰寫都與陳丕顯有關，作為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張春橋本應將這一情況向毛澤東下情上陳，但張春橋似乎沒有這樣做。不知陳丕顯自己有沒有想到向毛澤東匯報，在他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到，可能沒有。或者此時他與中央聯繫已經很困難，地方向中央反映困境的渠道從文革開初就已經梗阻，這次連功勞信息都被阻斷。以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原件曾在1967年的「一月革命萬歲」展覽會上展出過，但陳丕顯的簽字，卻被折到反面，不讓參觀者看到。

本來，張春橋來上海之前，中央意見就是希望陳丕顯出來工作，周恩來元旦電話更是具體授命；毛澤東生日那天也親口告訴張春橋：對陳丕顯「不要燒焦」。但張春橋以後的行動，卻給人以處處卡住陳丕顯的感覺。朱永嘉文革後對此評論說，張春橋沒有看到陳丕顯不是一個人，陳身後還有一大批中共元老，卡住陳丕顯實際上得罪了整個幹部層，這是張春橋以後在黨內尤其是高層始終是孤家寡人的原因之一。朱永嘉還認為，張春橋打倒陳丕顯和整個上海市委，有以自己取而代之的想法；但張春橋沒有預料到，毛澤東對他的定位將不只是上海，而是中央最高層。這一切，顯示出張春橋的狹隘，也顯示出他的短視。⁵⁷

保守派全面崩潰

中央最高權力機構聯合發賀電，而且是向群眾組織發賀電，還加上中央文革小組，連身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王力都深感不解。事後，他問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並列，合適嗎？王力後來回憶說：

我的概念中，文革小組是參謀秘書機構，怎麼成了權力機

57 這是朱永嘉對採訪他的金光耀 2006 年說的，朱對筆者也說過這樣的話。

構？我還說政治局不能同中央並列，書記處也沒有同中央並列，文革小組怎麼能同中央並列？毛澤東笑而不答，說「就是要這樣好」。⁵⁸

事實上，正是從這次賀電後，中央文革小組完全成為事實上的政治指揮中心。毛澤東就這樣不動聲色，又一次大大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組這套最忠於自己的工作班子的地位，更提高了自己妻子江青的地位。這是文革以來，毛澤東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義公開表態支持群眾，舉國為之震動。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以最權威的地位和姿態，向以工總司為代表的上海造反派組織發去賀電，高度評價他們的造反行為，表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旗幟鮮明毫無保留地站在造反派一邊。

毛澤東的這個動作是對保守派最大最致命的衝擊波，徹底打碎保守派心底最後的防線。毛澤東的巨大威望，使他們不得不否定自己。賀電發到上海第二天，就有赤衛隊員在《人民日報》駐滬記者站門前貼出大字報：《向毛主席請罪！》，批判說自己過去反對造反派是錯誤的。而就在幾天前，還有不少赤衛隊員到《人民日報》駐滬記者站門前示威，抗議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楊浦水廠一個赤衛隊負責人，在康平路事件剛結束時還說：「交掉袖章不要緊，交不了我的心！」中央賀電發表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將剩餘的赤衛隊袖章全部交給造反隊，表示「要堅決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跑。」中央賀電中名列第一的是工總司，工總司司令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赤衛隊員受震動最大，退出赤衛隊的聲明貼滿大字報走廊。⁵⁹

58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795 頁。

59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過去一直堅持自己立場的赤衛隊骨幹也動搖了。國棉三十一廠赤衛隊負責人李劍鈺後來回憶當時的思想：

我對文革始終是想不通的，大批老幹部靠邊，受迫害，我對照歷史，覺得這是殺功臣。令我轉變的是中央給造反派的賀電。中央賀電來時，我正被關着。當時我說，我們是先天不足，毛主席不支持我們。我想，毛主席都支持造反派，我還有什麼理由堅持，我應該轉變立場。⁶⁰

被赤衛隊總部聘為顧問的著名先進人物、文革前夕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三輪車工人程德旺，也說對他震動最大的是中央賀電：

正當我在激烈鬥爭時，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1月11日向上海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革命組織發來了賀電，傳來了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他老人家支持革命造反派。一聲春雷，使我猛然清醒。赤衛隊的大方向錯了，錯定了。我站錯隊，走錯路了⁶¹。

過去加入赤衛隊的勞動模範和先進人物，紛紛在報紙上刊文檢查自己「受了走資派的蒙蔽」。楊富珍等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種會上和報紙上批判自己，揭發當初暗示或動員他們保衛市委的幹部們。1月24日，楊富珍貼出大字報，《揭發舊市委工作隊鎮壓紅衛兵運動的罪惡》，爆料說她在1966年9月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寫的《給毛主席的急電》，是她工

60 筆者1992年7月3日對李劍鈺的採訪筆錄，載於上海歷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

61 《上海市1968年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發言稿》，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收藏。

作的國棉一廠四清工作隊組織策劃的。⁶² 楊富珍的反戈一擊引起轟動。

這些先進人物還帶領自己所在工作部門的同事一起加入造反隊。楊富珍康平路事件期間正赴日本訪問，她一回上海馬上打聽自己小組情況。當聽說同小組絕大多數工人都參加了赤衛隊，

她急得坐立不安，飯也吃不下，匆匆忙忙趕到廠裏找到造反隊負責人，表示自己堅決站在造反派一邊。但回車間第二天，造反派就在大庭廣眾中批鬥她，她不記仇，短短一個月，先後寫出近萬字的大字報，揭發陳丕顯、曹荻秋，還一次又一次參加批鬥陳、曹大會，面對面地鬥爭。不久，楊富珍參加了造反隊，還在小組談體會，發動大家反戈一擊。在楊富珍的帶動下，她參加造反隊後的第三天，全組就有一半人也參加了造反隊。⁶³

楊富珍是1967年2月28日參加造反隊的，那天：

楊富珍第一次帶上了鮮紅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隊的袖章，在全廠「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上講了話。楊富珍同志沉痛而又激動地說出了自己早想說的心裏話：「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由於我沒有活學活用毛主席的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在前一階段曾經被黑市委利用，做了黑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禦用工具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⁶⁴

6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63 《上海市 1968 年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發言稿》。

64 《毛主席的好工人、勞動模範的好榜樣楊富珍同志造反了》，載於《紅衛戰報》1967 年 3 月 18 日，紅衛兵上海司令部主辦。

和楊富珍一樣，程德旺也積極動員同組工人加入造反隊，他說：

我想，多增加一個人站起來，就是對革命多增加一分力量。我們小組有20多人，起初只有一個造反隊員。我就和他一起組織小組同志學習，提高認識。不久，多數同志都參加了造反隊。還剩一個同志，思想還是轉不過來，對造反派看不慣，造反派去幫助他，他卻頂牛，發火。我就去他家和他談心，終於這個同志也加入了造反隊。⁶⁵

不但勞模先進人物紛紛轉變立場，就連保守派最頑固的核心——幹部們，也因毛澤東的賀電而動搖了心中的原則。各級幹部不像工人保守派那樣與造反派明着對立，但他們是工人保守派的主心骨。而且，許多幹部之前固執地與造反派保持着思想和行動距離，又一原因是為了不與時局的前鋒靠得太近，給自己留有餘地。中央賀電使他們不得不強迫自己向昨天還看不慣的造反派歸順。許多幹部都是在這一天才開始真正懷疑，自己過去對文革的抵制是否錯了。這些幹部們的交代、揭發和批判，比造反派的任何批判都更有力更強烈地衝擊着保守派。據姚文元1967年10月給毛澤東的信，提及黨員參加造反派數字的變化：

一月革命前，黨員參加造反派的很少，一般只有2%至5%。到今年一月以後，一批黨員就陸續參加造反派，其數40%至80%不等。⁶⁶

紅衛兵早已在青年學生中成為多數派；到這時，工人造

65 《上海市1968年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發言稿》。

66 姚文元1967年10月11日給毛澤東的信，轉引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10月21日《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的通知》。

反派也開始在工人群眾中成為多數派；幹部們的多數人開始強迫自己轉向造反派。文化大革命終於在幹部和群眾中贏得了多數。雖然每一個勞模先進人物、幹部、赤衛隊員的轉向都只是個人表態。但所有個人轉向之和，卻形成了一股強大無形的壓力。越來越多的人「反戈一擊」。如果說工人保守派力量在康平路事件中，已經在組織上瓦解，那麼，黨中央賀電使他們在思想上徹底崩潰。這成為文化革命的轉折點。

中央賀電發來之後，為顯示批判走資派的決心，1月14日，上海的造反派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組織了一次幾百名幹部大遊街。文化大革命以來，常常有造反派把本單位當權派，或地富反壞右分子拉出來遊街示眾，這是造反派折磨人方式中最污辱人格的做法。以前只是各自為陣；兩周前，1966年12月30日，紅革會也曾將楊西光、王零等復旦大學黨委領導們掛上黑牌子押上卡車，到市中心南京路等遊街。但像這樣全市性大規模遊街還是第一次。工總司派出造反隊員去抓陳丕顯和曹荻秋。陳丕顯這天上午被炮司揪去，下午在巨鹿路上的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辦公處，遊街組織者找不到他，他才倖免這場人身污辱。而全市幾百名各級領導幹部，上至市委和市人委的部長、局長們，下至廠長，科長和黨支部書記們，被悉數押在各種車輛上。他們有的被迫手持稻草，以示「撈稻草」；有的被迫手舉算盤，以示「秋後算賬」；有的硬被披上用幾十塊赤衛隊袖章拼成的馬甲，以示是「赤衛隊黑後台」。更多人胸前掛着大牌子、頭戴紙糊高帽子，大多被以「噴氣式」強架着，甚至強迫跪着受凌辱。凜冽寒風中，滿頭銀髮的曹荻秋被押在修理電車天線的紅色天車架上，幾個粗壯的造反隊員架着他手臂，按着他腦袋，強迫他低頭跪在高高的天車架上，他的夫人石斌被強迫跪在另一輛天車架上。⁶⁷ 遊街的車隊浩浩盪盪地經過上海主

67 這是筆者聽母親說的。筆者的母親由於四清時和石斌同在一個工作團，被和石斌一起遊街，押在天車下的一輛卡車上。用赤衛隊袖章做成馬甲強迫

要馬路，從南京路遊到淮海路，或從淮海路遊到南京路。圍觀的人群站滿街道兩旁，沒有組織也沒有人出來呼籲阻止如此侮辱人格的行為。

從1966年8月的鬥鬼風和破四舊，到1967年的一月革命，從牛鬼蛇神到走資派，革命就這樣完成了對象的轉變。

造反派取得決定性勝利

在中央賀電的強大衝擊下，保守派組織徹底崩潰。據市革委會後來的一份報告說，1967年一年中，市革委會有關部門曾先後十五次組織市、區二級赤衛隊骨幹500人左右「集中學習」。對264名市、區赤衛隊負責人分析統計。其中：

站在造反派一邊或參加了造反隊的有144名，佔54%……

認識到錯誤，但對造反派還有些情緒的104名，佔39.5%……

與造反派對立的16名，佔6%。⁶⁸

而在工廠基層，越來越多工人加入了造反隊。1967年底，工總司曾作過對造反隊人員情況的登記和統計，這是筆者看到的最早的工總司統計資料。這些統計數字可能有水份，不盡可靠，但畢竟用數字向人們顯示，到1967年底，加入工總司造反隊的職工人數，已經在上海九成以上的工廠成為多數。例如，在工人造反派力量比較強大的紡織工業局，其所屬十三個公司以及直屬單位中，造反派隊員人數，佔全體職工人數50%至59%的有六個公司，佔60%至69%的也有六個公司，另有一個公司佔

遊街者穿上，手裏拿着稻草或算盤，也是母親說的，都是和她一起遊街的另幾個工作隊長。

68 《關於「赤衛隊」案審查情況的綜合報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赤衛隊專案組，1968年4月1日。

74%，顯示工人造反派已經在這些單位佔據全體職工人數的三分之二。⁶⁹ 其中，在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造反隊員人數佔全廠職工人數73%。⁷⁰ 又如輕工業局所屬十五個公司，造反隊員人數佔全體職工人數50%至59%的公司有四個，60%至69%的有九個公司，另有一個公司到80%，只有一個公司是36%。⁷¹ 再例如：在當時上海最重要的工業局——第一機電工業局，所屬十家擁有數千甚至上萬職工的大型工廠中，造反隊員佔全廠職工人數60%至69%的有七家工廠，一家工廠佔87.6%，一家工廠佔92.3%，只有一家工廠不到半數，佔48.5%。⁷² 下面是工總司在1967年11月對全市工業系統所作造反隊員統計：⁷³

單位	基層單位數		職工總數	造反隊員總數	%
	公司	廠			
冶金系統	2	53	91,693	76,710	83.7
第一機電局	8	411			
第二機電局		16	20,000	11,282	56.4
化工系統	8	183	75,802	46,514	61.4
紡織系統	12	497	362,701	216,265	59.6
輕工系統	15	576	157,871	95,071	60.2
儀錶系統	4	117	67,468	49,710	73.7
手工系統	5				
電業系統		23	17,762	12,244	68.9
造船系統		15	32,881	22,765	69.2
國防系統		6	5,864	3,416	58.3

69 以上數據是筆者根據1967年11月工總司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隊情況統計表》統計。

70 1967年11月工總司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隊情況統計表》。

71 以上數據是筆者根據1967年11月工總司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隊情況統計表》統計。

72 同上。

73 本表格引自工總司1967年11月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組織情況統計表》。表格中的數字和內容為原表格所製，空白處為原表格所有，百分比為筆者計算後另加。

華東物資局	7	6	3,883	2,546	65.6
市物資局	8	12	11,487	8,402	73.1

表格顯示，1967年底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全市幾乎所有工業系統，人數都已佔到職工人數的三分之二，成為多數派。這是文革贏得了大多數底層民眾的具體體現，更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取得決定性勝利的真正標誌。

小結

上海兩張普通傳單，讓毛澤東如此看重，不但要《人民日報》轉載，而且還史無前例地讓中央三個最高權力機構，再加上他所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給上海的造反派組織發賀電。這在當時和以後都讓許多人費解。

究其原因，正是這兩張傳單，為毛澤東解決了文革在1967年初陷入的巨大困境。整個文革發動階段，造反派到處「炮轟」，破壞現有秩序，卻無須承擔任何道德和法律責任，一切後果都由「走資派」承擔。1967年的1月，文革已經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應驗了谷牧一個月前的警告。一方面，幹部們因被逼着在各種要求上簽字，盡量四處躲避；科層管理人員因普遍遭受造反派衝擊，有意無意消極怠工，造成各級監督管理的缺位。於是大批工人以革命造反名義偷閒甚至離崗；另一方面，體制外的民眾要求改變體制身份造成的經濟不平等，颳起經濟主義風潮。這是兩個無法繞過的瓶頸，因為這兩個瓶頸造成嚴重的生產和經濟危機。不解決這兩個瓶頸，文革無法繼續開展。文革已經脫離毛澤東的駕馭，毛澤東面臨必須結束愈演愈烈的無序狀況的抉擇。這正是幹部階層所期望的，因為要結束群眾運動的無序狀況，就必須恢復幹部的權威和權力，重新啟動各級幹部的管理職能。

擺在毛澤東面前的是對秩序和革命的兩難選擇：要麼向幹部階層妥協，結束文革；要麼堅持逆水行舟，任天下大亂，實現自己的目標。毛澤東顯然不會為了秩序而犧牲他的革命，他不會打擊他好不容易發動起來的群眾運動；毛澤東更不會向阻止他繼續開展文革的幹部階層妥協：他的文革本來就是針對這個階層，他不能在幹部們沒有對文革真正認同之前，就重新恢復他們的權威。但恢復正常生產和經濟秩序又迫在眉睫，否則革命將無法承擔幾近極限的經濟和社會成本。上海兩個傳單的倡議和起草者們，加上張春橋和姚文元，誰都沒有料到這兩張傳單解決了這個困擾着毛澤東的大難題。

上海的《告上海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發布得非常及時，前者呼籲工人返回生產崗位，後者呼籲制止經濟主義風潮，正是完全針對兩個瓶頸。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呼籲恢復社會和生產秩序的傳單，都是造反派自己提出，而不是由中央發文提出，這符合毛澤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貫思路。兩張傳單將社會和生產的失序責任統統算在走資派賬上，既號召恢復生產、打擊經濟主義風，又開脫造反派的責任，解決了毛既不想打擊造反派又必須收拾亂局的困境。原來為經濟和生產所困的文革運動，一下峰回路轉。

文革的混亂，不但已經引起幹部和保守派的不滿，甚至引起造反派的擔憂。毛澤東必須對這樣史無前例的混亂有個交代，必須有人對這場混亂承擔責任，這個責任自然不能由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和文革的推動者造反派承擔。於是，對經濟要求網開一面的上海市委，順理成章地被指為這場混亂的始作俑者。「走資派挑動經濟主義風」，成為幹部們的新罪名。毛澤東說有人壓不了文革就破壞生產，然後再歸罪於革命。批判走資派找到了新的理由和動力。而《文匯報》的接管，更為毛澤東在操作層面提供了對付困局的具體方法。那就是讓造反派進入權力機構和各指揮系統，替代抵制文革的幹部階層，使社會

和經濟生活得以繼續運轉。毛澤東從上海文革中找到了已經陷於困局的文革的出路。毛將這稱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1967年的1月，是文革的一個大轉折。當上海造反派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動對於毛的文革所具有的巨大意義和價值時，毛澤東已經看到出路，及時抓住上海造反派的兩個傳單以及《文匯報》奪權事件，不但一箭雙雕地解決了混亂和混亂的責任，而且將此作為進一步解除幹部階層權力的契機，引發隨即而來的奪權高潮。這個高潮，以後被上海的造反派命名為「一月革命」。

第十八章

一月革命 從「接管」到「奪權」

紅三司接管公安局

《文匯報》接管之後，上海的接管還只限於報社和電台等傳媒機構，1月11日中央賀電下達後，上海立即掀起接管熱潮，上海所有的區、縣、局都紛紛被接管。這種自下而上的接管風，是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來所從未有過的。從1967年1月11日起，整個上海的接管進入高潮。三天之內，市區、縣、局級單位有四十九個被接管：有造反派上下結合、或者是內外結合的，也有外單位造反派前去接管的。¹下面是1967年1月初上海部分區和工業、交通管理局的接管日期：

9日，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被鐵聯接管，當晚鐵聯又與同濟東方紅共同接管鐵路上海站

10日，鐵聯與同濟東方紅接管上海鐵路分局；

12日，鐵聯與同濟東方紅又接管上海鐵路局；同日，紅三司宣佈接管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區區委、區人委被本機關的造反派宣佈接管；華東電業管理局被本系統造反派接管；

13日，上海港務局被海港指揮部接管；13日工總司徐匯區聯絡部等造反組織宣佈接管徐匯區委、區人委；市交運局被本系統造反派聯合接管；

14日，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黨政機構被局機關造反派接管。

1 中共上海黨史研究室 2004 年編纂《中共上海歷史實錄》。

面對突如其來的接管風，工總司總部最初不是很贊成。據戴立清回憶，這是因為王洪文不太贊成這種亂哄哄的接管風。王洪文認為，這是大事，各群眾組織應該坐下來商量，一起決定；如果今天這個去接管，明天那個去接管，不是亂套了嗎。所以工總司總部除了派岑麒麟去封銀行，沒有去接管過什麼機構。封銀行是為了阻止人們趁經濟主義風去銀行提錢，當時並沒有接管銀行。²

在一連串接管事件中，影響較大的，是紅三司對市公安局的接管。紅三司負責人安文江二十年後承認，他當時之所以想到接管市公安局，除了受接管態勢推動，更是為了「亮旗子，搶頭功，為紅三司這個小山頭增光添彩」。直接原因則是紅三司下面各組織負責人對總部的批評，說總部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以及《緊急通告》上都沒有簽名；在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上也沒有發言亮相。可紅革會在這些重大事件上，都有表現或簽名，鋒頭已經明顯蓋過紅三司，紅三司必須有足以引起全市注意的大動作。安文江等因此想到了接管市公安局。行動的依據，是江青和主管公安工作的謝富治的多次批判公安工作的講話。³

1月11日下午4時，安文江坐着吉普車，14輛大卡車載着紅三司的紅衛兵共四五百人駛向人民廣場。安文江作簡短鼓動報告後，即率眾人包圍位於福州路的市公安局大樓，在樓頂插上紅三司大旗，宣佈接管市公安局與所屬各公安分局：

2 王洪文最初不贊成奪權，筆者2009年7月9日對戴立清的訪談。黃金海也對筆者講到過王洪文的不贊成。

3 安文江1989年著《我不懺悔》。

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
接管上海市公安局臨時指揮部
第一號通令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記上海黑司令部陳丕顯的禦用工具——上海市公安局長期以來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黃赤波(市委常委，公安局黨組書記，公安局長)、杜蔚然(副局長)的把持下，一貫對抗中央、抵制毛主席有關公安工作的指示，頑固地推行劉少奇、羅瑞卿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包庇地富反壞，重用牛鬼蛇神，貪污盜竊，生活糜爛，亂搞男女關係，甚至奸淫女犯。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公安局更是頑固地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死心塌地地執行劉記司令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充當修正主義的上海市委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鎮壓革命群眾的忠實工具。罪惡滔天，令人髮指，革命群眾已揭發的大量事實證明上海市公安局絕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早已墮落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工具。

為了徹底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為了徹底粉碎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破壞國民經濟、擾亂社會治安、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砸爛上海市公安局這個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為此，本司令部決定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時起接管上海市公安局。

特此通令。

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
(聯繫：交大反修樓)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⁴

4 原文為油印傳單，文中的文理不通之處，為原文所有。

市公安局大門口紅旗招展，院子裏人頭攢動，安文江拿着電喇叭站在高處，對着一大批公安局的幹部和警察作進駐演講。市公安局隔壁是上海市高等法院，火線指揮部辦公室就設在法院二樓。正在那裏辦公的朱永嘉聽到下面人聲鼎沸，便前往詢問安文江，這樣的行動是否請示過上面，朱的「上面」自然是指張春橋。安答「沒有」。朱永嘉馬上打電話給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請他去問張對紅三司接管公安局的態度。據朱永嘉回憶，張春橋當時沒表態。⁵而據安文江的回憶，朱永嘉向他轉達張春橋的態度：一不支持，二不反對，三不表態。⁶又據當時負責火線指揮部的王明龍回憶，張春橋當時曾讓朱永嘉向火線傳達三點：一，武器不能動，不能接管公安局的武器；二，監獄不能動，不能接管監獄；三，接管主要還是應該依靠公安局內部的造反派，紅衛兵要和公安局造反派聯合接管，不能排斥公安局的人員。王明龍就馬上去隔壁的市公安局向紅三司的紅衛兵傳達。⁷畢竟，群眾組織接管公安局的權力是件大事，張春橋很謹慎，沒有輕易表態。

市公安局造反派已經於1967年1月5日成立了「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公革會」），負責人王維章，文革前是市公安局文保處幹部。紅三司事先沒有通知公安局的人，公革會也不知紅三司會來接管，但既然來了，他們也只能表示支持。紅三司接管消息傳出，其他組織也不甘落後：交大反到底和復旦的造反組織馬上與公安局的其他造反派，到市公安局在建國西路75號和394號的辦公大樓宣佈接管。幾方造反組織與公安局黨組簽訂了條約，明確由公革會為主接管市公安局；在參加接管的群眾組織監督下，仍由市公安局領導幹部主持工作。紅三司很不滿意，認為這樣的接管不徹底。

5 朱永嘉、金光耀 2006 年未刊稿《已申春秋》。

6 安文江 1989 年著《我不懺悔》。

7 王明龍 2008 年 9 月 27 日對筆者的回憶。

工總司最初要求聯合接管。據安文江以後回憶，他們剛到市公安局宣佈接管，王洪文便帶人趕來。王洪文提出，考慮到專政機關的特殊性，建議聯合接管。經十分鐘的談判，一致同意29個群眾組織聯合成立接管委員會，由紅三司安文江任主任委員。⁸但2個小時不到，晚上6點多，王洪文又帶人趕到市公安局，聲明退出接管。紅三司接管的當晚，王洪文召集黃金海、戴立清、王明龍等工總司總部負責人討論此事。王洪文不贊成紅三司對公安局的接管，認為專政機構怎麼能由一兩家群眾組織接管。⁹凌晨5點，工總司、交大反到底、炮司、紅革會、機關聯絡站等18個造反組織，在市公安局門口貼出一份《聯合緊急通令》，要求紅三司等立即撤出，由公革會督管公安局的事務。¹⁰全文如下：

按照黨中央指示，接管公安機關必須經過中央批准。我們認為，除了公安機關內部的革命造反派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任何群眾組織無權接管公安機關，同時為了避免轉移當前鬥爭的重點；紅三司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但考慮到群眾組織接管公安機關是不適宜的。為此我們發佈聯合緊急通令：目前進入市、縣、區各公安機關的各組織、群眾必須立即撤出，不得延誤，並建議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監督。¹¹

但情況很快又有變。1月13日上午10點半，張春橋接見紅三

8 安文江 1989 年著《我不懺悔》。

9 戴立清 2009 年 7 月 9 日對筆者的回憶。

10 一天後，1 月 13 日下午工總司又領銜 18 個組織，發了份《特急補充通令》，稱公安局事務由公革會和聯合兵團(全稱「上海市各區(縣)公安員警革命造反聯合兵團」)聯合督管。

11 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傳單：《聯合緊急通令》，1967 年 1 月 12 日凌晨 5 時。文中不通之處，是原文如此。

司的安文江等四人表示支持他們的接管行動。¹² 接着，張春橋和姚文元趕到永嘉路上的市公安局政保三處，接見公安局造反派二十多人，了解公革會成員情況。張春橋表示，有些事你們最好不要先問我，你們幹了再說，因為有些事我也很難表示態度；張春橋說，接管公安局這件事，中央沒有講過，但是你們已經接管了，話也說出去了，再不支持也不行，希望大家不要對紅三司過多指責。張春橋建議，光靠紅三司力量不夠，可以成立一個聯合組織，工人、學生應該抽一些人進入公安局，這有好處。¹³ 下午，工總司等25個組織代表主動找到安文江，承認對接管公安局「有個認識過程」。並表示將再發一份支持紅三司接管行動的聲明，以消除1月12日凌晨5點那篇《聯合緊急通令》的負面影響。¹⁴

紅三司接管公安局行動得到肯定，於是再接再厲，於1月16日，在文化廣場召開「打倒陳丕顯，砸爛上海市公安局，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安文江主持大會並作演講。

幾十年後，安文江回憶自己當時接管公安局的行為，說他們當時絕對沒有取而代之的念頭，想的就是先接管，等待上面任命新公安局長。其實，他們對接管以後該幹什麼，如何開展工作，心中完全無數。他們想的，就是不要在接管大潮中再落後形勢。¹⁵ 他們對自己行動的意義，根本沒有很好考慮過，所有的動作都只是政治表演。

12 據安文江在《我不懺悔》中回憶說：事後他才知道，「張春橋發出『三不指示』主要是因為他對全國首例接管公安局事件吃不準，當天深夜，他和北京通了電話，江青等明確答覆『應該支持』，這才來了個急轉彎」。

13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13 日下午在公革會和部分群眾組織座談會上的講話。公革會王維章等整理。

14 安文江 1989 年著《我不懺悔》。但筆者始終沒有有關聲明。

15 筆者 2008 年 5 月 16 日對安文江的訪談。

上三司接管上海市委

當所有組織都忙着接管區、局一級黨組織時，有人已經想到去接管省市委。1月14日，山西省的造反派組織「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出第一號通告，宣佈他們已經於1月12日晚上，接管了山西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這是全國文革中最早的省一級黨委被接管。¹⁶ 而在上海，這個行動的最早發起者是上三司。

1月15日，上三司宣佈接管市委和華東局，參加者主要是二兵團，還有另外幾個群眾組織。上三司的負責人是趙全國。他當時為什麼會想起接管市委和市人委？據他自己文革中的交待，說是風頭主義。因為他文革前曾經受過處分，總想在文革中有所表現，提高自己的形象。¹⁷ 文革後他的回憶又不一樣，說他當時看到碼頭無人裝卸，發電廠幾乎沒有煤，「我心裏非常着急。我想，首先必須讓那些幹部出來，指揮生產回復秩序。而幹部出來工作，首先應該是市委領導幹部出來。」¹⁸ 他還說，他當時曾找過陳丕顯、曹荻秋和華東局的魏文伯，但是沒有找到。「我想到督管上海市委和市人委」。¹⁹ 他並不知道謝鵬飛他們的火線指揮部已經成立。趙全國去找耿金章，成立了共11個組織的工人、學生聯合機構。²⁰ 趙全國為什麼不找王洪文而找耿金章？趙全國以後回憶說是因為「找王洪文找不到。而且當時他認為王洪文的工總司是空架子；而二兵團勢力大，當時全上海交運系統都是二兵團的勢力範圍，所以耿金章

16 上三司和二兵團此次接管是不是受山西接管影響？筆者文革後曾問過上三司負責人趙全國，趙全國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沒有。

17 趙全國 1970 年 2 月 23 日。

18 筆者 2009 年 1 月 24 日對趙全國的電話採訪。

19 同上。

20 1 月 15 日又增加了五個組織，成為十六個組織。

有能力指揮交運系統的人立即上班。他們有汽車，這樣也能解決上海生產中的運輸問題。²¹

1月14日晚上，趙全國和耿金章召開第二次會議。趙全國主張成立臨時督管委員會，「把全市各系統工作立即抓起來」。他想讓張春橋和姚文元擔任主任和副主任，請耿金章問張春橋是否同意。²² 耿金章當場打了個電話給張春橋，張春橋答說「很好，我同意，等我請示中央後再給你答覆。」²³ 耿金章掛下電話便將張的話告訴了趙。趙說先斬後奏，先接管起來再說。耿金章還有些猶豫，說光我們接管，人家會有看法。趙全國說，那先派人佔領外灘，延安路和康平路的辦公樓。耿金章問佔領這些房子幹什麼？趙全國解釋說，等上面批准了，答應我們了，這些房子就可以用起來了。耿金章以為有理，同意了。²⁴ 這時，二兵團常委張虎根帶來一個消息：聽說紅革會也有進駐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打算。大家覺得形勢緊迫，紅三司已接管了市公安局，說不定紅三司也正準備接管上海市委，要接管早接管，明天就進駐。上三司常委們當即決定立即行動。於是，馬上起草《向毛主席致敬電》，又起草了4個《通令》。

這是上海第一個接管市級領導機構的文件，雖然篇幅稍長，還是全文抄錄如下：

《接管上海市委第一號通令》

我們革命造反派莊嚴宣佈：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12時起正式接管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委。

自從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柯慶施同志逝世以後，中共上海市委被以曹荻秋、陳丕顯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

21 筆者 2009 年 1 月 24 日對趙全國的電話採訪。

22 趙全國 1979 年 4 月 30 日。

23 耿金章 1979 年 11 月 27 日。

24 同上。

分子所把持，他們積極地、認真地推行劉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他們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幹盡了壞事，罪大惡極。文革開展以來，他們頑固地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死命地堅持反動路線。最近更變本加厲，策動「三停」，玩弄經濟主義的把戲，破壞生產，破壞財政金融，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罪惡累累，罄竹難書！這樣的黑市委，非砸個稀巴爛不可。

目前，在革命造反派的萬炮猛轟下，上海市委已經分崩離析，支離破碎，完全癱瘓！

鑑於上述情況，我們確認，上海市委的權非奪不可！我們認為：非砸爛完全癱瘓的舊市委，重建革命的新市委，變革命的大亂為革命的大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二兵團，上海三司和中教司等革命造反派組織決定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三時起正式接管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委。

自此，舊上海市委業已不復存在。

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

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二兵團(二兵團)

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三司)

上海市中教造反總司令部(中教司)

毛澤東思想上海兵團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

《接管上海市委第二號通令》

我們上海革命造反派已經接管了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委。

舊上海市委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經自絕於人民。舊上海市委必須徹底砸爛，重建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忠於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新上海市委。

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

我們上海革命造反派請示毛主席和黨中央任命張春橋同志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市長，姚文元同志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副市長。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批准未下達之前，暫請張春橋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接替中共上海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市長及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副市長之職。

(簽名與日期同上，從略—筆者)

《接管上海市委第三號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委，已定於一月十五日12時起，由我革命造反派接管。臨時新市委業已誕生。

為了建立正常的秩序，開展革命的黨政工作，為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服務，並有利於機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特責令原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委所屬各級幹部工作人員，於本通令生效時日起三天內回到原工作崗位，並前來接管委員會報到，聽候臨時新市委和臨時新市委調動，任何人不得違誤，否則，作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論處。

(簽名與日期同上，略—筆者)

《接管上海市委第二號通令》，專門電報拍發中央和毛澤東。還有個《接管上海市委第四號通令》：

《接管上海市委第四號通令》

一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起，我們革命造反派接管了上海市和上海市委。

為了執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徹底

粉碎原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我們特向所有外出「串聯」的赤衛隊員發出緊急通令：希望你們自通令生效時間起二周內全部返回原單位（在本市的三天內）。

我們堅信工人赤衛隊的大多數隊員是革命的同志，是聽毛主席話的，我們相信大多數赤衛隊員是會響應本通令的，對於蓄意不服從本通令，蓄意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方針，作破壞文化大革命論。

（簽名與日期同上，略——筆者）

這四個通令，趙全國說暫時不要發，等中央表態後再發。但下面的人還是馬上就發了。1月15日清晨3點半，上三司和二兵團三百多人以及一些其他造反組織的造反派，往康平路市委辦公處宣佈接管。趙全國所在的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的紅衛兵，佔領了延安西路33號市委辦公大樓，插上上三司的大旗，以示接管；接着外灘的市市委辦公大樓也被佔領。他們又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到處張貼大紅喜報，散發傳單，宣告接管勝利。耿金章說光這些個組織接管不行，還要再聯合一些組織，聲勢更大一些。於是，又找了23個造反組織，商量如何進一步接管。

耿金章問趙全國，如果張春橋不同意怎麼辦？趙全國說：他沒有理由不同意。但是，耿金章的擔心很快得到證實。清晨7點，接管不到四小時，張春橋秘書何秀文打來電話，要耿金章立即去興國路招待所。耿金章趕到後，張春橋問他：你佔領這些空房子幹什麼？張春橋又說：你佔領這些空房子根本沒有用，市委這些領導照樣可以辦公。不能佔，你馬上給我撤！耿金章一聽張春橋不支持他們行動，就連忙打電話去佔領的三個地方，讓把人撤出去。²⁵ 二兵團撤出，趙全國的此次接管行動流產。趙全國不相信張春橋不支持他們接管，當日下午去衡山飯店找耿金章，了解張春橋的意思。耿金章告訴他們說：

25 耿金章 1979 年 11 月 27 日。

張春橋同志聽到奪權很惱火，要你們馬上撤出去。張春橋還講「你們十一個組織聯合奪權是想把市委的爛攤子壓在我身上，使我在上海待不下去，最後將我壓出上海」。²⁶

用民眾接管這樣非程序形式的更替，而不是中央任命改組或重組上海市委的正式程序，這樣的行動是一件大事，這種權力更替形式是1949年後從未有過的。顯然，張春橋此時沒有意識到，造反派的接管行動，將引出毛澤東的又一個重大步驟。不過，張春橋還是馬上向北京匯報這個新動態，「我們立即匯報了主席、中央」。²⁷ 張春橋對造反派提議自己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不接受，說：「現在叫誰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一樣過兩天就變成鬥爭的對象。」²⁸ 這樣的話，張春橋在1月13日下午的會上也講過，當時紅三司提出改組上海市委，張春橋回答：

你們提出改組市委，如認為條件已成熟，我就向中央反映。你們先提出改組方案，由什麼人來當書記。(大家說，請中央派人來)中央是沒有人的。過早改組沒有好處，無論誰來當書記，面對的都是困難，也解決不了。因為下面的機構沒有改組，思想也沒有改。²⁹

張春橋此時對接管並不熱心，他對徐景賢說：

造反派到處奪權的話，把什麼事都壓在自己身上，使走資派反而輕鬆了，不要幹這種蠢事，還是應該把擔子壓在走

26 原上三司常委何運平 1976 年 12 月 30 日證詞。

27 張春橋在中共上海市委第四次黨代會上的政治報告，1971 年 1 月 4 日。

28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上旬對造反派的一次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9 朱永嘉、金光耀 2006 年未刊稿《已申春秋》

資派身上，把他們推倒第一線，他們要對爛攤子負責。³⁰

張春橋評價上海的接管風，說：

接管有些成風，有的接管有利，有的接得不一定有利。

《文匯報》接管很順利，《解放日報》就不大順利，什麼事都堆在造反派身上，本來能做的事也不做了。³¹

張春橋主張，造反派不要什麼事都自己幹，要將幹部推到第一線：

部長們、局長們，除了完全爛掉的以外，要不要把他們推到第一線，讓他們管工作，看他們究竟能不能過新的關……(與其)在幕後，索性到第一線。³²

要推那些犯了錯誤的幹部上前線，讓他們在工作中改正錯誤。³³

機關還是要由原來的機關幹部掌握，不要群眾直接掌權，工作要有連續性。³⁴

顯然，張春橋不贊成造反派直接處理大量具體事務，他一再告誡造反派，一定不要把一切矛盾拉到自己身上，而是要邊批判上海市委，邊讓市委幹部去抓具體工作。還是在1月3日王洪文等去北京見他時，他就告誡說：

30 徐景賢 1978 年 11 月：《揭發張春橋、姚文元在一月革命風暴中的反革命陰謀》。

31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13 日下午在「公革會」和部分群眾組織座談會上的講話。

32 轉引自徐景賢 1967 年 1 月 8 日工作筆記。

33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13 日下午在「公革會」和部分群眾組織座談會上的講話。

34 轉引自金光耀、金大陸、李遜 2009 年對王知常的訪談。

你們一定不要管這些事。要警惕，否則可能會失去群眾的。你們還是要抓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果你們不批判，又幫他們解決問題，他們很高興。我看還是要抓緊批判。³⁵

張春橋的思路就是：造反派不要做具體操作性的管理工作，還是讓幹部們去解決矛盾，這是幹部們本來的責任；造反派的任務是大批判。換句話說就是幹部工作，群眾監督。

毛澤東支持群眾奪權

張春橋的這些想法，正是當時中央決策層中許多人的共識。1月15日，山西造反派宣佈接管省委的第二天，陳伯達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上講話，說：

剛才我在休息室裏，上海工人同志和我講，他們又有一個新花樣：工廠讓你們接管嘛！……。他們好跳到後台去，讓我們的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搞不好，他們想在那裏看笑話。我想他們的陰謀鬼計會繼續被群眾戳穿的，剛才同一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辦法，採取派群眾代表監督的方式，他們想偷懶，想讓我們忙得不得了，他們好坐山觀虎鬥。我們如用監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動一點，當然個別地方、個別機關也可用接管的辦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當的，因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要看我們笑話，要當心呀！³⁶

35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3 日接見工總司王洪文等人時的談話記錄。

36 陳伯達 1967 年 1 月 15 日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團體抓革命促生產」大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陳伯達所說的「上海的工人同志」就是潘國平，他1月10日左右晚上去北京參加一個造反派座談會，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小會場召開，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參加。

座談會上要上海代表先發言，我就說了上海情況，我講說上海目前有股接管風。這時江青就出來打斷了我的發言說「你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我們就是要奪權、奪權、再奪權！」江青還向參加者發問：你們講他的觀點對不對？下面人都講不對，就這樣把我哄了下來。後來我還要講，我說好話壞話總要讓我講完。這時總理講，上海的同志，你的發言我們知道了，這個意見可以考慮。³⁷

陳伯達在1月15日的大會上引了潘國平的話。陳伯達講話後，周恩來馬上表示贊成：

剛才陳伯達同志說得對，我們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樣防止接管風。革命靠自己，每個工廠、單位，都應依靠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組織起來，監督他們認真抓業務工作，不要讓他們躲在後面，叫我們上當。這提得及時，提得很對。³⁸

同一天，周恩來在另一個會上，也表達了這個意思，而且更加具體：

在上海有個接管風，陳伯達在體育場回答了這個問題。當

37 潘國平 1979 年 10 月 15 日。在岑麒麟 1979 年 1 月的一個交待《關於潘國平在文革初期我所知道的一些事》中，也說到：1967 年 1 月 12 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潘國平代表工總司發言，說上海颳奪權風，「江青就講他瞎講，她說，奪權好得很！」。岑麒麟說自己還把他們的講話錄了音，帶到上海給王洪文等人聽。

38 潘國平 1979 年 10 月 15 日。

前是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但新反撲不止經濟主義一種形式，最突出的是矛盾上交。經濟主義和矛盾上交是分不開的。……現在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接管，一個單位內部爛透了，內部起來鬧革命，外力給予支援，實行接管。現在接管變成一個風氣，本單位內部還沒有形成革命力量，外邊就去接管。……

接管總有三個條件：一是確實癱瘓了且腐爛不可救藥；二是內部革命力量形成了；三是外部支持。……

接管是監督的性質，監督的好處是業務可以繼續。對領導，嚴重的像鐵道部呂正操，武競天，現在決定採取撤職留用，考察三個月。(有人說三個月不夠，財貿方面時間要長一點)三個月不夠還可以延長。奪權是奪的監督權，不是管業務，否則你們就陷入業務圈子，影響鬧革命。³⁹

周恩來主張監管，保持工作延續性，與張春橋的「幹部工作，造反派監督」的思路基本相同。但是，毛澤東不同意他們的思路。大會剛結束，毛澤東就馬上召開小範圍的常委擴大會，討論上海的接管風。毛澤東批評陳伯達說，

上海造反派組織奪上海市委的權，怎麼能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呢？是他們(上海市委)採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群眾把他們的權奪了。⁴⁰

毛澤東還說：

就是要奪權，就是要奪他們的黨權。他們欺騙、蒙蔽、壓

39 周恩來 1967 年 1 月 15 日在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聯絡委員會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0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 798 頁。

制幹部黨員，使黨團員成為他們的工具。他們要保他們的烏紗帽，他們是做官當老爺。他們拿手的是用紀律壓人……誰不聽他們就是反黨，就是違背紀律。這個紀律成為約束幹部、黨員的緊箍咒。⁴¹

就是要奪黨權，當然不是全部奪，還有黨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奪。……

掌握在走資派手裏的部分政權也要奪，因為他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專政；不是鎮壓反革命，而是鎮壓革命。這政權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的。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觸犯了個別人利益，革命革到他們頭上，要革命的人一定要被打成反革命，這成了規律。不是要全部打倒他，只是把他不對的地方革掉，那就不行，就是反革命，就要抓你，他們可以隨便開除、監禁、戴帽子，挑動群眾鬥群眾，用保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保自己的烏紗帽、地位和利益。⁴²

毛並要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和關鋒為《紅旗》雜誌撰寫一篇關於奪權的評論員文章。本來起草社論，都是由陳伯達、王力和關鋒共同撰寫；或是王力、關鋒起草後，由陳伯達修改。這次毛沒有讓陳伯達參加起草。毛的那一大篇關於奪權講話的主要內容被寫進評論員文章。毛澤東批：「寫得很好，照發。」⁴³ 文章在當晚就按毛澤東要求通過電台向全國廣播，並登在1967年1月16日《紅旗》雜誌上，題目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光榮的上海工人階級，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組成了百萬革命造反大軍。他們聯合其他革

41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 803 頁。

42 同上，第 804 頁。

43 同上，第 799 頁。

命組織，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中奪了權，建立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勢如破竹，銳不可擋，他們正在乘勝追擊，掃盪抗拒歷史車輪前進的垃圾。……

上海工人階級、其他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的這一革命行動，標誌着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達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標誌着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

他們的經驗是多方面的。這些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把上海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這篇《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是文革中代表毛澤東、黨中央號召奪權的第一篇公開的正式文字。同一天發表的，還有陳伯達起草的另一篇文章：《響應毛主席號召，到群眾裏面去》，內容主要是號召各級領導不要懼怕群眾，要到群眾中去。陳伯達將自己這篇文章作為《紅旗》雜誌社論，將王力和關鋒起草的號召奪權文章作為《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當時，《紅旗》雜誌的每篇社論都有着指導性意義，重要性高於評論員文章。但是這次，起巨大影響的卻正是號召奪權的文章，震撼全國。人們並不因它只是評論員文章而看輕，北京造反派敲鑼打鼓，去《紅旗》雜誌報喜。

毛澤東覺得只是這篇號召奪權的評論員文章還不夠，接着又要《紅旗》雜誌再寫一篇綱領性的關於奪權的社論。2月2日，《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廣

播。文章的思想完全是毛澤東的，許多句子是毛澤東的原話，⁴⁴例如上面所引的最後一段。⁴⁵

在此之前，還是在1月，毛澤東曾經從各省市的接管和奪權行動中，總結出幾種奪權形式，

根據不同情況也有五種形式：（一）全部改組（上海張春橋、姚文元）。（二）接管後對當權派不同形式處理，邊檢討邊工作，監督留用（根據指示工作）。（三）停職留用。（四）撤職留用。（五）撤職查辦。……

接管是個大事情，會引起一系列的變動，是個革命。要解決接管的目的，解決什麼問題。接管辦公，遇到問題怎麼處理要有具體政策（局、科、部、科員怎麼辦）。現在奪了權，也許還會奪走，有的單位奪過來奪過去，是個鍛煉。要鞏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壯大。左派力量小時，奪權少，奪過去很快又被奪走。左派要壯大。我支持奪權。奪權後要抓革命促生產。⁴⁶

自從《文匯報》被接管後，毛澤東一直在尋找新的政權替代形式。上海從鐵路系統開始的接管生產指揮權行動，以及和山西的接管省市行動，給毛澤東以新的思路，不再是過去的那種自上而下的奪權，即撤換幹部，上級重新委派；而是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奪權，即由造反派奪權，接替原來的幹部們的權力；而且，山西造反派的奪權不是一派組織奪權，而是各派組織的聯合奪權。

本來，造反派只是將「接管」作為撤換和罷免幹部的過渡

44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799頁，以及第811頁。

45 中共中央黨史文獻研究所編《毛澤東年譜》第6卷第34頁，逢先知、馮蕙主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出版。

46 毛澤東1967年1月的一次同周恩來的談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性臨時舉措，只是臨時代管權力，待中央或上級另派幹部後，便移交權力，所以上三司的「督管」，提出中央任命張春橋、姚文元接任上海市委之職，並沒有想到自己取而代之。而在全國的其他省市，也有將此種罷免行動稱之為「查封」，即在上級另行委派幹部之前，先行終止幹部們的權力。徐景賢文革後的回憶，反映了造反派最初對於「奪權」的認識：

我在組織撰寫1月6日大會的三項通令的時候，沒有提出「奪權」的口號，只是宣佈：「第一，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市長；第二，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七天內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請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級幹部堅守崗位。……

當時，在我的思想認識上，認為還是應當遵循毛主席的教導，批判混進黨內、政府內以及各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所以，我們在通令裏請求中央改組中共上海市委，撤消有些人的職務，並沒有想過由自己掌權。我當時還曾和市委機關聯絡站的另一個負責人王承龍一起議論，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書記到上海任職。因為，在我們的固有觀念裏，省、市委這一級領導人的任免權一直在黨中央，不能由下邊擅自「奪權」任命的。⁴⁷

戴立清文革後回憶他當時對奪權的理解：

奪權，我的理解就是罷官，我們廠1966年8月25日那次奪權，讓支部書記下來，上去另一個黨員，我們的理解這就是奪權。所以，我們理解的奪權就是罷不好的幹部的官，就是撤走資派，換上執行毛主席路線的幹部。並不是我們自己上

47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去。到中央號召奪權，公社成立，革委會成立，一切權力歸革委會，革委會組成必須軍幹群三結合，明確造反派參加新的權力機構，這時才覺得奪權與自己有關係了。原來覺得奪權是上面派的，這時才覺得自己可以被結合進去。⁴⁸

《紅旗》雜誌的評論員文章，一下使造反派過去幾個月的造反行為，終於有了最終指向，也使造反派過去的不安全感，有了最終保障，那句政治口號式的「奪權」兩字，現在終於具有了真正與造反派切身關聯的實際意義，成為最有效的對底層的社會動員，贏得了最廣泛的社會呼應。所有積極參與奪權的組織，不會不預感到，參與奪權行動愈多愈深，對於提升自己的組織在文革中的革命名份越有利。那些在文革前一階段對運動介入不深的組織，這次都認準方向，一定要積極投入奪權，再也不能掉隊。各造反組織紛紛想方設法參與各種奪權，召開各種大會，盡量為自己的組織在將來的博弈中增加砝碼。而且大家都明白，對有些職能部門的接管，被與自己關係好的一派接管，和被與自己關係不好的一派接管，大不一樣。而當初接管《文匯報》的「星火燎原」，則更是將他們的接管視作一家的成果。當時《文匯報》社連印刷廠上百人，其中屬於星火燎原一派的有21人。在毛澤東號召奪權之後，他們宣佈，全部權力歸他們星火燎原一家：

我們認為，報社的全部權力應該歸「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因為報社是總部接管的，主席肯定了我們，鼓舞着我們，我們決不能辜負主席的期望。我們總部的人，在接管的當天是十九人，加上長征串聯回來的兩人，現在一共二十一人。⁴⁹

48 筆者2009年2月13日對戴立清的訪談。

49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代表1967年1月16日的介紹：《文匯報是怎樣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新生的》。

誰去奪權，權力就歸誰。這樣對奪權的理解，使得各派組織的紛爭不可避免。不過此時，奪權到底怎麼具體操作，造反派們還是心中無數。造反派們都是底層民眾，沒有對上層機構的管理概念。他們的眼裏，權力的物化體現就是各種公章，因為只要蓋上了公章，許多事便一通百通。文革前夕，有部重點上映的電影叫《奪印》，其中奪公章的畫面給人們印象很深。於是許多造反派組織的奪權行動，就是到奪權單位發個宣言或通令，將圖章拿到手，就算奪權了。當時號召奪權的宣傳畫上，都是畫着穿着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和穿着軍裝的紅衛兵一起，手裏高舉着剛奪過來的辦公大印。由於沒有奪權程序、奪權資格等操作層面的規則，於是誰都可以奪權，誰都希望將權奪到自己手裏。許多單位今天這批造反組織去宣佈接管，明天另一撥造反組織又去宣佈奪權，經常發生幾方爭奪的嚴重衝突。

1月16日毛澤東表態支持上海造反派奪權行為後，「奪權」代替了「接管」：

16日，交大反到底聯合部分工總司造反派，進駐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宣佈奪權。張春橋、姚文元明確告示，說華東局是中共中央機派出關，不允許奪權，奪權者只得退出華東局。同日，盧灣區人委被原區人委機關造反派奪權；

1月中旬，楊浦區委、區人委被奪權；市輕工業局被局機關造反派聯合工總司輕工業局聯絡站、交大反到底以及同濟東方紅奪權；

19日，靜安區機關造反派對區委、區人委奪權；

22日，普陀區機關造反派與工總司普陀區聯絡站等造反組織，在文化廣場召開大會宣佈對區委、區人委奪權；

23日，虹口區機關造反派宣佈奪權；

23日，華東師範大學、上海機械學院、上海中醫醫學院等大專院校的紅革會於半夜12時統一行動，在自己學校宣佈奪權；

24日，工總司南市分部等造反組織將區委、區人委領導幹部揪到南市公安分局，宣佈奪權；

25日，閘北區機關造反派宣佈奪區委權。⁵⁰

以上只是上海的部分奪權情況，而且許多單位被多次奪權：這次是這個造反派組織，下次是另幾個造反派組織。

面對奪權大勢，只有少數幹部堅持不交權。鐵道部副部長兼上海鐵路局局長邵光華，即使在1月18日毛澤東已經明確表態支持奪權的大勢下，仍拒絕交出印章，堅決不向造反派交權；而且馬上貼出《鄭重聲明》：「我是鐵路局長，仍在執行自己的任務！」第二天，他又讓人給鐵道部長打電話：「就說我邵光華講的，為了不中斷工作，請鐵道部迅速派個局長來，或者派軍隊來接管，否則會造成群眾鬥群眾。」⁵¹邵光華的這個預言，和谷牧在1966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擔憂是一致的，而且很快將被證實。但沒有人理睬他的預見，他被視作「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遭到批鬥。事實上，能夠像邵光華這樣硬頂的幹部並不多，大多數幹部在中央賀電的壓力之下，已經開始「轉彎子」，強迫自己「跟上形勢」，「重新站隊」。

張春橋傳達毛澤東講話

耿金章撤出沒幾個鐘頭，16日凌晨，張春橋又來電話，讓他去興國路招待所。耿金章連忙趕去。機關聯絡站徐景賢也在。張春橋對耿金章說：現在我告訴你，毛主席看了你們發去的電報，很贊成這種自下而上提名市委書記和市長的辦法，還要我和文元考慮一份委員的名單。因為你是這幾個奪權組織中

50 以上這些資料，全部引自這些系統文革後編寫的地方志。

5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最主要的組織，所以我向你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希望你去找其他幾個組織一起談一下。張春橋拿出一份電話記錄給耿金章看，⁵² 是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剛剛打來的電話，說毛澤東支持上海造反派奪權。並要張春橋轉告：

今天政治局開會，毛主席要我打電話給張春橋，要春橋告訴第二兵團等群眾組織，贊成他們推選張春橋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任第二書記兼副市長。這兩個人我們知道。還應當有一個更多人的名單。也同意春橋的意見，暫不宣佈，做一做工作，多搞幾個回合，再宣佈。原則上是自己解放自己。告訴第二兵團等接管組織，讓他們知道黨中央和毛主席是支持他們的。

毛主席說：上海這個辦法好，群眾接管這個辦法好，比改組北京市委辦法好。

毛主席說：我們過去的革命，是軍隊打江山、農村包圍城市，進城以後，組織原封不動，自下而上派人接管，舊人員包下來，解放戰爭發展很快，黨員進了城，有些人變了質，主觀得很。現在這個辦法，群眾起來奪權，上海這個辦法好。看起來，上海十一月上旬，革命力量小，只有千多人。兩個月，有上百萬，群眾的力量不可抗拒。

毛主席批評一些人不懂道理，罵群眾。革了這麼久的命，變成了保守派。有些人組織什麼非常委員會，聯合行動委員會，等等，都是從娘老子學來的。我們的幹部要趕快覺悟，站到群眾一邊來。不轉就靠邊站，給你飯吃。他們罵群眾是洪水猛獸，對他們來說，就是洪水猛獸。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群眾是壓不住的。

軍隊幹部要教育。軍隊不介入，其實很介入，不沾邊，辦不到，不站在保守派一邊，就站在革命派一邊。過

52 徐景賢 1978 年 4 月 17 日。

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群眾起來鬧革命。⁵³

耿金章聽到毛主席支持自己的行動，非常高興。說是否馬上成立聯合奪權委員會，讓張和姚任主任、副主任。張春橋沒有立即回答。等了一會兒才說：時間還早，沒成熟，上海的文革運動剛開始，搞得還不深，馬上成立這個機構還過早。耿金章不解：中央已經同意了，為啥還要拖？張春橋說：「我已經對你說了，時機不成熟」，「你回去要對趙全國、張虎根做好工作，對他們講現在時機還不成熟，我準備向中央匯報。」「時機不成熟，何時成立，我再對你們講。」⁵⁴張春橋又說：

你們這次奪權，大方向是對的，提的建議也是好的，但是因為只有幾個組織奪權，還有很多組織沒有參加，所以我考慮還是要搞聯合奪權。你們幾個組織是還是從康平路撤出來，再和其他組織商量聯合奪權。⁵⁵

張春橋為什麼一再說「時機不成熟」，不支持上三司和二兵團這次奪權？以後，張春橋在一些會議上做過解釋，說當時他這樣做是為了避免造反派隊伍分裂：

奪權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大聯合。奪權是爭取群眾，聯合要在鬥爭中聯合，要在鬥爭中爭取群眾，現在還有一些陣地沒有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還有很多群眾沒有站在我們這一邊。⁵⁶

53 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 1967 年 1 月 16 日電話記錄。

54 耿金章 1979 年 11 月 27 日陳述，1979 年 3 月 12 日陳述。

55 徐景賢 1978 年 4 月 17 日。

56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20 日在接見上海革命造反派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這次奪權的二兵團和上三司等，只是上海眾多造反派組織中的少數幾個組織。而且還都不是當時上海工人造反派和紅衛兵中最大、最有影響的組織，由他們牽頭奪權，既缺少代表性，也會引起爭執。二兵團雖然在康平路事件中起了大作用，畢竟只是掛在工總司名下的二級組織。張春橋曾勸說耿金章：「要和其他幾個大的組織聯合奪權，不然沒有這幾個組織，奪權是不生效的。」⁵⁷ 根據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奪權自然應由工人階級領頭。張春橋已經調看過工總司幾個主要負責人的材料。耿金章雖然是共產黨員，但他曾經當過國民黨兵，建國後又曾犯過錯誤，受過處分，政治形象不過硬，而且沒有文化，甚至識字不多。相比之下，王洪文條件顯然要好得多——黨員、大廠工人、基層保衛幹部、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在造反派中口碑也不錯。這應該是張春橋不願意讓耿金章牽頭奪權的原因，他這時的意向肯定趨於王洪文。又據馬天水回憶，他1967年4月重新恢復工作後，聽張春橋說過，他曾對王洪文和耿金章都分別談過幾次話，說他感到王洪文比耿金章好，他就支持工總司。⁵⁸ 張春橋這些考慮是謹慎和周全的。

造反派醞釀成立「新上海公社」

1月11日，在向上海的造反派組織傳達中央賀電時，張春橋建議，成立上海各造反派組織聯絡站，顯然，張春橋想以造反派聯席會議形式作為造反派的聯合體，向市委和市人委奪權。這個倡議在會上通過，登在1月13日的《文匯報》上。但是，各派組織各忙各的接管行動，實際一直未能成立。毛澤東號召奪權後，1月19日晚上，張春橋在餘慶路接見火線指揮部以及鐵

57 轉引自徐景賢 1978 年 11 月：《揭發張春橋、姚文元在一月革命風暴中的反革命陰謀》。

58 馬天水 1978 年 4 月 8 日。

路、海港、商業一局、商業二局、糧食局等系統造反派。他再次提出建立造反派聯絡站之事。張春橋明確地指出，奪權必須聯合，並告訴大家，這是毛主席的思想。張春橋向大家傳達了毛澤東的話：

上次你去的時候，造反派只有幾千人，現在有100萬人，上海工人革命力量是不可阻擋的。……

上海最重要的經驗是革命大聯合，革命大聯合就是奪權⁵⁹

張春橋講話當日，各造反派組織即在淮海中路上的市委黨校開會。到會的群眾組織有：工總司、機關聯絡站、新革會、同濟東方紅、交大反到底、紅革會、紅三司、上體司、版司、上藝司、上醫司、小教司、紅東北、紅西南、赤衛軍、紅上司，以及首都三司、新北大、清華井岡山、哈軍工、西軍電、北京電影學院，等等，討論籌建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政治聯絡總站」。會議首先推選召集人。⁶⁰ 眾造反組織推工總司、機關聯絡站和「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新革會」）為召集人。工總司出席會議的是王洪文，後面的會議便由王洪文主持。

接着，對聯絡總站叫什麼名字進行討論。有的建議叫「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總聯絡站」，有的建議叫「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代表、華東師範大學紅衛兵霍達說，「政治聯絡總站」這類名字不響亮，容易和一般群眾組織混淆，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叫巴黎公社，她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叫新師大公社，這個組織是不是叫「上海公社」。大家一致叫好。一位北京紅衛兵又提出再加一個「新」字。於是定名「新上海公社」。⁶¹ 有人提

59 轉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60 當時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稱「負責人」，而稱「召集人」，或「勤務員」。

61 王明龍 1979 年 12 月 7 日供詞，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

出，應該給目前的形勢定個名稱，我們現在的情況，跟蘇聯十月革命時期差不多，可稱為「一月革命」。又博得大家贊同，把準備起草的宣言名稱定為《一月革命萬歲——新上海公社宣言》。⁶² 會議推舉機關聯絡站的徐景賢、新革會的周國榮、北航紅旗駐滬聯絡站的徐險峰、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的薛珍等，每人起草一節，最後由徐景賢統稿。⁶³

上三司再奪市委權

就在大家緊鑼密鼓地籌備新上海公社的同時，上三司再次接管上海市委。二兵團撤出趙全國的那次接管行動兩天後，趙全國組織了一個5人告狀團去北京告狀。他們1月17日到北京後，正值《人民日報》發社論號召奪權，趙全國於是認為自己奪上海市委權沒錯，馬上回上海，組織第二次奪權。他們起草《急告全市人民書》和奪權標語。1月22日上午，上三司宣佈自己聯合了50個組織，再次接管上海市委。二百多人，據說其中三分之一是市郊農民，分乘十多輛彩車，五六輛轎車，以一輛宣傳車開路，沿南京路等主要馬路遊行。中午一點半，他們進駐康平路市委書記處，迫使工作人員交出鑰匙，接管了市委辦公廳機要室，佔領了市委印刷廠。

下午3點，趙全國對參加接管群眾發表講話，宣佈今天中午他們剛接到上三司駐京聯絡站電話，說陳伯達接見駐京代表，陳轉達說周恩來有奪權的指示。趙全國將其歸納成四點，向大

辦公室 1981 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之一》，以及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但是，謝鵬飛 2013 年看了本書底稿後提出：他記得「公社」的名稱，是在 1 月 22 日的康平路會議上。待考。

6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63 同上。名單是謝鵬飛 2013 年回憶的。

家傳達。⁶⁴ 趙全國對參加接管群眾發表講話，宣佈接管上海市委，呼籲立即籌備和建立工農兵學代表會議進行選舉，在選舉之前，暫以上三司為主，參加接管組織為核心的「督管委員會——上海市工農兵造反委員會」，監督市委日常工作。⁶⁵ 趙全國還表示了對張春橋不滿：「張春橋到了上海，被幾個群眾組織控制住了，不下來和群眾見面，不把上海情況向總理、伯達和江青報告」，「有人說市委內部已經有造反派了，你們為什麼還要接管？我說，不要看他們接管了，要看他們是什麼貨色：大老爺下台了，小老爺上來了！」

上三司奪權消息傳到張春橋處。張正在餘慶路接見上海和外地在滬三十多個群眾組織，傳達1月16日王力電話轉達的毛澤東奪權指示。張春橋一面讓秘書打電話去北京核實「周總理四點指示」，一面讓機關聯絡站朱維錚打電話找趙全國，告訴他說張春橋正在接見造反派，要他也來開會。趙全國沒好氣地回答：「不去！你告訴他我們這兒也在商量奪權問題」，「你叫春橋到這兒來！說我們找他十幾天了，他現在架子大了，希望他深入基層！」見朱無法說服趙全國，徐景賢親自和趙通話，

64 對於這個「周總理四點指示」，筆者在2009年1月24日對趙全國電話採訪時，曾問過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情。趙全國說，他沒有說過總理有「四點指示」，總理也確實沒有「四點指示」。他到北京去時，周恩來正在參加一個全國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大會，他在新華社看到周講話的打印稿，就自己歸納出4點精神。趙全國說，徐景賢說他講有總理四點指示，是栽贓。但是，筆者曾經看到過1967年1月22日的《趙全國講總理來電4條》，內容如下：「一，立即召開上海各革命造反組織代表會議，成立上海人民委員會，在條件成熟時由工農兵(包括革命師生員工)召開全市代表大會，按巴黎公社原則選舉新的全市性領導機構。二，在市人民革命委員會未成立之前，由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組織成立臨時的督管小組。三，責令市委各級幹部立即回原工作地點辦公，接受臨時督管小組領導。四，市委所屬各部委已經由各個革命造反組織接管者，立即同督管小組聯繫，建立全市性臨時督管網。1967.1.22」。筆者讀給趙全國聽後，趙全國說，這是當時上三司制定的一些奪權措施，不是總理指示。

6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勸趙來開會，有話到會上來談。趙堅持：「你叫他到這兒來，我們等他一小時！」⁶⁶

王力回電很快來了，不僅否認「周總理四點指示」，還轉達了毛澤東最新思路：

總理沒有打電話，也沒有這樣的意見。陳伯達的意見也覺得值得研究。

昨天主席談軍隊，積極站到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要求部隊支持援助，都應支持。不介入是假的。不許當防空洞是一面，還要積極支持左派。幹部不要吃老本。陳丕顯、紅小鬼，動員人家保自己，走到徹底垮台。廣播電台馬上發補充指示。左派下要求，不廣播。

江渭清、譚啟龍、江華、張平化，是否可以一批二保？你們保，就垮。

要一點舊的人，黎元洪也好。

我們造反有理，有理就不採用這種方法。用整風的方法。左派內戰。⁶⁷

看來，毛澤東的奪權思想又有了變化。他本來號召從「走資派」也即幹部手裏奪權，說「死了張屠夫，不吃混毛豬」，現在他又講，奪權後還要一點舊的人，哪怕辛亥革命時期黎元洪式的人也好。這表明，毛澤東考慮要使用原來的幹部。他打算留用張屠夫們了。

張春橋馬上對眾人宣佈，趙全國那「四點指示」是偽造的。張春橋說完便和姚文元離開會場，留下的人繼續聲討趙全國。工總司潘國平說：「趙全國偽造總理指示，還炮打春橋同

66 以上對話轉引自《打倒反革命野心家趙全國！》，載於紅衛兵小報《文藝戰報》1968年3月22日第50期(周刊)，上海《文藝戰報》編輯部編輯。

67 上海市委辦公廳1967年1月22日電話記錄。

志，是個政治扒手，應該馬上抓起來！」幾十個群眾組織負責人在潘國平帶領下，分乘兩輛大客車直奔康平路，找到趙全國說是辯論，幾句回合之後，不由分說，連推帶搽，將趙全國扭送公安局。趙全國就這樣被關了三個多月。⁶⁸

這是文革開展以來，上海的群眾組織之間，第一次相互抓人。康平路事件後，雖然赤衛隊的負責人王玉璽被抓，那是周恩來的要求，執行抓人的是公安局；由此示範效應，許多赤衛隊負責人也造反隊扭送去公安局，但畢竟還是由公安局收押這些人。趙全國被抓，只是潘國平振臂一呼；而此時公安局已經被奪權，收押趙全國的是群眾組織公革會。⁶⁹

1月22日，在康平路152弄1號，造反派組織的聯席會議繼續召開，討論新上海公社籌備事宜。王明龍作為王洪文的代表主持會議。會上對公社組成單位的資格進行討論。事先，王洪文已對王明龍交待公社參加資格原則：公社不能搞成大雜燴，行會幫會類型組織不能參加公社，非全市性組織不能參加公社。王洪文還特地關照：工總司方面，凡掛在工總司名下的組織，一律不作為獨立組織，所以都不能參加公社。⁷⁰ 王洪文此舉主要針對一、二、三兵團及工三司。他叮囑王明龍乾脆不要讓耿金章等知道正在成立公社，更不要通知他們到會，免得生出糾紛。經過激烈爭論，大多數到會組織都同意以下原則：

一、二、三兵團是工總司所屬組織，不能作為獨立組成單位。紅衛軍是非法組織，它的一小撮壞頭頭幹了大量壞

68 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69 筆者和樊建政 2014 年 10 月 9 日對馬立新的訪談。據馬立新說，公革會最初拒絕收押，問以什麼名義。後來，趙全國被以「野心家」「政治扒手」的罪名關押。

70 王明龍 1979 年 12 月 7 日供詞，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一》。

事，堅決不同意參加。紅工司是經濟主義組織，不同意吸收。其中真正的造反派可動員他們參加所在單位的工人造反隊。⁷¹

爭論最激烈的是紅衛兵組織的資格。最後一致同意：非全市性組織不能參加，於是刷下好些小組織；但是，交大反到底、同濟東方紅、新師大公社和二軍大紅縱，也都只是一個大學內的學生紅衛兵組織，如何處理？最後，以這些組織「早已殺向社會，起的作用和影響已經同全市性組織一樣」為由，允許它們作為公社組成單位。此外，對於外地駐滬學生紅衛兵組織，大家基本同意「在上海貢獻較大的都可以參加」。⁷² 有人提到法國巴黎公社是3月27日正式成立的，大家認為，為了與巴黎公社的成立日期吻合，公社成立日期放在1月的27日，在人民廣場開成立大會。⁷³

第二天，1月23日下午，在淮海路上的市委黨校，新上海公社籌備會議繼續召開。幾天前，在陳佩華建議下，機關聯絡站剛將辦公地點遷來此處；昨天討論時陳佩華又向大家提出，可以將黨校作為公社籌備會議辦公地點。共有五十多個組織到會，知道消息的組織全都來了，誰也不會放棄這個機會。王明龍反覆重申王洪文關於公社成員資格原則，每個組織都被要求作自我介紹，然後由大家評論。最後，共有三十餘個組織，被認為有資格作為公社組成單位。

7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其中提到的「紅衛軍」，是復員、轉業、退伍軍人的組織，1966 年底，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等幾次講話要求這類組織解散。

72 同上。

73 王明龍 1979 年 12 月 7 日供詞。不過，巴黎公社成立日期實際應為 3 月 18 日，其正式成立日期是 3 月 28 日。

紅革會奪市委和華東局權

1月24日下午，會議繼續在市委黨校進行。到會群眾組織六十多個，是公社籌備會議中最多的一次。會上，重新組成公社文件起草小組。為此引出一番爭論。會上推舉八個組織，作為新上海公社宣言起草小組：工總司、同濟東方紅、炮司、機關聯絡站、新革會、紅上司、農司籌、以及北航紅旗。⁷⁴ 紅革會未被推選進入起草小組，紅革會代表對此非常不滿，說紅革會是紅衛兵組織中造反最早的，卻不能成為宣言起草小組成員，這是對紅革會的排擠。紅三司代表不買賬，與紅革會代表激烈爭論起來。最後只好決定，上海學生紅衛兵組織全都不參加起草小組；另選出工總司、機關聯絡站、新革會和一些外地紅衛兵駐滬聯絡站等共八個組織，組成起草小組。

紅革會認為，自己應該是文件起草小組當然成員，現在被摒於外，是遭故意排擠。紅革會代表發言說，公社應該由有影響的真正的造反派組織組成。紅革會和工總司、機關聯絡站等，是從批判資反路線白色恐怖中殺出來的，造反早，影響大，公社應該由這樣的組織組成。他還點了到會三十多個組織的名，說這些組織都是在大局已定之後才造反的，是投機造反，且人數少，影響小，不應成為公社主力。這個發言一下得罪多數，大家紛紛起而反駁，紅革會陷於孤立。紅革會代表只好提出「最最強烈抗議」，退出會場。大家並不理會紅革會代表的退會抗議，討論仍然繼續進行。⁷⁵

當天，紅革會總部在上海展覽館召開整整一天的緊急會議。下午的會議上，李功佐談學習《人民日報》1月22日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74 這個名單引自《炮打紅革會頭頭》，載於1967年1月31日第9號《東方紅》，毛澤東思想上海市東方紅總部，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編輯。

7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一月革命大事記》。

體會，李功佐極力主張奪權。會上大家認為，趙全國被抓，是一個警示，意味着不符合張春橋要求的奪權不被允許；今天抓趙全國，明天就可能抓我們。紅革會不能屈服，雖然退出新上海公社，但決不放棄奪權權利。李功佐主張奪權，勞元一不熱心，認為有趙全國的先例，再要奪權不一定能成功。但會議最後還是決定各高校紅革會統一行動，進行全市性奪權。確定奪權對象是上海市委以及十個區的黨政機構。至於華東局，大家認為那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不應奪權。奪權由哪些組織參加？李功佐建議，按1月6日「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模式，以那天參加大會的組織為成員。大家於是分頭打電話，但找不到人。後來李功佐總算找到工總司的潘國平。機關聯絡站的徐景賢和農司(籌)的夏桂伯也被找到並通知前來開會。⁷⁶

傍晚，潘國平第一個趕到展覽館。他剛從北京回來，還不知道上海最新情況。紅革會負責人馬立新、李功佐等，向潘國平分析了上海奪權形勢，說不能讓那些沒有影響的中小組織奪了權，應由影響最大的造反派組織主宰上海大局。紅革會希望工總司領頭，潘國平同意，並馬上打電話找王洪文商量。王洪文回答：他們要奪權，參加就參加吧。⁷⁷ 接着，徐景賢和夏桂伯也先後來了。紅革會的人告之以聯合奪權打算，徐景賢沒有表態，但也沒有反對。只是問：新革會(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怎麼沒有來人？⁷⁸ 紅革會說電話找不到人。

76 馬立新在筆者和樊建政對他的訪談時說，紅革會當時是想通知所有參加1月6日大會的群眾組織的，但許多組織電話沒有打到，只找到機關聯絡站和工總司、農司(籌)。而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寫的《一月革命大事記》中，說紅革會當時只通知了機關聯絡站和工總司、農司(籌)，這四個組織代表了工、農、學和幹部四大社會力量，而且除農司(籌)外，前三個組織最早造反，最有影響，奪權就具有合法性了。

77 潘國平1979年11月28日。又據筆者和樊建政2014年10月9日對馬立新的訪談，馬立新也說潘國平當時打了好幾個電話，總算找到王洪文，王洪文表示同意參加。

78 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說自己是接到紅革會通知開會的電話後，就向張、

紅革會決定由潘國平和李功佐負責奪市委的權；各高校紅革會按學校所在區域，在統一時間分別負責奪各區委和區人委權。1月24日半夜或1月25日凌晨，潘國平與馬立新等，坐着小轎車到康平路市委辦公廳。市委辦公廳的兩個機關幹部說，趙全國已經來過兩次宣佈奪權。馬立新要他們交出公章，說徐景賢同意的，機關聯絡站也參加了這次奪權。

與趙全國派人佔領房間宣佈接管的奪權相比；紅革會的奪權則是要求交出印章。兩個機關幹部猶豫了半個多小時後，交出了銅製的圖章。⁷⁹ 與此同時，紅革會總部其他常委們也分頭帶人坐着吉普車和摩托車。紅革會就這樣一夜之間跑遍市委、市人委及10個區委和區人委共23個機關，收繳了辦公圖章。這是上海第三次奪權事件。

徐景賢沒有與他們一起行動。紅革會的會議一結束，他馬上打電話向張春橋、姚文元緊急彙報。張、姚要徐景賢去勸紅革會不要單方面奪權。徐景賢按與張春橋商定的口徑勸說紅革會的紅衛兵們，要他們聯合其他造反組織共同奪權；否則，別的組織不會同意，上海造反派也會因此而分裂。徐並建議，由這四個組織出面，召開造反派組織聯席會議，共同商討奪權事宜。馬立新等堅持要由四個組織先出個聲明，而工總司潘國平則堅持奪來的圖章要由工總司保管。徐景賢不同意，說這些公章不能流散在外，否則有可能引出嚴重後果。爭論到凌晨3點，沒有結果。徐景賢給姚文元打電話，姚文元一直在等消息，接到電話便去與張春橋商量。

十多分鐘後，姚文元電話來了，先要潘國平接聽。姚文元在電話中說：「這樣大的事情你們總該和春橋和我商量一下吧！」姚文元又說「拿了印，就是奪權嗎？我看還是不參加的

姚彙報的。而馬立新對筆者和樊建政的回憶，說他們在電話中沒有告訴徐景賢奪權打算，徐景賢是去後才被告知。一開始，徐景賢沒有表示反對。

79 筆者和樊建政 2014 年 10 月 9 日對馬立新的訪談。

好！你自己考慮。」⁸⁰ 姚文元明確要求：工總司決不能在四方奪權的聲明上簽字，一定要說服紅革會跟其他組織一起大聯合奪權；姚文元並說這是張春橋和他兩人的意見，希望小潘照辦。⁸¹ 潘國平應諾退出這次奪權。姚文元又要馬立新接聽，姚在電話中勸紅革會顧全大局，和造反派組織一起聯合奪權。姚文元給紅革會台階下，說他和張春橋以後會在上海造反派組織的聯席會上說，紅革會是主動表示要和其他組織一起聯合奪權的。姚文元又要求紅革會馬上將繳來的圖章全部交警備區，由部隊出面交回各機關，不影響上海市和各區的工作。⁸² 徐景賢對馬立新等說：「《文匯報》、《解放日報》都不登你們的奪權通告，其他造反組織也不支持你們」，「沒有春橋、文元的同意，權你們奪得了嗎？」

潘國平退出奪權，張春橋不支持紅革會奪權，這次奪權又不了了之。那些圖章，隨即被警備區派人來取走了。

張春橋回顧上海奪權

四年後，張春橋在1971年1月召開的上海第四次黨代會政治報告中，回顧1967年初上海的奪權。以下是張春橋的回顧，作為引文，稍嫌長了些，但可以看出，上海運動與毛澤東文革部署的互動關係，以及毛澤東是怎樣抓住上海運動，又推向全國的：

一月革命，更是在主席指導下進行的。《文匯報》奪權……主席在(1月)8日看到了上海報紙，決定在9日廣播。這樣一件事，如果不是主席指示，我們能做嗎？我們當時

80 潘國平 1979 年 10 月 15 日陳述。

81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82 同上。

感到很苦惱，那時市委癱瘓了，什麼事也不幹了。我們就想把鐵路、碼頭、電台等要害單位抓起來，當時並沒有全面奪權的計劃。但主席從《文匯報》奪權中，看到自下而上的奪權，主席講：紅衛兵奪權發生在上海，但對華東對全國都有影響。並指示《人民日報》登上海的文章，廣播上海的告全市人民書，這些都是在主席的領導下進行的。

奪權也不是很順利的，至少奪了三次。一次是二兵團和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突然進駐康平路，還任命我和文元二人做書記，事先也不打招呼。15日他們奪權，我們立即報告了主席、中央。主席十分重視。16日政治局開會，認為上海奪權辦法比北京市委改組的辦法好，群眾提名要誰當書記，這也比自上而下任命好。當時打電話來說，中央支持奪權行動，但2個書記少了，要我們提出個市委名單。這任務到今天我們才完成。

主席總是極其仔細地觀察群眾運動的每個行動，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像群眾起來奪權，這是主席發現，肯定的。這要比我們關在屋子裏想主意好。群眾辦法好。中央還說，這事不忙，要我們提出個名單來。這中間還有中央賀電。

18日，二兵團聯合8個組織第二次奪權。到第三次4個大組織：工總司、紅革會、「農司」、機關聯絡站，機關聯絡站開始沒派人，後來派人參加的，開了汽車，把市、區兩級機關的圖章都奪到手。那時以為奪大印，就是掌權。我們說圖章毫無用處。權力是人民給的，我們說那麼事先不商量好，又沒有按照主席要提名單的指示辦事，總的說來後來還是商量通了。文元同志又打電話，說還是要聯合奪權，否則圖章到手，毫無用處，真是形而上學，這說明政權觀念糊塗。政權第一是軍隊。憑圖章拿錢也拿不

到，那時我們已經命令銀行不能隨便支付了，所以有圖章錢也拿不到。

這個奪權，要靠工人階級團結一致，靠三結合。後來，20多個、30多個組織，成立了人民公社，來向我們報喜，要我們參加大會。我們一面報告中央，一面去參加大會。中央來電答覆：群眾奪權支持，但光有他們不行，要三結合，要我和文元同志參加，還要和軍隊商量。要他們參加。這樣到2月初，把班子搭起來，算奪權成功了。

那時一天要打一次到二次電話向中央報告。我們在中央指示下，主席關懷下，大體上奪權勝利，還是比較順利的。⁸³

張春橋在另一個場合還說過，上海的一月奪權，「每前進一步都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們那時「每天系統地給主席打一次電話，都是我和姚文元打的。我寫了他改，他寫了我改。我們的工作都是毛主席、黨中央直接指揮着進行的。」⁸⁴

在整個接管或奪權高潮中，工總司的態度始終比較冷靜。工總司沒有利用自己組織的威信，去接管市委或市人委的權力，而當時，工總司已經是上海最大的造反組織。從當時的工總司所發傳單看，工總司總部沒有參加過任何其他不是張春橋指揮的奪權；除了潘國平被紅革會拉去的那次，但也只是潘國平的個人行動，不是總部決定。不過，工總司下面的造反隊，許多都參與了對工廠或上級公司、局甚至市裏的奪權接管行動，一些造反隊還把奪來的公章交到工總司總部。有個輕工業局所屬公司下面工廠的造反隊，把全公司下面工廠的圖章統統收繳，送去工總司總部。甚至有人還把從市委和華東局收來的

83 張春橋 1971 年 1 月 4 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第 4 次黨代會上的政治報告(紀錄稿)。

84 張春橋 1968 年 1 月 11 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

公章送到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王洪文只好把這些公章暫時鎖在廠保衛科。

小結

毛澤東在號召奪權時，顯然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張春橋和周恩來、陳伯達等人，反對造反派將什麼事都扛在自己肩上，主張還是由原來的幹部們負責各方面工作，造反派的職責是在一邊批判他們的錯誤。其實質，是希望造反派監督幹部，而不是替代幹部們行使權力，這應該是民眾監督權力的方向。但是毛澤東卻支持造反派的接管行為，並將此進一步上升為奪權行動，而且一下將之推向全國。看似舉重若輕，但如此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不經決策層慎重討論，更不經局部地區試行，就這樣急匆匆輕飄飄地由《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形式發出，不要說各級幹部毫無思想準備，就連造反派也不知該怎樣具體操作。權力的置換是這樣突然，沒有交接，沒有過渡，更沒有規則，一切都是如此無序：幹部們因沒有被正式免職，不知是否還應該繼續履行職責；奪權者們因沒有被正式任命，既無合法性又無權威性；即使想承擔些責任，因不掌握必要管理信息，更因沒有形成系統的管理網絡，無法有效開展工作。整個社會一片混亂。

文革在1967年1月進入轉折。全國的幹部，從中央到各省市到基層，在一片打倒和奪權聲中兵敗如山倒。幹部們與造反派的關係跟兩個月前大不相同。兩個月前，造反派要求幹部承認自己的革命群眾名份，現在他們不再需要幹部們承認。相反，幹部們將要由造反派來判定，誰是革命幹部，誰是走資派。這種顛倒，反映了幹部權威與造反派權威的轉換，並由此帶來話語權轉換，以及政治名份評定權的轉換。

毛澤東肯定了在一個強權國家，處於弱勢的底層民眾監

督和撤換權力強勢集團的合理性，但卻沒有從操作層面，使之制度化尤其是規則化和法律化。毛澤東出於對權力機構的監督設想，在文革初期支持對幹部衝擊；但是奪權卻使那些衝擊幹部的造反派進入權力機構，成為幹部權力的接替者。毛澤東用紅衛兵、造反派這些體制外力量，去衝擊他所認為的體制內痼疾。但是，他用的方法仍然是體制內的。毛澤東引進體制外的力量，在體制內作改革，但在過程中又將體制外力量轉化為體制內成份。就這樣，權力的監督者成為權力的擁有者。於是對造反派們來說，他們前一階段所努力爭取的各種革命名份，到這時才真正名至實歸：從普通工人或學生轉換為各級管理機構的人員甚至領導人員。但是，毛澤東希望讓底層民眾監督權力的初衷，卻最終降低成為一場權力置換，一場權力再分配。

奪權是毛澤東最失敗的文革舉措，文革開始脫離毛澤東的掌控，發展到不可收拾。奪權使得國家從中央各部，到各省市，到工廠企業的管理階層，全部陷於癱瘓或半癱瘓，更引發群眾組織之間的惡性內戰。於是，自從一月奪權開始，文革已經不再是造反派與走資派的較量，而是造反派之間爭奪權力的較量，最後發展到動槍動炮的全面內戰。

第十九章

1.28 炮打張春橋 上海的紅衛兵運動式微

復旦三派紅衛兵打派仗

正當新上海公社在緊張籌備中，造反派內部出現了一場危機。發難者是上海三個最大最有影響的紅衛兵組織——紅革會、紅三司和炮司，目標是張春橋。

對張春橋的不滿，最初公開表現在對蔡祖泉的評價上。蔡祖泉是復旦大學電光源實驗室的工人工程師，文革前夕上海著名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復旦大學文革剛開始時，蔡祖泉曾經貼大字報反對學生罷免復旦大學黨委。1966年12月朱永嘉造反時，動員蔡祖泉也造反，蔡便在12月3日復旦大學「批判反革命分子楊西光大會」上發言，表態造反。蔡祖泉造反，馬上被寫成簡報匯報中央，毛澤東看到簡報後，說蔡祖泉這樣的人造反，代表了一個階層，因為他是工人中的標兵，這樣的人起來了，說明上海市委原來的基礎動搖了。毛澤東評價蔡祖泉的話，由張春橋在1966年12月23日接見造反派時傳達。

但是，12月6日，赤衛隊成立大會上，剛造反三天的蔡祖泉又去出席並發言祝賀，還受聘當了赤衛隊的顧問。紅三司認為蔡祖泉造反沒幾天，又去加入老保，是假造反。1967年1月10日，復旦紅三司所屬「反復辟」貼出大字報《復旦大學必須第二次大亂》，暗示蔡是假標兵，假造反。紅三司大字報矛頭實際對着紅革會，因為是紅革會去動員蔡祖泉造反的，而且之前

蔡祖泉還加入了紅革會。¹ 1月14日，紅革會傳達張春橋對蔡祖泉的評價。紅三司的「反復辟」當日馬上貼出一個聲明，說有人利用蔡祖泉的問題，在造反派內部製造分裂；還署名「內戰小組」貼出由安文江等撰寫的大字報《向紅革會某些人大喝一聲》。紅三司借蔡作文章，指責紅革會，紅革會也不示弱，立即貼出反擊大字報，署名「打就打」，意即「你們要打內戰那就打吧」。1月17日，復旦紅三司的「紅畫筆」貼出海報，說當日晚上舉行「打內戰自由辯論大會」，希望各組織的負責人統統到場。晚上，紅革會的勞元一、紅三司的安文江、「孫悟空」的胡守鈞都到會。但這個辯論會最終開得不歡而散。1月18日，在復旦禮堂，又舉行第二次辯論會。紅三司將《復旦大學必須第二次大亂》重抄貼出，還貼出另一張大字報《再論復旦必須第二次大亂》。1月25日，紅三司的「殺閻王」戰鬥組又貼出大字報《分歧從何而來》，指責紅革會「一貫右傾」，紅革會則在《紅衛戰報》上發文，說紅三司是「托派」。

紅革會看不起紅三司。一則紅革會人數遠比紅三司多得多。二則紅革會參加了上海除安亭事件之外的一系列大事件：解放日報事件由紅革會發起；寫作班集體造反大會，由紅革會和機關聯絡站共同組織；「打倒上海市委大會」，有紅革會發言；《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上，紅革會名字排在第二和第三名。而紅三司與這些大事全部無關。紅三司則認為，自己沒能在「兩個文件」上署名，是紅革會排擠所致。

紅革會能得風氣之先，與市委寫作班郭仁傑的密切關係是重要原因。郭仁傑是紅革會顧問，市委寫作班集體造反，郭在紅革會和寫作班之間起了牽線作用。後來他成為機關聯絡站負責

1 蔡祖泉，男，1924年生。原是復旦大學電光源研究所的工人，六十年代後開始從事電光源研究，在復旦大學其他教師的幫助下，研製出十幾種新型電光源，被評為上海第一代工人工程師，文革前是上海著名的先進人物、事迹被許多報紙多次報道。文革後被評為教授，碩士生導師，任復旦大學副校長至退休。

人，機關聯絡站但凡組織什麼活動，他大都會讓紅革會知道。

在紅三司與紅革會唇槍舌戰之際，炮司在復旦的組織「東方紅」也捲了進來。「東方紅」從造反初期，就與紅革會在「揭揭看」上不一致，以後兩個組織之間的往來很少。而炮司與紅三司的關係一直比較好，兩個組織對紅革會的態度也十分一致。1月20日，「東方紅」下面的「孫悟空」貼出大字報《我們的觀點》，說「紅革會頭頭執行了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1月25日「東方紅」在復旦大學貼出大量傳單：「紅革會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的作用必須重新評價！」

復旦校園內，風雲突起，紅三司、炮司、紅革會，三派組織內戰打得難解難分。²

炮司貼出大標語

打內戰的同時，炮打張春橋的準備已經在悄悄進行。復旦的「孫悟空」是最早行動的。「孫悟空」是復旦「東方紅公社」下面的組織。「東方紅」在市裏加入了炮司，但在復旦仍稱東方紅公社而不稱炮司。1月14日和15日，「孫悟空」戰鬥隊兩次開會分析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勢，他們認為三十年代與魯迅筆戰的「狄克」是張春橋的化名。魯迅1949年後越來越被神化的地位，使得紅衛兵們以為這是張春橋的七寸；此外，張春橋

2 以上三派組織打內戰的資料，以及本章資料來源，除注明出處外，均來自上海市委機關聯絡站1967年3月編《以紅革會某些負責人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是朱永嘉給筆者的，據朱永嘉告訴筆者，這份「紀要」編成後，經張春橋親自看過。另一資料來源是《紅革會混蛋頭頭炮打中央文革小組罪行錄》，「新復旦」紅革會造反聯絡站聯合調查組1967年2月19日編，紅衛兵上海市工農一中革命委員會翻印，原文為油印件。以及傳單勞元一1967年2月14日的《交代書》，該傳單為鋼板刻寫油印，沒有注明編印組織。還有紅革會上海外國語學院野戰軍「法四迎新春」、「從頭越」1967年2月4日編：《紅革會頭頭炮打張春橋同志大事記》，原文為油印傳單。

妻子文靜曾經被做過結論有「自首變節」行為，紅衛兵們認為這也是張春橋的軟肋。而且，紅衛兵們認為張春橋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之一，也是領導幹部，既然其他幹部文革中全部都可以懷疑，為什麼張春橋就懷疑不得？幾天前趙全國被抓，更引起紅衛兵不滿，「孫悟空」負責人胡守均當時在場，他覺得張春橋鎮壓不同意見的紅衛兵，急欲取代上海市委。他文革後多次回憶說，他最初炮打張春橋的念頭，就是在看到趙全國被抓那一刻產生的。1月中旬，炮司整理出一份近二十頁的關於張春橋的材料。這個油印資料絕對保密，只印了20份，但還是被紅革會的「二處」搞到手；這對紅革會後來也投入反張春橋，起了很大作用。

就在「孫悟空」悄悄準備反對張春橋之時，紅三司也將矛頭對着張春橋。紅三司對張春橋也沒有好感，認為蔡祖泉造反之事，是張春橋向毛澤東匯報，樹蔡祖泉其實是為了樹他張春橋自己。他們不知中央決策層對上海情況，除了張、姚這條信息渠道，還有另外中央文革小組記者站。蔡祖泉造反時張不在上海，他造反的情況，就是中央文革小組記者站匯報上去的。³

在對待張春橋的態度上，「孫悟空」和紅三司觀點一致，共同攜手。1月21日，復旦「孫悟空」和復旦紅三司的「反復辟」等戰鬥組，在江灣體育場聯合召開「批判蔡祖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會場上貼着「直追後台老闆」、「揪出蔡祖泉，直追黑後台」等大幅標語。矛頭既對着紅革會，又暗指張春橋。第二天，「孫悟空」和「反復辟」又在復旦校園刷出大標語：「在蔡祖泉問題上欺騙毛主席的人絕沒有好下場！」「打在蔡祖泉身上，痛在誰的心上？」但是，炮司幾次開會討論是否要炮打張春橋時，意見總是不一致，有人同意有人反對，也有人認為懷疑可以，要付諸行動則最好再看看。「孫悟空」負責人胡守鈞決心要炮打，說既然你們意見無法統一，那

3 朱永嘉、金光耀 2006 年未刊稿《已申春秋》。

我們就自己幹，用我們「孫悟空」的名義行動。⁴ 1月23日晚上，「孫悟空」開會討論形勢。胡守鈞提出，1月25日，全市造反派要召開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大會，聽說會上將有人提出成立新市委，並要求中央讓張春橋來當上海市委書記。必須搶在此前製造反對張春橋的輿論。於是他們連夜兵分兩路，到南京東路、西藏路和淮海中路等鬧市區以及復旦校園，張貼反對張春橋的大標語和大字報，統一署名「孫悟空」，沒有用炮司的名義或炮司在復旦的組織「東方紅公社」的名義。

1月24日清晨，南京路、西藏路、外灘等上海鬧市地區，一大批大標語映入上海市民眼簾：「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誰在蔡祖泉問題上欺騙毛主席，決沒有好下場」，「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警惕陶鑄、王任重式的人物」，「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一場炮打張春橋的序幕，就這樣首先由復旦「孫悟空」拉開。

1月24日凌晨3時，三大組織的頭頭胡守均、周谷聲、安文江、勞元一等四人去機關聯絡站，要求張春橋接見，說要向張春橋請示一些問題。徐景賢出面接待，質問他們說：你們已經在外灘和南京路等地方貼出炮打張春橋的標語了，還談什麼「請示」？徐景賢問他們炮打張春橋的理由，胡守均答：「中國的語言是最豐富、最精確的，我們的標語充分表達了我們的觀點。」紅革會的勞元一一言不發；紅三司的安文江則模稜兩可地說：「腦子裏懷疑是可以的，但不同意孫悟空把口號貼到街上去」。⁵

1月25日，「孫悟空」又貼出《一問張春橋！》、《為什

4 這個細節是筆者 2011 年 4 月 26 日對原炮司成員紅鸞採訪時，紅鸞說的。

5 上海市委機關聯絡站 1967 年 3 月編《以紅革會某些負責人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

麼——二十問張春橋！》等大字報，直接點名張春橋。紅三司的「反復辟」貼出大標語：「決不讓上海文化大革命走過場」、「懷疑一切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當日晚上，復旦紅三司召開勤務組擴大會議，研究對張春橋的態度。一致意見「我們不保」。同日，上三司也以趙全國被抓為由，在全市貼出標語：「挑動群眾鬥群眾的人決沒有好下場！」「揪出圍攻上三司的後台老闆！」

市紅革會猶豫，復旦紅革會積極

「孫悟空」和「反復辟」公開亮出炮打張春橋的旗幟，紅革會坐不住了。紅革會最早知道炮打張春橋，是在1月17日晚上的那個「打內戰自由辯論大會」上。當時數學系的一個紅革會紅衛兵在台下，聽見兩個東方紅公社的紅衛兵議論：「張春橋是陶鑄、王任重式的人物，把張春橋揪出來，紅革會就完蛋了，要把紅革會的後台揪出來」。此時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副組長王任重剛被打倒不久。辯論會散後，這個學生將這話告訴了勞元一。勞元一立即感到眼前紅革會與紅三司和炮司的這場內戰「非同小可，有些人搞紅革會是項莊舞劍」。他當晚便將此事告訴復旦紅革會勤務組。以後的幾天，他去康平路找過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要張春橋單獨接見。他文革後回憶：「我那時要弄清的，就是毛澤東到底是不是支持張春橋。我去康平路找張春橋的事，馬立新他們不知道」。⁶

6 傳單：勞元一1967年2月14日《交代書》。原件為手刻油印16開傳單，沒有注明散發單位。在這份交待中，勞元一說張春橋未接見他們。又據筆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對勞元一的電話訪談，勞元一回憶，炮打前幾天，大約1月20日左右，張春橋單獨接見了他，「我就當面問張春橋。現在對你有不少傳說，有些材料不像假的。我希望你能夠給我們答覆。例如，你是不是曾經用過狄克的名字，你是否曾經寫過文章反對過魯迅，等等。我們希望你能拿出中央的證明，如果你不能證明你沒有那些事，那麼一場炮打是不可避免的。我覺得張春橋聽了我的話很緊張。他

接着的幾天，「孫悟空」和紅三司的大標語和大字報指向越來越明確。1月24日上午10時接見三個組織的那個會上，徐景賢對「孫悟空」提出警告。炮司負責人馬上針鋒相對地發言：「徐景賢，我警告你，你剛剛的發言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當心你自己！」一旁的勞元一這才明白「孫悟空」和炮司的組織關係。但他沒有發言，保持了沉默。他後來回憶說，因為這一方面他覺得他們復旦紅革會和「孫悟空」關係一直不好，還是少說為妙；另一方面，「又覺得孫悟空的闖勁很足，他們如果有材料，那就讓他們去懷疑，這也未嘗不可。我不知內情，不必多發言。張春橋是當權派，他如果有問題有人要揭發他，大方向還是對頭的。」⁷徐景賢會後責怪勞元一不表態，說你們紅革會只在旁邊看，這種態度不對。徐景賢的觀察很敏銳，「在旁邊看看再說」，確實是市紅革會總部一部分負責人最初的態度。

這個會後來被打斷：當天上海柴油機廠發生的「聯司」和「東方紅」兩派群眾組織發生嚴重衝突，各組織聞訊都立即趕往上柴廠。

市紅革會負責人馬立新當時也不贊成炮打，他還責怪勞元一在1月24日上午的那次會上不該不表態。馬立新是從對文革的評價，考慮是否要炮打張春橋的，他曾經為此與勞元一討論過好幾次：

談及上海運動的狀況說如果張春橋也可以懷疑，那麼安亭事件、兩個重要文件（即《告上海人民書》與《緊急通告》

什麼也沒說，只是抽煙。「我又表示，我可以等你的回音」。為了等張春橋回音，勞元一說他甚至曾睡在「機關聯絡站」一兩天。「就這樣等了幾天。我覺得在此期間，張春橋是一直希望中央有所說法，但可能始終沒等到」。張春橋後來沒再單獨見他。

7 勞元一1967年2月14日《交代書》。

一筆者注)、奪權鬥爭、反對經濟主義鬥爭以及八十萬赤衛隊員要翻案怎麼處理等等。⁸

1月25日，徐景賢出面召集各大學紅衛兵負責人在上海大廈開會。徐景賢說：「在新上海公社即將誕生之際，社會上颳起一股針對春橋同志的陰風，很值得同志們深思。」他點名要復旦紅衛兵的幾個負責人表態。炮司負責人周谷聲說：「如果張春橋是左派，一萬張大字報也貼不倒」；「孫悟空」負責人胡守鈞說：「相信群眾嘛，你們緊張個屁」；紅三司負責人安文江虛晃一槍：「假如沒有材料證明張春橋有嚴重問題，我就承認他是革命左派」；「紅革會負責人馬立新以攻為守：「希望機關聯絡站的秀才們認清形勢，擦亮眼睛。」⁹ 徐景賢召開的這次會議不歡而散。

與市紅革會總部的猶豫不同，復旦紅革會對炮打卻比較積極。1月25日晚上，市紅革會總部在市裏奪權的第二天，復旦紅革會勤務組的趙基會、謝葆晨，還有復旦「大隊部」的金應忠等人，在復旦紅革會成員周向東的宿舍裏討論形勢。大家認為：市委寫作班對陳丕顯的問題揭得很少，是假造反；上海之所以沒有徹底亂，和寫作班、張春橋有關。¹⁰ 大家還認為：張春橋來上海，依靠的是市委寫作班，而市委寫作班是假造反；張春橋依靠公革會，但公革會也是名為造反組織，實為老保組織；專門鎮壓造反派組織；尤其在對待上海柴油機廠聯司與東方紅衝突的1月24日事件中，公革會抓了大批聯司的造反派。所以，對付張春橋要採取「一文一武」的兩手戰術，文搞寫

8 勞元一 1967 年 2 月 14 日《交代書》。

9 安文江著《我不懺悔》，載於《東方紀事》1988 年創刊號，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10 油印傳單：《紅革會頭頭炮打張春橋同志的大事記》，紅革會上海外國語學院野戰軍「法四迎新春」、「從頭越」1967 年 2 月 24 日。

作班，武搞公革會，「抓住這兩點，上海可以亂起來」。¹¹而且，張春橋過去負責分管宣傳和政治思想工作，錯誤肯定不少。最後決定，先寫一篇大字報《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其中對張春橋、姚文元和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十個問題。趙基會說：「孫悟空」已經點了張春橋的名，紅革會要抓緊時間。

大家還決定，馬上派人，去公安局與聯合兵團掛鉤。「聯合兵團」(全稱「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聯合兵團」)，是公安系統的又一造反組織，與公革會關係緊張。說張春橋與公革會關係密切，就是聯合兵團提供的。

復旦紅革會決定炮打張春橋，還有一個原因：他們得到了證明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的「重磅炮彈」。那是1月23日，市紅革會總部派師院紅革會負責人池東明去北京，要求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揪來上海批判，以此提高紅革會的革命地位。¹²池東明去北京沒揪到人，和同學又去了西安，在西安交通大學的「牛棚」裏，他找到被造反派停職的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據說霍親口對他說：「我用腦袋擔保，張春橋是叛徒！」¹³26日凌晨，復旦紅革會一幹人正在準備撰寫大字報之際，又接到賀學軍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賀學軍是師院紅革會成員，1月20日被派駐市紅革會總部在北京的聯絡站。她電話中說，北京街頭出現大標語：「江青、陳伯達、姚文元同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沒有張春橋的名字。這一系列消息，更讓大家覺得張春橋肯定有麻煩了。晚上，《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

11 轉引自《紅革會頭頭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罪行必須徹底清算》，載於《反逆流特刊》1967年2月20日，新復旦紅革會造反聯絡站編；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2 池東明去北京是為了揪彭、羅、陸、楊一事引自《新師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新師院人民公社1967年7月編。

13 卞全著《正當風華正茂時——同窗池東明「炮打張春橋殉難40周年散記」》，載於《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4期，北京春秋出版社《炎黃子孫》雜誌社出版。作者卞全還告訴筆者說，「1.28炮打」之前，他親眼看到池東明記錄的與霍士廉談話的筆記。不過事實上，張春橋歷史上從來沒有被捕過。

大字報貼出。這張大字報後來被稱為「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同志的反革命宣言書」。同時貼出的大字報，還有署名「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市委寫作班是什麼貨色》。

與此同時，市紅革會總部也於26日晚，在復興中路1367號總部辦公處召開常委會。會上大家都同意提出「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的口號，並擬出《三十個為什麼》。但是，對究竟要不要立即行動，未達成統一意見。勞元一提出先不針對張春橋，而是針對寫作班，「火力偵察」，看張春橋如何反應，再定下一個步驟。勞元一認為，徐景賢和張春橋關係很近，揪住他，就是揪到了張春橋的材料袋，這樣也可留有回旋餘地。馬立新不同意行動，持保留意見。最後決定，後天上午召開全市各校紅革會負責人會議，再討論決定是否行動。

但是接着而來的新信息，又打亂了市紅革會頭頭的炮打決心。1月26日晚上8點多，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給市紅革會打電話，要他們派人去交流情況，勞元一等人前往。出席會議的還有新北大駐滬聯絡站，以及北京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的代表。到會的北京紅衛兵都不支持炮打。會議開到半夜1點多才結束，最後共同擬定了幾條支持張春橋、姚文元的大標語。¹⁴

勞元一此時還是舉棋不定，既怕失去表現革命的機會，又怕如果失敗引出的後果。他後來回憶說：

此時我的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和機會主義完全佔了上風，站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立場上，非常害怕成為保守派，害怕別人的批評，同時也害怕萬一這些人是對的，那今後自己怎麼辦？紅革會怎麼辦？……

同時我也考慮到這一步如走錯，就要身敗名裂的，覺得這是一個大事情，不能隨便決定。¹⁵

14 勞元一 1967 年 2 月 14 日《交代書》。

15 同上。

市紅革會總部的勞元一、馬立新等負責人還在猶豫不決，復旦紅革會的謝葆晨、趙基會等負責人，卻已經鐵了心要炮打。一批針對紅革會的大標語，也促進了紅革會下決心。1月26日，馬路上出現一批新的標語：「紅革會是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徹底批判紅革會頭頭的右傾機會主義」，等等。都是與紅革會曾有過節的紅三司等組織貼出的。27日下午，復旦紅革會的趙基會去市紅革會總部，正式通知市紅革會總部負責人馬立新：「我們的大字報已經貼出去了，我們就要幹了」。「不幹就要被人家弄去了。我們幹，弄錯了是復旦的問題，弄對了，也有市紅革會的一份功勞。」¹⁶ 復旦紅革會已經等不及市紅革會總部的決定了。不管市紅革會是什麼態度，復旦紅革會都要行動。

1月28日凌晨2點，勞元一剛回復旦，馬立新告訴他，復旦紅革會的已經派人去機關聯絡站抓徐景賢去了。馬立新要求立即將人追回來。馬立新告訴勞元一，中央文革小組堅決保張春橋。勞元一後來回憶：

馬立新又拿出駐京聯絡站打來的長途電話記錄，說蒯大富問過中央文革了，說張春橋是堅定的革命左派，要保護。我一聽很高興，心想這下保對了。¹⁷

這個電話應該是師院紅革會的池東明打來的。前兩天池東明還傳回「張春橋是叛徒」的消息。但他到北京後，賀學軍安排他住在清華大學蒯大富的宿舍。蒯大富堅決反對炮打張春橋。池東明給總部打來電話的記錄如下：

16 上海市委機關聯絡站 1967 年 3 月編《以紅革會某些負責人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

17 勞元一 1967 年 2 月 14 日《交代書》。

春橋緊跟主席，是堅定左派。蒯已命清華井岡山聯絡站痛擊反張逆流。¹⁸

「蒯」即蒯大富。蒯大富還打電話給「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希望能阻止紅革會的炮打行動。而就在池東明打來電話的前一小時，紅革會駐北京的賀學軍也打來電話：

1月28日凌晨一時許，紅革會駐京聯絡站賀學軍同志來長途電話，對反對張春橋同志的這股歪風必須堅決回擊，毛主席的指示就是直接傳給張春橋的，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春橋就是跟主席跟得很緊的。¹⁹

勞元一暗自慶幸，自己此前與北京駐滬紅衛兵組織擬定的保張春橋標語，是「保對了」。但他還是有點猶豫：

勞元一的態度是模稜兩可的，說什麼「這個消息真實不真實？1.18搶黑材料之前，聽了陳丕顯的一句話，結果上了當，現在他們（紅三司、炮司）大反我們右傾，搞得我們好苦。」停了一下，又說：「不過，這一次是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你們主張保，就保他吧！」²⁰

- 18 《池東明從北京打給市紅革會總部的電話記錄稿》，市紅革會總部，1967年電話日期是1月25日至26日之間。這份記錄是金光耀提供給卞全的，筆者在卞全處看到。電話記錄的後半部分是「我軍可全線出擊，揪人一事，速求春橋來電支持，望果斷決策，切勿舉棋不定，坐失戰機。池」，「揪人」即揪楊尚昆等人來上海批鬥之事，是池東明去北京又一目的。而包炮也是在中央急電下達之前，接到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的電話，告之蒯大富反對炮打的態度。包炮立即去復旦，但沒找到紅革會和炮司的頭頭。
- 19 油印傳單：《紅革會頭頭炮打張春橋同志的大事記》，紅革會上海外國語學院野戰軍「法四迎春」、「從頭越」1967年2月24日，1967年1月27日。
- 20 同上。勞元一所說的「搶黑材料」上陳丕顯當之事，是指復旦大學三派紅衛兵在1966年11月準備搶黑材料之前，陳丕顯找勞元一、安文江和東方紅公社負責人談話，要求他們再緩三天，並承諾「如果三天之後復旦黨委

勞元一擔心，如果因為消息不準確而停止行動，那紅革會以後更會被紅三司和炮司說成右傾。而馬立新則立即打電話找已經帶隊出發去抓徐景賢的謝葆晨，希望告訴他們，如果還沒有行動，就馬上撤回復旦，停止行動，但是電話沒有打通。正在此時，金應忠從機關聯絡站所在黨校打電話來，說沒有找到徐景賢。馬立新當即想勸說趙基會他們立即停止行動。但沒等馬立新說上話，那頭電話已掛斷。幾分鐘後，機關聯絡站的電話來了，找馬立新，說你們紅革會的人綁架了徐景賢。²¹

復旦紅革會綁架徐景賢

綁架徐景賢的行動是復旦紅革會在1月27日晚決定的。當晚11時左右，復旦紅革會的謝葆晨、趙基會，以及復旦大隊部造反派金應忠等，在復旦大學開會。大家提出，紅革會如果再不行動，紅三司和炮司的「孫悟空」等都可能行動。紅革會必須佔據領先地位。復旦中文系紅衛兵提出，他們已經準備好50人，可以馬上行動。²² 1月28日凌晨1時，謝葆晨、金應忠等，分別帶領三路人馬，同時向市區進發：一路去機關聯絡站所在的淮海路市委黨校，一路去武康路2號原市委寫作班所在地，一路去康平路市委機關大院。每路隊伍都專門配有認識徐景賢的人。

去市委黨校的四十餘名紅衛兵由金應忠帶隊，騎着摩托車來到淮海中路市委黨校。他們首先控制了電話，七八個人挨屋搜索，找到了機關聯絡站另一負責人郭仁傑，說是要找徐景賢討論上海形勢。郭仁傑將他們帶到樓上，找到正在與人談話的徐景賢。徐景賢和他們剛說了沒幾句話，另外三十多人湧入，

再不交出黑材料，將以黨紀國法處理」。紅革會答應了。但紅三司和東方紅公社還是在第二天一早便行動，紅革會到下午才參與行動。

21 勞元一 1967年2月14日《交代書》。

22 傳單《「一·二八」綁架事件真相》，中共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1967年1月29日；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將徐景賢和郭仁傑團團圍住，說請兩人去復旦大學解答問題。徐景賢拒絕，他們不由分說架着徐就往樓下拖。徐一面大聲抗議一面掙扎。聞訊趕來的王知常攔腰死死抱住徐景賢不鬆手，想把徐奪回來。然終寡不敵眾，被從四樓拖到一樓，眼鏡也掉落在地。一輛吉普車早已在黨校後門等候，紅衛兵們敲打著不斷掙扎的徐景賢的腦袋，把他塞進了汽車，不肯放手的王知常也被一並塞入。王承龍上去和他們理論，也遭圍攻，被推得倒在水泥地，摔昏過去，不過還好並無大礙。²³ 程綺華等堵住黨校大門，試圖攔截，但是在後門的吉普車已經開往復旦大學。朱維鏗立即打電話向張春橋報告。張馬上讓秘書打電話給市紅革會負責人馬立新以及市紅革會勤務員、上海師院的繆財生，要他們立即釋放徐景賢。馬立新剛才接到的，正是這個電話。他馬上與在場的勞元一等簡單商量後，決定放人。馬立新和勞元一立即趕往事發現場黨校。

機關聯絡站造反派又給上海警備區打電話，說有身份不明者綁架徐景賢，還打人，要求警備區保護徐景賢人身安全。警備區作戰處立即打電話，請示張春橋如何處理，張春橋說要「派兵追查」。作戰處又問：「是全副武裝還是徒手？就是部隊要不要帶武器？」，張春橋說：「這還用問，沒有武器還算什麼軍隊？如果不帶武器，我就不會同意派兵了，當然要全副武裝！」電話掛斷後，他對在一邊的姚文元說：「軍隊老是『不介入』，現在成了什麼狀態！」「一旦真的發生戰爭，像這樣怎麼能打仗！」²⁴ 張春橋師出有名。幾天前，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文件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要求「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23 同上，傳單《「一·二八」綁架事件真相》。

24 張春橋秘書何秀文揭發，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

警備區緊急調動駐扎在人民廣場附近的四個摩托車排和一個步兵連，由師政委徐海濤帶領，全副武裝趕到市委黨校，但紅革會人已離去，只遇到趕來的勞元一等人。此時已經是清晨5點多。勞元一見部隊出動，立即質問是誰派部隊來的？為什麼把槍口對着學生？要部隊當場承認錯誤。勞元一這是先發制人。其實，要求軍隊保護，在上海張春橋不是第一人，反倒是紅革會，紅革會是上海文革中第一個群眾組織要求軍隊派兵保護的。那是1月26日晚上，市紅革會總部在復興中路1367弄開常委會，李功佐打電話給上海警備區，說有人要衝擊他們，要求派兵保護。警備區建議他們轉移地點，但李功佐說「這裏有檔案，出了問題你們要負責！」經研究，警備區派出23人，相當於一個排，由一個師副參謀長帶隊，警衛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離開。²⁵ 所以紅革會自己也曾要求部隊出過兵。

本來，謝葆晨綁架徐景賢之前，勞元一和馬立新已經得到蒯大富轉告中央文革小組對張春橋的態度，所以勞元一和馬立新當即決定停止行動。但從行動現場打電話給馬立新的金應忠，沒等馬立新發出中斷行動的指令，便掛斷了電話。估計金應忠掛斷電話，是因為正當他和馬立新通話時，徐景賢被找到了，於是他匆匆掛斷電話去徐景賢處。面對既成的事實，已經知道中央文革小組態度的馬立新和勞元一，心裏一定很矛盾，下一步該如何走？如何應對可能到來的危機？

張春橋調動部隊，為紅革會提供了化被動為主動的機會。紅革會立即抓住部隊出兵一事，將此上升到「動用軍隊鎮壓紅衛兵小將」。帶隊的徐海濤剛進校門，就被紅衛兵們堵住質問：「你們把槍口對準誰？」「誰派你們來的？」徐海濤謹慎地避而不答。天已經亮了，復旦校門口人越來越多。徐海濤只

25 油印傳單：《紅革會頭頭炮打張春橋同志的大事記》，（紅革會上海外國語學院野戰軍「法四迎新春」、「從頭越」1967年2月24日）記載，1967年1月27日。

得打電話給張春橋，請示如何回答。張的秘書何秀文接電話。徐問：「是否可以把誰下的命令告訴紅衛兵？」「部隊是否可以撤回？」張春橋聽了秘書匯報，不高興地說：「豈有此理，這個問題我不回答，隨他們怎麼辦。」

紅衛兵們帶着徐海濤，去看被看守着的徐景賢。徐被單獨關在文科閱覽室內，徐海濤見徐景賢還算安全，便決定撤離。紅衛兵只放走了當兵的，將徐海濤和另一位參謀留下。他們想了解軍隊是誰派的，但徐海濤就是不肯說出是張春橋派他帶兵來的。不過，到最後，他含糊地不點名地承認，是張春橋派的。1月28日下午4時，徐海濤才被放回警備區。²⁶

徐景賢被揪到復旦大學後，知道來者不善，趁他們不備，撕掉隨身帶着的筆記本和電話簿。1月28日凌晨，勞元一、馬立新、謝葆晨等十多個紅革會負責人，來到徐景賢被關的閱覽室內。十幾個人坐在一圈折椅上，將徐景賢團團圍住。徐景賢與紅衛兵們虛與委蛇，避重就輕，不正面回答他們提的問題。看問不出結果，紅衛兵們丟下徐景賢，另外商量對策去了。

在將徐景賢揪到復旦的同一天，紅革會另一路紅衛兵去地處外灘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將朱永嘉也揪到復旦校園。朱永嘉那天正好生病，看守朱永嘉的，是和他一起在火線指揮部工作的紅衛兵，見他不舒服，就把他送去校衛生室，讓他一直睡覺，沒有為難他。

市紅革會的部分負責人，本來對要不要行動猶豫甚至反對。但部隊的出動，反而使他們抓住了行動理由。1月28日上午，市紅革會總部在全市散發傳單《1.28事件真相》。反對張春橋的大標語遍佈鬧市區及復旦校園，上海的許多大學和中學校園，也貼滿炮打張春橋的標語。「誰派軍隊鎮壓革命造反派決沒有好下場」，「揪出調動軍隊鎮壓復旦紅革會的後台老

26 徐海濤後來擔任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解放軍支左人員，王洪文去中央工作後，他被調北京，在軍委總政的保衛部工作，文革結束後自殺。

闖」，「打倒罪魁禍首張春橋」。紅衛兵們揚言，「要把這一全國性大事件上告到中央軍委」。²⁷ 與此同時，針對市委寫作班的傳單，也貼滿上海：

這樣的「寫作班」，這樣的修正主義黑窩，披上了革命造反派的外衣，到處指手劃腳，以運動的指導者自居。開會，要他們主持，發言，要他們批准，文件，要他們審查，抓人，要他們點頭。他們實際上成了左右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決策機構。他們有什麼資格？是誰給予他們這樣的權力？

這樣的「寫作班」，這樣的修正主義黑窩，現在已經成為上海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黑窩不端，國無寧日，現在不砸，更待何時？²⁸

紅革會又打電話要求張春橋、姚文元立即接見。張春橋說接見可以，但要先放人。

張春橋被圍攻

下午1點半，在上海展覽館咖啡廳，市紅革會召集各校負責人開會，市紅革會的主力：復旦大學、鐵道學院、華東政法學院、上海外語學院、上海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機械學院等，學校的紅革會代表都來了。²⁹ 公安系統的造反組織「聯合兵團」的代表也參加。會議由勞元一主持。勞元一首先

27 中共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1967年1月29日傳單《「一二八」綁架事件真相》。這份傳單據吳瑞武1977年3月18日的交待中說，小樣經張春橋、姚文元看過，張春橋還在上面用紅鉛筆改動了兩處。

28 傳單《黑市委的禦用工具——「寫作班」必須徹底砸爛》，復旦大學紅革會1967年1月28日晨4：00。

29 這個名單引自傳單《「1.28」黑會記錄》，上海鐵道學院「反逆流聯絡站」翻印(原文無成文日期和作者，估計成文日期在1967年1月底)。

抓住出兵之事，提出張春橋這是用軍隊鎮壓紅衛兵小將。本來被駐京聯絡站反對炮打的電話攪得有點失去底氣的紅衛兵們，又抓住了新的理由。眾人情緒十分高昂，說再不炮打，炮司他們要行動了。正在勞元一發言之際，一個電話打來。接電話者回來告訴勞元一，是張春橋打來的，說要和姚文元一起來與紅革會成員見面。³⁰

晚上7點左右，張春橋和姚文元來到上海展覽館咖啡廳。他們一來，便被紅衛兵包圍。剛進會場，相機馬上對準了他倆。剛坐下，兩台錄音機就放在了他們前面：有人甚至還寫了「打倒大叛徒張春橋」的牌子，要給張春橋掛上，被勞元一制止。那些給張、姚拍下的照片，將寄給他們，幾天後他倆都將收到。³¹ 這些照片和錄音帶，後來清算紅革會炮打時，被作為重點搜查內容。

在場的紅衛兵有一二百人。大家抓住「為什麼派軍隊鎮壓學生」不放，高呼口號「鎮壓學生運動的人絕沒有好下場」。復旦紅革會宣讀「十問張春橋」的傳單：為何在打倒陳丕顯的口號聲中，一些造反的市委知情人沒有揭出什麼東西，只放了幾個空炮？為何現在有人鬼鬼祟祟，提出要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市委？這風從何而來？文藝界蓋子為何沒有揭開？為何市委大保皇機構突然起來造反？造反後又揭了什麼？寫作班的羅思鼎，連對復旦歷史系黨總支都沒揭發出什麼，更沒有揭發復旦黨委楊西光，而他們卻成了左右上海革命的決策機構，很多大會都由市委寫作班控制。為何上三司一夜之間成了非法組織？到處都在砸上三司？張春橋為什麼對紅三司接管公安局支持，

30 筆者 2008 年 7 月 6 日在香港對勞元一的電話訪談。

31 收到照片是文靜回憶的，轉引自范文賢《無法無天的上海灘——所謂『一月革命』始末》，載於《上海法制報》1986 年 6 月 23 日；掛牌子的事情是勞元一 2008 年 7 月 6 日在香港對筆者講的。

對上三司接管市委卻不支持？等等。³² 紅衛兵們質問最多的是寫作班和徐景賢的關係，以及張春橋和寫作班的關係。他們指責徐景賢是假造反，說張春橋是徐景賢的黑後台。他們提出要砸爛寫作班，打倒徐景賢。他們說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是當權派，當權派都可以揪。他們說張春橋「你們在北京只會發號施令，現在到上海嘗嘗我們的味道。」³³ 參加會議的公安系統的聯合兵團，也趁機反映他們認為的公革會的問題。

張春橋一再解釋，說他當時不知道是什麼人抓徐景賢，雖然也有人報告說是紅革會，但他想紅革會與徐景賢關係不是一向很好嗎？而且他和姚文元在北京時，北京高幹子弟的紅衛兵組織西城糾察隊經常半夜抓人，所以他以為是其他什麼組織抓人，就同意了出動軍隊。後來了解到真是紅革會幹的，就和姚文元商量讓部隊撤走。³⁴

紅衛兵們一個勁地追問：「狄克是誰」，「你屁股上有屎，你三十年代做了些什麼」。³⁵ 在圍攻中，張春橋有時沉默不回答，有時慢條斯理，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煙，神態自若；不過後來也被弄得臉色發白。姚文元從頭到尾不說話，靠在張身邊的另一張椅子上，兩眼定定地望着天花板，這是姚文元的習慣姿勢。那天姚正好沒鬍鬚，滿臉絡腮鬍子，看上去一臉疲憊。³⁶ 紅衛兵們整整將張春橋和姚文元圍攻了6個小時。張春橋之前一直要求幹部們不要怕群眾的批判，現在自己也面臨這樣百口莫辯的批判。凌晨一時，他倆才得脫身。勞元一、趙基會

32 《1.28 黑會記錄》，上海鐵道學院反逆流聯絡站翻印。原文為油印件，無日期，估計是1967年2或3月。

33 傳單《對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六小時圍攻——請看紅革會頭頭墮落到何等地步》，《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2月2日。

34 傳單《「1.28」黑會記錄》，上海鐵道學院「反逆流聯絡站」翻印（原文無成文日期和原作者，估計成文日期在1967年1月底）。

35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272頁。

36 筆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對勞元一的電話訪談。

等回到復興中路1367號，高興地議論：這回張春橋和姚文元可算是失敗了。

張春橋的強硬態度激起紅革會的炮打決心。29日晚，市紅革會召集各校紅革會負責人，在復旦大學登輝堂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會上播放他們在咖啡廳對張春橋的錄音。晚上，復旦大學紅革會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復旦紅三司、東方紅公社包括「孫悟空」、紅教工、復旦大隊部造反派、赤衛軍等，也都趕來參加。會上，復旦大學紅革會勤務組謝葆晨，首先介紹復旦形勢。復旦大隊部造反派、紅革會勤務組成員金應忠介紹1.28事件，即綁架徐景賢以及軍隊出動事件。³⁷ 大家競相發言，對張春橋提出一個又一個疑問。「孫悟空」的胡守鈞提出「張春橋為個人奪權」，「張春橋挑動群眾鬥群眾」。³⁸ 安文江一口氣提出了向張春橋質疑的「24個問題」，還表示：「我過去是兩面派，現在要做一面派了」。被取締的上三司負責人也趕來了，趙全國被抓後，他們就打算反張春橋。最早掀起炮打的「孫悟空」更是義不容辭地加入。一些原來還在猶豫觀望的學生，也加入了炮打行列。表示要「將炮打進行到底」。³⁹

復旦大學的紅革會、紅三司和東方紅公社，幾天前還在打派仗，互相指責；儘管都反對張春橋，但各自為戰，各打各的。現在迅速結成了反張同盟，走到一起了。特別當他們聽到上三司負責人趙全國被抓消息後，更是同仇敵愾，許多人拍着桌子叫：「幹！」原來爭吵不休的各組織頭頭，現在感到大家

37 上海市委機關聯絡站 1967 年 3 月編《以紅革會某些負責人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

38 新復旦紅革會造反聯絡站聯合調查組 1967 年 2 月 19 日編油傳單《紅革會混蛋頭頭炮打中央文革小組罪行錄》，紅衛兵上海市工農一中革命委員會翻印。

39 上海市委機關聯絡站 1967 年 3 月編《以紅革會某些負責人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

觀點很一致，紅三司負責人安文江，與幾天前還睚眦相對的紅革會負責人緊緊握手。大家決定馬上實行聯合，成立「新復旦公社」。⁴⁰ 誓師大會會場氣氛越來越高漲。大家決定立即成立聯合指揮部，第二天即1月30日就在人民廣場召開30萬人大會，批鬥徐景賢，控訴張春橋「調兵鎮壓學生」，會後舉行炮打大遊行，將徐景賢遊街，去張春橋、姚文元住處示威。紅衛兵們希圖造成張春橋不得民心的既成事實，逼迫中央承認，這在文革中不乏先例。

而參加了上海展覽館咖啡廳圍攻張春橋、姚文元的公安局聯合兵團，散會後，馬上於1月29日凌晨，在虹口公安分局刷出「炮打張春橋」的大標語。⁴¹

徐景賢28日被從閱覽室轉移至學生宿舍。他剛到那裏，郭仁傑也來了。郭仁傑覺得紅革會去淮海路尋找徐景賢時，是自己領着他們去找到徐景賢的，誰知紅革會接着就將徐景賢綁架而去。他趕到復旦，找到徐景賢說：「老徐，我對不起你，我來陪你一塊兒關緊閉」。郭仁傑與紅革會紅衛兵關係很熟，這天晚上看守徐景賢的，又正是郭原來任教的哲學系學生。郭仁傑說服了這個學生，放徐景賢出去打電話。徐景賢已經從廣播喇叭中聽到了誓師大會內容。他找到一處公用電話，撥通興國路招待所，直接向張春橋報告：復旦正在開炮打誓師大會，明天他們準備在人民廣場召開十萬人的大會把我拉去批鬥，會後還打算到興國路一帶示威遊行。⁴²

4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41 上海文化革命資料聯合編輯部 1967 年 6 月編《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以及《公安戰報》1967 年 2 月 12 日第 2 號：《聯合兵團惡貫滿盈難逃滅亡命運》，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公革會)主辦。

42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工總司保張春橋

王洪文已得知炮打消息。1月27日，炮司在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炮司試圖說服王洪文參與炮打，王洪文不肯。29日中午，王洪文得到紅革會炮打張春橋的消息，馬上趕往張春橋下榻的興國路招待所，張春橋要秘書將耿金章也叫來。

此刻，工總司與二兵團正在互相衝砸。1月27日，二兵團認為自己的常委方劍華等被工總司南市區聯絡站綁架；耿金章調動上萬人當晚便將工總司南市區聯絡站砸了。工總司馬上派人於第二天也砸了二兵團南市區聯絡站。29日這天，秘書打電話找耿金章，始終找不到。耿金章此時正在南市區斜橋佈置反擊工總司南市區聯絡站。直到晚上耿金章才得到轉告，匆匆趕往興國路。張春橋正與王洪文談話，見耿金章進客廳，便問：「你們在幹什麼，都在打內戰，是不是讓人家看我們的笑話？」⁴³此時，紅衛兵的宣傳車已經開到興國路附近，正在一遍又一遍地高喊口號。耿金章後來回憶：

張春橋起身打開窗口說：「你們聽，外面還在炮打我呢！」…

張春橋關上窗戶，坐在沙發上，要王洪文和我各坐一邊。張春橋說：「你們兩個都是共產黨員，工總司中最早造反的共產黨員就你們兩個人。你們為什麼總是合不起來？總是鬧分裂？你們有沒有想一想，你們兩個的分裂會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你們這樣是讓人看笑話！」⁴⁴

張春橋將28日這一天發生的事告訴了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當即表態：「我們不打內戰了！」他馬上給二兵團總部

43 耿金章 1979 年 11 月 29 日。

44 耿金章 1979 年 11 月 27 日。

打電話，讓他們立即將隊伍調到興國路招待所附近的淮海路和高安路一帶，保護張春橋住處。王洪文也表示要一致對外，他通知工總司總部立即將陳阿大、等人召到張春橋住處來。一會兒，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等人趕來了，同來的還有包炮。張春橋把剛才對王洪文、耿金章講的話又重覆了一遍。陳阿大後來回憶他當時的態度：

我馬上看出張春橋要我們去為他鎮壓紅衛兵的意圖，我想機會來了，為了得到他對我進一步賞識的機會，不能錯過。我就對張春橋講：復旦大學紅衛兵哪來這樣大的膽，敢炮打你？貼大字報攻擊你，就是反對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對我們工總司，我要把支持紅衛兵的後台揪出來。現在我就要調遣反隊跟紅衛兵幹，用隊伍衝紅衛兵，把負責人抓起來，把大字報撕掉。⁴⁵

黃金海有些猶豫，他後來說：

我聽出會議目的是煽動我們去衝擊紅革會……

我對紅革會感情上是比較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對我們支持很大，要砸他們我思想上不大同意。⁴⁶

但是，黃金海也不敢在張春橋面前公開表示自己同情紅革會。據黃金海後來的回憶，事先王洪文和他交換了看法，都覺得不知炮打背景，工總司還是不要參與，看看再說。所以，當陳阿大表示支持張春橋時，王洪文沒有作聲。⁴⁷

包炮支持炮打，就在29日這天上午，他打電話給勞元一，

45 陳阿大 1977 年 6 月 14 日。

46 黃金海 1978 年 12 月 12 日。

47 黃金海對筆者的回憶。

表示支持紅革會炮打張春橋；下午2時，他又特地去復旦大學，找馬立新和勞元一，說派軍隊就是鎮壓學生運動。此時包炮在會上當場表態說：「我反對衝紅革會，我想不通。即使紅衛兵犯錯誤，為什麼用槍口對付他們？」⁴⁸張春橋馬上解釋：「我沒有意思叫大家砸紅革會。我只是同大家談談。」黃金海後來回憶，他覺得張春橋那天希望工總司去衝砸紅革會，因包炮反對而未能成功。

出了張春橋的住處，王洪文要大家跟他驅車前往復旦大學看大字報。到那兒已是半夜，一行人轉了個圈子，沒看到什麼動靜。不料回到校門外，卻發現他們停着的面包車車身上，也被貼上了打倒張春橋標語。⁴⁹

毛澤東口授中央文革急電

從1月27日至29日，張春橋、姚文元多次與王力通電話，王力要他們用機關聯絡站名義，寫個報告給中央文革小組，好讓中央表態。張春橋讓機關聯絡站王承龍辦理此事。王即組織人起草電報，而且馬上讓機關聯絡站派人往南京路和淮海路等處，抄寫街頭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密切跟蹤炮打動向，隨時上報。

向北京拍電報之事一波三折。張春橋提出，由市紅革會總部和機關聯絡站各向中央文革發電，報告自己觀點，但紅革會負責人認為這是個「大陰謀」，拒絕了。機關聯絡站於29日晚，將給中央文革小組報告的電報稿交市委辦公廳。但正當他們準備拍發時，被正在市委辦公廳的紅革會負責人馬立新以及機關另一派造反派「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的人看到。他們認為電報不符合事實，扣押了電報稿。王承龍等人急得和他們吵了一架，但電報還是沒能發出去。他們只得急忙趕到興國路招

48 黃金海對筆者的回憶。

49 同上。

待所向張春橋匯報，張春橋雖然焦急，但也無可奈何。⁵⁰

北京那頭，給上海的電報卻已經起草好了，這是毛澤東的佈置。毛澤東一向白天睡覺，得知上海情況後，29日那天白天沒睡覺，坐鎮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隨時等着上海機關聯絡站傳來的信息。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都在釣魚台等着不離開；周恩來也不斷去中央文革了解上海動態。整個事件都是毛澤東親自指揮。毛澤東要王力起草給上海的電報：

他親自決定，採取什麼措施，發什麼樣的電報。電報調子是他定的，不能說口授，也差不多……

這個過程是非常緊張的。毛主席在北京廳坐鎮，不斷等匯報。給上海的電報是我起草的，但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毛主席定的調子，當面對我講的，我記下來，又經過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我把它整理成文，文革小組討論通過，江青送給毛主席，告訴主席這是王力根據主席意思起草的。毛主席說很好，有革命氣魄(不是說有造反派氣魄)，還說了很多好話，毛主席很得意。⁵¹

但是，王力始終沒有等到上海發去的電報。王力很着急，因為這樣他向上海發電報便師出無名。王力向江青、康生和陳伯達請示後，於29日深夜打電話給張春橋，將準備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拍發的電報，逐字逐句告訴了張春橋，讓張春橋記錄下來。王力對張春橋說，這份電報發不發，何時發，授權張春橋決定。

張春橋再一次催促王承龍：「中央文革的來電稿已到我的手，你們的電報怎麼還沒有發出？要去催促，快發！」⁵²於是

50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276 頁。

51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878-879 頁。

52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276 頁。

王承龍他們又重新起草了一份電報，由駐滬空軍用明碼發出。⁵³此時已經是1月30日。時間緊迫，紅革會30日上午就要召開全市大會，還要遊行，刻不容緩。張春橋聽完電話，將中央文革來電的收報時間改為1月29日，讓人謄清，批「印八開，二十萬份」，讓妻子文靜交秘書何秀文聯繫印刷。還讓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馬上通知紅革會，制止大會召開。⁵⁴與此同時，張春橋打電話給謝鵬飛要他「準備些車輛」。謝鵬飛當即從汽車一場調了30輛加長型巨龍客車，停在人民廣場主席台的後面。此外，張春橋還讓警備區的部隊調人，也守在主席台後面。對這樣的佈置，張春橋以後曾說：「那一天，紅革會他們的會沒有開成；但如果真開成了，我是要抓人的。」⁵⁵

張春橋又讓秘書何秀文打電話給機關聯絡站，讓王承龍立即去市電報局等候王力電報；此時已經是1月30日早晨6點左右，但一直等到8點，才拿到明碼電報。由於明碼電報收到日期是30日上午8點，而上海印刷日期是29日；而且張春橋在收到電報前，以王力的來電記錄代替電報收文；那份張春橋簽署印刷的「電報」，拿不出電報收文記錄稿。於是當時有許多人懷疑是張春橋自己偽造的。

中央文革小組電報全文如下：

中央文革特急電報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同志並轉復旦大學的同學們：

-
- 53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 54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276 頁。
- 55 這是謝鵬飛 2012 年 10 月 6 日與筆者閒聊時說起的，並說這事別人都不知道。張春橋的這幾句話是他親耳聽到的。但他文革中始終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張春橋沒有具體要求佈置準備多少車，30 輛車是謝鵬飛自己決定的。謝鵬飛告訴筆者說：「我親眼看到，至少好幾百解放軍，密密麻麻地坐在人民廣場主席台後面的市體育宮內的練功室裏。」

一、復旦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

二、復旦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無理綁架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革命同志，必須立即釋放，並向他們道歉。

三、人民解放軍採取保護革命群眾組織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扣押人民解放軍的師政委和參謀，是十分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四、各群眾組織內部之間的爭執，應當採取協商和談判的方式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綁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復旦和上海的同學們，幫助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線。我們將要採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後果應當由製造這次事件的某些負責人和幕後的操縱者負責。

(請你們立即印成傳單，出動廣播車，廣為宣傳)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1967年1月29日

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央文革小組唯一給紅衛兵的一份特急電報。紅革會在1月30日早晨得到消息，立即決定：一、停止行動，包括大會、遊行；二、撕下一切反對張、姚的大字報、大標語；三、釋放徐景賢、朱永嘉和郭仁傑。⁵⁶

而在中央文革急電到達之前，勞元一已經接到清華大學井岡山負責人蒯大富的電話口信：

56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蒯大富在上海的代表包某來找我，轉告老蒯的話：

- 一、中央文革要發給上海一個電報，康生看過，語氣很重，對上海會有震動，要勞元一有準備。
- 二、文革總會有犧牲，要想得開。
- 三、以後不聯繫了。⁵⁷

勞元一接到口信，立即打電話去北京。他要求蒯大富幫忙將上海紅革會的情況轉告中央文革小組，蒯大富沒答應，並要紅革會慎重考慮。蒯大富告訴勞元一說，特急電報是真的，中央文革已經給他蒯大富打過招呼，叫他不要捲入。蒯大富還說：「當初我在監獄中，張春橋是第一個來看我的，你們這樣，我從感情上是不通的」。⁵⁸

1月30日上午8點，上海各造反組織在淮海中路市委黨校開會，聽取中央文革小組的急電。市紅革會總部負責人馬立新表示：執行中央文革小組決定，但保留意見。

紅革會不願認輸。2月1日下午，市紅革會常委在上海師範學院開會，馬立新和李功佐在會上再一次表示，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⁵⁹ 各校紅革會按照市總部佈置，貼出大標語：「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紅革會戰士要聽毛主席的聲音」，「誰欺騙毛主席決沒有好下場」，話外有音地表示不服。2月2日凌晨，以李功佐、池東明為首，帶領師院紅革會約二千人，一路高呼「打倒張春橋」口號，遊行至上海交通大學。⁶⁰ 他們還抱着一線希望，試圖以這樣的行動，向中央決策者們傳遞對張春橋強烈不滿的民意信息。他們剛用這樣的方式打倒了上海市委，以為還能用同樣的方式挽回自己的頹勢。他們沒有料

57 筆者 2008 年 7 月 6 日在香港對勞元一的電話訪談。

58 同上。

59 同上。

60 上海鐵道學院「反逆流聯絡站」1967 年傳單《「1.28」黑會記錄》。

到，特急電報的定調者正是毛澤東本人。炮打的組織和參與者們始終不願相信中央文革小組的急電，總覺得中央文革不可能用這種方式、這種語氣對待紅衛兵小將。⁶¹ 他們一遍又一遍地給在北京的賀學軍打電話，要她調查了解這個電報的背景是否真實。賀學軍回答：據我了解是真的，你們不要再打電話來問了。

但是炮打的組織者們還是不死心。1月30日，復旦大學紅革會的勞元一、趙基會，復旦紅三司的安文江、潘嘯龍，以及復旦東方紅公社的胡守鈞，還有復旦大隊部的金應忠等，二十多人組成北上告狀團去北京。他們怕在上海火車站被攔截，先坐上公安幹警的組織「聯合兵團」提供的公安吉普，潛行出上海，再從無錫上火車。他們2月1日到達北京，先去北京大學找聶元梓，聶避而不見。他們又去清華大學找蒯大富，蒯告訴他們電報不會假。還說：「你們想想，毛主席的戰略步驟是大聯合大奪權，上海開了個好頭。這個時候，上海能亂嗎？他張春橋能倒嗎？」⁶² 告狀者不得不面對殘酷事實：中央文革不支持他們。他們那時還不知道，歸根結底，是毛澤東不允許任何人反對張春橋。有人提議再去中央告狀，立即被大多數人否決。大勢已去，只有回滬挨鬥。2月3日，一行人回到上海，一出北站，就看到三條醒目的大標語：「絞死勞元一！油炸安文江！砸爛周谷聲」，「壞頭頭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堅決反擊炮打中央文革小組的反革命逆流」。⁶³

上海紅衛兵運動式微

1.28炮打終於平息。徐景賢被復旦放出。張春橋立即派車

61 紅革會的馬立新等始終不知道這份電報是毛澤東口授的，40多年後，仍堅持懷疑電報是張春橋偽造的。直到筆者告訴他們這是王力在回憶錄中提到的，他們再去查閱，方知真相。

62 轉引自安文江1988年回憶錄《我不懺悔》。

63 同上。

將他接去自己住處，了解復旦炮打詳情。⁶⁴ 反擊的大標語覆蓋了炮打標語。中央文革小組表態，工總司立刻行動。王洪文佈置工總司各區、局聯絡站立即組織人員，上街刷寫大標語和大字報，覆蓋炮打的大標語和大字報。

炮打事件之後不久，中央號召學生回學校，王洪文就此機會清理紅衛兵對工總司的影響。工總司當初是由北京紅衛兵以及上海的炮司等紅衛兵組織幫助籌建的，成立後相當一段時間，炮司仍協助工總司總部工作。工總司最初辦公地址就借在炮司內。王洪文、潘國平等工總司總部負責人身邊都有炮司紅衛兵，或對外聯絡，或記錄會議，或起草發言，實際起着秘書作用，工總司的許多重要文件都是他們參與起草。華東紡織工學院的陳斌、上海師範學院的江必雄等，曾跟着王洪文；華東紡織工學院的林翌曾跟着潘國平，還有復旦的周谷聲、邱麗鵬等，都曾經為工總司成立和初期活動出了大力。工總司各區聯絡站也有許多炮司紅衛兵。紅革會與工總司的關係也很密切。解放日報事件中，工總司進入解放日報社，有力地支持了紅革會。1月6日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也是工總司與紅革會、機關聯絡站為主，共同主辦的。但政治情誼最容易被政治變幻擊破。1.28炮打後，王洪文對葉昌明說：「工總司是堅決跟張春橋的，不能讓紅衛兵來控制，利用工總司反對張春橋。」葉昌明貫徹王洪文指示，動員在工總司總部的紅衛兵們「回校鬧革命」；工總司的各聯絡站也進行了同樣的清理。⁶⁵ 對工總司成立起作用最大的北京紅衛兵包炮，幾年後被審查，他所工作的單位向工總司發函，了解他文革初期表現，工總司總部如實反映，說他曾經參與過炮打：

64 吳瑞武 1977 年 3 月 18 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幫」辦公室編。

65 葉昌明 1977 年 6 月 14 日。

對包炮的問題，我們認為此人在運動初期，在籌建工總司時，他是做過一些工作的，但後來犯了不少錯誤，特別是在上海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同志時，他積極參加，錯誤嚴重。他的思想是極「左」的。⁶⁶

機關聯絡站對紅革會也毫不留情，從此不再來往。雖然當初寫作班集體造反，是由紅革會促成的。在「捍衛無產階級司令部」原則和政治情誼之間，他們選擇了前者。

紅革會下屬組織紛紛倒戈造總部反。2月2日凌晨，復旦大學紅革會舉行「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堅決擊退反革命逆流」誓師大會，宣佈接管勤務組。交通大學紅革會所屬「遵義縱隊」宣佈接管總部；上海師範學院紅革會成立「造反聯絡站」，宣佈「徹底清算總部負責人的罪行」。全市許多大學都成立了反擊炮打的「反逆流」組織，還在全市成立了「反逆流聯合指揮部」。紅革會四面楚歌。市紅革會勤務組不得不以總部勤務組名義發出《向毛主席請罪》文。各大學和部分中學的紅革會馬上步調一致，也紛紛請罪。復旦紅革會的謝葆晨和趙基會，還分別去朱永嘉家道歉。⁶⁷ 2月2日晚，市紅革會總部負責人在上海師院開會，「向毛主席請罪」；去北京控告的趙基會等，也從北京發來電報「請罪」。⁶⁸ 復旦大學的紅三司和「東方紅」，也發表聲明認錯。

張春橋不放過積極炮打他的學生領袖。2月3日，他應部分紅革會紅衛兵要求，發表三點意見：

一、歡迎紅革會戰士起來造反。

66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1970 年 9 月 25 日對北京市美術公司工、軍宣隊來函的回復。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67 朱永嘉、金光耀 2006 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6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二、對於一般紅革會戰士來說，不是請罪的問題，而是造反的問題；要請罪的不是廣大戰士，而是少數負責人，責任在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

三、這一場鬥爭，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能否貫徹的問題，關係到上海運動大方向的問題。紅革會戰士要造反，就要徹底肅清少數負責人對這次事件所造成的惡劣影響。⁶⁹

2月3日，「市紅革會接管委員會」成立，⁷⁰並於第二天2月4日，在文化廣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粉碎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誓師大會」。大會組織者是市紅革會所屬38個組織。大會勒令紅革會總部負責人「交代罪行」。參加炮打的市紅革會負責人勞元一、馬立新、李功佐等，市紅三司的安文江，炮司的周谷聲等，站在昔日他們批判別人的台上接受批判。不過此時對他們還算講政策，允許他們坐着，點名時再站起來。大會由郭仁傑主持，張春橋、徐景賢、王洪文、陳敢峰等都出席了大會。以後，這些紅革會負責人又被勒令去各所大學巡回批鬥，如同當初他們批判走資派。⁷¹

由徐景賢建議，2月15日，復旦大學成立了由原紅革會所屬的27個組織組成的「紅革會造反聯絡站」，由未曾捲入炮打者擔任負責人。3月3日，勞元一被宣佈「解除紅衛兵兵籍」。3月4日，紅革會在文化廣場召開「堅決擊退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大會」，徐景賢代表市革委會宣佈，派郭仁傑往復旦主持工作。⁷²會上還將陳丕顯和曹荻秋揪上台示眾，說他們是「炮

69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70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 1967 年 3 月《以紅革會某些頭頭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這本紀要。

71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280 頁。

72 復旦大學 1986 年 5 月編《大事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

打中央文革的罪魁禍首」。因為炮打之前，陳丕顯曾經被紅革會看守在上海師院近一周；⁷³ 之後又被紅革會關在長樂路紅革會總部。⁷⁴ 勞元一等紅革會頭頭與陳丕顯有過多次交談。張春橋和徐景賢因此欲將陳丕顯與炮打掛上鉤，說炮打是「走資派幕後操縱」。但以後查了許久，實在查不出什麼，只得不了了之。

3月15日，反逆流聯合指揮部在文化廣場召開「反逆流大會」，批鬥紅革會負責人。勞元一被宣佈開除出紅革會；市紅革會總部被宣告解散。炮打事件中被紅革會扣押的徐景賢、郭仁傑，作為機關聯絡站代表出席了大會，會後他們馬上到興國路招待所向張春橋匯報。張春橋非常關心整個炮打過程。3月間，機關聯絡站的郭仁傑和朱永嘉，特地組織人編寫了一本關於1.28炮打事件的詳細大事記：《以紅革會某些頭頭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張春橋看後評價：「你們收集了很多材料，紅革會炮打的大體眉目出來了。」⁷⁵

張春橋的強硬態度來自毛澤東。3月21日，徐景賢和郭仁傑去興國路向張春橋匯報「反逆流」情況時，張春橋向他們轉告毛澤東對這次炮打的態度。徐景賢在工作筆記上記下了張春橋的話：「毛說過，炮打張、姚就是反革命。」⁷⁶ 這是2月間張在北京向毛澤東匯報上海運動時，毛對張說的：

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是反革命嗎？！紅革會這筆賬是要算的！紅革會搞遊行、扣部隊、圍攻張，就是反革命！⁷⁷

73 這是當年上海師範學員紅革會成員的卞全文革後告訴筆者的。

7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75 轉引自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76 這句話出自徐景賢1967年3月21日的工作筆記，原文是記錄張春橋的講話。此外徐景賢在《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中還回憶說，姚文元也對他說過同樣內容的話。

77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281頁。

張春橋還要求郭仁傑抓緊反逆流。他說：「你們的材料我已經看過了，但我總懷疑紅革會有背景。比如說，他們紅革會究竟與原市委的那些人有沒有聯繫？有沒有人幕後指使他們？又比如說，中央文革來了特急電報後，紅革會的一些頭頭居然跑到東海艦隊機關裏去，用艦隊的紅色保密機向中央文革打電話，究竟是什麼人給他們提供這種條件的？有一些頭頭又趕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接待站裏又有什麼人表態同情他們？我總懷疑還有長鬍子的人在幕後策劃，這些事情好像都沒有查清楚。」⁷⁸

炮司的頭頭們也被批鬥，炮司在巨鹿路上的那個辦公處被「沒收」。「司令部」沒有了，炮司活動能力大受影響。

上海最大的三個紅衛兵組織：紅革會、炮司、紅三司，負責人全軍覆沒，組織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了過去的銳氣。就連《紅衛戰報》，原來以紅革會為主，與紅上司合辦；1.28炮打後，也被紅上司宣佈接管，從此由紅上司單獨主辦。

炮打事件中拒絕向北京拍發電報的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被內部造反「改組」，幾個負責人都被揪鬥。參加炮打的公安幹警造反組織「聯合兵團」，原想通過與最大的紅衛兵組織紅革會結盟，壯大自己的組織，這下全軍覆沒，負責人宋春生被關押。

同濟東方紅最初蠢蠢欲動。1月28日晚上，東方紅負責人陳敢峰打電話，向紅三司負責人安文江摸情況；並說：「我正式通知你，也請轉報紅革會頭頭。我們將參加你們的革命行動，若有聲明宣言請簽上我們的名。」但還沒來得及行動，形勢便急轉直下，第二天早晨中央文革急電到達，陳敢峰又打電話給安文江：「你們的行動與我們無關。」⁷⁹ 同濟東方紅還趕緊並

78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79 安文江 1988 年回憶錄《我不懺悔》。

於1月29日發出《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發言人聲明——關於目前形勢的幾點看法》，聲明「張春橋同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他在關鍵時刻是緊跟毛主席的，他是一貫支持革命造反派的」，等等。同濟東方紅轉向快，就此被其他紅衛兵組織譏稱為「投機東方紅」，陳敢峰也被譏稱為「陳看風」。交大反到底有部分負責人沒有捲進炮打，經過改組，也保全了組織。日後，同濟東方紅和交大反到底，在上海文革中的地位超過了紅革會、紅三司以及炮司。

中央文革小組電報到滬後，其他許多群眾組織也紛紛表態。一時「張春橋同志是堅定的左派」等大字報、大標語貼遍全上海。炮打導致上海文革中對造反派的第一次重新劃線。凡在炮打事件中的積極參與者，以後絕不允許重用，即使是當初一起出來的「老造反」也不例外。在工總司也是這樣，用黃金海的話說，「這幾乎成了一條『原則』」。⁸⁰

但是，對張春橋的反感仍然普遍存在。一年以後，上海又將掀起第二次炮打張春橋浪潮。

小結

在炮打之初，復旦「孫悟空」最先發難，是出於對張春橋的看不慣。但紅革會負責人卻始終搖擺不定。搖擺的原因，不是他們自己對張春橋的評價和認識，而是因為不確定毛澤東對張春橋的態度，換句話說，一些人的炮打動機更多不是出於正義，而是出於政治。紅革會的猶豫，顯示文革初期造反派行動的投機性，他們不是根據自己的感覺和判斷決定所要批判和打倒的對象，而是揣摩中央決策層的好惡。這是文革群眾運動的真諦。

紅革會後來雖然還是投入了炮打，但推動他們投入的原

80 黃金海 1979 年 7 月 9 日。

因，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因為怕落後於其他組織，怕失去革命造反組織的名份。文革中許多時候，一些群眾組織的行動與其說是批判、參與，不如說更多具有表態成份，唯恐落後，唯恐被狂飆突進式的革命淘汰。在這種爭奪「最革命」名份的心理驅使下，一場原本由「孫悟空」發起的炮打張春橋行動，就這樣被紅革會跑到了最前頭。顯示這場炮打，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場表現自己組織革命造反精神的表演。這樣的表演，以後將還會有許多，例如各種誓師大會、批判大會、講用大會、標語傳單，等等，甚至成為一種必要的政治儀式，貫穿文革始終。都是為了強化自己組織的革命名份。

對信息了解的多少，體現了政治地位。1949年後，各種政治身份和體制身份之間的經濟差別，在城市一般來說不是很大，差別主要體現在對信息了解的權利。對一個幹部的懲罰，首先就是剝奪其看文件的資格，也即知曉政策和真實信息的優先權。這一模式被造反派組織有意無意模仿，為了提高自己組織的政治地位，一些群眾組織多方搜集信息，體現自己這一組織的消息靈通，從而顯示自己組織的「政治背景」。在「炮打」時期，體現在炮司和紅革會的情報收集上；而在不久的將來，更將體現在機關聯絡站的原寫作班成員，與工總司成員相互的關係上。

上海1.28炮打，又一次向造反派們揭示群眾運動的鐵律：造反派「炮打」幹部的權利只是毛澤東的給予，不是無限，更不是天然所有。一旦毛澤東不認可，就失去革命的名義，無法繼續運動下去。1.28炮打是分水嶺，從此，上海的造反派隊伍分裂：工人造反派與當初扶植他們的紅衛兵決裂；上海紅衛兵組織內部，也因炮打重新整合。由於參加炮打者都是造反派的中堅，這些骨幹因炮打遭批判而被邊緣化，上海紅衛兵運動開始走下坡路，不再叱咤風雲，再也掀不起大的風浪。而工人造反派，被認為立場堅定，地位更加上升。從此，上海局勢基本由

忠於張春橋的機關聯絡站和工總司控制。所以，王力在他的回憶錄中認為，1.28炮打在文革史上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是決定文革成敗的大事，決定方向的大事，決定革命目標的大事，決定究竟是誰應該批判，是哪條路線應該批判的大事」。王力還認為，炮打使「毛澤東做了重大決定」：第一，在給紅革會的急電中，將陳丕顯、曹荻秋作為上海的走資派點名拋出；第二，讓張春橋作為革命領導幹部留在上海領導運動，以促使更多的幹部轉換立場；第三，必須建立臨時性的權力機構，不能讓群眾造反組織一個一個地去奪權。⁸¹ 這些分析很有道理。1.28炮打使毛澤東終於下決心拋棄陳丕顯。

1.28炮打結果，顯示張春橋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毛不容許任何人碰張春橋，即使是他稱讚過的紅衛兵小將。所以，針對張春橋的1.28炮打，反而鞏固和提升了張春橋的地位。以後張春橋成為上海的禁區，任何對張春橋的懷疑都不容許。這種情況在懷疑和打倒一切的文革時代是罕見的，在全國更絕無僅有。這樣的信任，文革中毛澤東除了對自己的妻子江青，只有張春橋。這大大提升張春橋在上海的威信。上海最高權力機構只有張春橋一個中心，一個權威。張春橋在上海地位至高無上，上海各派一旦有權力爭鬥或意見分歧，張春橋的裁決馬上可以平定風波。這使得上海在兩派或數派爭鬥方面的消耗成本遠低於其他許多省市，上海在整個文革中，遠比其他許多省市穩定。上海的穩定，反過來又使毛澤東對張春橋更加欣賞和倚重，鞏固和提高張春橋的權威及地位。

上海完全用不着以其他勢力來平衡各方造反派的關係，有張春橋在上海足矣。上海甚至不用像外地那樣，需要動用軍隊權威實行軍事管制。當絕大多數省市都是軍隊當家、軍人當政時，唯獨上海，是由在軍隊沒有淵源的張春橋當家。文革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建立後，外地是革委會聽命於軍代表，上海是

81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880 頁。

軍代表聽命於市革會。即使是駐各級單位的軍隊支左幹部，也不像外地那樣聽命於軍隊，而是聽命於地方。少了軍隊表態，又有張春橋壓陣，上海群眾組織之間矛盾也就減少許多。張春橋的威信，使得群眾組織之間但凡有不同意見，只要張春橋一句話，反對者不敢多言，分歧馬上擺平。這使得上海能相對穩定地度過對全國其他省市來說最混亂的兩年：1967至1968年。

以後，還曾發生過幾次對張春橋的攻擊，例如1967年「二月逆流」，例如1970年廬山會議，毛澤東都給以閃電般還擊，甚至不惜得罪與自己浴血打江山的老帥葉劍英等，不惜將自己的副手林彪逼上絕路。

第二十章

「公社」的成立與改名 回歸秩序和權威

毛澤東要上海成立公社

2月2日，被炮打中斷六天的奪權籌備事宜恢復進行。但此時，毛澤東思路又變了。根據王力回憶，炮打事件平定後，毛澤東意見，要上海建立臨時權力機構，說不能將群眾組織或機關造反派組織作為上海臨時權力機構。新建立的權力機構名稱，就叫「上海公社」。王力回憶說：「這不是上海同中央文革決定的，是毛主席決定的。要張春橋和姚文元參加權力機構」。¹毛澤東特地在一次會後將王力留下，要他打電話給張春橋，轉達毛的這個意思。《紅旗》1月30日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提及毛澤東對新權力機構設想：「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這篇社論發表第二天，王力曾做過解釋：「三方面協商建立臨時的權力機構，散着不行，這是臨時的政府，是過渡，過渡以後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們主張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58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這要經過一個過渡，可能再要經過一個籌委會，才能達到徹底的完全的形式。」²社論未發

1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889 頁。

2 王力 1967 年 1 月 31 日：王力談《紅旗》第三期社論精神，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表前，陳伯達便在電話裏將內容逐字逐句告訴張春橋，又告訴他，毛澤東正在考慮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單。³ 毛澤東要成立北京公社，擬名單後通知上海，要上海也成立公社，電話是王力打的。⁴ 張春橋接電話後，即向造反派建議，將「新上海公社」名稱改成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大家都同意，認為成立公社，是實現毛主席的多年理想。

毛澤東在文革一開始，就評價說對聶元梓大字報是當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接着，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十六條》，又一次提及巴黎公社，說文化革命委員會要實行巴黎公社式的選舉。這一切，體現毛澤東的巴黎公社情結，也在熱情參與投入文革的群眾中，掀起巴黎公社熱。

2月2日上午9點左右，造反派們在上體司三樓會議室繼續新政權的籌備會議。期間有人來報告說，耿金章可能帶人來衝會場。大家於是馬上決定，所有與會者轉移至上海展覽館對面的新華社上海分社繼續開會。⁵ 這個會議開了整整一天，參加的有41個組織：上海本市28個，軍隊所屬單位1個⁶，外地駐滬紅衛兵組織12個。⁷ 會議仍然由王明龍主持。新革會起草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和第一號通令、宣言、奪權通令和給毛主席的致敬電，由徐景賢負責的公社籌委會文件起草小組修改。會上審議了公社組成單位；因1.28炮打，又重新確定上海人民公社組成單位的資格：

3 王年一 1998 年著《大動亂的年代》，第 182 頁。

4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889 頁。

5 這是當年參加會議的謝鵬飛對筆者回憶的。徐景賢等沒參加這個會，他們在黨校修改「公社」宣言等。

6 這個「軍隊所屬單位」是第二軍醫大學（「二軍大」）。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西軍電」）和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兩所大學，在 1966 年初已經不屬於軍隊編制。

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經濟主義、實現革命大聯合、向黨內走資派奪權等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大廝殺大搏鬥中，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出貢獻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組織。有以下情況的組織不准參加：經濟主義的行會組織，分裂革命群眾運動、破壞革命大聯合的山頭主義組織，違背中央規定成立的非法組織，炮打中央文革反動逆流中證明已走向反面的組織，「假造反，真保皇」的組織。⁸

掀起1.28炮打的紅革會，雖然是上海最大紅衛兵組織，但理所當然地不再被允許加入。許多人還提出，炮司是炮打張春橋的始作俑者，必須向上海的群眾組織認錯。但炮司代表周谷聲和紅鷗拒絕認錯，紅鷗發言說，參加炮打的是復旦的「孫悟空」，而孫悟空只是炮司下屬組織，不代表市炮司本部，現在會上這樣質疑炮司，是挑動群眾鬥群眾。她還為紅革會說話，說紅革會是最早的造反組織，為上海的文革作出過貢獻，公社的籌備不應將紅革會排除在外。據當時在場的謝鵬飛回憶：

我們大家對炮司的感情還是較深的，特別是炮司對工總司的成立曾作出很大貢獻。大家意見，讓炮司作個檢查，還是同意讓炮司參加籌備會的。但是周谷聲和紅鷗不肯作檢查，並且紅鷗發表了三點看法，認為張春橋是可以懷疑的。這樣激起了與會者的憤怒，一致批判他們的態度，周谷聲和紅鷗就退出會場。⁹

他倆退出會場，「激起各群眾代表義憤，多數通過決定

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9 這是謝鵬飛 2013 年對本書底稿寫的補充。此外紅鷗 2010 年也對筆者回憶過這個情節，在她寫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

不同意炮司為組成單位」，¹⁰ 就這樣，炮司與紅革會一樣，被摒於上海人民公社籌備之外。炮司總部對紅鷗退出會場的舉動很惱火，後來特地在自己的刊物《工學運動》上發文「開除紅鷗」。¹¹

會議最後決定，上海人民公社由40個單位組成。第二天，因為由於駐滬三軍作為三結合一方參加，減為38個。¹²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

上海農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籌備委員會(農司籌)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

上海市東方紅總部(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為主的大中學校紅衛兵組織)

上海新聞革命造反委員會(新革會)

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

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紅三司)

新師大公社

紅衛兵上海司令部(紅上司)

紅衛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員會(紅反會)

紅衛兵上海中專技校革命造反委員會(紅中技)

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紅西南)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紅東北)

上海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

上海藝術院校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藝司)

上海市科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科司)

1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1 這是紅鷗 2010 年對筆者回憶的，在她寫的未刊回憶錄中也有提及。

12 據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記載，這 38 個組織如下：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公革會)
 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體司)
 上海醫務界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醫司)
 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小教司)
 上海市中等學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員會(教革會)
 赤衛軍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赤革會)
 上海市人委機關事務管理局革命造反兵團
 上海市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聯絡委員會(財聯)
 上海毛澤東思想工人革命造反總部(同紅工司對立的臨時工組織)
 新華社上海分社、《人民日報》上海記者站
 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紅縱)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駐滬聯絡站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滬聯絡站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駐滬聯絡站
 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駐滬聯絡站
 北京電影學院毛澤東共產主義公社駐滬聯絡站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
 天津大學八·一三紅衛兵駐滬聯絡站
 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文革臨委會駐滬聯絡站¹³

這是成立上海文革新政權的籌備會議中，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會議內容據文革中的記載如下：

各單位代表一致認為，經過了一月革命風暴的偉大門爭，

13 這個名單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實現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建立代替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全市過渡性最高權力機構，時機已經完成成熟。會議決定：一、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過渡性最高權利機構，正式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二、發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定名為《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三、發表上海人民公社第一號通令，宣佈剝奪舊市委、舊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宣判舊市委、舊人委的死刑，宣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四、定於二月三日在人民廣場召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¹⁴

會議決定，由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負責人民廣場的會場佈置。火線指揮部的代表霍達和新師大公社的代表，還在會上強烈要求，公社委員一定要有女性代表，大家都同意。¹⁵

與會者都非常興奮，拍了許多照片，有人提出，新政權越快建立越好，只爭朝夕！同濟東方紅的陳敢峰提出，他們馬上去承製公社的牌子。大家決定馬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員會，並決定當晚就向張春橋、姚文元報喜。謝鵬飛說他有張春橋的電話號碼，於是謝鵬飛撥通了號碼，何秀文接電話後，請示張春橋，張同意。此時已是晚上，會議代表一起前往武康路報喜。¹⁶ 張春橋告訴大家，新上海公社宣言草稿已送去中央文革討論，中央文革支持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在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鬥爭中創造革命的新生事物。¹⁷ 大家提出，2月3日即明天，就在人民廣場召開成立大會，並要求馬上報告中央，請求立即批准公社成立。

1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5 謝鵬飛 2013 年在本書底稿上補充的內容。要有女代表是謝鵬飛和霍達文革後都對筆者回憶到的。謝鵬飛認為，所以後來王洪文去找來王秀珍，讓她進入市革會。

16 謝鵬飛 2013 年在本書底稿上補充的內容。

1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毛澤東指示上海「三結合」

就在上海人民公社緊鑼密鼓籌備成立的同時，毛澤東的思路又變了。這次，毛是從黑龍江省奪權後建立的文革政權受到的啟發。1月31日上午，在哈爾濱市的北方大廈門前廣場，黑龍江造反派召開「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2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第一條新聞，全面報道黑龍江省造反派聯合奪權的消息，並且全文播發了《一號通告》、《抓革命促生產呼籲書》、《給毛主席的致敬電》以及宋任窮、潘復生、汪家道、游好陽的講話。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當天除了頭版通欄頭條發表以新華社哈爾濱2月1日電的長篇消息，報道奪權大會及上述內容之外，還配發了社論《東北的新曙光》，對黑龍江省奪權給予高度評價。社論說：

黑龍江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經驗再一次表明，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對奪權鬥爭的勝利，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採取反對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針，是完全錯誤的。應當看到，有些領導幹部，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堅決同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鬥爭的。對於這樣的幹部，我們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們，與他們並肩戰鬥。對於那些動搖不定的、或者犯過路線錯誤的領導幹部，只要他們願意改正，回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回到毛主席的路線上來，我們也應該團結他們，一道戰鬥。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在全國上下對各級幹部一片

打倒和奪權聲中，這篇社論用了相當篇幅講述幹部問題，肯定黑龍江省建立的三結合奪權機構。「三結合」的三方是：群眾、幹部、軍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讓那些被打倒的幹部重新進入政權機構。而在此之前，山東的青島市、山西省、貴州省宣佈奪權，報上發消息時，《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所配社論的重點，都是強調造反派的大聯合以及要求幹部站出來支持造反派。《人民日報》為黑龍江省奪權所配社論，則不只要要求幹部支持造反派，而且要求奪權機構中必須有原來的幹部參加。黑龍江省是全國省級奪權中，第一個在奪權機構中有幹部參加的省份，讓一些在群眾中仍有威信的領導幹部站出來工作。毛澤東抓住了黑龍江的做法。

1月31日這天，還有一篇重要社論發表：《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這篇《紅旗》雜誌社論由中央文革的王力和關鋒起草，毛澤東親自修改。據王力回憶，其中一段話是毛澤東加進去的：「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¹⁸

幾天前，1月22日王力給張春橋的電話記錄中，毛澤東已經提出「要一點舊的人，黎元洪也好」。毛澤東從要求造反派聯合奪權，進而要求在新的權力機構中一定要有幹部參加。這是否是毛澤東對幹部們的讓步？看來毛澤東並不想打倒所有幹部，否則政權將失去持續性；但如果讓幹部們毫無約束地重新上台，又會使他好不容易發動起來的群眾運動受到打擊。他支持從上海發起的群眾性接管，是對那些「張屠夫」們的嚴正警告：不支持文革，就交出權力。但真的全部讓造反派接管權力，毛也不放心，他在以後多次講過類似的話。黑龍江的「三結合」式奪權，既制約幹部權力，又讓幹部繼續工作。鑑於幹

18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錄》第823頁。在逢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第6卷第42頁，也說這段文字以及下面的一大段關於幹部的文字，是毛澤東親自加寫或修改的。

部被批鬥後權威大大下降，毛支持了黑龍江結合軍人進入新權力機構以增強新機構威信的做法。隨着以後造反派弱點逐步顯現，毛澤東更將三結合確定為奪權的基本形式。

毛澤東的這個思路，是張春橋等所沒有跟上的。張春橋的奪權思想，應該就是他以後曾經多次說過的「改朝換代」。張春橋後來承認，他當時根本沒有想到過三結合：

三結合的經驗是黑龍江創造的。大聯合我想過，我想團結得越多越好。三結合當時我沒有想到。一月革命大多數是單方面奪的權，後來學了黑龍江才解決的。¹⁹

毛澤東提出三結合思想，上海奪權不得不推遲。2月2日晚，張春橋和姚文元剛回到興國路招待所，北京的電話來了，回答他剛才報告的關於上海造反派組織明天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張春橋後來回憶那天的情況說：

三十八個單位聯合，他們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員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點多鐘的時候打電話給我和姚文元，說我們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們報喜。我們說你們怎麼來的這麼快呀，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他們說明天開成立大會，你們來參加，現在我們就向你們報喜。我說這個事情要報告一下中央才行啊！我們就給中央打電話，說上海38個組織今天晚上宣佈奪權，宣言、委員都弄好啦，要向我們報喜，我們準備到他們那裏去給他們談一談，去接受他們的報喜，同時請中央考慮還有什麼指示沒有。這個就是第四次啦，我們到那裏當然大家很高興，我們也祝賀了他們，然後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電話給我們，說這樣

19 張春橋 1968 年 1 月 11 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載於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

子不好，就這樣子沒有三結合，他們搞得成啊？我們說三結合市裏沒有人站出來啊！中央當時就作了一個臨時決定，張春橋姚文元參加好了，為了支持革命群眾，因為我們原來也在上海工作嘛，也算上海的革命幹部。然後我們就馬上打電話通知三軍，請他們來參加，由我們來邀請了。²⁰

陳丕顯、曹荻秋，以及一大批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領導幹部，就這樣被張春橋以「市裏沒有人站出來」為由被排除；而「革命幹部」一方，則由張春橋和姚文元兩人代表了。

張春橋立即將王洪文、王明龍和廖政國叫到住處興國路招待所，向他們傳達了中央要他和姚文元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決定。張春橋要廖政國表態，廖政國說按毛主席指示辦。張春橋要求將公社成立時間推遲幾天，因為宣言等還要修改，大會發言稿起草也需要時間。王洪文說，成立大會之事已經佈置下去，不能拖延太久，否則會影響群眾情緒。張春橋於是拍板決定，推遲兩天，改在2月5日召開成立大會。張春橋還說，既然他和姚文元參加公社，就應該為公社做點事，他和姚文元可以負責修改公社宣言和一號通令。²¹

上海軍隊幹部與陳丕顯關係十分密切，而陳丕顯是張春橋一心要打倒的。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和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都是陳丕顯的好友。比起不愛人際交往的張春橋，陳丕顯

20 《張春橋、姚文元 1967 年 5 月 14 日對江蘇和南京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1 王明龍 1979 年 12 月 7 日供詞，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之一》。王明龍 2013 年在看此書底稿時，對筆者回憶說，他參加 2 月 2 日新華社會議，待幾件大事定下後，便和王洪文去了黨校，那邊徐景賢等正在起草宣言。晚上張春橋來電話將他和王洪文叫去興國路招待所，傳達毛澤東指示。當時在場的一共 5 人：張春橋、王洪文、王明龍、何秀文以及稍遲到的廖政國。

從中央到地方的人脈是張春橋所不可比的。陳丕顯和曹荻秋遭到造反派四處圍堵揪鬥，無法正常開展工作，警備區和東海艦隊多次為他們提供秘密開會和藏身之地，廖政國還一再打電話給陳丕顯，要他多保重。陶勇甚至和廖政國商量過，打算派個警衛排把被造反派關押着的陳丕顯和曹荻秋搶出來，然後秘密保護起來，儘管此時陶和廖自己也在遭受批鬥。1月11日中央賀電發來的當天晚上，廖政國的家就被警備區的軍內造反派抄了，十天後，1月21日下午，陶勇又離奇地死去。²² 廖政國心底不會認同文革。徐景賢後來對人介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過程時，特地講到與軍隊的關係：

特別說一下軍隊的作用，陳丕顯是上海部隊的第一政委，如部隊支持陳丕顯，我們將要帶來很大的麻煩……我們堅持對陳丕顯的批判，提供了大量材料，使軍隊同志看到陳丕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走資派。²³

軍隊對文革的態度一直是毛澤東的心病。幾天前的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佈《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決定，就是根據毛澤東要求制定的。那天下午，張春橋便找駐滬三軍負責人，要軍隊支持造反派。最先表態的是駐滬空軍。毛澤東的這個「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下達的當天下午，駐滬空四軍7341部隊立即派出聯絡員，去工總司和機關聯絡站等造反組織「訪問」²⁴，「接洽支持革命左派的問題」。接着，第二天1月24日下午，駐滬空軍部隊又舉行武裝遊行，幾十輛卡車從駐地開向市區，通過南京路等主要馬路，沿途高呼支持造反派的口號。

22 陳丕顯 2005 年著《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23 徐景賢 1970 年 11 月 24 日與美國友人斯諾夫婦的談話。

2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月25日，駐滬海、陸、空三軍遊行。1月26日，駐滬空軍出動安二型飛機兩架，由空四軍參謀長指揮，在上海市區上空散發《給上海全市人民的決心書》等傳單十萬多份。在駐滬三軍中，空軍第四軍態度最鮮明。

耿金章成立第二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即，不料，平地又起風波，事情又是由耿金章引起。還是在1月17日，耿金章在上海展覽館召集另外一些工人造反組織開會，成立了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共14個成員組織。²⁵

耿金章為什麼要成立這個組織，估計是因為他和上三司聯合奪權，被張春橋說不是大聯合的奪權而勸止。所以在1月16日張春橋找他談話的第二天，就成立了這樣一個聯合體，以示自己也是聯合行動的。儘管他將工總司放在第一個，但只是名義上的，每次開會從不通知工總司參加。有一次開會，因一人被懷疑工總司的，就馬上用摩托車將此人追回來。其餘十三個組織都是工總司的反對派。其中，除了二兵團外，其他組織大都人數少，影響小，有的甚至根本沒人知道。

王洪文始終瞞着耿金章，不讓耿金章知道正在進行的奪權籌備。1.28炮打事件後，耿金章想起張春橋要他和王洪文不要鬧

25 據1967年2月13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赴京匯報請示代表團的傳單《向中央文革的匯報請示》記載，這14個組織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一兵團（一兵團）、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二兵團（二兵團）、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三兵團（三兵團）、上海工人造反聯合兵團、上海革命造反委員會（戰到底）、上海工人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三司）、上海工人革命軍總司令部、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近衛軍上海司令部、上海市共產主義紅色接班人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一機部上海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毛澤東思想捍衛隊上海市紅衛兵聯合會、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戰鬥隊統一行動委員會。原件收藏於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公安分局。

分裂的談話，準備找王洪文談判，有人告訴他王洪文在市委黨校開會。2月1日，他和二兵團的幾個人去黨校找王洪文。樓上樓下找了一遍，不見王洪文人影，卻在門口碰上一兵團、三兵團和工三司等組織的負責人。他們告訴耿金章說，工總司等組織正在偷偷摸摸地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你知道嗎？耿金章立即打電話給張春橋，秘書何秀文接電話：

我問：「你和春橋同志是否知道王洪文成立人民公社的事？」何秀文答：「知道的」。我說：「你為啥不告訴我？還把那麼多組織排斥在外？」何秀文解釋說：「我們事先找過你，但沒找到你，所以沒跟你商量」。我說：「好！你們成立人民公社，不讓我們知道，我們也有權成立第二個人民公社！」我氣呼呼地扔下了話筒。²⁶

耿金章與張春橋在1967年1月至2月間來往很密切，何秀文說耿金章那時是興國路招待所的常客，張春橋有事就打電話給耿金章。1月28日的深夜，上海柴油機廠「東方紅」的工人翻牆進入興國路招待所，說是要向張春橋反映廠裏情況。此時正值1.28炮打，有人跳進自己住所的圍牆，張春橋嚇了一大跳。張說門口站崗的解放軍靠不住，讓秘書馬上打電話給耿金章，耿金章很快派了二三十個工人趕去。所以何秀文回答耿金章說找不到他，顯然只是托詞。

耿金章轉身將電話內容告訴一旁等候着的其他組織負責人，大家都非常氣憤。工三司和挺進軍負責人提出，王洪文他們成立人民公社奪權，我們也成立聯合奪權機構，和他們對着幹！於是眾人馬上在市黨校開會，決定將他們這個奪權機構名稱定為「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大聯委」），

26 耿金章 1979 年 3 月 12 日陳述筆錄。

湊了32個群眾組織，後來又有一些組織找上來，共36個單位，召集人是耿金章。²⁷

第二天，2月2日那天，在新華社會議的同時，這些被排斥的組織也正在上海大廈繼續通宵開會，也起草宣言和通令，也給毛主席發致敬電，也宣佈奪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也要張春橋和姚文元當負責人。他們還起草了一份給中央文革的緊急電報，控告工總司單方面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搞分裂，排斥老造反。有人提出「如果上海人民公社明天見報，這個緊急電報一定要和它一起刊登，不然就不讓《解放日報》出版。」²⁸

27 據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記載，這36個組織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二兵團（二兵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一兵團（一兵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三兵團（三兵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三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野戰兵團、上海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紅衛軍指揮部（紅衛軍）、上海紅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紅工司）、上海毛主席思想工人革命造反總部（同參加公社的是同一組織內兩派）、上海市學徒造反委員會、上海市「五八」兵團革命造反總指揮部（1958年進廠的大、中學校畢業生組織）、上海減資興無鏟修挺進軍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挺進軍、小業主為主體）、上海外貿駐滬工人革命造反總部、華東地區紅藝兵上海工人革命軍司令部、上海革命工人學生聯合委員會「戰到底」、國際工人革命軍上海司令部（上海工人革命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委員會（工革會）、紅衛兵上海工人學生革命造反派委員會（紅工學會）、上海工人學生革命聯絡委員會（工學聯）、紅衛兵新上海司令部中學部、上海市房地局工人革命造反總指揮部、上海市公用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部、上海一二·三革命造反委員會（機電二局新新等保密廠串聯起的組織）、上海科技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科三司）、上海中教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中教司）、上海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員會（人革會）、上海工農兵電影製片廠紅旗公社、上海市級機關革命造反委員會、首都紅衛兵第一司令部駐滬聯絡站、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公社駐滬聯絡站、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駐滬聯絡站、北京醫學院「八一八」駐滬聯絡站、中國人民大學「人大紅衛兵」駐滬聯絡站、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公社聯合兵團駐滬聯絡站、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東方紅公社財貿造反團、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但據另一份在1967年2月3日《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後的簽名，有37個，而且參加組織與前者記載的有三分之一的不同。

28 引自工總司1967年2月28日的《傳單匯編》：《透過一次黑會看耿金章之流反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動本質》。

其實，這些人也知道，自己這32個組織中，除了二兵團比較有些實力和名氣，其他組織不是沒多少組織成員，就是名不見經傳，毫無名氣。這些組織在上海文革中的影響和作用，根本不能和工總司及機關聯絡站等相提並論；他們對自己另立奪權機構的權威根本沒有自信，他們的目的只在於能以此作為談判資本，說「他們奪權，我們也奪權，奪了權後，大家坐下來談判。」²⁹

據當時不完全統計，1967年1月，上海全市性的稍具規模的組織即有一百多個，³⁰ 至於那些帽子很大，實際只有幾十個人甚至幾個人的組織，更多得不計其數。那些不能參加公社籌備的組織當然不肯善罷甘休。他們千方百計地打聽公社籌備會議的時間和地點，帶着人員衝擊會場或強行要求參加會議。籌備會則千方百計地甩掉他們，開一次會，換一個地方。有一次，被迫得沒法，甚至躲到一輛大客車上去開會，一邊開會一邊讓客車在市內兜圈子，直到開完會，車子才停下來。以後曾有文章回憶這次客車會議，不知底裏者會以為是防止保守派衝擊。³¹

2月3日，張春橋得到耿金章另立公社的消息，立即派機關聯絡站的朱玉佩到上海大廈找耿金章，要他來興國路招待所面談。對於這次面談，耿金章以後回憶說：

張春橋說：耿金章你為啥這樣啊，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我說：誰叫你們成立人民公社不告訴我們呀！

張春橋說：這不是我搞的，成立人民公社是中央同意的，毛主席批准的，你們的做法是向中央施加壓力，與中央唱對台戲。

聽說是毛主席批准的，我就軟下來了。

29 同上，《透過一次黑會看耿金章之流反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動本質》。

30 這個數字引自《張春橋、姚文元 1967 年 5 月 14 日對江蘇和南京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1 楊幼根、石忠康著《市革會成立前夕數事》，載於《一月風暴》，《一月風暴》編輯部 1967 年月。

我說，既然是毛主席同意的，我只好服從。³²

張春橋又說：「我和文元已經參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們再另外搞一個什麼大聯委，只能跟上海人民公社對立，就可能在關鍵時刻犯大錯誤！」張春橋要求：「你馬上回去做工作，公社成立以後，你們都是公社裏的人嘛，你快叫大家各自回去。」張春橋還說：「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時，讓你也上主席台，將來擔任公社的常委。」談話整整進行了三個小時，耿金章終於答應回去解散大聯委，不另立公社。³³

2月3日下午，上海人民公社籌備工作會議在上海圖書館舉行。會上主要討論公社體制，張春橋親自主持會議。這個會也通知耿金章參加。張春橋在會上宣佈：中央文革決定他和姚文元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領導工作。晚上，張春橋、姚文元又在武康路2號召開會議，仔細討論公社成立宣言、奪權通令和《向毛主席致敬電》。張春橋說，「宣言要始終突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實行革命的三結合，自下而上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思想，這是最新、最活的毛澤東思想。」張春橋還指出要突出把上海人民公社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³⁴

在原來徐景賢起草的「公社宣言」中，根據大家意見，把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中所提出的1871年3月法國「巴黎公社原則」寫進上海奪權宣言：「徹底砸爛國家機器」，「公社委員由群眾直接推選」、「公社委員是人民公僕，工資收入不得超過工人」，等等。³⁵張春橋將這些全都刪去，只留下公社委員的選舉產生經過；並將原來的題目《從十月革命到一月革

32 耿金章 1979 年 3 月 12 日，以及 1979 年 11 月 27 日的陳述筆錄。

33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257 頁。

3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35 徐景賢 2003 年著《十年一夢》。

命——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改為《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第二天，張春橋、姚文元將經過他們修改的宣言退回徐景賢，並讓在後面署上38個公社組成單位名字，送《文匯報》排印。

公社成立在即，卻不料又傳來消息：大聯委非但沒有解散，而且還改名為「新上海人民公社」。原來，那份署名38個公社組成單位的宣言底稿送到《文匯報》社印刷後，原來被嚴格保密的信息馬上傳出。許多榜上無名的組織紛紛趕到南京路市體委大廈，因為那裏是公社籌備組的辦公室。體委大廈裏外擠滿了人，一片吵鬧。全市一下冒出六百多個組織，都說自己是市一級群眾組織，都要求成為公社組成單位。而已經進入公社發起單位的組織，有些認為自己組織排名次序被靠後了，吵着要求排到前面去。大聯委成員們更是憤怒，認為被耿金章出賣，不顧耿金章傳達的張春橋要他們解散的話，索性將大聯委改名為「新上海人民公社」，對台戲唱到底。一時，南京路、淮海路等主要馬路上，刷滿大標語：「熱烈歡呼新上海人民公社即將成立！」「一切權力歸新上海人民公社！」這些標語與這些天剛剛刷出去的慶祝上海人民公社即將成立的標語一模一樣，只是前面多了個「新」字。參加大聯委的復員轉業退伍軍人組織「紅衛軍」，更是派出人員徹夜守候在《文匯報》排字房裏，揚言公社宣言如果不署上自己組織的名字，就不但砸報社，還要帶領隊伍衝砸籌備會的會場。³⁶

《文匯報》朱錫琪打電話向徐景賢反映這一緊急情況，徐景賢覺得十分棘手，當即向張春橋、姚文元匯報。2月4日晚，耿金章再次被張春橋找去談話。張春橋要耿金章立刻解散大聯委。張春橋態度強硬地說：「如果你們執意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那我和姚文元、駐滬三軍宣佈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看大家擁護哪個公社。」張春橋又說，「你們搞第二人民公社，我

36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和姚文元預先聲明，我們不參加，我們不支持，我想，你那個第二人民公社毛主席也是不會支持不會承認的。」耿金章終於答應不再對抗，並答應去說服其他組織；但他要求公社成立那天，讓二兵團單獨打着大旗參加成立大會。張春橋答應了。³⁷ 張春橋又告訴耿金章，他正在考慮將公社的「組成單位」改為「發起組織」，這樣，以後其他群眾組織也可以逐步加入公社。

耿金章在上海大廈召開會議，宣佈二兵團退出大聯委。³⁸ 二兵團是大聯委中最有實力的組織，二兵團退出，大聯委群龍無首，無形解散。事後，張春橋曾多次對人說過：

那次找耿金章，我們也是最後一着了，因為名單已經上報，5號就要開大會了，一下亂起來開不成會，這個影響有多大？那將來你就毫無辦法，不可收拾。所以我和文元商量後，找耿金章來跟他當面直接談，能聽就聽，不能聽也沒有辦法。開始我們和他左說右說，但總是不行，說不通。最後，我們只有借着毛主席的名義，憑着毛主席的威望，把他說服了。³⁹

張春橋化解危機

2月4日晚上10點，張春橋和姚文元通知徐景賢，要他立即將公社的38個發起組織負責人集中，然後轉送至上海展覽館咖啡廳開會，但先不要宣佈開會地點。徐景賢馬上通知正在市體委大樓的王洪文和王承龍。他們立即讓各組織負責人分批乘上大客車，在市區轉了幾個地方，確定沒有人跟蹤，再秘密地開

37 以上均為何秀文 1978 年 6 月 15 日陳述。

38 這個日子和會議引自《工人造反報》1967 年 2 月 28 日的《傳單匯編》中《透過一次黑會看耿金章之流反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動本質》。

39 轉引自何秀文 1978 年 6 月 15 日陳述。

往咖啡廳。⁴⁰ 徐景賢後來回憶，他和張春橋、姚文元在深夜11點來到咖啡廳，只見新華社上海分社、上海電視台記者都在，全場被水銀燈照得雪亮；駐滬三軍領導們也坐在主席台第一排位置上。這是公社最後一次籌備會議，由張春橋主持。大家鼓掌通過宣言。

《文匯報》的朱錫琪反映說，紅衛軍揚言公社組成名單如果不署上他們組織的名字，他們將砸報社。王洪文當即表示：紅衛軍敢砸，他就馬上帶人去砸紅衛軍在華山路的總部。正說着，警衛人員進來報告說，門外有好幾個造反組織，一定要進來參加會議。⁴¹ 本來，這種以一部分造反組織取代全市黨政權力的做法，就有違文革自稱的代表性和人民性，如果採取強硬方式打壓反對組織，會引出更大矛盾。眾人對這樣的混亂，除了以「砸」相對，一籌莫展。

在這個混亂時刻，還是張春橋有政治經驗和應變能力。他提出三點建議，這三點建議，核心就是他和耿金章的那次談話：一是將38個組成單位改為「發起」單位，使其他組織今後也逐步加入公社，避免他們因被排斥在外而與公社對立；二是發起組織一律不登報、不署名，避免排名次爭座位鬧糾紛；三是開公社成立大會時，不是發起組織的代表也可以上主席台。張春橋在會上闡述了自己的建議，立即得到大家的擁護，徐景賢帶頭鼓掌。這樣棘手的難題被張春橋化解，一場看來無法調解的危機就這樣避免，讓所有人深感佩服。張春橋在上海造反派中的威信就是這樣逐步建立起來的。

張春橋的建議避免了可能發生的分裂，上海的權力總算基本平穩地從原來的幹部手中轉移到造反派手中。但張春橋的建議以後沒有兌現，公社成立後，只在一開始實行過極短時間的集體委員制，但很快就回復到原來的委派制；而且一個多月

40 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41 以上均引自徐景賢 2003 年出版《十年一夢》。

後，毛澤東就要求群眾組織大聯合，所謂其他組織逐步加入公社，也就失去實際意義。

大聯委被解散了，但還是有人不買賬。就在張春橋召開最後一次籌備會議時，市體委大樓遭到衝擊，那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籌備處所在地。工三司、紅衛軍、戰到底等造反組織認為他們被耿金章出賣了，耿金章擠進了公社，撈到了席位，他們這些組織可是什麼也沒有得到。這些負責人表示：「不准我們參加公社，我們也不讓你們太平！」揚言要調動十萬人衝會場。但事實上，大聯委中，除了二兵團人數較多外，其他都是小組織。二兵團退出，剩下的造反派組織根本調動不了多少人。他們聽說公社籌備處設在體委大樓，就帶着一群人去衝擊，但撲了個空。深夜，這群人又趕到人民廣場，佔據了靠主席台最近的位置，打算開大會時起哄。但不一會兒，他們就被黃金海事先調去佈置在會場的工總司造反隊趕走。⁴²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

朝氣蓬勃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從半夜就一隊隊奔赴會場。意氣風發的貧下中農、革命紅衛兵、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天沒亮就一群一群匯集在人民廣場。全副武裝的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一列一列地警衛着會場四周。大會開始前一個多小時，人民廣場已成為語錄和紅旗組成的紅色海洋。擴音器下，電視機旁，數百萬革命群眾在收聽大會實況。駐滬三軍嚴陣以待，遊行路線兩旁大樓上架起了機槍，黃浦江中心巡邏着炮艇，空軍部隊嚴密警戒天

42 這是黃金海 2013 年在本書底稿上補充的內容。

空，隨時準備殲滅一切敢於搗亂的內外階級敵人。⁴³

就如張春橋應允耿金章的，參加大會的每個組織，都打着自己的大旗進入會場。會場主席台上的毛澤東像是上海畫院的幾名畫師用兩天兩夜時間趕畫出來，當大會宣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時，禮炮齊鳴，鴿子飛翔，五顏六色的氣球升上天空。這些都是謝鵬飛組織人員佈置的。⁴⁴ 駐滬空軍出動兩架飛機，撒下彩色傳單。

大會執行主席是工總司的潘國平。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會上講話。大會發言還有代表駐滬三軍的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代表工人的工總司王洪文，代表農民的農司籌夏桂伯，代表紅衛兵的同濟東方紅陳敢峰以及外地駐滬紅衛兵組織。大會在熱烈歡呼聲中，宣讀了《向毛主席致敬電》和《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大會宣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發佈第一號通令：「正式宣判舊上海市委、舊上海市人委的死刑，剝奪陳丕顯、曹荻秋等上海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一切職權。」通令包括九條規定：實行自下而上的全面奪權，軍隊支左，監督和保護無產階級專政工具，抓革命促生產，鎮壓反革命，正確處理幹部問題，正確處理各群眾組織關係，等等，即日生效。

會後，張春橋、姚文元和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全體成員，帶領群眾，伴送着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的彩車，舉行盛大慶祝遊行。從人民廣場經南京路到外灘原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大樓，沿路鞭炮齊鳴、鑼鼓喧天。在外灘原市人委大樓前，白底黑字的「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牌子被摘下，換上白底紅字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原來的牌子被眾人用斧頭劈碎，點火燒掉。

43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 年 1 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44 這是謝鵬飛 2013 年在本書底稿上補充的內容。不過，「上海畫院」，筆者認為可能是上海油畫雕塑室因為畫院的畫師是畫國畫的。

文革奪權後的上海造反派的權力機構，就這樣建立起來。這是造反派的「盛大節日」，是毛澤東文革的勝利狂歡。

毛澤東建議公社改名

但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北京方面卻遲遲不表態。文革以來，毛澤東對上海幾乎每一個重大行動都立即反應，高度評價。但這一次，如此重大的行動，而且事先經過毛澤東認可，卻不見毛澤東回應。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和新華社新聞，只有上海見報，始終不見最權威的《人民日報》刊登。上海自己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天天刊登公社新聞，但這些新聞卻始終上不了《人民日報》。而就在幾天前的1月31日，黑龍江省成立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馬上刊登消息，還配發社論。於是各種猜測紛紛而起。有人懷疑，是因為上海奪權機構中沒有原來的市委一級領導幹部參加；有人懷疑，是因為毛澤東不同意張春橋和姚文元擔任上海領導，等等。上海街頭甚至出現針對上海人民公社的質疑大字報。

毛澤東確實對上海人民公社有保留。炮打事件後，毛澤東雖然要上海建立奪權機構，而且公社這個名字也是毛澤東定的，張春橋完全按照毛澤東意願，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就如毛澤東一貫主意多變一樣，這次他又改變主張。王力回憶：「主席雖然叫上海籌備成立公社，但究竟什麼時候成立，怎樣成立，毛主席的想法改沒有改？他的思想過程經常反復，也許他正在考慮，上海就那麼做了。毛對上海這次行動有保留。所以，當主管宣傳的王力請示毛澤東，是否要在《人民日報》刊登宣言和新聞，毛澤東說：《人民日報》不刊登，新華社不廣播。」⁴⁵

王力還回憶說，毛澤東不是對張春橋不滿，他是對陳伯達

45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890 頁。

不滿。張春橋在接到毛要他成立上海奪權機構後，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稱、宣言、形式、以及成立時間，所有具體事宜，都直接向陳伯達匯報請示。王力認為，可能張春橋以為，既然是毛澤東讓成立的，就不用再直接請示了。但如此大事，陳伯達卻沒有再向毛澤東請示，而就在這幾天，毛澤東對公社想法又改變了。可上海的公社卻成立了。毛澤東因此對陳伯達非常不滿，說他不請示匯報，對江青也有意見。毛澤東說中央文革小組沒有民主集中制，沒有請示報告制度，說話隨便，要陳伯達寫檢討。毛澤東通知張春橋、姚文元回北京，給陳伯達和江青開民主生活會。⁴⁶

2月12日，張春橋、姚文元到北京，下了飛機就直奔毛澤東處。毛澤東穿着睡衣等着他倆。毛和他們商量，上海人民公社是否能夠改名，和別的省市一樣都叫「革命委員會」？因為這涉及到政體、國家體制、國號問題，還涉及到外國承認問題。張春橋、姚文元當場做檢討，說自己考慮欠周到妥當，還是主席高瞻遠矚。

就在毛召見張、姚前一天，2月11日，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葉劍英責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葉劍英還質問陳伯達：「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葉劍英的質問，顯示了中央高層反對將國家政體改為公社。究竟是高層對公社體制的不認同，令毛澤東改變了主意，還是毛澤東自己覺察出公社後面一系列問題，抑或兩者都有？

張春橋和姚文元是秘密去北京的，除了徐景賢，沒有一人知道。為了不讓任何人包括機關聯絡站的人覺察張姚不在上海，徐景賢每天都去張春橋住處，通過加密電話，向張春橋匯

46 王力 2001 年著《王力反思錄》第 890 頁。

報上海情況，然後又在第二天，向大家傳達張姚指示，彷彿他倆還在上海。直到一個星期左右後，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

2月24日下午，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會議由姚文元主持，張春橋傳達毛澤東指示。張春橋說，他和姚文元去北京後，毛主席兩次找他們談話，談話中心就是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問題：

主席說，這樣就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發生了改變政體的問題，就是國家的體制問題，國號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問題，是不是要成中華人民公社呢？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的主任？還是叫社長？……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主席說在考慮，如果都叫公社，那麼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裏呢？他說，總得要有一個黨嘛，要有個核心嘛，他說，你不管叫什麼，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總得有個黨，一貫道也是個黨嘛，公社總要有一個黨，公社能不能代替了黨呢？……

毛主席說：所以，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還是按照老規矩辦吧！將來還是開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選舉人民委員會，這些名字改來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不解決內容問題，那麼現在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是不是還是叫革命委員會。⁴⁷

徐景賢宣讀一項決議，是關於當前上海任務和形勢的。這個決議不再以上海人民公社名義發佈，而是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佈。就這樣，雖然沒有正式宣佈改名，但事實改

47 引自張春橋姚文元1967年2月24日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名。會後，一輛彩車開到外灘，將「上海人民公社」牌子換成「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塊牌子是前一天晚上去找來的。由於時間急，來不及定做牌子，只好派人到手工業管理局下面專做牌子的工廠，將一家單位定做的大牌子先借用了。造反派們一個多星期前滿街貼的大標語「上海人民公社萬歲」，現在又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萬歲」覆蓋。

但是，也有對這種情況很不滿意的紅衛兵們，於深夜悄悄出動，在未來得及覆蓋的大標語上，用「一」字覆蓋了「萬」字，「上海人民公社一歲！」。⁴⁸

1967年3月14日，文革中上海郊縣的第一個縣級政權——川沙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到1968年3月下旬，全市10個縣、197個公社、34個鎮、14個農場，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⁴⁹ 上海的奪權至此基本完成。

從公社到市革會

上海奪權後，分三處辦公。馬天水、王少庸、徐景賢和王承龍都在原上海市委書記處辦公地點康平路大院辦公。王洪文在康平路大院也有一間辦公室，但他很少去。康平路大院內的工作人員，都是清一色的原市委機關幹部和機關造反派。另一個辦公處在原來市委的延安西路33號，從華山路370號門進去。這是原上海市委各部委的辦公處。機關造反後，這裏變成市委的鬥批改大樓。外灘的原市人委辦公大樓是第三個辦公地點，各個職能組室都在那裏辦公。張春橋和姚文元基本在興國路招待所辦公，只有開會才去康平路。

公社剛成立時，外灘辦公大樓的事，主要由三王負責。

48 這個行動的領頭者是師院附中和松江二中的初中學生齊奇和艾小中，帶着幾個初中的同學們幹的，他們後來被關押。

49 這些日期引自中共上海黨史研究室編纂 2004 年《中共上海歷史實錄》。

「三王」即工總司的王洪文和王明龍，以及機關聯絡站的王承龍。王明龍是公社組織組負責人，王承龍是公社辦公室負責人。王洪文不大去外灘，王承龍也不太去外灘。於是主要由王明龍、機關聯絡站的朱玉佩和朱維鏔抓那裏的工作。

在籌備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時，上海的各造反派組織給公社的定位是「臨時過渡性權力機構」：即先由一些造反派組織組織起公社，等以後再由全體上海市民正式選舉。這個思想，曾經在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宣言中有所表述：

它的領導成員，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奪權取得勝利後，由革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在目前，則由各革命造反組織協商推舉組成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它是革命群眾組織，人民解放軍駐滬部隊負責人和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領導幹部三結合的臨時過渡性的權力機構，行使公社的領導權力。不論是現在的臨時委員會，或是條件成熟時選舉產生的正式委員會，都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堅決執行毛主席制定的群眾路線，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接受群眾的監督，傾聽群眾的意見和批評。⁵⁰

但是，說是過渡性臨時委員會，待「條件成熟」就將選舉產生正式委員會，卻再也未見下文，以後從未進行過任何選舉。雖然最初的公社委員位置都不是給予個人的，而是給予組成公社的群眾組織的，由各組織自己派出代表擔任；但不久群眾組織「大聯合」，「委員」們也就失去了群眾組織代表的意義。從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到改名後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文

50 1967年2月5日《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載於1967年2月9日第7期《工人造反報》。

革中，在上海被簡稱為上海「市革會」），除了張春橋和姚文元，其他委員以及領導成員始終沒有固定人選：

1月15日，上三司與二兵團宣佈接管市委時，發佈通令任命張春橋為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姚文元為新市委第二書記、副市長。毛對這件事的答覆是「贊成上海群眾推選市委書記市長的做法。這兩個人我是知道的，但總不能只有這兩個人，總得有個名單，醞釀一下，報告中央，我也同意張春橋同志的意見，這個名單暫時不要宣佈，做一段工作，搞幾個回合，再宣佈。」這個時候還沒有提出三結合概念。這個新市委的名單應包括哪幾個方面尚未明確。⁵¹

一直到1968年9、10月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名單才正式報中央：

在這一年多時間，誰是領導成員，誰由於某方面不適宜而從領導成員的地位退下去，都是張一個人說了算，這就是毛同意張的主張——這個名單暫不公佈，做一段工作，搞幾個回合再宣佈——的結果。也是全國其他各省市奪權過程中沒有的現象，換一句話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這一年多時間內，完全由張春橋一個人說了算，成了張春橋的一言堂了。⁵²

每次討論市革會委員名單，都是內部協商，而不是選舉。王洪文曾對此有過解釋：

名單產生根據協商推薦上來，不採取大民主選舉的辦法，

51 朱永嘉、金光耀 2006 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52 同上。

用大民主造反派不可能選上的。名單是按發起組織：工總司、財革會、紅代會、紅東北、公安機關只一個，此外照顧先進人物，原來的影響，如炮司雖然犯過錯誤還是有個名額。要考慮代表性、權威性。⁵³

而張春橋，對選舉也不熱衷。他多次對人說過：

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制度，重要的不是選舉，而是及時撤換。⁵⁴

一直到1968年9、10月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名單才正式報中央。雖然對外沒有名單，但實際上，還是有一個沒有正式公佈的名單，除了軍代表之外，由七人組成。這個名單雖然沒有正式向中央報批，但實際行使着上海市革會的全部權力。他們是：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和姚文元；老幹部的代表王少庸和馬天水，這兩人1967年3、4月間被三結合進市革會；群眾組織的代表，即機關聯絡站的代表徐景賢和王承龍，以及工總司的代表王洪文。這七人的排名順序是：張春橋、姚文元、王少庸、馬天水、徐景賢、王承龍、王洪文。這個順序，是從當時市革會發文件的傳閱順序而來，「這個辦法是跟中央學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也有一個文件傳閱順序，這個順序是毛定的。那個時候，市革會的重大問題，就在這七個人的小圈子內議論，最後由張春橋一錘定音。」⁵⁵ 其他群眾組織的代表，被結合進

53 王洪文在1968年3月20日工總司全委會上的講話記錄，原文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只一個」意思可能是「每個組織只有一個名額」。

54 市六通訊號外稿，轉引自《毛主席啊，毛主席……》，載於《教育革命》1967年5月30日，第8期，上海市中等學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員會（較革會）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此外「紅上司」主辦的《紅衛戰報》1967年6月3日第40期上也有類似報道。

55 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已申春秋》。

市革會所屬各組的不多。不過有交大反到底的余小兵，他在市革會專案組。

張春橋、姚文元1967年至1968年間經常不在上海，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組員的身份，使他們經常要回北京，或去其他省份處理問題。張春橋指定，他和姚文元不在上海時，由王少庸主持會議。但實際上，王少庸和馬天水雖然名次在張、姚之後，但他倆此時剛被「解放」沒多久，權威尚未完全恢復，還不敢放手工作。而且，王少庸年紀大耳朵不好，接張春橋電話聽不清。許多時候都是徐景賢接聽。加上徐景賢原來就是張春橋的部下，對張的思維和處事方式熟悉，張春橋指揮徐景賢比王少庸更順手。徐景賢於是成為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實際代言人。所以，徐景賢當時被稱為「徐老三」，就是指他的實際地位排在張春橋和姚文元之後，第三位。而底層上來的王洪文，權威尚未建立，工總司的造反派說王洪文是「王小七」，因為他的實際地位排在第七位。⁵⁶ 此時的王洪文對自己的定位比較自知，承認徐景賢的地位。他在1967年三四月份對工總司總部成員的講話，曾特地說服那些對徐景賢心懷不滿的造反派：「張春橋、姚文元不在上海，我們要聽徐景賢的。」⁵⁷

小結

在整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過程中，張春橋都是小心翼翼，亦步亦趨地緊跟毛澤東，不敢越雷池一步。公社命名並非上海自行其是，只是一時信息不靈，沒來得及跟上毛澤東的思路轉換。

從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看起來，似乎只是名稱改變，而且當時大家也都覺得只是名稱改變。但其實，這是一個重要概念的改變。上海造反派們肯定沒有好好思

56 徐景賢 2003 年著《十年一夢》。

57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7 月 19 日對葉昌明的訪談。

考過，他們即將成立的公社，與以往的政權有什麼本質區別。但是，有一點他們卻是明確的，那就是：公社官員權力的合法性，必須來自民眾的選舉。這是以巴黎公社的外殼，爭取民眾的民主權利，兌現民眾對政府官員的選擇權和監督權。在當時的情形下，造反派們能夠利用的政治資源，只有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的這一原則，在文革剛開始時的《十六條》中就有表述：「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後，進行選舉。……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而由徐景賢起草的宣言中提出，「公社委員由群眾直接推選」、「公社委員是人民公僕，工資收入不得超過工人」等等。這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公社原則吻合：權力機構由民選產生並實行監督，政府官員的薪金不超過平均工資，公民有參政議政的權利。但是，這些內容被張春橋在修改時統統刪去，只說公社的臨時委員會是由各革命造反組織協商推舉組成，按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

實際上，所謂的巴黎公社原則之一的選舉，根本沒有實行過。文革前，民眾推舉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委員會再任命官員的做法，雖然只是走形式，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甚至連這樣的形式也沒有了，有的只是那麼幾個、十幾個造反派組織派出自己的代表組成公社。雖然參加公社的各派組織隨時可以撤換自己派出的代表，但這只是十幾個參加公社的造反派組織之間的勢力平衡。這十幾個造反派組織，既非民眾推舉，而且在民眾中也只是極少數；大批公民完全被排除在選舉之外，被剝奪對這個政權的選擇權。同時，公社的主要領導張春橋和姚文元也不是上海市民選出，他們的權威和合法性只來自毛澤東的信任。

毛澤東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實際代表國家政權機構中

的三方力量：幹部、軍隊再加上民眾的代表。軍方完全由上面委派，民眾毫無選擇餘地；幹部一方，最初由群眾「解放」，但後來還是由上面指派；即使民眾代表，也不是從選舉產生。民眾從來沒有資格對三結合成員進行投票，更不要說直接選舉。

而毛澤東，一再夢想建立公社，他理想的公社究竟是什麼樣的？從他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信來看，那應該就是他的理想國。但就是這封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也沒有提到民眾對政權的選擇權利。巴黎公社是以民眾自治為模式的，上海的造反派聯席會議，雖然有自治共同體的雛形，但也只是十幾個「發起組織」組成，這樣片面狹窄的成員構成，無法組成代表全體上海市民的政權機構。

毛澤東和張春橋的談話，除了對改國號覺得不妥外，最關心的還是「黨放在哪裏」？而所有的群眾組織，此時最關心最起勁的就是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以群眾組織聯席會議代替市委，根本沒有想到再給市委一席之地。但是，毛澤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這樣的政權形式，實際摒棄了市委。那麼今後黨放在哪裏？在群眾組織聯席會議之上，還必須有個黨。「黨的領導」是毛澤東的文革底線，也是對巴黎公社市民自治模式的不信任和堅決否定。

造反派們批評政府和執政黨的權利，並不是他們的天然權利，只是毛主席恩施的臨時權利，他們的造反對象只能被毛澤東圈定。文革中可以對除毛澤東本人(一度還加上林彪)而外的任何幹部造反，但不能對共產黨壟斷一切的權力造反。毛澤東號召群眾自下而上地造各級領導幹部的反，但群眾所能擁有的權利也止於此，止於造反權。一月革命之後，造反派曾經有過為期不長的選擇幹部的權力，那是在各級革委會初建的三結合時期，他們可以對「解放」或「結合」幹部發表自己的主張，可以選擇自己認為「革命」的幹部。當然，這只是幾個造反派組織有選擇權力，不是全體民眾。但是，即使是這樣，這個時期

也不長，隨着秩序的恢復，對幹部的選擇權被回收，任命制重新恢復，重新一如既往地自上而下掌握在黨手裏。造反派不能代替黨，公社也不能代替黨，黨的權力和利益，始終高於民眾的權利和利益。於是，毛澤東發動文革，讓民眾參與國事，最終卻沒有從操作層面，從體制上落實民眾對執政黨的選擇和監督權利。

「公社委員由群眾直接推選」這一巴黎公社原則，一月革命後非但再也不被提起，而且遭到批判。1968年2月，《紅旗》雜誌第4期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甚至否定全面選舉，說「迷信選舉，這也是一種保守思想」，「革命委員會是解放以來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機構。但革命委員會就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群眾的行動產生的。」公社的夢想就這樣被悄悄置換。

一月革命，文革政權成立，秩序重建。整個文革話語開始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倒走資派」，向「大聯合」、「批判派性」、「反對山頭主義」、「馬蜂窩就是要捅」等口號轉換，即要求造反派進行自身的整頓。在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正在結束。⁵⁸ 以後，整個1967年和1968年，都是試圖將1966年釋放出來的能量，重新塞回專政秩序和常規軌道的瓶內。造反派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所掙得的政治名份，又將被後面的一系列運動再被重新鑑定。

58 這是在加拿大大學任教的吳一慶的觀點。

這本書是關於上海十年文革的歷史。由於官方不開放史料，無法了解上層政治，本史稿更多地側重於底層的群眾運動。上海文革是中國十年文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革除了上層的政治鬥爭，群眾運動是其最大特點。文革群眾運動由兩大部分組成：紅衛兵運動，以北京為典型；工人造反派運動，以上海為典型。紅衛兵運動，到1968年上山下鄉基本結束。工人造反派運動，到1968年「大聯合」也基本結束。只有上海以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派，通過組織的體制化，基本保留了骨幹隊伍，在文革政壇整整活躍十年。除了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上海還有一支其他省份城市都不擁有的文革力量：以張春橋和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委寫作組。這股勢力左右着上海的輿論，對全國的輿論也起着重大影響。上海的文革就這樣與中央文革派緊密相連，從1965年的批判《海瑞罷官》，到1966年的安亭事件，到1967年的一月奪權，到1976年的未遂武裝反抗，始終為毛澤東的文革尋找突破口，忠實地實現毛澤東的心願。

隱藏在本書整個敘事背後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為什麼，本書追溯的是歷史的初始動機和邏輯。許多事情或事件，最初究竟因何而起，希望通過細節，尋找歷史的來龍去脈。

李遜，女，1948年生，畢業於上海成人業餘大學中文系。1979-1992年，先後在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總工會工運研究所工作。與美國學者裴宜理合著《無產階級的力量》（*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美國 Westview Press 1997年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大眾圖書館 <http://dztsg.info>

ISBN 978-0-19-944168-6



9 780199 441686